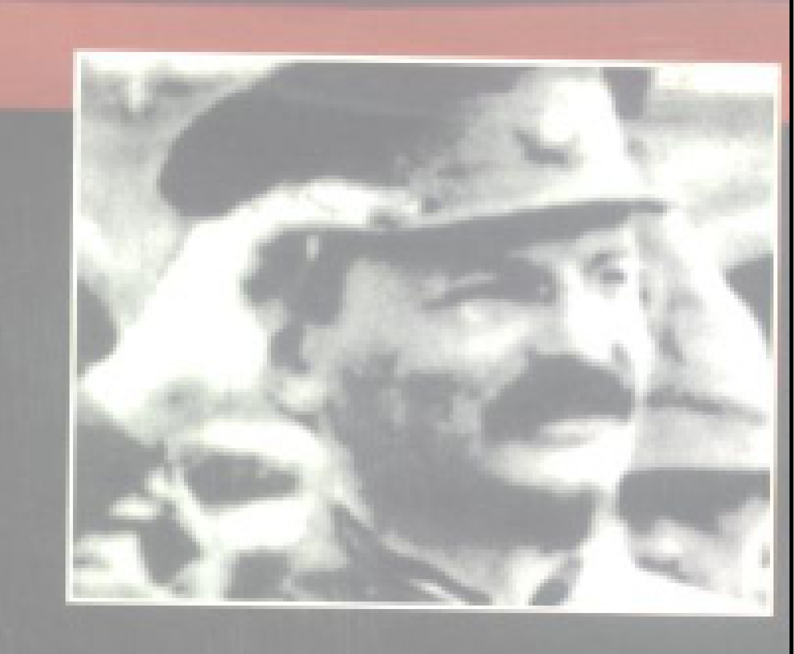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武装的先知

TROTSKY

托洛茨基

1879 - 1921

先知三部曲

[波] 伊萨克·多伊彻/著

先知三部曲

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1879—1921

〔波〕伊萨克·多伊彻 著
王国龙 译
施用勤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北京

037563

ISAAC DEUTCHER:
Trilogy of the Prophet——Trotsky:1879 - 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959 19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知三部曲/[波]多伊彻著;王国龙等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ISBN 7 - 80109 - 137 - X
Ⅰ.先…
Ⅱ.①多…②王…
Ⅲ.托洛茨基(1879 - 1940) - 传记
Ⅳ.K835.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066 号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 - 61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旭文建业图文设计制作中心(84011770)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200 千字
插　　图:139 幅
印　　张:55.25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套(全三册)
定　　价:98.00 元

译者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 年》（1954 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 年》（1959 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 年》（1963 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1906 —1967），生于当时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让诺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 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2 年因参加波兰共产党内

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9 年德国占领波兰后，侨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出版多部著作。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斯大林政治传记》、《未完成的革命：俄国 1917—1967 年》等。作者撰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册子和著作，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档案，俄共会议记录，《真理报》等俄文报刊，托洛茨基同时代人的著作、文章、书信及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作者依据这些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每日电讯》将其誉为“本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观察家》上说：“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另一位学者 A.J.P.泰勒(Taylor)在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评论道：“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 90 年代，包括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还没有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超过多伊彻的这部权威性的托洛茨基传记。

本书第一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和残酷的派别斗争，也介绍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最初的流放生活，特别突出地评介了托洛茨基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三卷着重叙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以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本书依据的史料极为丰富，叙述详尽而有层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二卷前言中强调，他力图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尽可能避免因主观感情或因注重一时情况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使他的这部传记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全书史料的取舍、观点的评述、重点的侧重等方面来看，作者的确是在向这一目标努力，因而才能使这部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霍·卡尔(E.H.Carr)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言：历史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因为“记载历史事实的人”总是“现在的人”，所以历史实际上是“现在跟过去之间

的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它必然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印记。托洛茨基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可能不反映到这部传记中来的。在这部传记中，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尽管在被波共开除出党后，并没有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但他对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论问题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全书来看，作者几乎把托洛茨基当成“无所不能预言”的先知，就连作者都承认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些预言，他也试图从中找出“合理的因素”来，比如，读者可以从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预言的分析中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二，本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必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历史资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来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的分析和评价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们希望，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今天，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我国国际共运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注意，有助于深入总结和认识苏联解体的教训，推动上述领域的研究。

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对全书译文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1)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单词或词组均直接译成中文，没有采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单词再加注的方式；

(2)原书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译文错误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译出，不再作注加以说明；

(3)原书中的里程和距离均以英里为单位，这对英语读者比较

方便,却让中国读者费解。所以,我们或是参照俄文原文改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为了便于读者核查参考,本书中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译文为准,所标卷数及页码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加注明;

(5)由于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与本书作者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译本中没有。凡在中译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们在注中均标出"中文版"字样,未标"中文版"字样的,其卷数、页码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注明。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原由郑超麟先生组织王国龙、周任辛、喻守一翻译:王国龙译第一部,周任辛译第二部,喻守一译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后,家属将其译稿带回家乡留作纪念。现用的第三部译稿是由施用勤、张冰、刘虎合译的;施用勤译前言和第一章;张冰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刘虎译第五章和跋。全书的译校情况如下:《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年》,王国龙译,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周任辛译,刘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年》,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全书由施用勤、张以童统校。郑超麟先生虽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参考著作名称的翻译,都是经他审定的。遗憾的是郑超麟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同志通读了全书的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刘庸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把译文质量关,弥补了译校者的一些疏漏并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对人名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版权的联系过程中，得到英国汉学家、利兹大学教授格雷戈尔·本顿（Gregor Benton）博士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有关国际共运著作的专业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我们在该馆工作人员阎虹女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本书部分俄文参考书并据此纠正了原书中英译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讹误，从而提高了中译文的质量；另外，在核对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阎虹女士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原著各卷的书名是独立的，并没有总书名。中文版根据各卷书名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其定名为《先知三部曲》。

本书的翻译工作工程较大，且延宕数年，尽管全体译校者和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尽心尽力，但译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

译　者

1998年11月28日

于北京西单西斜街

前　言

我最初打算撰写俄国革命领袖传记三部曲时，只想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不是他的生平。托洛茨基的晚年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较之他早期的辉煌经历更能激起我深刻的想象。但当我再次思考时，我开始怀疑，如果不叙述托洛茨基的前期经历能否使人完全理解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尔后我研究了史料及传记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是我刚刚见到的，我才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最后几年的戏剧性事件早在他的前期，甚至在他最早期的生涯中已扎下了多么深的根子。因此我决定为他写两卷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记：《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卷叙述的或许可以说是托洛茨基的“崛起”；第二卷则可以说是他的“垮台”。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传统术语。因为我认为，一个

人的崛起当权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巅峰,失去权力也不等于是他的失败。

这两卷书的书名是受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那本书中的一段文字的启发,这段文字即在本书的卷首语页上。本书的研究阐明了这段文字所说的真理,但它对此也作了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马基雅维里认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这话当然符合实际。也许可怀疑的是:武装的先知与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不同以及胜利与毁灭的区别是否总像《君主论》一书的作者看到的那样清楚。我们在本书中首先看到,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中没有武装而获胜,以后我们看到,他武装起来,所向披靡,却又在甲胄的重压下被压弯了腰,因此,叙述他达到权力的巅峰的那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尔后在构思《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他获胜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

我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使某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对苏联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而且不仅是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经历已经像一座埃及古墓,人们都知道墓中埋葬着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和用金字镌刻的有关死者生前功绩的记录;但经过盗墓及盗尸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芜凄凉、一无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过去藏有记录的痕迹。照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盗墓之徒持续不断的反复洗劫甚至对有独立见解的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经历的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的著作和他的档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敌对的同代人的大量回忆录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出版的俄国期刊的合订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中，保存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逐字逐句记录的报告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文件资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虽然其中少数资料只能在私人图书馆中找到。所有这些资料我都利用了。我妻子除了与我共同分担查寻资料的工作，还在其他方面对这一研究工作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一起专门研究了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俄国革命前的期刊。我在那里发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学家很少用过的史料，我和我妻子还一起研究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里的托洛茨基档案。迄今为止，这个档案是苏联境外有关苏联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收藏库（本卷末的参考目录中对这个档案作了简要说明）。

因此，我在这里没有理由再像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序言中那样为缺少传记史料而抱怨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写的这两个人物截然不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生平及活动毫不隐讳，不像斯大林那样守口如瓶。他让完全陌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探究他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他写了一部自传，而更重要的是有他的几十卷已出版的著作和难以计数的没有以单行本再版的论文、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发表的著作，这些都是不自觉地留下的可靠的自传线索。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使后人无法抹杀或篡改，甚至连他本人在个别情况下想这样做也办不到。

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要求传记作家为记述一个已写下自传的政治领袖的生平而进行辩解。我觉得本书情况对这一惯例也许是个例外。我经过批判性的认真考察后仍认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像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完全是真实的，然而它也留有作者对其反对斯大林的失败斗争所作自我辩解的痕迹。托洛茨基生前在《我的生平》的每一页中与盗墓之徒搏斗，他用带有自我赞扬味道的自卫行动回击斯大林派的全部诋毁。他对革命气候的变化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革命气候的变化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失败；但他却说是心胸狭隘、歹毒的篡权官僚

集团阴谋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种说法显然不恰当。引起传记作者关注的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对自己的失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严酷的环境以及他的性格迫使他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托洛茨基的一生是真正的典型悲剧,或毋宁说是古典悲剧在当代政治现实中的重演;如果托洛茨基能揭示这一点的话,他确实是超人了。另一方面,传记作者看到,托洛茨基在处于成功的巅峰时像希腊戏剧中的主角一样感到内疚,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也一样一心要赎愆。我相信,对这种带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既无须辩解,也不该谴责。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试图按照斯大林及本世纪20年代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状况——即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强加给他的观点为自己辩解。斯大林指责他是列宁的死敌,因而托洛茨基急于证明自己完全忠于列宁并与列宁完全一致。1917年以后,他忠于列宁是无可置疑的;他们之间一致的观点确实不少,而且还都是在重大的问题上。然而托洛茨基却抹煞了1903年到1917年间他与列宁辩论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性,还抹煞了他与列宁后来的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按崇拜列宁的观点进行辩解,因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这就是与列宁相比而贬低他本人在关键时刻的作用,这主要指的是缩小他本人在十月起义和创建红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不使自己被看做是贬低列宁的人,他才贬低自己在这两件事上的功绩。这在自传文学中是极为罕见的手法。因为我不受忠于任何偶像的束缚,所以我试图恢复历史天平的原样。

最后,我总是特别注意作为作家、小册子作者、军事著作作者和记者的托洛茨基。他的大多数作品现在已都被广大读者遗忘了,而且也无处可寻,萧伯纳(Bernard Shaw)只凭不高明的译本就能判断托洛茨基的写作才能,他说这是"胜过朱纽斯(Junius)及伯克(Burke)"的作家。萧伯纳这样评述托洛茨基:"像莱辛(Lessing)所说的那样,当他砍下对手的头时,把它举起来,让人看到头颅里

没有脑子，但他却不伤害他的牺牲者的人格。……他使他的牺牲者的政治声誉扫地，却让此人保全面子。"[1] 考虑到本卷的篇幅和结构，不允许我更详尽地展示托洛茨基这方面的品格，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我希望能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对此加以弥补。

伊·多·
1952年10月

① 《民族》杂志伦敦1922年1月7日。

致　谢

我非常感谢爱·霍·卡尔教授和巴巴拉·沃德－杰克逊夫人的批评及友好的鼓励，他们读过本书几章的手稿；感谢唐纳德·泰尔曼，他读过本书的全文。伯纳德·辛格谙熟俄国生活，他这方面的知识对我大有裨益。我非常感谢D.M.达文先生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部成员，他们对本书文体的改进提出不少建议。雨果·迪尤尔和乔恩·基姆彻先生热情地帮助我，给我提供资料及有关著作，其中有些是现在罕见的传记资料。我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Wm.A.杰克逊教授及其助手，他们帮助我和我的妻子找到查阅托洛茨基档案材料的门路，我同样感谢胡佛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国家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牛津大学出版社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的慷慨资助，

使我和我的妻子能在美国住上几个月并完成我们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工作的完成完全取决于能够进入上述美国图书馆。

我欠其他作者的人情债,将以在本书的脚注中表示谢意来偿还。卷首语摘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的英译本,该译本为《人人书库》中的一本,译者是 W.K. 马里奥特,摘录征得 J.M. 登特父子图书有限公司的许可。

伊·多·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的统治已逐渐接近阴暗的末日。这个统治者的继位及其早年的改革曾在俄国社会上,甚至在流亡的革命者中引起非常乐观的希望。事实上是,他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因而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但他却在绝望的洞穴里度过其最后的岁月——像一只被革命者追捕的野兽,躲在皇宫里,以避开革命者的手枪和炸弹的袭击。

沙皇正在为他自己激起的希望落空而受惩罚:他几乎使社会上的每个阶级都失望了。在不少地主看来,沙皇仍然头戴皇冠、身穿皇袍在颠覆自己,地主们决不原谅沙皇1861年的改革,这一改革剥夺了他们对农民的封建统治。在农民看来,沙皇解除了农奴

制的重负只是为了让他们受贫困和债务的压榨:农奴在解放时不得不把他们耕种的许多土地还给贵族,而对留下的土地则要长期偿付大笔赎金。他们仍然尊重沙皇,把他当做他们的恩人和朋友,并且相信,是贵族违反沙皇的意愿骗走了解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但是,在农民中已经激起了对土地的渴望,这一对土地的巨大渴望在半个多世纪中震撼着俄罗斯,并使它的身心都陷于狂热之中。

俄国社会的主要阶级仍是贵族和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发展缓慢。但这个阶级和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它没有社会渊源,没有传统,没有本阶级的思想,没有自信,没有势力。小部分农民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产业工人阶级。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10年中,虽曾发生过最早的工业大罢工,但城市工人仍只被看做是背井离乡的农民。

这些阶级对皇位都不能构成威胁。每个阶级都希望君主本人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昭雪他们的冤屈。总之,没有一个阶级能表示自己的不满或使自己的要求广为人知;没有一个阶级能集合本阶级的成员,积聚力量,组成一个代表本阶级的组织或政党。这样的阶级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国家和教会有全国性的组织;但这两者的职能,即决定其形式及结构的职能,是压制而不是表达社会的不满。

只有一个集团,即知识分子集团起而向王朝挑战。各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一直没有进入官员行列中的人,对沙皇——解放者——不满的理由不亚于农民。沙皇先是激起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继而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正如他激起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后使他们失望一样。亚历山大跟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一样,他虽没有用蝎尾鞭抽打知识分子,但还是用鞭子惩罚他们。他在教育和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纯属敷衍,十分吝啬;全国的精神生活仍在警察、书刊检查制度和圣教公会的监控之下。沙皇给知识分子披上

自由的外衣，因此，他拒绝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就使他们更痛苦、更屈辱。知识分子的自由被人玩弄了，他们企图报复；沙皇竭力驯服他们的倔强精神，所以他放弃了半自由主义的改良，代之以镇压来压制不断增强的反抗。

就数量而言，知识分子很弱。他们中积极革命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他们反对拥有9000万臣民的统治者的斗争说成是大卫与歌利亚的决斗，还是夸大了他们的力量。整个19世纪70年代是知识分子反抗的典型的10年。在民粹派的和平的“教育及宣传”运动阶段所卷入的知识分子至多只有几千人；最后，在恐怖主义运动阶段，直接参加的男女斗士不到40人。但就是这40来人使沙皇在自己的国土中成为流亡者，并且牵制了整个帝国的力量。只有在一个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国家里，一个如此之小的集团的形象才能变得如此高大。知识分子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不同，他们长于语言表达，而且都受过教育，这对分析危害国家的种种罪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制订出人们认为能医治这些罪恶的纲领。如果他们只想为自己说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政权进行挑战了。起初鼓舞他们的是巨大的幻想，幻想他们自己是全国的、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想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结合起来，把自己的革命组织称为“土地和自由社”。他们渴望汲取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努力使之适合俄国的情况。他们梦想的新社会的支柱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农民。那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不是公有制的工厂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公社——在俄国残留的古老的农村公社。

“19世纪70年代的人物”注定是革命的先驱。其实，并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支持他们。在这10年中他们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孤立，他们丢掉一些幻想也只是为了拾起另一些幻想。他们力图解决困境中的难题，有些难题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

的,有些则是每一场革命运动都要遇到的。起初,他们试图推动农民起来行动,像拉甫罗夫(Лавров)的追随者那样启发俄国农民认识独裁的罪恶,或像巴枯宁那样竭尽全力鼓动农民反对沙皇。在这10年中,男女知识分子曾两次抛弃家庭和职业,为了接近农民的思想,他们力图作为农民生活在农民之中。一位负责监视这些男女知识分子的宪兵队将军曾写道:“大批的社会主义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干劲从事这一行动,这在欧洲所有秘密社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的相反,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毫无结果。俄国农民仍相信沙皇——解放者,他们以冷漠、怀疑或赤裸裸的敌意对待民粹党人启发和鼓动他们的话。宪兵队和警察围捕“到民间去”的理想主义者;法庭判处他们长期监禁、苦役或流放。

由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逐渐被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中坚分子密谋策划的思想所取代,运动方式随之改变了。先前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到农村去这种运动始终是自发的,并没有得到任何核心的领导。而新的秘密团体必须是一个严格保密、联系紧密、纪律森严并具有强有力的领导的组织。其领导人热里雅鲍夫(Желябов)、基巴利契奇(Кибальчич)、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Софья Перовская)、维拉·菲格涅尔(Вира Фигнер)及其他领导人开始并不想进行恐怖行动;但他们的处境和事变的逻辑迫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1878年1月,青年妇女维拉·查苏利奇(Вера Засулич)——她后来影响了本书的主人公——开枪刺杀彼得堡宪兵头子特列波夫(Трепов)将军,[①]以抗议他对政治犯的虐待和侮辱。在受审时,她揭露警察当局滥施酷刑的可怕罪行。被告的揭发使陪审团十分震惊,她的诚挚的理想主义又使他们深受感动,因此他们宣告她无罪。警察

① 此处原文有误,特列波夫当时是彼得堡市市长。——译注

局企图在法庭外逮捕她,同情她的群众救了她,使她得以逃脱。沙皇命令:今后政治犯一律送交军事法庭,不再由陪审团审理。

查苏利奇的心血来潮之举及这一行动引起的反响给密谋分子指出了一条路。1879 年,即本书记述的第一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了。其中一派成员一心要从事恐怖活动直到推翻专制统治为止。他们成立了一个新团体:民意党,或称自由党。[①] 他们的新纲领强调公民自由远远超过强调土地改革。另一个团体影响较小,它不重视恐怖主义的秘密活动,分裂后他们成立了"土地平分社",主张平分土地。这个团体以普列汉诺夫为首,当时他流亡瑞士。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个团体中产生的,而且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信件也是由这个团体带给俄国国内的革命者的。

1879 年,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恐怖事件。2 月,哈尔科夫省省长克鲁泡特金(Кропоткин)亲王遭枪杀。3 月,政治警察头子德林特恩将军遇刺。这一年中,沙皇曾两次死里逃生:3 月间,一个革命党人向他开了 5 枪;夏天,沙皇从克里木的行宫归来时,几枚地雷在他的专列下面爆炸。接着是大规模的逮捕、绞刑及流放。但在 1881 年 3 月 1 日,密谋者刺杀沙皇终于成功。

沙皇统治向全世界展示着其威严和权力的辉煌外观。然而,卡尔·马克思 1879 年 4 月在从伦敦写给一位俄国朋友的信中就已指出:这一外观掩盖着俄国社会的解体。他把亚历山大统治结束时的俄国情况与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情况作了对比。[②] 的确,领导俄国革命的大多数人正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 10 年中诞

① 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 常译为"民意",其实 воля 一词有意志和自由和双重含义,因此两种译法都可以。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革命家书信集》第 84 页。

生的。

※ ※ ※ ※ ※

1879年,在远离这些激烈斗争场面的南乌克兰赫尔松省的阳光明媚、平静的草原上,大卫·列昂季耶维奇·勃朗施坦(Давид Леонтьевич Бронштейн)搬到靠近博布里涅兹小镇的一个庄园里住了下来。这块地产是他刚从亚诺夫斯基上校那里买来的,农庄因此得名为亚诺夫卡。沙皇把这500俄亩土地赐给上校作为对他服役的奖赏,但他经营农庄一直不成功,因而愿意把100俄亩土地卖给勃朗施坦,还另外租给后者200俄亩。这笔买卖在这年年初谈成。夏天,新农庄主和他的一家从邻近的村庄搬到庄园的茅屋里,这几间茅屋是连同土地一起买下来的。

勃朗施坦是犹太人,犹太人经营农业颇为罕见;但也有40来个犹太人农垦区散落在赫尔松草原上,他们都是从拥挤的犹太人聚居"区"里被排挤出来的过剩人口。在俄国,不许犹太人在聚居区以外居住,也就是说,不许在主要位于从波兰吞并来的西部各省的城镇以外居住,但允许他们自由定居在邻近黑海的南方草原上。18世纪末,那里的人烟稀少的肥沃土地已属于俄国,因此,沙皇急于向那里移民。正如移民史上常见的那样,这里的拓荒者也是外国移民及被流放的人。沙皇鼓励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去征服那里的荒原。定居的犹太人改善自己命运的时机到了。他们扎根乡间,享有某些优惠,而且避开了在犹太人聚居区经常面临的被驱逐及遭受暴行的危险。犹太人聚居区究竟能扩展多远,从来就不清楚。亚历山大一世曾准许稍加扩大,但尼古拉一世登上王位后不久就命令把犹太人赶回去。到19世纪中叶又把他们从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波尔塔瓦和基辅周围的城镇里

赶出,被赶出来的人大多数又回到了范围缩小了的拥挤的聚居区,而少数人则到草原上去谋生。①

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初,在这几次驱逐犹太人中的某一次,亚诺夫卡农庄新主人的父亲列夫·勃朗施坦及其一家离开第聂伯河东岸波尔塔瓦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在赫尔松省定居下来,他的子女长大后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但只有大卫一个人富裕起来,可以离开犹太人聚居区在亚诺夫卡作为一个独立的农民建立家业。

通常,移民都出自犹太居民中的最下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小镇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业格格不入,因此只有极少数在小镇中难以糊口的人才愿去从事农业。商人、工匠、放债人、经纪人、犹太教经典的虔诚信徒都宁愿住在犹太人聚居区,哪怕是生活悲惨的既定犹太人聚居区也行。他们极其蔑视农村生活,他们习惯称农民为 Am Haaret(即乡下佬),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指对圣经一无所知的穷人和俗人。那些到草原上去谋生的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不怕艰苦而又陌生的劳动,而且他们与犹太教联系很少或全无联系。

亚诺夫卡的新主人肯定会被他的教友称为"乡下佬"的:他是文盲,不关心宗教,甚至还有些蔑视犹太教。尽管他只是第二代庄稼汉,但他已使自己成为十足的农民、自然之子,几乎让人看不出是犹太人了。在他家里,不讲依地语(即古日耳曼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而是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说。但勃朗施坦一家跟大多数俄国农民不同,他们根本就记不得农奴制了,在这空旷的草原上从未确立过牢固的农奴制。大卫·勃朗施坦是一个雄心勃勃、吃苦耐劳的边远地区的自由农,他决心使他的农庄兴旺

① C.M.杜勃诺夫:《俄国、波兰犹太人史》第2卷第30-34页及同书各处。

发达,他无情地驱赶自己和他的雇工去辛勤劳动。他面前还有许多机会:因为他搬到亚诺夫卡时才30岁左右。

他妻子安娜(Анна)的身世不同。她不是在乡村而是在敖德萨或南方别的城镇长大的。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图书,偶尔也读读俄国小说,这在当时的俄国犹太妇女中是很少见的。她在娘家接受正统的犹太教传统,比丈夫更遵守教规,在安息日她不外出,不做针线活。她的中等阶级出身使她潜移默化地染上一点儿宗教的伪善。如果必要的话,她在安息日也干点儿针线活,但非常小心,不让人看到。她怎么会嫁给庄稼汉勃朗施坦,却不清楚。她儿子说,勃朗施坦年轻时仪表堂堂,她因此爱上了他。这使她娘家人不满,因为他们看不起乡下人。然而,这并非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年轻的勃朗施坦夫人起初对农村生活并不喜欢,但后来她尽力摆脱她的城市习惯,逐渐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在搬到亚诺夫卡之前她已生了4个孩子,来到亚诺夫卡之后的几个月,即1879年10月26日,她生了第5个孩子,是个男婴。按祖父的名字给他取名为列夫,他的祖父就是那个离开波尔塔瓦附近犹太人城镇到草原来谋生的人。[①]

由于命运的巧合,这个男孩生于10月26日(或新历11月7日),正是38年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日子。[②]

※ ※ ※ ※ ※

这个男孩在亚诺夫卡度过了他一生中头一个9年。他的童年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章。

② 同年的两个多月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的小镇里。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既不像“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勃朗施坦一家过着勤劳节俭的暴发户的严苛生活，“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想着劳动和积累。”“亚诺夫卡的生活完全受田间劳动的节奏调整。除世界市场的粮价外，别无其他紧要问题”；[①] 当时世界市场的粮价正在迅速下跌。尽管如此，勃朗施坦夫妇并不比大多数庄园主更看重钱财；为子女花钱他们并不吝啬，而是竭尽全力使子女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廖瓦[②] 出生时，大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家里给婴儿雇了个保姆，很少有农民能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后来，亚诺夫卡大概还请过一位音乐教师，还打算把男孩们送到大学读书。但他的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未能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很多体贴，两个姊妹和保姆的深情钟爱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廖瓦逐渐长大，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聪明伶俐，性情和善，深受父母、姊妹、佣人及农场雇工的喜爱。

按他那时所处的环境的标准来说，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勃朗施坦一家的农舍用泥土垛成，有5个房间，其中几间矮小阴暗，泥土的地面没铺地板，下大雨时顶棚漏雨；但当时的农民都住在这样泥垛的小房子里。此外还有一两间棚屋。廖瓦童年时，他家渐渐富裕起来，声望也越来越高，农作物的收成和牲畜都在增加；小屋附近建起了新的建筑物，紧靠着住房建了个大工棚，其中有作坊、厨房以及几间佣人住房，后面是一串大大小小的谷仓、马厩、牛棚、猪圈等等；更远处，在水塘对岸的小丘下建了座大磨坊。显然，这是那片草原上唯一一座磨坊。夏天，附近及远处乡村的农民都来这里加工他们的谷物。他们要排队等上几个星期。天晴时，他们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章。

② 廖瓦是列夫或列昂的爱称。

就露宿,雨天则睡在磨坊里面。他们用实物支付脱壳及磨粉费用,把1/10的谷物留给磨坊主。大卫·勃朗施坦起初把粮食卖给当地商人,但富裕起来之后,他在黑海岸边迅速发展起来的粮食港口尼古拉耶夫有了自己的代理批发商,通过后者出售他的粮食。几年后,若不是因为1881年颁布了新法令(该法令甚至禁止犹太人购买草原上的土地)的话,凭他的财力就不难在亚诺夫卡购买比他原有土地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只能向邻居们租地,而且是大规模地租地。邻近的土地都属于"开始没落"的波兰及俄国地主,他们满不在乎地挥霍财产,一个个债台高筑。即便如此,他们仍住在豪华的乡村宅邸里。

这个男孩在这里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腐朽的社会阶级。格尔托潘诺夫家族是破落贵族的典型。过去,一个大村庄及整个一个乡都是以他们家的姓命名的,整个地区曾一度归他们所有。但这时,老格尔托潘诺夫已只剩400俄亩土地了,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了这些土地,向银行支付租金。格尔托潘诺夫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来我家做客时总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给我们讲她的青春、她那众多的女仆、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家作坊里当过学徒。"[①] 不难想象,当勃朗施坦夫妇把自己和这样的邻居相比时会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而自豪。他们把自信、乐观、勤劳几乎都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父母和姊妹们都尽力想把小廖瓦留在家里或农舍附近,但农庄的忙碌和混乱对他的诱惑力太大,只有在冬季的那几个平静单调的月份里,全家的生活才集中在餐室里。隔壁作坊的魅力吸引着小廖瓦:机工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开始教他使用工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46-47页。

具和材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全家的知心朋友，他在农舍里和东家同桌吃中饭和晚餐。这在一般犹太人家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机械师的技巧、玩笑及愉快的性格迷住了小廖瓦，他在《我的生平》中回忆这位机械师时，称其为在他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过，在作坊里，这个孩子不时会碰到其他雇工古怪脾气的发作。他多次偷听到他们用粗暴刺耳的话骂他的父母。这些话使他震惊，使他思考，令他难忘。

他从作坊溜到谷仓和牛棚，常常躲在阴凉的粮仓里玩捉迷藏。就这样，他逐渐熟悉了周围的人、牲畜及草原的广阔的空间。他跟姐姐学字母。当他注意到农民们为粮食及钱的事跟他父母在磨坊里发生争执时，他初步了解到数字的重要性。他注意到贫穷、苛刻和由此引起的软弱无力的反抗情景，他注视着半饥饿的雇工们在收获季节的罢工。"雇工们离开田地，聚集在主人的院子里，趴在仓房下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得伤痕累累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了酸奶、西瓜或半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回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① 他还记得另一个场景：黄昏时，一群从地里回来的雇工双手前伸着，慢慢地挪动脚步，他们由于营养不良已患了夜盲症。一个卫生检查员来到亚诺夫卡，但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勃朗施坦夫妇对待雇工并不比别的雇主更坏，食物、汤及粥的供给也不比其他庄园更差。这一切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是无需夸张的。不少人在童年时也都目睹过这类情景，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可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革命家。使廖瓦心中点燃反对社会不公平的怒火并使他的思想转向反对现存制度还需要其他更复杂的影响。而当这些影响出现时，便会使他清晰地想起还储存在他记忆里的这些形象和情景，因而它们在他的感受及意识里起到更强烈的作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42页。

用。这个孩子平时认为他周围的环境是合理的,可一旦他父亲苛刻惩罚农民时,他就不知所措,把脸埋在餐室沙发的靠垫上忘情地哭起来。

他7岁时,父母送他到格罗莫克列亚的一所小学去上学。格罗莫克列亚离亚诺夫卡只有4俄里路,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聚居区。他在那里住在亲戚家中。他上的这所学校也许可称之为犹太小学,是一所私立犹太教会学校,使用依地语教学。学校教孩子学圣经,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依地语。课程表上还有作为附修课的俄语课和几节数学课。他不懂依地语,所以既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也跟不上同学。学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肮脏发臭的洞穴,这个习惯在田野上游玩的孩子在那里一定会闷得要死。成人们的作风也使他迷惑不解。有一次他看到,格罗莫克列亚的犹太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拖着一个放荡的女人走,无情地凌辱她,大声地辱骂她;还有一次看到移民们严厉地惩罚一个盗马贼。他还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村子的一边是犹太移民的肮脏茅舍,另一边是德国人居住的结实整齐的农舍。吸引他的当然不是犹太人的茅舍。

他在格罗莫克列亚住的时间不长。因为几个月后,勃朗施坦夫妇看到这个孩子闷闷不乐,决定领他回家。因而他与圣经告别,与那些愿意继续用古怪、单调的节奏把难懂的希伯来语短诗译成难懂的依地语的同学们告别。[①] 但他在格罗莫克列亚的几个月中学会了读写俄文,回到亚诺夫卡后,他不倦地抄写手头几本书中的段落,后来写作文,背诵诗歌,还自己作诗。他开始帮父亲算账、记账。家人常拿他向前来做客的邻居炫耀。父母要他朗诵他写的诗歌,让他画画儿。起初他总是难为情地逃走,但不久就习惯于接受人家的称赞,而且期待着受人称赞。

---

① 后来他在敖德萨时再次学希伯来语,但成绩也好不了多少。

他离开犹太学校后一年左右，一位客人来到亚诺夫卡，此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莫伊塞·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Моисей Филипович Шпинцер)，他是勃朗施坦夫人的远房侄子，属城市中产阶级。"他既做点儿新闻工作，也兼做点儿统计工作"，他住在敖德萨，已接触到激进的自由思想。因为政治上有过小小的过失不准他进大学。他来亚诺夫卡养病，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在此期间，他对这一家中聪明纯朴的宠儿下了不少功夫。他还自愿要带这个孩子去敖德萨并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勃朗施坦夫妇同意了。于是在 1888 年秋天，廖瓦带着准备好的崭新的校服，包里还装着亚诺夫卡农庄厨房里所能做出的一切好吃的东西，含着既有离愁也有欢乐的泪水告别了家人。

黑海岸边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是俄国的马赛。不过，它的历史不如马赛那么悠久。这是一座阳光灿烂、欢快的多民族城市，它向多种风尚和影响敞开大门。敖德萨人气质中的主要成分是南方人的奔放、对富丽堂皇的场面的喜爱以及富有温情。然而，廖瓦在敖德萨住了 7 年左右，这座城市及其气质远不及施宾策尔家对他的思想及个性产生的影响大。他以前从未进入过一个与他自己的家反差如此鲜明的家庭。起初，施宾策尔夫妇生活不大好，施宾策尔因进不了大学而处境不佳，她妻子当时是非教会办的犹太女子学校校长，是家庭的支柱。后来，施宾策尔成为有名的自由派出版家。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 40 年后结识了这对夫妇，说他们是"镇定沉着、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①] 夫妇俩着手教这个孩子讲标准俄语，而不讲乌克兰语和俄语混在一起的家乡土话，他们使他的言谈举止优雅大方。他容易接受这种影响，也急于使自己从乡下顽童变成像样的学生。新的兴趣和欢乐在他面前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 14 页。

展现出来。晚上,施宾策尔夫妇朗读俄国古典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及他们喜爱的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后者的诗是对沙皇制度造成的苦难的抗议。廖瓦听得入迷,如果催他从诗歌的金色云彩上降下来去上床睡觉时,他总要表示异议。他从施宾策尔口中第一次听到浮士德和格蕾芩的故事;《奥列维·特维斯特》使他感动得流泪;他还偷偷地读了托尔斯泰震撼人心而又阴沉的剧本《黑暗势力》,这个剧本刚被检查机构查禁,是成年人暗中谈论的主要话题。

施宾策尔为廖瓦选择了一所学校,可是他的年龄太小。但家乡的人口注册员填写出生证明时把他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解决了这个难题。更大的障碍是,前一年,即 1887 年政府颁布的臭名昭著的限制入学人数的法令对犹太人入学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即不得超过入学总人数的 10%,有些地方不得超过 5%或 3%。犹太新生还要参加入学考试。廖瓦没读过小学,因此没考好。他被送入这所学校的预备班读了 1 年,预备班的犹太学生比外边申请入学的犹太学生享有优先入学权。

圣保罗实科中学是这所学校的校名,它不教希腊文、拉丁文。但学生在理科、数学及德、法现代语言方面比在古典中学能打下更好的基础。在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课程安排是合理的,可以使他们的孩子受到合理而实用的教育。圣保罗实科中学是敖德萨的德国路德派新教团体创办的,但也免不了俄国化,廖瓦进入这所学校时,这里已用俄语教学。但是,在学生和教师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他们分别信奉希腊东正教、路德教、罗马天主教及犹太教。如此之多的民族和宗教造成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这在俄国学校中是少见的。没有一个民族占优势,也没有偏袒某一个教派,甚至对希腊东正教也没有特殊的偏爱。最糟糕的事也仅是一个俄国教师经常拐弯抹角地找波兰学生的麻烦,或是东正

教神父一贯用不那么露骨的蔑视凌辱犹太学生。但除此以外没有公开的歧视和迫害,因此非俄罗斯族的学生并没有自卑感。无疑,歧视是内在固有的,它存在于把俄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一事实中,但对此始终不满的可能只有德籍学生及其家长。犹太学生尽管入学时受人数的限制,不过一旦入了学则得到公平待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圣保罗学校使廖瓦第一次尝到世界主义的滋味。他立刻成为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无须别人为培养他而操心,也无须别人为他的功课担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①] 很快,他的老师们都承认他的天才和勤奋,而且没多久他还博得了高年级同学的喜爱。但他拒不参加体育运动。他在黑海边度过的7年时间里从未钓过鱼、划过船或游过泳。他远离学校体育场,也许是因为早年一次模仿他人的体操动作时发生过事故,当时他从直梯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像蛆一样在地上蠕动”;也许还因为他觉得户外活动在亚诺夫卡更为适宜:“城市是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他在班上的优异成绩足以巩固他的自信心。

在实科中学的7年中,他曾卷入过几次与校方的冲突,每次的结局都不算太糟。他曾编过一本校园杂志,其中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但因为教育部禁止这样的刊物,所以当他把杂志交给老师时,老师警告他不要再编下去。廖瓦没有把警告当耳旁风。二年级时,包括廖瓦在内的一批同学用噪叫声把一个讨厌的老师哄出教室。校长把几个有领头闹事嫌疑的学生留下来,而把他这个全班第一名学生放走了,认为他是无可怀疑的。被留下来的学生中有人“出卖”了廖瓦。那个被冒犯的老师指着这个他一向引以自豪的孩子说:“最优秀的学生原来却是个道德畸形儿”。这个“道德畸形儿”因而被开除。他受到的这一打击后来得以缓和,是因为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7页。

施宾策尔夫妇对自己所监护的孩子的理解和同情,也由于父亲的溺爱,被开除一事与其说使父亲生气,不如说使他觉得有趣。

翌年,廖瓦经考试复学后又成为学校引以自豪的宠儿,他也小心避免再出麻烦。不过,在高年级时他还是因作文之事跟其他同学一起与懒惰的老师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后者从不批改也不发还作文本;但这次他却没有受到惩罚。他在自传中用满足的语气描写他那次被开除的后果:"可以说,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这一事件全班形成了3个小集团:一极是告密和好忌妒的人;另一极是胸怀坦荡而勇敢的同学;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是摇摆不定的一群。在以后的几年中,这3种类型的集团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不只一次地遇到过这类的集团……。"[1] 在这段回忆中,敖德萨实科中学二年级看来确实像20年代因支持或反对托洛茨基而分裂的共产党的原型。

这时期,这个孩子的外貌和性格正在形成之中。他相貌英俊,面部肤色黝黑,脸形轮廓鲜明,五官端正。眼镜后面那双近视眼炯炯有神、异常灵活,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非常注重仪表:穿着整洁、讲究,甚至有点儿时髦。他的模样像"高等布尔乔亚"。[2] 他活泼,朝气蓬勃,而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像许多有天资的青年人一样,他的自我中心及渴望超群出众的思想也很强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可以希冀更多的东西。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都管他叫首领,这不能不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3] 对他不无批评但也十分欣赏的伊斯特曼曾讲到他早年表现出的强烈的好胜本能,并把它与众所周知的赛马的本能相提并论:"这种本能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94页。

②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5、31页。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11页。

使赛马甚至在慢步溜达时至少也要用一只眼睛不断向后扫视跑道，看看赛场上有没有自认堪称对手的马。这种本能使它保持警惕，总之，这是一种非常讨厌的性格——特别是在那些生来不好争快慢的马的眼中。”[①] 虽有不少同学追随廖瓦，但没有一个成为他的知己。

他在学校中没有受过重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老师们的性格。他们良莠不齐：有些明智善良，有些脾气古怪或有受贿的劣迹；就是最好的老师也很平庸，对他起不了促进作用。他的性格和想象力都是在施宾策尔家中形成的。他深受他们的宠爱和称赞，而他则报以诚挚的爱和感激。他居住在他们家期间，从最初几个星期欣喜地照看着施宾策尔夫妇的新生儿并看到婴儿最初的微笑起，直到最后离开，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未蒙上过阴影。许多年后，他的这两位良师益友才讲出他们和他之间唯一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初到这里时把他们珍爱的几本书卖了，用这钱给自己买糖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运气好，遇上了这样了不起的导师，使他与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智力兴趣。他们家的常客都是当地自由派报纸的编辑和文人。客人的来访及他们的谈话都使他着迷。在他看来，“作家、记者、演员的世界始终是最迷人的世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②] 当他开始跟这些人以及跟他注定要从事的职业接触时，他看这个世界时的激动心情，只有天生的文人才能理解。

敖德萨不是主要的，或者说不是最活跃的文学中心，在施宾策尔夫妇的朋友中没有俄国文学的巨子。尽管如此，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还是毕恭毕敬地肃立在这座神殿的门口，虽然他并没有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 19 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1 卷第 86 页。

看到这个祭坛上的最高祭司。当地的自由派报纸深受新闻检查制度之苦,这些报纸拥有大胆而老练的作家,如 B.M. 多罗舍维奇(Дорошевич),他是写那种半文学半新闻报导文章的大师。有朝一日勃朗施坦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大显身手。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是廖瓦及其表哥、表嫂最喜爱的读物。施宾策尔建立出版社后,屋里总是堆满书籍、手稿和校样,廖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阅读它们。看到印刷中的书籍,他感到兴奋,他喜欢闻新印出来的书籍散发的油墨芬芳。甚至在他后来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指挥重大战役的岁月中他仍保留着这一爱好。他是在这里爱上文字的,也是在这里初次听到他的作文由一位权威作家,当地的莎士比亚专家朗读。作家对小伙子的遣词造句手法赞不绝口,欣喜若狂。

剧院也使他着迷。"……我又迷上了敖德萨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歌剧……我甚至为赚钱买歌剧院的门票去当家庭教师。好几个月来,我悄悄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朱泽皮娜·乌盖特(Джузеппина Угет)。我觉得她是仙女下凡,暂时降临到敖德萨的舞台上。"[①] 对剧院及聚光灯、服装及面具、歌剧中的激情及冲突的陶醉,对一个将要用强烈的戏剧感扮演其角色的人物来说,这是符合他青年时代的特点的。此人一生本身就具有古典悲剧的力量,堪称古典悲剧的典型。

廖瓦从敖德萨回到亚诺夫卡度暑假及圣诞节,有时回家养病。每次回来他都看到亚诺夫卡日益兴旺的明显迹象。他离开时,他家还是普通的富裕农民,他回来时,他家越来越像地主庄园。勃朗施坦夫妇已为他们自己及孩子们造起了乡间大宅邸,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生活、劳动。父亲每天还是在磨坊里跟农民为几袋面粉讨价还价,检查牛棚,在收割时节监督雇工干活,偶尔也亲自拿起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85页。

钐刀割麦子。离家最近的邮局和火车站仍然有20多公里远。这里没有一个人订阅报纸,只有他母亲用经常劳作的手指指着一行行的字母吃力地读旧小说。

这几次回家使廖瓦充满复杂的感情。他还保留着不少乡下人的感情,使他感到在城里所受的压抑和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的乐趣。他在这里无拘无束,整天玩耍、散步、骑马。但他每次回来都觉得亚诺夫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父母的追求狭隘得令他不能忍受,他们举止粗野,他们的生活道路毫无意义。他开始发现:农场主要多么冷酷无情地对待雇工和农民才能使自己兴旺发达;即使像在亚诺夫卡看到的那样,冷酷无情被家长式的乐善好施所缓和,也是大同小异。廖瓦在度假时经常帮他父亲记账和计算工资。有时,特别是老勃朗施坦认为工资的计算对挣工资的雇工过分有利时,父子之间就会发生争执。争执不免会引起雇工们的注意,这使农场主十分恼火。小伙子却不想审慎行事,而优越感更加深了他的抵触情绪。一个出身于文盲农民家庭的有知识的儿子有这种优越感并不奇怪。此时,整个农村生活都使他感到厌恶,无法容忍。一次,一个警察来到这里,因两名雇工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就要驱逐他们出境。他竭力抗议警察的粗暴,却毫无效果。他还看到穷人彼此之间也以野蛮粗暴相待。他对被压迫的人有朦胧的同情感,甚至对自己的特权地位也有更加朦胧的自责感。同样严重,也许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伤害是他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伤害他的正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农村守财奴、文盲暴发户的儿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则是富农的儿子。

他在敖德萨一直住到1896年。按规定,实科中学应有7个年级,但圣保罗实科中学只有6个年级。因此,他不得不到尼古拉耶夫市去读七年级,然后再准备报考大学。这时他已快满17岁了。但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种政治思想能够吸引他。一年前弗·恩

格斯逝世这一事件没有在这个未来革命家的心上留下印象,甚至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他都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即使对自己的17岁年龄来说也是如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他还准备进大学学纯数学。吸引他的是想象和抽象的两条人生道路,后来,他努力在他的著作中把两者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暂时还没有吸引他。使他父亲失望的是他考虑步入学术生涯的前景,而他父亲宁愿他有一个务实的职业。他自己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革命家。

这里无疑体现出时代精神。其他时期,青年人往往在学校就直接投身到秘密革命团体之中。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些组织由于新思想而行动起来、由于强烈的愿望而活跃起来、而且理所当然地膨胀起来的时候。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民意党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事件本身就是自杀行为。这一派的领袖指望他们的行动会成为全国起义的信号,但是它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全国仍然继续沉默。那些直接、间接参与这一谋杀案的人都死于绞刑。没有直接继承人挺身而出继续行动。这再一次表明,农民尽管不满,但还没有革命的情绪:在农民看来,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是贵族对农民的恩人进行报复。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废除了他的前任的大部分半自由派的改革。他的主要的教唆人是他的宫廷教师,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统治阶级对革命的全部恐惧都集中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精明而阴沉的头脑中。他怂恿沙皇恢复尚未削弱的“父亲对全家的统治、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君主对全俄的统治”。颂扬前沙皇废除农奴制就是犯法。贵族对农民的司法权已经恢复。大学不准下层阶级的子弟入学;激进的文学期刊被查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全国不得不重新回到沉默的屈从之中。

革命恐怖主义本身证明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民粹派的又一幻

想也破灭了。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的企图失败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Ульянов)也参加了这一密谋。民意派的幸存者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冥思苦想,他们追忆往事,陷于混乱。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吉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的忏悔正是那个时期的特征,他逃亡西欧,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的忏悔书。有些以前的反抗者在工商业方面为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找到了出路。这种情况当时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扩展。不少人发现列夫·托尔斯泰是他们的先知,托尔斯泰对专制制度的罪恶深恶痛绝,却规劝他们不要用暴力来反抗。看来,托尔斯泰的哲学是在道义上批准了知识分子在幻灭后的消沉。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把他那时对政治的冷淡归结于当时的普遍情绪。这一解释只对了一部分。事实是,早在 1896 年,即在他离开敖德萨的那年之前,秘密的革命活动已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者阐明新的纲领和行动方法;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学生和工人团体迅速破土而出。我们从当时的俄国团体致社会党人国际的报告中得知:在这 10 年的中期,这种团体已在敖德萨积极地活动起来。[①] 年轻的勃朗施坦却不知道有这样的团体。显然,在圣保罗实科中学的学生中还没有社会主义团体,否则,总会设法吸收这个在学校中最孚众望、最有才能的学生。新运动的兴起也没有在施宾策尔夫妇富裕的安乐窝里引起什么反响。民粹派的崩溃给这对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避而不谈确实有危险的话题,或者压低声音谈论它们。他们的激进主义逐渐变成兼容并蓄而又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当然,这样的自由主义反对沙皇统治时

①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致第二国际的俄文报告(1896 年日内瓦)说这类团体在敖德萨比在南俄其他地方更活跃。另见 П.А. 加尔维:《社会民主党人回忆录》第 20－21 页。

总是拐弯抹角的。这样微不足道的反抗无法给他们的被监护人留下印象。只有大胆明确地讲出来的主张才能使年轻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1895年,当尼古拉二世登基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温和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的工作者放弃无稽的幻想,当时,廖瓦在心里是跟“幻想者”站在一起的;不过他像施宾策尔夫妇一样,也认为争取现存政体作任何改革都是堂吉珂德式的想法。

在这种难以界定、模糊的自由派情绪中可以强烈感觉到的一种思想感情是:对欧洲及其文明的渴望和向往,对整个西方及其自由的向往。这个“西方”可能就是那个希望之乡的幻想,它给俄国悲惨而不公平的现实提供补偿和慰藉,对犹太知识分子更是有无限的魅力:他们认为世界的那部分地区没有集体迫害、没有国界、没有入学人数的限制。在大部分非犹太知识分子看来,西方也同国内所有可憎的一切——正教院、出版检查制度、鞭笞及苦役——形成对照。不少有教养的俄国人起初都以崇敬的心情仰望西方,年轻时的赫尔岑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也曾对西方满怀希望,但经深入了解之后,他的希望破灭了。在以后的几年中,廖瓦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也逐渐认识到自由欧洲的局限性,转而开始对其持反对态度。但他仍保留了他年轻时对“西方”的某种热情,而且这始终是他的一个思想特征。

这就是他离开敖德萨时的情绪,因为“敖德萨是警察横行的俄国中最标准的警察城市”。他对这座城市唯一生动的政治回忆是这一场景:敖德萨市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Зеленой)统治着这座城市,他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性格专横霸道”的人。“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当时只看到他的背影。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市长挺直身躯站在他的四轮马车上,挥动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响彻整条街道。在他面前是立正敬礼的警察和几个手里拿着帽子的仆役。一张张惊恐的脸躲在窗帘后面往外瞧。我拉紧书包

带，加快脚步走回家去。”[1]

那时，在这个注视市长的年轻人的心中还没有点燃反抗的火花，他只是极其厌恶地躲开统治强权，走他自己的路，似乎就是处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的情绪中。

[1]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79页。

第二章

追求理想

最初，是偶然的影响使年轻的勃朗施坦走上革命道路的。1896年夏，他来到尼古拉耶夫市以便读完中学。他寄居在一个人家里，这家的几个儿子已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引他辩论，试图使他接受他们观点的影响。看来，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都没有取得进展。他傲慢地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青年人的架式，毅然应付辩论，他并非不同情人民，但怀疑"群氓的思想意识"及"群氓统治"。他爱好纯数学，对政治既无兴趣也无时间过问。他的女房东因儿子们的危险观点而感到担心，倒很喜欢他有这样高的辨别力，而且试图劝她的儿子们学他的榜样。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有关社会上普遍的不公正和必须改变国内全

部生活方式的论点已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酝酿。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据已经提出,并且集中在贫困和剥削的景象上,而这些景象自从童年以来就一直藏在他的心中;使他感到他呼吸的空气是那么窒息;他们新颖无畏的高尚品格使他受到强烈的感染。但他还是继续抵制。新思想的吸引力越强,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持他装出来的保守主义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他爱唱反调的精神和在争论中取胜的渴望使他难以让步。但他不能不放弃他的防守和自负。在那一学年中,他突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立即开始热烈地为赞成社会主义而辩论,使那些要他改变意见的人吃了一惊。[①]

我们将反复看到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他跟新思想一直对抗到他决定响应的时刻,而起初总是由于执拗的自负而抵制它。他的抵制随着吸引力的增强而加强,后来他克服了起初的怀疑和犹豫。于是,他内心的防线开始崩溃,他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可他的自尊心还是太重,或者说,还不足以使他信服到要作出一点儿让步的表示,他那内心斗争也没有外在标志。后来,新的信念在他心中增强,好像一下子克服了他的爱唱反调的精神和自负。使原来的争论对手们吃惊的不仅是他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原有观点,还有他接受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热情,更有他不时从他们的论据中得出的意想不到而有深远意义的结论。

他刚刚加人的事业在他内心还不明确。与其说他接受了一种思想,毋宁说是接受了一种情绪。他总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但受压迫者是谁?他如何加入他们中去?应该要干什么?没有人能给他以指导。在尼古拉耶夫市没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或组织。他转向社会主义立即表现在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刚刚觉醒的关心与他对数学爱好相应的削弱上。他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这样做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0页。

时马上就脱离了童年和青年少时期的受人保护的环境。

勃朗施坦通过跟他同住的人结识了一个名叫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Франц Швиговский)的人,是个在城郊租种果园的穷园丁,这人居住的果园里的茅屋是思想激进的学生和工人的小型讨论俱乐部。什维戈夫斯基原籍捷克,性格非同寻常。他读了不少语种的书刊,精通俄国及德国的古典文学,订阅外国报刊,总是乐于拿被禁的政治书籍或小册子满足朋友的要求。住在城里处于警察监视之下的老民粹派分子有时也参加这个果园里的小组活动。在这些民粹派分子中没有杰出人物,他们没有建立组织;但他们把自己的一些浪漫主义的革命观点传给什维戈夫斯基小组。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自认为是民粹派分子。正如一个参加者所说的,这些集会"性质无害"。人们到果园来是因为在这里感到痛快,可以畅所欲言。不久,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在城里就"声名狼藉……说它是各种最可怕的阴谋中心"。派去暗中监视的警察假扮成在果园里劳动的工人;但这些密探也只能报告说,什维戈夫斯基总是用苹果和大量的茶水款待他的客人,跟他们进行古怪但却无害的讨论。[①]

我们知道,那几年正是革命复兴的年头。1895 年 3 月,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Дурново)致函波别多诺斯采夫说,新的倾向,尤其是大学生中作有关各种社会问题演讲的热情和无私使他震惊。在这位大臣看来,这种理想主义的无私不是吉兆。前几年所有的镇压法规并没有使中学和大学免受颠覆分子的影响。多年来,一直由部里任命教授,解聘可疑分子,提升唯命是从但无足轻重的人,根本不征求院长的意见。世界著名学者如化学家 Д. 门捷列夫(Д. Менделев)、生物学家 И. 梅奇尼科夫(И. Мечников)及社会学家 M. 科瓦列夫斯基(M. Ковалевский)一直被认为不忠诚,遂遭到

① Г.А.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 8 页。

解聘或被迫辞职。杰出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不得不宣布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都是禁书。学生图书馆和俱乐部都被封闭;在课堂里安插了告密者。为了不让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学费提高了5倍。尽管如此,复苏的反抗仍在各大学里蓬勃兴起。1895年底及1896年初,当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时,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大多数学生都拒绝宣誓。继沙皇加冕典礼(那期间在警察造成的人群混乱奔逃中遭到践踏而死伤的旁观者达数千人之多)之后是1896年5月彼得堡3万工人的罢工,规模如此之大的罢工还是第一次。① 在这些事件中,可以觉察到新近由列宁、马尔托夫(Мартов)和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重新兴起的运动完全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民粹派很少参加。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产业工人,它否定恐怖主义,承认俄国必须进一步资本主义工业化,认为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实力上壮大起来。但其直接目的是要为争取公民的自由权、促使工人采取政治经济行动和建立组织而斗争。

这些发展远离尼古拉耶夫这潭死水,在这里只引起了点儿涟漪。当勃朗施坦加入什维戈夫斯基小组时(1896年的晚秋或初冬),小组成员一定因那年年初发生的事件而受到鼓舞。他们搜集消息,进行讨论。但也仅此而已,他们都估计不出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学说的批评,他们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继续自称是民粹派。只有一个小组成员例外,就是女青年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коловская),她本人是民粹派分子的女儿,但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力图使小组

① 西伯利亚克:《俄国的学生运动》。

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给他们提供真正的哲学和革命的科学。起初她没有取得效果,但不久后果园的茅屋里响起了热烈的辩论声。当勃朗施坦来到这里时,立刻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热烈的辩论中,并迫使他迅速地作出抉择。他当即自称是民粹派,并几乎马上就对那位孤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攻击。Г.А. 齐夫(Г.А.Зив)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的敌人,他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齐夫)在 1896 年冬天初到果园时,勃朗施坦还不满 18 岁,“他由于杰出天资和才能已经引起弗朗茨所有客人的注意”;他已经是小组中最大胆、最坚决的争论者,对女青年所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无情的挖苦讽刺”。

他对争论双方的学说所知甚少,只是向什维戈夫斯基借过几本过时的秘密小册子(这还是他第一次读到的)和几本激进派期刊的合订本;他紧张急躁地浏览了这些刊物,恨不得一眼就能掌握其中包含的论据。能激起他热情的作者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边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他们的著作与新的争论并无直接关系。勃朗施坦一度曾自豪地称自己是边沁主义者。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这种迷恋心态跟革命家,无论是民粹派革命家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都是格格不入的。他甚至对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稍逊一筹的人一无所知。一个更谨慎或更能思考的青年肯定会耐心地坐下来倾听双方的论据,也许还要弄清辩论的根源,斟酌正反两方面的理由,然后再表态(列宁最初接触马克思的学说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勃朗施坦早熟而且头脑灵活,兼收并蓄。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具有非凡惊人的天赋,他能迅速地抓住对手思想的要旨及其内涵。因此单凭知识是很难压倒他的”。[1] 他从学校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 68 页;Г.А.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 9－12 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6－7 章。

里就已养成优秀生的自信心和出人头地的习惯。如果他的新伙伴强留他讨论并强求他表态时，他最不愿干的事就是以不了解情况为借口而拒绝。他一旦表了态，就不能是半心半意或有所保留，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辩论。

他本能地作出抉择。民粹派的观点引起他的注意，正是因为民粹派把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民粹派分子并不完全拒绝这一观点——他们早在20年前就已是俄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驱了，但他们在论述这点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始终加以强调；而且他们有不少人还接受所谓主观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强调"批判精神"和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这种哲学与民粹派的传统及其传奇十分契合，这个派别在经济条件未"成熟"、人民群众未觉醒时没有推迟对沙皇统治的袭击，而是派出孤立无援的战士、义士去活动。这些思想坚定、意志坚定的密谋者手持炸弹，追踪沙皇和他的大臣及省长。在年轻的勃朗施坦看来，马克思主义狭隘、枯燥无味——侵犯人的尊严、把人看成社会经济环境的囚徒和没有个性特征的生产力的玩物。后来他自己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是对它的讽刺性模拟；但无论如何，现代其他的政治信条都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能吸引和鼓舞这么多的人坚定不移地为他们的事业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①] 而拙劣的模拟也并非完全虚构，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确实以枯燥的"寂静教教徒式的"拙劣模拟作为他们的信条。年轻的勃朗施坦碰到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就是这类人。与此相反，民粹派浪漫主义

① 托洛茨基在其晚年经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相比较，前者的决定论和后者的前定论学说远非削弱或否定人的意志，而是加强它。对其行动与最高需要协调一致的信念鼓舞着马克思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去尽最大的努力和牺牲。

传统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传统展示鼓舞人心的效仿榜样,保持对英雄的怀念。对烈士的缅怀给未来许下朴素无华的诺言,它赞美过去,似乎也赞美未来,不过仅仅是似乎而已。民粹派运动在衰落时再不能重演它过去的英勇壮举,无论如何不能用旧时单纯的英雄幻想去重演了。但尽管这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却在俄罗斯的天空布满紫红色的余辉。年轻的勃朗施坦眼中看到的全是这种余辉。

在投入辩论时,他是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厉害的对手,但在他们的关系中却产生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感情,而这在两个异性青年兼接近的政治对手之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小组中经常见面,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而不能彼此摆脱。索科洛夫斯卡娅比勃朗施坦大好几岁——有人说大 6 岁,还有人说大 10 岁,当然比这个实科中学的尖子生有更丰富、更严肃的政治经历。她谦虚,信心坚定,毫不自大,就是在她的年轻对手嘲弄她时,她也仍心平气和坚持说明她的观点,。想不到情况起了喜剧式的转折。果园里的每个人对这个女孩子都有点儿迷恋,有些小伙子还写了情诗。伟大的"主义"和问题,萌发的爱情和押韵诗都混杂在一起——讨论变得愈来愈反常。勃朗施坦取笑她说:"你仍然认为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姑娘居然能坚持这种枯燥、狭隘而不切实际的废话!"索科洛夫斯卡娅回敬说:"一个自以为有逻辑头脑的人居然能满足于一点点含糊的理想主义情感?"或者,勃朗施坦会因为她少女的多愁善感与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而挖苦说:"这是小店主及商人的学说"[①]。

然而,她的论据却开始灌进他的头脑。他内在的自信心在降

---

① Г.А.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 15 页;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 46 页。

低。他在辩论中越是"顽强",他的嘲弄就越发粗野。189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小组聚会讨论并庆祝新年,勃朗施坦一到就宣称他已被争取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去了。索科洛夫斯卡娅兴高采烈。大家为工人阶级的迅速解放、为沙皇暴政的垮台等等而干杯。轮到勃朗施坦祝酒时,他站起身来举杯转向索科洛夫斯卡娅,无缘无故地突然大声说:"马克思主义者都该死,那些要把枯燥和冷酷带进全部生活关系中的人都该死!"这个女青年离开果园时发誓再也不跟这个蛮横的人握手。不久以后她离开了这个城镇。[1]

新的一年开始了,而小组仍然仅限于谈论,勃朗施坦写了一篇论战性的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中"格言、引文和恶毒的语言多于内容,"并把它寄给有民粹派倾向的期刊。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他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哥哥合写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分子斗争的剧本,但写了第一幕或第二幕以后就写不下去了,写剧本的人原打算把民粹派分子塑造成正面人物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比。但当剧本的情节展开时作者吃惊地注意到:塑造成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物具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某些特点。小组还发动了一场"反抗"当地公共图书馆的斗争。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打算提高阅览费,"果园"派召集"群众"介绍新的读者,在年会上推翻了管理委员会——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2]

勃朗施坦此时已不顾他的学业,但他学到的知识足以让他在1897年夏以优等成绩毕业。然而他的父亲已觉察到有些不对头,

① 伊斯特曼和齐夫两人都讲述了这些事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没有提;但他给伊斯特曼那本书写的序言中肯定了书中所述事实的准确性,因而也证实了那些源于齐夫书中的故事的真实性。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6、7章。

廖瓦在亚诺夫卡度假期时谈论自由、推翻沙皇时，农场主(他的父亲)回答说:"听着吧，孩子，这是绝不会有的事，再过300年也实现不了!"他想知道他儿子的这些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很快，他就找到了廖瓦新结交的伙伴，于是严厉地命令儿子离开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廖瓦当即维护他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他说，选择自己的朋友是他的自由，但他既然不愿服从家长的权威，也就不能继续依靠父亲的钱生活。他放弃父亲给他的生活费而去担任家庭教师，从舒适的住宅搬进了什维戈夫斯基的茅屋，这时已有6个学生住在那里了，其中还有一个结核病患者。这一变化使他振奋，终于自由了！那个穿着整洁而听话的中产阶级儿子——为其他孩子的父母所赞美和羡慕的对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正的民粹派分子，像老一辈先驱一样，"到民间去"，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生活在一个小公社里，在那里每个人都穿着得像一个农场的雇工，都把自己的几个戈比拿出来共享，喝同样的稀汤，喝盛在公用马口铁粗碗里的粥。

老勃朗施坦有时从亚诺夫卡来看看廖瓦是否因耐不住贫穷和困难而改过自新。但没有丝毫迹象。一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编辑的当年什维戈夫斯基的房客还记得这个"留着连鬓胡子的高大农场主……拂晓时走进茅屋，挑衅性地、气势汹汹地站在他身旁，用洪钟般的声音吼道:'喂！你连你爸爸都躲着不见?!'"[1] 愤怒的场面往往和并非由衷的和解交替出现。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廖瓦的厚望已经破灭，气急败坏；儿子在同志面前丢了脸，因为他立志要在同志中成为领导人物，所以反应激烈而无礼。两人一样暴躁，一样觉得自己正当，一样固执，一样自大，声音也一样都像洪钟。当廖瓦进敖德萨大学读数学时，情况大有好转，在他的父亲看

---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55页。

来,与其和他那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干什么推翻沙皇的把戏,还不如搞纯数学。廖瓦在大学里开始显示出对所学科目的非凡才能。[①]但是大学的吸引力却比不上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微积分也不能胜过革命。他住在敖德萨的时间虽短,但也足以让他去跟革命家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取得地下刊物和小册子,他带着这些刊物在胜利的喜悦中回到尼古拉耶夫市。

继之而来的是 1897 年骚乱的春季,3 月间,一个因政治罪名关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女大学生在牢房中自焚而死。这一事件在大学中激起抗议示威的风暴。当局用放逐大批大学生来报复。这又激起了新的抗议与示威,连警察横行的敖德萨也轰动起来了。从基辅来的大学生给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带来新的刺激和愤慨。勃朗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感觉到,从语言转入行动的时候到了。

当时刚从基辅来的医科大学生齐夫写道:"勃朗施坦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极其秘密地提出要我参加他本人组织的工人协会。勃朗施坦说,民粹派的思想已被抛弃,他打算使组织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不过勃朗施坦避免用这个专门名词……提议称它为南俄工人协会。"齐夫继续写道:"当我参加这个组织时,一切都已筹备就绪。勃朗施坦已经跟工人有接触,而且跟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以及其他城市的革命团体也已有联系……。"[②]

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和工厂约雇用有 1 万多工人,大多数

---

① 伊斯特曼引用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大学同学,俄国著名的技术专家的话,他甚至在革命以后还惋惜地说,有如此非凡的数学天资的人不搞数学,这是科学的损失。参见《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 59 页。

② Г.А.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 18 页。约在这时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正在南方的大多数城市恢复,或正在建立。参见 M.H. 利亚多夫:《俄国共产党的起源》第 310 页及以后各页。

是报酬高的技术工人,他们有足够的余暇读书看报。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建立组织,连工会也没有。工人阶级居住区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的各种教派,勃朗施坦跟这些教派的教徒打交道,并很快看出,其中哪些人主要关心的是教义,哪些人更关注他们反对希腊东正教活动中的政治意义。他在后者中吸收南俄工人协会的第一批会员,把他们组成小组,定期集会讨论时事、阅读非法出版物。这一年年底以前,协会已共计约有200个会员了。我们根据当时一份在他们被捕后发表的俄文报告对这个组织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个协会的会员中有锁匠、细木工人、电工、女裁缝及学生,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20—25岁之间,但也有40岁左右的人。[①] 索科洛夫斯卡娅也是该组织的奠基人之一。她一得知这一新的开端,就忘记了新年前夜的事,回到果园。

这个组织的名称显然是借用25年前曾存在过、其中心设在敖德萨的另一个组织的名称。旧南俄工人协会是大学生E.O.扎斯拉夫斯基(Е.О.Заславский)创建的,就其性质来说是民粹派组织,遵循拉甫罗夫的宣传教育路线。据查,旧协会与新协会的规模大致相同。1875年警察破获了这个组织,它的领导人在大理院受审,多数成员被判处苦役。扎斯拉夫斯基和几个会员死在狱中,协会创建人之一Н.П.谢德林(Н.П.Щедрин)曾被两次宣判死刑,两次减刑判处终生苦役。这个囚犯好多年都被镣铐铐在手推车上,直到他神精错乱;尔后又被转押到施吕瑟尔堡要塞。他在那里又受了15年的折磨,也许只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才能提供那种折磨的概念。关于这种折磨的传说仍在南俄流传,勃朗施坦之所以称他的组织为南俄工人协会,大概是表示对殉难者的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工人事业报》于1899年4月1日在日内瓦出版,第150－152页载有一份协会被捕会员详细的长名单,其中有年龄、职业等有关资料。

敬意。他本人用的第一个化名是利沃夫(Львов)。

这个小伙子一年前似乎还是一个寻常的富人子弟,一变而成为秘密组织的创始人,自愿走革命家的艰难道路,转变的迅速是惊人的。他那显然是天生的旺盛精力、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一般的追求中只能发挥极小一部分或根本发挥不出来。他需要为一种事业服务,而且是为一种需要付出极大牺牲的事业服务。一旦找到了这种事业,他那富有青春活力的热烈性格就充分展现出来。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他是推动事业的灵魂、代言人和组织家,而且还是协会中精力最旺盛、最忠诚的工作者。齐夫甚至在其带有往昔敌意色彩的回忆录中也说:"在尼古拉耶夫,我们的团体是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们的成就使我们十分振奋,因此我们长期处于热情积极的状态。无疑,我们应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勃朗施坦,他的精力无穷,而且他多方面的创造性与不倦的干劲永不衰竭。"齐夫接下去说:"许多年后这个组织的成员还自豪地回想起它的全盛时期,那时它受这个18岁小伙子的领导。他用自己的信仰、雄辩和本人的表率倾倒了所有的成员,引导他们忘记个人的所有爱好、成见,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精力与时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勃朗施坦离开后,这个组织的神经突然崩断,协会再也不能恢复它开始时的热情了。"①

当然,与正规的政党或组织比较起来,协会还是一个小团体。对于它要坚决反对的那个政权来说,它正像细菌进攻巨大而衰弱的人体一样,事实上这个团体正是刚刚行动起来的大约20余个革命细菌中的一个。

在造船厂和工厂中建立起来的团体散发传单以及一份叫做《我们的事业》的刊物。传单中评论当地关心的问题、工厂和造船

① 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1页及同书各处。

厂的情况、雇主及官吏的横行霸道。这些揭露产生了影响,迫使那些被揭露的人作出答复,尔后协会又用新的传单予以还击。"当从工厂和车间传来消息说工人们如饥似渴地传阅这些用淡紫色油墨印出来的神秘传单时,又给我带来多大的满足啊!他们认为传单的作者是一个强大神秘的人物,他深入到所有工厂之中,知道每一个车间发生的事,而且在24小时内就能用新传单对事件加以评论。"① 协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事业》也得到令人鼓舞的反响。这个团体太穷,无力出版秘密报纸。据说勃朗施坦曾提出在敖德萨施宾策尔的印刷所里秘密印刷出版报纸——他在热情澎湃之时根本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给他的亲戚造成危害——但是他的同志说服他不要这样做。当时有一个多少有点儿古怪的好心人带着一个革命"计划",他说,推翻沙皇必需有10万卢布,用以在全俄罗斯建立1000个地下小印刷所,使反沙皇的宣言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区里到处传播。作为开端,这个好心人赠送给小组一架油印机,勃朗施坦就此开始工作。他亲自撰写刊物上的文章和传单;亲自用紫色油墨油印(为的是使工人们阅读时眼睛不至吃力);亲自给文章加漫画插图;亲自在一个瞎眼同志的破旧住所里刻蜡版,每期印刷好几百份;他还亲自照管散发。② 每刻一页蜡纸往往要用去他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有时我连续伏案抄写一个星期,连腰都不伸一下,只有开会和小组讨论时才暂时中断。"

政治上,协会是一个地方性的反抗者兄弟会,它很单纯,并不老练。其中有些成员仍自称为民粹派,其他人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妨碍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一个狭小的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33-134页。

② "所有重要的技术工作,更不用说文字写作部分,都是勃朗施坦完成的。"Г.А.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1页及同书各处。

基础上活动,所以能够共同行动。他们号召工人们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斗争,而在这方面,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分歧。他们避免对工人讲那些在果园中争论的政治问题。这类活动在当时是大多数秘密团体的主要活动。后来,它却因为片面强调"面包与奶油问题"而被称为"经济派"。但是使这个组织迅速成功的却正是它的片面性。如果两个团体各自提倡各自的"主义",并因此在争取工人上展开竞争,其结果只能是混乱和失败。只有在更广泛、更坚定运动中才能以严肃的斗争解决分歧。尽管尼古拉耶夫的协会已为其他中心区更先进的团体领导人所了解——那些领导人正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但他们不知道是否应邀请尼古拉耶夫的团体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考虑:他的年龄太轻,是否会有损于建党大事的庄严性?这个疑问还没有解决,尼古拉耶夫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就都已被捕入狱了。①

初次冒险的成功向这位青年革命家证明"书面语言的威力",城里流言蜂起,无论是赞赏还是害怕协会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要认真对待的因素。敌人和朋友都把它想象得比实际强大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勃朗施坦的书面语言的成果。对语言威力的信任他将永远保持,直到生命结束。他在各种形势下都始终求助于他的这一得心应手的手段,他一生始终运用这种威力,有时取得震撼世界的效果,有时惨败。他在这个反抗者的小小兄弟会里曾初试他的演讲口才,但初次尝试却以窘困和流泪告终。在辩论中发言尖刻辛辣是一回事,作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引用贡普洛维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但他不

① 托洛茨基:《十月的一代人》第20页;M.H.利亚多夫:《俄国共产党的起源》第324页;阿基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特征史料》。

知不觉使自己深深陷人了一张变幻不定的网之中,其中,充斥着难以理解的夸张之词,而对思想的希望渐趋减小,使坐着听他演说的听众因为同情他而浑身出汗,不知天底下还有没有办法能阻止他讲下去。当他最后停止发言并就这个题目展开一般性辩论时,却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谁都不知道题目究竟是什么。"这位演说者"在室内走来走去,尔后把他的脸埋在长沙发的靠垫上,浑身浸透汗水,羞愧得两肩起伏耸动,而每个人无不痛爱他。"①

勃朗施坦的品质无论优劣,在这个小团体中都逃不过同志们的眼睛,他们写下来的观察记录除了侧重点不同外,几乎在所有的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后来成为他妻子又被他抛弃的索科洛夫斯卡娅约在30年后回忆说,他很体贴人并有同情心,但也很武断、傲慢,他只在一件事上始终不渝,即对革命的忠诚,她说:"在我一生的经历中,从来没有遇见过有这样彻底献身精神的人。"贬低他的人更加强调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齐夫写道:"勃朗施坦的'自我'支配了他的全部行为。"但是,他接着写道:"革命却支配着他的'自我',他热爱工人,热爱他的同志……正是为了他们,他爱护他自己"。他既然心甘情愿地放弃舒适安定的生活与美好前途,就认为别人也应这样做。当齐夫急欲读完大学的课程而开始忽视团体时,勃朗施坦给了他有力而得体的劝告。他送给齐夫一幅画,在画上题词说:"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信仰。"②

鼓舞他的英雄人物莫过于斐迪南·拉萨尔,德国社会主义最早的群众运动创始人。当时,拉萨尔对欧洲社会主义的影响很大——后来因他跟俾斯麦暧昧的政治交易暴露而失去光彩。年轻的

---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70页,齐夫说勃朗施坦仔细研究过叔本华的《辩论术》中的论战技术与诀窍。

② 同上,第87页;Г.А.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12、19-21页。

勃朗施坦之所以受拉萨尔这样大的影响是由于他们有明确无疑的相似之处。拉萨尔也是有钱的犹太人子弟，背叛了他的阶级，为争取工人的解放而奋斗。他曾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演说家，最丰富多彩的浪漫人物之一，其昙花一现的生涯以悲剧结束：死于一场爱情决斗。拉萨尔作为第一个现代工人政党的创始人——不仅是德国的第一个——写下了历史新篇章。这样崇高、辉煌而富于戏剧性的一生只能激起年轻的勃朗施坦的想象。他讲到这位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时心醉神迷，赞叹不已，立誓要步英雄的后尘，如果我们相信齐夫的话，勃朗施坦还夸口要成为俄国的拉萨尔。这个青年人并不过分讲求谦虚，无论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他既不隐瞒他的缺点也不掩盖他的自负。他惯于思索和梦想，并且沉浸在他那并不讳言的抱负之中。

※　　※　　※　　※　　※

他的秘密活动的第一阶段从1897年春天延续到同年年底。警察开始不相信在工厂和造船厂里的所有宣传鼓动都出自什维戈夫斯基果园里的几个青少年狂热分子之手，他们要追查出更有经验的领导人。这样，直到警察醒悟过来，怀疑并开始监视与勃朗施坦往来的人及其朋友们的行踪之前，协会赢得了扩大影响的时间。到年底时，协会的领导人预料到镇压即将开始，一致同意暂且疏散，商定隔一段时间后再恢复活动。但他们决定：如果他们不在时警察逮捕协会的工人，他们就回到城中，决不给警察口实，使后者不能对会员群众说协会领导人把他们抛弃了。

1898年初的几个星期，勃朗施坦离开尼古拉耶夫准备躲到乡间的一个庄园里。因为什维戈夫斯基刚在那个庄园里得到一份新工作。他到那里没多久就和什维戈夫斯基双双被警察逮捕。协会

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尼古拉耶夫及其附近被捕。勃朗施坦从乡间被押送到尼古拉耶夫的监狱,尔后被转送到赫尔松监狱,在那里关了好几个月。警察毫不怀疑他是这个团体的鼓动者。整个严寒的冬季,他们都把他严格隔离,关在一间不供暖、空气不流通、虱子横行的小牢房里。晚上送来一张稻草垫子,天亮拿走。这样,他在白天既无靠垫,也没有座位。不给他放风,不准他在狱中的院子里锻炼身体,也不准收受一份报纸、一本书、一块肥皂或换洗的内衣;他整天挨饿,身上肮脏,满身是虱子;他在牢房里踱步,敲敲墙壁,看隔壁牢房里是不是有人——没有,他重新踱步,数着踱了多少步,设法驱除寄生虫。这几个月的单调生活甚至没有让一次提审打断过,甚至连指控的罪名也没有告诉这个囚犯。这种旨在在精神上搞垮他的待遇比起其他几个协会成员所受的刑讯来说还是轻的,有些成员在拷问下自杀,还有些人被折磨得精神错乱或被搞垮,更有甚者竟同意充当告密者。他承认说,"有时我也被孤寂……折磨得无法忍受"。但他对自己的牺牲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他写了革命的五行诗,后来成为十分流行的革命歌曲。当他将近离开这座监狱时,警察发了慈悲,他母亲贿赂看守成功,送进几包食物、肥皂、麻布内衣以及水果之类的"奢侈品"。

为了审讯查证,他终于被转解到敖德萨监狱,在那里又被关押了一年半,直到1899年年底。他在那里也是关在单人牢房里,但是他却能与朋友们进行秘密联系。[①] 监狱人满为患,但却由于不断有活动、密谋策划和恶作剧而充满生机。他兴致勃勃地取笑负责侦查此案的宪兵中校。为使自己作好应付审讯官的准备,他必

① 就是在这个监狱里,协会的成员得知有关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消息,那次代表大会刚刚在明斯克举行。他们激动地把这一消息从一个窗口传到另一个窗口。托洛茨基:《十月的一代人》第20页。

须摸清宪兵对协会的情况究竟掌握了多少，并且把摸清的情况通知其他牢房中的同伴，“他的任务……并不容易。……他必须告诉我他被捕的全部经过以及随之发生的情况。扼要地叙述他自己的证词。……这一切既要表达明确，使我对发生的一切有尽可能充分的了解，还要做到，即使信件万一被截获，其中也不至有对他自己不利的线索。他把这些事做得天衣无缝。他写了一篇才气横溢、冷嘲热讽的文章，这是一本出色的小册子。”[①] 他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

因为得不到罪证，审问拖延下来。这期间勃朗施坦贪婪地阅读他所能搞到的书刊。起先只读在监狱图书馆里可借到的书籍和期刊，但后来也阅读从外边送进来的书，监狱图书馆里只有宗教著作和教会的期刊。为学习语言，他同时读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的圣经。后来他拿到希腊东正教期刊的合订本，其中充满对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特别是对共济会会员的攻击，他后来写道：“有学问的东正教作家们对伏尔泰、康德和达尔文的攻击把我引入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神学思想领域，原先我根本想象不到倾泻这些思想的形式是多么荒谬、迂腐、离奇。”“对妖魔鬼怪、撒旦以及它们的黑暗的鬼怪王国的研究使我震惊……对天堂内部结构的热情探索总以忧郁的调子结束：‘没有确切地标明天堂的位置’；我在吃饭、饮茶和散步时都反复说这句话：极乐世界的地理经纬度也没有标明。”[②] 跟固执的监狱看守进行神学争论是他最爱好的消遣。一般来说，对宗教作理性主义的否定，是当时有教养的俄国人的特点，不论他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抑或只是温和的自由派，也

①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8页。

② 参见伊斯特曼的《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中所引托洛茨基致伊斯特曼的信，第113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1页。

不论他出身于希腊东正教或犹太教的家庭。犹太教信条在勃朗施坦的教养方面完全没有起过作用，而了解希腊东正教也只是在牢房里才开始的。犹太教教徒和希腊东正教教徒都是这样蒙昧，都是这样顽固，拒不理睬任何新思想——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新教徒，甚至落后于天主教教徒——因而蛮横地排斥有教养的甚至有点儿教养的人。他和宗教不能妥协，因为宗教本身拒绝向人类头脑中任何现代倾向妥协。

当他饶有兴味地钻研这些宗教著作时，他还力图从这些书里争论的概括以及对其歪曲中摘取他原先所不了解的那些受教会谴责的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内容。他探求线索，使他能重新建立自己对这些恶毒理论的见解，尔后按照他的见解和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评价。他收到从狱外送来的几本对他更有直接帮助的书。他读了达尔文的著作，这些著作坚定了他天生的无神论。25年后他回想起，达尔文对孔雀羽毛的花纹自然形成的叙述是如何永远消除了他心中的上帝概念的，而他在得知达尔文本人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时又是何等震惊。[①] 后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donio Labriola)的哲学论文使他和目标更接近一些；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和文风不带教条气息，明晰而且优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此时他对拉布里奥拉书中的论题虽只是一知半解，但已得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更可靠的线索。

他当时根据这种不可靠的观点加上用从希腊东正教原始资料中引出的不严密的论据就试图撰写一部唯物主义的共济会史，在这一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对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看法加以检

---

① 1923年他在对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讲话中说："我终生不会明白达尔文在这方面是否真诚，抑或只是他为传统信仰尽义务。"《十月的一代人》第55-56页。

验。这是他的第一部大部头著作,也是他终生难舍的著作:在早期的一次流亡中将它丢失后,他总是为此感到伤心。我们固然不必对他早期作品怀有他那样的深情,但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文章是他撰写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的最初尝试。他的许多文章常常放在监狱厕所的隐蔽处供他的朋友们阅读,其中有一篇是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这是一直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党人争论的问题。"我没有揭示任何新东西,我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别人早已得出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独立地摸索出来的。我认为这对我的整个发展过程很有益处。至于那些我在狱中觉得是我自己的还有待检验和论证的推测,后来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灌输进我的头脑的。"[①]

在狱中的第二年将近结束时,这些努力占据了他的头脑并使他保持精神愉快。他在心智方面已从青少年期进入成年期。在监牢里,除了思考和反思外,便没有其他的事了,因而缩短了他的这一过渡期。

※　※　※　※　※

1899年年底,囚犯们收到行政判决,也就是说未经审理的判决。判处勃朗施坦和三个会员流放西伯利亚4年;其他人短期流放,还有几个人获释。不久后流放犯开始了艰苦跋涉。先把他们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7页,据齐夫说,勃朗施坦在敖德萨监狱里还写过一篇论工资的论文,他在文中论证说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更可取,因为更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在那时候他会这样具体论述一个经济问题,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906-1907年齐夫又跟勃朗施坦一起被关在在圣彼得堡监狱,大概他把他的朋友几年以后写的文章说成是在敖德萨时写的了。

押解到莫斯科,他们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等候了6个月,不但没有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讯,而且两年半的关押期也没有从刑期中扣除掉。

勃朗施坦在莫斯科的监狱里结识了来自俄国各地的更有经验的年长的革命家,他们也在等待最终流放。这里有新的面孔、新的推动力、新的思想,他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关于列宁的情况,读到刚出版的列宁的力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俄国北方的秘密运动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在西欧进行的思想斗争甚至在这个监狱的围墙内也会立即引起反响。在一个个囚室间传递的许多书籍中,有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著名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是一个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次公然试图使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而赋之以渐进与改良主义性质的论著。伯恩斯坦的这本著作在欧洲社会主义的两翼——"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引起了一场在当时看来是重大的斗争。而这在"羁押监狱"里的囚犯中并没有引起慌张,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放弃革命道路。

勃朗施坦在这种新环境里没有丧失自信,他继续读书、辩论,不断写出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小册子。他计划在监狱里,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建立一个印刷所。但在他的同志们看来这样太冒险,他不得不满足于人们传阅他的手稿。他的伙伴已经觉得:他的想象力有时看来太大胆,向当局挑战的意愿太轻率。他在赫尔松时曾不顾阻力说服他的同志发动绝食来抗议警察的提议,那提议内容是:可以释放青少年犯人,但条件是,他们的父母要好好地揍他们一顿,管束他们不要参与政治——这是对"青少年革命者的自尊心的侮辱"。在莫斯科监狱里,他又一次勇气十足地捍卫犯人的尊严。一个犯人没有向典狱长脱帽而被罚关人单人牢房,勃朗施坦马上发动一场团结一致的示威:

> 在简短的会议上决定：我们都要戴着帽子出去，要看守给典狱长报警。当然，典狱长来时，我们都不脱帽。情况会决定我们下一步怎么办。看守……拒绝发警报，我们拥上去围住他，勃朗施坦站在我们前头，拿出他的表，极有信心地说："我给你两分钟去作决定。"……尔后他把这个惊慌失措的狱卒推在一边，自己用优美的戏剧性动作按下信号钮。我们戴上帽子向院子走去。典狱长在一大队武装看守的簇拥下跑进院子。"你们为什么不脱帽?"他大叫起来，朝勃朗施坦扑去。勃朗施坦站在我们前头，用极蔑视的态度傲慢地回答说："您呢，您为什么不脱帽?"①

几个魁梧的看守把这位奋斗不息的反抗者架走，关进单人囚室。

对当局，或像他自己所说的，对阶级敌人要严厉、轻蔑，而他对同志及其亲属则很热情。甚至有些感情用事。监狱允许囚犯每周两次会见亲属，勃朗施坦在会见时"不但对他自己的女朋友、即未来的妻子……而且对所有来探望丈夫和兄弟的妇女都表示出感人的体贴；他的骑士风度使她们都为之倾倒"。② 这些妇女常常把(关在牢里的)男人们的内衣拿回家去洗；但勃朗施坦却不愿享受这类慰藉，自己洗、自己补他的内衣，并且嘲笑革命家们上了资产阶级习气和偏见的当，以致用这样的家务工作去加重妇女的负担。他从会见室回到牢房后"常把他过多的体贴都用到我们身上，爱抚我们，吻我们并拥抱我们"。他的温暖的友情使人铭心刻骨，以至

①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39页。

② 同上，第36页。

在数年之后他原来的朋友们(那时已经成为他的敌人)都因他在革命和内战中的无情感到迷惑。

在莫斯科监狱中的这段时间,即1900年的春季或夏季,他跟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结了婚,一位犹太籍的监狱牧师在牢房里主持了婚礼,新郎向一个监狱看守借来一枚结婚戒指。这桩婚事有点暧昧之处。流放政治犯安排假结婚是常有的事,因为一对已婚夫妇有权利流放到同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完全与世隔绝。假结合往往发展成为真结合。勃朗施坦和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初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婚姻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他在《我的生平》中对这场婚姻只用一种超然而冷淡得出奇的措辞一带而过,使人认为这意味着结婚是假的。他说"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不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举行了婚礼……。"[①] 然而目击者的叙述却否定了这一结合的性质是平淡的这种说法,它描写了在这两个以前争论对手之间既恨又爱的矛盾感情是如何转变为恋爱的。在狱里以及在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途中,勃朗施坦心中充满爱情,在军队押解下持续两周的路程中他沉溺在爱情中,完全忘了他的朋友,忘了讨论。据内在证据,目击者的叙述看来是真实的。顺便说一句,结婚并非儿戏。勃朗施坦在赫尔松监狱里第一次想到结婚。但不必取得父母许可的时代尚未来临,他父亲反对,不许儿子娶一个年龄大这么多的姑娘,娶一个会把儿子引上邪路——老勃朗施坦对此深信不疑——的姑娘。齐夫曾写道:"廖瓦大发雷霆,并竭尽全力地抗争,而且极其顽强。但是老头子也同样固执,并占有在监狱铁窗外面的优势,老头子胜利了。"廖瓦又在莫斯科再次作努力,这一次他成功了,如果是假结婚的话,他大概用不到那样"大发雷霆"。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8页。

从莫斯科到流放地的路程因在几个羁押解送监狱"作短期羁留而中断,以致从夏天一直拖到晚秋。整批流放犯乘火车到伊尔库茨克,他们在那里被分别押解到不同的目的地。勃朗施坦夫妇则乘一艘大驳船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大驳船上挤满穿白衣的阉割派,[①] 他们唱祈祷歌,狂热地跳舞。命令勃朗施坦夫妇在乌斯季库特村上岸,这个村在勒拿河淘金热期间曾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移民基地。此时淘金者已去到更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乌斯季库特成了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凄凉地方,约有100家肮脏的农舍,小咬肆虐。苦于发财梦没有实现的居民发狂地沉溺于伏特加烈酒之中。勃朗施坦夫妇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阅读时不停地把蟑螂从书页上掸走。后来他们获准迁到东边250俄里远的地方,他在那里替一个不识字的百万富翁记账。他的雇主在广大的区域内经商,是通古斯居民的无冕帝王。勃朗施坦注视着在这个西伯利亚处女地上发展起来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将来他要以此为例来说明落后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这一俄罗斯特点。社会观察与聚精会神地记账不能兼顾,勃朗施坦由于记错了一笔账而丢掉了工作。在严寒的冬季,在华氏零下90°的严寒中,勃朗施坦夫妇乘雪橇回到乌斯季库特。他们带着他们那出生刚刚10个月的女婴,用厚皮袄把她裹着。每到一站,婴孩的双亲都要打开厚皮袄,看看是否他们为使婴儿不至冻死而把她闷死了。

他们从乌斯季库特迁到高耸在贝加尔湖之上的高山中的维尔

① 阉割派是受迫害的狂热教派,他们自行阉割,过圣洁("阉割圣人")的生活。他们在公社中生活,大多数是园丁,穿着白色衣服,用祈祷来消磨晚上的时间。这个教派以《以赛亚书》为根据:"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所喜欢的事,持守我约的阉人,我必使他们在我的宫殿中,在我的室内有位置,比有子女的更美。"(第56章第4、5节)据传说,有几个沙皇(如亚历山大一世)属于这一教派。

霍勒恩斯克，这地方位于去伊尔库茨克的途中，他们在那里住进一栋小房子，比较舒服地定居下来。维尔霍勒恩斯克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古老的居民点——35年前，波兰起义者曾被流放到这里筑路——而现在这个地方已有一个不小的流放犯人居住区了，它和伊尔库茨克通邮很方便，成为西伯利亚这一带最重要的城镇。勃朗施坦在这里有充分机会继续他的研究，发展他的思想，建立有效的联系以及用不止一种途径作自我介绍。不久，他就深深陷入流放区里正在进行的辩论中，而且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他通过演讲、辩论和写作阐明他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赞成群众斗争、反对恐怖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主观主义哲学。前几年，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此刻，他在西伯利亚终于坚决认同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当时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刚刚壮大起来，正在流放犯人及修建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工人中征集会员。协会跟勃朗施坦接近，要求他写传单，他欣然同意。很快，这个组织就把他看做是他们的领袖及发言人。两年后他参加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党的重要代表大会时就是代表这个西伯利亚协会的。而党也就是在那次大会期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

1901年春天发生的一次突然的骚动是沙皇帝国国内舆论起落的一个标志。大学和工厂里又爆发了暴风雨般的示威和罢工，几千名大学生被捕，许多人被征召入伍——这是1899年颁布的一项新惩治法，许多人被流放，圣教公会开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教籍。1901年2月，一个姓卡尔波维奇（Карпович）的大学生枪杀教育大臣博戈列波夫（Боголепов）。作家协会抗议警察当局对学术生活的粗暴控制。社会党国际发表庄严的宣言谴责沙皇。秘密组织又得到了新鲜血液，新来的流放犯把清新的空气带进西伯利亚的各流放区。勃朗施坦根据新来者的叙述估计反沙皇者的力量，

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骚动尽管激烈，但因为秘密组织不懂得如何对此加以利用，也不懂怎样引导它反对独裁政府，终归会彻底失败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但只能各自为战，每个组织都只全神贯注于当地事件，而且各有其抱负，这就需要有全国性的协作和领导。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并不是勃朗施坦。在国外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及其他人在新创办的《火星报》上都在阐述这一观点，但《火星报》的第一期是几个月前用德文出版的，还没有到达在维尔霍勒恩斯克的流放犯手中。勃朗施坦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区中广泛传播，引起热烈的争论。这篇现在鲜为人知的文章之所以引起传记作家的注意，是因为在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党的组织与纪律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特点的东西是相同的，但在当时却遭到尖刻恶毒的批评。①

1901 年，他的论点是：革命如果不受一个坚强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如果这个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力去解散无纪律的组织或开除不守纪律的组织或个人时，革命运动就必定会成为弗兰肯斯泰因所创造的恶魔。"中央委员会要与它(无纪律的组织)断绝关系，因而也要切断该组织和全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央委员会将停止为该组织提供文件资料，停止供给资助，要派自己的小分队……到现场参加斗争并给它必要的资助，中央委员会要宣布这支小分队就

① 参见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 32 页。他给西伯利亚协会作关于党的第二次大会的报告，在报告的附录中引用了他 1903 年在西伯利亚写的文章，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不顾他在西伯利亚所主张的观点而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因。起初，西伯利亚协会像南俄协会一样，其性质是"经济派"的。1902 年时，它才承认革命的政治对经济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在勃朗施坦的影响下加入火星派组织，后来，这个联合会被孟什维克吸收。

是地方委员会。”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概括起来，这就是清洗、开除、革出教门的全部步骤，他自己最后也被人用这些步骤切断了他和世界革命的联系。然而在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全国的一体化和纪律，确实不能前进一步；而全国性的领导有时必然要坚决地把这种纪律强加给那些不愿服从的团体。[①] 勃朗施坦最初系统地提出这种观点时，就给自己招来了指控，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有一天用来指控列宁的罪名。有些流放犯论证说，勃朗施坦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退到了民粹派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寄希望于工人群众，而不是少数领导分子，因此他们无需授予中央委员会那种在偏狭的阴谋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独裁权力。现在我们且不去深入地研究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事，因为在其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它将成为本书叙述的主题。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争论的开端一直可追溯到 1901 年。

然而我们对这些活动远不如对勃朗施坦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文学成就那样熟悉。他到达西伯利亚后很快就开始为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进步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稿子署名是安季特·奥托(Antid Oto)，这个源于意大利文 antid oto 的笔名很适合充溢其文章的反抗精神。他以“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区声誉鹊起，而且他的名声通过从流放地回到俄罗斯的流放者传到彼得堡、基辅的革命圈子里，甚至传到流亡西欧的人士当中。[②]他当时的文章后来重刊在他的全集第 4 卷和第 20 卷中，都是些介于文学和报刊文章之间的作品——按照 20 世纪中叶不连贯和简短

①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 62－72 页。

② 作者本人认识一些老一辈的前流放者，他们在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时在谈话中还是用安季特·奥托来指托洛茨基，例如，他们常问：“安季特·奥托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的报刊文章的标准,当然应把这些文章归入文学类。他撰写社会通讯及文学评论,前一类主要包括关于西伯利亚农民生活的文章,其风格是从容描写与尖刻讽刺兼而有之。他的这些文章深受天才的悲剧性民粹党人格列布·乌斯宾斯基(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的影响。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对农民、手工业工人及小官吏生活的现实主义但又极度伤感的描写暴露了沙皇帝国的伤疤,揭示了它的苦难,为"暴露文学"树立了很高的标准。

"自从这位老作家对当时情况进行评述以来,已经过去约 1/4 个世纪了,现在是要看看从那时以来俄国的农村和小城镇究竟起了多少变化的时候了。"安季特·奥托直接乞灵于乌斯宾斯基,步他的后尘。他论述同类人物,如农民和小官吏、受害者和心灰意冷的人,以同样的同情和怜悯对待他们——只是他的愤激更尖锐、更强烈。因为他的文章必须受检查官的审查,所以他并不直接攻击政府。但是这种约束使他那种克制的愤怒与嘲弄给人的印象甚至更深。他的语言流畅易懂,尽管文风有些造作——往往堆砌词藻,有时有些夸张并过于雕琢——但丰富多彩而意味深长;他的全面而深人的观察、生动的描写以及意想不到的对比和形象弥补了由造作的文风形成的缺憾。"我们的乡村在经济上受富农的掠夺,在肉体方面受梅毒及各种流行病的摧残,而精神上则生活在暗无天日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西伯利亚乡村不卫生的情况以及乡村医生的命运,"我们的乡村在沉默中因疾病而濒于死亡。"他还写道,把精神病人关在监狱里进行观察,因为没有医院,监狱就成了"当地卫生局的精神病科"。有一个例子:两个无家的病人,一个是老起义者,一个是老宪兵——就是这个老宪兵曾押送这个起义者到流放地——因为没有其他收容所,他们就住在同一间囚室里。医生们也都与世隔绝,孤立无援,情绪低落。或许地区医务人

员会议会使他们摆脱冷漠状态吧。[1] 另外一次,他再次要求建立西伯利亚的当地政府,他写道,在欧洲部分的俄国,地方自制机构在当地问题方面至少还有些发言权,但在乌拉尔以东,行政机关觉得每个地方自制机构都要造反,因而,即使当地政府基层机构遍布各地,农民在其中也不过充当"沉默的象征",贵族收入3000卢布的就可派一个代表,而农民却要收入43000卢布才可派一个代表。

他用描绘西伯利亚乡公所(包括管理几个乡村的行政区)的一个办事员的人物素描来说明行政机关不合时代的性质。一名办事员担负着多得惊人的工作:他负担着内务部的工作,为陆军部征兵,为财政部收捐税,为农业部准备统计数字,他还是司法部、教育部和宗教各教派的地方代理人。只有海军部和外交部没有让他办事;但连这点也不能保证。这个办事员集财税代理人、统计员、农艺师、筑路工程师、建筑师、公证人、法官的所有工作于一身,而他甚至连薪俸都不能定期领到。结果呢?他呈送上级机关的半真半假的统计数字都是他在那里编出来的,而这些又作为许多官方调查研究的根据,于是成为负责鉴定的头头们激烈争论的对象。[2] 勃朗施坦有一系列文章主要描写"家庭妇女的苦难":俄国农民残酷鞭打他们的老婆,西伯利亚的富商也是这样对待其妻子的。

这些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文献价值,可以想象得到文章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书报检查官在审读这些文章时疑心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删掉某几节或整段。这不断迫使作者采取规避的新手段,用暗示及隐喻表达他的用意。当他那"无防护的手"再也不能冒险去抓住棘手问题时,他只好抱歉地把要写的文章转化成半小说的文体。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4卷第17-42页。

② 同上,第3-7页及同书各处。

有反抗性的作家往往在文学批评中找寻避难所，以防审查制度的袭击，勃朗施坦也是如此，然而就他来说，文学批评远不仅是用来当做阐明政治观点的一种合适的依托。他把文学批评作为使命来做。即使在他开始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文学时也没有沾染那种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却往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点。他的探讨是分析而不是说教，而他对审美价值的生动评价和欣赏使他的探讨内容更丰富。他是一个不知餍足的读者。在西伯利亚的两年中他写过论尼采、左拉、豪普特曼(Hauptman)、易卜生、邓南遮(D'Annunzio)、鲁斯金(Ruskин)、莫泊桑、果戈里、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乌斯宾斯基，高尔基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联想及引喻范围极广，尽管其中有些纯属年轻人卖弄学问因而必须加以摒弃之处。像马克思义者必然会做的那样，他首先注意的是隐藏在文学作品后面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对此，诗人和小说家给予个性化的表现，而文学作品反过来也对那种气候发生影响。

但在这些文章中没有丝毫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后者声称在每首诗、每个剧本和每本小说中都能发现隐藏着经济的或政治的阶级利益。勃朗施坦没有宗派观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一个20—22岁的人来说就更难得了。宗派观念会使一个革命家把任何不合他自己观念的、对他是无用的精神价值都加以谴责。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这种态度通常是内心不稳定的一个症候：表明他没有真正消化他新找到的哲学；他所信奉的原则对他的思想来说是外在之物；与其说他是出于真诚信仰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莫如说是出于责任。任何看来同他没有完全消化的哲学相矛盾的东西，他对之痛斥得越猛烈，就越是心安理得，他的责任感就越能得到满足。所以，在年轻的勃朗施坦身上，没有宗派观念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多么真诚地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他

自己的思想方法,而且也是一个测量他对之确信程度的尺度,因而他才能摆脱唯命是从的宗派主义。对那些思想背离或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作家,他往往对他们的天资或才华大加称赞。他这样做不但出于公正,而且也由于确信“人的精神财产如此丰富,而又这样千差万别”,只有“站在伟大前驱者肩上”的人才能讲出确实崭新而有分量的话。这位21岁的作家坚定地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要去完善而并非抛弃伟大的文化传统——它所否定的只是守旧的、因袭的传统观念。他并不害怕去发现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观点可能有部分重叠或相符之点,也不害怕承认在总体上为他所拒绝的任何观念中也有不容怀疑的真理的坚实核心,或者说有一点儿真理的东西。[①]

在到达西伯利亚后的一两个月中,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一篇悼念尼采的批评性文章,从1900年12月开始分几期在《东方评论》上连载。在他能选取的主题中没有比尼采的作品更使他为难的了,因为尼采仇恨社会主义已恶名昭著,而其对超人的崇拜更使社会主义者厌恶。勃朗施坦在论文的开头为文章的批评语调致歉说:“我们应心平气和地对待……敌手的人格,我们应……赞扬他们的真挚及个人的其他优点。但是一个敌手,不论他真挚与否、活着或已去世,仍然还是敌手,尤其当他是一个还有作品垂世的作家……。”他指出超人的思想如何从标准的资产阶级道德中产生,又怎样与那种道德对立。他认为,尼采总结并得出极不合逻辑的,或更确切说是缺乏逻辑的结论——蔑视群众,这在标准资产阶级思

① 他在一篇论“俄国小说奠基者”果戈理的文章中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果戈理试图削弱他自己作品中的社会意义……我们就不要抓住这一点反对他吧,如果在他政论文章中试图向渺小思想呼吁——我们就原谅他这一点吧!为了他无可估量的伟大文艺功绩,为了他创造性作品的崇高人道的影响——愿万古流芳的光荣归于他!”《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20页。

想中根深蒂固。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批评家说明了尼采有多少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代表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不是已暗示过就是已明白说过的。超人思想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只不过像超标准与标准的对立而已。不道德的超人与正直的中产阶级的关系正如中世纪晚期的强盗骑士(其准则是：在本乡本土上抢劫同宗同胞并不可耻)与封建主的关系一样。尼采的超人理想就是不受约束、剥光伪装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对尼采指出的中产阶级乏味的伦理标准如何脆弱这一点，只能赞赏他的精彩和独创性。[①]

勃朗施坦在一篇评易卜生的文章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在易卜生身上看到这位不朽的剧作家同伪善者的斗争。[②] “欧洲社会思想史学家永远不会忘记易卜生给资产阶级市侩那洗刷得干干净净、油光发亮、自鸣得意的面孔所掴的几记耳光，那几记确实令人痛快的耳光。”例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是如何无需施加一点儿暴行就能阴险地孤立并消灭一个异端者的(像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有效)。但是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赞同易卜生剧本中主人翁的超人态度：不信赖人民，蔑视多数人的政府。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人民、多数人并不是包罗一切智慧的源泉：“如果讲的是要求‘群众’对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的价值作出判断……易卜生大概会正确一千倍。……一位达尔文派的学者关于生物学问题的观点比起十万人大会上发表的集体意见要重要一万倍。”(作者想象不到50年后在他的国家里在群众大会上告发“不忠诚”的生物学家或语言学家会成为惯例。)“但是当我们涉及实际社会政策领域时——在这一领域中有如此众多的深刻对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47－162页。

② 同上，第181－195页。

立的利益在起作用——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一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它符合真正的社会力量平衡而不是用人为手段临时搞出来的,它就有无限的优越性。"然而,易卜生的不信赖"人民"却是表示一个艺术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抗,马克思主义者应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尽管他们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的,而且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

勃朗施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受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的影响。"(这种艺术)像一只风筝能飞上高空,地上的万物都淹没在灰暗平淡中,但是即使它飞到云端以后,这种可怜的'自由'艺术仍然还是系在一根结实的线上,而在地上的那一端紧紧掌握在市侩的手里。"[1] 他在另一处写道:"没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文学是社会疲惫无力的征兆,是急剧过渡时期的特点"。[2] 因此他用批判眼光看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潮流。但是他这样看并不是因为他喜爱狭隘的现实主义。相反,他说:"艺术创作不论如何逼真,仍然总是象征性的。……艺术的目的不是在经验细节上复制现实,而是找出普遍典型特征,用以揭示生活的复杂内容。……从广义上讲,每一个艺术典型都是象征,更不用说像梅菲斯特、浮士德、哈姆雷特、奥赛罗这样高度象征性的形象,它们是人类灵魂'特定时刻'的艺术体现……。"然而他认为象征派实际上是试图把手段抬高为目的,这样,就把象征从加强表现人的感受的手段降低成为逃避感受的手段。

他对欧洲文学的兴趣正像他反对俄国官员及部分民粹党人的民族自大狂一样强烈。他奚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自我吹嘘:不必向西方学习,俄国人自己已经作出一切伟大的创造发明——

① 参见论霍普特曼一文,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70-181页。

② 论巴尔蒙特一文,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67-170页。

"俄罗斯土地能培养出自己的柏拉图和机智的牛顿。"[1] 这种"西方化"思想在当时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所共有的,它并不意味着对 19 世纪俄罗斯精神遗产的否定——俄国伟大的文学传统不能追溯到更远。大多数俄国思想家及作家都是反抗者,而革命的知识分子都钻研他们的著作。因为在勃朗施坦的童年及青年时期,可能使他成为革命家的经历很少,所以促成他自行切断他与童年及青年时期的联系的正是反抗文学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深受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影响。1902 年乌斯宾斯基发疯而死时,勃朗施坦曾引用乌斯宾斯基的话来自我表白,说他成年时的反抗者的生活和他的童年及青年时期的生活几乎毫无联系,并说他在形成新的个性之前已经忘记了他的过去,当然这话对悼文的作者来说更为确切。他写道:"乌斯宾斯基对自杀十分敏感,他了解的是已有的那种生活,在对应有的生活的渴望中筋疲力尽。他追求真理而得到的是谎言;他追求美而得到的是丑;他追求理性而得到的是疯狂。"[2]

对反抗文学方面的其他领导人物如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其次对赫尔岑,勃朗施坦钦佩他们与被压迫者打成一片、不计较世俗的成就、不受陈腐庸俗的沾染的品格以及为追求真理而彻底献身的精神。他认为乌斯宾斯基虽是民粹党人,但没有民粹党人的偏见和幻想:"一个为自己的无畏思想殉难的孤独人物,他那痛苦的洞察秋毫的目光超越他同时代人及其同志的头脑……直视未来的面貌。"他说,别林斯基"这位现代俄国文学的教父认为,一露头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20 卷第 116－118 页,1901 年 11 月发表的关于《俄国的达尔文》的讽刺文章。

② 关于乌斯宾斯基,勃朗施坦写过两篇悼文,一篇写给《东方评论》,另一篇写给《科学评论》,载《托洛茨基全集》第 20 卷第 33－40、41－67 页。

而马上成功而且得到无条件赞扬的绝不可能是重要的或伟大的——只有意见纷纭……经过真正斗争而发展成熟的,只有反对生存障碍、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才是有意义或伟大的"。他评论道,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评论家的价值在于:他对任何虚伪音符都极为敏感,对即使是无害的陈词滥调也不能容忍。使杜勃罗留波夫最为苦恼的是不得不听一个人热烈论证同类相食的不人道或教育的益处。勃朗施坦断言说:"只要伟大的英雄主义还为区区琐事而趾高气扬……,只要还认为宣扬廉价的自由主义入门是社会功绩,杜勃罗留波夫的讽刺仍是重要的题目。"[①]

对勃朗施坦的文学批评的这种概括经过不可避免的压缩,因而对他的文章的成熟性说得可能有点儿过头。他的过于精雕细琢、过于堆砌词藻、过于才气横溢的文风仍然是青年人的文风;但就整体说,他的判断力是成熟的。在传记作者看来,作者含蓄的自我分析和自画像中的不少精采之处提高了这些文章的价值。然而,年轻的勃朗施坦更直接地把自己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对20世纪的祈求上(早在1901年写的题为《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20世纪及其他许多问题》)。[②] 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声明他偏爱那种对目前悲观但对将来乐观的观点,勃朗施坦认为,为人类精神开辟新的前景、创造历史的人正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这个罕见的乐观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去勇敢地面对神圣宗教法庭。"集体的'托克马达(Torquemada)'[③]曾不止一次地专心对付他。"然而他这个乐观主义者从灰烬中站起来,"和以前一样热情,一样充满信心和战斗精神,大胆地去扣历史的大门。"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12、29－31页。

② 同上,第74－79页。

③ 托克马达系西班牙最早的宗教裁判所所长,以冷酷而出名。——译注

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市侩,市侩的力量在于人数众多和彻头彻尾的庸俗,他们用阅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而他们的阅历则不外乎柜台、办公桌及双人卧室的阅历。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者对市侩的嘲笑及其冒充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月亮底下没有新东西")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息尚存,希望不止!……如果我是一个天体,我会以完全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由尘土构成的可怜的星球。……我会对善与恶都同样地投之以光辉。……但我是一个人。"对你们这些冷冰冰的科学的火鸡,对你们这些永恒的簿记员来说,世界史在时间的天平上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为未来而斗争,坚强而又美好的人在光辉灿烂的未来将成为人类历史潮流的主宰,并引导这股潮流走向美好愉快和幸福的无垠的地平线!……

19世纪曾在多方面满足了乐观主义者的希望,但在更多方面则是对他的希望的欺骗。……迫使他把大部分希望转寄予20世纪。当碰到残酷的事实时,乐观主义者惊呼:什么?踏入20世纪的门槛后竟还会出现这样的事!过去他描绘和谐未来的美妙图景时,总把它们放在20世纪。

而现在,这个世纪来了!它在其开端时带来的是什么呢?

在法国——种族仇恨的毒涎;在奥地利——民族主义的冲突……;在南非——一个小民族在庞然大国的屠刀下痛苦挣扎;在"自由"岛国本身——为贪婪、侵略成性的股票经济大获全胜而高歌;在东方是戏剧性的"麻烦纠

纷";在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是饥饿群众的暴乱……仇恨、屠杀、饥饿和流血……。

看来,新的世纪,这个新来的巨人,似乎刚一出现就把乐观主义者推进绝对的悲观主义,推进市民的天堂。

——乌托邦见鬼去吧!信仰见鬼去吧!爱见鬼去吧!希望见鬼去吧!20世纪的雷鸣是由隆隆的炮响和排排火枪齐发构成的。

——投降吧,你这可怜的梦想者。现在我来临了,我就是你等待已久的20世纪,你的"未来"。

——不,毫不屈服的乐观主义者回答说,你只不过是"现在"。

※ ※ ※ ※ ※

勃朗施坦经过四年半的坐牢与流放生活以后,渴望着有比西伯利亚流放区更广阔的战斗舞台。1902年夏,地下邮递员给他送来一本列宁的《怎么办》和一本《火星报》的合订本。他读这些文件时感慨万千。他从中看到一些关于党的模式和特点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早已在他的思想中成熟,现在由那些流亡国外的杰出作者以极大的信心阐述出来。他在死水般的环境里独立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一事实只能使他激动,而且使他更加自信。但是他也感到极度不安,他再也不能忍受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鹅卵石铺的狭窄泥泞的街道了。甚至流放区内的争论和他为《东方评论》所写文章的成功也使他不胜厌烦。他只要能逃到莫斯科或彼得堡……尔后就有可能去日内瓦、慕尼黑或伦敦这些锻造革命理性武器的中心去……。

他把他的急躁情绪和内心的抱负告诉了妻子。亚历山德拉毫

不怀疑她的丈夫注定会成为伟人，而23岁正是他干不朽事业的时候。她让他设法逃出西伯利亚，她要承担起自我牺牲的重担。当时她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她将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挣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而重新团圆不知要等到何日。她深信，作为他的妻子而且作为一个革命者，她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她认为尽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事，丝毫没有想到这是戏剧性的传奇行为。[1]

1902年的一个夏夜，勃朗施坦躲在一辆农民运干草的大车里，大车沿着西伯利亚坑洼不平的原野辘辘地走在通往伊尔库茨克的道路上。在维尔霍勒恩斯克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床上躺着一个假人。第二天傍晚，警官照例来检查，看看勃朗施坦是不是在这里。他爬上楼梯，登上阁楼，向床上瞧了一眼，一切正常，满意地走了。与此同时，逃亡者却换上了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朋友给他的体面的新服装，乘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

离开伊尔库茨克之前，他的同志给了他一张假护照。他必须赶紧填上他要假冒的姓氏，他草草写上敖德萨监狱中他的一个看守的姓名。在这次危险的逃亡中，以看守他的狱卒自居，是否是为了满足这个逃犯对安全的潜意识的渴望？可能就是这样。确凿无疑的是，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看守的姓氏将在革命史册上赫然出现：这就是托洛茨基。[2]

这次西行意外地平静。这位旅客阅读用六音步诗形式翻译的荷马史诗的俄译本，以此消磨时间。他在伏尔加河边的萨马拉下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57页；《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42页；《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42－143页。

②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25－26页；《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43页。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没有说他假名的奇怪来源，他似乎是不好意思，只说他想象不到托洛茨基会成为他以后一生的姓氏。

车,《火星报》组织在这里设有国内总部。他受到杰出的工程师,列宁的朋友,未来苏维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莱尔(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 Клэр)的热情欢迎,勃朗施坦的文学声誉先于他本人传到这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莱尔已经给他取了个绰号:"笔尖儿(Перо)",并向伦敦的《火星报》总部送了一篇关于他的才华和活动的热情洋溢的报告。他们立刻派勃朗施坦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视察各社会主义团体。他看到大多数团体坚持地方主义、不肯互相合作或拒不服从中央的权威,他带着有关这种情况的报告回到萨马拉。那里已有一封列宁的急信在等待他:要"笔尖儿"尽快到《火星报》的国外总部汇报。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1902年10月的一个早上，几乎可以说在拂晓时，这个从西伯利亚逃出的人在伦敦英王十字形碑附近猛敲着霍福特广场10号住宅的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他的妻子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他们的下层中产阶级邻居称他们为里克特先生和里克特夫人——在这栋房子里住的是带厨房的一居室。清早的时间不宜拜访和做客。但是这位来访者的使命太重大、太急切、太自信，无暇考虑这些细小礼节。他心情极其激动地从伊尔库茨克来到伦敦，他曾偷越国境，在旅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他在维也纳也曾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著名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在星期天的休息中唤醒，得到他的帮助及自

己此行其余路程所需的钱。在苏黎世,他曾在午夜敲俄国马克思主义前辈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 Аксельрод)的门,向他作自我介绍和为最后一段路程作准备。此时他已到达最终目的地。他孑然一身,在伦敦拂晓的灰色晨雾中,身后只有等候他付车钱的马车夫——乘车人没有钱;他用力叩门,表明他内心的激动。他确实是在敲历史的大门。

克鲁普斯卡娅猜到大清早就来大声叩门的来客是同胞,她有点儿担心邻居英国人可能会因为陌生人在房子里这样过分的举动——这已不是第一次——而生气,就赶紧出来迎接客人。她在门口就叫起来:"笔尖儿到啦!"她后来回忆说:"列宁刚刚醒来,还坐在床上,我让他们在一起,我去打发马车夫,准备咖啡。我回来时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床上,跟托洛茨基就某个颇为抽象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谈话。"也许是对"雏鹰"的热忱介绍和这第一次的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新来的客人特别注意。"[①] 客人忘不了"列宁脸上流露出的欢迎……和理所当然的不解的表情"。

客人一口气汇报了西伯利亚流放犯中的政治倾向与情绪和他新近的基辅、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行的印象;汇报了当地的团体对于自身应是全国整体运动的一部分所持的抵触态度,萨马拉总机关的工作,秘密接头地点的可靠程度,非法偷越国境准备工作方面的缺点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列宁因最近从俄国地下通道送来的信混乱与没有条理而生气,所以,得到这个青年人报告的非常丰富确切的信息,听到这个青年人"清晰而深刻的"汇报以及发现他是一个对党的集中制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列宁十分高兴。[②]

---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5卷第245－250页;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1章。

列宁急于进一步考察他，带他长时间地散步和谈话，在此过程中给他指点伦敦的历史及建筑文物。但是托洛茨基——从此开始要这样称呼他了——心里装的都是俄国的秘密斗争，因此，凡是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不能使他产生兴趣。他注意到列宁在试图使他悉熟某些历史文物时所用的独特方式："这是'他们的'威斯敏斯特"，或"这是'他们的'大英博物馆"，列宁总是这么说，他用语气的变化和暗示既表达他赞赏体现在雄伟庄严建筑物中的天才，又表达他和统治阶级的对抗，因为那些建筑物都是统治阶级的精神与权力的纪念碑。托洛茨基热切希望言归正传，希望谈话回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火星报》的编辑们建议用什么方法把分散的团体结合成一个紧密集中的党？他们反对经济派——这些人试图使运动保持在非政治性的工联主义界限以内——的斗争进展如何？而他们如何去反击另一些人开始复活民粹派式恐怖主义党的企图呢？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反对彼得·司徒卢威(Петр Струве)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局促而满意地倾听了托洛茨基叙述他本人和其他人在狱中如何研究过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听他说该书中引用的大量统计材料给他们留下了如何深刻的印象：这些材料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已使俄国社会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已使农业社会主义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而为无产阶级运动准备了舞台。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要求托洛茨基来伦敦汇报以及他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

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指定的任务在等待他。列宁往往急于要会见每一个在地下工作中脱颖而出的人。仅仅几个星期前，他曾写过："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辩，……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为了纠正不和谐音，需

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①] 列宁有关党的集中制的思想里包括对那些正在现场为党进行战斗的生气勃勃的人们的密切关注,这是真正领袖的重要特点。他知道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已"演奏过第一提琴",因此,他想会见托洛茨基,要弄清楚"他在哪里以及如何学会演奏他的乐器的"。此时,列宁(在给朋友的信中)正在抱怨《火星报》编辑部人员不足,他必定考虑过是否把"笔尖儿"留在《火星报》工作。列宁在托洛茨基到达的当天就安排他在邻近的一栋房子里膳宿。《火星报》的其他编辑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都住在那栋房子里。托洛茨基搬进去后不久,就为该报写了第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发表在他到达后出版的那一期上,日期是1902年11月1日。[②]

《火星报》编辑部由6人组成: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三个流亡者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先驱),以及年轻得多的列宁、马尔托夫和刚刚从俄国来的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大多数编辑住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住在瑞士,但普列汉诺夫常到伦敦来。所有与俄国地下运动联系的线索都集中在这个团体里,特别是集中到列宁的家,秘密人员把信件带到霍尔福特广场来,把指示带回去。年轻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从维尔霍勒恩斯克直接来到俄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心,并且处于那些杰出而彼此对立人物的不断影响之下。

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跟托洛茨基同住、同吃,而且有共同思想。在托洛茨基出生前的那年,向特列波夫将军开枪的就是维拉·查苏利奇,她无意中鼓舞了民意派学习她的榜样。她在陪审团宣告其无罪后逃到国外,曾与卡尔·马克思保持接触,她虽然接受马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6页。

② 《火星报》第27期。

克思的教导时思想上不无保留，但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创立者之一。她是不顾马克思的疑虑而最早宣布马克思为西欧提出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样适用于俄国的人之一。[1] 她不只是一个英雄人物。由于熟读历史和哲学，她本质上是一个有聪慧智力的异端者，她凭直觉的冲动和机智而不是凭论证进行工作。在她同时代人对她所作的所有生动的描写中，我们还看到老式的俄国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喜剧特性。"她的写作很慢，确实备受文字创作折磨之苦"；她在写作或辩论时反复思考，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拖鞋在脚下趿拉趿拉地响，卷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喷云吐雾，窗台上和桌子上丢满烟蒂，烟灰落在她的宽大罩衣上、手臂上、手稿上，或散落在她的茶杯里，有时还落到与她交谈者的身上。在青年托洛茨基的眼中，她是壮丽史诗般的女主人公，现在他与活生生的革命传奇人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马尔托夫比托洛茨基只大几岁，也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伟大学者家族的后裔，真名是策杰尔包姆。他是崩得，[2] 即犹太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他放弃了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工党的想法，跟列宁一道在彼得堡建立了工人解放斗争协会。他继列宁之后流亡，并与他一起和老一辈流亡者携手创办《火星报》。马尔托夫是《火星报》撰稿人中的骨干，是敏锐的分析家，是有挖苦癖的作家，又是一位文笔流畅而多产的时事评论员。而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鼓动者和组织者。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都属于浪漫的叛逆者，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他们的反应与其说受理论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 240－242 页。

② 崩得(依地语 Bund)即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897 年建于维尔诺。1898－1903 年和 1906－1912 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1921 年自行解散。——译注

则的指导,不如说受道德义愤的支配。他们富有魅力,慷慨,谦虚,就气质来说与其说他们是政治家不如说是艺术家。

列宁是用不同材料铸成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浪漫主义——当革命还只是思想和幻想的时候,没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人是不能成为革命家的。但是列宁抑制了自己的浪漫气质,对俄国叛逆者常有的脱离现实抱之以轻蔑。列宁是民粹派烈士的弟弟,深知革命党人曾为脱离现实付出鲜血和挫折的代价。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给革命党人灌输现实主义精神,使冷静和热情相融合,并用准确有效的工作方法训练他们。因此,他珍惜精力和时间,自我约束,专心致力于研究和工作,在流亡者的聚会上很少看得见他,他也很少参加他们漫无止境而往往没有结果的争论。他欣赏为行动作准备的讨论而不喜欢为讨论而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只沿着一条轨道活动,但这条轨道如同社会本身一样广阔,它通向社会的改造。

托洛茨基跟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更接近一些,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而列宁对他的影响只是断断续续的。他仍处于性格形成期,需要密切的社会交往以及能促进他思想发展的辩论。充分满足这一需要的是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他们还拨动了他的心弦,他最初加入什维戈夫斯基的团体时,民粹派分子也曾拨动过他的心弦。列宁的指导尽管引起他的好奇心和敬重,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它只是枯燥而平凡的。还要经过若干年以后他才能发现这位平凡人物的伟大。

他到达伦敦后不久也结识了普列汉诺夫,跟查苏利奇一样,普列汉诺夫在托洛茨基心目中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普列汉诺夫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奠基者之一,一度与恩格斯交往密切。他是新学派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是这一派伟大的、学识渊博的文体

家和雄辩家，在欧洲享有声望。但普列汉诺夫陶醉在自己的声望和辉煌之中，因而冷漠无情且目中无人。他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对《火星报》的这个新撰稿者表示出本能的不悦，这种不悦渐渐发展成为强烈的反感。这两个人具有不少类似的才能和特性；两个人都是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而且都是机敏的辩论家，两个人的言谈和举止都有舞台效果，两个人都充满自信，坚信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当这个后起之秀初露头角时，那个前辈的光芒已经开始衰退。托洛茨基充满着未成熟的但感染力很强的热情，普列汉诺夫则逐渐变成怀疑论者，而且过于成熟了。卢那察尔斯基讲了一段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的轶事，尽管这段轶事显然并不真实，但的确能多少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说，当他到达伦敦时，查苏利奇在他面前兴高采烈地称赞托洛茨基的才干。她大声说："这个小伙子无疑是个天才。"普列汉诺夫绷着脸，转到一旁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他这一点。"①

《火星报》这班人虽然还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但是已有了意见分歧，托洛茨基不久就意识到了这点，而且不知不觉地也被卷了进去。编辑部里成为势均力敌的两方，三个年长的编辑为一方，三个较年轻的编辑为一方。有争论的问题都用投票来表决，由于每一方都一致投票反对另一方，因而产生了僵局。方针问题的争端往往悬而不决。列宁急于要打破僵局，因而想给编辑部增加一个新成员，即第七个成员。早在 1903 年 3 月，即托洛茨基到伦敦四个月后，列宁在送给各编辑的一份备忘录中竭力推荐他。列宁事前先驳倒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年龄及资格的种种反对意见；他强调托

① 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 19－22 页。某些回忆录作者（如泽利克森-博博罗夫斯卡娅）说，当《火星报》发表托洛茨基的第一批不署名文章时，读者以为是普列汉诺夫写的。

洛茨基"是难得的人才"、"信念坚定、精力充沛",而且还说他投的稿子"不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1] 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都同意。马尔托夫在致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他(托洛茨基)的作品显示出无可怀疑的才华……由于他的非凡的演说才能,他在这里已经产生重大的影响。他长于辞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都对此深信不疑。他知识丰富,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丰富知识而工作。我毫无保留地赞同列宁的提议。"[2] 阿克雪里罗得也认可这个候选人的资格。至少在这一点上,年长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并无分歧。《火星报》编辑部全班人员都热切地欢迎托洛茨基,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他激烈反对的理由是:托洛茨基投的稿子过于雕琢,降低了《火星报》的标准。托洛茨基的文风华丽、词藻堆砌,这是事实,列宁曾设法委婉地加以删节,他在推荐托洛茨基时曾写道,如果托洛茨基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会使他更容易注意到文风朴实的必要性,尔后他会明白这是全体编辑的意见而并非只是列宁一人特别喜欢文字简朴。但是使所有同事愤慨的是,普列汉诺夫无动于衷。在多次争吵以后,查苏利奇便把对此一无所知的托洛茨基带到编辑会议上来,希望普列汉诺夫会让步。普列汉诺夫冷冰冰地拒绝这个"闯入者",固执地坚持他的否决票。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普列汉诺夫怀疑他会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年长的编辑们。这简直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的主要动机。其他年长的编辑几乎都以父辈的自豪和体贴对待托洛茨基,他已成为这班人的宠儿,而他也对他们表示充满深情的敬爱。他不但对查苏利奇的态度如此,而且对阿克雪里罗得更是如此,阿克

---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5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

②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79-80页。

雪里罗得在苏黎世的家是托洛茨基来欧洲大陆期间最喜爱的隐蔽所。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性格大相径庭，他们的友谊深厚，已共同工作了近25年。阿克雪里罗得像托洛茨基一样是南乌克兰犹太人。他起初是第一个南俄工人联合会中的民粹党人，托洛茨基曾借用过他的第一个组织的名称。后来阿克雪里罗得移居国外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没有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天赋，作为一个作家是蹩脚的，作为演说家就更糟了。有许多思想本是他首先提出的，倒被他的朋友阐述得很出色。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那么阿克雪里罗得的社会主义则源于绝对相信工人阶级。他狂热地相信工人会找到通向社会主义和解放的道路，而且他本能地怀疑知识分子领导工人的抱负——这就是后来他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动因。普列汉诺夫在外表上是一个文雅的欧洲人、贵族，过着颇为布尔乔亚式的生活，而阿克雪里罗得则靠当工人过活，他在家里制一种特别的奶油供给他的主顾。从俄国逃出来的人以他家为避难所，他供他们吃，还常供他们穿，隔着牛奶罐跟他们辩论。他那不加修饰的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更像圣徒似的俄国犹太教教士，而不像革命的政治家。然而包括新近崛起的列宁在内的革命领导人，都视他为他们的导师和鼓舞者。对这个人，年轻的托洛茨基怀有深厚的感情，而这一深厚的感情甚至关系他的政治命运。①

共同友谊的纽带也把他和另一位先驱列昂·捷依奇（Лев Дейч）联系起来，捷依奇也曾是南俄民粹党人，他经过13年的苦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列宁传》第9－60页；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35－40页；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191－194、288－289页；H. 阿列克谢耶夫在1924年第3期《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H. 梅谢里亚科夫在《报刊与革命》1924年第2期中的文章；《梅杰姆自传》第2卷第1章；约翰·密勒：《先驱与建设者》第1卷第205－207页。

役之后,新近从西伯利亚逃出来,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尽管捷依奇的声望达到巅峰,他的勇敢逃亡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但他也用厌倦而又有点儿不理解的眼光看待新时代、新时代的问题和新时代的人物。对托洛茨基生气勃勃的激进主义和乐观主义尽管有点儿不安,但他也深情地喜爱这个出色的"宠儿",仿佛就是他自己年轻时希望的化身,他赞赏地注视托洛茨基在国外迈出的最初步伐,竭尽全力地帮助托洛茨基并使之更上一层楼。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意见分歧还未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久以前列宁和马尔托夫也是怀有此刻激励托洛茨基同样的感情师事这些老战士的。但是他们的学徒期已告结束,而且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徒弟总是比师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全部工作以《火星报》为中心,而老战士们既做编辑又是撰稿人,在这方面除普列汉诺夫以外,其他人都起不了多少作用。他们写得很少,又不大好;在组织俄国的秘密运动方面,他们很少介入或根本不参加。列宁与马尔托夫分担日常的编辑工作。而列宁在克鲁普斯卡娅协助下承担着保持和发展同俄国国内联系的主要的艰辛工作。[1] 老战士们不可避免地觉得自己已被人超越。

种种猜疑集中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的对抗上,双方都是各自一班人中最自信的人。这样的对抗在《火星报》创办时已经出现,而且愈演愈烈。列宁已对自己的观点及工作方法产生信心,而且他对此并不隐瞒。普列汉诺夫则傲慢地嘲讽列宁或者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地训斥列宁。1902 年 5 月,托洛茨基到达的前几个月,列宁

---

① 波特列索夫在 1927 年写的带有敌意的回忆录中承认:"然而…我们所有和工作最密切的人……不但尊重列宁的学识、智力和工作才能,而且尊重他矢忠于事业,尊重他随时作好献身准备、承担极不愉快的职责,而且极其自觉地一定要履行这种的职责。"A.H. 波特列索夫:《遗作集》第 299 页。

曾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收到了附有您的意见的文章。……您甚至不惜选用最轻蔑的言词。……如果您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共同工作无法进行,那么您所选择的方法很快就会使您达到这个目的。……至于……私人关系,那已经被您完全破坏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您已经使这种关系完全中断了。”① 自那以后查苏利奇与马尔托夫曾经弥合了这一裂痕。但是争吵又一再发生,最近一次的争吵与托洛茨基进《火星报》工作有关。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有一次(列宁)从编辑会议上回来,极其震怒地说,太不像话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回击普列汉诺夫。瞧瞧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吧!普列汉诺夫呵斥托洛茨基,而维拉只说:‘瞧我们的乔治,他只会大喊大叫。’列宁大声喊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②

这种分歧正在不知不觉地被由此产生的另一分歧所代替。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起初后者的作用是重要的,现在则微不足道了)一直共同行动,一致投票反对老一辈。但是随着争论的发展,列宁与同辈人,特别是同马尔托夫也开始疏远了。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回头,而且完全不顾老一辈的感情,继续反对他们。马尔托夫的观点不大明确,而且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也不大坚决,因而企图和解。通常,他的意见往往和列宁的意见相同,但当他企图把意见付诸实施而遇到阻力时就开始犹豫,重新考虑之后,他就动摇甚至退却。不仅跟老一辈的争论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他往往开头和列宁一致,为某一目标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尔后面对列宁的不妥协态度,他又畏缩不前,最后干脆放弃目标。就气质来说,他是“温和的”,列宁的“强硬”使他反感。在会议上,“列宁常用略带怀疑的批评眼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第219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5页。

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肩膀……列宁讲话时不看马尔托夫,马尔托夫眼睛在下垂的、从来不擦的夹鼻眼镜后面就会变得呆板无神。"①

托洛茨基当时就处于这些影响之下。列宁维护他,力图提拔他,抵制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这一事实本应使他接近列宁而反对老一辈。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老一辈在这一点上并不支持普列汉诺夫——他们也尽力支持并鼓励托洛茨基。其次,他比列宁约小10岁,而对老一辈浪漫的号召却十倍地敏感。他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太短,对他们的幻想还没有破灭,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尽管他们都有优点,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并不起作用。他觉得列宁反对他们是粗暴的,而且认为列宁的动机是个人的、自私的。

然而,他认为这种不和仅仅是光荣而重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次要方面。内部的争吵并不妨碍《火星报》成为新生政党的伟大核心——单单它的名称就是对革命者的激动人心的号召。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热情地相信《火星报》的使命,这种信心在他写的文章中跃然纸上。他最初给《火星报》撰写的文章其明显的标志是贯穿于文章的汹涌澎湃的感情力量,是他召唤革命的热情,是对俄国统治者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猛烈抨击,而不是他的独到的思想。这时他写文章不受检查官的约束,可以尽情发泄,但这一事实无助于提高他的文章质量——他为《火星报》写的文章往往不如他在西伯利亚写的文章。

他给《火星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彼得大帝在首都附近建造恶名昭著的施吕瑟尔堡监狱200周年而作,标题是《他的欧洲窗口,他的最重要的监狱》。作者召唤在这座监狱的围墙里惨遭杀害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76页。

以及被逼得发疯的烈士们的英魂，其中有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在文章结尾对沙皇及其仆从们发出响亮的挑战："你们仍可沉溺于你们爱国的狂欢中！——今天你们仍然是施吕瑟尔堡的主人。"他在同一期的《火星报》上痛斥半自由派的绅士们，这些绅士在地方自治会上连低声说一个反对当局的字都不敢。他写道："要使地方自治会的自由派们挺直他们温顺弯下的腰杆，还需要什么埃及的瘟疫、俄国的蝎尾鞭吗？"[①] 就沙皇发起斯拉夫人反土耳其的示威一事，他揭露"斯拉夫主义的骗子们"，写道："俄国公民们，这是又一个打开官方斯拉夫主义的安全阀的企图，给你们过剩的市民激情准备一个出口。还是25年前(即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的老把戏，当时，爱国主义的办报人从他们的档案室里抽出……泛斯拉夫兄弟关系这个概念，并紧锣密鼓地加以传播。"然而，沙皇政府对待自己的人民并不比苏丹对待他的非穆斯林臣民好。作者问："我们自己的牢狱难道比土耳其的牢狱好吗？……我们镇压叛乱的讨伐军士兵没有强奸过波尔塔瓦农民的妻子和女儿吗？没有抢掠过他们的财产吗？"那么，所谓的自由派对沙皇在土耳其的"文明使命"为什么给予支持呢？"为什么他们不要求发动反对野蛮的沙皇制度的……十字军远征呢？"半自由派的这种反对方式，亦即"用合法方式去反对无法无天的政府"，已经是，而且在许多年中一直是他特别喜爱嘲弄的对象。[②] 地方自治会的职能本应当是裁决行政机关的活动，但在其中"被告实际上承担着裁判长的

---

① 《火星报》1902年11月1日第27期。

② 《火星报》1902年11月15日第28期和12月1日第29期。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1年3月托洛茨基曾在《东方评论》上写道："带着所有曼彻斯特标记的纯自由主义在我国没有开过花就已枯萎了：它本身在俄国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曼彻斯特思想的输入是可能的……但是要输入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环境却不可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85－86页。

角色,并且僭取法庭随时休庭的权利"。沙皇统治赐给地方自治会"包上《大宪章》羊皮纸的皮鞭",地方自治会就感到满足。他们懂得自由是什么吗?是"政治自由的自由吗"?"人们可以确信地说:如果俄国的自由要由地方自治会产生,那就根本不会有自由。幸而俄国的自由另有可靠的根源:一个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另一个是俄国专制主义内在自我毁灭的逻辑。""会有不少政治潮流彼此接踵而来,许多'政党'将会出现,也会消失,每个政党都自称要改良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些政治潮流,这些政党在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插曲而已。……工人阶级已经在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他们的步伐虽不优雅,但却信心十足。"①

他用同样的笔调写到沙皇企图把俄语强加给芬兰人并破坏芬兰人的自主权,写到马克西姆·高尔基被开除出帝国科学院,写到倒退到民粹党恐怖主义的新成立的社会革命党的无能,还写到警察机关企图建立假秘密组织旨在与真正的地下组织较量。他攻击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在青年大学生巴尔马晓夫(Балмашёв)因刺杀内务大臣西皮亚金(Сипягин)而被判处死刑之后他写的那篇攻击文章引起了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愤怒抗议。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同情大大超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但是就连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攻击太激烈,说他提到这个被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人时应多些敬意和热情。②

---

① 《火星报》1902年12月1日第29期。

② 1902年夏,立宪民主党的未来领袖米留可夫拜访过伦敦的《火星报》编辑们,赞扬了《火星报》,但反对它开展反恐怖主义的运动。他说:"为什么呢?再给沙皇的大臣们来这么两三次,我们就会有一部宪法。"温和的立宪民主党人往往把恐怖主义者看做是对沙皇施加压力的有效的代理人。参见H.阿列克谢耶夫在《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3期上的文章。

从他到达伦敦到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其间只过去9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的声誉已经确立，以致这位23岁的年轻人能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严重分裂的大会上担任领导角色。这与其说是取决于他的文章，不如说是取决于他的演说和发言。他一到伦敦，列宁和马尔托夫就让他去白会堂与可敬的老民粹派及无政府主义流亡者辩论。这个新手与胡子花白的对手辩论，轻易取得了全胜，这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喜。此后，他到西欧的俄国侨民区作巡回报告。他的同时代人描写过初次听他演说时受到的意外、难以抗拒的冲击，他那雄辩、干劲、激情、机智与洪钟般的声音使听众振奋，因而所向披靡。由于不过几年前他在为数不多熟悉的听众面前说话还只能结结巴巴、窘得脸红，而且此后的时间大多是在单人牢房和流放中度过的，因而他的胜利就越发令人注目了。他的雄辩完全不是教出来的：他过去几乎从没有听过一个值得仿效的演说家的演说。这是出乎意料的潜在天赋突然迸发出充沛的活力而使目睹者惊奇与喜悦的例子之一。他的演讲以罕见的思想、想象力、感情和表达方式的力度而著称，甚至比他的文章还好。他那往往有损于其文章效果的修辞技巧却使他的演说更加动人。他带着似乎是他本身具有的戏剧性和对所加入的这场冲突的意识出现在讲坛上，他意识到，参加这场斗争的队伍和重要角色比荷马史诗中的战斗规模更大，都是堪称为半人半神的顶尖人物。[①] 他高高地站在讲台之上，感觉到下面有千万双眼睛集中到他身上，自己正使千万人的心受到强烈的感染。一个与

① 1902年8月，在他逃离西伯利亚前，他在《东方评论》上正好曾写过："社会生活的法则和党的原则就其严厉性来说也是一种不次于古代命运之神的威力。社会原则，就其无情的强制性来说，并不亚于阿斯基勒斯（Aeschylus）的命运女神，如果与之冲突则能把每个人的灵魂碾磨成齑粉。"《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241页。

他同时代的人描写说,这个瘦瘦的高个子,有一对热烈的大眼睛和一张敏感的但并不端正的大嘴,像一只"猛禽"一样屹立在讲坛上。[①]

※　※　※　※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受人称赞的演说家和作家就要坚持靠"自卫本能的原始斗争"生存下去。他觉得自己既已处于运动的精英分子之中,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处于黄金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使他这个能手具有可靠的思想武器,他从西伯利亚逃出前刚刚探索过"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错综复杂及其周期性危机,如同《资本论》第2卷中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一样,看似枯燥,然而却有激动人心的效果。在国外,他重新进行这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入迷使他不理睬任何无关的思想或现象。他到达伦敦后,列宁设法使他对英国历史建筑感兴趣时,他觉得很奇怪。他初到巴黎时也同样自我戒备,以免受新奇印象的冲击。他荒诞地总结对巴黎的最初看法说:"非常像敖德萨,但不如敖德萨。"卢浮宫的艺术宝库使他厌烦。在法国使他最兴奋的是茹尔·盖得(Jules Guesde)领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追随饶勒斯(Jaures)的改良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他投身在巴黎工人示威群众中,反对米勒兰(Millerand)这个第一位当上资产阶级政府部长、随后又介入镇压罢工行动的社会党人,他在游行队伍中高喊"米勒兰是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

他在巴黎结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娜塔利娅·谢多娃

① 《梅杰姆自传》第2卷第7-9页;П.А.加尔维:《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第385页。

(Наталия Седова),那时她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带他到卢浮宫,力图让他对绘画和雕刻开开眼界。她也是一个革命者,比他的第一个妻子小几岁。她原先在哈尔科夫的一所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由于她劝说同学不去祈祷、不读《圣经》而读俄国的激进文学作品,因而被开除了。[1] 这时她正在巴黎大学学习美术史。后来,她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陪伴他,分享他的全部胜利和失败。但索科洛夫斯卡娅仍然是他的合法妻子,还使用着他原来的姓氏。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细微区别对他们三人说来都完全无关紧要——像其他革命家一样,他们原则上不理睬中等阶级社会的那种习俗准则。也许,托洛茨基对他跟索科洛夫斯卡娅分手的方式始终感到内疚,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自传中对全部事情不过只用了一句话,而不只是出于不愿详述他的私生活。他自己是流亡者,不能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尽义务。他的父母(在 1903 年曾到巴黎跟他和好)照管他的孩子,帮助养育她们。就我们所知,托洛茨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是否重新团聚的问题。他和谢多娃回到俄国后也没有细微的不和迹象。互相尊重和品格高尚的友谊纽带把他们三人一直连结到底,最后,他的政治命运使两个妇女和双方的孩子们都受到同等程度的悲惨影响。

※　※　※　※　※

他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工作和讲演时,俄国国内的地下组织总部坚持要求让他回国。俄国地下组织和国外流亡中心为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托洛茨基对这些要求一无所知。当老列夫·捷依奇得知时,运用他的所有影响阻止托洛茨基回国。他自己在西伯

---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 153 页。

利亚13年的苦役至今仍然重压在他的心上,他恳求《火星报》的编辑们让这个"便雅悯"留在国外,使他可受更多的教育、见见世面并发展他的才智。捷依奇发现列宁是一个同盟者,因为列宁也不愿失去他的撰稿人。列宁给俄国写回信说,托洛茨基没有表示过希望回国。这是一个托词,列宁希望借此打消俄国总部的原来意图,而且克鲁普斯卡娅毫不怀疑,决定反对送托洛茨基回国的正是列宁。就这样,暂时决定了托洛茨基的命运:他要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留在国外。[①]

※ ※ ※ ※ ※

1903年7月,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召开。实际上这是一个建党大会——1898年的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举行,只有8个人出席,他们不久都被捕了,除了彼得·司徒卢威写的一份激动人心的宣言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这时,1903年,秘密组织网络已变得足够严密,与《火星报》的联系也已足够密切,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建立一个有明确党章、由选举产生领导的正规的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火星报》编辑部将仍是党的领导,这点不成问题,因为只有它能给各组织提供政治思想,只有它能协调各组织之间的活动。这次大会对整个《火星报》编辑部来说,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对老一辈革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牢狱中、在流放地长期梦想的实现。

由于《火星报》成员在思想目标以及领导抱负方面团结一致,他们在大会上将像一个人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大会之前,在起草纲领问题上曾有过分歧,但已然顺利解决。预计下面两个

① 娜·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0页;《列宁全集》第44卷第312页。

集团将提出反对意见:用打防卫战来反对革命政治胜利推进的经济派和为自己在党内争得特殊地位的崩得。这两个集团都处于少数,而《火星报》所有的人都将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在大会开幕前,《火星报》的编辑们在党的领导机构应如何建立的方式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但这似乎只是细小的组织问题。

7月初,44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个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举行大会,托洛茨基代表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和另一名代表一起从日内瓦到布鲁塞尔参加大会。① 代表们坐在人民之家后面的黄褐色的仓库里面兴奋地倾听普列汉诺夫致开幕词。他们觉得,他们出席的大会是正在为被湮没的俄国建立一座历史里程碑,它与沙皇的斗争已进行了约80年之久,而现在正朝着最后的决战前进。在参加大会的人看来,尽管大会的场地简陋,尽管大会没有引起世界的注目,都不能抹煞大会的历史重要性。

发言时的第一个争论问题与崩得有关。犹太组织要求在党内有自治权,有权选举它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在有关犹太居民的问题上有权制定它自己的政策。它还进一步要求:党应承认崩得是犹太籍工人的唯一机构。它极力要求党不仅像已经做到的那样提倡给犹太人以平等的权利,而且还应承认犹太人的文化自治权,也就是承认他们管理自己的文化事务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坚持用

---

① 他在《我的生平》中幽默地叙述说,他和列宁的弟弟乌里扬诺夫大夫如何在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车站,匆匆扒上一辆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人还没上去,车已启动,火车站站长使火车停下来,把这两个古怪的乘客从减震器上拉上车。托洛茨基此行用的是保加利亚假护照,护照上填的是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这些预防措施都是为了蒙蔽俄国密探的。但是代表中已有保安局的特务,因而比利时警察紧密监视着大会及其参加者。托洛茨基用精彩的电影脚本笔法描写了他半夜在布鲁塞尔空荡荡的街道里,穿街过巷,与一个密探赛跑。最后,大会转移到伦敦。

犹太(依地)语的权利。曾经是崩得创建人之一的马尔托夫代表《火星报》成员愤然拒绝这些要求。托洛茨基甚至更加激烈地重申这个拒绝。这场争论是在基什尼奥夫市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不过几个月时发生的。这就激起了犹太人的感情冲动和猜疑,并在崩得的立场上直接反映出来。[1]《火星报》中非犹太籍的发言人为了避免引起那些人的感情冲动而不出面,所以,都是由犹太籍发言人来断然拒绝崩得的要求。马尔托夫提出反对崩得的动议,在动议上签名的也只有犹太籍的代表。托洛茨基本人代表《火星报》中犹太籍的工作人员发言,他充分利用这一情况,痛斥崩得的代表,使他们大怒。他们强烈抗议他的发言,认为他蓄意侮辱犹太人,并要求主席保护他们。在主席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无可指摘时,崩得派代表提出对主席不信任的动议。

这是大会上最激烈的场面之一,也是托洛茨基以犹太人身份专就犹太人问题发言的极少有的机会之一。他仅仅为了反驳犹太人的要求才这样发言,这必然使极其敏感的崩得代表觉得他近乎粗暴。然而他辩解说,危险的不只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崩得要求在党内有自主权并有选举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为其他派别开一先例:如果党同意给崩得这样的特权,以后就不能拒绝给其他派别以同样的特权了。那就不得不放弃团结一致的组织观念而把党自身变成了一个若干党派的松散联盟。总之,崩得派正是试图用狡猾的手法诱使《火星报》的人放弃他们的指导原则以及为使之为付诸实施而进行的实际工作。另外一个要求即承认崩得是党在犹太工人中的唯一机构,这等于要求只有犹太人才有

① 未来的苏维埃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篇通信中对大屠杀后犹太籍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情绪有启发性的报道,载《报刊与革命》1924年第2期,另见《梅杰姆自传》第2卷第29-32页。

权利把社会民主党的信件带给犹太人和组织犹太工人。托洛茨基指出：这表示不信任非犹太籍的党员，是对国际主义者的信仰及感情的挑战。托洛茨基在一阵激烈的抗议声中大声说："崩得有不信任党的自由，但不能指望党投不信任自己的票。"[①] 党作为一个整体，只要放弃向犹太劳苦群众发言的权利，就是对犹太分裂主义让步。崩得要求"文化自治"同样是出自分裂主义，它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与党，以后是与国家和民族相对立。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是要扫除种族、宗教和各民族之间的障碍——社会主义绝不能试图去构筑这类障碍。他同意犹太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办学校，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的话。他接下去说，但是不应超出全国教育制度的范围，而且整个犹太文化生活不应以自身为中心，不应闭关自守。他提出一项动议，以便补充马尔托夫的总议案。两项决议都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②]

托洛茨基像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及其他犹太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持所谓同化的观点，认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是没有前途的。保持犹太人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不是宗教纽带就是半虚构的民族主义纽带，但根据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信念，宗教纽带必定要断裂，民族主义的纽带最终必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崩得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认为犹太人的前途取决于犹太人聚居的那些国家。但是托洛茨基论证道：崩得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时却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实质。[③]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52 - 55 页。

② 同上，第 198 页。

③ 托洛茨基在大会之后不久在《火星报》曾发表一篇激烈抨击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起因是，西奥多·赫兹尔领导的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和以乌克斯·诺道领导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后者准备放弃巴勒斯坦而要乌干达作为犹太人的祖国。赫兹尔试图向苏丹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而诺道则进行一场取得乌干达

他认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建立犹太国,更不是在非犹太人的国家里建立犹太国,而是坚持对社会进行国际主义的改造。其前提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中都应无保留地相互信任。这种态度,他终生不渝——只有纳粹主义的冲击曾使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视稍有缓和。他不承认犹太人对居住国环境的猜疑中含有悲剧性的真实。[①] 他和其他任何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噩梦中也都想象不到,倾听了国际团结宣传达几代之久的欧洲工人阶级在40年后竟不能或不愿去防止和制止在希特勒的毒气室里屠杀6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对这个问题,崩得的方案当然没有提供答案。托洛茨基作为犹太人站出来反对犹太分裂主义,因为他想象中的未来与本世纪中叶的欧洲"文明"有天壤之别。

《火星报》成员和经济派分子之间的争论是大会上的第二个争论。党认为革命政策高于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经济派分子反对这点。他们还反对集中制组织,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经济派分子会丧失战斗力。他们的发言人马尔丁诺夫(Мартынов)和阿基莫夫(Акимов)谴责《火星报》的"雅各宾式"的独断态度。[②] 应当注意的是在记录上出现这样的指责还是第一次。《火星报》成员一致反驳批评者。托洛茨基猛烈地抨击经济派,使他赢得"列宁的棍

的运动。赫兹尔的一个狂热追随者图谋杀害诺道。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说赫兹尔是"无耻的冒险家",并写到"犹太人中浪漫主义者歇斯底里的啜泣";而且他在这场冲突中看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破产。(《火星报》1904年1月1日第56期)。

① 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犹太报纸《前进报》(1937年1月28日)采访时说,经历过纳粹主义以后,难以再相信他希望过的犹太人的"同化"了。他接下去说,单凭犹太复国主义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但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许仍有必要给犹太人安排一个单独的居住区。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37页。

子"称号。[1] 他说,争取微小经济利益及争取改良的斗争,只有在有助于工人阶级积聚革命力量时才有意义。"当社会民主工党为改革而斗争时,也是对党本身进行根本的改革——无产阶级头脑中的改革,使它为革命的专政作好准备"。无论如何,统治阶级只有当他们面临革命的威胁时才同意改革,因此,即使是改良斗争也应受革命政策的支配。[2] 他捍卫集中制的组织方式,申明说,党必需有严格的党章,使领导人员能抵制不相宜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奚落他们扣雅各宾主义的帽子时说:党章应表明"领导对党员的合理的怀疑",这种怀疑体现在自上而下地对党进行警惕的监督上。[3]

这一思想不久就成为列宁的专有特性,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标志。我们记得,早在1901年托洛茨基就已经提倡这一思想了;而这一思想更是《火星报》的共同特征。引用最有权威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一思想总结了所有向前看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运动的"紊乱与松散联盟"的反应。[4] 《火星报》所有的成员,包括未来的孟什维克在内在捍卫这一思想时完全一致,但这是最后一次了,尽

---

① 娜·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70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36-137页。

③ 同上,第168页。

④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第62-72页。马尔托夫叙述集中制的组织思想当时是极不"成熟的"。最初详细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列宁,而是彼得堡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曾给列宁写过一封信阐述这一思想,党分裂后他加入孟什维克派。大会前的那一年,萨温科夫曾向《火星报》提出一个和列宁的计划相似的组织计划。他后来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而建立社会革命党。马尔托夫即使在党分裂后还写道:"在组织问题上,我们首先是集中制的拥护者,作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必须是集中制的拥护者。"同上,第11页。另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18页和马尔托夫为切列瓦宁的《组织问题》一书撰写的序言和阿基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特征史料》第104页。

管他们中也许没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样强有力地为这一思想辩护。如果有人告诉托洛茨基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竟会生气地放弃自己说过的话,他们之中谁都不会比他本人更吃惊。总的说来,在这次大会上对纲领进行辩论时,不是列宁,而是未来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最坚决地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极力要求代表们通过方案,这一方案使人们对下述情况没有怀疑的余地:他们在革命局势中将不惜摧毁议会制度并限制公民的自由。普列汉诺夫论证说,如果推翻沙皇统治后,选举出来的是同革命政府敌对的立宪议会,革命政府应仿效克伦威尔的做法,解散议会,普列汉诺夫发言时用"革命利益至上"这几个字作为他发言的题目。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8年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行动的,而且没有因老迈衰病的普列汉诺夫的谩骂而动摇。此时,普列汉诺夫还申明说革命政府不应废除死刑——为了推翻沙皇可能有此必要。这些意见曾引起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代表的反对,并在其他几个代表中引起微弱的怀疑。但它们在欢呼声中被一致通过。

然而在幕后,《火星报》的团结一致正在开始消失。起初出现的不和并不是什么政策问题,甚至也不在党章中著名的第一条上(虽然他们最后是为这一条分裂的),而是在无关政策或组织原则的问题上。列宁提议把《火星报》的编辑人数从6人减为3人。3个编辑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自己。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及波特列索夫都被排除了。对立两派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中都极欲把列宁的这一提议理解为是用意深远的;按照观点的不同,有人认为他居心险恶,有人认为他用心良苦。就实际背景看,列宁的目的很简单,他试图使《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比近期的工作有更高的效率。因为6个人的编辑部易于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方。为了打破僵局,他曾提议任用托洛茨基;但因为普列汉诺夫反对,他放弃了这一提议;所以他此时企图用减少而不是用增加编辑人

数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提议留任的3个人一直都是《火星报》的真正台柱子。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都很少供稿——他们都不是文笔流畅的作家,而且在管理和组织工作方面甚至做得更少。[1] 单以效率为理由来说,列宁的提议也是正当的。但是对效率的考虑往往与既有的权利及情感发生冲突。列宁在决定这一步骤前曾有过疑虑,而普列汉诺夫则很少或无所顾忌。在托洛茨基看来,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排除出《火星报》这一企图简直是"亵渎神圣",因为他们二人是《火星报》的创办人。列宁的无情使托洛茨基震惊。

这个小问题立刻同其他较大的问题纠缠起来。《火星报》编辑部正如以前一样,必须仍是党的真正领导。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在俄国国内工作。但由于进行地下活动有遭受逮捕的危险而不能保证中央委员会领导的连续性,只有像编辑部这样流亡国外的中心才能做到这点。列宁又进一步提议选出一个委员会,它将充当中央委员会和编辑部之间的仲裁。该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火星报》成员两名,中央委员会两名,而另外一名是主席,将由大会选举产生。普列汉诺夫应该是主席,这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因而《火星报》编辑部肯定对委员会施加决定性影响。正是因为这个方案,列宁给自己招来指责,说他企图统治党。然而正如事情表明的那样,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使列宁享有比在旧体制下更大的权力。如果这一方案势必会给某一个人以特权地位,那么,这个人就是普列汉诺夫,即列宁未来的敌人。该方案所要实现的目标无非是要把这支旧队伍中战斗力最差的成员去掉,首先是去掉阿克

---

① 列宁给追随者的一封信中说明他自己的动机,他说在45期"旧"《火星报》中马尔托夫写过39篇文章,列宁写过32篇,普列汉诺夫写过24篇,查苏利奇只写过6篇,阿克雪里罗得写过4篇,波特列索夫写过8篇。《列宁全集》第44卷第393页。

雪里罗得和査苏利奇。列宁是乐于向这两位老战士表示敬意的，而这种敬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不愿意以会对事务的有效处理有干扰的方式向他们致敬，而这些事务的主要压力无论如何都将由他本人承担，所以他不准备这样做。这两位老战士对此感到震惊，是很自然的。马尔托夫一心要安慰他们。托洛茨基对这支队伍的内部活动情况知之甚少，他无法理解列宁的动机。他觉得这是一个险恶的阴谋。

当"家丑"已私下传开之时，党章已提交大会辩论。《火星报》小组在大会前已讨论过党章，并已注意到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分歧。列宁的草案如下："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是党员。"除了列宁要求党员应"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一点外，马尔托夫的草案与列宁的草案是一致的。马尔托夫的提法比较含糊，要求党员"在一个组织的指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其间的差别似乎是难以捉摸的。列宁的公式强调党是一个只由参加秘密组织的人组成的紧密团结的党。马尔托夫的公式强调党是一个包含那些仅仅帮助地下组织而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人在内的涣散团体。当这两个公式初次对比时，分歧似乎并不重大，而且马尔托夫也准备撤回他的草案。[1] 党竟然只因党章中一条的两个词而闹分裂，似乎没有道理。

在此同时，与列宁的编辑部方案有关的个人冲突在背后形成了恶感和怀恨，使领导人都有无礼之举、猜疑日增。[2] 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及其他人愤然责备列宁粗暴与贪求权力，而列宁不明白

---

① 巴甫洛维奇:《就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同志书》第5页。

② 《火星报》成员在大会外举行秘密会议。当分裂初露端倪时，一次秘密会议由托洛茨基主持，因为任何其他人担任主席，对立双方都不同意。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

为什么这样的辱骂会泼到他的头上来，当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火星报》的改组提出一项切实可行、不言自明的计划。每一方都开始怀疑对方的每一行动怀有阴谋诡计。每一方都在警惕对方设下的圈套。每一方都开始改头换面地重复早已忘却的往日分歧；而这些分歧在昨天看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就仿佛有了深远意义、预兆不祥。在大会进入到审查党章时，对立双方都怀着这种心情彼此相对。现在无疑应该弥合这两个公式的分歧，只提出一份草案。但事与愿违，每一草案的作者都极力要说明他的条文中隐藏极深的含义，尽可能要使之清楚明确，要使不知所措的代表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所供抉择的两个草案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强调而且过分强调采纳这段条文或那段条文就要承担的某种实际后果。马尔托夫和列宁这两个朋友和同志，像敌人一样相互对抗。每个人的发言好像都恍惚迷离；每个人对自己的奇怪行为都感到惊奇；每个人都因此感到吃惊和迷惑；然而他们两人都不能停止自己的步伐或从原路回头。[①]

两个主要对手的情绪传染给代表们，大会分裂了。不是建立一个党而是产生两个党。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可调和的未来的敌人普列汉诺夫却是列宁最紧密的同盟；而托洛茨基则是反对派中公然抨击列宁最激烈的一个。他指责列宁企图建立一个阴谋家的秘密组织，不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党。社会主义是以对工人的阶级本能的信任以及他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那么党为什么不应像马尔托夫提议的那样向工人阶级敞开

① 列宁在大会后不久写给波特列索夫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成为永远不共戴天的敌人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做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列宁全集》第44卷第360页。

大门呢？列宁看见自己的“棍子”转过来打自己，感到吃惊，他曾多次试图把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拆开。他在全会上温和而有说服力地争取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由于缺乏经验而混淆了争论的问题，把分歧解释错了。他接着说，在工人阶级中也有混乱、摇摆和机会主义；如果党像马尔托夫所竭力要求的那样把门完全敞开，那么就会把所有那些软弱分子都吸收进自己的队伍里来。党应该组织的只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最有阶级觉悟和最英勇的分子。党必须领导工人阶级，因此，党不能像阶级本身那样广泛。

这一论据没有说服托洛茨基。于是列宁在会议礼堂外面和托洛茨基交谈。花了几个小时答复对方的指责并解释自己的行为。后来列宁还派他的追随者以及他的弟弟去“争取托洛茨基”。[1] 但一切都落空了，托洛茨基的敌意反而变得更强。

大会以多数通过马尔托夫的党章草案。但这个多数包括“崩得”和经济派代表在内，而这两派的代表因《火星报》全体一致的表决而失败，正打算退出大会，下一步就是退党。在他们退出以后，列宁提出改组《火星报》编辑部的方案。托洛茨基以提议进一步加强旧《火星报》编辑部的职权来反对这一方案。[2] 这一次列宁仅以两票的多数获胜。大会以同样的多数选举列宁提议的候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对方弃权。因此，称追随列宁的人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而称反对列宁的人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少数派的领导人因列宁蛮横剥夺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在党内的地位而感到震惊，而且几乎是被激怒，他们宣称要联合起来抵制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马尔托夫立即辞去编辑部的职务。列宁谴责说这是不可容忍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他决心要加强新选出来的机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364页。

关的权威。尽管是微弱的多数使他们当选,但列宁坚持他们要组成合法的领导机关:在任何民主的团体中,多数派尽管是非常微弱的多数,但也拥有合法的权力。大会在一片混乱的吵闹声中结束。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一分裂有偶然性,但它是由来已久、不可逆转的分化过程造成的,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党必定要与温和的党分道扬镳。西欧工人运动中的最温和分子已公然自称是反对革命的改良分子。在俄国也同样出现这样的分裂,这是很自然的。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就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可能公然组成一个改良政党,因为缺乏议会民主的环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真诚地继续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情况甚至比令人迷惑的分裂更能掩盖其实质。分裂呈现的形式复杂、无理性令人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在1903年,托洛茨基所看到的是两个团体承认同样的政策和组织原则,除了列宁冷酷对待同志,对待像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这样享有崇高声望的同志之外,他看不到使他们渐趋分裂的任何理由。他认为这种不必要的分裂只能成为削弱党及工人阶级的根源。

就事情的表面看,这似乎是很确切的。迄今为止,主要领导人只因性格不同而分裂,尽管很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使这一分歧合理化,把它说成是思想观念上的深刻争论。但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事。列宁对老战士的"不尊重"表明,他让一切情感及所有其他考虑——不论它多么值得称颂——都服从政策和组织的最高要求。如果为了提高效率而不得不牺牲建党的奠基人,列宁就会牺牲他们。地下运动攻击沙皇统治堡垒,因而受到残酷迫害,所以它不能容忍把名誉性的闲职授给任何人,即便是开创运动的元老也不行。当然,这是一种狂热的,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不近人情的态度。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会为了他所认为的革命根本利益而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人和其他考虑。但一个革

命的政党不服用大量这类的狂热剂就不能行动。必须认真执行普列汉诺夫宣布的准则，即：捍卫革命是革命的最高准则。反之，列宁的对手们把他们的私人感情的分量看得和这一最高准则的分量一样重，尽管他们曾许诺只应该看重后者。他们在将来也将同样重视各种其他的感情和考虑，这就不能不同他们所宣称的革命抱负相冲突。他们定会证明自己是调和者而不是革命者。

然而并不奇怪的是，这种分歧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回顾起来虽是如此明显，但不少（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当时登场的角色却察觉不到。托洛茨基并不理解在列宁本人的冷酷无情背后却是革命的心境。也许还有其他动机使他的立场如此坚定。他看到站在列宁一边的是目中无人、咄咄逼人的普列汉诺夫，而这位普列汉诺夫一有机会就显然毫无理由地冷落他。而在另一边，他所看到的是热情而不摆架子的男女革命家，他对他们十分感激。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但有一天，他将会为这一选择而追悔莫及。

几乎在大会刚刚闭幕，"冲突的热度还没有冷却"时，他写了《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照他的话说，这是"写给将来历史学家的一份有人性的文件"。在这份报告中他夸张地表达了他的幻灭、他对列宁的新的敌意并暴露出他自己态度中的矛盾。

> 大会认为正在进行建设性工作，其实进行的却只是破坏性的工作。……谁能想象由《火星报》召集的大会竟会无情践踏《火星报》编辑部？……有哪一个政治预言家能预卜到马尔托夫和列宁会……作为两个敌对派别的敌对领袖出场呢？所有这一切都无异于晴天霹雳。[1] ……

---

①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8-11页。

> 列宁以其特有的能力和才干承担了瓦解党的角色。……列宁的后盾是由《火星报》的“强硬”派新拼凑起来的多数，他们反对《火星报》的“温和”派。我们西伯利亚协会的代表加入了“温和”派，而……我们并不认为因此我们已抹去了我们的革命记录。……肯定《火星报》的老编辑部，是理所当然的。……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埋葬《火星报》了，……同志们，再也没有《火星报》了，同志们，说到《火星报》时，我们只能用过去时态了。

为与马尔托夫相呼应，托洛茨基写道：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把“戒严状态”和他的“铁拳”强加给党；[1]“我们遭到失败，因为命运裁定(列宁的)自我中心获胜，而不是集中制获胜。”列宁像一个新的罗伯斯庇尔，试图“把党的最谦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和罗伯斯庇尔一样正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热月党人准备基础”。[2] 这是他第一次作这一意义深远的类比，在其一生中，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下，他将一再重复这种类比。他当时所要表达的思想是这样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导致热月党人的反动，不但对雅各宾党人而且对整个法国大革命都是一个挫折。同样，列宁推行集中制原则过了头，他这样做不但使自己失去信誉，而且也引起对集中制原则的反动。这一反动将有利于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和联邦派分子。托洛茨基在文章的后记中嘲讽说，他根本不打算把列宁与罗伯斯庇尔相比，因为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过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拙劣模仿，而列宁与罗

---

①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20-21页。

② 同上，第30页。

伯斯庞尔的相似程度犹如“庸俗的闹剧与历史悲剧一样”。[1] 一旦托洛茨基决定反对列宁时,他就直言不讳地对列宁加以指责,并以最强烈的义愤进行狂风暴雨般的抨击。

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及《火星报》。托洛茨基也和其他人一起停止为《火星报》撰稿。1903 年 9 月,孟什维克在日内瓦聚会以便决定进一步行动的方式:他们的抵制应进行到什么程度为合适?他们有被开除的危险吗?如果被开除,是否应建立一个对立的党?或他们应当慎重行事,以便继续留在党内,设法在下次大会上剥夺列宁的地位?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托洛茨基尽管激烈、公开地攻击列宁,却也主张节制。在他看来,抵制的目的是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施加压力,恢复老战士们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党的团结。会议通过了由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合写的一项决议,决议中由托洛茨基写的那一部分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我们采取的措施不致使我们置身于党外,也不至使党和党的集中制思想受到损害……,(却使我们能)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从而保证党有可能自由地从事思想上和组织上教育党的工作。”[2] 但是,孟什维克虽然没有突然彻底地分裂出去,他们却建立了一个影子中央委员会,它要反对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而且,如果最后分裂了,它无疑会作为新党的领导机关出现。组成那个委员会或“局”的有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唐恩(Дан)和波特列索夫。这些人中除了托洛茨基外,其余的人都始终领导孟什维克派直至最后。

---

①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 33 页。

② 《阿克全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 94 页。

其实,孟什维克派不必承担分裂党的恶名,他们大喊大叫进行的抵制已迅速产生结果。起初如此坚决同列宁站在一起的普列汉诺夫渴望要向对方让步,要消除对方的不满。他竭力劝说列宁应恢复老编辑部,列宁毫不动摇,他说他不能在非正式流亡团体的压力下推翻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正式决定。[①] 从任何政党都要以常规程序为准则的观点来看,列宁的理由是无可反驳的。但普列汉诺夫却能不顾及这一准则。他是党的委员会主席,而且在《火星报》编辑部里仍然是最有权威的人,当马尔托夫辞职后,编辑部里就只有他自己和列宁。普列汉诺夫决定邀请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重返编辑部。列宁提出辞职。这样,孟什维克接收了仍是最有影响的《火星报》,不久,就是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也怀疑起来,列宁是否已走得太远了,是否与对手谋和要更加明智。列宁被打败,被孤立,然而他甚至比以前更确信自己立场的正确,因而决定加以捍卫。

使普列汉诺夫非常烦恼的是,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一起回到《火星报》。但普列汉诺夫既然已使老战士胜利地归来,他就不能直接排斥他们的这个最热心的卫士和被保护人。起初他只是力劝当时的实际主编马尔托夫让托洛茨基接受低于他在老《火星报》中曾占有的位置或者马尔托夫打算给他的位置。显然,托洛茨基只限于评论无关紧要的问题,[②] 尤其在俄国国内的读者反对托洛茨基攻击列宁的那种冒犯性语调之后。普列汉诺夫本人当时攻击列宁虽然也很尖锐,却不愿支持托洛茨基的这种语调。最后他终于要求《火星报》应停止发表托洛茨基撰写的稿子;而且威胁说: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就要辞去《火星报》的职务。他说,担任托洛茨基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页第394页。

② 可参见《火星报》第60期上的《特维尔党委的抗议》。

为之撰稿的报纸的编辑,使他"内心感到厌恶"。

引起这一"最后通牒"的是托洛茨基写的一篇评论刚刚爆发的日俄战争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3月中旬的《火星报》上,在内容和风格方面都很杂乱——普列汉诺夫反对这篇文章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文章中也含有一些重要思想。主要是专门揭露俄国自由主义的"半吊子、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和背叛倾向"。中产阶级的这一态度必然有害于民主事业,但这也有一个补偿性的后果:自由主义不能置身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而且由于它的行为会加速"无产阶级的自决"。然而,主要的争论点是对党的立场的批评,这种批评与托洛茨基对自由派的抨击不太吻合。他针对党委宣传的粗陋方式而攻击"多数派党委会",因为这种宣传断定正在进行的对日战争是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由俄国资产阶级支持的。托洛茨基争辩说,这不是事实,沙皇是为独裁政府的自身利益进行战争的,而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反护国主义的情绪"。他反对在党内泛滥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写道:"极其重要的阶级利害关系准则正失去光彩,变成僵死的陈词滥调……变成对解决问题采取强求一致的制度,它不是为无产阶级的需要……去分析问题,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砍掉问题。"这一批评如果不是专门也是主要针对布尔什维克的。[①]

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使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小组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都同意这篇被人控告的文章的论点,他们不愿免除托洛茨基的工作:托洛茨基是他们的主要喉舌之一,是他们的影子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多亏有普列汉诺夫,他们才把《火星报》重新夺回来,正如普列汉诺夫不断提醒他们的那样,他们

① 《火星报》1904年3月15日第62期,另见1904年6月《火星报》增刊上托洛茨基的半辩解性的评论。

新赢得的优势都应归功于他，归功于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他们起初拒绝他的要求，并对他那"有失尊严的行径"、"勒索"和"泄私愤"深表恼火。然而，托洛茨基提出辞呈，表示希望回俄国从事地下工作。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劝说他不必计较侮辱、继续为《火星报》工作。但普列汉诺夫既然把自己的声望作为赌注押在这一仇恨上，对此就不能容忍，他于是以辞职相要挟。最后，孟什维克害怕失去他们最重要的同盟者，因为能使他们打败列宁、羞辱列宁的正是这个同盟者，他们对普列汉诺夫让了步。从此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①]

托洛茨基开始疏远孟什维克。虽然他本人原是为避免使朋友为难而提出辞呈，但他们跟普列汉诺夫的交易只能使他厌恶。他愤然离开日内瓦，几个月没有出现在孟什维克分子的圈子里。个人恩怨与早期的政治分歧混在一起。孟什维克因为力图使其与布尔什维克长期不和的动机合理化，他们开始放弃分裂以前曾作过承诺的观点。其倒退从组织问题上一直扩展到政策问题上。查苏利奇大谈其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联盟的梦想，而当时声望正在提高的费多尔·唐恩则直截了当地鼓吹这种联盟。即使在现在，当唐恩和托洛茨基是同一派别的领袖时，他们也是在本能上彼此互不相容的。唐恩的性格坚定而平凡，而托洛茨基的性格似火焰般热烈。一个能在政治妥协的气候下如鱼得水，就像他1917年在克伦斯基内阁中扮演的角色所表明的那样；而另一个则是天生的革命家。当孟什维克开始摸索更温和的公式时，唐恩在他们中的影响自然上升，而托洛茨基的影响则逐渐下降。马尔托夫本人预先就注意到追随他的人在追求温和道路，但他被自己所开创

① 这件事的叙述系根据《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书信集》第2卷第198－201页、《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01－105页和《火星报》。

的过程压倒了。他们反对"老"《火星报》精神,托洛茨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而体现那种精神的只能是托洛茨基反对的列宁。此时,托洛茨基发现,老《火星报》一直没有摆脱类似民粹派那样的密谋态度,它对待经济派不公正,而且错误地宣称组织优于自发工人运动。这些都是大多数孟什维克在回顾自己最近的过去时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跟他们步调一致。[①] 但当他们试图架桥沟通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间的鸿沟时,他停住了脚步,而且在这点上永不越雷池一步。他坚持反对自由派的立场,总体上看,这一立场在老《火星报》里占优势。他在和孟什维克的长期争论中认识到,在这一决定性问题上,他和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如此之大,而与列宁的距离是如此之小。

然而,托洛茨基在跟孟什维克分手之前却又一次用最伤感情的话劈头盖脑地抨击列宁,使他跟列宁几乎不可能和解。1904 年 4 月,托洛茨基离开《火星报》,8 月,他在日内瓦出版了《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我亲爱的导师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这本小册子的历史与传记意义在于,在以往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中,这是最刺耳的一篇;在于它首先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散见于一百多页印得密密的漫骂文字上那惊人的历史直觉的闪光。

讲到日俄战争时,托洛茨基是这样开始的:"一举消灭世界反动势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在这样一个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却似乎表明它不懂得除了进行偏狭的党内争吵外还有其他任务。"这是一出"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而且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气氛"!"……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分裂的罪恶,但却没

①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中)与极右翼孟什维克切列瓦宁(在《组织问题》中)并无二致。

有一个人能从历史的铁腕下解脱出来。"分裂的深刻原因在于党无法调和其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党目前最关心的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然而党的更长远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党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不断分裂。每当党的队伍中发生争论,每一方都指控对方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每个代表新倾向的集团都把它的前辈革出教门。在那些提出新思想的人看来,前一时期似乎只是对正确道路赤裸裸的背离,是对历史的曲解……。"①

他继续写道,因此列宁和老《火星报》应该全面地看待经济派,尽管后者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们唤醒了俄国的工人阶级。孟什维克是试图在它前辈的肩头而不是在其断骨上自我确立起来的第一个集团,单这一点就是成熟的标志。经济派"向无产阶级呼吁,但他们并不是以社会民主的精神"而是以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精神去做的。相反,《火星报》则向知识分子而不向工人讲社会民主的要旨。列宁强迫革命知识分子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向马克思的权威无条件投降,希望用这样的方法训练知识分子,使他们可以胜任尚未成熟而且缺乏自信力的工人运动的可靠领导。但列宁不过是在试图加速历史的步伐;尽管拥有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学说,但它"并不能取代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② 列宁不信赖群众,对群众未经正规训练的行动采取轻蔑的态度,认为工人本身不能自动从工联主义上升到革命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由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托洛茨基写道,这是一种"正统的神权政治"的理论,列宁的组织体制就是适应"将以自身取代工人阶级"的党,这个党不顾工人的感受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4页。

② 同上,第23页。

和思想,却以工人的名义并且代表工人发挥其代理人的作用。

他用阿克雪里罗得设想的模仿欧洲社会民主党建立"有广泛基础的党"来反对这种"取代主义"(托洛茨基这样称呼它),反对这种以党充当无产阶级代理人的概念。[①] 他说:"列宁的建党方法导致如下的情况: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②] "党必须在自己的基层,在积极而自信的无产阶级中而不是在上层核心小组中去寻求稳定的保证,因为革命在展翅奋飞之时可能会一下子扫除这个小组……。"托洛茨基在挖苦地模仿了列宁的"骇人听闻、肆无忌惮的煽动"作风[③] 并针对列宁把纪律强加给党的企图作了讽刺之后问道:"任何严肃的团体……当其面临进退两难——是应根据纪律观而埋没自己还是应不顾纪律为生存而斗争这一困境时,毫无疑义要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会说:应当消灭那种压制运动的根本利益的'纪律'。难道懂得这一道理就这样困难吗?历史绝不会说:即令世界必须毁灭也应使纪律生效。历史最终会证明那些对革命任务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的人是正确的。"[④]

小册子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是最后一章"雅各宾主义与社会民主党"。[⑤] 在大会上,当经济派拿雅各宾主义讽刺整个《火星报》时,托洛茨基曾反驳过对雅各宾主义的攻击。这时他却转而用雅各宾主义来指责列宁。面对这种指责,列宁几乎感到自豪,他回答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是雅各宾派,不过是和无产阶级的组

---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50页。

② 同上,第54页。

③ 同上,第75页。

④ 同上,第72页。

⑤ 同上,第97-107页。

织紧密联在一起、而且意识到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人。"正如小册子所表明的,托洛茨基显然是根据他近期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研究而精心炮制了这些指责,而他却言中了俄国革命未来的戏剧性事件。他说,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是相互排斥的。法国大革命因受时代的局限,只能建立以资产阶级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雅各宾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所能到达的激进主义的顶点)力求使类似平等主义的短暂革命高潮永垂不朽,而这一革命高潮却与时代的根本潮流是不相容的。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历史如要挽救雅各宾主义,就不得不中断其进程。雅各宾主义及其与时代之间的矛盾说明了雅各宾派思想和行动方法的原因。罗伯斯庇尔及他的朋友们对真理,即他们的"真理"有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看法,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真理"会赢得民心和民意。他们怀着病态的猜疑环顾周围,仿佛看见敌人从每条缝隙里爬出来。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与其余世界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而且这条分界线是他们用断头台的刀刃划出来的。"凡是要抹杀雅各宾主义与其余世界之间(这条分界线)的一切企图都有释放内部离心力的危险……。"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本能暗示,他只有通过持久的戒严状态才能延长短命的革命高潮。"他们不惜大规模杀人,为他们的'真理'奠定基础。……他们对形而上学概念绝对信仰,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绝对不信赖生气勃勃的人民。"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具有乐观前景的社会民主党与雅各宾派不一样,因为它和它的时代潮流融为一体。在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业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社会主义不再是乌托邦了。社会民主党和雅各宾派代表"两个对立的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他们是空想主义,而我们想成为客观倾向的代表;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而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是唯理性主义者,而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砍掉人的头颅,而我们用阶级觉悟来启发他们。"

托洛茨基并不否认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类似点。他认为两者都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进行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改良派的机会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用不着断头台。"假如在一个革命的法庭上指控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① "罗伯斯庇尔常说:'我只知道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这句政治格言铭刻在他马克西米利安·列宁心上",他"这种恶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是对雅各宾派悲剧性偏狭态度的拙劣模仿……。"(他在同一段里把列宁说成是"机敏的统计学家和马虎的律师"。)

必须在雅各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这是托洛茨基的结论。他认为,列宁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放弃社会主义,自立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领袖。托洛茨基指控的要点就是,列宁正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蜕变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客,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政客才会像列宁那样极度地不信任工人阶级。② 列宁的追随者甚至走得更远,公然设想他们"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当人们读到某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在这里引用了他们在乌拉尔出版的小册子里的话)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绝对一致的党时,"人们感到寒彻脊背的战栗"。

托洛茨基的论据以下面这段反对绝对一致性的抗辩结束:

---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95页。

② 托洛茨基此处引阿克雪里罗得的话,阿克雪里罗得把列宁的演变与司徒卢威相比。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称颂孟什维克的领袖,特别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他称前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透彻精辟的政治见解",说后者是"他这一代的杜勃罗留波夫"。

> 新制度的任务一定是很复杂的，只能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竞争，通过长期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无数新……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些派别），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当无产阶级有能力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绝不会再容许任何人对它自己实行专政。……在工人阶级之中……无疑会有不少政治残废……许多必将抛弃的、陈旧的思想包袱被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在现在这样一个专政时代，工人阶级绝对有必要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像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几个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①]

在40年里由托洛茨基多产的笔写下的文章当中，这本小册子大概算是最令人惊异的文件了，这绝不只是因为它含有种种如此独到的重要思想、辩论中的小手段、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夸张的华丽词藻。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作家几乎都没有用这么多人身攻击的恶毒语言攻击过列宁。“肆无忌惮的”、“可怕的”、“煽动性的”、“马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105页。

虎的律师"、"居心叵测的以及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托洛茨基把这些形容词一古脑倾泻到一个人的头上,而这个人在不久前曾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这个人使他到西欧来,这个人提拔他而且保护他免受普列汉诺夫的中伤。确实,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惯于无情坦率地说出他们的观点。但他们都能克制不作人身攻击和诽谤,这是一条规矩。托洛茨基触犯了这一惯例,不能单用少年气盛来解释——他当时表示出来的特点在他一生里都未能完全摆脱:他不能把人与观点分开。

托洛茨基也没有举出任何一个能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增加他的指控分量的事实来支持他的种种指控。列宁至今没有把一个人开除出党。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坚持大会给他的授权的有效性,他警告反对派,如果他们坚持妨碍大会的正式决定,抵制当选的领导机关,他就不得不对他们采取行动。列宁的这一行为是任何政党的任何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的。[①] 因为孟什维克通过一系列事件和人事调动首先夺回《火星报》,尔后实际上把列宁撵出领导机关,所以列宁正式占优势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贯彻对反对派的警告。反对派一旦得手,领袖们也会对列宁发出同样的警告,不过,因为他们在大会上

---

① 当时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尔后在《火星报》(1904年7月第69期)上攻击列宁,她批评他把欧洲的,即德国和英国(费边社)的组织模式移植到俄国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温和派领袖高举集中主义旗帜反对革命派。卡尔·考茨基(在1904年5月第66期《火星报》上)以同样的理由批评列宁说,对欧洲来说是可口的肉,对俄国来说却是鸩毒。布尔什维克的未来敌人俄国社会革命党曾热烈赞同列宁的立场(参见《俄国革命导报》第3期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和不少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人都认为列宁在1903年所表述的集中主义这个标志是布尔什维克专有的特点、专有的品质或它的原罪,但这一观点是多么不符合历史事实。

未曾当选，所以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①]

托洛茨基知道这一切，在他的小册子里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他对列宁的指控只是根据推论，而在一点上则是根据理论。列宁曾认为，在历史上，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曾发挥过特殊作用，即给工人运动灌输马克思主义观点；而工人本身不会自发获得这种观点。托洛茨基根据列宁的这一论点而认为，这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智慧，是以列宁为喉舌的知识分子渴望使工人运动始终受他们的监护。他认为其中蕴含着雅各宾式的专政，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则是集权主义专政。已经有不少社会党人作者强调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其实列宁的这一观点是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那里引来的。[②]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都受知识分子的领导：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几十个代表中只有3个工人。所以，毫无理由把“知识分子的抱负”这个恶名只加到列宁一个人身上。列宁对革命政权的概念，如到那时为止他所阐述的，没有一点是托洛茨基能据以指控列宁的。当时及以后许多年，列宁都认为俄国的革命政府将由几个党联合组成，并且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不能希望在其中占有多数的席位。[③] 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一党专政。当时托洛茨基本人倒比列宁更接近这种思想：不久，他就开始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俄国革命的直接目标来反对列宁，这种说法未必一定就是一党专政的意思。但不可避免地已含有与之近似的的意思了。简言之，托洛茨基过早地把列宁描绘成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他把他的党和外界之间用断

① 接近孟什维克超过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帕尔乌斯（参见下一章）批评孟什维克采用他们归咎于列宁的独裁的组织方法。帕尔乌斯：《俄国与革命》第182页及以后各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29页；另见卡尔·考茨基在《新时代》1901年第3期上的文章。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16页；参见下章。

头台划了一条分界线,这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能找到任何重要的依据。如果要用这样失真的镜子去照出他的对手,那就要求小册子的作者需要有反复无常而不负责任的想象力了。

然而对于未来而言,这却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此时,他的继承者还是一个不知名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这面照出未来影像的镜子确实很准确,使人们可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之中看到俄国革命的戏剧性事件的一切成分。首先有资产阶级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困境,这是一种经常出现的困境。此外还有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两种精神: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无论在列宁身上抑或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在托洛茨基本人身上都从未解决。虽然托洛茨基此时迫切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作明确的抉择,但是环境不会允许列宁或托洛茨基作出这一抉择。此外,镜子预先照出几个阶段,即革命政党将按"取代主义"的方式经历的这些阶段:"秘密会议取代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取代秘密会议;最后是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其实,这些阶段在革命编年史上将要写好几章,而且是相隔很远的几章。再说这时,托洛茨基一点儿也想不到将来有朝一日他自己竟会在宣扬和赞美"取代主义"方面走得比列宁还远得多,直到它发展到极点他才因害怕而退缩。而且那个极点的残忍、可怕的景象即是:那个"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病态地猜疑想象,看到他的敌人从周围的每条缝隙里爬出来,为使革命的高潮永不衰退他奋力斗争,甚至不惜用大规模的屠杀使革命与其余世界完全隔绝。而且正像古典悲剧的序幕一样,这些预兆看来也预示托洛茨基自己的命运:他现在为思想和倾向的自由竞争进行抗辩,20年后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法庭上几乎是用同样的话重复他的抗辩。他当时深信"有能力对社会实施专政的工人阶级绝不会容

忍独裁者对自己专政”,而他没有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如果革命后工人阶级不能对社会实施专政,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相信历史最终会证明那些对他们时代的需要“了解最充分、最深入的”人的正确性,这是他终其一生、直到刺客的钝斧砍破他的头颅时为止始终不断阐述的一个信念。最后,好像预感到那个的时刻似的,他一想到列宁的党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党时,就感到“寒彻脊背的战栗”。

我们不能详细推测托洛茨基对未来得出这一见解的内心过程。他的结论缺乏可靠的事实依据,这种情况表明他的内心过程是凭直觉想象而不是凭理性认识的过程。我们只能探索出若干使他的想象力发生反应的外部促进因素。总的说来,某些孟什维克已经将布尔什维克与雅各宾派作过类比。普列汉诺夫甚至在他还是列宁的盟友时就曾这样说过后者:“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其他的人先是窃窃私语,后来公然重复这句脱口而出的名言。但几乎所有的人,就是这句话的原作者也没有把这话当真——人们都把这句话当做普列汉诺夫争论中的妙语。但托洛茨基则逐字地接受了这句话,至少是对它相当认真,因此他投入到雅各宾主义的历史中,并且用对比的眼光起劲地加以研究。由于受到雅各宾派悲剧的激发并充满了新吸收的形象,因此他的想象力把这一切都投射在他日常接触的团体和个人身上,并且投射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上。根据严格合理的分析,这种投射可能是怪诞的、没有道理的。更冷静、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是不会屈从这种想象性的预测的。但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这点使他从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中脱颖而出,虽然有时几乎使他沦为笑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可以发现,在更多的情况下他的预测是成功的、正确的。

在他辩论和富有想象力的预测能力后面是被抑制的浪漫主义

的革命情感,他自己虽然多次谈到需要一个紧密团结而有纪律的党,但一旦他面对这样一个党时,却突然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反对这个党的现实。他的倾向、他的爱好、他的气质都使他厌恶列宁那平凡而有条不紊的决心,列宁打算用这样的决心把党从抽象的云端降到坚实的组织基础上。托洛茨基现在反对列宁,与他还是17岁的少年时并无两样,那时他对待索科洛夫斯卡娅,即他结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脾气也是这样粗暴,他向她泼去的话是:"那些要把枯燥和冷酷带进全部生活关系的人都该死!"1898年的最后一天夜晚他在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里突然发出的这个叫喊声也同样在1904年他对列宁的猛烈抨击中回荡。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1904年8月，当《我们的政治任务》在日内瓦发表时，党内情况和一年前刚刚分裂后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不断干扰列宁，列宁一度甚至不能对这种攻击进行反击。差不多过了6个月之后，列宁才能出版他自己的报纸《前进报》。普列汉诺夫尽情讥笑他以前的盟友，并相信已一劳永逸地使列宁的声望扫地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的权威们早已认识并且尊重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老战士，他们与后者一起谴责列宁，在他们眼里，列宁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后生。就连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顾列宁的立场而向孟什维克妥协。然而，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的当天，列宁在瑞士召集了那些准备追随他的布尔

什维克,把一份召开有或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新代表大会的计划摆到他们面前。

看来事情的发展使托洛茨基连珠炮似的攻击过时了,敌人在他极力主张的攻击之前就已经溃散了。因此经过事后的思考,他在《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序言中写道:党内危机已经过去,并说拥护团结的人可以满怀信心地放眼未来,因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方的极端分子都已声望扫地并陷于孤立。一个较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一位习惯于对自己的话是否有伤人后果进行三思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者会克制自己不发表小册子,或者至少会删去争论中过激的言词。但托洛茨基太迷恋于自己的话了,连这些都没有做到。不过,他在序言中力图考虑新的情况,他要求孟什维克结束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即党内之党,托洛茨基自己也曾是它的秘密领袖之一。他强调写道:孟什维克应承认"派别组织的死亡",那就是说,要接受至今对立的两个派别的合并。[1] 然而他的呼吁却无人理睬。分裂正开始愈演愈烈,双方"热中分裂"的人都积极活动。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列宁集团把从大会以来发生的变化都看做是孟什维克的篡权,新的代表大会将彻底结束这种势态。孟什维克既已重新夺得权力,也就不会去冒在新召开的大会上失去权力的危险,更不必说通过组织的合并和对手分享权力地位了。托洛茨基曾经猛烈抨击列宁,指责后者是"瓦解党的人",因而当他在其孟什维克朋友中发现"瓦解党的人"时,他感到震惊。他开始很温和地向他们申明必须和解的理由。他过去同孟什维克联合是为了补偿列宁曾使缔造运动的前辈蒙受的损害以及使运动本身也受到的损失,损害总该彻底补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是急欲进行补偿的。为结束这令人痛苦的一幕,此时所需要的是,放弃为

---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8页。

打败列宁所必需的"特别"安排,而且党内两派的好心人一定要携起手来。但他并没有认识到那些"特别"安排早就木已成舟了。

像这样的争吵,调解人是不受欢迎的。他威胁要推翻安排好的计划,打乱所有的办法。他自己的朋友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认为他比叛徒好不了多少。有些孟什维克当时的确是这样看待他的:说他的态度不坚定,简直跟布尔什维克的温和派没有区别,没有人敢说明天他会站在哪一边。确实,如果他没有对列宁进行过伤感情的攻击,如果列宁的追随者也没有使他跟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疏远,他可能不难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调解人"。在布尔什维克眼里,他是一个最恶毒的孟什维克。因此,他虽与他的政治朋友绝交,但也没有多少机会跟他的敌手取得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受到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某种意义说是一个党外人士,而在党内事务上他却起着卓越的无党籍者的作用。他就是俄籍犹太人亚·季·格尔方德(Гельфанд),他定居在德国,作为经济学家、政论家以及几本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的作者而出名。[1] 他用帕尔乌斯(Parvus)的笔名给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高级期刊——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报纸撰稿。他还出版他自己的评论性刊物《世界政治评论》,早在1895年,他就在该刊上预言日俄将发生战争,并且预见到战争将推动俄国革命,1904—1905年间,当这一预言成为事实时,有不少人引用过这一预言。帕尔乌斯在德国党内站在极左翼,激烈地反对改良主义倾向,并且蔑视某些领导人,说他们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

① 他的著作都译成俄文。其中的《世界经济与农业危机》,列宁在1899年评论此书时曾大加赞赏,他写道:"帕尔乌斯以世界市场的发展为重点,首先描述了……这一发展随着英国工业霸权衰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我们极力推荐……帕尔乌斯的这本书"。《列宁全集》第4卷第55－56页。

并以此来掩盖他们和现存秩序的妥协。他精明而又富于战斗性,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以使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得到新生。

改良主义的头头们对他则是既害怕又嘲弄(即专门对那些谋求纠正其侨居国家的不足与缺憾的侨民的那种嘲弄)。[①] 帕尔乌斯则以更辛辣的讽刺回敬,而他本人却也用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他本国的同胞。对流亡中的俄国人,他真切地指出他们那东方的落后和狭隘,力图教给他们西方的政治方式。尽管这种姿态可笑,但俄国人认为他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还不失为是一位向导。他给《火星报》撰稿先是用莫洛托夫的笔名,后来改用帕尔乌斯。他的文章常发表在《火星报》的头版,《火星报》的编辑乐于给他腾出头版而把自己的文章放到其他版面上去。他们敬重他的渊博知识、才华和判断力。但是他们也担心他身上的某些不可靠的迹象。他身上确实有些类似卡冈亚都或福斯泰夫身上的东西,而且,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他长着一个像叭狗一样肥胖的大脑袋。但多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这种担心是正确的,帕尔乌斯没有犯过明显的过失,无论如何,他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和信念是无可指责的。他写的文章都是分期刊载的长文,但很少按时寄出,他是一个有点儿飘忽不定的投稿者,但他投寄的稿件还是很受欢迎。他的理财计划有点儿不牢靠:他曾力图建立一家社会民主党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计划要办一份社会民主党大型日报,并要同时用几种欧洲文字发行,他设想这份报纸会使欧洲的社会主义从改良主义的麻木中摆脱出来。但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需要大笔资金,而他得不到,大概因为他尚未准备投人没有把握的经济冒险。由于某种原因,可以说他受到的重视中混杂有一点儿冷嘲及不信任感。

---

① 一旦这位侨民开始适应环境,人们就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变得毕恭毕敬。帕尔乌斯直到去世前一直是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的智囊。

他后来的发迹就表明，隐藏在他内心的是一个势利之徒，一个政治骗子。然而，他的政治头脑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最大胆而且最深刻的。因而，他主要还是政治思想家，而骗子在他身上只居第二位。

在俄国人的争执中，帕尔乌斯先是表示同情孟什维克，但后来使自己远离两派，因为这样适合扮演一个调停角色的人。他曾试图使《火星报》的人与经济派和解，此时他又企图在前《火星报》的几个成员之间实行停战。总之，他和两派的关系始终未受损害。稍后当他开始批评双方时，对立的双方虽未被说服，但还是乐意接受他的调停，并把他当成好意而可敬的局外人来对待。①

托洛茨基在被排挤出《火星报》后并跟每个人都不和时离开了日内瓦，前往慕尼黑，帕尔乌斯住在那里。他住在帕尔乌斯家，后来他的第二个妻子谢多娃也到那里和他住在一起。托洛茨基看出，帕尔乌斯是一个对俄国人内部各派持有超然见解的人物，他能够看清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舞台，是一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大师。对阶级斗争的广阔前景，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他人的设想都没有超过这位人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托洛茨基欣赏帕尔乌斯的雄浑有力的文风，甚至在他们决裂后很长时间里，托洛茨基还是念念不忘帕尔乌斯的文风。简言之，在博学方面、经验方面及文学鉴赏力方面，帕尔乌斯仍然高于托洛茨基。但是要确定帕尔乌斯究竟对托洛茨基影响到什么程度却不容易。时至今日，诋毁托洛茨基的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不断革命论的唯一原作者是帕尔乌斯，或是认为托洛茨基抄袭或剽窃了这一理论，或是认为这一理论的来源如此拼凑杂乱，必然毫无价

---

① 帕尔乌斯：《革命与俄国》第182页；《火星报》第111期（1905年9月24日）；第112期（1905年10月8日）。另见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12页及以后各页。列宁用极尊重的语气评论帕尔乌斯的著作（《列宁全集》第8卷第95页）。

值。托洛茨基自己从不否认他曾受惠于帕尔乌斯,尽管他对此人感谢的热情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而起过变化。从他们交往最密切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有多少最先由帕尔乌斯阐述的思想和见解在托洛茨基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又有多少托洛茨基终生反复阐述的思想和见解在形式上同他年长的朋友最初灌输的并无多大差别。

但是托洛茨基具有某些特点,这些特点能使他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帕尔乌斯的门徒。托洛茨基有俄国的新经验,而且是地下斗争的新经验,帕尔乌斯却没有。托洛茨基有炽热的政治想象力,而帕尔乌斯的分析和预言则出自大胆而冷静的头脑。托洛茨基具有给自己的思想添翼腾飞的革命热情,而帕尔乌斯则是一个玩世不恭型的革命家。此外,对他们共有的丰富思想,托洛茨基也作出自己的个人贡献。正如大多数这样的合作一样,合作双方各自的份额是无法分清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思考是一起进行的,尽管有时可能说一种理论的某一部分是谁先在出版物中提出的,但是对合作双方之间无形的双向交流的启发和促进却查不出头绪来。关于帕尔乌斯与托洛茨基之间能够讲的只是,二人之中年长者起初暂居前列,在思想和提法方面都是主导;在下一阶段两人似乎并驾齐驱了;最后,年纪较轻者由于作出贡献而一跃居前。这显然是他自己的贡献:他创立和完善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他因完成这一理论便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革命舞台上异军突起。还应当指出的是:整个过程都异常迅速。这一理论创始于1904年夏,1906年在彼得堡监狱等待审判时达到顶点,托洛茨基以完美的书面形式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阐述。他以帕尔乌斯为师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仅到1905年初,即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这段时间是他的思想最凝练、最敏捷的时期,青年托洛茨基已把雅各宾主义形象投影到俄国革命中,他的确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

※　※　※　※　※

日俄战争爆发后，帕尔乌斯在《火星报》发表过论“战争与革命”的系列文章。[1] 甚至在这以前，他署名莫洛托夫的文章就已使托洛茨基深受影响。但主要还是他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给托洛茨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像。

帕尔乌斯的中心思想是：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气数已尽。“这一观点过去一直属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明过这一观点。但是在本世纪初，多数社会民主党作家都认为，它是一种适合在节日时重复讲述的大师言论，而跟晚近维多利亚式的、民族意识较强的和以帝国为自豪的欧洲现实却毫无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很远的将来民族国家才会黯然失色。帕尔乌斯则相反，已看出民族国家正在黯然失色。他指出其症候，预测出灾变的加剧，并据此迫切要求社会民主党人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立场和政策。他格外强调诸民族和诸国家的相互依存，这一强调使他的论断具有广阔的世界性的意义，而这在其他社会党民主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把1904年的日俄冲突看做是一连串战争的开端，他认为，一些民族国家受资本主义竞争的驱使而定会进行战争以求生存，各大陆的命运已联结在一起了；美国西部的开发已使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尖锐起来；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农业界和工业界携手合作以求废除自由贸易，把保护贸易制强加给西欧。“关税壁垒已成为诸民族文化统一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济障碍，它增加了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因而强化了诸国及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愈强大，各国

[1] 该系列文章在《火星报》1904年2月第59期上开始刊载。

之间愈容易发生武装冲突。"这些观点在托洛茨基看来已成为原则,他一生都根据这些原则进行辩论。

帕尔乌斯认为,俄国因在亚洲的扩张而与日本发生冲突,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压力造成的:沙皇统治企图通过对外征服而摆脱国内的弱点。但是俄国所受的外部压力却更大。在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起独立作用的只有现代强国;就连沙俄这样庞大的帝国,因为工业落后,也只不过是"一个领取法国证券交易所津贴的国家"。"战争是在满洲和朝鲜开始的,但已发展成为争夺东亚统治权的冲突。在下一阶段,俄国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将岌岌可危,战争将以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而结束。"

帕尔乌斯的分析结论如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引起俄国的政治动乱,这一动乱反过来必定要冲击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产阶级世界……而俄国无产阶级就会充分发挥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①

因此帕尔乌斯在1904年已经看到,日益迫近的革命并不单纯是俄国的事,而是世界范围的社会紧张局势在俄国的反映。他在即将到来的俄国动乱中看到世界革命的序幕。在这里已有不断革

① 《火星报》1905年1月1日第82期。帕尔乌斯在这同一系列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必定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历史发展中最有决定性的主观因素不是政治上的才智,而是政治上的愚蠢。人们还从来未能从自己创造的社会条件中充分受益。人们总以为自己远远地超越了客观历史进程,而其实他们远远落后于这一进程。……历史往往牵着那些自以为能控制历史的人的鼻子走。""长久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是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障碍。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无产阶级的政治能量还不够集中,各社会民主党还缺乏决心和勇气。人们可以设想,事变的转折会使社会民主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幸存承担政治罪名。"同时代人都觉得这是牵强的预言。

命论的主要成分了。然而到那时为止，帕尔乌斯还只讲到俄国的“政治动乱”而没有讲“社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公认，由于俄国的半封建和落后的状况，俄国革命本身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显然帕尔乌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托洛茨基却认为，革命由于自身的冲力会从资产阶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甚至在西方革命到来之前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

成为托洛茨基思想的重要部分的，不只是帕尔乌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关于俄国历史的某些见解，特别是他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帕尔乌斯。[①] 帕尔乌斯阐述过他的看法：俄罗斯国家是亚洲专制与欧洲专制杂交的变种，建成的不是俄国社会中任何阶级的机构，而是主要为抵制文明程度比它高的西方的压力而设计的军事官僚机器。[②]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沙皇统治曾把欧洲文明的一些要素引进俄国，特别是引进军队中。“这样就形成了俄罗斯国家的社会结构：靠欧洲式军队支持的亚洲专制国家。”他说，瞧瞧俄国边境要塞的防线就可以明白，沙皇想用一条类似中国长城的防线把俄国与西欧隔开。帕尔乌斯的一些理论经过托洛茨基阐述和加工，20年后成为激烈的历史及政治辩论的题目。

帕尔乌斯对托洛茨基的影响还可在文风和表达方式上，特别是在典型的历史预测方面看出来。这不是说托洛茨基在写作上模仿帕尔乌斯，而是因为他和帕尔乌斯在智力上和文学方面的近似，自然而有机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这一近似并未由于性格和气质

---

① 不过，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两人对俄国历史所持的看法，其原始资料部分来自自由派历史学家巴·米留可夫。

② 《火星报》1904年3月5日第61期。

的反差而减少。

※ ※ ※ ※ ※

托洛茨基第一次在慕尼黑居住一直住到1904年9月底,在此期间,他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中宣布同孟什维克绝交。这封信是寄给《火星报》发表的,但是从来没有刊载出来。我们只有孟什维克关于此信的摘要,摘要说托洛茨基用“傲慢夸张的语气”对“某些同志”大加指责并提出种种要求。指责的要点是:孟什维克集团企图将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他在信中写道,此外孟什维克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对列宁的立场作出了错误的反应:尽管列宁一心想使知识分子在党内有特许的统治地位,但孟什维克却在煽动工人反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给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的私人信中解释说,他的批评是针对温和派政客费多尔·唐恩的,旨在促进建立一个“稳定的党的核心”并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取得谅解。他还抱怨说,“《火星报》不能吸收的”作者——暗指他被普列汉诺夫排挤出《火星报》,没有机会影响社会民主党公众。最后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集团。[①]

孟什维克的反应是又窘迫、又恼怒。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之间的通信“措辞非常激烈”,马尔托夫这样写道:“我如果放任他不加控制,我同他的关系就会以完全断绝告终。”马尔托夫及其他孟什维克都渴望避免这一决裂,因为他们如果把这位反对布尔什维克发言最直率的争论者对他们的批评公开,可能会有损他们的集团的名誉。所以,他们安排在日内瓦举行秘密会议,在托洛茨基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他的“公开信”。会议正式同意孟什维克流亡组织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10-111页。

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党内新冲突的根源"这一意见,并同意,在俄国国内孟什维克各团体的进一步指示到来以前,该组织应予解散。[1]

这一决定的用意是清楚的,旨在安慰托洛茨基,使他平静下来。但它并未产生更多的影响。尽管托洛茨基能以幻想自慰,以为孟什维克已接受他的劝告,但是孟什维克这个"党内之党"与布尔什维克一样仍照旧在活动。无论如何,解散孟什维克组织这一正式决定倒使他摆脱了一直束缚他的集团纪律。马尔托夫很快就通知阿克雪里罗得,说托洛茨基终于"平静下来"了,"软化"了,说托洛茨基已重新给《火星报》撰稿了——自托洛茨基跟普列汉诺夫冲突以来的第一篇稿子确实不久在该报发表了。[2]个人的不满、自负和政治动机总是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分清。托洛茨基"平静下来",其原因是孟什维克在原则上向他让了步,还是他们弥补了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断然拒绝从而使他得到了某种满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无法确定。他现在不是《火星报》的制订政策者和编辑部的撰稿人了,他写的政治笔记刊载在报纸后几版上。但《火星报》仍然是孟什维克的战斗报纸,因此在局外人看来托洛茨基也仍然是一个孟什维克。

※ ※ ※ ※ ※

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不久从俄国传来的消息又使分歧进一步扩大了。日俄战争已给俄国造成灾难,沙皇统治的大厦已出现裂口。7月,沙皇远东政策的鼓动者普

---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10－111页。

② 《火星报》1904年10月5日第75期。(在这段时间内,托洛茨基写的唯一一份投稿在6月份发表在作为《火星报》增刊的讨论版上。)

列韦(Плеве)大臣被社会革命党人萨宗诺夫(Сазонов)刺杀。[①] 普列韦取缔并解散了地方自治会,因为地方自治会是自由派及半自由派士绅的大本营。他的继任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Святополк – Мирский)试图抚慰反对派,准许于1904年11月举行地方自治会的全国大会。大会后,不少城镇举行许多政治宴会。自由派士绅和中产阶级的领袖们在宴会上提出他们的要求,但和他们并排出现的还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成员。尽管他们所有的人在发言中还是一致地反对政府,但那些宴会也使人们发现反对派中的深刻分歧。工人们怀疑,自由派代言人的目的不是推翻沙皇,而是同他讨价还价、拍板成交。

在西欧的政治流亡者怀着希望和担心的双重心情注视着这场宴会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年底。事变迫使社会民主党人阐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在政治流亡者圈子中同样也存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彼得·司徒卢威的《解放》杂志先在斯图加特出版,后在巴黎出版,这份杂志最初鼓吹"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变种,旨在冲淡这一学说。它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派恐怖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那部分论述,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会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在这个时期,老《火星报》和《解放》杂志的对立还没有公开,但不久就明显起来:司徒卢威集团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给社会主义安上一块标记——农业的,不再拥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了。《解放》杂志从"合法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演变正值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分裂加深的时候,因此这一演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孟什维克倾向于自由派,布尔什维克却反对他们。1904年秋,托洛茨基在

① 普列韦自己雇用的破坏秘密恐怖分子组织的奸细阿泽夫却帮助筹划刺杀事件。

这个问题上跟孟什维克闹翻了。[①]

在11月和12月间，他针对宴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交给孟什维克的出版家。但他们不愿出版，百般拖延，据托洛茨基说是他们要把它封杀。这倒不是他们的既定意图，因为最后他们还是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由于孟什维克已经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联合反对沙皇是他们的机会，所以小册子中对自由派淋漓尽致的讽刺只能使他们感到忧虑。托洛茨基的论点的关键是：自由派害怕革命超过害怕沙皇，因而他们不会采取反对沙皇那样的行动。[②]

在小册子中，托洛茨基首先严厉批评了自由派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出的可怜而又虚伪的爱国主义。他写道，司徒卢威"不是为'真心的爱国'而是为虚假的爱国去牺牲最后残留的一点儿反对派精神和政治尊严的"。[③] 沙皇统治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已陷于绝境。"反对派暴露沙皇统治和全国之间裂开的鸿沟……越是尖锐有力，它力图把全国真正的敌人沙皇统治推入深渊的行动就会越坚决。而相反，自由派地方自治会……却把自己套在破战车上去搬运尸体、扫除血迹。"实际上，自由派祈求沙皇失败是因为这可能导致沙皇与反对派妥协。"但是自由派的报刊，这些咕咕哝哝、花言巧语、狡诈圆滑、已经腐朽而且仍在腐朽下去的可悲的报刊究竟干了什么？……(它讲到)'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战争'时，既不相信它自己的话，也没有掩盖得住它那在渴望沙皇垮台时的奴才相。""自由派这样的反对派只不过是在追求使自己得到专制主义的感激与信赖，成为专制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用人民的金钱来收买

① 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02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3章。

② 这本小册子《1月9日之前》收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6页。

它。这样的手法和俄国的自由主义一样陈旧,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聪明、更体面些"。他指出,新任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愚蠢而又傲慢地)借以表示他的政府信任人民的办法,开始了欺骗性让步的时期。"仿佛问题就是内阁是否信任人民,而不是人民是否信任内阁"。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但是地方自治会从他们的声明中删去了普选权及立宪政府的要求,这就够了。他们害怕"宪法"这个外国字眼儿,而"在害怕字眼儿后面隐藏的是害怕行动……","谁想得到群众了解并使群众站在他一边,就应该清晰确切地提出他的要求,首先就应以真名呼其实物,宪法就叫它宪法,共和国就叫它共和国,普选权就叫它普选权。"[①] 自由派由于胆怯,不知不觉又回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信任的专制主义的前途方面去。他们自称是民主主义政党,但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原则。"我们没有民主传统,必须创造这些传统,而只有革命能够做到这一点。民主主义政党只能是革命的党。"[②] 除了工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不能对沙皇统治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整个小册子洋溢着革命迫近的胜利感。"律师们上街示威,政治流放犯在报纸上抗议流放……一个海军军官公开开展反对海军部的斗争。……不可思议的变成现实,不可能的变成可能。"[③] 在其他流亡者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对日益迫近的事变有如此准确的预感。其他人都深深地陷在内部冲突的斗争中,他们那样全神贯注于在相互斗争中耍手腕,无疑是想使党在革命中尽可能占有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几乎都没有看到革命的到来。因为托洛茨基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9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3页。

乎是独立于各派的,只有他一心关注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正如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说的,其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程度不同地与祖国失去联系,而托洛茨基是一个与他们大相径庭的流亡者。[①] 对他持怀疑态度的朋友听到他兴高采烈地预言起义的到来,只是轻蔑地耸耸肩,如同听到他猛烈地抨击自由主义时一样。

托洛茨基以总罢工为背景去看革命的发展。但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到那时为止俄国工人斗争的规模一直都还是地方性的,就连西欧工业国家连同它们的老工会也未曾有过真正的总罢工的经验。他在《我的生平》中说,从 1903 年起他就提出这一思想进行讨论,不过在 1904 年才最后决定采纳。[②] 他当时草拟过一个"行动计划",他把这个计划概括如下:

> 鼓动工人离开机器和车间;领导他们走出工厂大门,走上大街;指挥他们到附近的工厂,在那里宣布罢工;尔后把新参加的群众带上街头。这样从工厂到工厂、从车间到车间,在行动中发展,扫除警察的障碍,发表演讲,吸引过路的行人,与对面来的队伍汇合,堵塞街头,占领首批适合举行公众集会的建筑物,牢牢占领那些建筑物,利用那些建筑物和不断变换的听众举行不断的革命集会。这样,你就可以使群众运动秩序井然,提高他们的信心,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目的和意义;这样,你最终能把城市变为革命的营垒——这就是行动计划的大体内容。[③]

① 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 20-25 页。
② 《我的生平》第 1 卷第 13 章;《托洛茨基全集》第 2 卷第 1 册第 521 页。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 2 卷第 1 册第 51 页。

事实上这确实是在1905年10月和1917年2月实现的革命图景。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是没有任何先例可援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中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成分。这幅革命图景出自炽热的革命想象。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种想象中奇妙地融为一体。这本小册子中的某些部分读起来就像托洛茨基自己在1905年和1917年中的经历片段,只是这里的事件是用将来时态叙述的,甚至连口号也都是那些回荡于1905年及1917年的口号:"结束战争","召开立宪会议!"[①]

最后他概括地研究了投入战斗行动的社会力量:"城市必将是革命事变的主要舞台。"[②] 但是单凭城市无产阶级不能决定结局。农民是"革命潜在力量的主要储藏库"。[③] "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不失一切时机地在乡村进行宣传鼓动。"[④] 他根本没有号召城市无产阶级单枪匹马跟沙皇统治拼命而招致失败,并不像后来批评他的人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他格外强调威胁工人阶级的孤立主义这一危险。[⑤] 他分析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的作用,并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清醒地注意兵营中发生的情况:当士兵接到向群众开枪的命令时,他们宁可朝天开枪;在过度疲劳下,军队的士气已经衰竭:

> 我们的舰只速度缓慢,我们的步枪射程不够远。我们的士兵都是文盲,我们的军士既无地图又无罗盘,我们的士兵赤足走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们的红十字会在偷窃,我们的补给部门在偷窃。这类传闻一传到军队中,都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1页及同书各处。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20页及同书各处。

④ 同上,第52页。

⑤ 同上,第46页。

> 被士兵贪婪地吸收进去了。每条这样的传闻都像强酸一样腐蚀掉上了锈的陈旧的官方训条。我们多年的和平宣传起不到战争一天所起的作用。
>
> 军官在决定性的日子中再也不能依靠士兵了。……昨天朝天开枪的同一个士兵,明天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一旦他坚信:人民不但一心要起义,而且在懂得起义的要求并且能够为起义的要求而战斗时,他就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在军队中开展最强有力的鼓动,这样,在(总)罢工的时刻就会使派去镇压"叛乱"的每个士兵都懂得在他面前的是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人民![①]

俄国革命序幕揭开的消息传来时,孟什维克的出版家仍然扣压着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不予出版。1905 年 1 月 9 日,彼得堡工人前往沙皇的冬宫进行声势浩大的和平请愿。领导工人队伍的是监狱神父加邦(Гапон),他的保护人是宪兵队队长祖巴托夫(Зубатов)。祖巴托夫建立了他自己的工人组织,用以反对地下的社会主义者。示威者举着沙皇画像、圣像和教堂的旗帜,希望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请愿书中卑躬屈膝地哀求沙皇为他们伸冤。沙皇拒不接见请愿者,命令守卫冬宫的军队向群众开枪。这样一来他点燃了引爆革命的雷管。

托洛茨基是在日内瓦听到这一消息的,他刚刚作完巡回讲演回到那里。他费尽心机也未能出版的小册子中的预见已经成为事实。他怀着希望、充满激情地回到慕尼黑的帕尔乌斯家,口袋里装着小册子的长条校样。帕尔乌斯读了长条校样深受感动,决定利用他的权威和影响来加重托洛茨基观点的分量。他为小册子写了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2 卷第 1 册第 50 页。

一篇序言,而且极力主张让孟什维克出版小册子。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托洛茨基本人还踌躇着未敢做出的结论。帕尔乌斯写道:“俄国的临时革命政府”一定会是工人民主政府。……因为社会民主党居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这个政府一定会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是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当小册子最终问世时,引起了不少争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都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预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帕尔乌斯的结论上,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双方都反对这个结论。前者认为,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残余,其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依照他们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参加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即使它是一个从革命中出现的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站在反对派立场上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列宁承认,就革命的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来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他并不相信资产阶级能承担这一革命任务。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参加革命政府。然而他也反驳帕尔乌斯关于这个政府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预见。列宁写道:“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的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革命政府的组成不得不是有“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甚至贫民群众”参加的联合体。……它“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列宁补充说,“对此无论抱有什么样的幻想都会极其有害!”①

代表俄国社会主义的集团或个人公开要求政权或在其中占主要位置,这是第一次。奇怪而反常的现象是,这一要求却是俄国革

---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6页。

命的局外人帕尔乌斯首先提出的，而列宁几乎是极其厌恶地加以否定。在列宁本人看来，革命仿佛"在这远大的而又模糊的目标面前由于吃惊而后退了"。然而就是帕尔乌斯讲的也仅是"工人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也还未曾怀疑过大家认同的假定，认为这一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破坏了封建专制制度后，革命的任务也就完了。同时，在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看来，如果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么，如果革命胜利，无产阶级的代表必定能对临时政府施加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辩驳的。没有一个在革命中首当其冲的社会阶级会愿意放弃革命的胜利果实。批评家们对这个论点都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反驳。但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都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第一，这一前景怎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相冲突？第二，人们怎能设想一个占少数的无产阶级执政的政府却会不放弃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争执各方都不愿放弃的。对这两个问题。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都还没有答案。

1905 年 1 月，托洛茨基在帕尔乌斯家里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后来用《彼得堡起义以后》的标题发表。这些系列文章是由颇不相干的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有反对自由派的挖苦性的新论战，有充满激情迎接革命的篇章以及对革命方法非常清醒的看法。托洛茨基在其对自由派的责难中对这点曾详加论述：在彼得堡示威之前仅仅两天，司徒卢威还说"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他评论说：这些话应镌刻在司徒卢威的额头上，即使他的头部看来不像一块墓碑而因此没有刻上去，但墓碑下面也埋葬着那么多的计划、口号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派的、"爱国的"、革命的、君主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及其他的。[1]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我们为革

---

[1] 《托洛茨基全集》第 2 卷第 1 册第 57 页及以后各页。

命所作的斗争以及我们为革命所做的准备工作都要与为争取影响群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角色而作的反对自由派的无情斗争同时进行……。"

我们从下面这些话中也许可以估量出他撰写的迎接革命的篇章中的要点:

> 是的,她来了,我们一直在期待她,我们从未怀疑过她。多年来,她只是从我们的"学说"中推导出来的结论,而形形色色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物挖苦我们的"学说"。她的第一次冲击已经使社会振奋。……1月9日以前,我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在所有自由派的权威看来都是幻想和空谈,使他们厌恶。但只要一天的革命,只要人民和沙皇间一场壮丽的遭遇战就足以使立宪君主思想变成幻想、空谈而且令人厌恶。神父加邦用他的君主思想反对现实的君主。但是因为站在他后边的不是君主制的自由派,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所以,这场有限的"骚动"立刻在街垒战中和在呐喊声中显示出造反内容:打倒沙皇。现实的君主摧毁了君主思想。……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①]

在这一阶段,革命的方法问题"非常重要"。"彼得堡无产阶级表现出伟大的英雄主义。但那是群众手无寸铁的英雄主义,不能对付兵营里武装的白痴"。从今以后,力量分散会导致一事无成——运动必将在全俄起义中达到最高潮。革命必须武装自己。有些人认为起义者反对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政府是毫无希望的,例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7页及以后各页。

如一位英国作家就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有几个机关枪连,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托洛茨基说:“用枪炮的口径去计算革命的历史机遇,这是多么狂妄的废话。仿佛指挥人的是枪炮,仿佛使用武器和枪炮的不是人。”[①] 他承认:工人单凭自己,即使武装起来也不能在起义中取胜——他们还必须使军队转到自己这边来。但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首先武装自己,而且要用自己的决心去影响动摇的沙皇士兵。他在教导工人应如何武装自己和形象地描述、具体地说明沙皇军队会转到起义人民一边来的过程的文章片断中阐述了这一思想。重读这些预期的场景,就像阅读在事变后撰写的历史篇章一样。他在结束语中仿效丹东的风格,向他的同志们呼吁说:为了奋起抓住良机,你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素质:不受组织的陈规戒律的约束,不受秘密运动可怜传统的影响,眼界开阔,敢于创新,有审时度势的才智。再说一遍:敢于创新”。

※ ※ ※ ※ ※

人们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仍可能感觉得到作者当时炽烈的热情。他急不可耐地要返回俄国投入革命旋涡。他无法忍受流亡者侨居地的沉闷空气,因为在这里他几乎与每个人都有矛盾。他也无法忍受流亡生活,因为从流亡地注视革命是看不清楚的,就像从遥远的海岸注视大海上的风暴一样。返回俄国要冒严重的危险。从西伯利亚逃出的流放犯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作为逃犯处置,被解送去服苦役,不管他原来是否被判处过苦役。但他还是下决心回国。谢多娃先于他而回国,以安排秘密的居所。1905年2月,托洛茨基自己动身回国,途中在维也纳停留时拜会了奥地利社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60页。

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在他家中刮了胡须,使俄国警察不容易认出来。

当年托洛茨基在从西伯利亚去英国的途中,第一次请求帮助时也是在阿德勒家中。从那时以来,时间不过过了两年半,但这却是充满了预兆的两年半。

第五章

1905 年的托洛茨基

2 月间,托洛茨基到达基辅,在那里他冒充退役海军少尉阿尔布佐夫躲了几个星期。当时基辅是秘密组织的中心,但那里警察的警觉性不如彼得堡和莫斯科警察的警觉性高。托洛茨基在基辅结识了列昂尼德·克拉辛(Леонид Красин),在当年的其余时间里,托洛茨基一直跟克拉辛关系密切。克拉辛是卓越的技术专家与成功的工业管理人员,他也是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仅次于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是处于秘密组织负责地位的实际当家人。然而,他却是一个急欲克服党内分裂的"调解人",因而跟列宁不和。这就使托洛茨基更容易与他合作。在克拉辛看来,托洛茨基是当时俄国国内唯一杰出的制订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人,而且是著

名作家,很快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春天,克拉辛把托洛茨基带到彼得堡。

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都留在西欧,一直到那一年年末。平时,事件进展缓慢,秘密组织能有充裕时间和国外流亡者商量,等待他们的指示。但此时,党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党越来越频繁地迫于事变,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因此,秘密组织与国外流亡者的常规联系就变得太慢而且太麻烦了。

托洛茨基回到俄国这样早,因而立刻发觉自己已处于秘密活动事务的中心。这使他在1905年革命中比年长的革命家们更加突出。然而他的形象之所以更突出,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党内的两种倾向尚未完全定型,没有变成两支独立的敌对势力。不过,争论已发展到足以吞噬领袖们全部精力的程度了。俄国的动乱来得太晚,党不能以单一的整体立即用其首创精神和巨大的活力采取行动;但也可以说是来得太早——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彻底分离以前和在它们尚未取得对运动的新的主动权时就来了。比起其他任何人来,托洛茨基更能代表那种踌躇不决以及非常讨厌分裂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对当时的党内两派来说还是共有的。就某种意义说,托洛茨基是运动“未成熟”的化身,而“热衷于分裂的人”却更能代表运动的未来。托洛茨基表达出党的极强烈情绪以及反对运动发展的更为强大的逻辑。但是他又是运动迄今为止在更远大的革命抱负方面所达到的最高程度“成熟”的化身:在阐明革命的目标方面,托洛茨基无论比马尔托夫还是比列宁都更深远,因而使他在革命高潮时担当积极主动的角色有更好的准备。可靠的政治直觉使他及时置身于革命的敏感位置和焦点上并指导他的步伐。

他回国后最初几个月只不过写写文章,鼓动鼓动克拉辛,并通过他鼓动组织。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动乱过去了,春季里工人运动

陷入沉闷。罢工终于失败，警察的镇压和迫害威胁着工人们，政治主动权转到自由派的中产阶级一方。由工业家、商人、银行家、医生、律师及其他人士举行的一连串大会和会议呼吁成立立宪政府和进行改革。只是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在对马海峡的战事失败、“波将金号”战舰的水兵起义及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政治主动权才从中产阶级手里转回到工人手里。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不能公开露面，就是在彼得堡的秘密组织圈子里也是谨慎地用“彼得·彼得罗维奇”这一化名进行活动的。因为根基动摇了——党组织里有保安局的密探。但他从躲藏的地方观察政治舞台，文章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下倾泻而出，他研究社会问题，给《火星报》写信，撰写传单、小册子、犀利的辩论文章和论述革命战略战术的著作。他进一步肯定了他同帕尔乌斯共同阐述的观点，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他回国后马上在《火星报》上写道，除了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再没有一个党能在革命战场”上组织全国性的起义：

> 城市居民中的其他集团只有在追随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才能在革命中起到他们的作用。……农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担当跟无产阶级角色相同的独立的革命角色。……因此，要组成临时政府主要依靠无产阶级。如果起义以决定性的胜利结束，在起义中领导工人阶级的那些人就会取得政权。①

在国外的帕尔乌斯也主张武装起义。当然，列宁也这样主张。孟什维克企图等待时机，说武装起义和一般的革命一样不应人为

① 《火星报》1905年3月17日第93期。

地组织而是伴随人民反抗的发展自发地产生的。孟什维克这种观望态度正是由于它顽固相信俄国革命的领导权并不属于社会主义而是属于自由主义。就在刊登托洛茨基说"除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再没有一个党能在革命战场上"担当领导这话的那篇文章的同一期《火星报》上，马尔托夫坚持说中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俄国社会的彻底民主化。下面就是马尔托夫本人的话："我们有权认为，清醒的政治估计会促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起到和上一个世纪在革命浪漫主义鼓舞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所曾起过的同样作用。"①

托洛茨基通过批评自由派的立场来反对马尔托夫的观点，而莫斯科实业家协会、彼得堡钢铁工业、省银行、乌拉尔的雇主、乌克兰制糖厂厂主、医生、演员、犯罪学家的全国大会等团体当时所持的就是这种立场。他并不否认中产阶级受独裁统治的压制，也不否认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同他们利害相关并因而促使他们要求政治自由。他甚至说："自由政体成为资本的阶级需要"，还说"城市商人已表明了他们的地位不低于'开明的地主'"。② 但是他补充说，中产阶级的要求只不过是工人要求的回声，而且对革命的恐惧使他们受到抑制。"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治的需要，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则只在某些情况下民主才是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东西。"③ 资产阶级的反抗姿态正在给中产阶级制造不无革命风险的政治声望。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一直看不起实业家和商人，现在却在欢呼他们是人民事业的英雄。而在自由派的代言人看来，"他们自己的发言信心十足地宣称他们等待敌人（指沙皇）

① 《火星报》1905年3月17日第93期。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71、79页。

③ 同上，第91页。

立即投降。……但耶利哥(Jericho)还在，而且正在策划罪恶的阴谋。"[1]

"耶利哥"确实在策划——根据沙皇大臣布里根(Булыгин)的倡议——召开所谓布里根杜马这一假议会。8月6日沙皇在一份诏书中宣布了这一计划。杜马将成为沙皇的咨询(议)会，而不是立法机关。每一等级在选举中分别投票，投票权根据财产，沙皇保留对杜马的休会权或解散权。工人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而这份诏书也使在野的反对派陷于某种紊乱中。大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当时以自由主义的领导自居，欢迎这份诏书，并把它说成是使举国渡过立宪政府的卢比孔河。[2] 自由派领袖愿意满足于沙皇的贿赂，这促使赞成抵制杜马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致巴·米留可夫教授的公开信。[3] 在他对自由主义的所有猛烈的抨击中，这封公开信是最辛辣、最尖锐的，这封信以半秘密方式广为流传。托洛茨基写道："历史上的卢比孔河，只有当政府的物质手段从专制主义手中转到人民手中时才能真的渡过。教授先生，这样的事单凭签署一纸诏书是绝不能办到的；这样的事得在街上进行，通过斗争才能实现。"他回顾法国大革命，说它的伟大转折不在于宣布立宪原则而在于政权的真正转移。他又进一步回顾了1848年的德国事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如何满足于普鲁士国王许诺的自由和如何帮助独裁者镇压革命的，最后，独裁者又是如何在革命退潮时击败自由主义、羞辱自由主义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98－99页。

② 这一紊乱打乱了党的路线：许多自由派分子不同意米留可夫的观点，准备抵制杜马，孟什维克一度反对抵制，布尔什维克则赞成抵制。参见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26页。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196－205页。

> 但历史学教授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自由主义的错误和罪恶都是国际性的。现在您重复您的前辈在半个世纪前在同样形势下的所作所为。……您害怕同杜马决裂,因为在您看来,干旱荒凉沙漠上的立宪海市蜃楼似乎是真实的,俄国自由主义在这样的沙漠上跋涉并非是第一个10年了。……您,教授先生不会把这些告诉人民。但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您不是在自由派的宴会上而是在群众面前打算跟我们辩论,我们将会让您看到,我们使用粗野刺耳的革命惯用语言能够所向披靡,令人心悦诚服。……如要革命不退潮,官僚政治依靠您如同依靠堡垒,如果您真的试图成为官僚政治的堡垒,胜利的革命一定要抛弃您。……(反之,如果革命失败,沙皇统治也就用不着自由主义了)。您建议不要受来自左边和右边的呼声干扰。……但革命还没有说出它最后的裁决。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它的刀刃向专制主义的头上砍去。让自作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当心,别把他们的手伸到闪闪发光的钢刀下面。让他们当心吧。

这封"公开信"真可谓文如其人,既学识渊博、词藻华丽而又毫不留情。他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类似列宁。但列宁不大想或不想用直接的思想对话与自由主义交锋,而托洛茨基感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不断对抗是必须的。他当时进行这样的对话,而且终生都进行这样的对话,这并非因为他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决裂的决心不如列宁,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更知道这种对话的吸引力。列宁指示并领导他的追随者,而且就某种意义说,还劝诫改变信仰的人。而托洛茨基则直接对自由派的代言人发言,而且在广大的犹豫未决的听众面前剖析自由派代言人的论点,反驳他们

的论点。与敌手对话也最适合他的好辩性格和辩证的文风。他爱好“公开信”这种表现方式是不无理由的。

因此他酣畅淋漓、非常热忱地直接对各不相同的听众发言，用每个社会集团的习惯用语对他们讲话。在讽刺自由主义时，他就转向知识分子和先进的工人说话。他用《致米留可夫的公开信》向学术界说话。他回到俄国后不久写下的告农民书由克拉辛发表，却是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托洛茨基写这些告农民书时，他眼中看到的是粗野、目不识丁的农业劳动群众，正像他还能想起他父亲农庄里的那一群人一样，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能为其余的人朗读他写的文字。他用最简易的措辞、斯拉夫民间叙事体的韵律、特有的造句和召唤写成他的号召书，他所用的语言和韵律仿佛都是为乡村中的半鼓动手、半吟唱手的吟唱和朗诵而设计的。然而他对俄国农民说话中的逻辑和气势却仍然和他对学术界敌手讲话时一样。在所有为农民或由农民写的革命文献中，就笔调通俗和呼吁的直截了当而论，很少能比得上托洛茨基论及彼得堡一月大屠杀时的告农民书的。他描写工人们如何手持沙皇画像、圣像及教会旗帜“和平、安静地”向沙皇皇宫进发的景象：

“沙皇究竟怎么办？他怎样答复圣彼得堡的劳苦人？

“听着，农民们注意听着……。

“这就是沙皇同他的人民讲话的方式……。

“彼得堡的全部军队都集结起来。……俄国沙皇就是这样准备与他的臣民讲话的……。

“20 万工人向皇宫前进。

“他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有头发斑白的老人和年轻小伙子；妇女跟丈夫一起行进，父母领着他们的小孩子，人民就是这样向他们的沙皇走去。

“听着,农民们注意听着!

“每一个字都要铭刻在你们的心上……。

“和平的工人要去的所有街道和广场都早已被军队占领了。

“‘让我们去见沙皇!’工人们请求说。

“老人跪下了。

“妇女们请求,孩子们也请求。

“‘让我们去见沙皇!’

“事情发生了!

“响起了雷鸣般的枪声……工人的鲜血染红了白雪……。

“请告诉所有的人,沙皇是用什么手段对付圣彼得堡的劳苦人的!……

“要记住,俄国农民们,每一个俄国沙皇是如何傲慢地反复说:‘在朕的国家里,朕是朝廷之主,是头号地主。’……

“俄国的沙皇使农民变成了农奴,把农民像狗一样当做礼物赏给他们的忠实仆从……

“农民们,在你们的大会上要告诉士兵,他们是靠人民的钱养活的人民的儿子——告诉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

他用的就是这样明白易懂的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农民想象力的掌握,他解释了党所追求的目的以及党应该使用的手段;而且也把“革命”这个外来语翻译成农民们习惯用的话:“农民们,让这把大火一举烧遍全俄罗斯吧,什么力量都扑灭不了。这样的一把

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①]

他对城市工人又用另一种方式讲话——例如当城市工人不响应在五一节举行示威这个党的号召时,他说:"你们在沙皇士兵面前害怕了。……但是你们却不怕把你们的弟兄交给沙皇军队,使他们竟死于满洲那个无人哀悼的大墓场上。……你们昨天没有出来,但明天或后天你们一定会出来的。"[②] 革命报刊上登了他的一篇短小精悍的杰作《早安,彼得堡的扫院工》。[③] 在那一年,沙皇在所谓《十月宣言》中已经许诺颁布宪法和公民自由权,他的这篇文章写于宣言颁布之后。扫院工一直是政治警察的眼线或奸细,但这时候却受到革命的感染。"彼得堡的扫院工从警察的噩梦中醒悟过来",托洛茨基写道:"2500名扫院工集会讨论他们的需要。扫院工们不愿再充当警察暴行的工具了。"他们提出他们的要求,拒绝在呈交沙皇的谢恩书上签名,因为沙皇的《宣言》中"许诺自由但迄今没有兑现"。托洛茨基写道:"许许多多的罪恶迫使彼得堡的扫院工们深感内疚。他们不止一次按照警察的命令粗暴对待诚实的工人和学生。……警察威吓他们,人民开始憎恨他们。但是普遍觉醒的时刻来到了。彼得堡的扫院工正在睁开眼睛。早安,彼得堡的扫院工。"

他就是这样对社会上从地位最高到最低的各个阶级讲话的,用他们本阶级语言但却总是用他自己的声音讲话。俄国革命从未有过而且也不会有别的代言人能用这样种种不同的语调和口气讲

① 《火星报》1905年3月3日第90期;《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17－224页。这篇告农民书的手稿是在1917年以后在基辅宪兵队的档案中发现的——手稿是在搜查克拉辛的印刷所时被没收的。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41－245页。这篇由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农民书也是在1917年以后在基辅宪兵队的档案中发现的。

③ 《俄罗斯报》1905年11月15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300－301页。

话了。

※ ※ ※ ※ ※

他住在基辅期间从一个秘密居所搬到另一个居所,用“阿尔布佐夫准尉”的假名掩盖自己的身份,但也不安全。这位“准尉”仪表堂堂,温文尔雅。但他忙得惊人,接待一些古怪的来客,甚至关在小房间里跟这些客人密谈上几个小时,或者仔细研究大量报纸、书籍及手稿。这使他的某些房东害怕,他又不得不搬家。但也有敢于庇护他的好心人。他在《我的生平》中描写了他如何假装成病人在一家眼科医院里找到避难所。负责病房的那位大夫和几个助手都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但有一个不知情的护士认真而又体贴地同这个古怪的病人斗争,督促他滴眼药水,给他洗脚,不让他阅读和写作。

他迁到彼得堡后,克拉辛安排他住在炮兵学校的主任军医利特肯斯(Литкенс)上校的家里,那里也是克拉辛和地下党党员秘密开会的地方。上校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秘密活动,上校本人是一个“同情者”。托洛茨基和谢多娃假称是地主维肯季耶夫夫妇,住在上校家中暂时躲避秘密警察的注意。但谢多娃在五一节示威中被捕,安插在秘密组织中的密探因而找到了托洛茨基的行踪。托洛茨基急忙动身去芬兰,当时芬兰虽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但享有的自由却比俄国多得多。他住在芬兰乡间一家名为“宁静”的旅馆里,在湖边和松林中思考、研究、写作,并同克拉辛保持联系,直到10月中旬彼得堡总罢工的消息“像一阵猛烈的风暴吹进了敞开的窗户”一样闯进那家静寂凄凉的旅馆。10月14日,至迟是15日他回到了俄国首都。

※ ※ ※ ※ ※

罢工以印刷工人要求缩短工时及增加工资的口号开始,尔后迅速蔓延到其他行业,并从彼得堡蔓延到外省,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这使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大为吃惊。工人们高喊着要求公民自由、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随着罢工的发展,诞生了俄国革命必然要诞生的机构:第一个"工人代表委员会",或称"工人苏维埃"。苏维埃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相反,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和克努尼扬茨-拉金(Кнунянц-Радин)领导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苏维埃,认为它是党的对手。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新历第三个星期),当苏维埃的力量和影响已处于高峰时,列宁才从斯德哥尔摩那边发来指示,竭力说服他的信徒以更合作的态度靠拢苏维埃。[①] 50个印刷厂的罢工工人构成了苏维埃的核心,他们选出代表并指示他们成立委员会。不久,其他行业的代表也加入了。说来也似乎矛盾,苏维埃这一概念本身却是沙皇间接或无意中建议的:在经历一月事变之后,沙皇曾任命杜马代表施德洛夫斯基(Шидловский)领导一个委员会调查动乱的原因。委员会命令工人们选出他们的工厂代表,以便倾诉苦衷。10月中,罢工的工人遵循了这个先例。10月13日苏维埃第一次开会时,只有一个区(涅瓦)的代表出席。需要有一种促进力量劝说其他区也参加。起这种促进作用的都是孟什维克,而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激烈反对这一制度,但当时他们对这一制度却起了教父的作用。

苏维埃立即取得令人惊异的权力。这是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

① 列宁为此曾写过一封信给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新生活报》,但该报没有发表这封信;35年后,即1940年11月5日,该信才在《真理报》上发表。

机构,它代表迄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工人阶级。在一个极端蔑视人民民主代表制原则的政府统治下,第一个体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势必马上在精神上使现存政府相形见绌。苏维埃立即成为革命的头等重要因素。

10月15日,托洛茨基从芬兰回来的当天或第二天,他第一次在理工学院召开的苏维埃会议上露面。出席会议的有好几个区的代表——参加选举的约20万人,几乎占首都全体工人的50%。后来,经继续选举后,代表人数逐渐从400个增加到560个。苏维埃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消息报》,就跟市政会谈判为出版工作提供设备和方便条件。理工学院的大厅和走廊里是一片热烈激动的气氛:罢工者来来往往、商谈、等候指示——这情景简直就是1917年苏维埃的一场预演。

然而社会主义党派及团体对苏维埃的态度仍不一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立即派出他们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不愿跟着别人走,而要求苏维埃必须先接受党的指导——只有这样他们才准备参加。克拉辛邀请托洛茨基参加布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托洛茨基力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参加苏维埃,他申明任何党派或团体都不能追求独霸领导权。苏维埃应当是包括形形色色工人阶级意见的代表机构,只有这样,尔后才能在总罢工中以及由总罢工发展而来的革命形势中形成统一的领导。

直到10月17日沙皇因为害怕总罢工而被迫发表允许立宪、公民自由和普选权的宣言时,上述的争论还在继续。宣言是半自由派的首相维特伯爵草拟的。布里根杜马还没有诞生就被埋葬了,沙皇出面放弃同皇朝本身一样悠久的专制主义,彼得堡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接着便陶醉在欢乐之中。像在节日里一样,群众挤满了街头。他们惊奇地阅读宣言。然而在政府里,反对改革的人继

续在动用实际的权力。内务大臣特列波夫(Трепов)将军给警察下命令:"别吝惜子弹!",这一命令和沙皇的宣言并排张贴在墙上,仿佛是有意给"新纪元"提供居心不良的注解。警察恰恰在沙皇发表宣言之前逮捕了许多人。

17日早晨,托洛茨基和许多兴奋的群众向前两天苏维埃开会的理工学院走去。骑马的宪兵冲入人群之中。特列波夫的公告看来是警告每一个人的,让他们别得意得太早了。但是群众,包括工人及中产阶级还是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然而,唯有工人才是风云人物,正是工人的罢工才迫使沙皇答应立宪和自由。所有的房子都挂着皇朝的旗帜,即红白蓝三色国旗。但青年工人们扯去旗上的蓝色和白色的布条,随手扔在人行道上,举起扯碎了的狭条红旗。队伍行进到理工学院,但在那里被警察和宪兵的路障挡住了。

人群继续向学院前进,要在那里举行集会。人数不断增加的、兴高采烈的队伍带来一位青年,他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很久了,他曾预测过这一时刻,此刻却充满疑虑,急不可耐地要警告群众不要高兴得太早。队伍涌进学院的院子里,演讲的人已经从阳台上向群众演讲了。托洛茨基因疑虑而紧张,怀着从队伍中感受到的激动感情,挤过密密麻麻的广大群众,上了阳台:这里才是他的位置!大会的组织者只知道他姓亚诺夫斯基(亚诺夫卡人),在苏维埃中代表孟什维克;有些则知道他就是《火星报》的托洛茨基。[①] 他望着人群,望着他过去从未看到过的这样的人群。他大声呼喊着,这声音仿佛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仿佛不像他本人的声音。他说:"公民们!因为我们完全制服了统治集团,他们才答应给我们自由。"

---

① 米留可夫:《1905年彼得堡第一次俄国革命》第1卷第63页;第2卷第68页。

他停顿下来,似乎想知道他准备向群众的热情泼去的冷水会不会伤害他们;他在斟酌词句,既要让人们看到他跟他们一起兴高采烈,又要提醒他们谨防轻信。

他继续说道:"正是这个坐在皇位上的杀人不倦的刽子手,我们已经逼迫他答应给我们自由,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但是——不要急于庆祝胜利;因为还没有完全胜利。难道期票等于纯金?许诺自由就等于自由?……公民们,请察看一下,难道昨天以来有什么变化吗?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吗?……我们的弟兄已从西伯利亚荒原上回家了吗?……"

"大赦!大赦!"群众回答说。但这还不是他的用意所在。他继续提出以下的口号:

"……如果政府真心实意地决定要跟人民和解,他们首先应该答应实行大赦。但是,公民们,一切就是为了实行大赦吗?今天也许会放出几百名政治战士。但是明天就会有几千人被投入监狱。……'别吝惜子弹'的命令不是同自由宣言并排张贴着吗?……刽子手特列波夫不是彼得堡无可置疑的主人吗?"

"打倒特列波夫!"群众高呼。

"打倒特列波夫!"托洛茨基再继续说下去,"但是,单单打倒特列波夫吗?……他靠军队统治我们。他的权力和依靠是近卫军,就是那用1月9日的鲜血玷污了的近卫军。他现在命令他们对你们的肉体和脑袋别吝惜子弹。我们不能,我们不愿,而且我们也绝不会在枪口下生存。"

群众以要求军队调离彼得堡作为回答。这位演说者好像由于人民胜利的不现实而生气,又因群众经久不衰的响应以及他自己意外地掌握住群众而激动,他最后说:

"……公民们!我们的力量在于自己。我们必须手拿利剑捍卫自由。而沙皇的宣言,……瞧吧!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他用戏剧性的姿态在群众面前晃动沙皇的宣言，愤怒地把它在手中揉成一团说：

“今天把宣言给了我们，明天就会拿走、撕成碎片，正像我现在把它——这纸上的自由在你们眼前撕成碎片一样。”[①]

俄国的首都就这样第一次听到这位革命演说家的讲话。

托洛茨基的这篇讲话是针对所有将使革命失败的致命弱点而发的。动摇了的是沙皇的自信，而不是政权的巨大机器。武装部队中，特别是海军中发生了骚动。但哥萨克、禁卫军和不计其数的农民步兵仍受盲目服从的陈腐习惯束缚。军队身后是俄国农村，沉溺于冷漠和绝望中的整个广大的俄国农村。革命还完全是城市的事。甚至在城市里胜利也夹杂有惧怕。中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自由派极愿相信沙皇许诺的自由，因而一想到他们应把这一许诺归功于工人的总罢工时就感到不舒服，他们是急于停止革命的。他们对老百姓的“无政府”幽灵提心吊胆，总是害怕革命继续下去会使沙皇听从那些策划镇压而无意让步的顾问的意见。因此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争论说：“如果你们不放弃斗争，我们新近得到的自由就会成为泡影。”社会民主党人反驳说：“但这本来就是泡影。”十月宣言使工人阶级具有的胜利感并不像实力感那样强，工人阶级急欲运用那种实力继续进攻。每一阶级对运动都怀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中产阶级希望从君主立宪制度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工人则拥护共和国。前者只要求政治自由，后者还提出针对中产阶级而不是针对沙皇的社会要求。

工人阶级的热情、激奋和冲动甚至超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领袖们统计队伍、拟订计划、制定时间表。他们原指望这场斗争在

① 托洛茨基：《1905年俄国革命》第93－96页。

1906年1月9日,即在进军冬宫的周年纪念日那天达到高潮。[①]但是所有阶段和日期都因群众的激烈情绪而意料不到地提前了,他们很容易被挑衅激怒而冲动行事。然而群众的无援正如他们的自信一样严重,因而其结果只能是灾难。工人阶级手无寸铁,在军队本身起义之前,工人阶级一直得不到足够数量的武器。即使革命是在理想的条件下,普遍的起义情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渗透到兵营里去。俄国军队的情绪取决于农民的心态。俄国农村到了1906年才算是真正骚动起来。而到那时,城市的革命已化为灰烬,已被穿军装的农民子弟扑灭了,如果城市的运动不是那样性急,穿军装的农民子弟原是可能参加的。革命一点点地浪费了自己的后备力量。工人阶级缺乏揭竿而起的经验。社会主义党派太弱,不能控制工人的急躁情绪。所有这一切背后的首要事实是:旧秩序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耗尽,还有能力分化那些本来可以集中起来打击它的力量。

彼得堡苏维埃这个注定的革命中心从一开始就是已处于所有种种对立思潮的中心,它不断地在勇敢与谨慎之间、在周围火山般的狂热与政治判断力之间受折磨。10月7日苏维埃选出它的执行委员会。出席执委会的有3个布尔什维克代表,3个孟什维克代表及3个社会革命党代表。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发言人是克努尼扬茨-拉金和斯维尔奇科夫(Сверчков)(后来他写过一部苏维埃史)。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尽管在国外他已退出了这一派。与此同时,他逐渐支配首都的孟什维克组织并使之反对流

---

① 列宁从斯德哥尔摩的来信(这封在1940年才发表在《真理报》的信我们上面已经引述过)中写道:"到1月9日一周年的时候,沙皇政权的机构都能被消灭干净。"《列宁全集》第12卷第63页。别人几乎都没有指望过这样迅速而彻底的成果。列宁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起义最好推迟到1906年春天(同上,第311页)。

亡国外的领袖。[1] 协助托洛茨基的是一个从尼古拉耶夫来到彼得堡的工人兹雷德涅夫(Злыднев),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曾在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里代表他的同志。根据托洛茨基的倡议,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委员会组成联合委员会,准备重新统一两派,同时在苏维埃中协同行动。[2] 社会革命党是由阿夫克森齐耶夫(Авксентьев)领导的,这个人后来在1917年充当克伦斯基政府的内务部长时下令监禁托洛茨基。但在1905年,三个党派的合作却是协调的。没有一个党派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派,它们都一致推选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Хрусталев-Носарь)为苏维埃主席,此人是一名律师,置身党派之外,在劳资斗争中作工人的代理人,取得了工人的信任。[3] 他对外界代表苏维埃,瞬息之间声誉鹊起。然而,苏维埃的政策是由各党派,主要是由社会民主党制订的,而赫鲁斯塔廖夫在革命中的作用只是一段插曲。正如参加者的记载和回忆所证明的,托洛茨基才是政治上原动力的灵魂。他在重大的场合既代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又代表整个苏维埃发言。大多数苏维埃的宣言和决议都是他起草的,他还编过《消息报》。这样,在有名无实的苏维埃主席和行使主持权的灵魂之间在幕后形成了无声的对立。[4]

在沙皇发表宣言两天之后,即10月19日,托洛茨基力主苏维

---

①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41-142页。

② 由托洛茨基签署的协定发表于《消息报》第2期,另见马尔托夫的上述引文。

③ 但后来赫鲁斯塔列夫-诺萨尔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

④ 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作为一名流亡者被法国警察逮捕、被指控犯有金融罪时,他的传奇也就无情地烟消云散。1917年他到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承认他是前苏维埃主席,遭到轻蔑的拒绝。1918-1919年内战期间,他作为所谓赫鲁塔廖夫共和国这样一个小共和国的头子在南俄的一个省份再次出现,不久以后被杀死。关于赫鲁斯塔廖夫和托洛茨基的对立,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90-197页和第2卷第1册第110-111、508-509页;H.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1卷第126、129页。

埃停止总罢工。继续总罢工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希望,反而可能招致过多的流血。苏维埃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因而在10月21日结束了罢工。当时苏维埃宣布在10月23日将为在罢工中遭到杀害的工人举行隆重的葬礼。但在22日得知,特列波夫将军正在调动宪兵准备镇压这次示威运动,而且特务正在阴谋策划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当天晚上。托洛茨基站在苏维埃前,要求取消葬礼。说:"苏维埃(通过他的提议)宣布:彼得堡无产阶级决不按特列波夫选定的日子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只有在有组织、有武装的无产阶级认为适合的时候才进行这一决战。"[1] 苏维埃忍辱吞声,取消了对烈士的葬礼。这样的屈辱是极为痛苦的:难道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后才能按自己选定的日子进行战斗吗?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武装起来?同一天,苏维埃决定组织战斗队,它的当务之急是防止大屠杀。后来在对苏维埃的审问中得到确凿证据证明,大屠杀确实是策划过,只是苏维埃的行动才防止了它。但这些战斗队,即令是保卫苏维埃的最好的战斗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用左轮手枪武装的起来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棍棒和铁器。然而就是这一进行武装的号召,都成了对苏维埃控告的一条主要罪状。[2]

但无论如何,苏维埃仍然保持朝气蓬勃的政治上的首创精神。十月宣言许诺过新闻自由;但是伪自由派首相维特却命令报刊审查机构照查不误。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在苏维埃的鼓励下宣布不排、不印已呈送审查官审查过的书报,以此作为回敬,出版家和作家也迫使政府表态,使俄国第一次尝到新闻自由的滋味。于是要求8小时工作日的呼声高起来了,工人们在苏维埃的保护下自己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84页。

② 参见本书第六章和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200页。

开始在工厂中推行8小时工作日。到10月底,政府在波兰宣布戒严状态,使革命彼得堡的情绪受到伤害。11月1日苏维埃为"被压迫的波兰代表团"筹备隆重的欢迎会。使大会不安的是:看到来为波兰说话的人却是扎莫伊斯基(Zamoyski)伯爵、克拉辛斯基(Kpasinski)伯爵、卢鲍米尔斯基(Lubomirski)亲王以及几位罗马天主教教士和商人,代表团中只有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然而,托洛茨基仍然热情地欢迎代表团,庄严地宣告波兰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苏维埃号召举行新的总罢工,以表示对波兰的同情。政府同时宣布凡参与过十月罢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于是,要求释放水兵的呼声和要求波兰自由的呼声结合在一起了。[①]

这样慷慨英勇的情绪并非没有挑衅的性质。维特首相向工人们发出呼吁:"工人弟兄们,请听听一个同情你们、祝愿你们走运的人向你们提出的劝告吧!"这个呼吁传到暴风雨般热烈的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马上写出下面这篇答复:[②]

> 无产阶级不是维特伯爵的亲戚。……维特伯爵要求我们怜悯我们的妻儿。苏维埃……则号召……工人们数一数从维特就职以来工人阶级中增加了多少个寡妇和孤儿。维特伯爵讲到沙皇对劳动人民的宽厚照顾,苏维埃则想起……1月9日那个流血的星期日。维特伯爵要求我们给他"时间",并答应"尽力而为"。……苏维埃知道

① 托洛茨基欢迎波兰人的演说词发表于《消息报》第5期(11月3日)。

② 斯维尔奇科夫说苏维埃委托他(斯维尔奇科夫)起草答复,但是他因为不知怎么写就请求刚到达的托洛茨基写,托洛茨基当场写出答复,在一片掌声中宣读。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28页。

> 维特已找到时间把波兰交给军事刽子手们,而苏维埃毫不怀疑维特将"竭尽全力"地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维特伯爵……祝愿我们走运。苏维埃声明不需要沙皇的趋炎附势者之流的良好祝愿。苏维埃要求基于普遍、平等、不记名、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制。[1]

自由派们在他们的客厅里,大学生和教授们在课堂里,工人在茶馆里,他们都哄然大笑。据说,维特本人读到苏维埃的尖锐反驳时全身一阵痉挛。[2]

11月5日,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大会上代表全体执行委员发言,要求结束第二次总罢工。政府也刚刚被迫宣布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该受普通军事法庭而不是受战时军事法庭的审判。苏维埃确实不是胜利地撤退而是光荣地撤退,然而也是不得已地撤退,尤其是因为外省的罢工者已日益厌倦。托洛茨基说:"事变为我们尽了力,我们不必强迫加速事变的步伐。我们一定要尽可能为决定性的行动延长准备的时间,也许要延长一两个月,直到我们能成为一支团结最紧密、最有组织的军队。"总罢工不能无限期进行下去。总罢工的后果应该是起义,但苏维埃对此并无准备。将来总有一天,当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已经加入时,他们定会"用铁路钢轨和电报线路把全国所有革命堡垒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在需要时才会使我们在24小时以内就能唤起整个俄罗斯"。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87页。

② 米留可夫证实:托洛茨基对待维特伯爵并非不公平。大约就在这时候,米留可夫拜访维特并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沙皇不必等到杜马召开,应立即颁布一部宪法。维特回答说,沙皇不要什么宪法,十月宣言是在"头脑发热"下发表的。维特本人也不要宪法——他感兴趣的只是虚伪的宪政。米留可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第18-19页。

即使他在力图抑制狂烈的反抗成分时，他仍然像挑战本身一样热情而又忧郁地站立在苏维埃面前。他讲到他同一个力主克制的著名自由派分子的一场谈话：

> 我对他回忆起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件事，当时国民议会要投票表决“法国人民决不在自己的国境内同敌人谈判”。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打断说：“你们签订了一项胜利的条约吗？”他们回答他说：“不，我们签订了一项死亡的条约。”同志们，当自由派资产阶级仿佛夸耀他们的背叛，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孤立了。你们想想，如果没有我们，你们能继续战斗下去吗？你们签订了一项胜利的条约吗？”我们把这一答复甩到他们的脸上：“不，我们签订了一项死亡的条约。”①

几天以后，他不得不再使苏维埃记住本身的弱点，力主停止坚持8小时工作日：因为雇主的答复是否则不准十万多工人进厂。苏维埃发生了分裂，少数人要求总罢工，但是托洛茨基得到钢铁工人的拥护，占了优势。这些弱点表现得愈来愈频繁，但群众的冲动行事又使这些弱点不可避免。令人惊奇的是，苏维埃的弱点并没有带来更具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苏维埃的主要鼓动者是一个年轻人，而以前又从未领导过或参加过任何规模的群众运动。当考虑到这次革命是在一切不利条件下艰苦进行的，那么旨在扰乱敌人不让它开始总决战的苏维埃策略就几乎是无可指摘的了。而其结果是苏维埃保持着不衰的权威，并且努力争取到沙皇的让步。

① 这篇演说词发表于《消息报》1905年11月7日第7期；《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90－293页。

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令人难忘的。直到20年后,即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期间,才把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温和态度"拿出来作为他的罪证。但在长达20年的期间内却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指责,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的这项记录作为革命编年史上值得自豪的一章。[①] 当时布尔什维克从未向苏维埃建议过另一条指导路线。在这20年当中凡有关这个课题研究的政治文献都一致把1905年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国内"客观"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从来没有归咎于任何一个领导人,更没有归咎于托洛茨基。[②]

苏维埃瞬息之间成为革命的主要焦点,因此所有集团、党派连估量其意义或使自己适应这一新形势的时间都没有。到11月中旬,所有集团、党派的领导人终于都从西欧回国。他们担心而又迷惑地注视这个看起来很像俄国国民议会的论坛。但他们身上的流亡习气太重,不能在其中取得一个立足点——无论如何,苏维埃是在他们到达以前三四个星期已经自行组成了。这正是托洛茨基代表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歌颂老一辈流亡者的自我牺牲和英勇精神之时。[③] 那年年初当他向这些流亡者告别时,他们还像对待神童那样,用赞赏俯就兼有的态度对待他。此刻他们对他刮目相看,充满敬意,注视着他在讲坛上的那副高屋建瓴的姿态,在工

① 但布尔什维克却以更强烈的情绪培植对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的纪念,那次起义是由布尔什维克成员领导的。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13－333页;《1905年彼得堡第一次俄国革命》第1卷及第2卷。在党的下一次大会上并没有出现对苏维埃策略问题的分歧,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大约到1926年党的历史学家[利亚多夫及波克洛夫斯基]才逐渐开始"修正"这种态度,直到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79－80页)明确地说苏维埃在托洛茨基和其他孟什维克的影响下"反对准备起义"。

③ 参见《1905年彼得堡第一次俄国革命》第1卷第128页上巴·米留可夫的回忆;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章。

人集会上的一张张粗鲁而又严肃的脸上觉察到他赢得的威望和信赖。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11 月 8 日(或 10 日)列宁回国后，当有人告诉他“苏维埃的强者是托洛茨基”时，他的脸色有点儿不快，但是他说：“也好，托洛茨基是以其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赢得这个地位的。”他脸色之所以不快，一定是因为托洛茨基曾攻击他的那些伤害感情的浑号闪过他的脑子。那些浑号激怒过列宁：刚在不久前，列宁不责骂帕尔乌斯同别人合伙，而偏偏责骂他同托洛茨基合伙，骂托洛茨基是“敲不响的破锣”、“空谈家”、“巴拉莱金”。[①] 然而此刻他却公正地承认托洛茨基的优点和成就。

看来，托洛茨基另外还有更深刻的理由证明自己反对以前的政敌是正确的。现在列宁和马尔托夫双方都承认，他们的狂热争论在只不过是流亡者茶杯里的风波，是小题大做。对中央委员会特权及党员条件的争论是与组织的秘密形式相关的。党已走出地下可以公开活动，党员第一次能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机关而无需害怕暗探局。列宁和马尔托夫一样急欲使党委自下而上地选举而不是由上边指定。[②] 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对中产阶级革命使命的信心已经动摇，因为这一信心与事实难以相符。孟什维克的追随者在彼得堡受到托洛茨基激进主义的影响如此强烈，使流亡国外的领导人不得不对此加以容忍。因此所有的分歧似乎都已消失了，随着双方的中央委员会合并完成，两派可望在年终前重新统一。看来是这样：热衷于分裂的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而鼓吹团结的人则是正确的。[③]

---

① 巴拉莱金是萨尔蒂科-谢德林作品中的一个讽刺人物，此人工于算计，是一个自鸣得意的饶舌者、律师。这是列宁为托洛茨基用“蹩脚律师”这个浑号攻击他而作的针锋相对的回敬。

② 《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78 页。

③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 141 页－151 页。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的人格和思想力量的影响远不限于对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1906年当革命早已衰退时，米留可夫受到来自右派的攻击，他在自卫时这样说："那些现在指责我们党(立宪民主党)的人说我们当时没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他们简直不了解或是忘记了当时大会上所有民主公众中普遍的情绪。"米留可夫说，那些人在1905年要是试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只会使自己声望扫地。[1] 这就越发意味深长，因为米留可夫心目中的"民主公众"都是专业人员、开明商人，他们并不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活动范围以内。他只有很少几次离开平民苏维埃去对资产阶级公众讲话；而且即使如此，他也是作为苏维埃的使者。托洛茨基在他的1905年历史记述中说到在11月罢工期间他如何到尤赫库姆·冯·希利德勃朗特男爵夫人家里去参加一次重要的政治集会。"男管家等着我出示名片，但是，我真不幸，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拿得出什么名片？……在接待室里出现的第一个人是大学生，接着是一个激进派的讲师，尔后是一位'严肃'期刊的主编，最后是男爵夫人本人。他们显然在期待着一个'从工人中'来的、令人鼓舞而更使人敬畏的人物。"顺便提一下，在这动乱的一年，托洛茨基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布尔乔亚，穿着如此整洁，使他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朋友都感到吃惊。[2] 无论如何，在男爵夫人家聚集的人与一个粗野的革命煽动家来往却没有感到紧张。"我报了姓名，人们很客气地把我领进去。拉开帷幕，我看见有六七十人在一起的集会……走道的一边是30个高级军人，其中有戎装华丽的近卫军军官，另一边坐着夫人们。最前排是一班穿黑色燕尾服的

① 米留可夫：《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前情况》第91－92页。

② 阿·卢那察尔斯基等：《革命家剪影》；A.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50－52页。

自由派的主要人物。"前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正怂恿近卫军军官捍卫沙皇的十月宣言,以防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托洛茨基在听司徒卢威讲话时回想起仅在7年前司徒卢威本人写的话:"在欧洲越是往东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胆怯、越卑鄙。"尔后轮到托洛茨基向军官们讲话,他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尽管要解放自己,但手无寸铁;而他们军官则握有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决定性时刻,他们应把钥匙交给理应归其所有的人,即交给人民,这是他们军官的责任。[①] 近卫军高级军官们竟会听得下去这样的讲话,这也就衡量出政治不稳的程度。但他的呼吁在他们听来必定仍然像天大的笑话。他把沙皇统治比做金字塔,认为如果从它的根基而不是从它的顶端去推是完全能推倒的。

每次会议后他都急匆匆赶回到他的编辑部,因为他主编的和与他人合编的报纸有三份。苏维埃的《消息报》不定期出版,这份报纸的出版纯属大胆冒险的举动。因为每期都要在另一家极右派报纸的印刷厂里排印,每次苏维埃都要派一个小队对这家印刷所发动突然袭击,临时征用它。除此以外,托洛茨基在已来到彼得堡的帕尔乌斯的帮助下设法控制了激进的自由派日报《俄罗斯报》,他把《俄罗斯报》改造成为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战斗报刊。稍后,他与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创办了一份严肃的大型日报《开端报》,名义上是孟什维克的喉舌,实际上主要是托洛茨基的报纸,因为他向孟什维克提出他的条件是:报纸要支持他和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论",而且不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打交道。所以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时这样说:"我们不得不同意宣传一种简直是危险的思想,而我们却不能对它作任何批评。"[②] 在这份报纸的撰稿人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73页。

②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45-146页。

名单中有欧洲社会主义大名鼎鼎的人物:维克多·阿德勒、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而且《开端报》的专栏也对普列汉诺夫开放,这正是托洛茨基的漂亮报复,因为刚刚在去年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在《火星报》与托洛茨基为伍"简直令人恶心"。托洛茨基编辑的几份报纸比布尔什维克那份由列宁、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编辑的《新生活报》成功得多。凡是从头到尾读过那些报纸合订本而加以比较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托洛茨基编的报纸更有气势、更加辛辣。[1] 尽管两个编辑部的人互相对抗,但两家报纸在政治上却互相支持,而且共同支持苏维埃。

由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活动以及各派报刊的公开出版形成的这一开放的平民自由之花不久就被摧残了。政府成功地镇压了军队中的零星起义。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一部分人失去自制,一心要拿起武器。维特伯爵重新强行实施书报检查,苏维埃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政府却对它怕得要命。"[2] 下一个打击落到苏维埃本身。11月22日,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和其他几个领导人被捕。政府等着看苏维埃会怎么办。苏维埃又一次面临常见的两难抉择。社会革命党人力主对沙皇的大臣们进行报复。其他人则宁愿用总罢工予以反击。社会民主党人在原则上反对恐怖的报复行动,但也不愿号召再举行一次总罢

① 列宁本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1917年5月,甚至在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列宁就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份受欢迎的报纸的主编,他还回想起1905年托洛茨基主编的出色的《俄罗斯报》,不过,列宁的提议却被否决了。载《红色年鉴》1923年第3(14)期。

② 《俄罗斯报》1905年11月17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301-303页。

工。再一次落到生气勃勃的托洛茨基身上的任务就是要求头脑冷静和再次推迟使用武力的最后尝试。他提出一项动议，建议“工人苏维埃代表临时推选一位新主席和继续作武装起义的准备”。苏维埃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选出由亚诺夫斯基（这是托洛茨基用的化名）、斯维尔奇科夫和兹雷德涅夫组成的三人主席团。托洛茨基所说的起义准备连初步都谈不上：只派出过两名代表同省苏维埃建立联系，根本就没有起义的力量。政府决定不让苏维埃有继续准备的时间。一队警察很快在苏维埃举行会议的自由经济协会大门外布置了岗哨。

显然，苏维埃存在的时间已屈指可数，而且从此苏维埃的活动主要是示威性的，目的在于使人民铭记革命的原则和方法。托洛茨基向苏维埃提议停止强行实施8小时工作日时说：“我们还没有为工人阶级争取到8小时工作日，但是我们已成功地争取到工人阶级去要求8小时工作日。”确实，在不久以前，要求8小时工作日对俄国工人来说似乎是幻想，甚至对西欧工人来说也一样。然而这一要求从当时直到1917年都居俄国工人要求中的首位。同样，在1905年，托洛茨基命中注定不是去争取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而是争取无产阶级进行起义。在每一场合他都解释说：有些人指望总罢工能奇迹般地推翻沙皇的统治，但是，如果总罢工不导致起义，就不能完成对社会的根本改革；他还继续说明保证起义的成功需要的是什么。他后来甚至在被告席上也阐述了这一教训；而且，以后几个月及几年的事变使人理解了其中的道理。那些持革命只是巧妙策划的密谋这一观点的人认识不到在革命背后是人民心中长期、缓慢积累起来的不满、经验及策略思想，他们想不到这样的革命教育学，并可能把苏维埃的起义决定看做是空洞的威胁，而且仅仅是短期内的空洞威胁。但是苏维埃和托洛茨基的方法在将来才能得到验证。1917年的二月革命将1905年流传下来的思想付

诸实施。它的第一幕是,彼得格勒工人及其子弟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使它获得了胜利,而这些工人正是1905年聆听托洛茨基演讲的工人。

苏维埃的最后姿态是宣布在财政上抵制沙皇。苏维埃号召人民停止纳税、只接受金币而不要钞票、从银行提取存款。[①] 帕尔乌斯写的《财政宣言》斥责政府的腐败、财政破产和伪造收支平衡,指明首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性质不代表人民。"害怕民众监督,怕因此把政府的财政破产暴露于全世界;害怕人民监督,促使政府把召集普选代议制会议束之高阁……。政府从未得到人民的信任,因而也没有得到人民授予的权力。现在政府统治自己的国家正像统治被征服的国土一样。"《宣言》宣布俄国人民不会替沙皇还债,这是有朝一日苏维埃政府要对沙皇的西欧债主们重提的一个警告。《宣言》的论据在道义上、在政治上听起来都是令人信服的,然而作为实际政策,抵制只能加速苏维埃一直千方百计推迟的冲突。双方都认为这是以抵制取代起义,并非没有道理。苏维埃采取这一手段正是因为没有能力进行武装行动。《宣言》宣布"只有一条出路……推翻政府的路——就是不给政府……纳税",这显然同经常阐述的观点——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统治的"唯一道路"——是矛盾的。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受到的纳税人拒绝纳税这种打击可能几乎和起义一样沉重。它不得不立即行动起来。[②]

---

① 抵制的倡议并非出自苏维埃,而是出自比较温和的全俄农民协会,苏维埃和这个农民协会紧密合作,《财政宣言》是由苏维埃全俄农民协会、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党共同签署的。

② 7个月后,即当社会民主党人失败以后,沙皇决定跟自由党人算账,解散第二届杜马,因自由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占有优势。自由党在他们著名的《维堡宣言》中也要求财政抵制。他们要求的条件几乎和苏维埃宣布的抵制条件相同,但同样也没有效果。《维堡宣言》还要求人民拒绝应征参加沙皇军队。

12月3日下午，托洛茨基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要准备将要召开的苏维埃全会的议程。他作了关于政府最近的行动情况的报告：政府已授权各省省长颁布戒严令，有些地方业已颁布了戒严令；罢工者受到重罚的威胁；发表《财政宣言》的各报社已遭查封；内务大臣正在准备强行取缔各社会主义政党并监禁它们的领袖。这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都提议举行总罢工。在辩论中间传来消息说，警察对苏维埃的袭击迫在眉睫。执委会决定继续进行议程，但派几个执行委员离开会场，如果苏维埃成员遭到监禁，就由他们代表苏维埃继续行动。那几个推选出来的执行委员刚离开就又回来了，因为禁卫军、哥萨克、宪兵和警察已包围了那栋房子。于是，执委会一致决定留下不动，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决定不进行武装抵抗。执委会继续商议，此间长统靴的橐橐声和军刀的卡嗒声愈来愈近。从楼下大厅里（代表们因为要出席全体会议已在那里集合）传来愤怒的抗议声浪。托洛茨基从厢座上向下面的代表们大声说："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警察！"他还命令把枪机砸坏后再把手枪交给警察。然后他又回到执委会会议桌旁的主席席位上。

一位工会发言人正在声明他的工会准备参加总罢工，这时一队士兵和警察占领了过道。一个警官走进执委会正在开会的那个房间，准备宣读逮捕令。此时唯一的问题是：苏维埃是否能不失尊严地承受它的软弱和屈辱。抵抗这条路已被排除，但难道他们能没有一点儿反抗的表示就温顺地面带愁云地屈服吗？托洛茨基的自尊心及其舞台效果的意识不允许他主持这样泄气沮丧的场面。但因为他不能进行认真的对抗，就只能以幽默来缓和这暗淡、阴郁的形势。因此，他把这一场面的最后一幕变为对无耻行径的机智讽刺。当那个警官刚要对执委会宣读逮捕令时，托洛茨基严厉制止他说："请不要打断这位发言者的话，如果你想要发言，必须先报

姓名,我还要问问会议是否想要听你的话。"

困惑的警官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了嘲弄或者是否会遇到武装抵抗,所以等候那位工会代表发言完毕。然后,托洛茨基严肃地问执委会,他是否应准许这名警官"为介绍情况"而作陈述。那个警官宣读过逮捕令,托洛茨基提议执委会应承认收到这一通知,接着就继续进行议程中下一项的讨论,另一位发言者起立。

那个警官因这一前所未闻的举动而感到慌乱,朝托洛茨基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仿佛向托洛茨基求援似的。

"请不要妨碍发言",托洛茨基严厉地训斥他:"你已经发过言了,你已作过陈述;我们已收到通知,难道会议还需要跟警察打交道吗?"

"不!"

"那么,请离开会议厅。"

警官嘟哝了几句拖着两脚离开房间。托洛茨基指示执委会成员烧毁所有文件、不要对警察暴露自己的姓名。楼下大厅里响起了砸左轮枪枪机的声音——代表们正在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

警官再次进来,这一次他率领了一排士兵。一位执委会成员站起来对士兵讲话,他说:沙皇恰恰在这一时刻撕毁了《十月宣言》的诺言,而他们士兵却容许沙皇利用他们充当反对人民的工具。警官怕这些话发生影响,赶紧带领士兵们到过道里去,随手关上大门。发言人提高嗓门说:"即使关上门,士兵们也会听到工人们兄弟般的号召。"

最后,一大队警察进来,托洛茨基宣布"执委会会议闭幕"。

历史上第一篇苏维埃史诗,就这样经历50天后结束了。[1]

---

① 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163-165页;托洛茨基:《1905年俄国革命》第177-179页。本章中的某些材料引自B.沃伊京斯基:《胜利与失败的年代》第1册第184、222-223页及同书各处;加尔维:《一个社会民主党员的回忆》;《维特回忆录》第2卷。

第六章

“不断革命论”

苏维埃被消灭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苏维埃的主要发言人是国事要犯。空气中还弥漫着政治的不确定性。在监狱里——先是在十字监狱，以后在彼得保罗要塞——苏维埃成员享受一切优待。名义上他们是单独监禁的，但是他们的囚室并不上锁。他们自由地相会，自由地在院子里散步，自由地接受书籍，而且稍加遮掩，还能自由地从事紧张的政治活动。[1]

最初，对苏维埃的突然袭击是否过了头，政府自己还不清楚。

---

① 普通监狱的狱规十分松懈，刚从华沙监狱释放出来的卢森堡竟能到彼得保罗要塞“秘密”探望帕尔乌斯和捷依奇，看来她这次没有会见托洛茨基。

彼得堡通过几次罢工表示抗议,莫斯科举行总罢工表示抗议,莫斯科的总罢工导致了10天的街垒战。在莫斯科,甚至在起义被镇压之后,革命看来也没有被彻底击败。整个12月和1月,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高加索,叛乱风起云涌,惩罚队忙于镇压。3月,第一届杜马选举,社会民主工党进行抵制,政府受挫,立宪民主党获得显著的成功。对苏维埃的审判究竟举行与否还是一个疑问。但无论如何,当局是不会忙着确定它的日期的。后来计划在1906年6月10日开庭。可是,沙皇在夏季又恢复了自信,罢免了半自由派分子维特,停止了正在进行中的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谈判,解散了杜马,任命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为首相。审判成了政府中激烈竞争的对象,拖延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直拖到9月底。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们计划利用这一案件向沙皇证明:维特的软弱政策挖了皇座的墙脚。而政府中的伪自由派则渴望利用这次审判达到相反的目的,借以表明:反动派的阴谋破坏了十月宣言的政策。

这期间,犯人们精心准备他们的辩护词。起初,他们对在被告席上应采取的行动方针上有分歧。马尔托夫代表(当时差不多要放弃独立存在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致函各被告人说,他们应采取温和态度为自己辩护,要以十月宣言为依据,向法庭证明苏维埃的行动没有超出宣言允许的限度。苏维埃特别应否认自己有武装起义的目的来反驳这样的指控。托洛茨基愤慨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通过他的律师从囚室里送出一份表示“震惊”的答复:“没有一个被告采取这种态度。十月宣言的纲领从来就不是苏维埃的纲领。”他说,苏维埃应以直截了当地肯定自己的共和国主张来对抗沙皇的诺言;中央委员会建议被告否认他们与起义有关,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法庭上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否认的是他们参与过起义的技术准备,但是对政治准备必须承担责任。

这封信是当着那位等着将此信偷偷带出去的律师的面匆匆写成的,是怒气的爆发,是对侮辱的反击。托洛茨基坚定地认为:苏维埃人应该阐明自己的原则,解释自己的动机,公布他们的目的。他们一定要利用被告席作为政治讲坛,而不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点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支持托洛茨基的,用当时同他一起坐牢的老友齐夫的话来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的话充满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的好感,他在精神上跟他们类似;[①] 而他对他的盟友孟什维克则抱有几乎抑制不住的反感”。[②] 然而,托洛茨基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被告都采取同样的对抗态度,而且几乎全体都同意他致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唯一与其不一致的是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这位苏维埃第一任主席,他在预审中态度暧昧。犯人们威胁说要在法庭上公开指斥他为叛徒。尽管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过去是他的对手,但他却渴望避免出现有损这次审判的政治影响丑闻。他说服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在法庭上和大家一致行动,并答应以不谴责后者作为交换条件。于是,主要被告们商定了他们在审判中各人的分工: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谈他担任主席时的苏维埃工作,斯维尔奇科夫谈苏维埃最后那些日子的情况,克努尼扬茨谈社会民主党,阿夫克森齐耶夫谈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托洛茨基则对付最危险的题目:武装起义。

作好这些安排之后,他就专心致志地阅读和写作。即使是宪兵将军伊万诺夫主持的预审也不能使他分心。他拒绝作任何证词,他把要讲的一切都保留到公开审判时去讲。斯维尔奇科夫写

---

① 托洛茨基致马尔托夫的信后来在马尔托夫被捕时落入警察手中,并作为起诉证据之一出示。这封信载于《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459-460页。另见同书第639页上的注338。

② A.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53页。

道:"托洛茨基的囚室很快就变成了图书馆。他收到所有值得一读的书;他通读了这些书籍,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作。他常说:'我感觉非常良好,我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工作,而且绝对用不着担心会有人抓我——在沙皇俄国,这的确是一种颇不平常的感觉。'"[①]齐夫描写了托洛茨基如何热心地把他的书报传递给其他犯人和他怎样不倦、热情地促进他们智力的提高。

审判前,托洛茨基在囚室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文雅的男子汉,"文质彬彬"的外貌引人注目,面庞显得比本人更端庄。一头浓密的黑发,下巴上蓄着一缕略微前翘的山羊胡子,脸上一副沉思的表情表明此人高度集中的精力与极强的自制力。面部表情尽管极其平静,仍反映出他内在的活力和强烈的感情与情绪活动。浓密的黑发、宽宽的前额、两道凸起的浓眉、黑色夹鼻镜、修剪得极好的唇髭和刚毅的下巴都从不同角度在这张脸上突出了这个人内在力量。这位身材中等、消瘦的犯人身着黑色服装。黑色西服套装、雪白的硬领、袖口稍稍露出一点儿雪白的衬衣袖口和擦得锃亮的皮鞋,给人留下了几乎是博学优雅的印象。这是 19 世纪末西欧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像是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候审的革命家的肖像。只是光秃秃的墙壁和牢门上窥视孔造成的森严气氛才使人想到真实背景。

他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我躺在监狱的床上,完全陶醉在这些名著之中,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享受,其程度不亚于啜饮美酒或抽馥郁的雪茄。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正是在那时,我通过原作才真正了解法国小说的伟大作家。"[②] 终其一生,他都保留对法国古典与现代小说的爱好。当时他已精通德语和法

---

① 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 189 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1 卷第 216 页。

语，而且都讲得很好，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他运用德语更得心应手，但他更喜欢作为文学语言的法语。他在赫尔松和敖德萨的监狱里吃力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些日子离现在已经久远。他不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授马克思主义了；而现在他的心灵则自由地翱翔于浩瀚的欧洲文学之中。

※ ※ ※ ※ ※

他在寂静的囚室里仔细思考过去几个月的暴风雨所给的教训，他把结论写成若干论文和小册子，其中之一已成为特别重要的著作。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除了一篇论地租的因遗失而未问世以外，差不多都已收入全集中。他在自传中把那篇失去的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一次"惨重的损失"。他的惋惜是否值得，我们无从判断。但他对经济学业已掌握是肯定无疑的。不过，他跟列宁和布哈林不同，不是以抽象经济理论知名于世，而且，对于像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这样高度专业化的题目他是否作出独到的贡献，也许还难以确定。不论实情如何，这一年他写的一些政治论文大概比他关于地租的论文分量要重得多，而且更有独到之见。在他那本曾经风行一时、用H.塔霍茨基的笔名写的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司徒卢威》中，对自由主义又是一阵连珠炮似的谴责，这谴责尖刻辛辣，击中对手要害。但其中除了熟知的老一套论据外没有增加什么新论据，我们姑且不谈它。更重要的著作是《苏维埃史》，这是一本由几个人合写而由托洛茨基主编的著作。入狱后牢门在他的身后刚一关上，他就有了撰写此书的打算。他为此书撰写了总结苏维埃作用的一章：

[他得出如下结论]俄罗斯城市过于狭小，不足以作

> 为斗争基地。苏维埃力图开展全国规模的斗争,可是它首先还是彼得堡的一个组织。……毫无疑义,在下次革命高潮中,工人苏维埃这样的组织将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由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全俄工人苏维埃……将承担领导责任……历史绝不会重演。新的苏维埃不必再次经历这样的50天,然而从这50天的经验中就一定能推导出整套行动纲领……;与军队、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平民阶层建立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专制制度的军事机器,解散部分军队,整顿部分军队;废除警察和官僚机构;实行8小时工作制;武装人民,首先是武装工人;使苏维埃成为革命的机构、城市自治机关;成立农民苏维埃,负责进行当地的土地革命;选举立宪会议。……制订这样的计划容易,而实现这样的计划却困难。但如果革命注定要胜利,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个任务。它将完成空前的革命伟业。
>
> 这50天的历史将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与胜利的伟大篇章中的苍白的一页。[①]

这确实是1917年的纲领。然而,这些文章只是为他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总结与展望——革命的种种动力》作准备的草稿和短文。这本著作作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说明,成了几十年激烈争论的对象。[②] 这是他为他的1905年论文与纪事的文集《我们的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06页。

② 概述和引文都根据1919年3月的莫斯科重印本。本书作者在华沙的藏书中有一本现已成为珍本的1906年原印本,此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了。1919年版是原版的忠实再版本,书前有专为这个版本写的序言。

革命》而写的长篇总结。他在其中给不断革命理论作了完备的、几乎是数学公式般的简洁说明。他用正确观察俄国史上百年之久的各种趋势之间相互关系的眼力回顾新近发生的危机事件，然后转向国际舞台，明确了俄国革命在欧洲现代史中的地位，还概略地预测俄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这一框架中，他明确地把他的概念与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的观点对立起来。这对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对于1847年以来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测即使不是修正，也是最激进的重新阐述。仅仅为了这个理由，也值得对此略加详细地概述。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都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清除半封建遗产；只有完成这一阶段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在俄国充分发展，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在这个国家的财富增长、生产力充分发展了以后，革命的社会主义才会起而夺得政权，开始满足群众的平等愿望。马克思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已经打好。当东方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已在盼望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胜利了。这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都公认的原理。后两者的争论集中在是哪个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个问题上。

托洛茨基对这些假定中的的大多数都作了分析。他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承担这个角色。他当时更深入地论证说：工人阶级由于自己在革命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会主义高潮开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向社会主义阶段。这是革命“不断性”的一个方面——它不可能把剧变限定在资产阶级的范围以内。

究竟是什么使俄国注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前驱？为什么俄国中产阶级不能像18世纪法国中产阶级那样把他们的革命进行到底？答案在于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俄国是一个半亚洲式、半欧洲式的国家，是以发展缓慢、没有分化的原始社会为基础的。形成这样的国家不是由于俄国社会的推动，而是由于占优势的欧洲列强的军事压力。从很早的年代起，俄国先是反对鞑靼人统治的斗争，继而反抗波兰－立陶宛人和瑞典人的入侵，国家强迫俄罗斯人民尽了最大努力，耗费了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财富，因此阻碍了本来就缓慢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过程，也阻碍了生产力，使它的增长更加缓慢。可是国家需要等级制，而要完成等级组织就必然促使社会分化。沙皇制度因此既抑制、同时又促进俄国社会的发展。根据这一事实，米留可夫说：在西方是等级创造了国家，相反，在俄国却是国家创造了等级。托洛茨基摒斥这种说法，认为它是片面的，因为"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制造社会集团和阶级"。然而，统治者的主动权大得这样惊人，而俄罗斯社会又如此迟钝和麻木，以至在俄国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像是国家的产儿"。[①] 奠定现代工业基础的是国家，而不是私人企业。就连俄国的思想和舆论似乎也是国家的产物。在现时代，财政和军事保护主义和欧洲的金融援助保证了沙皇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则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统治社会的权力。自由派认为国家这一压倒的优势使革命成为不可能。但是正相反，它却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

这一趋势的后果之一是，俄国跨入20世纪时，它的城市中产阶级极端软弱。俄国城市本身也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彼得大帝在位的时候，城市居民只占全国人口的3%。拿破仑战争之后，城市人口占4.5%，一直到19世纪末也不过13%。旧俄城镇与欧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16页。

洲的城镇不同,它一直不是工商业中心,只是某一军事行政单位或城堡(莫斯科是皇村)。俄国城镇和亚洲城镇一样,不生产、只消费;既不积累财富,也没有逐渐发展分工。俄国的严寒气候及辽阔的幅员强加给它的对文明发展的严重障碍使这一切更加恶化。19世纪中叶,在俄国看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产生现代工业的那种城市手工业,而只有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正如帕尔乌斯已经注意到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显著的政治后果:俄国没有一个可与集中的城市手工业群众类比的社会阶级,而正是集中的城市和工业群众构成了法国中产阶级的脊柱,完成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400万家庭手工业者则分散在农村里。

甚至现代工业的发展也没有使中产阶级的实力明显加强,因为培养俄国的工业主要靠外国投资。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本国都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而在俄国,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投资的安全,而“强大的”,亦即专制的政府看来是最能保障安全的。这样,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弱势,外国资本在俄国工业中占的支配地位,中产阶级传统的缺乏——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使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成了死胎。然而,现代工业虽然没有明显加强中产阶级的实力,却把无产阶级推上了显著地位。俄国工业发展得越晚,就越乐意采用最先进的组织形式,而这在别的地方总是缓慢、艰难地发展起来的。俄国拥有的现代工厂数量不多,但比西欧,甚至比美国的企业都更大、更集中。因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及其自我组织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就更强。

这样的社会阶级组合必然要彻底改变通常的革命模式。欧洲革命史经历过三个里程碑:1789年、1848年和1905年。强大而自信的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领导了反专制主义的斗争。确实,雅各宾平民派,即无套裤汉常常不得不把革命推向前进。但这些人都是不像样的乌合之众,他们自己没有一贯的纲领。他们只能偶

尔对抗富有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在经过了罗伯斯庇尔的短暂专政之后又恢复了优势，当时没有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挑战。[①]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德国和奥地利。但德国的中产阶级既没有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强大，也没有那样自信。反对专制主义所必需的勇气又因为害怕新兴的无产阶级而变为气馁。1848年的平民群众不再是与愤怒和偏激的赤贫者混杂在一起的下层中产阶级，而是工厂中的工人阶级了。他们探索着走向政治独立，不但反对君主，更直接反对雇主。工人阶级虽然强大到已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但还是太软弱、缺乏自信，不能领导全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弱无力，而无产阶级还不够强，二者都无力承担革命的领导，革命因此失败。

最后，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车轮转了一整圈后回到原位。但革命再也不是没有领导的革命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太软弱无力，又太害怕无产阶级，不能指挥对专制统治的斗争。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到产业工人的肩上。他们已经比1848年的德国工人强大得多，而且如饥似渴地吸收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最先进的思想。[②]

托洛茨基接着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革命如果成功，其结果必将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目的都是夺取政权，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③] 孟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俄国还“未成熟”，工人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说法，勇敢地宣称：“在经济上落后

---

① 多年以后，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这一看法，即使在18世纪，也把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夸大得过分了。

②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33页。

③ 同上，第34页。

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能比先进资本主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夺取政权。……俄国革命造成了条件，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有机会充分显示他们的政治家才能之前，政权就可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①] 他抛开根据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那些论据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革命先于社会主义革命，声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分析社会关系的方法，而不是教科书。”

考虑到批评他的人会马上指责他要俄国“跳过”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而倡导一种会使居少数的产业工人和全国其他人相对立的政策，托洛茨基试图对这些批评来一个先发制人。他说，他并不否认俄国革命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革命的直接任务是使俄国从过去的封建制度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完成英、法资产阶级已经完成的任务。然而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之处是：他坚持认为革命不会停止在这一点上。根除了封建制度之后，它要进而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②] 他并不排除社会民主党人和农民代表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指定后者担任配角。工人代表有“将赋予政府政策以内容，并在政府中成为团结一致的多数党”。[③]

那么，这是一个少数人的专政吗？他含糊地而不是明确地设想革命本身实际上是工人单独实现的。在城市里，旧秩序必须推翻，产业工人要成为那里的主人。“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才能吸引许多阶层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吸引乡村里的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并使他们第一次在政治上组织起来。”[④] 虽然

---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 34 – 35 页。
② 同上，第 39 – 40 页。
③ 同上，第 40 页。
④ 同上，第 41 页。

旧秩序的推翻和政权的夺取都将是少数人干的,但如果得不到多数人的亦即农民的真正支持,革命不可能巩固,而且也不能幸存下去。“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农民面前。”[①] 在诸多其他事中,要批准农民夺取大地产。法国农民会跟拿破仑走,因为拿破仑保障他们的小土地所有权,对付逃亡的地主;俄国农民由于同一理由也会支持无产阶级政府。因此,这个政府既代表少数人的统治又不代表少数人的统治,无产阶级少数将构成这个政府的核心,而且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掌握主动权;但他总是为压倒多数的人的利益进行统治并享有他们的衷心拥戴。

他关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关键,成为不少争论的焦点。对托洛茨基的常见的攻讦是:他“低估”了俄国农民的革命潜力,否认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这种指责在他本人的言论里是找不到根据的。我们已经看到他那样强调:“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农民面前。”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会剥夺地主的财产而且批准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在这点上他比已经走得很远的俄国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走得更远。孟什维克认为应由市政府接管乡绅的土地;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笼统地主张土地归国有,但没有提到分配土地。[②] 如果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及1917年以后所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与农民“联盟”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在1906年肯定已这样主张了。

然而他的确认为农民跟其他小业主、小资产阶级一样都不是

---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42页。

② 现在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只有斯大林在1906年主张过党应宣布赞成把大地产分配给农民。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95-207、209-213页;另见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82-83页。

独立的革命力量。他认为农民是无组织的群众、一盘散沙。他们关心的是狭隘的地方利益,不能在全国协同行动。农民起义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胜利了,也只是导致新的压迫王朝的兴起,或者被其他阶级利用,这就是农民的命运。现代社会里农民在政治上甚至比以前更软弱:“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乡村从属城市的历史。”[①]城市里只有现实的或潜在的独立力量的两极:拥有集中财富的大资产阶级和拥有集中生产财富能力的无产阶级。农民尽管在人数上强大得多,但不得不或是追随这个或是追随另一个。在议会选举的天平上,农民一票的重量和工人一票的重量相等。在革命形势下,这种相等是虚幻的。在罢工中,1000个铁路工人比100万分散的村民在政治上作用更大。现代社会阶级的作用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其社会功能和比重。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否则就不能掌握政权。但要吸引农村小业主群众的唯一办法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显示力量和决心。弱者总是被强者吸引的。

这一如此明白说出来的观点尽管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里已作了强有力的暗示,但却标志着根本背离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托洛茨基厌恶“教科书式的分析”,这使得他不去征引有用的引文)。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内的多数之前,不能、而且也不应试图夺取政权,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流行的社会主义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在现代国家中,产业工人阶级会像在英国那样逐渐壮大成为多数。[②] 托洛茨基早已同这一幻想彻底决裂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43页。

② 斯大林在1946年给他的全集写的序言(《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页)中说:1905年时,他“当时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尚未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了,他写道,在全国的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以前,革命早就胜利了。

他在对农民的评价上与流行的意见同样尖锐对立。孟什维克倾向于把农村的小业主看做是反革命的后盾。他们寄希望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联合。列宁与他们相反,把俄国农民看做是革命力量,但又跟托洛茨基不同,对农民的潜力不作过早的预断。他耐心等待,看农民会不会建立自己的革命党,要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把它当做平等伙伴。1905年初,使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马尔托夫觉得有趣的是,列宁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过大的希望看待那个谜一样的人物,加邦。[①] 他很想知道:这个神父,这个哥萨克的后代,这个率领首都工人走向冬宫从而帮助打开了革命闸门的人是否就是一个独立、激进的农民运动的先驱。[②] 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看来比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宽泛、更严谨,而且更适合社会民主党人与农村革命家的联合。1917年的俄国事件却肯定了托洛茨基的预见。然而到了20年代,这个问题在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在托洛茨基阐明他的观点之后约半个世纪,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被亚洲革命提出来。在亚洲,城市成分与农村成分的关系比过去在俄国更错综复杂,更模糊难辨。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革命的国内方面。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革命的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

---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5－180页;《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4－57页;另见帕尔乌斯论加邦,载《火星报》第85期(1905年1月27日)。

在革命一边。[1] 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2] 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全力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不能把它的暂时统治转变成稳定而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3]
>
> 这样，从一开始就使事件的发展具有国际性质，并展示了最广阔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由于领导政治解放斗争而上升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积聚有巨大的力量和手段，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消灭资本主义的首创者……。[4]
>
> 如果暂时取得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不把自己开创的革命在欧洲大地上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封建及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定会迫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这样做。[5]
>
> 正是由于害怕兴起的无产阶级，投票赞成支付巨额军费的资产阶级政党才被迫一本正经地表示要求和平，

---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42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71页。

④ 同上，第73页(重点号是托洛茨基加的)。

⑤ 同上，第74页。

> 梦想建立国际调解会,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所有这类可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既不能消除列强的对立,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欧洲大战必然意味的是欧洲革命。[①]

他接着指责社会民主党各派"宣传上的保守主义"可能妨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希望俄国革命能够激励国际社会主义,正如1905年的事变曾促进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并要求普选权一样。"东方的革命用革命的理想感染西方的无产阶级,并使之也有用俄语和敌人讲话的欲望。"[②] 他把自己的论点总结如下:

> 俄国无产阶级……将遭受到全世界反动势力有组织的敌视,也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给予革命的有组织的支援。如果听其自然,一旦农民背弃无产阶级,俄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镇压下去。工人只有把他们自己的政治统治命运,也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除此别无选择。俄国无产阶级将把巨大的国家政权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这个巨大的国家政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难得的机遇所给予它的。手中有国家政权,背后有反革命,面前有欧洲反动派,它将向全世界的兄弟们发出那个熟悉的号召,这一次却是最后攻击的冲锋号:

---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77页。

② 同上,第80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

托洛茨基的论点要旨暗含着他把欧洲革命设想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此,在他的预测中夹杂有致命的幻想,至少在关于全过程的发展速度方面抱有幻想。第二国际的精神导师卡尔·考茨基曾权威地宣布过一个信念: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当时,这一信念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接受,托洛茨基对这一信念大加称赞。可是,甚至在 1906 年,尽管他预测的要旨都是明确的,但关于革命会以什么方式从俄国扩展开来,是否会通过波兰冲进德奥两国或是否会向东转到亚洲,他对此却相当谨慎,说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2]

托洛茨基无论如何一刻也未曾想到俄国革命能孤立地存活几十年,所以像斯大林 20 年后说的那样,托洛茨基“低估”了革命在俄罗斯内部蕴积的力量和活力。如果考虑到托洛茨基在 1906 年发表的这个观点到 1917 年至 1924 年之间竟成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全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共有的理论财富的话,这个在回顾中十分明显估计的错误就不那么令人惊异了。自然,马后炮总是对预测中的局部错误猛攻,致使那个错误蒙蔽整个预测的光彩。托洛茨基没有预见到苏俄会孤立地存活几十年,这的确是事实。但是除了他以外,又有谁在 1906 年预见到苏维埃俄国的存在?而且,托洛茨基本人是在无意中间接地提供了他自己错误的思路的,这从他对农民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农民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和没有独立性这两点,是集体主义制度在个体农民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存活的原因,同时也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能够相当成功地把集体主

①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第 80 页。

② 同上,第 74－77 页。

义强加给农民的原因。

他当时说,一旦农民转而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就会失败,这显然与他本人的观点相抵触。如果这一论断是一个错误的话,这个错误与他在1905—1906年的革命观密切相关。他没有想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会在与人民中的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长期统治和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他没有预见到革命导致少数人的长期统治。这种统治的可能性在他的理论中原本存在,但成为现实时,仍然使他像几乎所有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觉得这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尽管他写过关于列宁的"雅各宾主义"的文章,但未曾设想革命会因为设法摆脱孤立及弱点而成为集权主义。

如果把他的种种思想倾向看做一个整体,那么,也许可以说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不同结果的政治预言:时而得到如此辉煌的应验,时而又被完全推翻,尔后,新的历史巨变的洪流又在某一点上给以肯定。托洛茨基的预测中讲到俄国会推动世界革命那部分尤其符合事实。几十年来发生的事变使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1917年以及其后,在王座倒塌和起义的霹雳声中,他的话似乎句句兑现,准确得不可思议。接着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退潮,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缩进自己的甲壳里。托洛茨基受到羞辱和嘲笑,被说成是完全荒谬的、"显然不可能应验的空头"预言家。但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他的声音仿佛在身后又回响在两个世界的冲突中。在西方看起来,俄国"上升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积聚了巨大力量和手段,成为全球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的首创者"。我们不能过多超前我们的叙述,不能在这里就探讨这是不是俄国的真正作用或起到什么程度的作用。我们只能在这里提示托洛茨基的想象与显然成为事实的部分之间的差别。他当时指望俄国的新政权成为国际革命的首创者和鼓舞者,而不是国际革命的主子;他认为在俄国以外"消灭资本主义"是西方工人阶级的真正

成就，而不是俄国军队胜利进军的副产品。

然而尽管事变的行程偏离了他在1904—1906年制订出的路线，但到本世纪中叶，看起来他又一次正确掌握了“形势的主要机遇”。无论人们怀着恐怖还是怀着希望阅读他的预言，无论人们认为他以其成熟及伟大永垂青史、成为新时代鼓舞人心的先驱还是认为他是毁灭和苦难的先知，但对他那设想的胆略和气概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他观测未来就像一个从耸立的峰顶眺望那不熟识的无垠的地平线的人一样，指点远处大量未经标出的里程碑。诚然，从他的制高点观察，他不能把下面的全景中那些被浓雾包围的部分尽收眼底，而距离所起的作用使远景看起来跟在低谷中看到的大不相同。他错误地判断了一条主要道路的准确方向；两个或更多的独立的里程碑在他的眼中融为一个；他可悲地看漏了一个将来有一天他自己会在那里摔得粉身碎骨的岩石深谷。但他的视野宏大无比，补偿了他的失误。与托落茨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囚室里勾画出的这个设想相比，他的同代人中最卓越、最聪明的人，包括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所作的政治预言都显得畏怯或含糊。

他的思想发挥在《总结与展望》中达到高峰。在狱中度过的几个月中，他深入思考并领悟了新近的经验，对他来说，这是从早期向成熟期的转变，这一转变像他从童年跃向青年、从青年跃向成年一样地突然和迅速。这本80页的小册子正是这个人的实质与精华。在他的有生之年，作为革命领袖，作为军队的创建者和统帅，作为新国际的创始人，然后作为被“追捕”的流亡者，他总是在捍卫和发挥他在1906年概括提出的思想。同样，马克思用其毕生的时间不断发展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思想，并从中得出结论，而《宣言》正是他早年对自己学说的简要说明。

托洛茨基这本著作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如1848年以来《共产党宣言》对于欧洲社会主义一样，一直是主要的革命规划，是

唤起行动的号召书。然而,托洛茨基这本著作尽管引起争论,但它的影响却几乎被忽视了。这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作者观点的内在原因。1906年这本书刚出版就被警察查扣没收了,到读者手中的寥寥几本没有引起注意,尽管当时对苏维埃案的审判正在进行,作者正受到公众的瞩目。这本书的大部分是收集旧文章重印的,寻求新观点的读者不容易看到其中新的重要一章。[①] 例如,列宁在1919年前肯定从未读过这一著作,虽然他有一两次依据第二手的引文轻蔑地提到过它。[②] 到此书终于送到印刷所之时,革命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人从实用的观点出发不去仔细考虑革命胜利的前景,而更想要去掂量反动派的取胜机会。这样,《总结与展望》如要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出版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了。结果是,党内的两大主流都不愿认同这种挑战性的新预见。孟什维克已从1905年的激进主义中恢复过来,他们急于要摆脱托洛茨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新提要是白日梦。布尔什维克则无意认真注意这个孟什维主义代言人绘制的革命前景。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党内已成了孤军作战的人,这就判定他在该起最大作用的时候起不了作用。他的年龄太轻对此也有影响。他在党员群众和非党员工人中已经很孚众望,但在积极的宣传家和组织家(他的学说主要是给他们看的)看来,他还是年龄太轻,不能把他当做先知。[③]

尽管缺乏响应,但他已深刻意识到:他已进入了历史创造者的行列。1906年9月19日,他正是带着这一意识走上被告席的。

---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39-42页。

② 参见越飞写给托洛茨基的遗书(1927年11月16日),该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哈佛大学)。

③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

※ ※ ※ ※ ※

审判充满战斗而且激烈。审判不像料想的那样在军事法庭上进行，因而被告席上并没有笼罩着死刑的阴影。但是被告们都有长期服劳役的准备。大批哥萨克骑兵和步兵围住法庭。在宣布处于戒严状态的区域内满是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准许旁听的只有百把人，其中有托洛茨基的父母。辩护律师共40人。25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证人对苏维埃活动的每一细节提供了证词。从第一天起，由几万名工人签名反对这次审判的抗议书像潮水般涌到法庭。有一份典型的抗议书说：“我们，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宣布……苏维埃绝不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组成的，而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如果我们尊敬的П.А.兹雷德涅夫同志有罪，那么，我们大家都有罪，我们用签名来证实这一点。”[1]

无数小插曲也表明公众反对沙皇的情绪。“在被告席上经常出现报纸、信件、装有甜食的盒子和鲜花。无数的鲜花！在被告的钮扣眼里，在被告的手中，在被告的膝上，在所有的被告席上——都是鲜花。审判长始终没有勇气消除这种扰乱秩序的芳香。结果，甚至连宪兵军官和执事人员也都因大厅内的气氛而士气低落下来，他们从听众手里接过鲜花送到被告席上。”[2] 一次，被告们起立为一个在审判前就被处决的人默哀。律师和听众都站了起来，尴尬的宪兵军官和警察也都站了起来。革命的余波仍在空中飘荡。

兹雷德涅夫代表全体被告在开庭时这样说：“我们决定出席现在的非常法庭，只因为我们认为必须……公开说明苏维埃活动的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142－143页。

② 同上，第141页。

真相及其意义。"被告们这样的表现有时引起羡慕和同情,甚至引起敌人的尊敬。警察控告苏维埃的某些成员——托洛茨基不在其中——侵吞从工人中征集的基金。这一控告在各工厂中引起一阵轰然抗议,而且在法庭上遭到那样有力的驳斥,以至连检察长本人也认为是诬陷,不予受理。证据如此明显:苏维埃号召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都曾得到压倒多数的群众的拥护,因而检察长不能根据这两个行动立案,而只能集中于暴动这一罪名进行起诉。①

10月4日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起来发言。他的发言以马克思和拉萨尔在1848年面对同样的指控时所作的辩护为范本,但这一次他也许更胜于他的两位老师。他首先声明:共和国和暴动问题从未提上苏维埃的议事日程,所以按照严格的法律观点说,这一控告毫无根据;而在这里论述它们只是因为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持有自己的态度、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而无需讨论的。尔后他无所畏惧地纵论政治暴力问题:

> 苏维埃……是否认为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是正当的呢?用这样概括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是正当的。政治总罢工的实质是使政府机构瘫痪,因此,在政治总罢工所造成的情况下,早已过时的、为罢工所直接反对的旧政府的暴力已经证明本身完全无能为力。即使采用唯一能用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维持控制公共秩序。同时,罢工已使千千万万的工人从工厂中出来冲上街头,已唤醒他们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

① 《泰晤士报》载当时的彼得堡通讯说:"[1905年10月的]革命集会,其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组织周密完善,……相反,'白党'的游行队伍却只是由店伙计、店主、教堂执事和少数狂热分子的乌合之众。"《泰晤士报》1905年11月1日。

> 谁能接管对群众的指导，谁能使群众队伍遵守纪律？旧政府的哪一个机关？警察吗？宪兵吗？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谁也不能。[1]

他说，苏维埃只能承担起准政府的职责。然而它不行使高压统治而宁愿进行说服。检察长提出的证据中只有几件微不足道的暴力事例，与其说它们是悲剧性的不如说是喜剧性的。被告当然可以抗辩说，苏维埃的所作所为无不在沙皇本人宣言允许的范围以内，但它宁可坦率宣布它的民主共和的信念。沙皇宣言许诺的自由是只给保皇党的呢，还是也给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的？这就让法庭去决定吧。“现在就让宣言通过法庭的裁决对我们宣布：你们总是否认我的现实性，可是我对你们、对全国来说都是存在的。”否则，被告们将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被定罪，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了。

然后，托洛茨基继续论证说：法庭所认为合法的总罢工在某些情况下必然发展成为法庭认为是非法的暴动。暴动就某种意义说是与总罢工同时开始的。罢工既然已使现政府瘫痪，因而就需要有另一个政府取代它。类似双重政权的情况已经成为现实。检察长承认保卫现存秩序以防苏维埃的侵犯。可是这种秩序，按沙皇宣言中的表述而论，它本身就是总罢工的产物——正是为了对付十月罢工沙皇才公布这一宣言的。旧秩序合法的、现实的基础已经粉碎。事实上已经存在两个政府。两个政府都坚持自己的权力，都竭力争取军队支持自己。两个政府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彼得堡的工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意识到了。无产阶级、苏维埃相信两个政权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相信。”而且，不但它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163－164页。

们,中产阶级也知道这一点,并多次对苏维埃表示同情。体现无政府状态和嗜血的正是旧政府,并不是苏维埃。要求秩序就得推翻旧政府;只有暴动才能推翻它。

托洛茨基问:这种暴动是什么性质?历时已100年的俄国陈旧法典只知道一小撮造反者秘密进行反政府阴谋活动这样的概念。确实,这在过去时代是唯一可能的起义方式。但新的暴动是人民起义,是陈旧的法典万万想象不到的。法律已落后于时代,它甚至没有给检察长提供控告苏维埃的技术根据。

> 而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而我们已为武装起义作了准备!法官先生,群众的起义是制造不出来的,是主动自发的。它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在纸上策划的结果。群众暴动不能筹划,只可预见。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那些原因既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沙皇制度。公开冲突一天一天在迫近。对我们来说,准备公开冲突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场冲突的牺牲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

苏维埃力图组织群众并向他们说明事件的意义:不是准备暴动,而是使自己对暴动有所准备。一点儿不假,群众没有武器。但是——"不管武器多么重要,法官先生们,伟大的力量不在于武器。不,不是群众有杀人的能耐,而是他们有准备赴汤蹈火的伟大决心,它最终保证人民起义的胜利……。"因为只有群众表示出准备战死在街垒的决心,才能把旧政权所依靠的军队争取过来。在革命中,街垒并不起堡垒在正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街垒主要是人民与军队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会战场地。"它为起义服务,因为它阻挡了军队的调动,使之与人民密切接触,。"就是在街垒上,士兵

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诚挚勇敢的话语,这是兄弟般的呼吁,人民良知的呼声。士兵与市民在革命热情气氛中这样接触,其结果就是旧军队纪律的绳索突然绷断……。"

他这样说明了暴动在革命中的地位之后,就回过头来对政府进行抨击。他说,统治者试图用暗杀和大屠杀的手段延长他们的统治;黑色百人团的无赖们一直按警察和宪兵的指点行事;而沙皇本人一直都是他们的保护人。[①] 托洛茨基引证自由派亲王乌鲁索夫(Урусов)在第一届杜马上的揭露,这位亲王讲到一个宪兵头子曾这样夸口说:"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屠杀10个人,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屠杀1万个人。"

> 检察长对这一切并不相信,因为他不能相信。否则,他就必须转而去控告他现在保护的那些人,而且必须承认用左轮手枪武装自己的公民是反抗警察的自卫行动。……我们毫不怀疑:黑色百人团的门面背后是统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拳头。法官先生,就是此刻,就在我们面前,也能看见这双邪恶的拳头。
>
> 检察长要你们承认:苏维埃武装工人为反对现存"政体"而进行直接斗争。如果明确问我"是这样的吗?"我会回答说:是的!……我准备承认这一指控。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不知道检察长和法庭是否同意这个条件。
>
> 我倒要请教:检察长所说的"政体"确切涵义究竟是

① 黑色百人团的纲领如下:

1. 祖国利益在于坚决捍卫正教教会制度及权力无限的俄国专制制度。
2. 基督教正教教会在国家中必须居支配的统治地位。
3. 俄国专制制度出自人民的理智;一直得到教会的祝福,而且历史一直证明它是正确的。

> 什么？难道我们当真都在什么"政体"下生活吗？这个政府早已和全国人民决裂了。……我们拥有的不是全国的行政权力，而是一架屠杀群众的自动机器。对这架把我们人民肉体活生生地剁成碎块的政府机器，我找不出任何别的名称。要是你们告诉我杀人、放火、暴行，……要是你们告诉我在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谢德尔策发生的一切，……要是你们告诉我基什涅奥夫、敖德萨、比亚威斯托克（一直在进行大屠杀的地方）是俄罗斯帝国政体的代表，那么——是的，那么我就同检察长一起承认：我们在10月和11月里是在武装自己，反对这个俄罗斯帝国的政体。①

他就是这样面对着法官们，用洪钟般的声音对他们说话，而且向听众飞速地瞧了几眼。他的父母坐在听众中间。他父亲注视着他，感到自豪，跟儿子完全和解了。他母亲默然流泪。他的辩护词使听众情绪激动，以至辩护律师要求暂时休庭，让情绪冷静下来，法庭批准了这个要求。在休庭时，律师和听众团团围住被告席向托洛茨基表示敬意。而托洛茨基则温情地尽力使他母亲对严厉的判决有所准备，因为在儿子周围争先致敬的骚动使她天真地以为没事了。重新开庭时，检察长兴高采烈宣称：被告已给了他所需的证词，不过他也对托洛茨基的正直和勇敢表示敬意。

对证人的质询彻底暴露了政府和警察的暴行和腐败。托洛茨基质问指挥侦察的宪兵将军伊凡诺夫（Иванов）一个问题时，逼得伊凡诺夫承认：在政治警察总部，他的一只装有文件的公文包被人偷走了，这在法庭上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将军解释说：确实是疏忽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163－177页。

大意,任何个人的东西放在那里不加照看,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也总会被人偷走的。尔后,10月13日,一件事像炸弹一样在法庭上爆炸。一个辩护律师收到洛普辛(Лопусин)的一封信,要求召他作证。洛普辛是新近被免职的警察某部门的主管,是一个半自由派,他对自己部门的秘密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他向法庭提交一份他呈送给新任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报告副本。他要证明:去年由于苏维埃采取的措施才使彼得堡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他要证明:煽动大屠杀的传单是在政治警察总部一个办公室里印的,而刚才那个办公室的主任却向法庭作证说从未见过那些传单。他进一步揭发:政治警察自己一直都在组织黑色百人团的匪徒;指挥这些匪徒的实际上是特列波夫将军,宫廷卫队司令定期亲自向沙皇呈递有关这些活动的报告。被告要求传前首相维特、前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Дурнозо)和洛普辛出庭作证。这个要求被拒绝,借口是质询业已结束。若允许警察部门的前主管为被告作证以及把帝国宫廷牵连进去,定会招致沙皇对法官的恼怒。然而,他们拒绝传证人实际上暴露了这次审讯的政治性质及不少其他情况。被告和律师决定抵制继续开庭。

11月2日,在空无一人的法庭上宣读了判决书。关于主要罪状,即暴动,法庭宣告苏维埃成员无罪。但是判处托洛茨基和其他14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褫夺其全部公民权利。

※ ※ ※ ※ ※

1907年1月5日黎明,这些犯人身穿灰色囚服上了路。关于他们动身的日期及目的地,事前都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兴致勃勃地下棋”下到后半夜,刚刚躺下睡着,就被叫醒上路。不过,他们在动身前还是设法私下送出一封给彼得堡工人的“告别书”,对工人

群众与苏维埃的团结一致表示感谢,并重申了革命最终胜利的希望。

这批流放犯,有些带着妻子和小孩,在大队军人押送下经过空无一人的黑暗的街道,走到火车站。政府仍然害怕有人企图劫救他们,因此预防措施十分严密,由于认为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士兵不可靠,押送的军队是从莫斯科调来的。沿途各站都有密密麻麻的宪兵警戒线包围住犯人的车厢,直到押送行程快到终点的时候才告诉犯人流放的地方。尽管如此,犯人们仍受到尊重和照顾。押送士兵公开地表示同情。他们都读了审判报导,当他们得知要押送工人代表到流放地而不是押赴刑场处决时,感到宽慰。途中,犯人的邮件都是由他们秘密投寄的。亏得这种环境,我们才有托洛茨基致谢多娃那些生动描写押解途中情况的信件。[①]

从彼得堡出发,途经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彼尔姆,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秋明。在这里让犯人下火车,而且更换了押送队。他们从这里起坐雪橇向北行驶到托博尔斯克。这支40辆马拉雪橇组成的押送队只在日出到日落之间赶路,因此马不停蹄地走一天也只不过赶20俄里。[②]提防得很紧,黄昏前就不再赶路了,以防有人逃跑。途经乡间星罗棋布的流放犯定居点时,押送队伍总要受到革命歌声和红旗的欢迎致意。这批流放犯到来之前,西伯利亚本地农民中就已流传着传说和流言了,这么强大的押送队伍使人想象这些流放犯是重要的大人物,如失宠的公爵、省长或被解散的第一届杜马的议员。农民们满怀敬畏地看待他们。

---

① 托洛茨基后来把这些信发表在一本小册子《往返记》里,我们的引文均都摘自德译本,这是作为托洛茨基的《1905年俄国革命》一书中的附录发表的。

② 此处有误,应是每天90－100俄里,参见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一书的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第166页。——译注

三个多星期后，犯人到达托博尔斯克，在当地监狱里羁押了几天。在这里告知他们，旅程的目的地是鄂毕多尔斯克的苦役场，位于鄂毕河河口湾边的群山中，正好在北极圈上，离铁路约1700俄里，离电报局850俄里。从托博尔斯克到鄂毕多尔斯克的路途是：向北沿鄂毕河，经萨马洛沃和别列佐沃，越过荒无人烟、冰封雪锁的冻土带和泰加森林。在那500俄里路程内，除寥寥儿所奥斯佳克人的小屋和帐篷以外，没有定居的村落。部分道路还得用马，再向前走，就得换用驯鹿了。这时，这个判处流放的犯人突然震惊地感觉到，与文明世界隔绝已成定局。1月29日，他从托博尔斯克监狱写信给他的妻子，讲到了使他最难堪的是突然强烈地渴望“街上电灯的灯光，电车的丁当声”，特别是在“世界上能提供给他的最可爱的东西——新出版的报纸上的油墨香”。

虽然他在从彼得堡起程之前曾深谋远虑地把一份假护照和钱藏在靴底，但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想到设法逃跑。一是因为政治犯们克制自己不在途中逃跑，以免牵累押送队，二是他考虑到，公众这样熟识他，作逃跑这样的尝试是否太冒险了；流放犯逃跑如果被捉住，就要受3年苦役的惩处。足以证明他这种考虑的是，当他写信给谢多娃讲到他流放的地方时他表示仍希望她带着他俩的婴儿一同到那里去，这个婴儿是他在狱中候审时出生的。为了给谢多娃鼓劲儿，他在信中写道：鄂毕多尔斯克的气候有益于身体健康，有居民1000人，而且他会有机会在那里谋生维持生活的。他还迫切要求她把书籍报刊随身带来或寄到鄂毕多尔斯克来，越多越好。他下决心在北极圈外长期等待，他在这不无抑郁的心情下从托博尔斯克动身到下两个羁留地——萨马罗沃和别列佐沃去。

押送队全速奔驰，经过伤寒流行的广大地区，这里的奥斯佳克人像苍蝇一样死在他们的小茅舍里。2月12日，犯人们被寄押在别列左沃监狱，不过白天允许他们离开牢房走动。在冻土带，正是

暴风雪的月份,警察认为不会有人企图逃跑。

但在别列佐沃,一系列有利条件使托洛茨基改变了主意,他准备逃跑。他遇上一个判处流放的医生,医生教他如何假装成坐骨神经痛患者,这样就可以逃避最后一段路程而留下来,留在监视宽松的当地医院。装病需要很大的意志力;但是如果装得好,就检查不出来。如果他继续上路后再设法从鄂毕多尔斯克脱逃,那就要越过北方的荒原,多走500俄里路。于是他下决心按医生教他的办法在别列佐沃留下来,并找到了一个同情而乐意帮忙的农民。他必须在三条路中选择一条。他来时走过的那条托博尔斯克的路就某些方面来说是最方便的,但走这条路容易被抓住;而越过乌拉尔山脉到阿尔汉格尔和芬兰那条最北的路既危险又困难;因而他选择了穿越没有道路的冻土带,沿索斯瓦河向西南直奔乌拉尔山脉中一个金矿区,那是一条与彼尔姆——维亚特卡铁路线连接的单窄轨小铁路的终点。他的农民朋友为他找到一个本地济良人酒鬼做向导,这个酒鬼认得冻土带的路,会讲俄语和本地土话。他们约定成交:托洛茨基出钱由向导购买路上必需的驯鹿和皮衣,旅程完毕后归向导所有。

日子临近时,托洛茨基假装坐骨神经痛发作已经复原。逃走前那天晚上,他去看了契诃夫剧本的业余演出。幕间休息时,他遇见当地的警察局长,告诉局长说,他已感觉良好,可以继续那段北上的最后路程了。警察局长非常高兴。午夜,托洛茨基不无担心地把自己托付给那个酒鬼向导,向南而去。

他们几乎是日夜兼程,走了一个星期才越过广袤的冻土带,其距离除了“天使长”米迦勒之外,没有人量过究竟有多远。那个向导在冻土带探路,对方向有像野兽一样本能的敏感。他几乎同所有的奥斯佳克人和济良人一样,总是不断地喝酒,喝醉了就睡。眼看雪橇冲进深深的雪堆,又怕后面有人追捕,使雪橇上的乘客恐慌

不已。托洛茨基自己不吃、不喝、不睡，不断推搡那个驾雪橇的酒鬼，拉掉他的帽子让他挨冻，以此使他保持清醒。奥斯佳克人的小茅舍幸而寥寥无几，而且彼此相距很远，他们路过那些小茅舍时，驾雪橇的酒鬼总要停下来，人也不见了。这位乘雪橇的旅客找到酒鬼时，见到他总是同奥斯佳克人及其老婆孩子尽情狂饮，或者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途中，领头的驯鹿扭伤了腿，其余的驯鹿也都疲乏不堪，不得不把这些牲口留下而买新的。这样的事一再发生。因而，托洛茨基只得同奥斯佳克人一起去围捕驯鹿。

尽管困苦和气恼，但活动身体还是使他感到愉快，他睁大眼睛看着白雪荒原惊心动魄的美以及奥斯佳克人小茅舍里生活的丑陋和可怜。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竭力避免睡着，当他们在露天的荒野停下来生火、融雪煮茶的时候，他就坐在火堆边，把他观察到的事物草草记下来，后来写进一本书里。就连这次逃亡的紧张和冻土带的恐怖也未能使他放松调查和写作。他把沿途的地形景色、树木的形态、狼、狐狸、貂、麋鹿及其他野兽留在雪地上的足迹及他和驾橇人谈话；关于土人的风俗习惯（他们最喜欢生吃活鱼，即吃那还能在他们手上蹦跳的鲜鱼）、土人妇女受到的悲惨奴役、猎捕麋鹿、猎人和猎物的动作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一一作了笔记。

当他们临近乌拉尔山脉时，居民点渐渐多起来了，人们爱打听，使他感到麻烦。他装扮成商人，或者装扮成回乡的北极探险队员。当遇到有人硬卖东西给他时或偶然碰上一个人说认识他所说的那个北极探险队中的一两个队员时，他就必须开动脑筋，找出一些听起来合理的回答。不过总算没有发生任何麻烦，最后他终于到达单轨铁路的终点博戈斯洛夫斯克。

过了一天，列车载着他从彼尔姆向西、经过维亚特卡和沃洛格达驶向彼得堡。他后来回忆说：“在那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宽敞的车厢里，我却觉得又挤又闷，我走到车厢间的平台上，那里寒风呼

啸,一片昏暗。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声。"[①] 他欣喜若狂,干出凡是谨慎的人都要劝阻他别干的事:他朝着每个警察特务都认识他的彼得堡驶去。他打电报给妻子,告诉她他到了,要她去途中接他。谢多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电报送到时,彼得堡的报纸还在报导关于被判刑的苏维埃领袖们去北极圈的旅途情况。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1 卷第 227 页。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1907年是沙皇复仇的一年。6月3日事变完全恢复了专制政治,开始了斯托雷平的恐怖统治。他解散了第二届杜马,用一项新法律剥夺了大批人的公民权,尔后才选出新杜马。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革命政党都被击溃,它们的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取缔,无数革命党人遭到屠杀。统治政治舞台的是军事法庭和绞刑架。甚至连新近还抱希望与沙皇达成协议的温和的自由派也都受到迫害和羞辱。米留可夫痛苦地抱怨说:"当人们认为我们身后有赤色力量支持的时候,就邀请我们担任官职,……当认为我们是革命党人的时候,就尊敬我们。但自从弄清楚我们是十足的立宪民主党时,就发现我们毫无用处。"

不久前还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主义影响此刻已经黯然萎缩。在1905年,似乎每个人都同情社会主义;而在此时又几乎每个人都背离了它。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只是寥寥少数,就连这些人也顶不住渗透人心的幻灭和混乱。曾经满怀希望崭露头角的社会民主党人此时又被赶回地下。1905年以前,他们结成秘密小团体比现在怀着失败情绪重返地下要容易得多。他们仿佛重新回到了起点,却没有了原来的信心和勇气。有些人勉勉强强地恢复了秘密斗争,却又希望在6月3日政权许可的范围内公开活动。另外一些人则蔑视对反革命胜利的让步,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从地下继续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其中大部分人要抵制少数公开存在而又摇摇欲坠的社会政治机构。前一种人的立场,即所谓"取消派"立场在孟什维克中占优势,而有些孟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则深信秘密组织的必要性。"召回派"则在布尔什维克中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遭到列宁的反对。列宁竭力要使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结合起来。

托洛茨基认为沙皇统治的复苏不过是两次革命之间的一个间歇而已。他与列宁一样坚持重建秘密组织的活动是必须的;他还极力主张,地下工作者要"渗透"进从杜马到工会等每一个公开的组织中去,以便在内部宣传他们的主张。所以,他既反对取消派也反对召回派。在那沉闷的几年中他仍抱着乐观主义并以非凡的热情继续阐述不断革命的思想。①

然而在1907至1914年之间的几年,却是他的生命史上唯独没有政治成就的一章。他后来写道:"在反动的几年中,我的大部

---

① 参见托洛茨基主编的维也纳《真理报》第1、4、5期编者声明;《致俄国工人书——紧急呼吁》,载维也纳《真理报》第6期;《今后怎么办》,载维也纳《真理报》增刊第17期。

分工作就在于解释1905年的革命以及通过理论研究为下次革命铺平道路。"[①] 他的确解释了1905年的革命,或毋宁说他不断地重复以前的解释。而新的理论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却几乎找不到证据。那几年的著作全是才气横溢的新闻写作和文艺批评,但就是没有一篇政治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然而就是在这种多少有点儿为自己辩护的回顾中,托洛茨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成就可归功于他自己。而在这几年中,列宁在他的信徒们的协助下锻造了他的党,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长了才干,使他们在1917年能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对托洛茨基来说,在1904—1906年间曾经达到的高度,在这个时期他则很少有所增添或者说毫无增添。

斯大林在他还没开始中伤托洛茨基的那些日子里曾说过一段话,这段话给本章提供了一个佐证。斯大林说,当革命冲力增长因而前进时,托洛茨基的力量就显示出来;而当革命失败并必须退却时,他的弱点就变得突出了。[②] 这话倒多少符合事实。托洛茨基具有的精神道德素质使他在现实巨变的紧张和压力下受到最强有力的推动并在巨变中出色地调动他的应变能力。他屹立在宏伟的舞台上是巍峨的巨人,使别人相形之下成了侏儒。他的声音在战斗的呼啸轰响中充分发挥力量;而当面对起义群众时,他汲取群众的希望,分担他们的失望,并把自己的热情和信心传给他们,这时,他的品格驾驭了人们,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也驾驭了事变。然而一当革命退潮,他就无所适从,失去了力量。他可以胜任任何最艰巨的任务,却难以承受其轻。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5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9-331页。

※　※　※　※　※

托洛茨基从遥地的北方归来后,先在彼得堡停留了几天,尔后在警察发现他的踪迹之前就已越境进入芬兰。一批新的革命流亡者陆陆续续向西转移。芬兰是他们停留的第一站。赫尔辛基的警察局长是一位芬兰的爱国者,他很乐于给沙皇的敌人提供庇护所。列宁与马尔托夫已经到达那里。他们热烈欢迎托洛茨基,为他在被告席上的表现表示祝贺。他在芬兰寄居了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他为出版一本描写从冻土地带逃亡的书进行准备。4月底他要在伦敦出席党的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就多方面来说是一次奇特的大会。出席的代表约350人——差不多是1903年大会代表人数的十倍——这是统一的党的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尽管是在斯托雷平政变的前夕集会,但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革命已经失败,相反,在他们看来,党仿佛仍然处于力量的顶峰。党员人数表面上还是很多,不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起进行工作,而且连波兰党和拉脱维亚党也参加了俄罗斯母党——他们迄今与两派都保持距离,不至于与任何一派接近。然而党很穷,穷到不得不向一个自由派英国企业家借钱才能在伦敦的兄弟会堂举行大会的地步。

大会对革命的重大问题——如经济趋势、阶级阵线及历史前景——都公开持久而充分地加以辩论,辩论持续了3个星期。"领袖们的发言长达数小时……简直成了学术讨论会……。"[①]托洛茨基第一次有机会在这种集会上阐明不断革命论。他猛烈批评孟什维克要跟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倾向,主张工农联盟。[②] 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罗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88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72－273、417－418、420－424页。

莎·卢森堡同意不断革命论。列宁两次强调承认:在主张工农联盟方面,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有共同基础。列宁又一次希望把托洛茨基争取过来,但又一次失败。因为当时托洛茨基与两派都保持距离,向双方宣扬团结。他说:"马尔托夫到这里来……大有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竖起一道枪眼儿密布的马克思主义高墙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则回答说:"我们并不害怕……",也威胁要用深沟高垒加强自卫。"马尔托夫同志,你的墙只不过是纸糊的,是用你的争论文字堆砌的——你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用来砌你的高墙。"[①] 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当然错了,分隔两派的"高墙"所用的材料比他想象的要坚固得多,列宁和马尔托夫对于他们的政治方法最终不能和解这一点都有先见之明。而托洛茨基继续争辩说:"如果你们认为分裂不可避免,至少也要等到让事变,而不只是让决议把你们分裂开来。你们不要跑到事变前头去。"

他对待党内两派的态度是以某种目空一切的理性为依据的,因为他是透过不断革命论这面三棱镜去看双方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一致认定俄国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他看来,双方都是错误的,双方的观点都经不起事变的考验。[②] 按严格的理论说,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严格的理论观点未必是最现实的。无论如何,革命的党正是在列宁的鼓舞下组成的,而在马尔托夫鼓舞下的只可能是改良的党。托洛茨基的视线由于集中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就看不到在他眼前发生的分裂了。他自己的理论本应促使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54 - 55 页。

② 大会后不久,托洛茨基在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报纸《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上写道:"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貌早已彻底暴露,而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特征则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才会有暴露出来的可能。"然而,托洛茨基希望新的革命会迫使两派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会像他们在 1905 年事变中一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参见《1905 年俄国革命》第 231 页。

他更接近布尔什维克,但个人友谊的纽带以及他跟列宁昔日争论留下的沉重包袱却使他比较接近孟什维克。

伦敦大会上的一个新问题使旧日的恶感又趋激化。在委员会上,代表们讨论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直在进行的活动,特别是在高加索进行的游击活动及“剥夺”活动。孟什维克愤怒抨击这些活动,说它们即使不是公然的盗匪行径也是在重蹈民粹派恐怖主义的覆辙;他们劝说大会对这类活动加以禁止,而列宁在这次大会的其他方面是拥有多数的。列宁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态度暧昧。他显然仍想利用战斗队在俄国国库运送现金时进行几次袭击,借以取得党在反革命恐怖下进行活动所需的经费。一个不知名的高加索代表(与布尔什维克战斗队有密切关系),名叫朱加施维里-伊万诺维奇——他还没有用斯大林这个化名——始终沉默地坐在那里,等待争论结果,等待列宁的指示。关于这场争论的过程,大会记录里没有一点儿记载,可以得到的只是许多年后写的一些片断回忆。但是尖锐责难布尔什维克的人中毫无疑问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在大会之后不久,托洛茨基甚至还在西欧社会民主党报纸的专栏上发表公开的指责。他一定在大会的休息室里或委员会上发泄过他的愤怒。这样,列宁早些时候承认的他和托洛茨基在基本观点方面的修好和重新试图把托洛茨基争取过来的努力都落了空,而令人难受的诟骂一直持续到大会结束。托洛茨基仍然时而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提议,时而赞成孟什维克的提议,但他有好几次带有恶感地突然大肆攻击列宁,大会记录对恶感并没有提供说明。[①]

① 大会后不久,列宁写信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曾出席大会并曾力图使列宁和托洛茨基和解)说,托洛茨基的行为“像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列宁全集》第45卷第176页。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大会》第506、602、619页和《梅杰姆自传》第187–189页。

继战斗队问题争论而起的是一场关于运动性质的更大争论。所谓的取消派分子力图为反对秘密工作进行辩解,说这是努力用欧洲精神改造俄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争辩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是公开活动的,俄国组织也应如此。由于自从反对民粹派斗争的日子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俄国革命的"欧洲化"视为自己的使命,因此这场争论诉诸党内各派都曾有过的这种强烈的情绪。但这时两派对"欧洲化"一词的意义各有不同的解释。取消派分子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的群众组织、日益发展的议会代表的公开活动、工会的和平谈判,简言之,即在于改良主义的实践。而"欧洲化"对布尔什维克的意义,如同它在开始时对全党来说的意义那样,就是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移植到俄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超越它、如何才能仿效西方社会主义的公开合法方法;俄国这个警察国家,特别是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连自由党都不准许公开存在,更不要说社会主义政党了。如果社会主义只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而法律则听命于胜利的专制统治,那么社会主义实际上就会自我取消。

托洛茨基用他特有的满腔浪漫热情赞扬地下斗争,赞扬地下斗争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但是他对"欧洲化"这个口号也作出过热情的响应。在他看来,"欧洲化"是情感和文化态度的概括,而不是明确的政治概念。他对"欧洲化"的含义从未作过清楚的说明。正如列宁认为的那样,这明确地表明托洛茨基厌恶秘密组织的"严峻无情"。他知道,在沙皇统治下,有广泛基础的公开的工人运动纯属空中楼阁。但他渴求两全其美,希望看到西方社会主义的广泛民主及宽容精神能灌输到俄国的地下组织中来。他希望秘密组织给基层群众"自主活动"(主动精神)的余地,西方的工人党显然是能提供这种余地的。然而,任何秘密运动与公开活动的政

党相比,必然是狭隘而严格的。说实话,它不可能有广泛的基础,秘密运动确实不能放松领导施加于组织成员的纪律,不能听任群众也有如正常政党可能有的(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有的)首创与"自主活动"的自由。列宁有理由坚持认为:就是按托洛茨基所希望的,而不是按取消派所希望的意义上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欧洲化",也意味着党的瓦解。

※ ※ ※ ※ ※

要求欧洲化的呼声最强烈的当然莫过于托洛茨基。比起任何其他流亡者来,他则是最"欧洲化"的,大多数流亡者都在封闭的圈子里生活,他们热中于俄国的事,不受居留国生活的影响。托洛茨基不是这样。由于具有犹太人对流浪生活的适应性和接受思想快的特点(尽管这些也绝不是犹太人独有的特点),他生活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都感到如在家中一样自在。他热情地关注那些国家的事务,用那些国家的语言讲话和写作,参加那里的工人运动。

1907年的夏天大会以后,托洛茨基从伦敦到达柏林,他的妻子谢多娃和他们的男孩已在柏林等待他了。在那里他受到德国社会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已遐迩闻名:他在苏维埃、在被告席上的表现已经引起人们的赞赏,德国的期刊也已经译好并发表了他的文章。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帕尔乌斯把他介绍给卡尔·考茨基,当时,考茨基作为欧洲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教皇",其影响正处于巅峰。托洛茨基常常回想起那次访问时他的欣喜之情以及"满头皓发、目光明亮"的考茨基留给他的非凡印象。他想不到有朝一日考茨基会成为最激烈地批评十月革命的人,会成为他本人毁灭性攻击的对象。尽管考茨基这位大师思想"枯燥而生硬"、相当平庸、不会审时度势,不久就使托洛茨基感到

失望,但在那几年中,托洛茨基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仍然拜倒在考茨基的脚下,考茨基的家是他在柏林时常去的地方,而且他参加了"教皇"核心圈子的亲密聚会,在那里他见到了倍倍尔,那是一位勇敢对抗俾斯麦的先驱,德国社会主义在其领导下经历过多年的迫害后似乎进入了黄金时代。他在那里还见到累德堡(Ledebour)、哈阿兹(Haase)及其他领导人,他使这些友谊和接触转化为有利于政治的优越条件,他在考茨基主编的月刊《新时代》和极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前进报》上经常介绍俄国社会主义的实情,从他的角度说明其内部分歧。[①] 他置身于俄国争论的两派之外这一事实使他受到德国人的欢迎,这些德国人对俄国纠缠不清的争论莫名其妙,都不愿卷入。[②] 托洛茨基的文风灵活,有吸引力,是欧洲式的;他对德国读者的吸引力是俄国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可企及的。另一方面,他的德国朋友也不时地给他办的俄文流亡报纸写稿,这有助于抬高报纸的身价——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是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母亲、导师和活的榜样"。

奇怪的是,与托洛茨基联系最紧密的并不是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这些未来的德国共产党创始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而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外貌而实际上是把党引向屈从于霍亨索伦的帝国主义野心的中间派。更奇怪的是,德国激进派绝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对应党派。他们对大多数重大问题的态度和托洛茨基一致,他们对党的统一也十分珍惜,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一翼的代表,他们反

① 列宁给信徒们的一封信中曾抱怨说:"托洛茨基之流这样写,德国人也就相信他们,总之,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可以随心所欲。"《列宁全集》第46卷第90页。

② 这几乎是所有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例如饶勒斯曾告诫过《人道报》编辑部人员不要发表来自俄国党或和俄国党有关的任何东西,否则,来自对立双方极难搞清的无穷声明会使报纸难于应付。莫里茨:《列宁与托洛茨基》第101页。

对德国工会散播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改良主义。在所有欧洲社会主义人物中,在出身、气质、政治和写作才能方面跟托洛茨基相近的也莫过于罗莎·卢森堡了——1932年斯大林在她死后攻击她是"托洛茨基分子",并非毫无理由。这两人在最近的伦敦大会上、尔后又在斯图加特国际大会上都发现他们是一致的,卢森堡在斯图加特国际大会上曾代表反对军国主义的左派发言。她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总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她和托洛茨基一样希望看到俄国运动的"欧洲化",而同时她本人又试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吸取一些俄国的革命理想主义。他们有时在考茨基家相遇,但相互之间十分冷淡,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相似了,所以彼此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热情真挚,然而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也没有引起托洛茨基的注意,这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使他感到遗憾。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显其政治气质的弗兰茨·梅林此时却热中于历史及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这些工作却有点儿远离托洛茨基所关注的问题。

以后的7年,托洛茨基一直住在维也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1912年曾在那里拜访过他的一位美籍俄国社会主义者曾写道:"他在维也纳的家是一个穷人的家,是一个比普通工人更穷的家。……他住在……近郊的工人居住区……他的三个房间里,家具简陋,根本谈不上舒适。他身着廉价服装,使他在中产阶级的维也纳人的眼中有失'体面'。我去他家拜访时,看到托洛茨基夫人在忙家务,而两个浅色头发的可爱男孩则得不到一点儿照顾。唯一使房间增色的东西是堆满角落的书籍。"[①] 这位客人对他贫穷的印象也许有些夸张,尽管托洛茨基一家生活非常节俭,正

---

① 参见M.J.奥尔金为托洛茨基著的《我们的革命》美国版所作的《传记注释》第18页。

如我们看到的,有时深受贫穷之苦,但比起大多数流亡者来,他的境况还是不错的。整整这几年托洛茨基都用安季特·奥托这个旧笔名写作,同时他还担任读者众多的激进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驻维也纳的记者,并且至少经常为六家俄国、德国及比利时的报纸写稿。[①] 他的有钱的父母帮助养育他初婚生的两个女儿,而且曾几次到国外来看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的父母帮助过他。那位美国客人所说的两个男孩,一个是列夫(廖瓦),这是第二次结婚生的大儿子,生于1906年,当时托洛茨基正在狱中;另一个是1908年生于维也纳的谢尔盖(谢辽沙)。

无论如何,这个家庭过的是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托洛茨基这位革命雄狮是一位挚爱妻子的丈夫,钟爱子女的爸爸。他一心帮助妻子既能追求她的艺术爱好又能介入俄国侨民的政治生活,在家务、带养孩子上,他也帮忙。后来孩子上学时,他又按时辅导孩子做作业,甚至在举家移居巴黎以后,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他也抽时间帮助他们。[②] 至于谢多娃,她在维也纳重新开始对她丈夫进行艺术教育,这是她从1902年在巴黎时就已经开始的,当时连初步成就都未取得。夫妇俩一起在布格希洛斯和维也纳美术陈列馆收藏的丰富的美术作品中度过了不少日子。显而易见,他对艺术的兴趣正在增强:他常去巴黎、伦敦或慕尼黑,他会从秘密的政治集会上偷偷溜到卢浮宫、泰特美术陈列馆及其他收藏美术作品的地方;在这一时期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为《基辅思想报》写的维也纳年度美术展览的评论中,表明他对欧洲美术思潮的评价较

① 他在这几年中,除《基辅思想报》外,还不定期地为下列各报写稿:《光明报》、《时报》、《敖德萨消息报》(这份报纸的发行人就是他表哥施宾策尔)、《新时代报》、《前进报》、布鲁塞尔的《人民报》。

② 阿·罗斯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洛茨基》,载《新国际》1950年第9－10期。

之美术爱好者已略胜一筹。由于政治和新闻写作只需用他的一部分时间，因而他还扩大了他对法国、俄国小说以及德国诗歌的已然十分广泛的了解，这在他当时的文艺论文中也反映了出来。

德国警察局拒绝他定居柏林以后，他不得已住在维也纳。他渴望住在德国社会主义的活动区域以内，就这个意义来说，维也纳是仅次于柏林的地方。他在维也纳观察德国的冲突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的雄心。维也纳虽然多少带点儿外省气，但直到弗朗西斯·约瑟夫的统治结束时仍然是一个欧洲的精神中心。在政治方面，维也纳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自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打破了这个几乎是天主教帝国中的教权主义的绝对统治。在文学方面，有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s)及其他文学家，他们对19世纪末过敏的性意识及死亡意识倾向作过贡献。在艺术方面，直线派能适度地反抗学院派的保守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粗野。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及其激进派中并不缺乏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可靠鉴赏力的人，尽管这些优点与性格坚强或目的性不能相提并论。也许当时维也纳只有心理学方面产生过划时代的东西：弗洛伊德的伟大思想正开始支配这一领域。至于其他方面，如法庭、议会、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文学艺术团体与派别的状况都可在维也纳舒适的咖啡馆生活和闲谈中反映出来，而且常常因为机智、诙谐、不着边际的空谈而轰动一时。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用轻蔑、嘲弄的语调描写过这种环境。但当时他写的文章强有力地表明，他非常欣赏维也纳适度兴奋的气氛。他投入当地的生活，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访问它们的俱乐部，参加集会并给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撰稿。当地的文学艺术活动使他激动，他有时也顶不住咖啡馆的诱惑。几年后，作为革命胜利的领导人、改良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他给奥地利马

克思主义的领袖们画了一幅置他们于死地的肖像。他住在维也纳期间,对他们还不算太严厉,而他们的友谊也还使他感到满意。他热烈赞赏过维克多·阿德勒这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父,因为他在阿德勒家里跟在柏林的考茨基家里一样受欢迎,他热忱、满怀爱戴之情地反复为俄国读者描写维克多·阿德勒。[①] 他喜爱维克多的儿子弗里德里希,这是个叛逆成性的年轻人,是党的宠儿,他担任《战斗报》的编辑,日后为抗议世界大战而杀死了奥地利首相斯裘尔克(Stürgkh)男爵。[②] 友谊的纽带还使托洛茨基与鲁道夫·希法亭(Roudlf Hilferding)结交。希法亭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袖。正当托洛茨基在维也纳郊区希特尔多夫住下时,希法亭正在撰写或完成他那不朽著作《金融资本》,这确实是从马克思逝世以来使《资本论》成为现代理论所作的唯一雄心勃勃的努力。(列宁曾利用希法亭的这一著作证明他的革命政策的正确,而作者本人却当上了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正是希法亭把托洛茨基介绍给奥地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与总统卡尔·伦纳(Karl Renner),介绍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少数民族专家,未来的外交部长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并介绍给几乎所有其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袖。托洛茨基写道:"他们都很有教养,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比我学识渊博。在中心咖啡馆初见他们时,我怀着强烈的兴趣,几乎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了他们的谈话。"[③]

但是托洛茨基也渐渐意识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不同;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0页及以后各页。

② 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曾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说成是他"思想上的同志和朋友"(《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33-36页)。1919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提名弗·阿德勒为第三国际名誉书记。当阿德勒对他们掉头不顾时,使他们大失所望。后来,阿德勒成为第二国际书记。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37页。

他们是学院式的、过于世故的怀疑论者,毫无气概;而且他感觉得到他们以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他们内心的优越感,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他的革命热情的。他看到在这些思想家和领导人的后面有“一大群为同一目的集结在一起的奥地利青年政客。他们加入这个党是由于坚信:精通罗马法就会给人支配工人阶级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①] 但是他相信,在关键时刻社会主义的英勇精神会克服领导人的怀疑主义和党内人员的机会主义,并相信当革命到来时定会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卷入革命,就像曾把孟什维克卷入革命一样。显然,他把他的朋友错看成革命家,正像他的朋友喜欢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一样。[②]

托洛茨基仰仗这些友谊的支持,常常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发言人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他成为第二国际集会上的常客,他在那些集会上结识的先驱人物有饶勒斯(Jaures)、盖得(Guesde)、凯尔·哈第(Keir Hardie)、麦克唐纳(MacDonald)、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和屠拉梯(Turati)。饶勒斯的品格使他着迷,尽管饶勒斯是改良主义者,而使他着迷的是“饶勒斯的天赋的纯真和激情”,是“其如火山爆发般的道德激情和能集雷霆万钧之怒的天分”,此外他还着迷于其演说的才华——虽比起他自己的口才来典雅过之而昂扬不及,但却那么相似。在这些集欧洲社会主义所有人才于一处的集会上,托洛茨基比较过各种不同的演说风格。例如,他注意到他后来讥之为庸人的王德威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2-13页。

② 下列事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说明:到1917年底,当奥地利外交部长切尔宁伯爵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托洛茨基进行停战谈判时,曾跟维克多·阿德勒谈过一次话。“阿德勒在维也纳对我说:‘您肯定会同托洛茨基相处得很好’,而当我问他为什么认为会这样时,他回答说:“啊,您知道,您跟我一起相处得很好嘛。”O.切尔宁伯爵:《在世界大战中》第234页。

尔得的"沉着冷静及其精雕细琢的风格和温文尔雅的姿态",或者分析维克多·阿德勒强烈的演讲效果。他说阿德勒"从来不会控制他[颇为低弱]的声音,毫不吝惜地浪费嗓音,因此到演讲结束时,他总是咳嗽,而且嗓子也哑了"。但是无论在全会、委员会或公众集会上,饶勒斯的演讲使托洛茨基听起来"每次都像初次听他讲话一样",因为"他(饶勒斯)能移山倒海般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可他本人从不被震聋。他又像沉重的铁锤一样能锤碎岩石,或者能在极薄的金片上进行无限精密的加工"。[1] 托洛茨基曾描写过这位伟大的法国人,发表了独到的看法:"有时,俄罗斯黑土草原上的人在饶勒斯身上只会看到做作的技巧训练和仿古的朗诵。但这样的评价不过暴露我们俄罗斯文化本身的贫乏而已。"

托洛茨基愈是沉浸于 1914 前的欧洲气氛中,俄罗斯文化的"贫乏及粗野"感就愈发使他难受,愈发使他断然坚持要把使用长柄大钐刀的俄国人改造成"十足的欧洲人",这正是社会主义的部分使命,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以此为使命。1912 年他在给《基辅思想报》撰写的一篇论俄国知识分子的出色文章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思想,既展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弱点。《基辅思想报》的主编在发表这篇文章前曾踌躇过好久,因为即使是激进的报纸也会认为这篇文章可能对俄罗斯人的自尊心伤害过重。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伊万·拉祖姆尼克(Иван Разумник)的一本名著,书中赞美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卓越品德及其历史作用,托洛茨基在对此书的批评中详细阐述了他早些时候提出的若干关于俄国历史的观点,努力说明俄国知识分子在广阔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作用。

他写道:"由于一千多年积累的穷困,我们现在是贫乏的。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8 卷第 13、19、30 – 31 页。

……历史把我们俄国人从她的袖管里抖落到艰难的环境里,使我们稀疏地分散在广漠的原野上。"只有像利维坦式的国家才能保卫这一广漠原野免遭亚洲人的入侵,才能顶得住富强的欧洲的压力。利维坦这只巨大海兽为喂饱自己而使全国挨饿,摧残了社会阶级与制度的生长,使文明衰退萎缩。"俄罗斯人民受贵族和教会的严重压迫并不亚于西欧人民,但是,在欧洲封建统治基础上成熟的那种复杂完美的生活方式——那里有封建主义的哥特式精致建筑——在我们的土地上却不能成长。我们无力提供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缺乏生活必需的物质基础。……我们在粗陋的小木屋里住了上千年,木屋的壁缝里都长满了苔藓——难道我们会去梦想圆形拱顶和哥特式高耸的尖顶吗?"

他继续写道:"我们的贵族多么可怜,他们的城堡在哪里?他们的马上比武大会又在哪里?他们的十字军、持盾武士、游吟诗人和侍从呢?他们的骑士爱情呢?"俄罗斯的贵族粗鄙、野蛮、庸俗。俄罗斯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净化经历,因此对西方市民的"人的人格一无所知,而市民的人格就是力争在自身和上帝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镇——第三等级的石砌摇篮里,发展出了各种各样引人注目的文化类型,在那里孕育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手工业、行会、自治城市、大学、学术大会、选举、游行、庆祝会和辩论等都是自治的宝贵习惯的结晶;正是在那里形成了人格——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人格,但毕竟还是人格,而不是每个警察可以拳打脚踢的猪鼻子。"第三等级,随着本身的发展而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新的人际关系和自治习惯从市镇自治机关转变为整体的民族国家。俄罗斯的城镇却相反,那些生长在"俄罗斯农村肌体上的军事—封建的赘疣"却没有为资产阶级进步创造一个起点。在彼得大帝统治下,监护手工业的是警察部门,但由警察部门监护是不会发展出真正的城市文化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幸境

遇又补充了封建传统的残暴性。

然而,国家所需要的是受过教育的、欧洲化的人才,但又害怕他们。沙皇给知识分子以强制教育,但同时继续……用鞭子抽打他们。"旧特权集团中的青年分子……一旦进入阳光普照的欧洲思想意识领域,几乎都毫不踌躇、不可阻挡地冲破封建主义和所承袭的东正教的樊篱。"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得不用最极端而且最昂贵的手段捍卫自己最起码的权利。"仿佛要用钟表把钉子敲进墙里去……这就成为他们的历史呼声。"一个俄国人要证明按照自己的选择决定的婚姻是对的,就必须成为达尔文主义者;他要为渴求教育辩护,不能不引用革命思想;如果他要求的是一部宪法,他只有求助于社会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都是激进主义者,但也只是仿效西方,采用西方的现成制度、学说和纲领。在托洛茨基写的一段话里,并不完全公道地把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和文学都说成是死水塘里的产物,他说:"我们的社会思想史迄今为止尚未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通道,甚至尚未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有一锥之地。难道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可怜安慰吗?……历史真实是民族自豪感的侍女,我们宁可把我们的自尊心付诸将来,不要寄予过去。"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他们艰苦斗争的全过程中没有得到社会主要阶级的支持,只是在国内孤军作战。这一点形成了他们的特点。他们"生活在可怕的道义压力下,生活在专心一意的苦行主义中……"。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自负、"思想的狂热、无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划界、不信任和怀疑以及对他们自身的纯洁性保持警惕"等作为代价,也就是说以造反的正统观念去反对钦定的正统观念为代价,去换取道义上的自信和坚定。因此,他们逐渐表现出"对文学的热情,也就是有时在我们的知识分子激进派中可以看到的那种热情"。知识分子往往不得不作为未成熟的、消极的社会力量的代

理人,这正是他们的不幸。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待这种"取代主义"现象,1904年他同列宁争论时曾第一次写到这个问题。[①] 他当时看到知识分子的"取代主义"现象像一条线索贯穿俄国的历史。首先,1825年起义的十二月党人是尚未诞生的中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尔后是民粹派力图为默不作声的农民说话,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命为刚刚觉醒、尚未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发言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阶级的概念比阶级本身更为重要。托洛茨基用更有希望的语气总结了这种悲观的观察,他说,1905—1906年的革命已使工人群众行动起来了,此后,没有人再能做他们的代理人:这是取代主义的结束。[②]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一乐观的结论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正确的成分有多少。取代主义在革命以后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再度出现,而且不可抗拒,因而在很长的时间内阶级的概念比阶级本身更重要。托洛茨基在此如此精辟领会的俄国历史上一些其他长期的倾向在革命以后同样也以压倒之势趋于表面化。与我们所说的这一时期更为有关的是:托洛茨基把"阳光普照的欧洲思想意识领域"——西方文明中的"圆形拱顶"和"哥特式高耸的尖顶和雕花门面"同俄国历史上的原始"小木屋"进行对比,差别就格外悬殊了。这一对比在其结论部分和有关当代部分说得太过分了,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并未夸大,倒是很真实。1914年之前,欧洲文明中的雕花门面掩盖了自毁和内部衰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现在则在连续两次的世界大战中、在法西斯与纳粹主义病症的发作中、在西欧工人运动软弱和退化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对使19世纪与当代俄国沸腾起来的创造性能量并不公平,而他的人格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327-342页。

和能动性正是和这些能量结合在一起的。他有时似乎把俄国的过去和现在几乎看成真空。这就是他强调要求欧洲化时所显露出的弱点,也是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方面的一个缺点。而列宁却如实地看待俄国的现实,同时着手改变现实,这正是列宁的力量所在。列宁的党深深扎根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它在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无情中、在震撼世界的英勇中、在原始的残暴中去汲取这片土地所能生产的一切。布尔什维主义有其自己的思想家、自己的列宁和布哈林及其他人。他们从欧洲社会主义中汲取凡是能够移植到俄国来的所有内容;但党也有它顽固暴戾的中央委员,它的斯大林们,他们在半欧洲半亚洲的无产阶级的深处活动,欧洲化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　※　※　※　※

托洛茨基并没有而且也不能真正放弃俄罗斯简陋的"小木屋"。1908 年 10 月,他开始主编那份被称为维也纳《真理报》的报纸。这原是一个名叫斯皮卡尔的乌克兰孟什维克一个小团体出版的一份微不足道的报纸,已经完全办不下去了,报纸的出版人希望托洛茨基能给报纸注入新的生命力。托洛茨基编的头几期仍然还有这个乌克兰团体的痕迹;但在 1908 年底,该团体自行解散,让托洛茨基做《真理报》的唯一主人。因为没有钱,《真理报》根本无法按期出版——他主编的第一年只出版了 5 期。[1] 但是要把报纸秘

[1] 这是当时所有流亡出版物的共同命运;其中大多数甚至出版得更少。参见 H. 波波夫:《苏共党史纲要》第 1 卷第 233 页。托洛茨基编的《真理报》现在一般都称为维也纳《真理报》,以区别于很晚才开始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维也纳《真理报》最初是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勒沃弗(Lvov)出版的,到 1909 年 11 月第 6 期时才迁到维也纳。

密运进俄国比出版还难。编者常常求助于读者,诉苦说"好几普特"的《真理报》因为缺少50个卢布而滞留在俄国边境上不能运进,或者诉说新的一期稿子堆在他的桌上而无法付印,或者诉说《真理报》因为无力付邮资而不得不停止与俄国国内的读者通信。[①] 托洛茨基从其他报纸所得的稿费都用做这份小报的经费;他卖掉自己的书,他的妻子拖着沉重的脚步上当铺,这样才使那几普特的《真理报》终于得以送过边境;幸有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借给他1000卢布,偿还了一些债务,才能使托洛茨基夫人赎回部分典当了的东西,使《真理报》有两三个月得以每两个星期出版一次。但后来两期之间的间隔又拉长了,双周刊变成月刊,再往后,几乎变成了季刊,直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或是其他一些好心人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资助才使《真理报》摇摇欲坠的财政得以暂时好转。1909年整整一年,托洛茨基力图争取得到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资助,但都落了空。列宁同意资助,但唯一的条件是托洛茨基必须接纳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共同编辑《真理报》。因为托洛茨基不愿接受这个条件,列宁不许他的追随者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印刷所里承印托洛茨基的《真理报》,除非它严格履行商务条款。[②] 尽管《真理报》有这些困难,尽管出版不定期,但它在俄国还是引起了反响,而且不久,保安机关暗探的秘密报告中已注意到这份"销路极好"的报纸。[③]

《真理报》有一支不寻常的撰稿者队伍。青年大学生斯柯别列夫(Скобелев)当时是托洛茨基的得意学生,担任该报的秘书——

---

① 《真理报》第3、5期。

② 《列宁全集》第45卷第239页。

③ 《保安处布尔什维克卷宗》第1卷第42页。

后来斯柯别列夫作为第四届杜马的孟什维克派议员而驰名;1917年他成为克伦斯基政府的劳动部长。托洛茨基的助手谢姆柯夫斯基(Семковский)也是一个孟什维克,当时党内争论中常出现此人的名字;梁赞诺夫(Рянзанов)是未来马恩研究院的创建人,他不向任何权势弯腰,是一个倔强的反抗者,他当时站在两派之外,是该报的固定撰稿人,也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负责为《真理报》同俄国地下活动联系的是乌里茨基(Урицкий),他以前是孟什维克,因在沙皇监狱中表现镇定勇敢而出名;1917年,乌里茨基是十月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时他作为特别人民委员解散了立宪会议。在这支队伍中有孟什维克维克多·科普(Виктор Копп),后来他显示出灵活而爱冒险的外交家特点:1922年他在幕后准备苏德拉帕洛条约,而在30年代他为斯大林秘密试探过与希特勒达成协定的可能性。

这支小队伍中最有创见的人物是阿道夫·越飞(Адольф Иоффе)。他是一个年轻、有能力但神经过敏的犹太卡拉教[1]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时间分别用于学术研究、给《真理报》写稿以及进行心理分析治疗等方面。托洛茨基通过越飞结识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越飞是阿德勒的病人),对心理分析学逐渐也发生了兴趣,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具有的共同点比马克思主义者准备承认的要多得多。[2] 越飞在维也纳同精神崩溃的复发进行殊死斗争,而他在病痛中艰苦写成的稿子都需要编辑大加改写。托洛茨基尽力帮助他,使他增强自信心。1917年,越飞是十月起义及后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停战谈判中的主要角色之一。

---

① 卡拉教是主张放弃犹太教义回到真本福音书的一个中世纪犹太教派。

② 革命后,托洛茨基要求布尔什维克学者对弗洛伊德学说中新揭示的内容采取虚心态度。《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23－432页。

(托洛茨基在他的私人文件上曾说,革命"对越飞所患综合症的治疗作用胜于心理分析"。)[1] 越飞用最大的献身精神报答托洛茨基对他的友谊,1927年,他以自杀抗议布尔维克党开除托洛茨基。

总的说来,《真理报》在托洛茨基所办的报纸中不是重要的一份。他要亲自对"普通工人"说话,而不是对有政治头脑的党员说话,而且,他是为他的读者服务,而不是领导他们。[2]《真理报》的平易语言和它对党的团结的宣传无疑使它享有一定的声望,但却没有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那些为一个派别或集团说话的人,往往本人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复杂的争论,往往是对运动的中上层而不是对下层群众说话。另一方面,那些说党应紧密团结党员群众的人尽管其说法各有不同,但跟托洛茨基一样言之有理并肯定有感染力。但这种感染力往往是表面的。他们的对手争取党的干部支持其更复杂的论点,毕竟也很可能会同样得到群众的倾听;干部们又用简单化的方法使那些论点更深入下去。托洛茨基关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的号召一时曾受到不少人的鼓掌欢呼——甚至连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也翻印托洛茨基出版的《真理报》。但是当时鼓掌赞成的那些人最后却不顾团结的呼吁而去追随这一派或那一派,使呼吁团结的人陷于孤立。除此之外,在托洛茨基博得群众欢迎的态度中,在他对语言平易的强调和他的"服务而非领导"的诺言中并非仅仅是蛊惑性宣传的点缀,因为对于政治家特别是革命家说来,对其听众的最好的服务就是领导他们。

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表达党内仍然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把这种情绪称为对最终分裂的恐惧,是最恰当的了。1910年1月,两派的领导人在巴黎开会,最后一次试图弥合他们的分歧。两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真理报》第1期。

派中都有人决心要把事情闹到最后关头而分手。但双方的温和分子当时还占优势。在布尔什维克派内占优势的调停者是李可夫(Рыков)、索柯利尼柯夫(Сокольников)、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及加米涅夫。[①]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致力于统一，继续制止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后来承认，他之所以让步只是因为孟什维克还太软弱，因而不能去冒马上分裂的危险。[②] 协议达成了；但这即使从表面来看也是过于完美而不可能成真。两派都答应解散各自的组织而合并起来；双方都同意清除他们中间的"极端分子"：孟什维克开除他们的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开除他们的召回派。双方还进一步同意停办各自的刊物，并把他们的资金放在两派共有的金库里，委托3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保管。撮合成功的托洛茨基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受到各方的赞扬。中央委员会正式承认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不顾派别斗争"对全党所作的贡献，并决定以党的权威支持《真理报》，每月给托洛茨基150卢布的定期补助，另外还用其他一切方法支持他。委派托洛茨基的妹夫，布尔什维克派的加米涅夫为中央委员会驻《真理报》的联络员。估计这一任命是为使合作顺利，因为加米涅夫曾真诚地努力克服党内分歧。

不难想象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宣布这一切时的喜悦之情。[③] 然而，几个星期后，他不得不表示，为调解所作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因为——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拒不解散他们的派别，这一点并没有使他大为吃惊，他一向知道他们向布尔什维克妥协是非常勉强的。而这时布尔什维克则已停办了他们自己的

① H. 波波夫：《苏共党史纲要》第1卷第248页。

② 马尔托夫：《是救星还是灾星》第16页。

③ 《真理报》第10期。

刊物。这本是托洛茨基这位统一战士不遗余力地指责违反统一的人的机会,然而他在《真理报》上却"迟迟不判",只是温和地暗示不同意孟什维克的行径。[①] 加米涅夫敦促他采取更坚决的态度,但也是徒然。托洛茨基却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侵犯他主编的独立性,是企图利用《真理报》达到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接着是不可避免的争吵,转眼间,所有流亡侨民区都在大耍阴谋。

巴黎会议决定:与党内的极端两翼——取消派和召回派脱离关系。孟什维克答应不跟前者打交道,而布尔什维克则答应不跟后者来往。列宁不难遵守他那一方的诺言。无论如何,他已把主要的召回派分子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党;孟什维克则相反,简直不可能履行他们的义务。持取消派立场的人在孟什维克队伍里太多,使孟什维克无法认真地与之切断关系。如果他们把反对地下斗争的人都开除出去,只会削弱他们自己的势力而助长布尔什维克的优势。这是他们不肯干的。于是争论便以如下形式出现:布尔什维克认为,反对与党的前途利害攸关的秘密活动的人不能留在党内;而孟什维克——即其中反对取消派的人——则回答说,党内应该有持不同意见者的位置。列宁对可以允许不同意见这一总的原则并无怀疑,只是认为持这一不同意见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反对秘密工作的人不可能是有效的秘密工作者。鉴于从某种角度可以把这一分歧看做是维护纪律者和捍卫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的人之间的分歧,那么托洛茨基采取的就是反对维护纪律者的立场。这样一来,他就陷于明显的自相矛盾中。他作为争取统一的战士,却为了持不同意见的自由而默许孟什维克在党内制造新的分裂。曾因满腔热情地赞扬地下活动而堪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他,却与那些视地下活动为危险畏途而急欲摆脱的人握手

---

① 《真理报》第12期。

了。最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死敌却同那些赞成与自由主义联盟的人联盟,一起反对那些激烈反对这一联盟的人。

持这样自相矛盾的立场只能导致托洛茨基失败。布尔什维克再次认为,托洛茨基不但是一个对手,而且是奸诈的敌人;而孟什维克尽管因有托洛茨基这样激进而有阅历的人物反对列宁而高兴,却也把他看做是一个不可靠的同盟者。他与马尔托夫长期密切的交往使他不只一次对令他非常反感的孟什维克的行动视而不见。他同列宁长期的激烈争吵竟使他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每一个易受攻击的细节都吹毛求疵、抓住不放。他常用伤感情的挖苦讽刺公开地非难列宁主义,而他对孟什维克的厌烦大多数只在私下的争论或"抱怨的"通信中吐露出来,在这些场合下他才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加以痛斥。因此,他在公开和私下判若两人。这种情况持续愈久,他愈成为马尔托夫的政治俘虏。马尔托夫的书信说明了这点:

> (马尔托夫有一次曾写道,)我曾在一封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讽刺的信中答复他(托洛茨基),虽然我承认我并非没有伤害过他的自尊心,但我给他的信中曾写道:他逃避不了取消派和我们,因为,迫使他维护取消派分子留在党内的权利,并不是因他的宽宏大量……而是正确估计到列宁要吞没取消派分子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独立的人。①
>
> (马尔托夫在给另一通讯者的信中写道,)事物的逻辑迫使托洛茨基循着孟什维克的路子走,尽管他在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之间进行某种"综合"时有其言之

① 《阿克果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30页。

成理的种种借口……但是他不但已发觉置身于"取消派阵营"，而且还迫使他对列宁采取好战的态度。然而，这连他的门徒们……也都感到焦急不安。[①]

1910年夏，托洛茨基与中央委员会彻底决裂。在托洛茨基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另派联络员接替加米涅夫之后，加米涅夫离开了《真理报》；接着，中央委员会撤销了对《真理报》的资助。[②] 这时，带头分裂统一运动的人不是马尔托夫而是列宁了；托洛茨基则谴责说"(布尔什维克)流亡集团阴谋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指责说"列宁集团要使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也就是自绝于党"。[③] 他把争论带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去，他写道，没有一个流亡的领袖代表俄国真正的革命运动，俄国的真正革命运动是渴求统一、憎恶阴谋的。其实，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中间的共同观点，就连斯大林在高加索也是用类似语气写文章的。[④]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的文章还是在党的代表中引起争执，这些代表们是在1910年10月来到哥本哈根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在俄国代表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在列宁的支持下要求给托洛茨基以纪律处分，而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则充当了他的辩护人。被告没有受处分——就连原告也一定认为在"兄弟的"德国报纸上发表意见是不便给予处分的。

长期的斗争并非没有喜剧性的插曲，至少其中之一也许在这里可以说一说。两派都设法收回存在德国托管人那里的经费，但

① 《阿克里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33页。

② 《真理报》第20期；《列宁全集》第19卷第368页。

③ 同上，第21期。

④ 《斯大林全集》第2卷 第146－158页；伊·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104－106页。

因为某种原因,双方都不能提出一个正当的理由。1911年夏,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前往耶拿,代表孟什维克去跟经费的托管人打交道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那里举行代表大会。[1] 托洛茨基当然希望:如果帮助孟什维克取回经费成功的话,则《真理报》的经费也得以恢复。考茨基显然赞成这一计划,但其他两位托管人的态度并不可靠;其中,蔡特金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会见考茨基非常秘密。阿克雪里罗得向马尔托夫报告说:"星期二K(考茨基)才有机会向我和T(托洛茨基)提出在什么地方见他并作一次初步的私人交谈……哈阿兹选定一家餐馆作为会见的地方,在那儿可望不至被其他代表,尤其是那些亲近蔡特金和卢森堡的代表察觉。……第二天,在K和Z(蔡特金)商谈同我们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后,他和哈阿兹要求我和T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告诉Z……。"[2]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部分存款已被布尔什维克突然取走据为己有。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对此非常愤怒,予以指责。孟什维克企图通过一位德国长辈托管人的帮助精心策划夺回布尔什维克拿走的那笔存款,但毫无结果,代表们拿不到"金羊毛",空手离开德国。

1912年初,分裂终成定局。列宁在布拉格会议上宣布尔什维克派为布尔什维克党。[3] 孟什维克派和少数几个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来的小团体在所谓组织委员会的名义下联合反对列宁。托洛

---

①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到他要就沙皇迫害芬兰人问题在大会上发言。大会期间,传来奸细巴格罗夫在基辅刺死斯托雷平的消息,德国人害怕在他们的讲坛上出现一个俄国革命家,会引起外交上的复杂问题并招致镇压,所以,倍倍尔说服托洛茨基放弃在大会上发言的打算。

②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17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452-453页。

③ 除布尔什维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个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小派别。

茨基在《真理报》上卷起一阵狂飚，攻击列宁的冒险行动。[①] 4月间，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新出版的一份日报也取名为《真理报》时，托洛茨基的愤怒达到极点。这是无耻的剽窃，显然是布尔什维克打算利用托洛茨基编的《真理报》的声誉。他猛烈攻击小集团的“盗用”和“篡夺行径”，而“这个小集团是与党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它只有在混乱中才能生存、兴旺”。他要求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编辑在指定时间内改换报名，并有意威胁说：“我们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静候答复。”[②]显然，他直接给布尔什维克编辑部送过类似的最后通牒。但是他哪里知道，在彼得堡开办这份敌对报纸并发行第一期报纸的人原来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也就是这个人后来用类似的手法剥夺了托洛茨基的比《真理报》主编更高的荣誉——革命领袖及红军缔造者的称号。

然而，把剽窃报纸名称的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并不公平。列宁对此完全赞同，他在给彼得堡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建议在信箱栏给托洛茨基这样一个答复：‘托洛茨基(维也纳)：对于无理取闹、造谣中伤的信件，我们一概不予回答。’”[③] 人们不难推想列宁本人是如何为剽窃辩护的：中央委员会资助过《真理报》，因此该报的名称和声誉属于党而不属于托洛茨基；因为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因此有权占用这份报纸的名称。这个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在所有流亡者的团体中都发生对报纸名称权属谁的争论。托洛茨基威胁说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但看来他并没有采

---

① 《真理报》第24期。

② 同上，第25期。(以下凡提到《真理报》，都指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否则另加说明。)

③ 《列宁全集》第46卷第11页。

取,而且停止了出版他的《真理报》。这样,布尔什维克在盗用的名称下出版的《真理报》开始了漫长而又辉煌的历程。1922 年,当《真理报》庆祝出版 10 周年时,托洛茨基参加了庆祝会,并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对这份报纸的起源甚至只字未提。

※　※　※　※　※

当时,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公开出版日报(孟什维克出版《火炬报》,该报撰稿人中也有托洛茨基),这个事实表明俄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年的反动要结束了,恐怖已告无效;工人运动正在经历新的复兴;对此,不管愿意与否,沙皇统治都不能不容忍。一代新革命家正渐趋成熟,聚集到少数几个公开存在的工人俱乐部、工会和秘密组织中去。新形势为领袖们提供了新的论据。取消派指出:政府的日益宽容证明使党欧洲化以及使它从地下隐蔽处走出来已成为可能。在恐怖的年代里这一论据听起来是不现实的,而这时则有事实根据了。政治复兴也给秘密组织带来新的活力,这时加入秘密组织的青年革命家不满足于只在合法的俱乐部及工会中谨慎地表示警察能够容忍的那种反抗了。政府方面愈倾向于容忍合法形式的反抗,它也就愈害怕非法的反抗。这使布尔什维克有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们说,哪怕只是为了得到较多的公开活动余地,我们也必须加强秘密工作。①

在这些情况下,托洛茨基又一次开始追求一厢情愿、渺茫的统一。他劝说组织委员会于 1912 年 8 月在维也纳举行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大会。他希望俄国革命情绪的高涨如同 1905 年一样能导致和解。但这种和解没有出现。1905 年革命事变的高潮还能

① 费·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 440 - 442 页。

中止或推迟刚刚开始的分裂,而在1912年,分裂已成鸿沟。因而新的政治复兴只能使之更加扩大。此外,列宁此时正在收获他的劳动果实:他手下的人领导着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组织,而孟什维克则是几个散漫、软弱的集团的大杂烩。列宁主义者拒绝出席维也纳会议;因此,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极左派,召回派,崩得和托洛茨基聚合一起结成联盟。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上著名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是这个联盟的主要发言人,他不断地攻击列宁的"分裂活动"。托洛茨基在辩白中声明,他绝无意要使会议反对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列宁拒不出席会议或不赞成作重新统一的任何努力才驱使他处于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一辩白的真诚是无可怀疑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的私下通信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表明了托洛茨基对10年争论的后果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朋友却不像他那样抱有幻想。他们觉得在他的帮助下,再一次把分裂的恶名加到列宁头上是策略的;但是他们和列宁一样坚决要把分裂进行到底。两者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列宁公开坦率地承认他的意图,几乎是大肆宣扬;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唐恩则把他们的图谋隐藏起来,设法用狡猾的策略把戏使分裂实现。把列宁讲出来的话和孟什维克领袖们的秘密通信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双方的角度相反,但在使分裂既不可避免又合于愿望这一点上是多么高度地一致;而且双方几乎是用同样的措辞讥笑托洛茨基为避免分裂或扭转分裂所作的努力。[1]

---

[1] 这时,托洛茨基与"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各分裂的小派别,如召回派和造神派的关系极其友好。1914年夏,他在他们的博洛尼亚党校讲课,这所党校是卢那察尔斯基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创立的。一个奸细在给保安处的报告中对这所党校有生动的叙述。报告特别说到讲师们(卢那察尔斯基、明仁斯基、柯伦泰、波克罗夫斯基)用傲慢的主子态度对待他们的学生,即那些从俄国来的秘密工作者。托洛茨基则是例外,和他的学生是友好的个人关系。《保安处布尔什维克卷宗》第1卷第40页。

※　※　※　※　※

尽管(或许是正因为)托洛茨基代表八月联盟而表现出来的"好斗性",八月联盟留给他的却是恼怒和心烦意乱。因此,当1912年9月《基辅思想报》要求他担任该报驻巴尔干的通讯记者时,他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从流亡者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出来,从扮演不适意角色的演员变为注视世界政治风暴中心的观察家。10月初他离开维也纳;在去车站的马车上他得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消息,在这场战争中南部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土耳其帝国。

他在维也纳一直注意着巴尔干,并跟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两年前,1910年7月,他曾前往索非亚揭露并斥责在米留可夫主持下所举行的泛斯拉夫大会。他还在一个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会议上讲了话,这个会议与泛期拉夫大会同时举行。未来斯大林派的保加利亚主席柯拉罗夫(Коларов)把托洛茨基作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传奇英雄介绍给大会,介绍给街上和广场上的群众;托洛茨基受到热情的欢呼。他告诫南部斯拉夫人说,沙皇外交正在企图利用他们作为抵押品,并说,俄国自由派则培养泛斯拉夫主义,因为他们急于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找出与沙皇制度的共同基础,而在国内则屈服于沙皇统治。[①] 从那以后,托洛茨基常去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作短期旅行,与那里的事变保持密切接触。早在1909年1月他就在《基辅思想报》上写道:巴尔干是欧洲的潘多拉女神的匣子。[②]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07-223页;第6卷第34、46页。

② 托洛茨基当时写道:"在巴尔干所有国家中,只要有一个国家按照瑞士或北美共和国的模式建立在民主联邦制的基础上,就能给巴尔干带来国际和平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同上,第6卷第10页。

潘多拉的匣子此时已开始放出可怕的东西;这些可怕东西的景象使托洛茨基受到震动。他曾抽象地思索过战争问题;但此刻当他看到奥地利的探照灯射过边界照亮贝尔格莱德的城堡,当他注视着大队大队的预备役军人,当他得知他的许多朋友、政治家、报刊编辑、大学讲师都已在前线先杀人尔后又战死时,一种悲剧感压倒了他,一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受……和对人类导致自身灭亡的贪婪的痛心"[1] 压倒了他。"对历史过程来说,抽象的人道——道德观点是最无效的——这是我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文明、由物欲掠夺、风俗习惯及偏见形成的大杂烩曾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陷于催眠状态,使我们形成虚假印象:仿佛我们已经取得了主要成就。这时战争爆发了,才使我们明白,我们甚至还没有四肢着地从我们历史的野蛮时期爬出来。"[2]

他写的所有巴尔干通讯都带有这种悲剧感的色彩,这些通讯都具有新闻写作的宏伟风格,体现出革命前俄国的激进自由派报纸的特点。每一篇都是相当重要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背景资料充实,印象鲜明且当地色彩丰富,描写与分析都很出色,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其想象力及生动的语言。这些收集在他的全集里的文章至今还是 1914 年前巴尔干编年史的无价之宝。文章的作者又是精力充沛的记者,能独立而敏锐地观察事物,会见各界人物,给读者提供热门题材。他喜欢新闻采访的刺激和艰辛,他还自由自在地跟欧洲各家报纸派来的同行结合在一起——他和《法兰克福报》及《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密切合作,一时间,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革命的平民领袖仿佛消失在报人的身后了。[3] 他一到贝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6 卷第 66 页。

② 同上,第 141 页。

③ 同上,第 283 - 292 页。

尔格莱德就几乎访问遍了塞尔维亚政府的每个成员;他以非凡的机智和才华写人物特写,表明这些人物如何反映出近代史和小农国家的精神状态的。他深入研究给养、军事训练及战术问题,揭露战争的暴行及其原始残忍性。无论在为宣传家们捏造的胜利举行感恩祈祷的索非亚教堂,还是在他与伤兵谈话的医院,无论在他获知土耳其步兵遭遇的那龌龊、拥挤的战俘囚牢,还是在充当土耳其被俘军官囚室的舒适旅馆,无论在貌似欧洲中心的那些巴尔干地区各国首都里的上流社会咖啡馆,还是在几近亚洲式的悲惨郊区——贫穷、恐怖和堕落的渊薮,他都以同样的热情进行采访并加以描写。

起初他对南部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抱有一定的同情,因为他看到巴尔干各国对土耳其人的压迫的记忆甚至比对俄国奴役的记忆还要清晰。[①] 斯拉夫人的起义在某些方面使他想起1859年意大利收复领土。但是他担心斯拉夫人的不满会被各大国,特别是被沙皇所滥用,担心它被利用去作为进行欧洲大战的借口。他在解释俾斯麦的一句话时写道:"如果巴尔干的各主要政党……除欧洲的新干涉外,看不到解决巴尔干各国命运的出路……那么,他们的政治方案实在还比不上库尔斯克省一个步兵骸骨的价值。这话听起来也许刻薄,但只有这样,一个真诚的民主政治家才能提出这个悲剧性的问题。"[②] 巴尔干的农民领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过俄国革命的影响,此时却荒谬地把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单凭这点就足以使托洛茨基对他们事业的同情变得心灰意懒了。当地奢侈和饥饿的鲜明对比、统治者的腐败、对土耳其士兵和平民施加的毫无必要的残暴、沙文主义的猖獗、宣传家们的恫吓和检查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142－143、187页。

② 同上,第144页。

当局的愚蠢,这些都在托洛茨基的心里激起愤怒和厌恶。他保卫弱者,保卫战败者,他保卫的正是这样的土耳其人。

保加利亚的新闻检查当局对他突然袭击,没收他的文章,不准他上前线采访。奇怪的是,新闻检查长彼得科·托多罗夫(Петко Тодоров)竟是一个激进派诗人,仅在两年前他还同托洛茨基一起在索非亚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会议上发言。托洛茨基在他写的《致新闻检查官的公开信》中进行反击,无情地揭露战时新闻检查当局通常用以证明检查有理的诡辩和借口,并且雄辩地要求新闻自由。这封充满火药味儿的雷霆万钧之势的信对攻击的目标而言未免有点儿杀鸡用牛刀的味道,但也曾造成相当大的轰动。[1] 不久,一个比较值得轰击的目标出现了。当时,作为泛斯拉夫主义使徒的米留可夫来到索非亚,他吹捧保加利亚人,而对他们的残暴行为则保持缄默,怕招来麻烦。托洛茨基又写了一封致米留可夫的《公开信》,这封信在彼得堡报纸上发表时引起一场争论,[2]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俄国报纸的专栏载满这场争论的文字。米留可夫怀疑托洛茨基所报导的残暴行为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泛斯拉夫倾向的俄国记者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但托洛茨基拿出文献作为证据,这是他本人以及《每日电讯报》、《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所搜集的。当这些刻毒的互相攻击还在全力进行时,整个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斯拉夫人的胜利而结束;获胜一方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却为争夺战利品而引起纠纷;俄国官方和自由派分子同情塞尔维亚人。尔后甚至在米留可夫自己的报纸上,一夜之间竟把保加利亚人从光荣的英雄一下子贬为残暴的恶棍。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263-273页。

② 《光明报》1913年1月13日;《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273-292页。

这场论战的一部分是托洛茨基从维也纳策动的,他在维也纳还总结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后果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他通过巴尔干这面三棱镜看到1914年将要出现的列强之间的结盟;而且他本来看得非常清楚,只是在他一厢情愿地相信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因后者拥有"86家报刊和几百万读者")定会把"反对沙文主义野蛮屠杀的和平和文明事业"[①] 捍卫到底时他才一度迷惑起来。

回到维也纳,他立刻又被党内的阴谋小集团的行为所吸引,他在私人信件中提出抗议,反对他的孟什维克朋友要跟布尔什维克分裂这个不加掩饰的愿望,反对取消派在八月联盟中的优势。他悄悄地辞去一份孟什维克报纸的工作,又大声疾呼地反对另一份他常常为之撰稿的报纸。他和孟什维克过于接近,难以分手;但他又太倔强,不能与他们留在一起。马尔托夫在一封私人信中嘲笑说:"托洛茨基在巴尔干时错过了使整个(八月)联盟进展的机会。"而在这段期间,孟什维克已经不再提什么统一,停止了"空洞的口头和解";而在值得怀疑的八月联盟全盛时期,这些"和解"把戏曾流行一时。马尔托夫又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应给他(托洛茨基)一点儿颜色看看(当然是用最温和、最客气的方式)。"[②] 此话他到处反复讲过多次。

因此,托洛茨基再次离开维也纳去观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没有丝毫遗憾。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塞尔维亚和希腊打败了保加利亚,而被人认为是保加利亚人的敌人的托洛茨基却变成保加利亚人的保卫者。他叙述新的胜利者犯下的掠夺与暴力的罪行;他前往战胜者并吞的领土采访,描述了政治的动荡、人类的悲惨命运以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302页。

②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262、274页及以后各页。。

及"以三十年战争方式进行的"战争和改变人口和疆界所需要的那种种族歧视的荒谬行径。他写了本研究罗马尼亚的书,这是描写文体的一篇报导杰作,1917年后曾多次再版。他总结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原始的农民民主国家从土耳其统治下浮现出来,没有什么农奴制和封建主义的残余,相反,罗马尼亚尽管有几十年骗人的宪政,但直到现在它的农民还一直处在封建关系的严格控制下。"[①] 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是"走狗",未发一枪就分到战胜国的赃物,而且吞并了南多布鲁查地区。托洛茨基去过这个省份,当时该省的农村正流行着霍乱并常常受丘八们抢劫的折磨,而罗马尼亚的新统治者对此漠然不顾。他叙述道,整村整村的人因缺粮少药快要死光了,而地主家的医生用双筒望镜从远处观望患霍乱病的农民,不屑走近他们。

他对这些情景的描写都是罕见的镜头,其中闪现着俄国人特有的乡愁。他坐在车子里走遍跟他故乡的草原很相似的地方。黑海的微风掠过多布鲁查的景色,草原上散落着的座座坟丘,旅途中炎热无比,令人昏昏欲睡的车速,这些都使他回想起在格罗莫克列亚和亚诺夫卡的童年,想起新近亡故的母亲形象。

> 道路是那么像俄国的,和我们赫尔松的道路一样满是尘土。真有点儿像在俄国似的,母鸡从马蹄下逃出来;俄国式的小马的脖子上套着俄国式的挽具;甚至马车夫的脊背也是俄国式的……呵,他的脊背多像俄国人的脊背……天色暗下来,闻得到青草和路上尘土的气味,马车夫的脊背看不清了,周围一片寂静。我们彼此相靠,打起盹来。吁!马车夫吆喝着使马停下来,耐心等待,对马体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348页。

贴地吹着口哨。一片寂静。足部的血液发痒,我们仿佛是在从新布格车站到亚诺夫卡作假日旅行。①

当他访问散布在多布鲁查的俄国人居民点时,他的乡愁变得更浓。居民点住的是阉割派教徒。1901年他第一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曾乘驳船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当时就是同这个奇怪的"圣阉人"教派的一些教徒一同走的。多布鲁查省的阉割派教徒的聚居地及其果园都整洁得耀眼;但托洛茨基写道:"不知怎么的,这里令人厌烦,单调而沉闷。缺乏一些什么东西。没有生气,没有孩子,没有母亲。这儿的人们脸上有得意之色,尽管是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但令人不快。"他得到同意,把一位"医生朋友"写的一段话照抄如下:"观察阉割派教徒的生活会使你确信……性生活是一项社会原则,是利他主义和各种高贵人性的源泉。"② 这位医生朋友是引他走遍多布鲁查的向导。

这位"医生朋友"兼向导就是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Раковский),以前在西欧和在巴尔干时托洛茨基曾见过他多次。此时,他们已成为挚友,他们之间的友谊经历了战争、革命、胜利、失败、流放甚至清洗的考验——这大概是托洛茨基一生中唯一持久而亲密的友谊。拉柯夫斯基比托洛茨基大六七岁,他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使人联想到阿纳卡西斯·克洛斯(Anacharsis Cloots)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和克洛斯一样,也是贵族、思想家、世界公民;而且他也和克洛斯一样把革命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和革命中的激进派站在一起。甚至在此时,1913年,他的生涯就已不同凡响。他原是保加利亚人,北多布鲁查一个大地主家族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415-420页。

② 同上。

的后裔,1878年当他的祖国被罗马尼亚并吞时,他成为罗马尼亚公民。他在15岁时因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而被学校开除,而且保加利亚的所有学校都不准他入学。他家便送他出国学医。他毕业于法国蒙特彼利埃大学,其博士论文《论犯罪及堕落的原因》使他在医学界获得很高声誉。后来他在另一所法国大学学法律。1893年当他20岁时,他在苏黎世国际大会上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那里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并成为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茹尔·盖德和罗莎·卢森堡的朋友。翌年,他在柏林从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当时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活动仍然处于俾斯麦的残酷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令的余波中,因而他被逐出德国。此后,欧洲大陆上每次重要的工人集会他都曾出席过。1905年他回到罗马尼亚。他因为是农民的保卫者而招来地主的痛恨,受到迫害,最终被驱逐到保加利亚的国土上当保加利亚公民,尽管他此时仍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担任军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为争取他回国进行了5年的斗争。但政府拒不接纳他,不是攻击他是俄国总参谋部的间谍,就是说他是反对沙皇的危险阴谋家。

拉柯夫斯基在流放中出版过几本书。一本题为《俄国在东方》,揭露沙皇在亚洲的扩张;还有一本名为《贵族的罗马尼亚》。这位小册子作家、宣传家兼医生在业余时间致力于研究历史,《梅特涅及其时代》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他用保加利亚文、法文、俄文和罗马尼亚文写作都一样得心应手,他用所有这些国家的文字给政治、医学与历史期刊撰稿。他常回到布加勒斯特,但是每一次,尽管有国会的暴风雨般的抗议和街上的示威,政府还是如以往那样屡屡对他下驱逐令。有一次,由于饶勒斯的敦促,法国政府进行了干预才使他从巴尔干的一个监狱里释放出来,因为他还担任着饶勒斯的《人道报》驻巴尔干记者之职。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不久他获准回到布加勒斯特,成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公认的领

袖,党报的主编,巴尔干联邦制思想的阐释者,而且是巴尔干反军国主义最有影响的发言人。同时他还管理他在多布鲁查的家产。他在那里把他的农民从封建劳役中解放出来,并且给农民看病。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国会、党的总部及编辑部与家乡的地产之间不断地穿梭往来,为反对大大小小的不正义行为而不断进行斗争。他往往刚从首都回来,身上还穿着燕尾服就去察看耕作,在检查耕地时,大衣的燕尾随风摆动。他在跟农民聊天和给病人出诊的间隙中向托洛茨基介绍罗马尼亚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况。

托洛茨基此行还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元老多布鲁查努·赫列阿(Dobrodjanu Gerea)建立了友谊。当时,拉柯夫斯基刚从赫列阿手里接管了党的领导职务。赫列阿是一位令人着迷、个性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个俄籍犹太人,原名叫卡茨,是早期民粹派分子,从俄国逃出来后定居罗马尼亚。他为罗马尼亚人发现他们本民族的历史而成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以及所谓罗马尼亚文艺复兴的鼓舞者。整整一代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都是从他的著作《新农奴制》中学会政治思考的;后来领导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人都是他的弟子。他在普洛耶斯蒂的火车站开有一家酒馆,这是罗马尼亚文人和政治家朝圣的场所。托洛茨基在这家酒馆的柜台边消磨了不少时间汲取这位脾气古怪的老哲人的智慧。[①]

※　※　※　※　※

1913年1月底或2月初,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间,当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作短期逗留时,斯大林的形象仿佛影子掠过屏幕般地在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6卷第386－402页。

他眼前闪过。奇怪的是,托洛茨基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才详细叙述此事。[①] 有一天,他去拜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他的前《真理报》的助手,刚刚当选的杜马议员。他们坐在茶炊边谈话时,突然,一个中等身材、脸色灰暗憔悴、脸上有麻子的人推门而入。他住在别的房间,但进来之前并没有敲门。这个陌生人似乎因托洛茨基在场而诧异,在门口停了一下,喉头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也许是打招呼。尔后,他手里拿着一只空杯子,走到茶炊边,冲满一杯茶,没有说一句话就出去了。斯柯别列夫向托洛茨基解释道,这就是高加索人朱加施维里,刚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看来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一定地位。据托洛茨基自己说,他对未来的对手的第一瞥以及斯大林当时留给他的令人不安的印象始终记忆犹新。他注意到这个高加索人的"阴沉而非一般的"外貌、集中在脸部的"乖僻"和"黄色"眼睛里凝聚着的敌意的表情。正是此人的沉默和难以捉摸的眼神把这一偶然场面深深地刻在托洛茨基的记忆中,使他在过了27年之后叙述这件事时不免有回顾往事不寒而栗的感觉。

按照内在的证据来看,托洛茨基的叙述是真实的,无需用事后的所知加以渲染。这个面容憔悴、残酷无情、工于心计并有点儿粗鲁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看来就是其真实性格的写照。他就是当时经历过多年秘密活动、潜藏在巴库的鞑靼石油工人中而后又多次坐牢、流放与逃亡之后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眼神中凝聚的敌意的表情的印象看来也并非没有根据,那种敌意反映了布尔

---

①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见面的这一叙述,系根据托洛茨基本人的回忆录(写于1939年9月22日)写成,这篇回忆录是我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里发现的。我在《斯大林政治评传》中误写成"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未曾叙述过他们在维也纳的见面"。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生前最后一年以前没有叙述过此事。

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对八月联盟鼓动者的态度。以前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见过托洛茨基,但当时托洛茨基没有注意到他。斯大林当然还记得托洛茨基鼓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袭击与剥夺行为一事,而斯大林和此事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在1907年,斯大林在其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已经写到托洛茨基"华而不实"。托洛茨基并不知道是谁盗用他的《真理报》名称编出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第一期,而斯大林是知道的。就在那次没有搭话的见面以前不过两个星期左右,斯大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就已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就是在这些话下面,他第一次签上了斯大林这个姓名。[①]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见面时发出的粗暴刺耳的噪声仿佛是从俄罗斯小木屋的深处传来的。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281页;另见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4章。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议会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突然终止，在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这些主义曾同时一起兴旺过，只受过殖民地和巴尔干半岛边缘的一些小规模战争的干扰。欧洲的两代人在乐观的信心中成长，他们乐观地相信人类的进步足以保证对大自然的支配，相信通过辩论、和解与多数表决的方式就能改变并完善社会环境。他们总是把战争看做是野蛮历史的遗迹，人类当然不会再回到那个时期去了。总体来说，欧洲财富的积累这样惊人、这样迅速，因此看来能保证社会各阶级财产的不断增长并排除社会的暴力冲突。

在工人运动中，尤其是在第二国际中，这些幻想比在任何其他

地方更加根深蒂固。第二国际继承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几个革命时期——1848年的动乱、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德国社会主义反对俾斯麦的地下斗争——所提出的思想口号及其信条。这些口号和信条表明了工人的国际团结和他们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为目标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早已和这些传统大不相同了。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已经让位于和平交易和议会改良主义。这些方法愈成功,以从前非法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为一方与政府、雇主协会的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密切;而民族利益和民族观点就更实际地胜过继承下来的国际主义的口号。直到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仍设法用惯用的革命词句为他们的改良主义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仍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及反军国主义,直至大战爆发的第一天第二国际瓦解为止。

在欧洲大国中,俄国是在前一阶段的和平发展中唯一分享不到什么的国家。俄国的经济进步尽管不容置疑,但同西欧的财富积累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把和平交易和妥协作用移植到俄国的民族习惯中去,也不足以培养起经济逐渐进步能使各阶级都会从中受益这样的信心。议会制度以及围绕其周围的所有社会调解与仲裁制度在俄国土壤中没有生根。方式最激烈而又毫不掩饰的阶级斗争从帝国的一端疯狂地蔓延到另一端;而沙皇统治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存有它允许他们对国家命运施加影响的幻想。在社会党国际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几乎是唯一一个热烈而认真地对待革命传统和革命口号且不仅仅把它们当做礼仪的党。

1914年的俄国流亡者,除少数几个例外,都恐惧地注视着吞没国际的大灾变;当他们看到欧洲社会主义领袖们完全不顾他们所有庄严的反军国主义决议和国际主义的誓言、反而号召工人阶

级为他们的皇帝作战、仇恨“敌人”、杀死“敌人”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起初，大多数俄国流亡者——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一样斥责这种行径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后来有许多人对此重新考虑，但也有不少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看到：随后几年的大屠杀为了争夺敌人的几码土地使成百万人付出生命，这场大屠杀教导他们要蔑视和仇恨欧洲国家装出人道主义的外貌和虚伪。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文明政府认为为追求本国强权政治就可以屠杀几百万人和使几千万人伤残，那么，在为建立能使人类摆脱这种愚蠢行径的新社会制度的斗争中不惜牺牲，无疑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旧制度正在给他们一个残酷无情的教训。欧洲文明的“哥特式花边”已被扯成碎片，而且正被踏入战壕里的泥浆和血污中。

※　※　※　※　※

大战爆发时，托洛茨基正在维也纳——他刚从布鲁塞尔回来。在布鲁塞尔他与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向国际局作了最后呼吁，要求调停俄国党内的长期斗争。8月3日上午，他到维也纳《劳动报》编辑部去。法国沙文主义者杀害饶勒斯的消息刚传到维也纳；外交大臣们在交换最后照会，目的在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敌方；总动员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在去社会民主党报刊编辑部的路上注意到，广大群众被好战的歇斯底里冲昏了头脑，正在这个城市的繁华中心举行示威。他在《劳动报》编辑部里看到的是混乱。有些编辑准备拥护战争。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厌恶地谈论正在兴起的沙文主义暗流。阿德勒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堆宣扬憎恨外国人的小册子，紧靠这堆小册子的是另一堆为8月15日在维也纳举行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而准备的会徽——国际要庆祝其成立

25 周年。而此时大会已经取消了，奥地利党的金库掌管人正痛惜他为准备庆典而花费了的两万克朗。老维克多·阿德勒虽然蔑视正侵袭他自己周围人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他不够坚决，未加以反对。他把托洛茨基带到政治警察局长那里去询问，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迫在眉睫之际警方打算如何对待俄国的流亡者。警察局长回答说他准备拘押他们，托洛茨基和他的一家在几个小时后就乘火车前往苏黎世。

中立的瑞士是侨居德国和奥地利的俄国革命家的避难所。卡尔·拉狄克因为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德国驱逐，遂来到苏黎世；曾在维也纳遭到短期拘留的布哈林也来到这里；而列宁当时仍被奥地利人囚禁在加利西亚，稍迟一些也到达苏黎世。瑞士是中立国家，它容许瑞士社会民主党用容忍甚至友好的态度对待俄国人的国际主义宣传。在一个工人教育协会里，托洛茨基看到听众热切地倾听他谴责战争、谴责拥护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位知名的瑞士作家回忆说："由于托洛茨基到达苏黎世，工人运动，至少是一个地区的工人运动就恢复了生气。他带来的信念是……这场战争定会引起革命。……对托洛茨基而言，这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信念。"① 他对新听众的影响这样强烈，因此他几乎立刻便当选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样做使该党的领导人向党员群众解释时会有些麻烦，因为把大会的表决权给予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参战国的公民，这不大妥当。。

托洛茨基在苏黎世停留的时间只不过两个月多一点儿，他写下了《战争与国际》一书，这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全面陈述反战政策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锋芒主要指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强辩说：霍亨索伦的德国跟"欧洲宪兵"沙皇统治作战是在完成一项

① F. 布鲁普巴彻：《持不同政见六十年》第 188－189 页。

进步的历史使命。托洛茨基反驳说:“我们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们过去未曾寻求过,而且现在也不寻求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军国主义的援助。……我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感激。我们大家都受过它的教育,都从它的成功和错误中吸取过教训。对我们来说,这样一个党不是国际中一般的党,而是享有特殊地位的党。”正是为此,他现在就越发尖锐、越发义愤填膺地表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决裂。他坚决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是支持和平,但不是支持意味着恢复现状或恢复帝国主义强国间新均衡的那种和平。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必须是民主的和平,是不兼并、不赔款的而且是容许从属民族有自决权的和平。只有交战国人民起来反对各自的统治者才能得到这样的和平。他的论点中的这一部分在时间上比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还要早3年多;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美国发表时对威尔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然而托洛茨基提倡的“民族自决”与威尔逊的解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民族自决”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早已认为民族国家是不合时代的东西,他认为,应当使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能够取得独立,以便他们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参与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写道:“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捍卫不合时代的民族‘祖国’并不关心,因为它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无产阶级关心的是创立一个更强大而稳定的新祖国,即作为世界联邦基础的共和主义的欧洲联邦。无产阶级只能以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组织作为切实可行的现代方案去跟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死胡同相对抗。”[1] 这一大胆的结论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不现实的。托洛茨基说,拉狄克在当时批评过这一结论,

---

[1] 《战争与国际》最初用俄文在巴黎的《呼声报》上发表,从1914年11月该报第59期起开始连载。

其理由是：世界的，甚至欧洲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因此不允许以国际社会主义为基础建立世界或欧洲经济组织。列宁到达瑞士时也批评过"欧洲联邦"这个用语，因为这个用语使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只设想为全欧洲同时起义的组成部分。关于这场争论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1914年11月，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本发表，并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送到德国。散发这本小册子的德国反军国主义者都受到了迫害，托洛茨基本人因"叛逆罪"受到缺席控告并由德国法庭判处几个月的监禁——这是他从法国报纸上的报导中得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含沙射影地批评说托洛茨基是为俄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写这本小册子的。但是，因为托洛茨基毫不迟疑地批评拥护战争的协约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转过来指控他为德国的"社会护国者"涂脂抹粉。[1]

11月下旬，托洛茨基离开瑞士去法国。《基辅思想报》任命他为驻巴黎的记者，他热切地抓住这个机会，以便从非常有利的地点观察战争。马尔托夫当时正以纯粹反战的态度主编巴黎的一份俄文报纸《呼声报》，托洛茨基急于与他合作。此前他最后一次见到马尔托夫是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时，当时他们在那里一起去取国际执行局对列宁分裂活动的裁决；他们还同普列汉诺夫共同起草了一份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只不过几个月后，所有这一切好像那么久远，那么不相干！由于国际的领袖们是社会主义的最高权威，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曾请求过他们对列宁进行干预，但此刻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都和列宁一样指责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叛徒"。而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却以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霍亨索伦王和哈布斯堡王朝而非罗曼诺夫王朝为理

① 《呼声报》1914年11月25日第63期。

由,对战争进行护国的颂扬。看来,消除了旧的分裂,却又有了新的分裂,马尔托夫是列宁青年时代的朋友,列宁从未放弃过再同马尔托夫进行政治联合的内心渴望,列宁说:“正如现在欧洲一家最好的社会党人报纸——巴黎的《呼声报》正确指出的:《前进报》已经死亡。过去我同马尔托夫经常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就愈是应当肯定地说,这位著作家现在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①] 这个孟什维克的创始人热情地回报说,他欢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而且同意,旧的争论已经失去意义。[②] 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重新联合终究是不可能的。但托洛茨基当时对重新联合的前景感到高兴。

在巴黎,他把时间分别用于为马尔托夫的报纸和《基辅思想报》工作,并同法国社会党和工会内反对军国主义的小组接触。差不多从到达的那一天起,他不得不为指控他为亲日耳曼主义而进行自卫,这种指控主要来自阿列克辛斯基(Алексинский),此人以前是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现在是一个疯狂反对布尔什维克、拥护战争的人(就是这同一个前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散布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谣言)。一个巧合竟使这一含沙射影的指责显得可信:一个名叫尼古拉·托洛茨基的人领导着奥地利人发起的乌克兰解放联盟,这个联盟就是德国后来建立的乌克兰特务组织的原型。把一个托洛茨基的亲奥和亲德言论归到另一个托洛茨基身上并不困难,即使在《战争与国际》的作者在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决有罪而已公然表明这是张冠李戴之后。

托洛茨基到达巴黎后,《呼声报》仅继续出版了六七个星期。该报由于审查制度的干扰在1915年1月中旬停止出版。在这儿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页;《呼声报》1914年10月27日第38期。

② 《呼声报》1914年11月12日第52期。

个星期中，托洛茨基表达的意见甚至更为明确。他写道，"或是不断的战争或是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只能在这二者中择其一。战争是欧洲过度发展的生产力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严格控制的框架的盲目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只能用武力打破国家疆界而不能一劳永逸地把它们彻底推倒；因此，只要资本帝国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它就会把人类投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接二连三的屠杀中去，因而使文明走向毁灭。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因为这种改良主义已成为旧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它的罪恶的同谋。[①]那些希望重建旧国际的人，那些设想它的领袖们用相互赦免的办法就能使他们对国际主义的背叛一笔勾销的人，都是工人运动复兴的障碍。[②]

他在《呼声报》的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把他的论点甚至推得更远，他说，反对"沙文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只不过是今后任务的消极一面，而积极的建设性一面是"积聚第三国际的力量"。这一思想倾向是同列宁的思想倾向平行发展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得到了列宁思想的鼓舞而引发的，因为列宁在稍早一些时候已经阐述了同样的思想。[③]

马尔托夫起初曾热烈赞同过这些观点。可是，甚至在《呼声报》停刊之前，他已经因为他怀疑和重新考虑而感到困惑。那些流亡的孟什维克像他自己一样是反对过战争的，但他们不愿得出这样彻底的结论。他们认为拥护战争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认为他们还会改正错误；并且认为工人阶级差不多都跟

① 《呼声报》1914年11月24日、25日第62期和63期，顺便说一下，列夫·托洛茨基在1903－1904年间曾用H.托洛茨基做文章的署名。

② 同上，1914年11月28日第66期；1914年12月13日第79期。

③ 同上，1915年1月8日第100期；《列宁全集》第26卷第18页。

他们的领袖一样已被社会护国主义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一个“清一色的”新国际绝没有团结工人阶级的可能,它定将是无力取代老组织的一个宗派而已。有些孟什维克反对战争是出于和平主义的信念,而不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大多数人曾经反对代表他们国家进行战争的沙皇,而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而且在俄国国内,一些孟什维克持更加强烈的护国立场。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马尔托夫。他夹在自己的信念与他创立的党派施加于他的拉力之间而感到左右为难。他悄悄地进进退退,试图弥合分歧,从进退两难中脱身出来躲进巴黎咖啡馆的氛围里。

在1914年这一年结束之前,战前的分歧又开始重新强加到新近的“国际主义的团结”上来。列宁坚定地认为,他的党整个来说是始终忠于国际主义的,而孟什维克中那些忠于国际主义的人,如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跟他们的门徒并不一致。不久,马尔托夫向阿克雪里罗得透露说,托洛茨基指责他马尔托夫,说他用马基雅维里式手段别有用心地磨砺孟什维克的斧头。马尔托夫的回敬则是采取屡试不爽的策略:他试图“恐吓”托洛茨基(马尔托夫自己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他(指托)要与孟什维克决裂,就会置身于布尔什维克的支配之下,就会落入格里沙·季诺维也夫的手中”(因那时候季诺维也夫在瑞士,是列宁的主要助手)。但是这种恐吓小孩子的鬼把戏却不像过去那样有效,马尔托夫说,他不得不用圆滑的外交手腕跟托洛茨基打交道,不得不像对待“玲珑小巧的瓷雕像一样”对待托洛茨基。[①]

托洛茨基尽管那时还不愿“落到格里沙·季诺维也夫的手中”,然而他渴望自己最后能摆脱这个可以追溯到八月联盟的旧联盟。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309页,马尔托夫致阿克雪里罗得的这封信写于1915年1月9日。

1915 年 2 月 14 日，他在《我们的言论报》（这份刊物已取代了《呼声报》）上发表声明，第一次公开叙述他与孟什维克不一致的内情，并透露，他甚至在两年前已拒绝给孟什维克的报纸撰稿，在社会党国际局上他拒绝代表孟什维克讲话；而且还透露说当时就拒绝计划在伦敦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上代表孟什维克。托洛茨基这样与八月联盟断绝关系，是他在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①]

其他政治老关系及友谊的纽带也同样突然断了。使托洛茨基个人最痛苦的是同帕尔乌斯绝交。帕尔乌斯刚刚宣布站在拥护战争的官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一边，并且正在巴尔干地区为自己、也为德国政府的利益做大生意。这个马克思主义作家过去曾如此精辟地分析民族国家的过时和阐述国际主义，此时却蜕变成为"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民主党人"，蜕变成一个庸俗的、谋取战争暴利的市侩，这在当时确实是人们经历过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变化。这对托洛茨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不断革命论"的共同创立者，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和名字是并列在一起的；从 1904 年以来，帕尔乌斯参与了托洛茨基在报刊和政治方面的大部分活动。托洛茨基对帕尔乌斯总是寄予天真的期待，希望他会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肩作战反抗沙文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胜利。

与其说托洛茨基感到愤怒不如说是感到伤心，他写了一篇《为尚键在的朋友而发的讣告》。在这篇文章中，尽管当时在他们之间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 年 2 月 14 日第 13 期；《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 315－317 页。引起托洛茨基发表这一声明的原因是拉林在瑞士社会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拉林当时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拉林称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为组织委员会的三个领导人。

已横亘了一条鸿沟,他还是为帕尔乌斯那浪费了的巨大才华而表示伤心和敬意。

> 且不谈这个现在以如此赫赫的笔名出现在巴尔干的人物,写下这几行文字的作者认为,给予此人以应有的评价,是事关作者本人荣誉的问题,因为在他本人的思想和智力的发展上得益于此人之处超过得益于所有其他老一代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之处。……就是现在,我也看不出比以前有更多理由去否定那些主要由帕尔乌斯作出的判断和预见。

托洛茨基宽宏大量地回忆起他和其他人向帕尔乌斯学到的知识如何多以及他们为后者而感到如何自豪。特别是他感谢帕尔乌斯教导他"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清晰的思想"。但是——"现在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正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他自己已死亡的幽灵"。[①] 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开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关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它进行任何接触。[②] 当帕尔乌斯以致编者函的形式发出辩护信时,托洛茨基先打算予以发表,但后来改变了主意。[③] 他断然同这个原先的朋友断绝关系;革命后,帕尔乌斯曾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主动提出

---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 年 2 月 14 日第 15 期。

② 同上,1915 年 10 月 5 日第 208 期。然而,当阿列克辛斯基利用托洛茨基的警告而诬称帕尔乌斯为德国特务时,托洛茨基写信给《人道报》,说明他指责过帕尔乌斯为社会护国主义,但他并不相信帕尔乌斯是特务,见同报。

③ 马尔托夫在自动辞去《我们的言论报》的职务时曾透露过这一点。马尔托夫:《致编辑的信》,载《我们的言论报》1915 年 11 月 9 日第 235 期。

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对这些接近的表示置之不理。尽管如此，但这种交往的阴影不止一次地作祟：在1917年7月，即那个“大诬蔑的7月”作过祟，尔后又在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斗争期间那些大诬蔑的年月中再次作祟。[1]

1915年1月29日，《我们的言论报》开始出版。这是一份仅有两个版面的小报，偶尔出过四个版面。版面上满是新闻检查官删除后留下的“天窗”标志，然而仍有不少新闻和评论。这份报纸经常处于被检查官勒令停刊或由于本身的拮据而被迫停刊的危险中。编辑和撰稿者没有工资或稿费。排印工人的工资往往拖欠好几个月，但是半饥半饱的工人和担任编辑的政治流亡者都毫无怨言，继续工作，他们还常在在流亡者集中的那些简陋的场所，如戈培林大街的俄国图书馆、蒙特玛特的俄国流亡者俱乐部或腓迪南·杜伐尔路的犹太工人图书馆进行募捐。捐款都是几生丁、几苏而不是几个法郎，募捐所得全部都用来支付供应不足的纸张费用。然而《我们的言论报》却有一批出色的撰稿人，几乎每个人都将名垂革命史册；它作为报刊事业远胜于维也纳《真理报》，影响也大得多。如果有人对一位巴黎记者或政治家说，这份名不见经传的俄文日报在政治上的分量比所有法国林荫大道上的报纸更重，他定会认为这话是开玩笑。然而不出三年，在《我们的言论报》上阐述的思想会从彼得格勒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传遍全世界。

这份报纸的主要创建人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他是个党龄很长的孟什维克，前沙皇军队的军官，1905年曾率领一支部队起义，被判处死刑，但他逃脱了，加入了地下斗争的

---

[1] 帕尔乌斯有钱，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有不小影响，但却感到灰心，因而一再靠拢布尔什维克，直至列宁粗率地不予考虑为止。列宁说：“苏维埃当然需要聪明的头脑，但首先需要干净的双手。”参见M. 比尔(Beer)：《国际社会主义五十年》第197页。

行列。1917年10月他率领赤卫队进攻冬宫,逮捕了克伦斯基的部长们,使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取得胜利。这位未来的人民委员身材瘦小,眼睛近视,秉性活跃而富有想象力,他当时运用他的创造力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使这份报纸得以存在下去。他"显示出来的坚强和乐观,甚至使并不缺乏这些品质的托洛茨基都为之吃惊"。[①] 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用以取代旧友情的一位新交朋友:1923年至1925年间,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

邀请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担任《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的人显然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起初托洛茨基没有答应,因为他怀疑这份报纸的用意只是为孟什维克的狭隘目的服务。[②] 但他最后承担起共同编辑的职责,而且,在他同马尔托夫的不断争论中,他自己的观点对《我们的言论报》所起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都认为这份报纸是他个人的领地。造神派的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一度曾背离过列宁,后来成为革命的杰出的教育人民委员,他当时也曾为这份日报工作过,有时还在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之间充当调解人。梁赞诺夫也从维也纳来到巴黎,是《我们的言论报》的台柱之一。洛佐夫斯基是红色工会国际的未来领袖,当时是巴黎的一个犹太制帽工人小工会的领袖,他全面了解法国的政治和工团主义的发展。布尔什维克的召回派分子曼努伊尔斯基(Мануильский),未来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领袖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当时用别兹拉波特尼埃——"失业者"这个笔名写稿,他的唯一"职业"就是《我们的言论报》的发行人,挂名的主编,在法律上对当局负责。他用第一流喜剧角色的激情讲述他编造的诙谐轶事,使编辑部人员十分开心。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是半俄罗斯半

① 阿·罗斯默:《大战期间的工人运动》第244-249页。

② 《阿克里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319页。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她在《我们的言论报》上揭露她的老朋友兼门徒墨索里尼,是她使墨索里尼脱离贫民区成了意大利党的显要的,而墨索里尼当时却力主中立的意大利参加战争。巴拉巴诺娃还把比较重要的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成多种语言,特别是译成意大利文,从而帮助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大多数人坚持反对战争。《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队伍还包括以下诸人:后来十月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索柯里尼柯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署者、财政人民委员及外交家、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还有几个著名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

在编辑部以外的撰稿人中,首先应当提及的是驻伦敦记者契切林(Чичерин),他是俄国头号贵族家族的后裔、前沙皇大使馆秘书,他放弃外交生涯,暗中培养他一生对革命、音乐及历史的伟大激情。多年来,他是巴黎法国社会党蒙特派纳斯支部所熟悉的人物。他常常裹着一件西班牙式的大斗篷,午夜前在那里出现,斗篷的衣袋里装得鼓鼓的是书籍、小册子及期刊,数量惊人,而且他还常在那里花上一小时的时间从容不迫地对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发挥他的观点,并把他从衣袋里的参考文库中摘引的引文作为论据。他在后来担任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时仍保留着这样像蝙蝠一样夜间活动的习惯和对尖锐而又从容不迫地辩论的爱好。契切林在巴黎时还是一个孟什维克,但是他太孤僻、太倔强,没有使自己卷入流亡者的政治旋涡中去,因此甚至没有人猜测得出隐藏在他身上的才能。战争使他留在伦敦。托洛茨基在一篇看来未曾发表过的回忆录中说,契切林从伦敦写来的通讯是用一种并不明确的社会护国主义精神写的,但却是这样罕见地敏锐和有创见,以至使托洛茨基乐意把它发表在报上。[1] 大战后期,契切林在英国

① 托洛茨基档案。

因其反战宣传而遭拘捕。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和莫伊谢·乌里茨基两人以前都是孟什维克,但厌恶“社会护国主义”并迅速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程度不同地经常从瑞典和丹麦来稿,柯仑泰后来是列宁的初期政府中的社会福利人民委员,而乌里茨基——他曾在维也纳《真理报》工作过——后来成为1917年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撰稿人名单中还包括有:费多尔·罗特施坦(Фёдор Ротштейн)(英国宪章运动史家,未来的苏联驻波斯大使)、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和未来的苏联驻伦敦大使马伊斯基(Майский)。拥有这样一群杰出撰稿人的报纸是罕见的。

编辑部的成员都一致反对大战和“社会护国主义”;不过,除此以外,他们却代表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每天上午在印刷所里举行的编辑会议最后都发展成为热烈的辩论,这些辩论也在报纸的各专栏中反映出来。情况往往是:对外的一致实际上掩盖着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分歧,争论所涉及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并不相干;而辩论往往变成激烈的争吵。如果这些争吵并不显示出即将成为大党及群众运动的领导集团与个人的重新组合,我们尽可不予理睬。在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仅次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最重要的革命实验室。报上热烈争论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划清国际主义者与社会护国主义者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界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如何坚决地划分?以划到什么程度为定局?那些集团和个人企图答复这类问题时不是彼此接近起来,就是分道扬镳;其中有些人开始时似乎意见一致,但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已站在那条界线的这一边或那一边了。

一般说来,有三个集团设法影响《我们的言论报》。马尔托夫尽力要把他忠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忠于孟什维克调和起来;然而他逐渐把对布尔什维克的旧日怀疑转为怀疑列宁倡导的单一

"生硬"的国际主义。在另一极端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头浪子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其次还有卢那察尔斯基,战争的冲击正把他们推回到列宁身边来。托洛茨基处于中间位置,他试图约束亲布尔什维克集团,又要说服马尔托夫应与孟什维克的社会护国主义者割断关系。卢那察尔斯基说:"编辑部会议在长时间的争论中拖延下去,在这一过程中,马尔托夫的意见的灵活性令人吃惊,而且他总是用躲躲闪闪的狡猾手法避而不作明确的答复。……托洛茨基常常非常生气地攻击马尔托夫。"[①] 其实,马尔托夫在第一期报纸上曾斥责过他的一些追随者;[②] 但几个星期后他却争辩说,指责"社会护国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③] 于是亲布尔什维克集团愤然转而反对马尔托夫;但是,托洛茨基尽管在争论中很生气,仍然避免同马尔托夫决裂。

然而最近的事变及欧洲社会主义的不断瓦解迫使托洛茨基在思想上回顾过去的争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新眼光去看列宁"。这一改正尽管是渐进式的,其间也有微小的迂回曲折,但也可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例如,1915 年 7 月,他曾承认说:战前俄国党内的分裂和当前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承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主义中已成为国际主义部分的核心。但是他仍然怕他们一心要支配非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者。[④] 马尔托夫反对这种言论以及类似的说法,对托洛茨基在报上提出的方向拒绝承担责任,而且以辞职相威胁。同时,列宁则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说他的国际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因

---

① 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 23－26、68 页。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5 年 1 月 29 日第 1 期。马尔托夫在该期上表示跟彼得格勒出版的孟什维克期刊《我们的曙光》断交。

③ 同上,1915 年 3 月 5 日第 31 期。

④ 同上,1915 年 7 月 23 日第 146 期。

为这并不妨碍他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护国主义者合作。

在这场争论中,发生过一件当时的重要事件,托洛茨基在其中起过主导作用。1915年9月5日,在瑞士伯尔尼市郊外山间的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会议,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举行国际会议的倡议是由意大利社会党人提出来的,他们过去一直违抗战前的国际,不想召集会议。这一年早些时候,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奥迪诺·莫尔加利(Ordino Morgari)去巴黎要求国际的主席比利时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召开执行局会议,王德威尔得回答说:“只要德国士兵奉命居住在比利时工人的家里,就谈不上什么召开执行局会议。”莫尔加利问道:“那么,国际岂不成了协约国手中的人质了吗?”王德威尔得回答说:“不错,是人质!”当时莫尔加利要求至少召开一次中立国社会民主党的大会。当王德威尔得对这一建议也加以拒绝时,这位意大利代表向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及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建议,要召开一次独立于老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三国际先驱的运动就这样产生了。①

来自交战国和中立国的11个国家的38位代表在齐美尔瓦尔德集会,重申他们的国际团结。② 以几位在德国国会中有影响的议员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带来身陷囹圄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狱中的贺信。法国代表团给人的印象不太深,因为法国党内的反军国主义的团体力量薄弱,到会的只有几个工团主义领袖。列宁代表布

① 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5月10日第109期上曾叙述齐美尔瓦尔德大会的准备工作。

② 大会开幕前,俄国人开会讨论他们的代表问题。《我们的言论报》派出3个代表: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曼努伊尔斯基,他们代表编辑部人员中的3种态度。列宁怀疑他们的证书,因而马尔托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弃权,支持托洛茨基。大会在只有列宁一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允许托洛茨基出席并给予他完全的表决权的决定。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9日第212期上讲到这一点时稍含不满。

尔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孟什维克,拉柯夫斯基和柯拉罗夫(Коларов)来自巴尔干,还有从波兰,瑞士,荷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来的代表。在正常时期不会认为这样的集会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但在那些连交战国公民间相互接触都是犯罪的日子里,只要著名的工人领袖们隔着有刺铁丝网和流血的战壕"握起手来",对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就是空前的挑战。

然而,大会的参加者在目的方面并不像他们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一致。大会的多数派是和平主义者,热衷于重申他们的信仰,而不想走得更远。以列宁为首的少数派第一次作为国际的,而不只是作为俄国社会主义潮流的主角站出来,它力主大会要对所有交战国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号召人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宣布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对此,多数派加以拒绝。托洛茨基虽不愿赞同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他写道:为了社会民主主义,战争应以没有胜利者与被征服者而告终),但在大多数观点上他是和少数派一致的。此外他认为,为了使大会能一致谴责战争,应当越过这些分歧。对此每个人都赞同,因而要求托洛茨基起草一份原则性的声明,这份声明不久就成为闻名于世的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他在这份宣言中激动人心地描绘了使欧洲对垒的困境,指出责任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各国资本主义政府以及自动叛变的社会民主党;他号召劳动人民从沙文主义的陶醉中清醒过来,结束屠杀。声明尽管振奋人心,但结论并不明确。它没有要求用国内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大战;也未对一个新的国际作出展望。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但列宁集团在记录中留下它对此有所保留的声明。最后选出国际委员会,虽还没有指明反对第二国际。这个国际委员会后来成为第三国际的核心。

全凭运气不错,托洛茨基才能安全回到法国。在边界上他的行李被打开检查,他在行李里带有齐美尔瓦尔德大会的全部文件。

一个检查人员把文章拿起来,但是看到最上面的一页上有引人注目的一行护国标题《沙皇万岁!》,他就不耐烦再检查下去了。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期间,托洛茨基已给文件做了伪装的封面,同时复制了从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转变为护国者的古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e)的文章中摘出的那些字句。在巴黎,新闻检查机关查禁了关于大会的报导。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大会还是举行了,检查官先生,而且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法国报纸不只一次写道,卡尔·李卜克内西挽救了德国的荣誉。齐美尔瓦尔德大会挽救了欧洲的荣誉。"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一位迟钝的教授在《辩论报》上曾写道,大会并无意义,这给了德国以安慰;莱茵河对岸的一位同样迟钝的教授却写道,大会并无意义,这给了协约国以安慰。如果大会这样不中用,这样没有意义,为什么每逢说到大会,你们的上司就禁止呢?为什么你们自己不顾所有禁令,不得不开始讨论这次大会呢?先生们,你们还会讨论大会的。……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把这次大会从欧洲的政治生活中抹掉。"① 这篇文章被新闻检查官大肆删节,报纸上开天窗的空白所占的篇幅比印出来的内容还多。

托洛茨基来到巴黎以后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法国的一些反对军国主义团体保持着联系,先和马尔托夫一起,后来独自一人,这些团体主要是以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布尔德朗(Bourderon)及梅尔黑姆(Merrheim)为首的工团主义者团体,他们后来建立了法国共产党。托洛茨基按时出席这些团体的每周会议,这些团体受到警察严密的监视。他的政治经验使他们获益匪浅;他对他们说明战争背景及外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他激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政策方针,使他们投入齐美尔瓦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19日第218期。

尔德运动。因此他起了法国共产党的“教父”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同法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这些活动外，他继续为《基辅思想报》写通讯，以此谋生。《基辅思想报》拥护战争，因此他在文章中不得不小心地看风使舵，避免与该报关系破裂。《基辅思想报》的编辑非常乐于发表巴黎通讯中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谴责，但对协约国的批评则不欢迎。托洛茨基能告诉俄国国内读者的真相只是他见到的一半，即用某种方式设法使之适合俄国官方政策的那一半真相。遇到机会时，他就设法用某种方式使机灵的读者会推测到另一半遭到封锁的事实。对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来说，这种处境是很难堪的；因此他越来越局限于写报导和严格的军事述评。

这个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公然蔑视世界上的强权，而他写的宣言传遍了全欧洲，但他并没有摒弃报纸的工作。他到法国南方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去搜集种种现象，测定战线后方的情绪。他像曾在巴尔干战争中干过的一样，访问医院，跟伤员交谈，在法国小城镇的咖啡馆和市场上跟英、法士兵混在一起。他怀着永不衰退的好奇心倾听着战时难民——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惨痛陈述，他们的经历记满了他的笔记本。回到巴黎，他在罗通德咖啡馆里一天总要读20来份欧洲的报纸，在一天中的几乎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在这家咖啡馆里找到马尔托夫。从罗通德出来后，他奔到图书馆去研究重要的英、法、意、德、奥和瑞士的军事期刊和著作。他在这些旅行和研究中得到了放松，并恢复了精力，也为他日后将负的重任预先作了准备。如同汉普夏掷弹兵团上尉的经历对罗马帝国史学家吉本(Gibbon)不无用处一样，认真严肃的军事记者的经历来日对这位红军的缔造者是很有用的。

自从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声望失色以来，他《全集》中重版的军事通讯也被人们一起忘掉了；然而它们和他在内战年代的著作合

在一起应能为他在军事思想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同几乎所有认真探究军事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古典战略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不是职业军事家,但是他具有超过当代克劳塞维茨派和反克劳塞维茨派的军事专家的优点,这一优点就是,他看到武装冲突的背后还有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的较量,此外他对交战各国的士气具有更为敏锐的眼光。

几乎从战争的头几个星期起他就跟专家的普遍意见相反,他预见到壕堑战是持久流血的对峙,嘲笑德国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军队的进攻力量上的克劳塞维茨的追随者。[①] 但他也不同意法国人特有的对纯防御战略和消耗战的幻想。他指出,他们的防御观念一再迫使法国人进行代价沉重而无功效的进攻,消耗战只会比常规战流血更多,而不会更少。他说明军事的对峙是两个敌对联盟双方经济资源的均势造成的结果。我们在这里只能直截了当地总结说,这种分析方法使他在大战的头三年里能以罕见的准确性预见到连续军事行动的进程。他把无情的战略僵局的前途和革命的前景联系起来,因为他认为,壕堑战的对峙几乎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会逐渐削弱旧社会的基础,终将促使人民失望和造反。他的确也有时指望战略和科技的发展会打破僵局,但战争不到最后是不会打破僵局的;他差不多预见到坦克的发明。[②] 然而,从整体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7-15页。

② 他曾预测战后军事领导人会忘记或者忽视这种决定战争结局的新武器,其实他也就几乎是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总参谋部对坦克的忽视。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190页。当源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的马奇诺防线开始出现时,他事先就用讽刺挖苦的话驳斥这一幻想。"法国(防御)的胜利如此明显,不但使军事专家,而且使……和平主义者都心悦诚服,其中有一个……得出妙不可言的结论:如果用连续不断的战壕加固并用强大的电流划分国界,就可完全消灭战争,这是一个可怜、堕落的和平主义者,他竟然要在战壕里寻找避难所。"同上引书。

来看，如此漫长而千真万确的势均力敌和不断自相残杀的噩梦给他的军事思想投下阴影；甚至在大战的最后一年也仍然如此，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这使他在那一年犯了重大的判断错误。

即使在他独立观察战争的进程、渴望吸收军事理论的时候，流血和发狂的欧洲悲剧仍在支配他的思想。这样全神贯注于战争中“人的因素”，使他的军事著作远在内行人的水平以上。例如他的文章《带刺铁丝网与剪刀》就是一篇对壕堑战进行技术性研究的论文，其中同时又直观而富于想象地设想它对卷入壕堑战的庞大军队的心理影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连战壕也没有见过——他竟能这样详细地洞悉战壕的陌生环境，使雷马克（Remarque）、茨威格（Zweig）、哈塞克（Hasek）、谢里夫（Sheriff）、巴比塞（Barbusse）、格拉塞（Glaser）及其他作家在战后写的自传体小说和剧本都大受启发。

我们曾反复提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命运以及人们阅读或忽视他的著作的程度如果同他的政治命运或同仅仅因他的姓名引起的同情和反感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么单凭他这些文章的力量也会使他在文坛上流芳百世。他的叙事作品尤其如此。在这些作品中，他常常记述一个士兵的冒险经历，借此揭示战争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1915 年 2 月他在加来写的《比利时史诗中的第七步兵团》中，他描写了鲁汶大学一个法律系学生德·巴埃的经历，他把被人侵并被占领的比利时的全部戏剧性都集中表现在德·巴埃这一人物身上了。他从大战爆发起就注意这个青年律师，通过对动员的混乱、战斗、退却、包围、脱逃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然而却十分普通的场面的描写，使人们看到和感到被侵略人民那自然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的苦难、惊慌失措和偶发的英雄主义——那种悲剧与喜剧交织在一起的英雄主义。但最触目惊心的还是战争中那些无穷无尽的荒唐行为。大学生德·巴埃在战壕中经历过骇人

听闻的折磨,后来他被选派到军事法庭为士兵伙伴们充当辩护律师;他回到战壕,无意中立了战功,人们以隆重的仪式给他授勋。以后,他的连队被围困,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只是在紧张中丢了眼镜。他被送到法国的一家医院。因发现他是高度近视而不宜当兵,就让他退了伍。他在外国被军事机构抛弃后根本找不到工作;作者遇到他时,他正处于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境地。因为故事非常现实、朴素,读起来就像现代化了的《战争与和平》书中的断片。作者没有进行宣传,他的主人公也不是无产阶级,被侵略的比利时人的爱国感情和作家的政治观点似乎矛盾,但他用如此强烈的同情去描写,使故事也许非常适合列入沦亡的比利时的爱国文选;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暴露了战争的荒唐。

《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笔记》是用同样风格写的。文章把另一个小国史诗的焦点集中于托多尔·托多罗维奇这一人物的历险上。这个小国先是受到列强的奉承,尔后被列强利用、剥削,再往后遭到列强的蹂躏。托多尔·托多罗维奇是受奥地利统治的巴拿特的塞尔维亚农民,他从奥军中开小差逃出来,拖着沉重的步伐随同撤退的塞尔维亚军队走过正在燃烧的乡村和冰封的大山。他经常处于危险中:不是被奥地利人当做逃兵或塞尔维亚叛徒,就是被塞尔维亚人当做奥地利奸细,总有被枪决的危险。他每次都悲喜剧式地逃脱掉,继续跋涉,盯着但丁式的恐怖情景,直到他几乎成为在这冲破文明薄壳的原始野蛮的暴行中绝望之人的象征。[1]

托洛茨基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例如在《战争的心理困惑》中努

---

[1] 《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87-112页。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5月16日)上问:"把讽刺的镜子放在资产阶级欧洲面前的现代斯威夫特在什么地方?"他讽刺地描写了德国和法国的大使、总参谋长和学究们如何各自为自己护国的目的力图利用塞万提斯的诞辰纪念。

力探索欧洲人在大屠杀中的内心状态。他推想战壕里的人不容易使自己适应“正常”的社会：

>……目前的灾难将会在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中喷发出血腥的辐射，未来的几代人将据此看待他们自己的命运，正如欧洲迄今一直感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辐射一样。然而那些事变……同我们现在正进行或经历的事变，特别是同我们面临的事变比起来是多么渺小。人的精神倾向平庸，只是慢慢而勉强地向这些巨大事变的高峰攀登……这种精神本身不知不觉力求要缩小事变的意义，以便能比较容易吸收。……并不是我们的头脑主宰重大的事变；相反，从客观历史的巨大力量的结合、联系及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事变却迫使我们呆滞而懒散的头脑慢吞吞地蹒跚着自我调整，以适应事变。对如此有害于我们的第二天性——妄自尊大这一事实，文明各国当前的灾难用全部枪炮武器的轰鸣声大声抱怨。①

※ ※ ※ ※ ※

到1915年年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裂痕已经加深。以列宁为首的少数派愈来愈强调要与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试图保持中立的那些“中间派”分子断绝关系。各交战国得到“社会护国主义者”的支持，着手镇压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把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及其拥护者关起来或送往战壕，争论因而渐渐激烈起来。杜马中孟什维克代表的行径——对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审判并把他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244－248页。这段话写于1915年9月。

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激怒了俄国流亡者的感情。孟什维克代表的领袖,格鲁吉亚人齐赫泽(Чхеидзе)曾在杜马讲到齐美尔瓦尔德的情况,他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作辩护时态度如此敷衍塞责、模棱两可,以至于他的辩护等于否定。列宁立即斥责齐赫泽,并且坚持认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每一个俄籍成员都应当对之加以斥责。

当俄国国内的维拉·査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出来拥护战争时,使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这对托洛茨基是一个新的打击,使其幻想破灭。当初,由于忠于这些党的老战士,他和列宁产生纠纷;此时,他虽已比老战士更成熟而且也跟他们发生过分歧,但他仍然没有减少对他们的忠诚。这时他看到他们(除流亡国外的阿克雪里罗得以外)都在"背离事业"。他在战前和齐赫泽在政治方面也一直有联系:他在1913年写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是吵架大师……是利用俄国工人运动落后性的行家……"。[1] 这封信就是写给齐赫泽的。当时托洛茨基还是试图为齐赫泽的行为开脱;但是他与维拉·査苏利奇绝交时和他与帕尔乌斯绝交时的心情一样沉重。[2] 他不只一次地不得不自问,是什么使老近卫队员放弃了他们的原则?列宁摒弃他们而走自己的路是否始终是不对的?

托洛茨基在自传中陈述说他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化是一个主动向列宁愈来愈靠拢的过程,而对若干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的人给他的影响并未作任何公正的评价。《我们的言论报》的文章表明的真实情况是:编辑部中的亲布尔什维克的人员促使他向这条

① 这封致齐赫泽的信是在1921年俄国内务部的档案中发现的。主管党的档案工作的奥里明斯基致函托洛茨基,询问该信是否应该发表。托洛茨基建议不要公布该信,他说,重提以往的争执是不明智的,尤其是他并不认为他所写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书信都是错误的。参见托洛茨基1921年12月6日致奥里明斯基的信,托洛茨基档案。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3月9日第58期。

道路迈进。尽管这些人员与他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在掌握改组分化的趋势方面却比较敏捷,而且力劝他放弃旧时的忠诚而从新形势中得出结论。[①]

(他们中的一个写道)一个人不应也不必同样抱有列宁集团的宗派偏见……但是不能否认,……在俄国,在政治行动最激烈时,所谓列宁主义本身是没有宗派特征的……而且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的报纸)有关的工人团体现在在俄国是唯一积极的、一贯的国际主义力量。……那些游离于派别之外的国际主义者,除了同列宁主义者结合外别无出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加入列宁的组织。……当然,经过这样的合并,我们会失去某些宝贵的特点,但是阶级斗争精神并不生活在书本的实验室里,而是在群众政治斗争的动乱和紧张中,只有在这里它才能振奋起来、勇往直前。[②]

另一个撰稿人以前是孟什维克,他力图说明为什么创立俄国社会主义的前辈会变为"社会护国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这些前辈以批判民粹派唯意志论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他们的政治与写作生涯,这给他们的观点留下持久的影响。他们和民粹派争论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客观条件"上,即从历史角度来看,什么在俄国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样就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宿命论的奴隶。孟什维克在分析俄国的社会条件和试图使运动欧洲化方面无

① 当1929年托洛茨基写他的自传时,前《我们的言论报》撰稿者中的大多数亲布尔什维克的人都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1月19日第15期。

疑是有功的(这些功劳——作者补充说——是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和孟什维克所共有的)。但是孟什维克完全忽略了培养革命意志,即在其活动的社会条件范围内改变该社会条件的革命决心。决心和行动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说是和社会条件决定论同样重要的;而这一原则(作者这样总结说)已在列宁集团中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事变的潮流使孟什维克漂到社会护国主义的下场而使布尔什维克有力量抗拒潮流的原因。[①]

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特别是前者仍按同样的方式争论,仍然拒不承认列宁主义是"新国际主义者意识形态的既成的、圆满的形式",仍然批评列宁主义的"狭隘的民族偏见和生硬、粗暴";然而曼努伊尔斯基却坚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强调决心和行动,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核心。他写道:"在革命主动性方面,历史已把俄国工人阶级摆在比西方无产阶级更为有利位置上。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义务比赋予欧洲工人的更为崇高。"尤其迫切的是要找到和列宁集团的共同语言。曼努伊尔斯基谨慎地、不点名地批评托洛茨基试图为齐赫泽及其他孟什维克代表的模棱两可的行为辩解。[②]

所有这些影响对托洛茨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就连像曼努伊尔斯基这样的人都对布尔什维克的"宗派主义"及其特有的俄国性怀有厌恶感,那么这种厌恶感在托洛茨基心里就更为强烈了。但是他也宣传要和"积极而有影响的列宁集团"密切合作,尽管他仍然怕和他们单独在一起。[③] 当他把跟布尔什维克建立友

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波兰社会党人 K. 查列夫斯基,他在战前和孟什维克取消派站在一起。《我们的言论报》1916 年 2 月 11、12 日第 35、36 期。

② 同上,1916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第 75－78 期。在这几期中托洛茨基继续在不署名的社论中为齐赫泽辩护。

③ 同上,1916 年 4 月 14 日第 89 期。

好关系作为编辑方针的原则时,马尔托夫在经过多次的"最后通牒和反最后通牒"之后终于不满地退出了《我们的言论报》。[1]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又断绝了他与一个老朋友的友谊,就是这样再向列宁和第三国际靠近了一步。

然而,不仅是托洛茨基,甚至连列宁还都没有下决心立即退出第二国际。1916年春,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引起的反响而惊恐起来,他们终于在海牙召开国际局会议。洛佐夫斯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强烈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抵制这次会议,或者参加会议也只是为了示威性的宣布:不再参加战前的国际组织。托洛茨基在答复中要求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一答复对第三国际的历史学家相当重要,托洛茨基说:"……我们左派身后如果有群众,也许可能采取抵制海牙会议的立场。或者像洛佐夫斯基过早对结局下判断因而片面劝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到海牙去只是为了进行示威……但是工人运动的内部调整迫使我们在他们的国际(第二国际)中暂时采取左派的立场也是有可能的。"[2] 托洛茨基回忆说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产生并非是因为明确试图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及列宁那样明确。1916年4月底,列宁被获准参加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第二次大会。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因为当时法国当局不许他过境。但是他不顾猖獗的检查制度,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声明他和昆塔尔决议一致。[3]

仍然使托洛茨基与列宁有隔阂的是在一些更大问题上的分

---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4月19日第93期。

② 同上,1916年4月23日第97期。托洛茨基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引用布哈林主编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共产党人》所表示的相同意见。

③ 同上,1916年5月12日第111期和5月17日第115期。另见1916年9月2日出版的那一期。

歧。首先是对革命失败主义的看法不一致。托洛茨基写道:"革命并不关心什么积累更多的失败。"而列宁则阐明了俄国的军事失败有利于革命这一观点。从表面上判断,在这里似乎是两种截然对立、彼此冲突的观点;未来的斯大林派的历史学家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实际上这是宣传的重点不同,而不是方针政策的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力主社会民主党人要把战争转变为革命并要在工人和武装部队中传播他们的思想观点,即使这样会在军事上削弱他们的国家。双方一致认为对本国失败的担心不应使社会民主党人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尽管列宁对其失败主义观点的强调带有刺激性,但他并不要求追随者去进行或者鼓励别人去进行破坏、开小差或其他严格意义上的失败主义活动。他不过是在论证:虽然革命的鼓动会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职责和道义上必须进行这种冒险,以期德国革命家会同样行动,从而使所有帝国主义政府由于国际主义者的共同努力而最后遭到失败。在革命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推进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战败都将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托洛茨基,和他一起的还有列宁的不少追随者,决不把革命的命运完全与战争失败联系在一起。[1] 托洛茨基论证说,无论军事形势如何,都要充分宣传和准备革命。以各人所持的观点来看,双方的态度都各有其优点与不足。托洛茨基的非失败主义并不会事先招致别人指责说,这位国际主义者是在帮助敌人,使敌人舒服。列宁的态度尽管在策略上有其明显的不便之处,但能更有利于使革命家对好战的护国主义产生免疫力,更有利于在他与他的对立面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 1917 年,反战态度的这两方面互相融合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上并没有引起争论或不和。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6 年 3 月 21 日第 68 期;《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0 期。

另一场争论是关于"欧洲联邦"问题。"欧洲联邦"虽然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但列宁早在1914年9月在他自己论社会民主党人的战争政策的文章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点。"欧洲联邦"集中体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不可动摇的希望，他们希望大战结束时无产阶级革命会席卷整个欧洲。但列宁却反对托洛茨基提出这一思想的方式，因为托洛茨基有时似乎暗示说，只有在欧洲起义的同时俄国才能爆发革命。列宁指出，这一观点可能会成为消极无为的借口，因而可能会引导任何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消极地等待"别的国家开始革命"；或者它可能含有和平主义的幻想，幻想欧洲联邦能在资本主义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列宁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①] 托洛茨基曾给这种批评提供过某些依据，当时他由于展望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陆的壮丽远景而难以自制，曾争辩说，大战瓦解了民族国家，也破坏了革命的国家基础。[②] 如果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全部论据的倾向，那么，列宁对这些话所作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托洛茨基一贯论证说，俄国革命会首先胜利，而俄国革命的胜利会促进其他国家的革命。

对列宁的批评，托洛茨基回答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斗争中绝不应该袖手等待别的国家先动手，这是一个首要的思想，反复阐明这一首要思想是有益的。……我们不等待别人，而是必须在我们国家领土上开始斗争，完全确信我们的首创性对别的国家……会有促进作用。"[③] 他继续发挥一个论点，而这一论点包含着不是与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7页。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2月24日第23期。

③ 同上，1916年4月12日第87期。

列宁,而是与列宁的继承者争论的萌芽。托洛茨基写道:确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革命可能先在一个国家内取胜。然而,发展不平衡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某些欧洲国家在经济、文化上比其他欧洲国家先进;但欧洲作为整体比亚洲或非洲更进步,因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成熟。所以不必去仔细考虑革命的不断性或长期孤立在一个国家中这两种前景。没有必要陷入到"那种促使人们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做是注定要把人类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民族革命救世主这种情绪中去。如果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话,那么,这种救世论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国家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虽然不能不在国家基地上开始,但是在欧洲各国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像在目前这场战争中这么明显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在国家基地上完成的。"[①]

列宁与这种立场并无争论。[②] 在托洛茨基的有关言论中现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其所持否定态度的设想正是他的预见: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做是"注定要把人类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那种"民族革命救世主的情绪"。斯大林在后来的岁月中就成为这种"情绪"的代表。

※　※　※　※　※

---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4月12日第87期。

② 当然,托洛茨基认为指望资本主义的欧洲联邦是乌托邦,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写道,德国军国主义力图在它的统治下统一这个旧大陆,但是它即使成功了,也只会是强制性的军事同盟和关税联盟,是德国军国主义用火和剑写成的嘲弄欧洲联邦的讽刺性摹拟作品。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人民的自愿联邦。同上,1916年2月4日第29期。

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将满两年时，1916年9月15日，法国警方取缔了《我们的言论报》，第二天就命令托洛茨基本人离开法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向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提出抗议，命令才得以推迟执行。驱逐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我们的言论报》不可能说超过检查制度所准许说的话；尽管托洛茨基常同检查官争论，嘲弄检查官，但他还是审慎地遵守自己的办报方针，法国政府也没有把托洛茨基与力量尚薄弱的法国反战团体的接触当回事。但既然沙皇大使馆阴谋反对革命流亡者，法国政府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遵从其盟国的愿望。一件意外事件助长了沙皇大使馆的阴谋。由于一个俄国警察局特务的挑拨，在马赛登陆的俄国士兵中发生了兵变；据称兵变者是受《我们的言论报》的影响所致。托洛茨基唯恐法国要把他引渡给俄国，为获准能进入瑞士、意大利或经过英国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努力了6个星期，但没有成功，10月30日两个警察局特务拘留了他，把他押往西班牙边境。

他在被驱逐前给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茹尔·盖德写了一封“公开信”：

> 一个忠诚的社会党人可能不反对您吗？当资产阶级社会——你，茹尔·盖德曾是这个社会的死敌——的真实性质已愈来愈彻底暴露出来的时候，你却把社会党变成温顺服帖的合唱团，为资产阶级的罪恶活动领头人伴奏。……巴贝夫、圣西蒙、傅立叶、布朗基、巴黎公社、饶勒斯和茹尔·盖德——是的，也有你茹尔·盖德——的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艾伯特·托马斯（Abert Thomas）跟沙皇商议夺取君士坦丁堡最有把握的办法。……茹尔·盖德，请你

从军用汽车上走下来,从资产阶级政府把你关闭起来的笼子中飞出来,稍稍向周围环顾一下吧。命运也许会再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怜悯你可悲的晚年,你会听到即将来临的事变无言的声音。我们等待事变,我们召唤事变,我们酝酿事变。①

他进入西班牙,希望从那里去意大利和瑞士——他的意大利朋友还在设法为他争取得到入境许可。但是当法国人强迫他越过西班牙边境时却已警告西班牙警察局说,有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已潜入他们的国家了。他在圣塞瓦斯蒂安逗留了一天,在旅馆里,他怀着悲凉、嘲讽的心情凝视挂在床头的一幅《罪人之死》的画。他从圣塞瓦斯蒂安去马德里,期待着从意大利来的消息。在那儿他跟欢乐喧闹的群众混在一起,观看了几场别致的典礼并记下笔记,一共消磨了10天。他不懂西班牙语,除了在法国保险公司西班牙分公司担任经理的一名法国社会党人之外,他在马德里没有其他熟人。11月7日这一天——翌年的同一天,他将领导布尔什维克起义了——他在普拉多度过,他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对西班牙古典绘画不朽成分的回顾,并把它与虽庄重不足,但更加令人感到亲切且精巧的法国印象派艺术的感染力相比。

两天后,他在观看体育比赛时被警察局特务发现,并被逮捕。他唯恐西班牙警方会把他送上开往俄国的轮船,就往四处发电报、写抗议信。他在致西班牙内务部长的信中以其惯用的华丽辞藻和嘲弄口吻声明他不懂西班牙语,不认识任何一个西班牙公民,没有发表过一行用西班牙文写的文字,只不过参观了博物馆和教堂。

① 转引自1950年9-10月号《新国际》上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洛茨基》。

马德里警察局局长向他说明，逮捕他的唯一理由是"他的观点对西班牙来说有点儿太进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和党的报纸开始纷纷要求释放他。3天后，命令将他押往加的斯，准许他在警方并不严格而且几乎是喜剧性的监视下逍遥自在地留在那里等待第一艘可载他离开西班牙的船只的到来。[①]

托洛茨基在加的斯度过了6个星期。在此期间，他用连珠炮似的抗议轰击西班牙政府。他在警方一个特务的陪同下在一所古老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图书馆里静得"使人能听得见蛀虫咬穿书页的声音"。他钻研英、法文的古籍，记笔记，摘录的内容是关于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关于斗牛的印象，关于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失败，关于列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阴谋等等。[②]一艘开往古巴的船只终于进了港。他拒绝上船，经过抗议，又过了一些焦灼不安的时刻以后，才准许他留下等待开往美国船只的到达。他的意大利朋友写信告诉他说，他们希望不久能为他搞到意大利和瑞士的签证。"当我已在加的斯时，"他说，"整个欧洲都对我变得殷勤好客起来。"12月20日他获准在警察的押解下前往巴塞罗那，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已从巴黎到达那里。他同家人从巴塞罗那乘一艘破旧的西班牙轮船航行，船上挤满了从欧洲各国逃离的有钱人和被欧洲各国"抛弃的"穷人。这艘船挂着中立国旗号，至少可以免遭德

---

① 在马德里牢狱中，他在日记中作过长篇记述，幽默地描写了这个牢狱以及牢狱的管理当局和狱中的囚犯，还描述了他与看守的争论。其中一个犯人是曾偷遍半个世界的"贼王"，犯人和看守都敬重他。"贼王"想要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加拿大能给一个大胆窃贼提供什么机会——确实，一个懂多种语言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加拿大吗？'我含糊地回答说，'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农民和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像瑞士人一样，私有财产意识相当强！'"

② 他在访问过加的斯这个老港口以后（他在那里目睹了野蛮的吵架），在日记中记下："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需要巨大的螺旋千斤顶。"

国潜艇的袭击。轮船在那年的最后一天驶过直布罗陀海峡。

托洛茨基写信给阿尔弗雷德·罗斯默说:“这是我向那个卑鄙下流的旧欧洲投下的最后一瞥。”

※ ※ ※ ※ ※

1917年1月13日,一个阴雨寒冷的星期天早晨,他在纽约港上了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侨民热情欢迎这位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响起了不断的问候声和欢呼声。[①]

5年前在维也纳拜访过托洛茨基的俄裔美籍共产主义者M.奥尔京(Ольгин)说:托洛茨基“显得憔悴,老了一些,脸上有劳累之色,他的谈话紧扣社会党国际的瓦解这一话题”。这也是他到达美国后不久在纽约、费城及其他城市向俄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和犹太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发表演讲的主题。

他和家人在布朗克斯第164大街租下的住所里住下(租金每月18美元)。这套租金便宜的公寓给这个家庭提供了并不习惯的舒适环境:这位未来的革命领袖平生第一次家中有了电话机。形形色色的美国作者对托洛茨基在纽约的生活作过大肆渲染的描述:有的回忆说他做过食不果腹的裁缝,有人说他当过餐馆的洗碟工,甚至还有人说他当过电影演员。托洛茨基否认这些传说;而像齐夫和奥尔京这些当时和托洛茨基接近的人的回忆录并没有给那些传说提供依据。他靠为报刊撰稿以及演讲的收入维持生活。[②]

---

① A.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68-69页。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2年2月14日发表的一篇有趣的“报导”描述说,托洛茨基在《我的正式妻子》影片中扮演火车站站长的角色。作者说,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演员是失败的,没有个性,没有性感,是一个从不谈政治或社会主义的“胆怯而缄默的人”。

俄国流亡者的在纽约出版了由布哈林、柯伦泰和沃洛达尔斯基(Володарский)编辑的日报《新世界报》。托洛茨基立刻成为这份报纸的骨干。这是他第一次和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密切合作。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主编他的《真理报》时,布哈林也在维也纳,但是那时激烈的派别斗争使他们分开。此时他们结下了动人的友谊,但这种友好关系仅仅持续了8年,尔后,即在布哈林成为斯大林的搭档以后就破裂了,当然并不彻底。原先是孟什维克的柯伦泰成为列宁的狂热信徒。自称"出身及生活方式都是一个美国工人"的美籍俄国人沃洛达尔斯基也深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把美国人的干劲和组织带入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来。托洛茨基虽然还未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但已跟这些人打成一片了。

他在美国的居留时间持续了不过两个多月,他几乎没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生活,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不过窥视了一下将在其中锻造人类命运的铸造厂而已"。纽约使他入迷,大战以来,美国财富迅速增长的统计资料的证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卑鄙下流的旧欧洲",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意义最大的经济事实是:欧洲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我仍感到我是一个欧洲人,我羡慕地看着纽约,不禁担心地问自己:'欧洲能承受得住这一切吗?它不会变成墓地吗?世界经济文化的重心是否会转移到美国来?'"[①] 从此以后他一直梦想美国该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出崭新的、伟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论在规模上或能量上都超过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并正在作出的贡献。但此时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暂时还缺乏自信、眼光短浅、荒唐可笑,而且受巴比特式社会主义者的离奇变种所领导。这种人物"平常从事商业,到礼拜天则无精打采地对人类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308页。

的未来作一番思索”。例如,他把“巴比特中的巴比特”——希尔奎特(Hillquit)说成是“极其成功的牙医的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代言人”。唯一的例外是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尽管他不是一个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勇于赴汤蹈火的先驱、殉道者,“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火焰尚未熄灭……每当我们见面时,他都和我拥抱亲吻……”。①

※ ※ ※ ※ ※

1917年3月中旬之前,首次传来俄国首都发生动乱的混乱消息。因为通讯中断,电报局还只报告是“抢购面包的骚动”。但托洛茨基于3月13日就已经在《新世界报》上写道:“我们是俄国第二次革命开始的目击者,我们希望我们许多人都会成为这次革命的参加者。”激动的热潮席卷着俄国侨民区,那里连续不断地举行集会。当时的孟什维克,“社会护国主义者”齐夫博士写道:“在所有这些集会上,主要的大事和理所当然的高潮就是托洛茨基的演讲。有时,大会延迟了几个小时,因为托洛茨基须参加同时召开的许多集会。……但是公众耐心等候他,渴望听他的讲话,因为他能把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阐述清楚。”② 齐夫显然是不满地说: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攻击李沃夫(Львов)亲王刚刚组成的临时政府。托洛茨基在那些集会上大声疾呼说,革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竟会是米留可夫,这个人曾把红旗叫做红色破布,第一任国防部长竟是曾向斯托雷平卑躬屈膝的古契柯夫(Гучков),难道这不是耻辱吗?这个政府中唯一的左派是克伦斯基(Керенский),他只不过是它的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313页。

② A. 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80页。

人质。齐夫的朋友们惊愕地问："托洛茨基怎么啦？他到底要什么？"

从托洛茨基在《新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接受革命的和他对革命的期望是什么。从彼得格勒"抢购面包骚动"的最初消息传来到他离开纽约时的两个星期中，他已充分而清楚地说明了他在这一年中要阐述的主要思想。当李沃夫亲王政府的组成和这个政府要求恢复秩序已为公众所知时，托洛茨基写道："这场革命的强大雪崩方兴未艾，绝非人力所能阻挡。"自由派分子害怕赋予他们权力的群众运动会使他们陷入灭顶之灾，因此他们都在要求结束这场革命。"似乎革命的铁扫帚已经彻底扫清在沙皇宝座周围堆积了好几个世纪的一切反动杂乱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将站起来，一个阶层跟着一个阶层，所有那些一直受压迫、被剥夺、被欺骗的人都将站起来。站在俄国人民群众最前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将完成其历史性的工作：反动的君主主义者无论试图躲在哪里，无产阶级都要把他们赶出来；无产阶级还要向德国及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伸出手去。必须消灭的不仅是沙皇统治，而且还要消灭战争。"①

他指责第一个革命政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及其对巴尔干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图谋，他满怀希望地迎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出现，以为这个潜在的政府一定会表现自己和反对当时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旧政府。当得知这个被孟什维克操纵、由齐赫泽主持的苏维埃明确支持李沃夫亲王的政府并认可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托洛茨基便激烈指斥齐赫泽。曾几何时，他还保护过齐赫泽，使其免遭布尔什维克的指责。他也激烈指责克伦斯基，说"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律师……在革命的天平上并无多大分量"。孟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5－7页。

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召唤农民的护国主义,为他们拥护战争辩解。托洛茨基写道,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谓的农民的护国主义,而是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沙皇统治、地主和资产阶级已竭其所能使农民离开土地革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引导农民从战争回到土地革命则是社会主义的任务。这样,无产阶级士兵会对农民士兵说:"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① 托洛茨基在为美籍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月刊《前进》写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点甚至说得更加明确:"农民群众不等立宪会议的决定,就会在农村揭竿而起,他们将把大地主们从他们的庄园里赶走,一切要终止阶级斗争的努力……必将徒劳无功。庸人市侩们却以为是革命家制造了革命,因而也以为革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刻取消革命。"②

综上所述,虽和事变的现场相隔一个大洋和一个大陆,但托洛茨基透过混乱与矛盾的消息的迷雾牢牢地掌握事物运动的方向,提出革命的种种问题,断然指明他当时认为是革命敌人的人,尽管那些人昨天还是他的朋友。他还必须答复的问题是:哪一个党是真正的革命党,是他的党吗?

他十分准确地预见并描绘了革命的图景,但他给这一图景蒙上一层梦幻。他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起义天真地怀着希望,而且他认为彼得格勒的起义只是前者的序曲,这种希望奠定了他所有思想的基础;在他顺利时,这种希望会使他如虎添翼;而希望的落空马上会使他粉身碎骨。我们从《新世界报》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第一次对这一幻想所作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他以后还作过多次。他正好在离开纽约之前力图答复某些批评者,这些人狂热地认为:即使在李沃夫亲王政府的统治下,也必须保卫俄国,反对德国皇帝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7－20页。

② 同上,第27－28页。

军队的入侵。即令是在此时,托洛茨基也坚持反对战争,他说:

"俄国革命[他如此答复批评家们]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危险比起帝国主义俄国的贪婪和种种图谋来,不知要大多少。革命越快抛弃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强加给革命的沙文主义面具,它就越快显示出无产阶级的真面目,它在德国得到的响应就越加强烈,而霍亨索伦王朝要想扼杀俄国革命的希望和力量就越少,它自己国内的麻烦就越多。

"(批评家问)但如果德国无产阶级未能举行起义,将会怎么样?那时你打算怎么办?

"那么,你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可能不影响德国吗?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情况万一如此,又将如何?

"我们实在不必为这样难以置信的假设大伤脑筋。战争已把整个欧洲变成社会革命的火药库。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正把燃烧着的大火投入这座火药库。认为这不会引起爆炸的假设是违反历史逻辑和心理规律的。但如果未必可能的事真发生了,如果保守的社会护国主义组织确实会在最近的将来阻止德国工人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起义,那么当然,俄国工人阶级就会手执武器捍卫革命……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并号召兄弟的德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一任务要保卫的不是祖国而是革命,并把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7-20页。

因此,他每一次力图答复“万一德国没有爆发革命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时,实际上都在躲避这个问题。看来,他要摆脱他的梦想只是要再钻回到梦想中去,放弃他的希望也只是为了要再抱住这个希望。除了欧洲革命以外,他再也看不到前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生机了。

※ ※ ※ ※ ※

3月27日,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以及一小批其他流亡者乘挪威轮船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从纽约起航,前一天,社会民主党人在用多种语言发言的集会上兴高采烈地与他们告别。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行“体面的”旅行,因为顺利地得到了所有必需的证件:俄国的入境许可证及英国的过境签证;他以为会一帆风顺。大出意外的是,4月3日,当挪威客轮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抛锚时,英国海上警察强迫他和家人一起下船,把他送往阿默斯特的德国战俘集中营,同时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进行严密监视。和他同行的其他流亡者也被拘禁,不能继续航行。他们都拒不向英国审讯官说明他们的政治观点以及他们在俄国打算干什么,他们声称这不关英国海上警察的事。

托洛茨基从集中营打电报向俄国政府和英国首相抗议,但是他的电报在当地被没收了,永远到不了接收人的手中。尽管这样,扣留还是成为政治丑闻。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执行委员会要求释放托洛茨基,它说:“俄国的革命民主政权正急切等待它的争取自由的战士归来,号召那些一生奋斗、为推翻沙皇统治而进行准备的人团结到它的旗帜下面。然而,英国当局许可一些流亡者过境,却阻挡了另外一些流亡者。……因此,是英国政府对俄国的内政进行了难以容忍的干涉,以非法扣留革命最忠诚的儿女来破

坏俄国革命。"全俄罗斯都举行了抗议集会，外交部长米留可夫这才要求英国大使释放托洛茨基。但两天后，他又取消了这项要求，因为他深知除了敌意之外，他从托洛茨基那里什么也得不到。[①]与此同时，由于扣留已延续了将近一个月，托洛茨基怒不可遏，向集中营管理当局提出抗议并且进行猛烈指责。阿默斯特集中营关押着800名德国战俘，他们都是被击沉的潜艇上的水兵，托洛茨基对他们讲话，向他们解释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思想，告诉他们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一直进行着反对德国皇帝及大战的斗争。托洛茨基的讲话在集中营里回荡，集中营的生活变成了"不断的集会"。[②] 集中营长官在德国军官的坚持下禁止托洛茨基对战俘讲话。托洛茨基挖苦说："英国上校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在反对禁令的抗议书上签名的有500多名水兵。最后，米留可夫在搞了不少拙劣把戏和阴谋诡计之后被迫重新要求释放托洛茨基。4月29日，托洛茨基离开阿默斯特集中营，德国水兵在他们的管弦乐队演奏的《国际歌》乐曲伴随下欢呼着一直把他送到集中营大门口。

大约经过3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他于5月17日(俄国旧历5月4日)乘火车经过芬兰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和另一个比利时著名社会党人德·曼(De Man)与他乘同一列火车，并在同一分隔间里，这两个人都急于要给俄国同志灌输好战的护国主义精神。对这次会面，托洛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作过不同的叙述，前者声称自己拒绝与这个"社会护国主义者"交谈，后者则说

① 乔治·布坎南爵士：《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121页；《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5页及以后各页。

② 托洛茨基在小册子《当英国人的俘虏》里描述了他的经历，他回到彼得格勒后立即发表这本小册子(《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

他们进行了彬彬有礼但颇不友好的长谈。[1]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间的鸿沟恰巧横亘在那节火车车厢的分隔间里长达几个小时。

从彼得格勒来的国际主义者代表团在俄国边界迎候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来迎接他,但不无保留:到边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中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知名领导人。在彼得格勒,一群高举红旗示威的群众从火车上把托洛茨基抬到肩上;他当即向这批群众发出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的号召。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5-6页;埃·王德威尔得:《一位社会主义战士的回忆录》第230页。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5月4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当时革命已历时10个星期，在那10个星期中，事变纷至沓来，而且这样迅速，即使对这个从1905年以来一直怀念首都街道和群众的人来说，首都呈现的也是一幅如梦一样的景象。[1] 革命虽然是在1905年终止的地方开始，但是革命已经把最近的起点远远抛在后面了。沙皇及其大臣们虽然还活在政府的监狱里，但对他们以前的大多数臣民来说，他们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的幽灵。君主政体那年深岁久的显赫与臣民对它的恐怖和偶像崇拜看来已经随同去年冬天的白雪消逝了。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7页。

列宁正好比托洛茨基早一个月回国,他把他看到的俄国说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①] 当然,俄国的自由还只是言论自由;但人们要充分利用这种自由,似乎希望通过充满激情的争论发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因为旧的生存方式已经到了深渊的边缘。对社会生活的新原则、新方式和新内容的紧张的探索,亦即备受蹂躏的下层群众庄严感人地参与的这一探索,就是1917年春天彼得格勒精神趋势的特点。权威和真理都不是想当然的事。普遍流行的只有一种不明确的信念,即认为凡是促进革命、有助于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的就是好的。甚至就是城市的外貌也反映出大动荡的社会性质。繁华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都不断聚集着从郊区贫民窟来的居民;成群结队的工人和士兵参加各种集会,这些集会在工厂和郊区兵营中日夜召开。不久以前还被禁止的反抗标记——红旗,现在已在涅瓦河畔的新古典派的建筑物上高高地飘扬。从街上的每一个偶然场景、每一个事件上都可推想得到工人和士兵在革命中占据着优势。这位新来的人只要看一眼首都就明白,李沃夫亲王竟然仍是革命政府的总理,这是多么不协调。

托洛茨基几乎还没有把家人和少数几件行李在住所里安顿好,就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②] 的所在地斯莫尔尼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它是1905年以托洛茨基为精神领袖的那个机关的继承机构。此时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是齐赫泽,此人曾是托洛茨基的副手,托洛茨基刚刚在《新世界报》上对他进行过攻击。齐赫泽站起来欢迎托洛茨基,但并不热情。[③] 接下来是一阵窘困。

---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4页。

② 在没有附加说明情况下,下文中的"苏维埃"单数均指彼得格勒苏维埃。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7页;H.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440－441页。

在苏维埃执委会里居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知道这位新来的人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看来他要从长期的朋友变成敌人了。执委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指出：应该邀请1905年苏维埃的领袖在现今的苏维埃执委会中占有一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难地窃窃私语。他们同意托洛茨基作为没有表决权的候补委员进入执委会。他却也并不想再要什么了，在他看来，要紧的并不是表决权，而是使自己有机会在这个革命的首要论坛上发表意见。

然而冷淡的接纳只能使他恼火，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书记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写道，他甚至怀疑党的领袖们根本不曾为他从英国人的拘留中获释施加过充分有效的压力，因为他们并不渴望在讲台上看到他。"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双方对待他都是充满怨恨和怀疑……部分出于害怕竞争……。"[①] 无论真相如何，事实是，2月到5月之间，政治阵线已经分明，各党和各团体已组成他们各自的队伍，并且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立场，领袖们都已担当各自的角色，占有职位。1905年时托洛茨基是流亡者中第一个回国的，而现在却最后一个回来。看来没有一个适当的空缺留给像他这样有才能而雄心勃勃的人物了。

当时正是这样的时刻，即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所有党派都有理由害怕任何难以估量的新影响。二月起义中诞生的政权第一次失去了不稳定的平衡，它正在试图通过精心策划和联合来重新取得那种平衡。李沃夫亲王的第一届政府已不存在，参加那届政府的只有贵族老爷和上层中产阶级的代表，前者以追随古契科夫的保守派为代表，后者以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为代表。在苏维埃里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保证支持政府，但没有加入

---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176页。

政府。然而，没有苏维埃的支持，这个政府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苏维埃是由革命建立的事实上的政权。目前已到了这样的关头，苏维埃里的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加入政府，就再也不能支撑政府了。

组成李沃夫亲王第一届政府的党派力争使革命只限于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挽救君主政体；力争继续战争，并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军队纪律，因为没有这些，战争就不能继续。追随苏维埃的工人和士兵则相反，希望“深化”革命并且及早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人试图调和这些矛盾的政策和要求，他们自己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一截然对立的矛盾之中；他们试图帮助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又要抚慰人民对和平的渴望；[①] 他们对其追随者说：政府已抛弃了沙皇贪婪的战争目的——俄国统治巴尔干、征服加利西亚和君士坦丁堡，它寻求的正是取得公正民主的和平。[②]李沃夫亲王试图使从沙皇统治继承下来的旧行政机器运转起来，而工人和士兵则认为苏维埃才是真正的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希望新政府的制度会把旧行政机构和苏维埃结合起来。政府竭力要在厌战而革命化的军队中重新建立纪律，而军队中的士兵们拒不服从他们的长官，只听由他们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的话。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人保证帮助政府恢复纪律；然而他们还号召士兵保卫他们刚刚争取到的权利，它们体现在反对沙皇将军及其军官的苏维埃著名的第一号法令中。政府想为土地财产建立安全保障，而农民则大声疾呼要求分配贵族庄园的土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试图把这个生死

---

① 巴·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第54－76页及同书各处。

② 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在《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108页上写道：“米留可夫……认为取得君士坦丁堡对俄国说来是至关重要的事。”

攸关的问题推迟到召开立宪会议时解决，但立宪会议的召开时间却无限期地拖延下去。[①]

这座用闪烁其词、欺骗手段建立起来的高大建筑物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在建立它的那些人的头上崩溃。4月里的首次震颤已经使之动摇。古契科夫未能恢复军队纪律，因而辞去国防部长。此后不久，米留可夫也不得不辞去外交部长。他曾在一份致西方盟国的照会中宣称新政府忠诚遵循前沙皇政府的战争目的。这份照会激起一阵爆炸性的普遍愤怒，使李沃夫亲王的第一届政府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革命的无情逻辑开始展现。在两个月中，革命利用了第一届政府及组成这届政府的党派，并使它们声望扫地。刚刚不久前，即在沙皇政权那些最后的日子里，未来的法国总统杜梅尔格(Doumergue)对彼得格勒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劝过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耐心调解与沙皇的分歧。“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Маклаков)一听到‘耐心’这个词就跳了起来，说：‘够耐心的啦！我们已经耗尽我们的全部耐心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群众再也不会听我们的话啦……。’”[②] 这些话后来成为革命最时兴的迭句；而当时这些话报应在米留可夫身上了。苏维埃中温和派社会党人的大多数虽无意剥夺他的席位，但当他公然要求政府和国家遵循沙皇的战争目的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跳起来说：“够耐心的啦！我们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全部耐心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群众再也不会听我们的话啦！”如果他们把政府的全部事务继续留给那些只是利用而未曾发动二月革

①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第101－115、125－138页及同书各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1－13章。

② M. 帕列奥洛格：《大战期间的沙俄》第3卷第188页。

命的阶级的领袖们,群众就不会再听他们的了。

这样,就出现立宪党人和温和派社会党人的第一个联合政府。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出现时,新搭档们正好分配完政府的各部席位。有"10个资本家部长和6个社会党人部长。"立宪民主党人是资深的搭档,因此新政府的纲领和前一届政府的纲领基本上难以区别。让6个社会党人任部长不过是为冲淡政府,使之比较合苏维埃的口味。跟社会革命党有联系的克伦斯基继古契科夫为国防部长;策列铁里(Церетели)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前议员,苦役犯,此时出任邮电部长;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党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被任命为农业部长;斯柯别列夫以前是托洛茨基的学生和编辑助手,此时是劳工部长。

5月5日,即托洛茨基到达后的那一天,这些社会党人部长站在苏维埃面前,要求苏维埃支持联合政府。托洛茨基到场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斯柯别列夫称他为"亲爱的老师"。苏维埃代表席上有人要求托洛茨基对当前的事变阐明他的观点。"在一批不相识的群众的注视下和……在'社会叛徒'的敌意眼光之下初次露面,他显然有些紧张。"① 他小心谨慎地摸索。开头时他赞美革命的伟大,用同样的语言说明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接下来他立即用含蓄的话对当时的事变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只要他们能像他在国外那样,观察并估计革命对世界的影响,他们就会认识到俄国'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但不再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斗争的纪元,而是被压迫的受苦阶级反对统治者斗争的新纪元!'这些话使社会党人部长们觉得刺耳,因为他们现在正委身于继续战争、平息革命风暴之任。托洛茨基接着说下去:"我不能隐瞒,对这里正在进行的许多事我并不同意。我认为参加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440-442页。

政府内阁是危险的。……联合政府不会把我们从现存政权的两重性中解救出来，它只不过把两重性转化为内阁本身而已。"这话跟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说法并无区别——布尔什维克也在仔细研究权力在苏维埃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托洛茨基似乎又唯恐伤害他的老朋友，用比较缓和的口气说："革命不会由于联合政府而消亡。但我们务必记住三条指令：不相信资产阶级；监督我们自己的领袖；以及依靠我们自己的革命力量……。"他用复数的第一人称——"我们务必"、"我们的力量"——说话，用这种方式表明，仿佛他认为自己与以前的同志完全一致。但是就讲话的实质来说，他是持不可和解的立场的："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一定要把全部政权转交到苏维埃手中，只有单一政权才能挽救俄国。"这话听起来又像列宁的口号一样。他高呼"世界革命的序幕——俄国革命万岁"，以此结束他才气横溢的长篇辩论。[①] 听众即使不是被他的思想迷住，也是被他向他们表露的真挚态度和滔滔辩才所折服。[②]

部长们一个接一个起来作答。切尔诺夫答应说，社会党人会使政府受到他们的影响，但为此他们需要苏维埃全心全意的支持。策列铁里详细谈到如果他们拒不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就会给苏维埃招来危险。斯柯别列夫则劝告他"亲爱的老师"说：在革命中，"冷静的理智与热烈的感情同样非常需要"。苏维埃对新内阁投信任票。投反对票的只有极左的少数派。

把托洛茨基作为自己的领袖来欢迎的政治组织是"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简称"区联派"。从1913年这个组织成立以来，托洛茨基一直从国外激励这个组织并为它的出版物撰稿。这个组织并不想组成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既非布尔什维克又非孟什维克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45－46页。

②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440－442页。

临时联盟。他们坚持反对战争,反对李沃夫亲王以及"社会护国主义"。这个组织的影响只限于彼得格勒的几个工人区;而且就是在那里也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发展而受到干扰。但是依附这个小组织的人,过去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著名人物,现在他们都又重新崛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曼努伊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越飞、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都曾为托洛茨基的报纸写过文章。还有几个人,如卡拉汉(Карахан)和尤列涅夫(Юренев)后来成为苏联重要的外交家。他们一起形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杰出政治人物团体,但他们的组织太弱,太狭隘,不能作为独立行动的基础。托洛茨基到达时,他们正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前途,正在考虑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左派组织合并。在公众集会上,人们一再质问这个组织的鼓动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跟布尔什维克携手联合。对这个问题,他们实在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分手,是由于过去曾卷入旧党中的长期不和,这种长期不和反映的是过去的分歧,而不是现在的分歧。①

5月7日,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安排了一次特别欢迎会,欢迎托洛茨基;5月10日,他们开会讨论建议中的合并。列宁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陪同到会;自从托洛茨基在齐美尔瓦尔德同列宁不很友好的会面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列宁。关于这次会议,我们只有列宁私人笔记中的资料丰富的片断记录。托洛茨基重复了几天前他在迎接他的欢迎会上说过的话:他已放弃他的旧日立场,不再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了。现在,只有那些完全和社会护国主义决裂的人将在新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当时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365页;《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47页;另见尤列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他明确地问列宁，是否仍认为俄国革命性质只是资产阶级的，仍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看来他显然不知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刚刚完成的方向性的根本转变。列宁在托洛茨基到达以前用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跟党内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右翼进行激烈的辩论；他已经说服党放弃关于革命前景的“布尔什维克的”旧观点。可以设想，对这一问题他当场就向托洛茨基作了解释。如果没有别人，那么托洛茨基的妹夫加米涅夫后来也肯定会告诉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中反对列宁的人其实就是加米涅夫本人，他曾责备列宁把“不断革命”论一古脑儿都接收过来并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而放弃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路线分歧历时这样长，但现在确实已经弥合了。他们两人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的一个得出这些结论早得多，而另一个却为这些结论作了长时间艰苦的辩论。但是两个人都不是有意识地采纳对方的观点。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会合点。我们明白，是战争的事变逐渐促使托洛茨基看到工人运动中的裂口已无法弥合，而且他认为试图弥合是错误而且有害的，因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是建立新党。早在大战前，列宁已得出这一结论，不过只是就俄国党而言。大战使他把这一结论推广并应用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列宁的俄国经验是他在思考和本能反应中的主要因素，尽管单单这一点并不能决定他的态度。反之，托洛茨基则从国际概念出发，转而把这一原则应用于俄国。无论他们得出共同结论的过程如何，其实际的内涵都是相同的。

在他们对前景估计的演变中，我们能看出结论的一致和处理方法方面的类似区别。1905—1906年时，托洛茨基已预见到俄国

---

① 《列宁文集》第4卷第300－303页。

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结合,并说明俄国的起义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列宁其时拒不认为俄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他根据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俄国社会结构来推断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而俄国社会结构中的最大成分是个体农民。但在大战期间他开始认真考虑欧洲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俄国革命放到国际远景之中。看来,现在对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否成熟,而是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了。因而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俄国革命局限于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中。二月政权的经验进一步向他指明,不同时打垮并最后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打垮地主政权。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1]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旧分歧虽已消失,但两人的地位很不相同。列宁是一个大党公认的领袖,尽管这个大党在苏维埃中是少数,但它已成为团结整个无产阶级反对二月政权的基础。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加起来也不过是六七个没有军队的杰出将军,托洛茨基作为个人虽然能在革命的讲坛上发表他的意见,但是现在只有纪律严明的强大政党才能使言论变为持久的行动。每一方都需要对方的配合,尽管程度不同。最使列宁满意的事莫过于能把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这六七个杰出的宣传家、鼓动家、策略家和雄辩家引入党的"总参谋部"。列宁以他建立的党而自豪,并且知道它所具有的优点。他决定让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加入他的党。在党内,他愿意给他们种种民主权利,使他们分享他的影响,而且像记录所表明的一样,在重要的事情上他允许对方通过投票压倒自己。但他也并不准备废弃他的党而去和一些小组织合并成一个新党。如果这样做,他不是要过分作假,就是向别人的自负作不必要的恭

①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142 - 147 页。

维。

列宁在5月10日的会议上要求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立即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他给他们提供领导机关及《真理报》编辑部的职位。[①] 他没有向他们提出条件。他并不要求托洛茨基放弃他过去的一切;他甚至不提过去的争论。他自己已经不把那些事放在心上了,并期待托洛茨基也同样如此——他是如此渴望同凡能促进共同事业的人携手合作。当时,他甚至希望同马尔托夫再度联合,因为马尔托夫已经脱离孟什维克,仍然忠于齐美尔瓦尔德纲领,反对联合政府。[②]

托洛茨基只有进一步摆脱他的自尊心,才能马上接受列宁的建议。他还不得不考虑他的几个朋友提出过的反对意见,他们说到列宁的党缺乏民主,还提到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及其会议的宗派作风。长期以来,托洛茨基也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列宁的党,此时,他看不出这些疑虑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在给列宁的答复中详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最近变化,他说,布尔什维克"已经学到了国际主义的观点",已经"非布尔什维化了"。因此,在政治上他已同列宁完全一致;而且他还接受了列宁为立即合作而提出的大部分技术性建议。但是,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已有如此显著的变化而且变得如此之好,所以不应要求他和他的朋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说:"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坚持旧称号是令人不快的。"[③] 他们应当在一个新党里用一个新的党名,在

---

① 甚至更早些,列宁就已建议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邀请托洛茨基主编党的大型日报。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中央委员会否决。《红色年鉴》1923年第3期。

② 卢那察尔斯基在《革命家剪影》第69页上写道:"1917年5、6月间列宁希望跟马尔托夫联盟。"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后来甚至很希望马尔托夫仍然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右翼领袖。他在1923年出版的这本书中表示过这一希望。同书第70页。

③ 《列宁文集》第4卷第300－303页。

他们组织的联合大会上携手联合。托洛茨基想必已意识到,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大会上会占有绝对优势,这样,全部分歧本身缩小为"称号"问题。这是个太微不足道的问题,无法证明他和他的朋友坚持他们的政治孤立是正当的。但这个问题却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大约在这时,当有人问列宁:尽管他们一致,仍然使他与托洛茨基分开的究竟是什么时,列宁回答说:"难道您不明白吗?野心,野心,野心嘛。"[1] 就托洛茨基看来,自称为布尔什维克,不言而喻是投降;不是向现在的列宁,而是向过去的列宁投降;他因而对此畏缩不前。然而,投降在某些方面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是过去的列宁,流亡中的列宁一直是那个如今成为革命党的派别的总设计师。另一方面,这个党目前的纲领与其说体现的是列宁的观点,不如说体现的是托洛茨基一贯的观点。对此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感谢托洛茨基。这一切可能给托洛茨基造成极大的伤害,列宁肯定没有注意到;即使列宁乐意承认它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实际上他也没有可能以任何方式去承认。一个革命的党在革命中没有时间对政治思想的所有权问题去详加考察。这年晚些时候,列宁对托洛茨基大加赞扬,说托洛茨基自从和孟什维克决裂以来,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2] 在托洛茨基方面,政治见识太多,不至于不明白在这样的时候仍坚持表示自己有高明的远见是多么可笑。对他来说,革命的实际政策也比昔日的理论预见重要得多。他的踌躇不决不过是他反对列宁的最后闪现而已。

托洛茨基当时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骑士。他到处寻找门路,曾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编辑部歇脚。他同高尔基

---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175-176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05页。

早已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彼此仰慕。他们的年龄、性格思想方法如此不同，以至妨碍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但他们偶尔也有过合作，特别是当高尔基离开列宁的时候。现在，高尔基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他在他的那份大型日报上规劝双方，向双方进行革命道德的说教。他希望接近托洛茨基，以为托洛茨基会像他自己一样力图调停社会主义者阵营中两派的对立。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的第一次发言使他产生不祥的预感，而他的撰稿人则窃窃私语："托洛茨基甚至比列宁更坏。"尽管如此，高尔基还是安排了一次他的编辑人员与托洛茨基见面。双方立刻明白：他们的目的截然相反。除此以外，高尔基的影响严格说来是在文学方面。他的报纸尽管有其新闻方面的优点，但同革命的主要组织及舆论方面却没有认真的联系。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方面却像小孩子般地天真。然而他缺乏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著名人物的谦虚性格，摆出政治预言家的姿态，要是托洛茨基同高尔基联合，就再没有比这更不谐和的了，更不用说承认高尔基是政治上的指导。托洛茨基要在革命的现实中寻求一个坚定的组织结构，寻求可靠的依托；而高尔基不可能给托洛茨基这样的组织和依托。他们之间的意见交换使托洛茨基大失所望，因而他得出结论：除了同列宁携手联合外，他已别无出路。[①]

与此同时，他创办了区联派报纸《前进报》。尽管《前进报》有不少才华横溢的撰稿者，但是这份报纸并无成就。在这样的时候，只有依靠强大财力的支持或依靠分布很广的组织网的无私帮助，报纸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前进报》二者都不具备。它开始是一份周报，但也不能按期出版，在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总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191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486－487页。

共只出版过16期。

托洛茨基对首都政治生活发挥的影响与其说是通过他写的文章,不如说是通过他的演讲。他常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在无数的集会上讲话。在他到达首都仅仅两三个星期中,他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就被视为苏维埃左派中最有口才的鼓动家而大受欢迎。[①]位于首都郊区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是托洛茨基最喜欢去作政治演说的场所,喀琅施塔得对他往后的政治命运举足轻重。海军全部参加了起义。海军基地成为一个类似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水兵们激烈反对把军纪再强加给他们的企图。部里任命的委员中有几个因跟旧政权甚至跟黑色百人团有联系而名声扫地,水兵们拒不允许他们登上军舰,而且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十分粗暴。托洛茨基力劝水兵们克制情绪,不要报复;但是他也尽其所能点燃他们的革命热情。

5月底,社会党人部长们向苏维埃控告水兵,托洛茨基出面为他们辩护。他并没有宽恕水兵们的过火行为,但他为水兵们申辩说:如果政府没有任命那些名声扫地、令人憎恶的人但任委员,这些过火行为原是可以避免的。他大声说:"我们的社会党人部长们拒不反对黑色百人团的威胁,相反,他们却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与战士宣战。然而,如果发生反动事变,如果一个反革命将军试图把绞索套在革命的脖子上,他们的黑色百人团委员一定会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一个绞索,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却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殊死战斗。"[②] 后来,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真的去保卫克伦斯基政府、防御科尼洛夫将军的叛军时,这几句话被广为引用。托洛茨基还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写了激烈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呼吁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164-167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52页及以后各页。

全国反对国防部长——从克伦斯基当上国防部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受挫。从此,水兵们忠诚地追随托洛茨基并保卫他,几乎把他当做偶像崇拜,而且不管他号召他们行动还是告诫他们要克制情绪,他们都言听计从。①

当时他还在摩登马戏场建立了他的讲坛,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在那里向广大群众讲话。摩登马戏场挤得水泄不通,因而托洛茨基常常被举起,越过听众头顶被传送到讲台上,他从高处总能看见参加大会的他的前妻生的女儿兴奋的目光。他以惯用的精辟逻辑讲到当时的问题及革命的目标;他也汲取群众的精神气质和严格的正义感,注意他们对以敏锐深刻的目光观察事物的愿望以及他们的不安和巨大的期待。他后来回忆说,一看到广大群众,他事先已准备好的词语和论点不知怎么全都烟消云散了,另外的词语和论点又不知怎么地好像从下意识中冲出来,这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但却是听众所需要的。此时他听自己的说话声好像是听别人的声音,尽力跟自己脱口而出的思想和措辞保持同步,唯恐自己像个梦游者的他会突然惊醒或跌入深渊。此时他的政治活动不再是提炼个人的见解或在职业政治家的小圈子里辩论了。他在感情上同他面前热情、无知的大众融为一体,并成为群众的宣传工具。他同摩登马戏场的听众如此一致,以至回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或斯莫尔尼宫后在他指责他的对手们或与其辩论时,他们就对他吼叫说:"别用这种语言跟我们说话,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②

※　※　※　※　※

①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第77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15－16页;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7页。

6月初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开了3个星期。各政党及其领袖们第一次在一个全国性讲坛上互相对抗,这个讲坛是当时俄国仅有的由全国选举的机构。温和派社会党人约控制5/6的票数。他们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但在他们队伍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穿军装和农民衬衫的人。在代表激进左派的120名反对派成员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来自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大会反映出外省军队和农村成分与大城市无产阶级成分之间的分歧。几天前,彼得格勒的市政选举已透露出重要的转变:在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在他们“最保险的”选区遭到惨败。孟什维克得到一半票数。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则一致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孟什维克是以当时很有胜利希望的派别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则对自己未来的胜利怀有新的信心。[①]

左派反对派的发言人利用多数派本身的胜利对付多数派。他们说,李沃夫亲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追随者已微不足道。温和派社会党人代表着全国的压倒多数。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心为立宪民主党人充当苦力的部长角色呢?他们为什么不组成自己的政府?何况他们有这样做的民主权利和责任,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正是列宁发言的大意。[②] 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主题。[③] 托洛茨基的论据在若干部分虽比列宁的尖锐有力,但他用比较友好的语调向多数派呼吁,诉诸共同的利益和命运。托洛茨基试图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看到他们自己的屈辱地位,并试图说服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党散伙。他说,企望把政府变成社会各阶级间的调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204-20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7-250页。

③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142-149页。这里的托洛茨基发言的摘要根据的就是这一原始资料;后来再版时,谈到孟什维克的友好话语已都被修改过了。

解委员会是徒劳的。"在革命时期，调解委员会是不能行使权力的。"李沃夫亲王及其朋友们代表的是习惯于控制及统治的阶级；而社会党人部长们由于他们的自卑感，则太容易使自己甘受欺侮。尽管如此，当他谈到最不知名的社会党人部长佩舍霍诺夫(Пешехонов)时，他说的几句友好的话却赢得了多数派代表席上的掌声。他在辩论中说，只有由佩舍霍诺夫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府才会"认真前进一步"。"同志们，你们看到，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从任何党派的角度，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的……。"他同意社会党人部长们所说的工人阶级应当有纪律，但声明，不能由资产阶级内阁让他们遵守纪律，他们也不能为资本家的政策遵守纪律。这就是激进左派方面所有的鼓动源泉，而多数派的抱怨也正是为此。

他申辩说："所谓左派鼓动家在为俄国革命的将来作好准备，我敢说我们以及我们的活动并没有损害你们的权威——在准备将来方面，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志们，我们不希望今天使你们信服，因为这种希望太冒昧了。今天我们所想做到的是要使你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反对你们，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敌意的或自私的派别动机，而是因为我们和你们一起都在经受革命的所有阵痛和折磨，我们看到的解决办法跟你们看到的不同，而且我们坚信，当你们在巩固革命的现在之时，我们却为你们准备革命的未来。"① 列宁在这个阶段再不给敌方以托洛茨基仍给他们的那种信任，尽管他也赞同托洛茨基说的"12个佩舍霍诺夫先生们的内阁"对目前的联合政府来说总是前进了一步。

这些辩论因"格里姆(Grimm)事件"而变得更激烈，格里姆是瑞士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他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

---

①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149页。

德会议,在那次会上属于"中间派",不赞同列宁的革命策略;后来他帮助安排列宁从瑞士经德国返回俄国的旅程。5月间他把德国政府试探俄国关于议和的可能性的信件送给彼得格勒当权党派的领袖们。俄国政府把他当做德国间谍驱逐出去,但是并没有公布原因。

严格说来,格里姆并不是德国间谍。作为一个头脑并不复杂的和平主义者,他认为设法担当调停人的任务是很自然的事。他对俄国革命政治的错综复杂性不甚了解,他不明白,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大声疾呼和平的布尔什维克或托洛茨基还是反复许诺尽早实现和平的孟什维克为什么都反对他的行动。[①] 有关他的活动,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知道。但是政府已指责格里姆为德国间谍一事却马上被利用来使人怀疑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俄国人。据说米留可夫在一次有关的讲话中诬蔑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德国奸细。托洛茨基在大会上挺身为格里姆辩护。他认为政府驱逐格里姆是不正当的,并说他从这一事件中看出来米留可夫的险恶阴谋。在讲到米留可夫诬控列宁和托洛茨基本人时,他转身向记者席说:"我从这个革命民主的讲坛上请求正直的俄国新闻界刊登我的这句原话:只要米留可夫不收回他的指控,造谣诽谤之徒的印记就永远留在他的额头上。"[②]

高尔基的报纸这样报导当时的情景:"托洛茨基的声明铿锵有力,庄严慎重,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都热烈鼓掌,掌声持续达数分钟之久。"[③] 翌日,米留可夫宣称,他没有说过列宁或托洛茨基是德国奸细——他只说过,因为他们进行

---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178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158页。

③ 《新生活报》1917年6月6日。

颠覆性活动，政府应把他们关起来。[①]

大会这样一致地对托洛茨基欢呼，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了。随着争论的继续，各政党之间的分歧已经固定下来，难以弥合。在有关最后一届杜马的争论中掀起一场波澜。那届杜马是在 1912 年按有限选举权选举出来的；它所起的作用只相当于沙皇的咨询会议，而不是真正的议会；而且杜马的大多数议员是由沙皇的大臣组成的。立宪民主党人迫切要求恢复杜马，他们希望利用杜马作为支持他们政府的准议会式的基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苏维埃提出一项含糊的决议案，马尔托夫对这项决议案用巧妙的措辞作如下解释："杜马再也不会存在下去，但却因此对消灭杜马的任何企图发出了警告。"[②] 卢那察尔斯基提议：应当把杜马当做可耻的过去的遗物埋葬掉。托洛茨基用一篇尖刻的发言支持卢那察尔斯基。而当托洛茨基在接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站起来照常用"同志"这个词开始他的演说时，他的话被喊叫声打断："我们是你的什么同志？""住嘴，别称我们为同志！"托洛茨基再也不称他们为同志了，他同布尔什维克因而靠得更近了。[③]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军队的状况问题。自从推翻沙皇统治以来，俄国的前线没有军事行动。俄国政府及其总参谋部在西方盟国的压力下正在准备重新进攻，为此他们急切要得到苏维埃的批准。总参谋部还迫切要求修改著名的第一号法令，即士兵自由基本法。托洛茨基在这场辩论中作了重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警告政府：军队遭受重大损失以后，而且由于无能、发战争财和腐败而破坏了军队的后勤给养以后，军队已不能继续作战。进攻的结局

① 1917 年 6 月 7 日米留可夫的发言。

②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 295－298 页。

③ 同上，第 352 页。

只能是灾难;试图再把旧的军队纪律强加给士兵也无济于事。"对俄国全部历史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军队已破除旧俄国军队的观念,破除残暴的观念……几十万人默默地死去时……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牺牲的目的。现在……就让被我们抛到后面去的这个历史时期见鬼去吧!此刻我们尊重的不是群众初步的、不自觉的英雄主义,而是那种可以通过每个人的意识折射出来的英雄主义。"[①] 目前,军队不明白为什么而作战。"我再说一遍,同是这支军队,当它经过革命的洗礼后……就会有而且将来也会有能够重整军队并且能够把团结和热情传给我们这支军队的思想、口号和目的……。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就是自觉地响应进攻的号召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现在不存在能使军队团结起来的目标……。每一名会思考的士兵都问自己:在我今天将流的每五滴血中,难道为俄国革命利益流的不是只有一滴,而为法国证券交易所和英帝国主义流的却是四滴吗?"[②] 只要俄国脱离帝国主义同盟,只要摧毁旧统治阶级的政权,只要由苏维埃建立一个民主新政府,那么,"我们就召集全欧洲的人民,告诉他们:现在欧洲地图上已经屹立起一座革命的堡垒。"[③]

然后他用他特有的对话体方式回答那些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革命会扩展、不相信俄国的革命军队和俄国的民主政治在欧洲会找到盟友"——的人,他说:"我的回答是:历史不会给我们、也不会给俄国革命打保票,我们不会被彻底击溃,我们的革命决心不会被世界资本的大联合扼杀,世界帝国主义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俄国革命对各国的有产阶级来说是这样大的危险,因而他们要力

①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353页。

② 同上,第354页。

③ 同上,第356页及以后各页。

图破坏俄国革命,把俄国变为欧洲资本的殖民地,或者更可能的是变成美国资本的殖民地。但对这一力量的考验还在前面,苏维埃有责任为此作好准备。“如果……(革命的)德国没有崛起,或者说,如果德国革命虽爆发但力量太弱,那我们应调动我们的团队……不是为了保卫自己,而是为了保证革命的攻势。”这时,代表席上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说:“那时就太迟了”,这声音打断了这篇发言的有力结论。这个不知姓名的人的话未到年终就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就在这位向大会发言的托洛茨基身上可以清楚看出此人的特色:他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却不但要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手段当面较量,而且还要创立红军。

托洛茨基在这次大会上和普列汉诺夫发生了最后的冲突。他们在发言中彼此冷淡地称对方“公民”而不称“同志”。普列汉诺夫的好战情绪已达到极端的程度,他爆发出来的沙文主义甚至使孟什维克也感到发窘,因而他们与他保持距离。大会热烈赞扬了普列汉诺夫过去的功绩,但托洛茨基认为那全是陈腐的护国说教所致。他敢于为此指责普列汉诺夫,而普列汉诺夫的答复则目中无人,一会儿把自己比做丹东(Danton),一会儿又比做拉萨尔(Lassalle),并把对俄国革命失去信心、士气低落的军队比做克伦威尔(Cromwell)和雅各宾派的军队,说他们的“士气在喝下革命的血液时才会高涨起来”。这位对革命厌倦了的老战士想不到,正是他的年纪较轻而常受他斥责的对手注定要担当俄国丹东的角色,注定要使俄国的革命军队“喝下革命的血液”。

多数派在大会的大部分活动中始终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伙伴们等闲视之。当策列铁里为联合政府辩护时,他向代表们挑战,让他们回答俄国有没有一个派别准备单独肩负政府的职责,列宁从代表席上打断他说:他的党已经准备肩负这一职责。多数派哄堂大笑,淹没了列宁的话。外省来的代表不知道反对派在彼得格勒的

影响已如排山倒海之势一样在增长。列宁一心要使他们牢记并使他们看到,彼得格勒人要求结束联合内阁并组成社会党人内阁,而且是只由温和派社会党人组成的内阁。列宁在大会代表席上的声明所宣布的是原则而不是直接的目的,他当时的目的还不是推翻政府,他更不赞成温和派社会党人和他的党组成联合政府。只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还是少数,他就力促他的追随者不要在夺取政权上开玩笑,而要"耐心向群众说明他们的立场",直到他们取得多数。这就是他的苏维埃立宪主义的关键所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不是"打倒政府",而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列宁为克服在他的中央委员会中出现的不良倾向,非常秘密地为6月10日用这个口号举行规模惊人的大示威作准备。托洛茨基消除他的朋友们的疑虑,引导区联派参加示威。但在6月9日,当《真理报》公开号召工人、驻军举行示威时,大会执委会却禁止示威。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想公然反抗禁令。他们决定服从多数,取消示威,并专门发表一篇宣言说明他们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工人和士兵会注意到示威的取消吗?如果注意到了,会不会误解党的立场?迫切要求行动的他们会不会感到寒心?列宁起草了一篇解释性的声明,但因为他本人和追随者都不满意这篇声明,所以他乐于采用那篇由托洛茨基撰写的声明;这篇声明以全部反对派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当时尚不是布尔什维克成员的托洛茨基还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宣言书。[1]

6月10日,彼得格勒仍然平静。但苏维埃中多数派的领袖们决定在6月18日另外举行一次大示威,希望把这次示威变为支持

---

[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0－301页;《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37页;托洛茨基:《列宁传》第66－69页。

他们的政策的一次具体表现。到了指定日期,50万工人和士兵的队伍走过经过检阅台,检阅台上大会代表已经集合在一起了。使温和派社会党人惊慌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的所有旗帜都写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打倒战争!”及“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游行终于和平地结束,没有骚乱,没有冲突,可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第一次估量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口号已深入人心。

托洛茨基回俄国后仅仅一个月,就在这一段早期活动中,他的个人品格已经大放异彩。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并在他那伟大的人格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们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真正领袖的倾向。乌里茨基……曾对我,好像也对曼努伊尔斯基说过:‘好啦,大革命来了,你看,列宁虽然智慧超人,但与托洛茨基的天才相比,却日益逊色。’”卢那察尔斯基接着说,这种意见之所以是不正确的,并不是因为对托洛茨基的才能和力量过分推崇,而是因为列宁的政治才能的规模还没有显露出来。“列宁在这段时间……确实稍逊一筹,因为他不经常公开讲话,而且写作也不很多。他主要是在布尔什维克阵营内指挥组织工作,而托洛茨基则在各种集会上慷慨激昂。”然而在1917年,革命既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同样也在党内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进行。[①]

※　※　※　※　※

7月初,布尔什维克举行党的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机会。没有人再谈什么改变党的“名

①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25－28页。

称"的问题了。区联派的多数人一度反对合并;代表这些人的尤列涅夫仍在警告区联派成员说: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作风不好",布尔什维克有通过狭小的秘密干部会议进行工作的倾向。区联派中急切要求合并的少数成员以托洛茨基为首。他辩解说:由于布尔什维克已从秘密活动的晨昏蒙影中浮现出来,由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复苏,布尔什维克已基本上摆脱了他们的旧习;余下的问题将在一个公开活动的党内彻底解决。[①] 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协助说服,区联派的多数人接受了上述观点。但就在合并之前,七月事件的危机震动了全国。

这是每次革命中都会突然意外发生的激烈痉挛之一,它打乱了所有领袖们的计划,加速了事变的节奏,迫使敌对力量的两极分化达到顶点。彼得格勒的驻军和劳动人民已忍无可忍。买面包的长队越排越长,没有尽头。发行的货币量是战前的十倍,货币已经贬值。投机活动猖獗。群众看到自从革命以来他们日常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他们觉得受骗了。除此以外,现在仍在进行着代价很大的军事进攻。但首都和外省的情绪还有差别:在彼得格勒,人们大声疾呼,要求立刻改变局面,要求李沃夫亲王的第二届政府辞职;而在外省,二月政权的名声并未扫地。

托洛茨基和列宁因为全面考察过全国的力量对比而知道他们的进攻时机还没有到来。但在首都的追随他们的人却按捺不住,开始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策略。如同布尔什维克曾斥责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踌躇不决和背叛一样,此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斥责布尔什维克在玩弄等待把戏和背叛。最后,不少团队为迫使布尔什维克指挥部面对既成事实而号召7月3日举行武装示威。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45-149页。

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正如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一样，当冒险的政治首创精神直接来自群众的冲动激怒时，这种主动精神的目的是模糊不清的；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布尔什维克指挥部力图像6月10日做过的那样取消示威，但这时群众的激情已无法阻挡。

列宁当时力图把他的党置于运动的前列，以便使运动保持在和平示威的限度以内，和平示威的目的是要再一次敦促温和派社会党人成立以苏维埃为基础的自己的政府。广大群众带着这个要求来到市中心，两天两夜挤满街头游行集会。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演说家对他们演讲，痛斥当权的联合政府，但又呼吁群众要保持冷静、遵守纪律。

最愤怒而人数又最多的群众包围了苏维埃执委会办公处所在地塔夫利达宫。群众派代表到塔夫利达宫宣称：如果温和派社会党人不结束跟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他们的队伍就不解散。这使某些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深信：必是列宁在现场策划而打算使之成为武装暴动。的确，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据闻，参加游行队伍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而且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动乱中表现最突出。[①] 被困在宫中的温和派社会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1－3章。《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5卷第41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142－143页。斯大林在七月事件的开头阶段很活跃，他向党的六大作过详尽的说明。《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02－107页（他的说明的摘要在多伊彻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148－149页上）。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第116页及以后各页。

党人害怕丢了性命,他们向司令部求援。[1] 因为全部卫戍部队几乎都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所以要从前线召来可靠的部队。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待救兵的时候,听说宫外的群众已经逮捕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并要把他处死。托洛茨基已在宫里工作了整整一夜和一个上午,时而劝说宫外的示威者,时而劝说宫内的执委会。此时他冲到骚动的现场。

对以后发生的事人们有过多次描述,但都没有像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中写的那样生动:

> 目力所及,都是狂怒的人群。一群水兵围住一辆汽车,脸色十分可怕,举动非常粗暴。切尔诺夫坐在那辆汽车的后座上,看得出来,他已完全失去自制。整个喀琅施塔得都知道托洛茨基,看来也信任他。但是当托洛茨基开始演说时,群众还是不能冷静下来。如果这时候有一颗挑衅的子弹从附近任何地方射出来,马上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他们会把我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人都撕成碎片。托洛茨基因为激动,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设法引起那些站得离他最近的人的注意(他开始赞扬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革命美德,在苏汉诺夫看来,这种赞扬有点儿过分奉承的味道。)"你们,喀琅施塔得的红色水兵们,你们一听到有威胁革命的危险

---

[1] 事变过后35年,孟什维克领袖P.阿布拉莫维奇写道:"注定要倒霉的6月进攻之后,对使在群众心目中已经死亡的战争死灰复燃的企图的仇恨如此强烈,使我自己当时感到:如果列宁和他的朋友表示更大的决心,在7月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通过半政变就可以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导报》1952年3月号的《延误了的革命的悲剧》。)但事变期间及事变以后,阿布拉莫维奇指责布尔什维克以彻头彻尾的阴谋方式夺取政权。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9页。

就来到这里……。红色喀琅施塔得万岁，革命的光荣和骄傲万岁！”

但是他们在听托洛茨基说话时心情闷闷不乐。当他试图向他们谈到切尔诺夫时，围在汽车周围的人们又暴怒起来。

（托洛茨基接着说）“你们到这里来表示你们的决心，要向苏维埃表明工人阶级决不想看见当权的是资产阶级。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损害自己的事业？你们为什么要任意对个人施加暴力，玷污你们的记录，使你们的记录黯然失色？……你们每个人都表明自己忠于革命，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为革命抛头颅。我知道这一点。……同志们，请答应我吧！……答应我吧，我的兄弟们……。”

托洛茨基把手伸向一个激烈反对他的话的水兵，这名水兵一手紧握着枪，另一只手躲开托洛茨基。在我看起来，这名水兵一定不止一次在喀琅施塔得听过托洛茨基演讲，他这时当真认为托洛茨基出卖了事业。[①]。

最后，托洛茨基不理会群众，只要求那些同意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在寂然无声中，托洛茨基挽住当时已半昏厥的切尔诺夫，把他领进宫里去。托洛茨基和被他救出来的敌人一起回来时，他脸色惨白，满脸冷汗。

---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423－425页；维·切尔诺夫：《俄国大革命》第422－426页。托洛茨基后来说，那些把切尔诺夫抓起来的人是奸细，和水兵毫不相干。（《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93页及以后各页。）根据内证，苏汉诺夫的说法显然更可信，而且和喀琅施塔得的领袖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看法相同（上引书第128－130页。）

在城里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小规模骚乱和小规模的闹事,如果未被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所约束的话,它们必将引起流血和杀戮。示威的群众终于渐感疲劳,他们的劲头也松懈了。当前线来的军队开到时,他们正要散开。凶暴的反对势力马上猖獗起来。迄今一直潜藏着的秘密与半秘密的右翼组织突然走上街头。经过几次冲突后,渴望睡眠和休息的亲布尔什维克群众散开了。正在这时,报纸上突然发表了前线进攻溃败的消息。这就等于给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动气焰火上浇油。右翼党派、将军们及军官团责备说,正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破坏了军队的士气,导致了失败。[1]

单单这种指控就足以给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带来一场风暴。除此以外,甚至还有更具挑拨性的指控。一份右翼的通俗报纸发表的"文件"声称列宁曾接受德国总参谋部津贴;还公布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那些文件一看就可知道是拙劣的虚构。提出指控的证人姓叶尔莫连科,原是密探,此时为军事反谍报机关服务。[2] 但指控最初造成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这一表象对列宁不利;而且在当时,这一表象具有决定性作用。不懂政治、对革命党的历史及行为习惯方面一无所知的公民问道:列宁不是确实是由于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而经由德国回国的吗?难道不是他鼓动反对战争的吗?不是他煽起动乱的吗?如果答复说,

---

① 6月28日,即这些事件前的一个星期,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写道:"如果经过三年战争和四个月的革命之后,(批准进攻的苏维埃)大会作的小心谨慎、含糊其辞的决议或者半社会党人半部长们廉价的演说喇叭还不能说服所有的士兵的话,那么'忠心耿耿'的报刊总会求助于屡试不爽的伎俩:它会号召'社会'随意讨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

② 在我著的《列宁评传》中对这件事将作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克伦斯基的说法在其《自由的苦难》一书中第285-294页E;M.H.波克罗夫斯基在对克伦茨基说法的反驳在该书中第115-136页。另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96-123页。

列宁要经过法国、英国的其他所有路线都遭到拒绝以后他才决定取道德国返俄的，而且他的许多孟什维克政敌跟他一起或稍后都是经过同一条路线回国的，这也毫无用处。[①] 如果指出列宁希望革命会像摧毁罗曼诺夫王朝一样摧毁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那也没有用。在继七月事件之后的一片混乱中，这样的微妙关系谁也不会加以注意。上层阶级对革命害怕得要死，仇恨得发狂，中产阶级因绝望而看不见一切。总参谋部需要对最近的军事溃败作保全面子的解释。温和派社会党人感到脚下的土地裂开了。找替罪羊和骇人听闻的罪恶祭品是压倒一切的需要。

在混乱之中，托洛茨基见到列宁，列宁说："现在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枪毙。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时机。"[②] 他在慎重考虑反革命是否可能胜利；他认为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阉割了的苏维埃已扮演完了它的角色；他在为党作回到秘密活动中去的准备。他稍经踌躇后，决定不让自己束手待捕，而要同季诺维也夫一起躲起来。托洛茨基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列宁的决定令他遗憾；这样的举动与托洛茨基自己的习性完全相反。他认为列宁不必躲起来，相反，列宁若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反而会发生充分影响，会比逃跑能更好地为他的事业服务——逃跑只会增加不利的表象，人们可能会凭这种不利表象来判断他。[③] 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看法相同，并决定去坐牢。但列宁坚持自己的决定，他预料政府不会公正地审判他，因为正是这个政府把一大堆虚构的指控

① 官方在对七月事件的调查期间查明，约有500名俄国流亡者从瑞士经德国回国，其中400名是反布尔什维克者和"社会护国主义"分子。波克罗夫斯基：《十月革命》第123页。

②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69页。

③ 参见托洛茨基后来在狱中的证词，载《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93页及同书各处；《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240－241页。

加到他的头上并在报上散布伪造的证件的。气氛相当紧张,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已被取缔,《真理报》已被禁止出版,报社也被捣毁,好几个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如若仍然盘踞在警察局的旧近卫军的刺客或反革命的狂热之徒在把他们所仇恨的革命领袖押往监狱或从监狱里押出来的途中行刺,真是易如反掌。列宁对自己在党里的重要性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他不能去冒这种危险,他不顾常规的考虑而躲藏起来。[①]

在政府的攻击中,托洛茨基的名字最常和列宁的名字连在一起,但这次没有发出逮捕他的命令。原因很明显:他在名义上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他回俄国的情况与列宁回国的情况如此不同,因而难以给他加上德奸的罪名;另外,托洛茨基英勇地救出其政敌切尔诺夫这一事件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记忆犹新。但宽容他的时间并不长。米留可夫的《评论报》发表一篇报导说,托洛茨基离开纽约前接受过美籍德国人的1万美元,要他用这笔钱在俄国鼓动失败主义。在一些更不严肃的报纸上则揣测这笔钱来自德国总参谋部。托洛茨基马上用公开信答复,这封公开信刊登在高尔基的报纸上,以富有喜剧性的效果戳穿了米留可夫的揭露。托洛茨基挖苦说,美籍德国人或德国总参谋部显然认为只花1万美元就能推翻敌国政权是件最廉价的事。他追究这篇报导的来源,说它出自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大使否认这一指控,但这并不妨碍米留可夫声明他的消息就是来自前者。于是托洛茨基叙述了他离开纽约前发生的真实情况:俄、美、拉脱维亚、犹太、芬兰和德裔的美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会,还有另外三个要跟

① 这一步骤使列宁的某些追随者十分为难,只是过了很久,在德国革命期间,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都这样被人刺杀时,才使起初为列宁的决定而感到不安的人认识到列宁是完全正当的。

他一起动身的俄国流亡者。当场进行募捐，收到 310 美元，其中 100 美元是听众中的德裔美国人捐献的。捐款都交给了托洛茨基，他平均分给一起回国的流亡者。美国报纸报导过那次告别会与募捐的消息。他以愉快的心情“供认”事实真相，作出结论说，正如他所了解的，这样的“供认”事实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甚至比接受德国总参谋部的津贴更会使他丢脸，他写道：因为他平生从未同时支配过 1 万美元，甚至连这个数目的 1/10 也未曾见过。[①]

他在另一封公开信中讲到他与帕尔乌斯的友谊和绝交的经过，因为有人又重提这一关系来反对他。他揭露阿列克辛斯基(Алексинский)是造谣中伤的主谋，此人以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叛徒。他写道：阿列克辛斯基因是个造谣诬陷者曾被巴黎的记者组织开除，而且孟什维克也曾以道德为理由拒绝接纳他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正是这个人此时却高升为护国主义者道德的捍卫者。[②]

因为把托洛茨基牵连进去这个企图遭到失败，阴谋又改从相反角度开始了。报上载满报导，扬言托洛茨基已跟德奸列宁分裂。7 月 10 日，即在列宁躲藏起来 4 天之后，托洛茨基因此致临时政府如下的公开信：

> 部长公民们——我了解到你们已签发逮捕列宁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但没有签发逮捕我的命令。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事实：1. 我跟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立场和原则完全一致，而且我已在《前进报》上以及我的所有公开演讲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3 卷第 1 册第 150－154 页。

② 同上，第 155－159 页。

> 中阐明了我的立场。2. 我对7月3日及4日事件的态度跟上述同志们的态度是一致的。①

他叙述了那些事件,并说明:他过去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组织,是由于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已经过时,而且已毫无意义。

> 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所有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你们不逮捕我,只会使你们对他们采取的举动的蛮横、反动性质更加鲜明突出而已。②

对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的高峰达两三天之久,托洛茨基没有在苏维埃露面。他在拉林(Ларин)家里过夜。拉林以前是孟什维克,他正要加入布尔什维克。但在《致临时政府的公开信》发表后,托洛茨基以大无畏气概挑战式地重新露面了。他在苏维埃里,在苏维埃执委会上,在农民苏维埃执委会上捍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他在不间断的喧嚣声中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列宁为革命战斗了30年,我为反对压迫人民群众战斗了20年。我们只能仇恨德国军国主义。只有不识革命为何物的人才会说相反的话。……在这个大厅里决不许任何人说我们是德国的雇佣者,因为这样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65-166页。

② 同上。托洛茨基同时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这次,(与捍卫列宁的马尔托夫相对而言)高尔基的表现颇为暧昧,托洛茨基原想促使高尔基出面大力捍卫列宁,提醒高尔基去想想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作用。这封信托洛茨基没有投邮,载《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46-347页。

人是堕落邪恶的……喉舌。”[1] 他警告说，对这件事作壁上观的孟什维克分子定将使他们自己毁灭。切尔诺夫这个“社会护国主义者”因为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已被迫辞去部长职务。反革命已挑选布尔什维克作为第一个靶子，温和派社会党人将是下一个受害者。

就是在那些惊慌失措、歇斯底里的日子里，人们也都专注而恭敬地听托洛茨基讲话。尽管如此，他的呼吁收效甚少，甚至毫无效果。温和派社会党人知道，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德奸是荒谬的，但他们都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反战鼓动上走得太远；他们怀疑：列宁，或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一起在七月事件中曾试图夺取政权；他们不肯为恢复列宁的名誉帮忙，只有马尔托夫捍卫老政敌的荣誉。[2]

又过了两个星期，托洛茨基仍未被捕，他的挑战使内阁感到麻烦。下令逮捕他是没有理由的，除非宣布指导整个苏维埃(包括温和的多数派在内)的原则为非法，因为托洛茨基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制定他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另一方面，内阁又不能让他继续逍遥在外，否则就等于嘲弄它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举动。7 月 23 日夜，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被解送到十字监狱。苏汉诺夫后来叙述了这件事在彼得格勒造成的影响，因在事发的第二天，苏汉诺夫本人曾到摩登马戏场的孟什维克集会上讲话。“当我报告关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逮捕一事时……立刻掀起了一阵长达一刻钟之久的愤怒的风暴，集会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叫喊声

---

[1]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 5 卷第 52、59－62 页。

[2] 对七月事件的不少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曾有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组成的三巨头专政的计划，甚至连苏汉诺夫也有信以为真的倾向。从这一情况可以判断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多么广泛。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 4 卷第 511 页。

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群众当即要举行游行,向当局表示抗议。马尔托夫好不容易才设法使事态转化为通过一项当场草拟的抗议决议。"①

这样,在革命中,托洛茨基以前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都崛起当权;而他自己却被关在1905年沙皇政府曾把他关在其中的同一所监狱里。这时狱内的条件更坏,牢房极其拥挤:不断逮捕嫌疑分子,每天都有大批人被送进来。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而在旧政权统治下,政治犯反而都能享受分开监禁的特权。所有人都饥肠辘辘。人们唆使刑事犯反对"德奸",抢走政治犯的食物,粗暴地对待他们。公诉人、审判人员和狱卒都跟沙皇统治下的一模一样。新统治者的矫饰与司法机关的内幕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托洛茨基注意到这些情况时,他认识到列宁决定躲藏起来并没有什么大错。在这样疯狂的混乱中,有时连囚犯的生命也是有危险的。但正像在旧政权统治下一样,囚犯却还是有政治活动以及写作活动的足够自由的。因有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克雷连科(Крыленко)这样的辩论家,政治辩论倒是十分热烈。囚犯中还有德边科(Дыбенко)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他们都是喀琅施塔得的领袖。十月起义的全部主要角色和第一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成员几乎全部聚集在这里。

托洛茨基自己开始拿起笔写作,他的文章和小册子再次像潮水般地涌到狱外的世界。有些文章中详细描写狱中的生活,它们用П.塔纳斯这个笔名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其他文章发表在高尔基办的日报上。托洛茨基在另一封《致临时政府的公开信》中把司法程序奚落一番,他揭露说:指控他的罪名是,他同列宁一起经由德国回到俄国以及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这些控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5卷第121页。

告证明检察当局如此蛮不讲理和怠惰无能。[1] 顺便要说到的是，托洛茨基被捕几个星期后，区联派终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此后托洛茨基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他对司法程序的揭露所产生的后果是使他的检察官被免职。但司法程序却继续进行下去。“德雷福斯的事件及贝利斯事件如果与这种处心积虑地企图进行道德名誉上的中伤比较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托洛茨基向司法部长扎鲁德内(Зарудный)这样抗议说。由于不可思议的巧合，此人竟是1906年苏维埃审判案中的被告辩护律师。[2]

过了几个星期，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它使被告及其案件变得更有希望，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对七月“起义”的反动已扩大成为反对由二月革命产生的所有制度和条件的激烈行动：反对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以及那些有意或无意地抵抗旧行政机构职权的类似组织。反动派此时集中打击温和派社会党人。右翼的头头不无理由地争辩说：布尔什维克只是当前事态的最坚定的鼓吹者，而温和派社会党人则要为捍卫这种事态承担程度不同的责任。[3] 只要苏维埃还存在，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就不会停止，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苏维埃的存在则利害相关。如果布尔什维克竭力鼓动士兵反对军官，那么这种对抗的最早的的喉舌——温和派社会党人至少在防止军官团重新得到他们的旧地位方面有既得利益。中产阶级的领导人至今希望借助温和派社会党人去驯服革命；但此时他们到处寻求一个能驯服或击溃温和派社会党人与布

---

① 《新生活报》1917年7月30日。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203页；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170－179页。

③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2册第58－72页；A.H.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1卷第2册第232－238页。

尔什维克的军事独裁者。只有这样,包括前自由派在内的右翼才能希望结束他们认为是俄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七月事件表明:如果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还剩有什么力量的话,这种力量就在军官团内。当时被困在塔夫利达宫里的温和派头头们因害怕丧命而发抖,祈求忠心的军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的群众中救出来。这一场面人们并没有忘记。然而,二月政权的机构如此不合逻辑,以至此时越发要用政治门面去掩饰政权内部关系的真相了。紧接七月事件之后,组成了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第二届联合政府,温和派社会党人在其中担任有名无实的领导职位。他们在其全盛时期在联合政府中是低级搭档;只有在他们的弱点都已经暴露无遗之后,他们才充当高级搭档的角色,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这样的怪事不会持久。

保守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寄希望于科尔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将军。克伦斯基已任命科尔尼洛夫为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受到上流社会及中产阶级的拥戴和支持,他便以上帝的选民自居,骄横跋扈。他对克伦斯基先是态度暧昧,后来则咄咄逼人,最后于8月24日对政府公开宣战,命令军队向首都进军。由于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事前就夸下海口要彻底消灭革命。

关在十字监狱中的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接到这一消息时有一种复杂的预感。克伦斯基继续把他们关在牢房里,如果科尔尼洛夫胜利,他会把他们作为有效的人质交给得胜的军人。他们必定会遭到屠杀,这肯定不是由恐慌引起的虚构想象。但这一情况又带来新希望。温和派社会党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不可能从科尔尼洛夫手里救出自己,正如在七月事件中他们没有将军们的帮助就不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救出自己一样。政府很快就主动把枪杆子塞到刚被解除武装的赤卫队手中。政府刚把全部军事灾难归咎于布尔什维克鼓动家的破坏性的影响,现在却乞求他

们用这一影响去影响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并说服士兵不服从甚至抛弃他们的指挥官。而且最后，克伦斯基还乞求七月事件的首恶者们，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团结起来保护他自己。

在托洛茨基的牢房里发生了一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场面。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派一个代表团去问他：是否应响应克伦斯基的号召，是保护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还是索性与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两人一起算账。急性子的水兵更愿意走后一条路。托洛茨基劝阻他们，提醒他们，5月间他在苏维埃捍卫他们时曾说过："如果一个反革命的将军试图把绞索套在革命的脖子上，那时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殊死战斗。"此时他们必须履行这一诺言，暂缓跟克伦斯基算账，跟克伦斯基算账无论如何为时不会太远。水兵接受了他的劝告。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检察当局仍旧机械地继续它的工作。调查拖延下去，托洛茨基必须答复关于他与德国总参谋部及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问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克雷连科被关了六个星期还没有被指明罪证，因此威胁要绝食，但托洛茨基竭力劝阻他们。最后他决定不再继续参与这场审判闹剧。他拒绝回答审讯官的问题，在致苏维埃执委会的信中阐明理由。三天后，9月4日，他得到保释。

他从监狱出来直接去斯莫尔尼宫，参加反对反革命斗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斗争委员会是经克伦斯基同意由苏维埃建立的。这个机关是领导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原型。

击败科尔尼洛夫的并不是武装部队，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的作用。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不放一枪就抛弃了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的失败引发了一连串直接走向十月起义的新事件，正如7月3—4日流产的革命使力量的对比转向有利于反革命一样，这次流产的反革命则更加强有力地使它倒向相反的方向。第二届临时政府垮台了。立宪民主党人部长们辞职，因为他们不

赞成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社会党人部长们退出,因为他们疑心克伦斯基曾与科尔尼洛夫合谋反对苏维埃并助长了后者的野心。一个月来,克伦斯基由于不能把联合政府的碎片捏合在一起,便通过一个所谓指导委员会来统治,这是个完全没有代表性的小委员会。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苏维埃中要求调查导致科尔尼洛夫政变事件以及克伦斯基在开始时所起的作用。他们更加坚决地促使温和派社会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决裂,不少立宪民主党人都曾支持过科尔尼洛夫。听起来,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赞成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论据是无可反驳的,但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继续试图复活联合政府时,追随他们的人便把他们完全抛弃了。苏维埃中的温和多数派在几天之内就瓦解了。9月9日,托洛茨基作了一次令人振奋的发言,要求明确为他本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恢复名誉。他要求政府提出早该提出的关于七月事件的报告,他还提出对苏维埃的孟什维克"主席团"的不信任案。使所有人都惊异万分的是,这一动议居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票,这是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①]

当孟什维克及其合伙者在苏维埃里失去地盘时,他们企图在苏维埃之外重振旗鼓。9月14日他们召开所谓民主会议。这个会议就任何意义来说都不是选举出来的会议。会议的成员是事先为保证反布尔什维克者占多数而拼凑起来的。这是形形色色的非

① 在同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提议根据比例代表制选举新的主席团,这一提议招致列宁愤怒的批评,列宁辩驳说: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居多数时,他们不采用比例代表制——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要给他们这种特权?但托洛茨基的这种和解姿态也遭到孟什维克的拒绝:他们拒绝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坐在主席团里。

政治组织，如合作社与革命前地方自治会代表团拼凑的大杂烩，却要对所有正在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情况就是这样荒谬，不管以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在现阶段看来，只有布尔什维克坚持了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而温和派社会党人则企图否定这一原则。在工厂和兵营中选出来的苏维埃不代表资产阶级，却完全代表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中的主要阶层。他们的权威和对群众的号召力部分应归结到由于没有任何真正的全国性的议会体制。看起来，创立这样的体制可能与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生死攸关。然而联合政府还在继续拖延已经许诺的立宪会议选举；而布尔什维克则大声要求选举，但他们自己心里对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未来的关系也不清楚。他们并未预见到通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就会使立宪会议成为不可能的事；也未预见到他们召集立宪会议只是为了解散立宪会议。另一方面，温和派社会党人迎合立宪民主党的愿望，同意一再推迟选举，而立宪民主党人则害怕此时举行全国投票会产生一个过激的立法机关。[1] 同时，温和派社会党人试图策划用民主会议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预备议会”来取代议会。

会议使统治集团出现不和的局面。温和派社会党人热衷于辛辣地对立宪民主党人反唇相讥。克伦斯基自己的追随者公开表示不信任他，说他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暧昧的，说他把自己凌驾于使他得以执政的党的头上并建立他的个人统治。克伦斯基企图反驳这些指控和说服会议必须恢复联合政府，但是他的表演如此荒唐无稽，以至使他的朋友们大失所望，而他的目的什么都没有达到。正是在这一时刻，托洛茨基首次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发言人出现在会议的讲坛上。孟什维克的革命史学家是这样

---

①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 1 卷第 2 册第 91－92 页。

描写托洛茨基这次演说给人留下的印象的:[1]

> 这无疑是这位令人惊异的的演说家的一篇最杰出的演说,我抑制不住自己心头的愿望几乎全文转录了这篇了不起的演说,使我这部书更加生色。如果将来我的书也有读者,就像拉马丁(Lamartine)的并非富于想象力的书至今仍有读者一样,那就让该读者从这一页来评判我们时代的演说艺术及其政治思想吧。他一定会得出结论说:在过去的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没有白活,我们的革命英雄已使1789年的著名领袖黯然失色。
>
> 亚历山大剧院里的听众一听到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像触电似的。……托洛茨基自己作了充分准备。在台上我站在他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见他面前的讲坛上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纸上有的措辞下面划了线并有脚注,还有用蓝色铅笔画的箭头。……他说话十分平易,没有用修辞技巧(尽管需要时他的修辞技巧可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丝毫没有装腔作势或耍什么花招,这次是他跟听众进行对话,有时往前走一两步把他的胳膊肘靠在讲坛上。声如洪钟和措辞优美本来是托洛茨基演讲的特点,但在这次演说中都没有。

我们不必概括这篇重述布尔什维克政策主要路线的演说,只要例举几点说明他的论战方式就足够了。他以非常平静的语调开始说:“同志们,公民们,社会党人部长们刚对你们讲过话。原以为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5卷第125-126页;另见切尔诺夫:《俄国大革命》第306-307页。

部长们出席代表机构的会议是要作工作报告。而我们的部长不作工作报告,却喜欢给我们提意见。对意见,我们感谢,但我们还是要求作工作报告。部长公民们,我们要的不是提意见,而是工作报告",演说家非常平静地重复他的话。轻轻地敲着讲坛,他总结了以前的争论并指出,没有一个发言的人替克伦斯基辩护过,因此总理处于受他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谴责的境地。这一下击中了对立阵营的最致命的弱点,因而激起代表席上一阵暴跳如雷的叫嚷。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一项最近重新推行死刑的法令。克伦斯基急于平息他自己的追随者的不满,在会上宣称:"如果我曾签署过一次死刑判决,你们可以责骂我。"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如果死刑是必要的,克伦斯基怎么可能承诺说他不用死刑?如果他认为他能在整个民主的舆论面前表态,说他不会应用死刑,那么,我告诉你们,他正把重新推行死刑看成是属于犯罪的轻率举动。"

支持联合政府的人曾说过不应因为科尔尼洛夫的叛变而责怪整个立宪民主党,并且还说: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党受到指控要对七月事件负责时还提出抗议,他们怎么反倒率先指责全部立宪民主党人呢。托洛茨基就此问题回答说:"这样相比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当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造成或煽动7月3—5日的运动时,毫无疑问,你们不可能邀请他们入阁——他们那时都被请到十字监狱里去了。同志们,在这里确实有所区别……我们说:如果因科尔尼洛夫政变案你们要把立宪民主党人关进监狱里去,那么请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事,要分别调查各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案子!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去审问吧!"就连带有敌意的听众都为此话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讲台上最自负的部长与各党的领袖们也都忍俊不禁。但这样的欢笑声很快就被一个令他们生畏的重要声明所打断,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托洛茨基力主赤卫队武装起来。这

时从孟什维克席位上发出喊叫:“为什么?为什么?”托洛茨基回答说:“首先,为了使我们可以建立一座对付反革命的真正堡垒,反抗新的、更加强大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其次,如果成立真正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政府,如果这个新政府所提出的诚挚的和平遭到拒绝的话,那么,我现在代表我们党奉告你们……彼得格勒及全俄的武装工人一定会以俄国历史上空前的英勇捍卫这个革命的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以指斥这个会议毫无代表性而结束发言,接着就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退出了会场。[①]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退场以后,会议还是不能满足克伦斯基的期望。会议在混乱中结束,像在开幕时一样。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但当时团结一致的多数断然决定不再迁就立宪民主党人,而联合政府中唯一可能的搭档就是这个党。9月21日,克伦斯基不顾他本人的假议会观点,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被架空了。这是7个月来组成的第五届内阁。托洛茨基和列宁留给这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一个月。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的力量越来越壮大。9月初,他们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工业城市都成了多数。他们满怀信心地指望,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多数党出场。授权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机关是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这个在6月中选出的执委会还是由温和派社会党人控制的。凡是对温和派社会党来说是冒险的行动,他们都竭力拖延,而布尔什维克当然迫切要求尽早召开大会。托洛茨基跟温和派领袖抗辩而且警告他们说:“不要玩弄这次大会。地方的苏维埃,首先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都要求召开大会;如果你们不按宪法规定的方式召开,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287－293页。

我们就会用革命方式召开大会。”①

9月2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托洛茨基为主席。托洛茨基登上讲台时，会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鼓掌声……苏维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七月事件中的令人沮丧的会议相比，“现在这又是一支革命队伍了。……现在，它是托洛茨基的近卫军，已作好准备，只等他一声号令，就直捣联合政府、冬宫以及资产阶级的所有堡垒。……唯一的问题是托洛茨基要率领他们冲向哪里。”② 他在就职演说中回顾了1905年，并表示，希望这一次他将领导苏维埃走向不同的命运。他作了庄严有力的保证，后来的事件却给这项保证投下令人伤心的阴影，他的保证说：“我们都是忠于各自政党的人，将来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彼此冲突。但是我将要按照合法的、所有党派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精神进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主席团决不帮助压制少数。”③ 他代表苏维埃发出第一个号召：举行第二次革命，要求克伦斯基辞职，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大会。他像以往一样尖锐地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辩论，但他并无敌意，没有丝毫渴望报复之意，而对一个新近被取缔过的政党的领袖，人们总会以为他会渴望报复的。④

尽管列宁反对，但所有的党派仍按人数比例推出代表参加新的主席团。⑤ 这样一丝不苟地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是否仅仅是旨在麻痹少数派警惕性的策略手段？未必会这样。苏汉诺夫说，三年后，在布尔什维克取缔所有反对党以后，他提醒托洛茨基说，他曾保证决不帮助压制任何少数派。托洛茨基陷入沉默，考虑了一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20页。

②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第188页及以后各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94页。

⑤ 甚至像高尔基那个人数很少、无权要求派代表的团体也分配到几个席位。

会儿后若有所思地说:"那些日子是美好的日子。"[1] 那真是美好的日子。那时,革命仍在认真保证要扩大自由并使自由成为现实,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许诺自由,或者只是吝啬地给予一点点自由。

托洛茨基此时不再禁止自己当众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他接受了这个他曾长时间内认为是玷污他名声的称号,他在狱中时已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从他被释放到十月起义的7个星期中,他的名字不但已跟布尔什维主义同义,而且在外界看来,他的名字甚至比列宁的名字更有力地象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抱负。因为当时公众见不到列宁。[2] 这几个星期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历史大事,以至把人们记忆里前几个月及前几年的事变全都挤掉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近15年来的长期不和同今天他为布尔什维党在15分钟内所做的事相比,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党的核心集团里,当然有人不能从记忆里抹掉过去他们两人的长期纷争。他们怀着隐藏得很深的不满情绪看着托洛茨基在党内突然上升到支配地位。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最近的逆境中,托洛茨基在还不是党员的时候就以值得赞赏的英勇站在党的一边了。他们也不能否认,在列宁不在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坚定、清晰和权威地为党说话;就是列宁担当党的喉舌也未必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卓越。

因此,托洛茨基在党内占支配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要看出隐藏着的感情,只要查看一下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就够了。这一年早些时候,列宁力图说服他的的同事们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作中给托洛茨基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没有成功。一直到8月4日,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第190页。

② 雅克·沙杜尔后来是狂热的斯大林派,但他当时曾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而列宁仍还是起义的理论家。"同上,第76页。

中央委员会推选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总编委员会〔这个编委会由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米柳亭(Милютин)组成〕时有一项提议:托洛茨基从监狱出来后应参加编委会。这项提议以11票对10票被否决。[1] 但在9月6日,即托洛茨基出狱两天后第一次出席中央委员会时,他被任命为党的主要编辑之一,没有人反对。[2] 当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是21名中央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其中有几名是过去在流亡侨民中的知名人物,有几名是从区联派来的。其他人如米柳亭、诺根(Ногин)、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邵武勉(Шаумян)都是国内土生土长中央委员。他们几乎不知道严格秘密的地下党以外的生活,他们自认为一直是真正的地下革命活动家,而且他们怀着本能的不信任看待以前流亡的人,特别是看待最自豪、最能吸引人而又最有辩才的那个人。但这种对抗性却几乎被压抑到下意识的深处。

托洛茨基作为新人,开始时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慎重而有分寸。在他第一次出席中央委员会那一天,老布尔什维克之间,在与党的根本立场直接有关的问题上的分歧就暴露出来了。这些分歧是对起义问题激烈争论的开端:列宁从其隐蔽所刚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跟列宁躲藏在一处的季诺维也夫就已向中央委员会申请准许他公开露面,离开列宁。中央委员会不肯批准;但也为两位领袖的继续躲藏问题感到不安;中央委员会允许加米涅夫和温和派社会党人谈判,为两人的可能公开露面作好安排。在这场起义问题争论的序幕中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托洛茨基很少发表意见或不发表意见,尽管他有其坚定的见解。

列宁已开始敦促他的党举行起义。在他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5页。

② 同上,第56页。

详述了苏维埃里的情绪变化、农民反抗掀起的高潮以及军队的不耐烦,他因而极力主张党应当立即从革命的宣言和革命的许诺转到武装起义方面来;他深信如果党抓住时机就会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历史提供的机会都是转瞬即逝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失去这个机会,另一个科尔尼洛夫很快会准备好檄文,打垮苏维埃和革命。列宁写道,考虑到这种危险,不能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克伦斯基随时都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党应该发动起义。只要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发动起义(从哪里开始都可以,甚至可以在莫斯科先开始),党一定能取得胜利。[①] 9月15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些提议。加米涅夫出面断然反对,并且要求中央委员会警告所有的组织,不得有任何起义性质的行动。中央委员会不接受加米涅夫的意见,也不同意列宁的提议。[②]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从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一新的优越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起义的时机及其紧迫性问题上同意列宁的意见。但在方法问题上,特别是在党应以自己的名义发动起义并独自承担起义的责任这两点上,他和列宁不一致。他不如列宁那样认真地看待迫在眉睫的反革命威胁。[③] 与列宁不同,他深信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不容许旧的中央执委会把全俄大会拖延过久。他推论说,既然布尔什维克根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进行他们的全部鼓动,他们就应以这样方式举行起义,使每个人都把起义看做是这种鼓动的直接结论。所以,起义的时间要与苏维埃大会一致,或稍前于苏维埃大会,因而起义者应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234页。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65页。

③ 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七月事件。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第171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15-319页。

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此外,他要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并通过这个机构举行起义,因为这个机构的全部组成部分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而整个苏维埃机构正是他亲自指挥的。这样,起义在全世界的眼中就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事,而是广泛得多的事业。[①]

如果硬要把这种分歧理解为更深刻的原则性矛盾并由此推论说:托洛茨基要为苏维埃夺取政权,而列宁的目的在于把政权单独置于他的党的手中,这就错了。在某种意义上,两人都是苏维埃宪政主义者。列宁同样设想,起义者要召开全俄苏维埃大会,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但他拒绝把起义拖到大会召开之时,因为他深信孟什维克执委会定将把大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样,如果让反革命抢先胜利,起义就绝不可能举行了。但他也把苏维埃大会看做是政权的宪法根源。相反,托洛茨基倒认为构成苏维埃中多数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上会成为当权的党。在这一阶段,他们两人都看不出苏维埃宪政与布尔什维克专政之间有什么矛盾,如果在细节上作些必要的变更的话,那么正像英国的民主派看不出议会统治与以多数党为基础的内阁制之间有什么矛盾一样。

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同看法集中在一个更狭小得多的问题上:即起义本身应否用苏维埃宪政这个术语来表达。植根于托洛茨基的立场中的策略冒险性就在于,会因拖延时间而使整个行动计划受影响;而列宁的方式在政治上的不利之处则是可能会缩小起义对群众的吸引力。列宁一心所想的只是要达到的目的,托洛茨基则更注重起义的政治脉络关系、群众的情绪和争取踌躇分子的必要性这些方面,因为踌躇分子可能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而不响应党的号召。摆在一个躲藏起来的人眼前的只有赤裸裸的、变化无常的政权现实性;而另一个人除此以外还考虑到无可估量的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5、6章。

精神与政治影响,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充满信心,他的信心来自他正处于事变的中心而且主宰着那些事变。

这种分歧相对于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的人之间的主要争论来说,则是小事一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正在使党及革命陷入自杀的冒险中去。这是一场甚至要使党分裂的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争论;这场辩论中的主要正反两方的意见将在后来无数次的论战中以不同组合方式重新出现;不管这场争论的直接结局如何,历史也许还未对它做出最后定论。在事变发生之后去评价说主张起义的人正确和反对起义的人错误,这是容易且很自然的。其实,双方陈述各自的理由时,正确的和错误的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而对历史前景所作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则为严重的错误所抵消。列宁和托洛茨基以敏锐犀利的目光估计俄国全国的局势和国内的力量对比。他们察觉到赋予克伦斯基政权强大的假象的只不过是这个政权的存在而已,他们对起义结果的乐观看法是基于对互相敌对的力量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衡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这种乐观的结论,在记录上有他们的下述警告:"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的赌注押在武装起义这张牌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情况,被压迫阶级必须承认:与其不战而降不如前进而失败,难道俄国工人阶级目前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吗?不是!绝对不是!!!"①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的前途只有灾难;在他们悲剧生涯的余年中,每当回想起这些话时就羞愧难当。但主张起义的人,首先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他们的论点不仅仅是根据,甚至主要不是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2-108页,这段叙述的英文本在《列宁文集》英文版第21卷第2册第328-332页。

根据他们对俄国内部力量对比的看法。他们更强调的是欧洲革命的迫近。正如托洛茨基自1905—1906年以来一直主张的那样，俄国革命会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列宁在10月10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动议中所申明的起义的理由主要是："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激烈的表现）"。[①] 此后他在公开及私下的讲话中几乎每次都重复这一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②] "我们正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阶。"[③] 他在一封致党员的信中说："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只是用……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者关于起义的号召，那么我们就是国际的真正叛徒。"[④] 他在另一个场合中论证说："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不少客观材料，说明我们一旦发起行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⑤] 这种信心不但决定了托洛茨基的全部看法，而且也决定了列宁对形势的全部看法，列宁还坚持苏维埃政府应准备进行革命战争和帮助德国无产阶级的起义。

反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说："如果我们得出结论……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一定会离开我们。"这对导致后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发展倒是确切的预见。他们进一步辩论说："这里我们要谈谈第二个断言——即国际无产阶级的多数据说已经跟我们站在一起。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德国海军中的暴动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但距离遥远，不能积极支持向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挑战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高估计（我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85页。
② 同上，第178页。
③ 同上，第268页。
④ 同上，第377页。
⑤ 同上，第387页。

们的)力量是极其有害的。”

这样,那些在总结俄国形势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人当转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时却成为幻想家;那些透过胆怯的怀疑主义迷雾悲观地看俄国的人却成为现实主义者。的确,主张起义的人体现了革命的活力及不屈不挠的勇气,而反对起义的人则表达出他们对革命力量的怀疑。然而,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国际革命进行更清醒的观察并预见到在几十年内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学他们榜样,人们也许会怀疑,他们是否会依然那样行动,或他们是否会以同样的决心行动,对这类纯属推测性的问题不可能作出回答。事实上是,俄国历史的全部动力推动着他们、他们的党和国家走向这次革命,而且他们需要以胸怀世界的希望去完成震撼世界的事业。当历史需要以幻想为动力并继续起它自己的作用时,历史就会产生伟大的幻想,并把它植入和培育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领袖的脑子里,历史同样曾使法国革命领袖产生坚信融合各民族的世界共和国即将成为现实这一信念。

※ ※ ※ ※ ※

在中央委员会的争论没有结果时,党当然不能有首创性的行动。9月底克伦斯基召开预备议会,即取代经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新替身。布尔什维克必须作出是否参加的决定。这个问题和起义问题有关。那些反对起义的人和犹豫不决的人都赞成参加:他们想让布尔什维克党在预备议会中充当正式的反对派,尽管事实上这个机构不能自称为代表全国的议会。主张起义的人认为他们的党充当反对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否则,他们就不会考虑立即推翻现政权。他们论证说:倘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还居少数,他们就只能敦促温和派多数把一切政权移交给苏维埃;因为他们

自己不能实现移交。但他们既已成为多数，如果不想证明自己是只爱讲漂亮话的人，他们就必须使之实现。他们出席预备议会只会给后者装上真议会的门面，而使自己的精力脱离了直接行动。

在这场辩论中，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席会议——一起发言抵制预备议会。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则主张赞成参加预备议会。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预备议会开幕式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多数人投票赞成参加。列宁坚决要求改变这种立场，他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民主议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①] 这一事件表明党在精神上还未具备领导起义的条件。

列宁写下"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这几句话时显然感到欣慰。他曾不安地、甚至猜疑地看待托洛茨基在起义问题上的态度，不知道是否托洛茨基会因坚持起义应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相联系这一点而不遵守列宁提出的时间，以致拖延了行动，直到使起义错过时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根据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甚至是一个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更危险的反对者，那两个人的立场至少有反面价值：因为他们的态度毫不暧昧，他们直截了当地否认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整个趋向。托洛茨基的态度则相反，看起来是在遵循党的政策，因而对布尔什维克更有说服力；事实上，中央委员会是倾向于采纳他的意见的。因此在列宁的一些信中，有时反驳托洛茨基的意见几乎跟反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同样激烈，只不过没有点托洛茨基的名罢了。列宁写道，起义若等到苏维埃大会的召开，正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等待克伦斯基召开立宪会议一样，都是背叛的行为。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6页。

过了很久托洛茨基才原谅列宁的做法,他写道:"如果没有列宁的忧虑、他的压力、他的批评、紧张而激烈的革命怀疑,党在关键时刻就不可能整顿自己的阵营,因为最上层的反对非常有力……。"[1] 也许还要补充说,列宁的"紧张而激烈的革命怀疑"当然也包括不信任托洛茨基本人——这个好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的人,一面"敲不响的破锣"或过去的"巴拉莱金",以前的孟什维克伙伴,只不过刚刚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此时却要乘列宁不在的偶然机遇置身于党的领袖地位。确实,他在七月事件中表现出的尊严与勇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列宁从未怀疑过托洛茨基的尊严和个人的勇敢,即使在他们争吵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尔托夫在7月间也曾勇敢地保护过列宁。然而,保护捍卫一位受敌人折磨的同志(即使是一个政敌)是一回事,领导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能胜任领导革命之职吗?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从长篇激烈的演说转变为行动吗?直到起义的时刻,甚至在起义期间,这种疑问一直折磨着列宁。

此时,托洛茨基正在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时,心理上这样难以捉摸,策略上这样机智,以至于他虽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他的活动,但无论敌人或朋友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并不企图从外部把起义计划强加给事变的过程。他根据形势的发展来部署起义,因此他根据当时的迫切需要,在某种意义说是真正的需要而采取行动,尽管这些需要表面上和起义无关。而且,他能够证明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正当的。他进行的每一活动看来都光明正大;虽然他的这些活动在一个谋划中彼此相联,但这些联系也都伪装得天衣无缝。那些为政府、总参谋部、盟国大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监视情况的训练有素的政治、军

---

[1] 参见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载《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xlvii-xlix页。

事观察家没有一个能看穿他的伪装,甚至连列宁也在某些方面被他蒙骗了。

10月初,危机已达到新高峰:经济混乱在加剧;城市的供应已经中断;在广袤的乡村中,农民夺取乡绅的庄园,焚烧宅邸;军队又遭受新的失败;德国海军就在芬兰湾活动。彼得格勒本身似乎立刻要遭到德国的进攻,政府各部门和军界、商界已讨论从首都撤离并把政府迁到莫斯科。但也出现了相反的态度,在战争史及革命史上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那些渴望反革命而自己又太无力、不能实现反革命的人,尽管惯于自称爱国,却满怀喜悦地期望着入侵的敌军为他们效劳这种前景。杜马的前议长罗将柯十分轻率,公然说,如果德军重建彼得格勒的法律和秩序,他一定表示欢迎。沮丧情绪在工人阶级及"失败主义的"苏维埃里蔓延。10月6日,托洛茨基在驻防首都各团队的代表面前对苏维埃士兵讲话,并提出如下决议:"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首都,那么就应缔结和约或者让位给另一个政府。政府迁到莫斯科就是擅离职守、临阵逃脱。"[①]这项决议案全票通过了。驻军接到通知: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有权在没有政府授权甚至违背政府意愿的情况下组建城市的防务。

第二天,托洛茨基在预备议会讲坛上敲响了警钟,他说:"使革命首都向德军投降的计划,是谋划助长……反革命阴谋的总政策中一个自然的环节。"[②] 一阵辱骂声潮水般地向演说者冲来,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在预备议会上的发言——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坚持和催促下终于决定抵制这个预备议会。托洛茨基制服了大吵大闹之后,宣布布尔什维克退出会场:"我们与背叛人民的政府,这个纵容反革命的内阁没有共同之点。……我们退出这个会场,号召全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21页。

② 同上,第321－323页。

俄工人、士兵和农民要提高警惕,要勇敢!彼得格勒在危险中!革命在危险中!人民在危险中!"从此以后,起义者每天都大踏步地向他们的目标迈进。

以克伦斯基及其总参谋部为一方,以托洛茨基和苏维埃为另一方,双方都在忙于一连串计划,部署内战舞台的演习;但双方都自称为更广泛的国防利益活动。克伦斯基正准备重新调动军队,表面上说是用以加强前线。最革命的团队在这一过程中都要被调出彼得格勒,作为跟苏维埃摊牌的前奏。托洛茨基必须挫败克伦斯基的计划,并要防止亲布尔什维克的团队被调走。他这样做根据的理由是:德军入侵决非虚妄之言,把驻军全都调走将使首都面临德军入侵的危险。与此同时政府却否认它曾提议迁离彼得格勒。但政府的打算一直引起怀疑;在克伦斯基一心要调动军队的事情传出后,怀疑得到证实而且加深了。10月9日,苏维埃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托洛茨基强烈要求苏维埃全体会议及其分组会议干涉军队调动问题。既然苏维埃已经承担保卫彼得格勒的职责,就不能对驻军的撤离袖手旁观。托洛茨基还没有明确提出关于苏维埃应当否决克伦斯基的计划。他提出的第一步是,苏维埃应查明这个计划的用意并"控制"驻军的情况。但无疑他已提出谁该成为驻军主宰的问题了。[①]

同一天,在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实际上是起义最高机关的委员会此时仅以代表苏维埃承担保卫首都之职的机构而出现。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议是一个姓叫拉济米尔(Лазимир)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他当时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没有预感到此举的后果。执委会中的孟什维克成员反对过这一意见,但当向他们指出,这个委员会与他们自己在科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24页及以后各页。

尔尼洛夫政变时成立的机构不但一模一样，而且是它的延续时，他们作不出有力的答复。在孟什维克居多数时期，苏维埃确实一再否决过政府打算采取的行动——这本来是二月“双重政权”体制下的惯例——而现在引用这些先例时却解除了对方的武装。托洛茨基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当然领袖，委员会的任务是：规定保卫首都所需要的驻军规模，同北方前线、波罗的海舰队、芬兰驻军的司令部保持联系，估计兵力和军火的库存，制订防御计划，维持城市居民的秩序。军事委员会成员中，除了其朝气蓬勃但缺乏理解力的发起人之外，还有波德沃伊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拉舍维奇这些未来起义的作战指挥员。委员会分为7个处，分别负责防御、后勤、联络、情报、工人民兵等。委员会还按照先例任命政委，政委是该委员会派驻在所有团队中的代表。

当托洛茨基部分由于计划，部分由于重大事件和平常事件的推动而在建立起义机构时，党中央却仍然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10月3日党中央听取莫斯科代表洛莫夫-奥波科夫（Ломов-Оппоков）的报告，他赞成起义，要求结束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写道：“决定不讨论该报告”，[①] 但要求列宁来彼得格勒向中央委员会陈述他的论据。[②] 10月7日指定一个局去“收集有关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信息”。这个局的成员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勃诺夫（Бубнов）。[③] 10月10日，即军事革命委员会组成后的那一天才举行了有列宁出席的那次历史性会议，会上，经

① 参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发表的起义参加者在起义三周年时所作的回忆。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87页。

③ 同上，第94页。

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党的领袖们以1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起义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又选出第一届政治局——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以便向党提供对起义的逐日的指导。① 但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要求下级组织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党的立场再次处于波动中。新选出来的政治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提供指导:列宁回到芬兰的隐蔽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斯大林几乎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索柯里尼柯夫的意见比托洛茨基的稍微谨慎些;而列宁还是不信任托洛茨基的计划,极力主张党独立倡导武装行动。政治局全体成员原则上并不反对这样的行动。但更赞同通过苏维埃来举行起义。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托洛茨基在最有力的鼓动家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和沃洛达尔斯基的协助下集结革命力量。10月10日他对全市工厂委员会大会讲话,10月11日及12日他号召俄国北方苏维埃大会为伟大事件作好准备。他说:"我们的政府可能会逃离彼得格勒。但革命人民决不离开这个城市——它将誓死捍卫首都。"② 同时他竭力迫使孟什维克中央执委会成员召开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10月13日,他越过执委会的那些头头们,代表俄国北方苏维埃发出"致全体同志"的无线电报,他在电报中把"致全体同志"几个字连续重复三次,他号召所有苏维埃和军队派代表出席大会。苏汉诺夫写道:"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沃洛达尔斯基在著名的摩登马戏场演讲,使巨大的圆形剧场都容纳不下的人群在外面排起了长长的队。……托洛茨基中断了他在革命总部的工作,从奥布霍夫工厂跑到制管厂,从普梯洛夫工厂跑到波罗的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8-101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5页。

海舰队,从马戏场跑到兵营,好像他同时在各处讲话。彼得格勒的每个工人和士兵都认识他,倾听他的讲话。他对群众和领导人的影响都同样不可抗拒。他是当时的中心人物,是这一非凡的历史篇章中的主要人物。"[①]

10月16日,驻军的一些团队宣布,他们不服从克伦斯基的调令而要留在彼得格勒。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说的,这是无声的起义,它预先决定了斗争的结果。[②] 在这之前,托洛茨基自己一直为他把起义跟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所冒的风险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安。现在使他消除疑虑的是:在短时间内,克伦斯基不能使力量的对比变得对他自己有利。同一天,托洛茨基签署命令,命令军火库发5000支枪给市民赤卫队。这是检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驻军中是否有效的一种方式。命令的确是有效的。

在这"无声起义"期间,中央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有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地方领袖参加的会议。[③] 列宁乔装到达会场,他提出会议应批准关于起义的决定,中央委员会应立即发出行动的号召。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谈到群众中的冷淡情况,但声称:如果起义的号召来自苏维埃而非来自布尔什维克,就会唤起群众并得到群众的响应。要实施列宁的计划就得完全依靠党的军事部,而党的军事部领导人克雷连科声称军事部只有少数人赞成起义,但即使是这样的少数也赞成起义由苏维埃发动而不赞成由党发动。沃洛达尔斯基讲话的口径也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断然重申反对任何方式的武装行动。斯大林谴责他们对欧洲革命缺乏信心,并且说在党的领导人陷于混乱的争论中时苏维埃已经"走上起义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44、76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页。
③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0－125页。

之路”。莫斯科的代表米柳亭说话模棱两可。索柯里尼柯夫认为，起义应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后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有关群众冷淡、厌倦的忧虑的议论声。列宁扼要地重述了他的观点，但他向拥护托洛茨基计划的人作出让步，提出“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的方法”。[①] 暂定在10月20日起义。

中央委员会定下这个日期是因为这一天是苏维埃代表大会预期开幕的前夕。作准备的时间只有三四天了。然而中央委员会刚一批准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力图破坏。他们斥责这个计划，但这一次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决策会议上，而是在高尔基报纸的版面上进行攻击。外界就是这样从这两个被认为是起义总参谋部成员的人那里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警报的。列宁非常愤怒，要求立即开除“这两个破坏革命的工贼”出党。人们对他的要求充耳不闻。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力图跟敌手和解。尽管这是一个不可能和解的问题：因为起义只有举行或不举行，二者必居其一。[②]

托洛茨基甚至利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混乱推进他的计划。10月17日他接到消息：孟什维克中央执委会又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推延了几天，他心中暗暗感到宽慰。这样可使他有稍稍多一点儿的时间作最后准备。但对方阵营也能从推延中得到好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泄露秘密有引起敌对阵营警惕的危险。10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列宁全集》第32卷第389页。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一个“军事总部”，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这个核心要“成为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在托洛茨基属下工作，后来斯大林及斯大林史学家根据斯大林是这个“总部”的成员，就说斯大林一直是起义的实际领导人，但这个“总部”在整个起义期间从未起到独立机构的作用。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27－129页。

月 18 日苏维埃向托洛茨基提出两个麻烦的问题，一个是广泛流传的关于起义的传闻，另一个是关于他命令军火库发放枪支给赤卫队的事。他的答复是外交辞令的杰作，他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所有决议都是公开公布的，苏维埃是选举出来的机关，每个代表都要对选举他的工人和士兵负责。这个革命的议会……不会背着工人作出任何决定。我们没有任何隐瞒。我代表苏维埃宣布：我们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就字面上说，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没有作出这类决定。他作为苏维埃的主席，人们只能要求他汇报苏维埃的工作。他没有义务公开承认像布尔什维党中央这样秘密机关所作的机密决定。

但他并不止于这样否认，因为这样会使朋友和敌人都会陷于混乱。然而他也绝不束缚自己的双手。他补充说："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他承认他曾命令给赤卫队发放枪支，但他用熟知的先例掩护自己：因为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也下过同样的命令。他用挑战的口吻补充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将继续组织并武装工人赤卫队……我们一定要作好准备，我们已进入更加激烈的斗争时期，我们必须作好准备，随时迎接反革命的进攻。但我们对反革命第一个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企图、第一个进攻我们的企图，定将予以严厉无情回击，而且我们必将把反击进行到底。"[①] 他以这种方式激励起义者及其朋友的战斗精神，同时却使他们的敌人不知所措。他小心谨慎地突出起义者活动的防御方面，而把攻势方面隐蔽起来。加米涅夫当场起来声称他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而季诺维也夫在一封致《工人之路报》编辑的信中也作了同样的声明。这两个反对起义的人希望他们的党受严格防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3 卷第 2 册第 31－32 页。

立场的约束并因而可以转弯抹角地放弃起义。但是他们表示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却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看见这两个著名的反对起义的人声称跟托洛茨基一致,以为托洛茨基也跟他们一致。"那么,就不会有起义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自我安慰说。

事后,托洛茨基立即同列宁秘密会晤,看来,这是他们在这几个星期中的唯一一次会晤。他不知道列宁是否误解了他说的话以及他跟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之间表面上的一致;他急于消除列宁的误会。[1] 但在这一点上他的担心并没有根据,列宁刚给中央委员会写过信说:"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了极点,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了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2] 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在这次会晤中列宁"更加冷静而且更加信任,我还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尽管如此,他仍时不时地摇头提问:'他们会不会抢在我们前面?他们会不会抓住我们疏忽的地方?'我争辩说,今后一切几乎都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3]

列宁并没有完全消除疑虑。他反复提出立即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托洛茨基及中央委员会全体的响应,这使列宁充满怀疑。任何一个处于同样情况的党都会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轻举妄动是背叛行径。所以,列宁从中央委员会对他们二人的姑息中看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央委员会在起

---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 8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415 页。

③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 86 页。

义问题的态度上犹豫不决。[1]

当苏维埃命令卫戍部队只许执行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及其政委签署的正式命令之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即告结束。10月21日，托洛茨基向团队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这项指令，并呼吁哥萨克（即以前沙皇的近卫军）站在革命的一边来。团队委员会在正式通过托洛茨基的决定后，作出特别声明：

> 卫戍部队赞同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的一切政治决定，兹声明：说空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军队要求和平，农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就业和面包。联合政府现在反对人民，已成为人民敌人手中的工具。说空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保证人民得到和平，土地

---

①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关系的特点是，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列宁的这一要求。加米涅夫自动宣布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不过，列宁要求把他和季诺维也夫开除作为惩罚，以警效尤，不是因为他们持不同意见，而是因为他们破坏纪律的行为是前所未闻的。读读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是有教益的，捷尔任斯基发表意见说应劝加米涅夫退出政治活动，但他不赞成开除，他补充说，不值得为季诺维也夫费心，因为他躲藏在隐蔽处。斯大林和米柳亭建议待到中央全会再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党报上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动机辩护，此时斯大林本人也受到批评。乌里茨基赞成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定，斯维尔德洛夫的发言虽然强烈反对加米涅夫，但认为中央委员会无权开除任何人。托洛茨基赞成接受加米涅夫的辞职而不赞成开除。他攻击斯大林在编辑工作中的表现，说党报态度的模棱两可造成不可容忍的局面。越飞的发言相同。斯大林再一次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说他们应留在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不是治病救人——必须保持团结。"加米涅夫的辞职以5票对3票通过。接着斯大林宣称他要辞去党报编辑的职务，但会议没有通过。此事及许多类似的事无法与下述观点吻合，即布尔什维克党从一开始就被独断或集权主义的一致所支配。《中央委员记录》第127－129页。

> 和面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庄严保证其所有部队都听候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调遣,并为此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信赖我们吧。……我们坚守自己的岗位,誓死争取胜利。[①]

事变表明这一最后的保证不但真实,而且更庄严。工人事实上都"誓死争取胜利";但驻军拥护苏维埃是因为深信战胜克伦斯基易如反掌,并指望这一胜利会结束战争。无论动机如何,事实是驻军自动服从苏维埃的命令。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正规军司令部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冲突。托洛茨基甚至在这时仍未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取代正规军总司令部。该委员会的政委们隶属于总参谋部,表面上是为了协调行动和消除磨擦;而在起义的当天,托洛茨基授意散布协商进行得令人满意的报导。[②] 托洛茨基在进行这些军事准备的同时,使赤卫队和市民组织处于戒备状态。10月22日,他在"人民之家"的大会上讲话。我们常常援用的那位见证人描写会场的情景是:"周围的群众情绪几乎是欣喜若狂。"托洛茨基要求他们跟他宣誓。"无数群众举起手来。托洛茨基铿锵有力地讲道:'让你们的表决作为你们全力以赴为支持苏维埃而献身的誓言吧,因为苏维埃已承担起使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伟大使命和给人民以土地、面包与和平的伟大责任。'无数群众一直举着手,他们一致同意。他们宣誓……托洛茨基讲完了,还有其他人要上台讲话,但这就不值得再费时间等着瞧了。"[③]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37页。

②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87页。

③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91页。

托洛茨基出场的戏剧性以及他的发言差不多像诗一般的崇高，恰好是他迷惑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作战策略"。那些领袖们太习惯于托洛茨基演讲的鲜明性及火药味了，并不觉得这次是真正开火了。在他们，而且不只是在他们看来，托洛茨基过于健谈，不能胜任成功的起义司令。但是这种革命的语言，伟大理想的语言实际上比数个师、团更为有效，而且鼓舞人心的长篇激烈演说确实起着激战的功效。到一定时刻，它们将使革命不战而胜，革命主要通过它们那巨大无比的说服力起作用，而且看来这种说服力的确已把其主要力量授予了一个人。

到10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已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既简明又谨慎。计划规定，用精选的部队迅速占领首都的所有战略要地，确保起义总部与卫戍部队之间的联络工作正常运转。精选的队伍都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当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最后一次检查部队的部署时，他们都深信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把政府推翻——因为支持苏维埃的部队占压倒优势。靠不住的只有一个重要阵地：涅瓦河上的彼得保罗要塞。据报告，那里的驻军拥护克伦斯基，至少对起义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制定了一个袭击要塞的计划，预料这是唯一一场重大的战斗。但托洛茨基决心设法用对话去攻占这座要塞。23日下午，他由苏维埃卫队的非布尔什维克指挥员陪同，坐卡车前往被设想为敌营的要塞去。他对要塞驻军讲话，劝他们跟他宣誓忠于苏维埃。[①]

此时，托洛茨基所要等待的是来自克伦斯基方面的挑衅，这样他就可以把发动起义作为防御战了。他毫不怀疑，克伦斯基必定

---

①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113页。

会挑衅——他自己对克伦斯基的刺激足以使他进行挑衅。[①] 果然，23 日，克伦斯基试图从他和他的政府所处的真空里发起攻击。他下令取缔《工人之路报》的发行（从七月事件以来《真理报》都是用这个报名出版的），还下令封闭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一个女工与一个男工从印刷所急匆匆地跑到军事革命委员会说，他们准备揭去《工人之路报》印刷所的封蜡，如果军事革命委员会给他们有效的军事保护，他们将继续出版报纸。那个无名女工气喘吁吁地提出的建议对托洛茨基来说像一道闪电。他后来写道："布尔什维克党报编辑部门上的一小块官方封蜡作为军事措施——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却是一个多么壮丽的战斗信号！"[②] 他当场签署命令，派一个步兵连和几个工兵排去保卫布尔什维克的编辑部和印刷所，这道命令立即执行。

这是尝试性的开场，它发生在 10 月 24 日破晓时分。第二天早晨，报纸上满载克伦斯基策划镇压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导。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制订起义的最后细节，现在看来很清楚，起义一天也不能拖延。一直都是警卫松懈疏忽的斯莫尔尼宫很快变成一座架满大炮和重机枪的要塞。清晨，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决定性事件到来之前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除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没有公开出面活动以及斯大林原因不明的缺席以外，在彼得格

① 然而，无可怀疑，克伦斯基把苏维埃视为眼中钉，一心要把它除掉，甚至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势力尚还微小、他本人的地位也完全要依赖于苏维埃的时候也是如此。早在 3 月 27 日（新历 4 月 9 日）乔治·布坎南爵士在日记中记道："昨天我和克伦斯基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不赞成现在对苏维埃或对军队中的社会主义宣传采取强有力措施的意见。当我对他说，只要他们让自己听命于敌对组织，政府就绝不会成为局势的主宰。他说：苏维埃会寿终正寝……。"乔治·布坎南爵士：《我的驻俄使命》第 2 卷第 11 页。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 3 卷第 205 页。

勒的所有中央委员都出席了。[1] 已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并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自动表示：一旦开始行动，他将听候起义总部的吩咐；而且他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主动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准任何中央委员在白天离开斯莫尔尼宫的建议就是他提出的。根据托洛茨基的倡议，给每个人都分派了联络和组织方面的专门任务。捷尔任斯基与邮电部门保持联系；布勃诺夫与铁路系统保持联系；诺根和洛莫夫与莫斯科保持联系；斯维尔德洛夫负责监视临时政府的活动；而米柳亭则负责首都的粮食供应；加米涅夫和伯尔津要把脱离他们本党派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争取过来。最后，托洛茨基提议：如果布尔什维克在斯莫尔尼宫失败，起义总部应迁移到彼得保罗要塞。因为他刚刚把那里的驻军争取到革命事业方面来。[2]

对方已经进行这样的部署时，克伦斯基在向预备议会致词中还一味进行已经过时的威胁。他宣称已命令对整个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诉、重新搜捕列宁、逮捕保释的托洛茨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说正对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采取行动。[3] 托洛茨基召开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报告军事革命委员会刚刚采取的步骤。即便在此时，他还是没有宣布起义：

> 我们不怕承担维持首都革命秩序的责任。……我们的原则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原则应当在

---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41－143 页。

② 同上。加米涅夫提议，后备总部设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他与舰上的人员及无线电台保持联络。

③ 前一天，英国武官陆军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知道这个计划，他的笔记本上有一段记载："今天巴格拉季奥尼告诉我说，克伦斯基决定逮捕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我问我们是否有足以实现这一计划的强大力量，巴格拉季奥尼说我们有。波德雷洛夫说：'我们可以冒险'。"《与俄军在一起》第 2 卷第 705 页。

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予以贯彻。这是否会导致起义或其他方式的行动,不仅仅取决于苏维埃,甚至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取决于苏维埃,倒不如说更取决于那些不顾人民一致的意志而仍然把持政权的人。(他报告了《工人之路报》事件,质问道:)这是起义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人民毫不信任的半破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也不相信自己,因为它的内部已经死亡,这个半破产的政府只有等待历史的扫帚把它扫出历史舞台……。

他宣称已依法撤销克伦斯基对喀琅施塔得水兵采取行动的命令,并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泊在涅瓦河待命:

明天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卫戍部队及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他们所集结的力量交由苏维埃调遣,在这一力量面前,政府的任何挑衅一定会失败。把这一力量不折不扣地交给大会正是我们的任务。如果产生错觉的政府企图冒险恢复自己的军团,人民群众一定会给予更有力的反击。进攻愈猛烈,反击也就愈强有力。如果政府试图利用留给它的24或48小时来挫败革命的话,我们宣布,革命的先锋一定会以进攻对进攻,以钢对铁。[①]

当市杜马代表团前来向他询问苏维埃的打算时,他含糊地回答说,苏维埃准备同市杜马合作,捍卫革命秩序。他还毫无诚意地邀请市杜马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

深夜,孟什维克中央执委会召集为参加大会而聚在一起的代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51-53页。

表们开会。唐恩最后一次代表苏维埃旧领导人发言。他警告代表们要反对流血事件,说:"反革命分子正在等待时机,只要布尔什维克一发动,他们就会开始暴乱并进行屠杀——这将成为革命的末日。……群众已经厌倦而且精疲力尽,他们对革命已不感兴趣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服从总参谋部的命令……那是决不容许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就是死亡。……我们不怕刺刀。……旧执委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革命……。"[①] 在喧闹和大声嘲笑中,唐恩答应立即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改革,因而不自觉地承认了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始终是正确的。(他宣称:"俄国再也无力继续进行战争了。")代表席上传来喊声:"太晚了!"

> 尔后,托洛茨基登上讲台,引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情绪高涨的大厅里掌声如雷。他削瘦而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蓄意的冷嘲热讽的表情,简直是十足的梅菲斯特。
>
> "唐恩的手法证明群众——这批迟钝、冷漠的广大群众——是绝对站在他一边的!"(哄然大笑)他像演戏般地转过身来对主席说:"当我们提议把土地交农民时,你们反对。我们对农民说:'如果他们不给,你们就自己拿吧!'农民照我们的话做了。……现在你们又提出我们早在6个月前提出的主张。可能到时候唐恩会说革命的精英分子参加过7月里的起义。……不,过去7个月的历史表明群众已离开了孟什维克。……唐恩会对你们说,你们无权举行起义。但起义是所有革命者的权利!被蹂躏的群众起来造反,是他们的权利。……只要你们保持

---

①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58-60页。

充分的信心,就一定不会有内战。我们的敌人就会立刻投降。你们会取得理当属于你们的地位,即俄国土地的主人。"①

唐恩由于托洛茨基仍然是那样含糊地谈论起义而受了蒙蔽,也许还由于他希望布尔什维克不会取得苏维埃的多数,他立刻跑到克伦斯基那里向他保证说不会有布尔什维克政变,并且恳求他不要采取高压手段。②

起义已在进行。托洛茨基颁发他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昨天夜里,反革命阴谋家们试图号召容克营和突击营进攻彼得格勒。因此命令你们的团队准备行动,等候下一步的命令。一切拖延、犹豫都将是对革命的背叛。"他的坚定语气鼓起起义者的信心。10 月 24—25 日间的夜里,赤卫队和正规团队以闪电般的速度几乎一声不响地占领了塔夫利达宫、邮局及火车站、国家银行、电话局、发电厂及其他战略地点。2 月间推翻沙皇统治的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而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只用了几个小时。10 月 25 日早晨,克伦斯基已乘一辆外国使馆的汽车逃离首都。他的部长们在冬宫里空等他,中午时,他们已被包围在那里,正如沙皇政府在二月革命的最后阶段被包围一样。布尔什维克没有流血就成为首都的主人。③ 中午,托洛茨基向满腹狐疑、十分震惊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汇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有几个部长已经被捕,预备议会已经解散,全城已在控制之中。当时敌

---

①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 58－60 页。

② 克伦斯基:《来自远方》第 197－198 页;《自由的苦难》第 346 页。

③ 陆军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怀有极大敌意的观察家,他说伤亡的总数约"10 人"。《与俄军在一起》第 2 卷第 711 页。

人盘据的只有冬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正准备攻打冬宫。

24日夜，仍然乔装的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报纸上报导的总参谋部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友好谈判又曾引起过他的怀疑。他仍然怀疑起义被延误了。在他从最近几天藏身的维堡市郊区偷偷去斯莫尔尼宫的路途中，他并不知道他经过的首都实际上已在他的党的手里了。他连珠炮般地对托洛茨基及其他领导人提出问题：他们真的正在跟总参谋部谈判吗？为什么城里这样平静？[①] 但是当他仔细听了答复，当他注意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房间里参谋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不断接到报告及发出指令，当他眼见起义领导人本身都几乎精疲力竭、没刮胡子、一身脏兮兮的、由于没有睡眠而眼睛红肿、但个个信心十足、从容镇定，他才意识到他们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已经采取断然行动。他的怀疑因而冰释。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抱歉说，当然，起义也可以按他们的方式进行——主要的事就是必须成功。

他的表现就像一位总司令从远处注视着决定性的战斗，并且了解到指挥战斗的司令在他不在的情况下跟他的主张不同；他有夸大分歧的严重性的倾向，而且担心没有他插手事情会办糟，于是在进行战斗时就冲到战场；他丝毫没有冒犯不得的虚荣，因而他使自己顺从已经采取的行动方针，承认晚辈的成就。托洛茨基虽然一直负责指挥起义而且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见解作战，但列宁的影响是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托洛茨基对广大工人、士兵群众思想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个人，而事变的结局也正取决于广大工人、士兵群众的态度。然而，积极的起义者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和党员队伍；列宁作为党的缔造者，无与伦比的领袖，尽管他在隐蔽所，也能从远处对他们的思想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没有他持续顽强的

①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

推动,没有他的警告,他们不可能像已经做到的那样听从托洛茨基的命令和指挥。他在他们执行托洛茨基的起义计划以前已用起义思想鼓舞他们了。但只有当他实际看到起义在进展中时,他才终于毫无保留地承认托洛茨基在这场不朽的斗争中是他的不朽伙伴。

10月25日夜,两人躺在斯莫尔尼宫大厅旁的一间黑暗的空房间的地板上休息,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在斯莫尔尼宫的这个大厅里召开。昨天夜里托洛茨基因疲劳曾一度昏厥,此时他想稍睡一会儿。但还是睡不了,隔壁屋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吵醒他,助手和通信员不断地敲门。一个消息报告说攻打冬宫受阻;托洛茨基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始行动,让他们用空弹轰击冬宫——这样的轰击就足以促使政府投降。他回来躺在列宁身边的地板上。尔后这里又是短暂的瞌睡,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和一阵阵急促的低声耳语。他们马上就要到灯火通明的大厅去面对苏维埃代表大会了。当然,他们要宣布:大会是政权的唯一来源,土地属于农民;他们要向俄国及全世界提议立即实现和平;明天他们会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政府。他或他的任何同志,即职业革命家们要接受部长的职位——这跟列宁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片段的历史回忆通常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忆,飘过托洛茨基困倦的头脑:也许他们该称自己为委员,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行吗?[①]

苏维埃代表大会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炮轰击冬宫的隆隆声开幕,布尔什维克单独掌握着近2/3的多数;他们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一起约占3/4的票数。14名布尔什维克,7名左派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及1名高尔基集团的代表在新"主

---

① 托洛茨基在翌日的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这些称号。《我的生平》第2卷第48-49、59-60页。

席"台上就座。失败的党派立刻提高嗓门抗议起义，抗议攻打冬宫。欣楚克(Хинчук)(未来斯大林政府驻柏林的大使)以孟什维克中最不可调和一派的名义宣布他们退出大会。这一派在一片"逃兵！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吧！"的喊叫声中离开了会议大厅。中间派和左派孟什维克留下来，要求成立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当布尔什维克拒绝这一要求时，这几个集团也宣称抵制大会及其决议。当托洛茨基看着他们在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Абрамович)带领下离开时，脑子里忽然闪过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景，当时马尔托夫宣称抵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自己那时也在抵制分子之中。这两个情景看起来何等相似：领导人都是同一批人，是"温和派"和"强硬派"；马尔托夫刚才的宣言是1903年大多数反指责的回声：就连"阴谋"，"篡夺"、"围攻"这些措词也重新出现。但场面的规模与斗争的激烈程度又是多么不同啊。而托洛茨基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又是多么不同，经过这些年的偏离和迷误之后，他回到了列宁身边。

当托洛茨基站起来答复马尔托夫时，尽管后者仍然在讲台上，就站在他对面，但他发现自己对失败者并不心软，没有怜悯甚至没有仁慈——只有严厉、愤怒与轻蔑。他说："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既成事实是起义而不是阴谋。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干劲。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搞阴谋……。"在政治上确实如此，尽管在军事上起义的指挥事实上像一个阴谋。但不能用其他方法指挥。他接下去说："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现在他们却对我们说：放弃胜利吧，妥协吧。跟谁？我要问：我们跟谁妥协？跟那些残留的可怜小集团或那些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吗？但是他们的精神境界我们已彻底看透了。整个俄国没有人再追随他们了。千百万工农难道像跟平等的伙伴一样跟他们

……缔结协议吗?……你们是些可怜虫,是孤家寡人。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应去的地方: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①] 当马尔托夫及其追随者走出会议大厅时,这种"败者该遭殃!"的话刺进了他们耳朵,当他们穿过密集的士兵与工人的队伍时,士兵和工人们都愤愤然,他们想起了临时政府的一切罪行,想起了人民的饥寒,想起了毫无人性的血腥进攻,想起了七月事件,想起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想起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胜利者爆发出被压抑的情感。

复仇女神昂首阔步地走向斯莫尔尼宫会议大厅。这位女神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 ※ ※ ※ ※

以前从来没有哪一批夺取政权的人像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这样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他们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第一批匆匆写就的法令,答应给人民和平、土地及面包。从诺言到实现诺言的距离难以计算。和平要公正、民主。和平将是不兼并领土、不赔款、胜利者不凌辱和伤害失败者的和平。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说,从专制主义政府甚至资产阶级议会政府那里都不能指望得到这样的和平——只有通过交战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然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还占领着从俄罗斯帝国夺去的土地;只要他们还没有抛弃他们的皇帝和他们的统治者,只要他们还没有放弃他们的贪婪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就有责任继续进行战争,即为争取实现公正的和平进行革命战争。但是他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202-204页;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79页。

他们只知道他们已着手开辟一条复杂、矛盾重重而且危险的道路:他们进行过一次土地革命,但同时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用另一场革命来消除土地革命。

"面包"对产业工人和广大的城市居民来说意味着工业的增长和发达。对1917年的俄国工人来说还意味着私有制和私人控制工业的消灭。在革命领袖们从年轻时起就已接受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中,生产、分配的统一规划在国有制、最终是国际所有制中占决定性位置。布尔什维克所看到的俄国工业即便没有经过内战的进一步破坏,其规模也太小、太可怜,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它只能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提供一个起点。尽管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不可能使俄国工业立即转变为公有制或国营制。没有现成可用的资源、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必需的技术。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摸索能找出从容解决问题的办法。起初,他们如同急于剥夺地主一样去勉强剥夺工厂主和商人。

但在1917年期间,事态的发展是顺利奏效的,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被剥夺的工厂主超过一半。正如兵营里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在扯去现役军官的肩章以前甚至就剥夺了那些军官的所有职权一样;在工矿企业中,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甚至在厂主和经理没有被剥夺资产或免职时就已夺走了他们的大半权利和特权。从2月到10月间,全俄政府体制中政权的两重性也贯穿在俄国的工业中,甚至在10月以后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物,部分是出于天性,部分是因为普遍的混乱,它必将会破坏全国工业的凝聚力,没有工业的凝聚力就不能向社会主义发展。每个工厂委员会都有成为闭关自守的团体和独断专行的倾向。不但资本家的资产,而且国家本身的工业资源也有被剥夺的危险。

他们只知道他们已着手开辟一条复杂、矛盾重重而且危险的道路:他们进行过一次土地革命,但同时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用另一场革命来消除土地革命。

"面包"对产业工人和广大的城市居民来说意味着工业的增长和发达。对1917年的俄国工人来说还意味着私有制和私人控制工业的消灭。在革命领袖们从年轻时起就已接受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中,生产、分配的统一规划在国有制、最终是国际所有制中占决定性位置。布尔什维克所看到的俄国工业即便没有经过内战的进一步破坏,其规模也太小、太可怜,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它只能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提供一个起点。尽管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不可能使俄国工业立即转变为公有制或国营制。没有现成可用的资源、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必需的技术。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摸索能找出从容解决问题的办法。起初,他们如同急于剥夺地主一样去勉强剥夺工厂主和商人。

但在1917年期间,事态的发展是顺利奏效的,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被剥夺的工厂主超过一半。正如兵营里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在扯去现役军官的肩章以前甚至就剥夺了那些军官的所有职权一样;在工矿企业中,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甚至在厂主和经理没有被剥夺资产或免职时就已夺走了他们的大半权利和特权。从2月到10月间,全俄政府体制中政权的两重性也贯穿在俄国的工业中,甚至在10月以后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物,部分是出于天性,部分是因为普遍的混乱,它必将会破坏全国工业的凝聚力,没有工业的凝聚力就不能向社会主义发展。每个工厂委员会都有成为闭关自守的团体和独断专行的倾向。不但资本家的资产,而且国家本身的工业资源也有被剥夺的危险。

这样的事态迫使布尔什维克行动。代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府不能重新树立老工业家的权威，尽管出于经济理由应该这么做。这样，使它不得不用在其他方面结束两重政权的同样方法——即摧毁旧政权来结束工业中的两重政权。只有结束两重政权以后才能争取克服国民经济方面的离心倾向。已被剥夺了一半资产的资产阶级知道不可能指望得到革命的好处，不得不用自己唯一能直接掌握的手段进行自卫：即在经济方面进行抵制和怠工。这又迫使布尔什维克把剥夺政策坚决推行到底。当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终于达到高潮而成为内战时，所有这些倾向都集中在1918年6月颁布的法令上，该法令旨在使全部工业突然实行过早的国有化。据本书主要人物的预见，革命是不断的。托洛茨基比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更认真地考虑过这一前景。但它的实现意味着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建立在极其虚弱的经济基础上。结果是，在随后许多年中经济结构时而在这一部分、时而在那一部分上必然发生俄国人民难以理解的崩溃或者陷于窘迫恐慌。

但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能够实现起码的三大诺言——和平、土地和面包——他们的胜利应归功于这三个许诺。他们满心相信，流血、受难的欧洲人民会很快学习俄国人的榜样，并帮助俄国革命解决种种不堪的难题；尔后俄国将会进入国际社会主义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西欧的财富和文明会战胜俄国的贫穷和落后，正如文明、进步的德国、法国，也许还有英国的千百万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及俄国农民，肯定会胜过千百万愚昧的俄国农民一样；俄国给西方打开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西方就会沿着这条道路牵引俄国，帮助她到达真正的文明福地。在布尔什维克讲的每句话里都洋溢着这一热情的、几乎是救世主的信念。这一伟大远见的令人目眩的光辉在他们眼中甚至把他们接收过来的遗产中最黑暗的方面都照亮了。

在他们打算建立的政体的思想中,类似的希望也大放异彩。他们想建立的将是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没有官僚的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务不再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几个小集团的职业机密和特权,而要成为普通公民的日常事务。在七月事件以后,列宁被当做德奸遭搜捕而且随时都可能被暗杀时,他写了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作为他的政治遗言。他在该书中复活了大半已被人忘记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这是有关在无阶级社会中的政府的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不再是政府,因为它将管理"物"而不是统治人,因此再不会使用强迫的工具(如监狱、法庭等等)。无疑,这是未来的理想国家,而不是 1917 年的俄国。但在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和这一理想直接有关。托洛茨基的国家概念不如列宁的那样具体,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他熟悉了列宁的观点后接受列宁的观点。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更直接、更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并无不同。

在苏维埃中,有产阶级没有代表;因为他们被褫夺了公民权,其方式与任何一次革命中旧统治阶级被褫夺公民权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也应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苏维埃要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由政府负责实施。选民不仅在投票阶段而且随时都有权撤换代表;而苏维埃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过投不信任票罢免政府。苏维埃内部有反对派的存在以及允许党派之间不断争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认为只有执政党才有造舆论的权利,这在当时谁都没有想过。当然,苏维埃共和国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指工人阶级占社会政治优势而言;但要确立这一优势的方法并非是预先决定的。布尔什维克,其他各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一样,都惯于把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指的是它体现资产阶级占社会优势,而不是说它真是用专政方式进行统治。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广义地说自己的政府体制是专政,完

全真诚地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会给全国大多数人民带来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权，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言论与结社的自由。

苏维埃的平民民主制起初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专制独断或集权主义的政体，因为领袖们都深信广大俄国人民跟自己有共同的愿望。那时他们还无需考虑：如果这种希望的假定被证明是错的，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如果他们跟全国大多数人发生冲突，那么他们、他们的党以及他们的革命就会注定灭亡，而留给他们的只有光荣的牺牲。但在1917年对他们来说，这种危险性看来跟宇宙灾变的威胁一样不现实。

俄国人民怎样看待布尔什维克及其目的呢？直接参加十月起义的只是少数人——托洛茨基说："很难超过25000人，最多也就30000人。"[①]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只是极少数人的成果，它不像二月起义，在二月起义期间广大群众在没有人指导之下就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地扫清了君主政体。但在十月起义前的最后两个星期，只有在彼得格勒"有1/10的工人及士兵采取直接行动，其形式是防御，而实质是进攻"。[②] 由于许多人采取了主动或被动的友好态度，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其他许多人则采取各种各样可能的中立态度，也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代表了2000万选民，也许更少些。其中大多数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就是在革命后举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不算布尔什维克的伙伴左派社会革命党，单投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就有1000万张。这1000万票包括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化了的农民分子和军队中的很大部分——总而言之是国内的最活跃分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290页。

② 同上。

子。革命依靠他们的不断积极支持才得以幸存下来。但立宪会议所代表的全体选民比苏维埃全体选民多一倍;在投票选举立宪会议代表中,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只是少数中的多数。

俄国幅员辽阔的、蒙昧的农村在叛乱和复仇中沸腾,那里的人们不理解城市党派之间的复杂争论,所以,试图要把那部分俄国人的态度具体化为明确的公式是徒劳的:因为它混乱、变化不定、自相矛盾。历史学家描述的下列情况可更鲜明地刻画出它的特点:在一个农村地区,一大批农民用宗教誓词结束会议,他们发誓不再等待什么土地改革;他们要立刻夺取土地,赶走地主;他们把任何试图劝阻的人都看做是他们的死敌。农民进一步发誓说,如果政府不立即缔结和约,不把他们的儿子从军队里放回来,"那个罪恶的德奸"列宁不受到惩处,他们决不罢休。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这些农民无疑要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他们之所以这样投票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革命党扎根在乡村,是坚决实行其纲领的党;但实际上决心实现这个纲领的只有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为什么在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垮台以后成为这场广泛运动的硕果仅存的这两个政党且各有理由能自称得到农民拥护的原因。社会革命党人自信地说:"难道农民不憎恨德奸列宁?"布尔什维克怀着胜利的喜悦反驳说:"难道他们没有宣布像你们这些拖延剥夺地主、延长战争的人是他们的死敌吗?"

不少农民憎恨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公然宣称是私有财产的敌人。一旦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在乡间出现并宣布结束战争、批准或规定均分土地时,这种感情就大都消除了,农民在内战中进一步发现:总的说来,只有红军跟他们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地抵抗地主回来。布尔什维克作为唯一坚决反对复辟、对捍卫土地革命的革命党人,事实上得到国内压倒多数的人的拥护。但是在乡间,这种拥护往往是勉强的,特别是当回来的地主再也不能有

所作为以及当布尔什维克的小分队继续在农村搜查粮食时，农民对他们的拥护就变成了反对。即使当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处于顶峰时，也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布尔什维克每当处于困境时都要向这个少数呼吁求援。他们向这个少数宣传超越经验的理想，他们从这个队伍中提拔新的行政人员、指挥员和领导人。

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是历史的奇迹之一。他们虽然人数少、年轻幼稚、没有经验、未受教育，但富有政治热情、慷慨大方、具有理想主义以及罕见的英雄品质。这个工人阶级具有对未来伟大美景抱有幻想的天赋，对死亡则抱有如同斯多葛派甘愿战死疆场那样的视死如归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尽管是半文盲的思想，却信奉哲学家们的共和国理想，这种共和国理想不是博学者对老百姓进行寡头统治的柏拉图式共和国的翻版，而是财富和智慧都足以使每个公民成为哲学家而又是工人的共和国的理想。俄国工人阶级在他们悲惨的深渊里着手建立这样的共和国。

但与理想主义者和英雄并存的还有奴隶式的工人，他们是懒散、怨天尤人、对昔日的耻辱逆来顺受的可怜奴隶。革命领袖们只向理想主义者和英雄讲话，但奴隶粗鲁地提醒他们眼前还有奴隶存在。在内战期间，尤其在内战以后，托洛茨基在他的军事演说中一再抱怨说，俄国共产党员和红军士兵宁可为革命牺牲生命，而不愿擦枪或擦亮皮靴。这种古怪的现象反映了俄国人民缺乏那数不清的自我约束以及文明生活的细小习惯，而社会主义却把希望建立在那样的生活习惯的基础上。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着手建立他们的无产阶级民主新国家的人力资源，而在新国家里“每个厨师”都应该能够处理政府的公务。因此，这也许是革命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所有严重矛盾中最严重的矛盾。

历史刚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露出仁慈的微笑，几乎紧接着

就给他们提出了第一次警告;历史这样做是由于它对其经常展示的突降法特别爱好。十月起义的荒诞后果是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的,即那场惊人的、真正的酗酒狂欢,已得到解放的受苦人用这种狂欢来庆祝胜利。狂欢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一度曾有使革命停顿和瘫痪的危险,正当新政府面临着全部文职官员的抵制和内战初起时,当政府还没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时,当政府的命运尚完全取决于支持者的警惕、纪律与干劲时,群众的酗酒却达到高潮。狂欢对构成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背景的事件也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和平谈判过程中不少旧俄军队几乎化为乌有。当时描写这些奇特的纵情狂欢的原始资料很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回忆录中有最引人注目的叙述。他当时是军队中两个主要政委之一并兼任彼得格勒卫戍区司令:

> 卫戍部队开始完全涣散,这给我个人造成的麻烦比拥护立宪会议的人给我造成的麻烦严重得多。……空前荒唐的狂欢遍及彼得格勒;这是否是由于有人暗中挑唆?至今一直没有近乎合理的解释。成群流氓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出现,大部分士兵闯入酒窖,有时抢劫酒店。只剩少数几个守纪律的士兵及赤卫队员值勤,他们都已疲惫不堪。劝阻根本没有用。
>
> 冬宫(以前沙皇的宫殿)的酒窖里出现非常棘手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直都很遵守纪律,现在却在宫中值勤时喝得烂醉。帕夫洛夫斯基团是我们的革命堡垒,连它也经不起狂欢的引诱。从不同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混合警卫队被派到那里,他们也喝醉了。于是委派团队委员会的委员们(即驻军的革命领导人)去值勤警卫。这些委员们也屈服了。武装士兵受命驱散人群——

他们来回巡逻了几次后就开始摇摇晃晃、步履踉跄。

薄暮时，狂欢作乐进一步蔓延。"让我们喝光这些沙皇留下的东西吧！"这个放荡的口号抓住了人群。我们竭力堵塞入口，阻止他们。人们用力拔掉窗栅，从窗口挤进去抢陈酒。我们试图用水冲酒窖，而派来冲水的消防队员们也喝醉了。

只有来自赫尔辛福斯号舰的水兵设法使冬宫的酒窖免遭祸害。这也是一场重大的斗争。水兵们的立场坚定，因为他们严守同志式的誓言："破坏誓言者死。"尽管他们自己平时也是好饮之徒，但他们举着飘扬的军旗执行任务……。

斗争仍未终止。酒疯感染着全市。最后，人民委员会任命一个特派人民委员，授予他紧急处置权，而且给他一支强有力的警卫队。但事实证明这个人民委员也不可靠。……在瓦西列夫斯基岛上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倾向者率领的芬兰团宣布岛上戒严，并声称他们要炸毁酒窖，凡看到有抢夺酒窖者格杀勿论。经过紧张的努力之后才克服了这场酗酒狂潮……。[1]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反复谈到这个问题，第一次是10月27日，即起义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12月2日。他说："伏特加和词汇一样，都是政治因素；革命的词汇使人们清醒，鼓舞他们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而伏特加……又使人们沉睡过去……。"[2] 托洛

①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札记》第1卷第19－20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39－140页。

茨基比任何人都更倚重工人中的理想主义者和英雄,而且在他们眼前展示出社会主义的宏伟远景;而此时这一远景被酒精气弄得模糊不清。最后,人民委员会命令把酒窖里的酒都倾倒到涅瓦河里去。

伟大的彼得格勒驻军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却在纵酒狂欢的过程中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紧接着彼得格勒之后轮到外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伯尔津同志(一名众所周知的中央委员)报告他的重大困难,他还注意到铁路上大批托运的果酒和烈性酒。……成队的士兵闯人货运车厢喝得烂醉。特遣部队涣散了。抢酒在继续进行……。"①

苏维埃共和国在这种荒诞的预兆下开始了它的第一年,看来这种荒唐的预兆是对共和国崇高抱负的嘲弄。

①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札记》第1卷第31页。一位亲布尔什维克的外国目击者对纵酒狂欢及其悲喜剧性的后果作了生动描写,参见贝西·比蒂:《俄国的红色心脏》第329-334页。

第十章

人民委员

就其组成人员说,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那些拒绝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宪法规定的唯一权力来源并宣布抵制大会的党派完全不可能参加政府。只有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组织,即脱离社会革命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跟布尔什维克共同分担政府的职责。列宁给他们人民委员会的席位。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希望在布尔什维克与对手之间进行调解。而且,为了不失去进行调解的机会,他们宁可留在政府外面。

托洛茨基说过,最初讨论政府的构成时,列宁曾提议:既然诞生这个政府的起义是托洛茨基领导的,托洛茨基就应担任这个政

府的首脑。[1] 出于对列宁的政治资历的敬意,托洛茨基拒绝列宁的提议。[2] 任何原始资料都没有否定过这一说法,而且它可从这个政府的成员卢那察尔斯基对他的亲密朋友苏汉诺夫说的话里间接得到证实。卢那察尔斯基说,列宁不愿主持人民委员会,甚至不愿参加政府;他宁可集中精力管理党务。但是那些曾反对起义以及对起义踌躇不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在内,却认为列宁的意图是规避职责,因而坚持由他主持政府。列宁绝不是逃避自己行动后果的人,他同意主持人民委员会(Совнарком)。[3]

于是他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内务人民委员。[4] 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对反革命的斗争,需要意志坚决的人。托洛茨基也拒绝接受这一任命,部分理由是因最近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使他感到疲劳,另一部分理由是他担心他的犹太血统对这一职位也许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反革命会煽动反犹情绪并利用它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看来,列宁对这种考虑不以为然。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另一个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却和托洛茨基有共同的顾虑,因而列宁让步了。

这是一段有趣的、难以理解的插曲,在社会主义政党和苏维埃之中还从未察觉到有民族偏见;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支持。在所有激进的革命运动中,犹太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是很杰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属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犹太人甚至比在布尔什维克中更多。托洛茨基尽管

---

①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16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

③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266页。

④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62-63页。

有犹太血统,却是起义的领袖。然而到目前为止革命还只是城市里的事,而且俄国最先进的城市是革命的主要舞台。当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摸索着去适应新任务,充当新的角色,比如去担任俄国农村的统治者;而俄国农村仍然被希腊东正教对城市的怀疑和民族偏见蒙蔽着。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就会号召那部分俄罗斯的儿子奔赴十多条前线去捍卫革命;他的犹太血统不会妨碍他。而在那几个月中苏维埃政权有了些稳定感,所以可以向根深蒂固的偏见公开挑战。但在刚起义后的那一天,托洛茨基也许已感觉到胜利者如果引起的刺激太强烈那就未免轻率了。

但可能他还有另外不能明说的动机。革命的警察首领职务可能不适合他的口味与爱好。无疑,他不久会成为初期对反革命实行镇压的最有力的提倡者之一;而且时间一到,他不会回避红色恐怖。然而,在最富有戏剧性的内战气氛中为红色恐怖辩护甚至指挥红色恐怖是一回事;而在革命的日子里接受警察首脑的职务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职务也许在他看来过于平淡,对国际主义者不会有吸引力,因为如果接受这个职务,他就不得不把他的心思主要用在国内的紧急事务上。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他欣然同意担任革命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提议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斯维尔德洛夫。这是仅次于政府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命。托洛茨基本人却贬低这项任命。他说革命不需要外交,“我将对世界各国发表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在他的谦卑姿态里有一点儿做作。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这项任命的理由是,托洛茨基是代表革命“对付欧洲”的合适人选;而且这项任命对托洛茨基不但是相宜的,同样也是重要的。然而,他确实不想用传统的外交方法“对付欧洲”。[1]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

政府成立了,但很少有人相信它会持久。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人以及许多布尔什维克看来,起义及其后果不完全是真实的。其中大多数人预料将有一场血腥的镇压。政府成立后的那一天,首都谣言四起,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逃走了。[1] 克伦斯基在离首都西南30多公里的加契纳自信地宣称,他即将率领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将军的忠诚的哥萨克重返彼得格勒。重新担任起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外交人民委员为了阻止克伦斯基军队的前进必须集合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表明这在某些方面要比举行起义更加困难。卫戍部队现处于兵无斗志的精神状态。以前在克伦斯基威胁说要把造反团队派往前线时,卫戍部队曾经乐于帮助托洛茨基推翻克伦斯基;但现在,托洛茨基命令这些团队离开兵营去占领首都外围制高点的阵地时,同样是这些团队,却对执行他的命令非常不满,怨声载道。他们再不想打仗了,现在突然看到自己置身在炮火之下,他们的情绪消沉。工人赤卫队是唯一可用的战斗力量;像任何民兵一样,只要是在城墙以内作战,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勇敢作战——因为他们熟悉城内每条大街、过道和隐蔽的地方,然而他们并不适合在开阔地迎击敌人。[2]

这时如果克伦斯基能召集几支训练有素的可靠部队,也许可能重返彼得格勒,尽管难以预料他是否能够再维持他的权力。但克伦斯基的哥萨克也不愿意流血牺牲,正像托洛茨基派去打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他们已接到通知,他们的任务是去镇压由一小撮德奸策划的叛乱;而使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抵抗他们的是首都驻军和赤卫队。在这一瞬间,一个大国的命运,确实也是世界的命运竟取决于两支垂头丧气的小部队进行的遭遇战。哪一方若能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63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86-90页。

唤起军队中闪现一丝战斗精神而且其行动的决心大、速度快，那一方必定取胜。胜利就在于微小的优势，正如有时当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战斗顽强、势均力敌的两支军队在相持不下时也取决于微小的优势一样。

托洛茨基深信，在击溃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的战斗中，劝说比子弹更有效。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们在接近哥萨克以前还必须用武器动摇他们的自信心。托洛茨基在这一阶段不得不寻找有经验的熟练指挥员。在起义后的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向迄今为止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攻击的靶子的正规军军官求教，但是经说服到斯莫尔尼宫来的军官却谨慎地拒绝合作。只有少数几个亡命之徒和野心家准备在"非法"政府下工作。其中一个姓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ёв)的人被选中指挥普尔科沃高地的战斗；后来他在内战的最初阶段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看来，这个自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吹牛大王采取行动的动机与其说是由于同情布尔什维克，不如说是由于对克伦斯基的怨恨。托洛茨基在任命他时就有怀疑。但是，中校精神饱满，足智多谋，渴望在这项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任务中争取奖赏；因此他的首创精神和勇敢迷住了托洛茨基。这一小批人中的另一名军官瓦尔登上校(Вальден)指挥炮兵部队，这决定了普尔科沃战斗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获胜。[1]

雇用这些军官，在苏维埃里引起很大愤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照他们的理解，认为这是把革命的命运交付给声名狼藉的野心家掌握，这使他们感到震惊，据说穆拉维约夫在7月中镇压布尔什维克特别热心。然而，布尔什维克因受到整个军官团的抵制就不能过于细究那几个愿意工作的军官的可信程度了。党的军事部里也有精于起义技术的人，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68－69页。

胜任指挥正规战争。卫戍部队已经乱作一团,托洛茨基甚至查不出武器弹药和给养的库存情况。那时假如他能用手枪对着魔鬼的脑袋并能监视它的去向的话,他甚至愿意雇用魔鬼。人们从这些即兴的措施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军事政策主要部分的缩影。

10月28日,托洛茨基来到设在加契纳的赤卫队总部,一场争夺通向首都道路的战斗在那里打响了。克伦斯基的军队在加契纳首次受挫;托洛茨基希望把这个前总理作为苏维埃的囚犯押回首都,但克伦斯基从托洛茨基手中逃跑了。[①]

当战斗仍在彼得格勒城外进行时,城内军官学校的士官生发动叛乱。他们曾一度得手,在他们抓获的战俘中有军事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托洛茨基向苏维埃讲到为镇压这场叛乱所采取的措施时,宣布:

> 我们抓获的俘虏是我们手中的人质。如果我们的敌人偶尔从我们这里抓去俘虏,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每个工人、农民要交换五个士官生。……我们今天已向他们表明我们已经不再犹豫。当工农的根本利益处于危险时,我们绝不开玩笑。我们懂得地主和资本家怎样打仗,……他们怎样对待起义的战士、工人及农民,他们欠下了

---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305页。笼罩着苏维埃的气氛已由约翰·里德描写的一个场面充分表达出来(《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78–179页):托洛茨基在作战斗进程的报告,他说:"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及共和国号驱逐舰停泊在涅瓦河上,舰上的大炮瞄准通向首都的道路……。"

"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跟赤卫队在一起?"一个人粗鲁地喊道。

"我现在就去!"托洛茨基回答后即离开讲台,群众甚至对革命领袖也一样粗暴地发泄愤怒,而且往往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多少血债，他们断送了多少人的生命……。[1]

这些话有可能被认为是任意判处死刑的信号，因此引起愤怒的抗议。[2]托洛茨基在后来的会议上利用代表席上向他提出某一个问题的机会解释他这几句话的意思。他说："出于人道，而且还因为对我们来说，生比死更有价值，战俘的生命不可侵犯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以前说到过"交换"，但没有说枪毙战俘。[3] 然而事变已预示内战的残忍。就在这次会议上，当托洛茨基谈到赤卫队后勤补给困难时，宣称苏维埃将不再尊重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工人和士兵组织可以从军事革命委员会得到征用必需品的授权。"他还报告说，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法令，授权禁止在内战中支持对方的报纸。

10月31日，克伦斯基的哥萨克在普尔科沃投降。他们的指挥官克拉斯诺夫将军被俘，但克伦斯基又一次逃跑了。托洛茨基从战地用动人的电文向苏维埃报告胜利。他凭誓言释放了克拉斯诺夫，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位将军在不久后拿起武器反对苏维埃。同时，布尔什维克经过持久而残酷的战斗后取得了对莫斯科的控制。其他大多数城市同样也报告了苏维埃占支配地位的消息。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政府不再孤立，再过些时候内战才全面爆发。

列宁政府最初受到的武装威胁几乎是不能抵挡的，当时政府由于本身成员的顾虑和瞻前顾后而处于毁灭的危险中。温和派布尔什维克渴望要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和解，邀请他们参加政府。铁路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威胁说，如果不成立所有社会主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71页。

② 例如洛佐夫斯基指责托洛茨基"模仿兴登堡的方法。"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71页。

义党派的联合政府,就中断铁路交通。10月29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决定进行谈判。[①]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他们加入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新政府不对苏维埃负责而要对广大的革命民主界负责;新政府要解除布什维克部队的武装;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加入联合政府。[②] 这些条件等于要求布尔什维克宣布十月革命无效,让他们在敌人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自行排除起义的领袖及鼓动家。在革命中被打败的党派竟向寻求和解的胜利者提出这样无礼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加米涅夫、梁赞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特别是前两人,站在党的右翼,一心希望能给党带回列宁和托洛茨基将难以拒绝的、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如此急于迁就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甚至普尔科沃的战斗还未定局时他们就签署了一份关于停火的联合呼吁,这份呼吁无疑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党和政府的。然而就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接受孟什维克的条件,他们不能给党带回党应自杀的建议。

托洛茨基从普尔科沃战斗前线直接奔到会议场地,这次会议是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军事方面的领导人为了决定是否谈判而召开的。他第一个攻击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他说:"如果我们在政府中得不到多数,我们就不必举行起义。……我们应得到全部席位的3/4。"他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列宁必须继续主持政府。[③] 列宁甚至更进一步要求,谈判必须中断。站在另一极端的是梁赞诺夫(还有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倾向于同意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他们说党应坚持的是原则而不应是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4-147页。

② 同上,第156页。

③ 同上,第149页。

人事。会议决定继续进行谈判,但只能以保证党在建议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占优势为条件。

这场争论是起义前争论的延续。从外表判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赞同苏维埃应成为政府的宪法基础和基本构架。看来大家也都同意,跟准备赞同这一原则的政党或团体组成联合政府是可取的。11月2日,中央委员会庄严地重申:布尔什维克仍然愿意跟那些宣布过抵制苏维埃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只要那些党派能够回头,接受苏维埃立宪政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此不能同意,否则他们就等于否认了2月以来他们所干的一切。如果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规定的条件明确要求布尔什维克必须进行政治自杀,那么,列宁的党也要如法炮制,请它的所谓合作者去干道义上自我毁灭的事。列宁料定他们不会同意,因此他认为再谈判下去毫无用处,说它充其量只能作为蒙蔽对手的一种策略,即在反对克伦斯基的战斗持续进行时用以打乱拥护克伦斯基的人的阵脚。

列宁和托洛茨基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妨碍他们的党单独由自己的党员组成政府。他们认为没有力量能阻止苏维埃的多数单独肩负职责。在民主制中少数派没有要求参加政府的权利;少数派的切身问题是,它作为反对派,其活动不应受到阻碍,但该活动应在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接受的宪法框架的范围之内。十月革命后并没有这样共同接受的宪法框架。一个党宣布新宪法原则,而所有其他的党派却认为那个新宪法原则本来就是违反宪法的。孟什维克及其同伙断然否认苏维埃的统治权,他们甚至不能成为苏维埃内忠诚的反对派(即使它们中某些团体偶尔试图这样做),更不必说他们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合作者了。名义上反对党都是社会主义党派,然而此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只是对共同过去的淡淡的回忆而已。

由仍然寻求为鸿沟搭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成了一个人数

众多、有影响的团体,其中一部分人正是被这些回忆所推动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不少主张和解的人感到,他们的党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如要走出来,应该抓住对方伸来的援助之手。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惊恐不安地争辩说,彼得格勒已没有粮食供应了,如果铁路运输停顿,布尔什维克就不能统治国家,在持久的内战中绝不可能幸存。列宁和托洛茨基得到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坚决支持。他们并不否认有种种危险,但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有决心行动,就能坚守阵地。请求联合就是示弱;这个所谓合作者伸出手来不是为了援助,而是要扼死人。

11月2日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布尔什维克中主张和解的人跟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一起投票反对自己的党。这种公然分裂是最令人苦恼的事;尤其是,这些“和解者”以加米涅夫为首,尽管他最近跟党产生过争执,但还是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这是一个相当于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不久以后,这个布尔什维克主席公然要求解散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且要求代之以联合政府。加米涅夫背后还有政府的最重要成员: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工商人民委员诺根;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供应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Теодорович),另外还有未在政府任职的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梁赞诺夫和尤列涅夫等人,这里提到的只是最有影响的人物。

政府及党内的危机是再严重不过了。一个参加政府工作的党员应按党的指示进行活动并受党纪约束,这一规定不但为布尔什维克接受,而且也为大多数俄国的,实际上也为欧洲的党所普遍接受,尽管这一规定实际上往往是违反的多而遵守的少。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要加强纪律。他们说服中央委员会重申这一观点:“向苏维埃里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屈服,就等于(我们)不但完全放弃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而且还完全放弃民主的立场。这样的屈服证

明苏维埃的多数派害怕运用多数,就等于向无政府状态屈服,等于鼓励任何少数派不断用新的最后通牒跟我们对抗。”[①] 11月3日,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向“和解者”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并威胁要召开党的非常大会,非常大会抑或认可“和解者”的政策,抑或要求开除他们。[②] “和解者”则以向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集体辞职作答复。他们用措辞强硬的抗议为自己的手段辩护,反对党坚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诺根代表他们宣称:这样的政府“只能靠政治恐怖才能维持”,它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权”;会“在政治生活中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排除出领导位置”。[③]

正如1904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争论,也正如不久前关于起义的争论一样,这次争论中的是非也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难以辨析。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列宁和托洛茨基用来为自己政策辩护的种种考虑是无可反驳的。为广泛的联合政府进行谈判则是枉费心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试图用迂回的办法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夺取政权,而不是共同掌权。加米涅夫尽管渴望跟孟什维克达成协定,但也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事实上在同一次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会议上他要求过列宁的政府辞职,但他也宣称过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④] 另一方则坚持“砍头”,因为不先打破布尔什维克的自信心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出政府。要求布尔什维克党让党外人指定谁代表政府并坚持它应否定自己的两个领袖,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办法。

同在10月间一样,列宁此时也并不否认加米涅夫及其朋友有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1页。

② 同上,第162-164页。

③ 同上,第169-170页。

④ 同上,第166页。

持不同意见的权利。但他否定他们有权在党外来反对党已宣布的政策。当他们示威性地辞职时,他又一次称他们为"逃兵"。加米涅夫及其朋友终于像10月间一样屈服了。在几个对立的政党都无意和解这点已然清楚之时,加米涅夫及其朋友的角色也扮演完了。季诺维也夫第一个改变立场,宣称孟什维克使和解成为不可能。[①] 他呼吁他的朋友们说:"我们还是跟党留在一起;我们宁可同千百万工人一起犯错误,和他们同牺牲,也不能在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袖手旁观。"他的话预示着他将来更悲惨的屈服。这些"和解者"几天之内都垮了。加米涅夫被罢免了苏维埃执委会的最高职务;托洛茨基在一次执委会上提议斯维尔德洛夫继加米涅夫之后任执委会主席。谈判的唯一积极结果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满反布尔什维克党派的立场而加入了列宁政府。

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反对者并不像现在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完全错了。他们所预言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只能靠政治恐怖才能维持"并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府"这句话最终应验了。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以真挚的愤怒否定这一预言,他们反复保证,苏维埃只要有简单的多数票就能推翻政府。[②] 但是历史将证明这个警告性的预言是正确的,尽管作此预言时显然并无根据。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无疑都本着对苏维埃全体选民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地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表明:他们单独一个党全心全意信奉苏维埃宪政,这只能使他们把自己党的政策和宪政视为一体,然后以党的意志取代宪政的原则,最后将彻底抛弃那些原则。说得更明白些,布尔什维克是革命党这一情况促使他们首先把革命跟他们自己等同起来,尔后使革命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7页。

② 同上,第171-175页。

成为他们党独占的事。11 年后，布哈林在研究一系列导致对苏维埃民主的歪曲、导致斯大林的支配地位事件的后果时，把这些“祸害”追溯到“一个错误”：即把党与政府等同起来。[①] 在革命的第一周内，形势的力量就已开始把党推上这条道路；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对这条道路本能地害怕。没有人想象得出这条路的行程的长短、方向及其悲剧性。

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是最直言不讳而且坚持主张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或以布尔什维克为主的政府的人。他引为自豪的是能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送入“历史垃圾堆”；他不想回忆他们曾是伙伴和盟友。然而他和他的任何同事都不想镇压这两个党派。在孟什维克退出苏维埃大会后的那一天，马尔托夫回来为被捕的社会党人部长一事找布尔什维克说情——正如 7 月间为被捕的布尔什维克找这些部长说情一样。当时，布尔什维克心软了，托洛茨基释放部长们出狱，先把他们软禁，尔后把他们统统放了。比起这些部长们不久前对待他本人和列宁的方式来，无论如何是更宽宏大量的。[②] 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回转敞开大门；在中央执委会，他们按对方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保留了相应的空席位。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不希望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分掌政府，但希望看到这两个党在“无产阶级议会”及其一些机构中有人数公平的代表出席。

托洛茨基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和解者”时没有表示出任何犹豫不决的迹象。但我们却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内心有过忧虑。萨多尔说，起义后的第三天，托洛茨基曾向他透露自己为孟什维克担

① 这话引自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在 1928 年的谈话，托洛茨基档案中有这次谈话的最完整的摘要。

②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 7 卷第 243 页。

心:由于他们的自命不凡以及故意阻挠,可能会迫使布尔什维克粗暴地对待他们,这样就会扩大两党之间的鸿沟。托洛茨基说,这比起有关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进军和成立白卫军的消息更使他忧虑。[①] 稍后,他向萨多尔表达他的希望:布尔什维克在实现纲领中最基本的要点后,是会邀请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

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于11月3日突然终止。当时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声称:只要继续发生逮捕以及不允许刚被查禁的报纸复刊,他们就不会参加谈判。[②] 布尔什维克已逮捕了几个右派政治家,查封了几家公开号召武装反抗的报纸。因此,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为这些措施辩护说:"在内战期间要求停止镇压,等于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我们的敌人一直没有向我们提议和平。……在内战情况下查封几家敌对的报纸,这是合法的。"[③] 他断然向苏维埃保证:政府并不想建立自己的新闻垄断。但有责任必须摧毁有产阶级的新闻垄断,因为每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同意这样做。印刷厂和造纸厂应该国有化;然后政府按选举中人数的比例给所有党派及团体分配纸张和印刷设备,这样就会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真正的出版自由。人民传播他们观点的能量的大小将取决于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真正影响如何,而不取决于财政来源的多寡。[④]

---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68-69页。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4页。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04-105页。

④ 过了些时候,托洛茨基就同一问题对掷弹兵团讲话说:"拥护资产阶级的人如何解释出版自由呢?他们的解释与他们对贸易自由的解释一样。凡是有资本的人就有权,因为他们有按个人爱好办工厂、开商店、妓院或者办报的财力……但千百万农民、工人及士兵难道能享有出版自由吗?他们并没有自由的必需条件,没有财力,出版报纸的真实财力。"这一次他还为按比例分配印报设备及其他设备给各政党的原则作了辩护。同上,第125-127页。

革命后一个月，科尔尼洛夫、卡列金(Каледин)、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和邓尼金(Деникин)指挥的第一批白卫军已在顿河开始行动；奥伦堡的哥萨克在其首领杜托夫(Дутов)的率领下起而叛乱。白卫军的将军们甚至不打为恢复克伦斯基政府而战的旗号；他们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复辟沙皇统治，或是建立他们自己的独裁。与此同时，随着遥远省份的内战已实际开始，立宪民主党人和一些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首都发动了小规模叛乱。11月28日，托洛茨基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他说，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白卫军的政治总部；它指挥着为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招募军官的活动，[①] 因此应该把立宪民主党人排斥出政府将要召开的立宪会议。托洛茨基又补充说，"我们已有了一个并不过分的开端，我们逮捕了立宪民主党头头，并命令监视他们在外省的追随者。法国大革命时，被雅各宾党人送上断头台的人都比这些阻挡人民意志的人更正直。我们没有把人处死。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但现在是群情激愤的时刻，而立宪民主党人却在自找麻烦。"[②]

"我们有了一个并不过分的开端"，这话听起来有点儿不祥。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就不能放弃革命的恐怖；而恐怖有它自己的势头。每一个革命党最初都把他们的任务估计得过于简单：它必须镇压的只是"一小撮"暴君或剥削者。确实，暴君及剥削者通常只构成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旧统治阶级并非脱离社会的其余部分而孤立存在。旧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在其周围围织起了一张统治机关的网，笼络了各阶级的团体和个人；

① 这段话逐字都是真实的，可以根据像邓尼金那样可靠的消息来源来印证。邓尼金曾详细地叙述白卫军同立宪民主党总部的关系。参见《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2卷第35、186－194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38页。

它产生了许多连革命都不能完全摧毁的依附和忠诚。解剖社会绝不像外科手术给人体截肢那么简单。每一个社会阶级与它的最接近的阶级都是通过许多几乎觉察不出层次的阶层而联系起来的。贵族渐渐变成上层中产阶级;以后又渐渐变成下层资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分裂出工人阶级;而无产阶级,特别是在俄国,必然跟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党之间也有类似的相互关系。革命如果要给最凶恶、最危险的党以致命的打击,就不能不迫使那个党,而且还迫使跟它关系密切的党以反击来作回答。因此,革命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跟敌人关系密切的党。当革命打击第二号敌人时,与这第二号敌人关系密切的党也会被激起而卷入斗争。这一过程像连锁反应一样地继续下去,直到这个革命党不得不奋起镇压所有直到不久前还挤满政治舞台的党派。

率领白卫军的将军不过是些拥护君主主义之徒而已,他们被培养为沙皇专制主义的奴仆;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和渴望复仇的心理观察了革命的各个阶段——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的时期。立宪民主党人是君主立宪主义者。在沙皇统治下,捍卫专制主义者的主要集团和君主立宪主义者的主要集团曾经彼此敌对,互相轻蔑。但这两个党也有部分的一致性。自从君主政体垮台以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无足轻重——他们都希望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后,他们终于摒弃分歧而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但大部分君主立宪主义者都紧跟二月政权的支柱——准社会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内可以发现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到准革命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观点;而这些党的极左派又跟布尔什维克有部分的一致性。如果布尔什维克曾有可能孤立白卫军,即孤立他们之中的最猖狂、最危险的敌人,并以他们为唯一的进攻目标,也许革命和内战的发展道路就将大相径庭。君主立宪主义者与白卫军之间的天然同盟使这个目标

不可能实现。布尔什维克为了剥夺白卫军的政治代理机关而不得不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集团绝不想保卫科尔尼洛夫、邓尼金或高尔察克。但当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时，他们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右翼在政治上与立宪民主党人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与之共同策划政治阴谋。像马尔托夫这样的左派孟什维克是绝不会单单捍卫立宪民主党人的。但他深知，在立宪民主党人之后，革命的鞭子就会抽打到社会革命党和他自己的党的右翼；而这正是他急于要防止的事。

托洛茨基保证布尔什维克不想设置断头台，证明他已意识到恐怖行为可能与革命一起失去控制。急于防止恐怖的愿望在布尔什维克中是普遍的。他们在起义后的当天废除死刑；只有列宁一个人反对。[①] 但甚至列宁在同温和派布尔什维克争论时也说："在巴黎，他们（雅各宾党人）使用断头台，而我们只拿走那些不能从工会得到的粮食卡的人的粮食卡。"[②] 整个党部分出于本能，部分出于自觉，都力图避免重蹈血淋淋的滑坡，雅各宾党人就是从这个斜坡上坠人深渊的。党被形势所迫，一只脚踏在斜坡顶上，只得费力持久地抵制向下滑的引力。政府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非法，却没有宣布11月28日参与过小规模叛乱的社会革命党的右翼为非法。政府颁布推举立宪会议代表的命令时，还没有完全觉察到由苏维埃产生的政府与立宪会议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到11月底，布哈林仍在力促中央委员会把清算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推迟到立宪会议开幕时解决。他引用英、法历史的先例而提议，应从立宪会议中开除立宪民主党人，然后那个残余议会应宣告自己是革命的

---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116－117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10页。

议会。他希望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控制这个会议中的压倒多数,给革命以更加合法的形式。托洛茨基显然支持布哈林的行动计划。看来,唯独斯大林在这一阶段对事变的动向有比较清醒的看法,大概因为他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能控制国内的多数。他声称,布哈林的提议来得太迟了;镇压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不能拖延。他预料会议要分裂及两个敌对会议之间的斗争。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解散立宪会议。就连在最可信的讨论记录中也找不到任何镇压其他党派的建议。[1]

※ ※ ※ ※ ※

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两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而他在党的核心讨论会议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起来。起义前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从未恢复工作,取代它的是一个较小的机构:"中央局",即常设的执行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2] 当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成功时,人民委员会选出一个核心内阁,在内阁中代表布尔什维克的也是这几个人,只是没有斯维尔德洛夫——他不担任政府职位。人们一般都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党的主要的决策人,而且在理论方面是最高权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则是主要的组织者。

尽管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但他们却互相信任,彼此真诚尊重。在起义前,特别在起义后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而共同斗争,敌人对他们两人的仇恨致使要求把两人都排除出任何联合政府这件事所给二人带来的荣誉,还有他们在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80 - 191 页。

② 同上,第 189 页。

所有主要问题上的一致——这一切形成了最结实的纽带，把这两位人物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协调一致下面，还存在着气质和习惯方面的不一致。列宁态度谦逊，几乎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甚至在行使权力方面也如此。他不相信那种花哨的姿态、华美的言词。近20年来，围绕在他周围的是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纯粹用品质与才智的力量领导他们。他学会了精于判断同事和下属的优缺点，并为党的最高利益使用他们。他在重要的争论中态度生硬，甚至无情，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含蓄，有分寸，审慎，宽容同志们的敏感及弱点，而且对他们的意见及建议虚怀若谷。

托洛茨基火山般的热情与有力的语言打动着每个人的心灵，这是列宁深刻的说教和平铺直叙的文章绝不能做到的。此时，当他们为共同事业再次团结起来时，列宁以赞同甚至欣赏的神态倾听托洛茨基滔滔不绝的长篇激烈讲话，但多少也有点儿不安，正如俄国农民听城里人夸夸其谈时一样。他们的气质大不相同，其他特点也不一样，形成鲜明对照。多年来自由政治骑士式的活动在托洛茨基身上留下痕迹。他没有得心应手地与他人协力配合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却是使人成为真正领袖的力量。卢那察尔斯基即令在还是非常钦佩和尊重托洛茨基时也着重评述过托洛茨基的这一特点，他说：托洛茨基要把追随他的人组织成一个稳定的团体是永远不能成功的。[1] 托洛茨基态度傲慢，独断专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几年中他证明自己是如此伟大而杰出的行政官员，但是他在行政方面取得成就不是由于对人的管理，而是由于他的计划的清晰与严密，由于他的干劲、意志力以及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在有条不紊的工作能力方面他超过列宁，这在一个人们不珍视时间和不重视坚定不移的努力的国家里是罕见的。他现在与列

①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25–30页。

宁的紧密合作是建立在他们个人的某些互相适应以及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的。他以无可置疑的真诚承认列宁的领导能力。他的这种承认毫无吹捧之意,也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明显地懊悔他过去错误地低估了作为革命家和领袖的列宁。而列宁则竭力使托洛茨基在党内感到自己似乎过去始终在党内而且一直是党的一员一样。在他们6年合作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不少新的争论,列宁没有一次提过他们之间以前的争论,只是私下说托洛茨基过去有些方面是对的;并告诫党说,他希望不应抓住托洛茨基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这一点来反对他。

"中央局"里的另外两个人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品质。作为党的总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是斯大林的前任,但名义上,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还没有创立。斯维尔德洛夫像斯大林一样,全部政治生涯都是在地下活动中度过的;而且他同样具有组织才能,在用人方面同样具有鉴别力,而且同样具有经验型的头脑和坚强的性格。[1] 但他比斯大林更能胜任组织家的任务,他没有充当理论权威的野心。如果人们根据他为数不多的著作和演讲来评判,就可看出他比斯大林学识更渊博,更有教养而且更灵活;他的口头表达能力要强得多。[2] 列宁不在时,提议托洛茨基参加党的内部生活的人正是他,他使托洛茨基熟悉党的军事组织,使之便于跟各级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合作。我们知道,斯维尔德洛夫还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是融洽的同志友谊关系,相比之下,他最初同斯大林更密切地接触时却

---

① 萨多尔说布尔什维克给斯维尔德洛夫取的绰号是"守口如瓶",《革命札记》第266页。

② 这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私人通信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通信发表在1924年《报刊与革命》第2辑。

完全不同。他自己后来写道,直到十月革命之后,他几乎察觉不到斯大林的存在。[1] 然而斯大林一直是党报的编辑。而且是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如果真是托洛茨基忽视了斯大林,这也不会全像托洛茨基一心要证实的那样是因为斯大林的作用不重要,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在党内工作中获得的个人影响没有兴趣。斯大林不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他沉默寡言,没有口才,有时粗俗卑下,引不起托洛茨基的注意。因为托洛茨基十分注意别人是否具有他那样杰出的品质,这使他更容易重犯过去对列宁所犯过的错误:斯大林的暗淡无光使他看不到斯大林的力量。甚至在斯大林已成为处理党及政府事务的那个最小型机构中的同僚以后,他仍继续用虽非故意但更有害的轻蔑来对待这个未来的政敌。因此他刺伤了斯大林的自尊心,这点是用不着惊奇的。

然而个人感情以及刚刚出现的忌妒心理到那时为止还是无关紧要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这几个月的狂喜和骚乱中仿佛生活在心醉神迷的梦幻中,而这种梦幻会突然悲惨地消失。他们坚持并力图巩固执政地位,即使处于这种地位看来暂时毫无权力可言;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预料到,他们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失败,而革命车轮会辗过他们的尸体驶向最后胜利。列宁曾对托洛茨基说过:"如果白卫军把我们两人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吗?"[2] 同时,他们发表宣言,颁布法令,这与其说是为了立即实行,倒不如说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他们考虑到: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们至少会给后来者留下一整套思想、一系列革命政策,这些思想与政策会鼓舞其他人,正如巴黎公社的启示曾鼓舞两代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布尔什维克的领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 242 - 243 页及同书各处。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2 卷第 60 页。

袖们竟然用这种似乎不切实际的方式奠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

他们实现这一任务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符合理想家的目的的。如果说新国家的这些奠基人身边既没有办公设备，也没有可以炫耀的权势，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法。他们甚至连在最简朴的办公室中都能找到的办公设备也没有。在斯莫尔尼宫里，打字机是稀有之物，速记机是神话，而电话则是令人欣喜欲狂的技术设备了。新的统治者起草重要宣言、法令还是用他们自己的手来写。他们要经过迷宫似的走廊才能跑到彼此的办公室。他们在斯莫尔尼宫的食堂里吃的是黑面包，喝的是白菜汤。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他们小小的办公室里住宿，生活在无休止的嘈杂声中，生活在通信员及鼓动人员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士兵皮靴的沉重橐橐声、警铃声、惊慌与狂热和垂死世界与新生世界的一片混杂声中。他们的办公室已由赤卫队的志愿人员担任警卫；但是他们总是平易近人地对待地位最低的工人、水兵及记者。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时期撰写的无数文章应归功于这种环境。以下是一名美国记者所写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印象记：

> 在布尔什维克暴动的最初几天，我基本上每天早晨都去斯莫尔尼宫采访最新消息。托洛茨基和他娇小的妻子住在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对外国记者）只说法语，几乎从未用过别的语言。房间被隔开，像穷画家的顶楼画室。房间的一头是两张行军床，一个廉价的小梳妆台，另一头是一张书桌及两三把廉价的木椅子。……托洛茨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期间一直占用这间办公室，不少显要人物知道必须在这里拜访他。……世界上每一个小小的困难都要由托洛茨基来处理。他工作勤奋，往

往濒于精神崩溃:他变得烦躁,动辄大怒。[1]

起义前,托洛茨基在中产阶级居住区租了一套房子,住在那里,他及其家人的周围笼罩着强烈的仇恨。萨多尔写道:"托洛茨基显得疲劳、神经质。……从10月20日以来,他一直不在家。他的妻子和蔼可亲,身材不高,富有战斗精神,精力充沛,生机勃勃,可爱动人,她说他们的邻居威胁说要杀死她的丈夫。……想想这个无情的专政者,……这个全俄的主人因为害怕看门人的扫帚而不敢在家里睡觉,岂不是很有趣吗?"[2]

① 路易斯·布赖恩特:《俄国的六个红色之月》第145页。

②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94页。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①] 10月26日，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列宁的和平法令，列宁的话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外政策的实质：只有这样的和约才是公正的，因为它能让在欧洲或其他大陆所有被占领受支配的民族在占领军全部撤退以后进行自由投票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列宁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9—10页。

提出这一富有胆识的和平目标只有推翻所有的殖民帝国才能实现。他又谨慎地补充说，即使他们的和平纲领不被接受，苏维埃也准备参加和平谈判，他们愿意考虑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至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本身则赞成通过公开的谈判签订公开的和约；因此它将公布俄国以前历届政府签订的帝国主义秘密条约，并宣布它们无效。正如列宁向大会解释的，这一电文既向各国政府呼吁，也向各交战国人民呼吁。无疑，这是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交战国的现政府，这是明确要求各国人民迫使他们的政府准备立即停战。布尔什维克对外政策的主要的两难境地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悲剧的起源就在于这种双重性的要求。

厌战的俄国松了口气，接受了和平法令，英法两国政府和护国派舆论则以愤怒的吼叫回答。协约国大使及驻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或多或少了解到俄国没有能力进行战争。① 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说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宣传"确实是迫切而积极的，但是情况却很像一个人朝着势不可挡的龙卷风的同一方向吹一口气而已"。② 然而，想防止俄国"不履行义务"的协约国外交使节们却要迫使自己相信：只要布尔什维克停止吹气，龙卷风就会平息。英法两国大使差不多从二月革命开始就力促李沃夫亲王、米留可夫和

① M. 帕列奥洛格：《沙皇俄国》第3卷第265、280页及同书各处。乔治·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228页及同书各处。早在1917年4月1日，即列宁抵达俄国前，帕列奥洛格看到一场只有革命化程度最小的军队参加的游行，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令是这些最忠诚的部队也都不愿打仗，甚至更早些时候，即1917年3月间，帕列奥洛格曾致法国外长里博一份报告，他用以下意味深长的话结束报告："在俄国革命的现阶段，既不能战也不能和。"法国大使用这一公式比托洛茨基早了将近1年。

② W. 哈德：《雷蒙·罗宾自传》第29页。后来，大多数反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头头们在流亡中都同意这一看法。

克伦斯基镇压列宁的党。[①] 两国军事代表团的头头满怀希望怂恿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以反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②] 十月起义前两天,英国大使用全无外交礼节的语言强迫俄国的部长们立即逮捕托洛茨基。[③] 现在布尔什维克既已当权,他们的革命呼吁无视外交礼节,威胁要公布并废除秘密条约,使俄国退出战争,这一切使协约国恨得咬牙切齿。协约国的使节们因目睹这一剧变一下子不知所措,无法说明剧变的原因,他们因而易于接受任何旨在提供解释的罪恶谎言。他们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否真的是德国收买的奸细以及对有效而成功地指挥十月起义的人竟是德国军官的说法都将信将疑。[④] 他们还有一个安慰,即布尔什维克不久会被推翻;而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则是协约国的职责。[⑤]

布尔什维克尽管已发出革命呼吁,但也急欲同协约国进行外交接触。托洛茨基一打败克伦斯基的军队就提出同英法两国恢复正常关系。[⑥] 布尔什维克,特别是托洛茨基估计到德国人可能提出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而以此迫使俄国重新开战并回到协约国中。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建议充耳不闻。协约国的大使们不理睬他。只有比利时的大臣到斯莫尔尼宫他那个用隔板隔开的小房间

① 帕列奥洛格:《沙皇俄国》第 3 卷第 245 - 247 页及同书各处。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 2 卷第 11、119 页及同书各处。

② 陆军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与俄军在一起——1914 - 1917》第 2 卷第 692 页;A.克伦斯基:《自由的苦难》第 295 - 319 页。

③ 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 2 卷第 203 页。

④ 乔治·布坎南爵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不过我不能保证其准确性,大意是在斯莫尔尼宫的列宁参谋人员中有他们的 6 个军官(即德国军官)。"同上,第 232 页;诺克斯:《与俄军在一起——1914—1917》第 2 卷第 718 页。

⑤ 萨多尔说,孟什维克是在协约国外交界的授意下以排斥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成立临时政府的条件。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 74 页。

⑥ 同上,第 77 页。

进行过一次试探性的拜访。托洛茨基向这位并不轻信的使节说明政府的和平目的时，方式“稍稍有点儿生硬，有些傲慢”，但彬彬有礼。比利时大臣在离开时被托洛茨基的人格与真诚深深打动，而且相信，这位革命的外交部长是理论家也是空想家，用不着认真对付；他对他的同行就是这样描绘托洛茨基的。[①]

不仅外国大使，而且连俄国外交部的人员都抵制托洛茨基。他被任命一个星期后才在喀琅施塔得水兵马尔金（Маркин）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外交部，因为那个星期他正跟克伦斯基的军队打仗。首先他急于掌握前任留下的秘密条约和外交信函。但外交部的办公室及走廊里却空无一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题。最后，他的水兵朋友找到外交部的常务首脑，外交世家的后代塔季谢夫（Татищив）伯爵。伯爵声称外交部的雇用人员不再来部里办公了。托洛茨基用威胁的口吻命令伯爵立即召集全体人员，一群外交部官员马上前来报到。托洛茨基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新任领导，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革命，并说那些真正想要为新政府服务的人都应该为新政府工作。但是那些官员拒不移交秘密文件和存放秘密文件的保险箱钥匙。托洛茨基离开了外交部办公楼。过了一会儿，他的水兵朋友回来，命令塔季谢夫及司长们跟他到斯莫尔尼宫去——在那里将他们逮捕。两天后，伯爵引导托洛茨基视察了外交部，打开所有的保险箱，分类移交秘密条约和外交信函。不久，秘密条约就开始印刷发表，这使外交使臣们惊慌失措，这些秘密条约非常清楚地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指控：俄国一直是为征服加里西亚及君士坦丁堡和统治巴尔干半岛而进行战争的。[②]

11 月 7 日，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命令克伦斯基的最后一

---

①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 77－80 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 3 卷第 2 册第 97－99 页。

任总参谋长杜鹤宁(Духонин)将军向德军司令部提议立即停火。托洛茨基向协约国大使发出第一封正式公函,要求他们考虑随函附送的和平法令,该法令作为立即召开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他在该函结尾处说:"大使先生,请接受苏维埃政府对贵国人民真挚的深深敬意,贵国人民同所有其他各国人民一样,都由于空前的屠杀而流尽鲜血、精疲力竭,因而也力求和平。"[①] 同一天,他第一次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上评论外交形势。"受陈腐思想支配的资产阶级欧洲因和平法令而惊慌,把和平法令看做是党的政策声明,而不是国务活动家的行动。对此德国人的最初反应是矛盾的:作为德国人他们对和平建议感到高兴;作为保守派他们害怕革命,而提出和平建议的正是革命。英国官方的敌意是明确无疑的;法国人厌战,但"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则认为我们是跟德国皇帝结盟的政府";意大利热情地响应;美国则容忍。托洛茨基远不是把外国所有形形色色的意见都混为一谈,而是细心准确地将它们分开。然后他宣布将秘密条约公开发表。他承认同盟国将试图从揭发出来的事实得到好处,而苏维埃国家必须给别的国家、特别要给德国工人阶级做榜样,在如何对待他们的统治阶级的秘密交易和协定方面作出示范。他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机会得到他们政府的外交保险箱,在公布他们的秘密条约时,全世界就会明白"德帝国主义在其犬儒哲学与强盗行径方面绝不亚于协约国"。[②] 第二天,他在公布秘密条约的仪式上这样说:"欧洲各国人民为了取得知道这个真相的权利,付出了无数牺牲、普遍贫困的代价。消除秘密外交是真正民主的、大众的、可靠的对外政策的首要条件。"[③]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57页。

② 同上,第161页。

③ 同上,第164-165页。

协约国大使们举行会议，会上他们决定不理睬托洛茨基的信函，并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以苏维埃政权非法为借口而不予答复。协约国政府同意这一建议，而且决定只同俄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建立正式关系，也就是同司令部设在莫吉廖夫的杜鹤宁将军建立正式关系。他们这样做可以说就是把军队的最高司令部提高到政府的地位。他们还警告杜鹤宁，让他反对任何停火谈判；而且他们明确地暗示说：如果俄国退出战争，他们会利用日本进攻西伯利亚进行报复。[①] 托洛茨基对这些行动马上提出抗议并威胁要逮捕任何试图离开彼得格勒去依附外省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协约国外交人员；他呼吁中立国外交家运用他们的影响争取和平。同一天，杜鹤宁将军被免去职务，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肯执行停火的命令。后来，他的士兵得知他决心要继续战争时，残暴地把他杀害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克雷连科被任命为总司令，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少尉，是党的军事部的领导人之一。

俄国与协约国的关系立即恶化，这是干涉战争的前兆。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协约国决定继续战争，协约国大使们只能运用他们的影响反对这个威胁要让俄国退出战争的政府。单单这一点，不可避免要导致对俄国内政的干涉。老派外交家和军人对革命的无法调和的仇恨使这场干涉显得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大使和军事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成为俄国内战的参与者。[②]

---

① J.努兰斯：《我任驻苏俄大使》第1卷第145页；约翰·W.韦勒-本奈特：《被遗忘了的和平》第71页。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大国因法国不履行义务也曾干涉过法国内政。而俄国在1917－1918年退出战争是由于革命因素导致的，1940年法国则是在保守的右翼领导下退出的。对这两件事中协约国（同盟国）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令人触目的类似与区别，还会清楚地表明，协约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盟国不履行义务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阶级对抗所致，而阶级对抗又促使它反动到什么程度。

托洛茨基竭力对这一趋势进行反击,并防止英、法和美国完全投入战斗。他得到列宁的同意后,竭其所能地提醒他们:不使俄国觉得自己被完全抛弃而被迫与德国签订不管条件如何的和约,对协约国是有利的。但协约国对这一考虑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协约国大使通过其低级工作人员——法国军事代表团萨多尔上尉和英国大使馆的布鲁斯·洛克哈特与托洛茨基保持非正式的接触。托洛茨基的建议和抗议都是向这些官员以及美国红十字协会的罗宾上校提出的;通过他们使协约国随时了解停战预备谈判的情况。同托洛茨基接触的协约国的每一位官员都转而相信他的观点,满怀希望地要去改变他们上司的观点,但是一无所获。所以,当时还是一个并未悔悟的"社会护国主义者"的萨多尔写信给法国"社会护国主义"的主要代表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说:"我们坚持否认大地会翻转,我们继续断言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不存在。"伦敦申斥布鲁斯·洛克哈特,因为他这样认真对待托洛茨基,好像后者是"又一个塔列朗(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一样"。[1]

11月14日,德国统帅部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克雷连科命令停火和"前线双方士兵联欢",希望德军通过同俄国军队的接触会受到革命影响。同一天,托洛茨基通知西方国家:

> 共和国军队最高司令克雷连科少尉已建议将停战谈判推迟5天,到11月18日即公历12月1日开始举行,以便再一次提请协约国政府明确表态。……我们人民委员会将这一问题提交给我们的盟国政府……我们现在当着协约国各国人民的面,当着全世界的面问他们:是否同意

[1]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127页;洛克哈特:《一个英国代表的回忆》第197、226-231页。

对待。当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贾德森(Judson)将军冲破协约国的抵制来拜访他并表示希望协约国对苏维埃国家不至再使用威胁手段时,托洛茨基答复说,他并不想为过去的事争吵,他对将军的这一声明感到满意;他重申他的保证,即公开地进行和平谈判,使协约国能够密切注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以后还可参加谈判。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尼塞尔(Niessel)将军惯于在宫殿般的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地对俄国部长和将军们讲话——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权人和政治操纵者。[①] 当他来到斯莫尔尼宫的那间"穷画家的顶楼",自以为他在这里可以更加目中无人地讲话时,托洛茨基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去。他命令法国大使馆关闭军事使团的情报处,因为它发表公报攻击苏维埃政府。[②] 当法国大使努兰斯到斯莫尔尼宫来缓和冲突时,托洛茨基则彬彬有礼,而且愿意协作。他跟英国交涉的第一件事是:要求立即释放因反战宣传而被囚禁在英国的《我们的言论报》前记者契切林及其他俄国革命者。然而英国继续囚禁契切林,他就通知英国大使说,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将不允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③] 托洛茨基以近几届俄国政府从未有过的坚决和庄重坚持俄国同其他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虽然他采取的反击方式本来就是合理而且有说服力的。

11月19日,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开会,而德国人马上建议初步休战一个月。苏维埃政府代表团拒绝这一建议,只要求延长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85页。

② 努兰斯:《我任驻苏俄大使》第2卷第27页。

③ 英国大使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有些道理,如果我们认为有权逮捕在一个要求继续战争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他也同样有权逮捕在一个要求和平的国家里进行战争宣传的英国臣民。"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228页。

对待。当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贾德森(Judson)将军冲破协约国的抵制来拜访他并表示希望协约国对苏维埃国家不至再使用威胁手段时,托洛茨基答复说,他并不想为过去的事争吵,他对将军的这一声明感到满意;他重申他的保证,即公开地进行和平谈判,使协约国能够密切注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以后还可参加谈判。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尼塞尔(Niessel)将军惯于在宫殿般的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地对俄国部长和将军们讲话——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权人和政治操纵者。[①] 当他来到斯莫尔尼宫的那间"穷画家的顶楼",自以为他在这里可以更加目中无人地讲话时,托洛茨基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去。他命令法国大使馆关闭军事使团的情报处,因为它发表公报攻击苏维埃政府。[②] 当法国大使努兰斯到斯莫尔尼宫来缓和冲突时,托洛茨基则彬彬有礼,而且愿意协作。他跟英国交涉的第一件事是:要求立即释放因反战宣传而被囚禁在英国的《我们的言论报》前记者契切林及其他俄国革命者。然而英国继续囚禁契切林,他就通知英国大使说,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将不允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③] 托洛茨基以近几届俄国政府从未有过的坚决和庄重坚持俄国同其他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虽然他采取的反击方式本来就是合理而且有说服力的。

11月19日,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开会,而德国人马上建议初步休战一个月。苏维埃政府代表团拒绝这一建议,只要求延长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85页。

② 努兰斯:《我任驻苏俄大使》第2卷第27页。

③ 英国大使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有些道理,如果我们认为有权逮捕在一个要求继续战争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他也同样有权逮捕在一个要求和平的国家里进行战争宣传的英国臣民。"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228页。

停火一个星期，以便使西方国家有时间考虑这一局面。托洛茨基再一次转向协约国大使，却再一次遇到冷冰冰的沉默。但他仍指令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代表：如果同盟国国家同意不把军队从俄国调往西线，而且如果他们不明确地表示允许苏维埃政府在德、奥军人中进行革命鼓励——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条件——就不要签署休战协定。俄国前线的德国最高司令霍夫曼（Hoffmann）将军拒绝这两点要求，一时看来，谈判要中断，俄国将重返战场。托洛茨基再一次面对摩登马戏场的老听众时宣称苏维埃要继续要求全线停战。"但如果我们不得已单独签字停战，那么我们要对德国说，不许把军队从俄国战线调往其他战线。因为我们提议的是真诚的停战，因为英、法不应被压倒。……如果德国皇帝面对这些公开、直接而真诚的声明而拒不签订和约……各国人民就会明白谁是对的，而且……我们一定会感到我们是胜利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因为除了军事胜利之外，还有其他胜利。……如果法国和德国不和我们一道参加和平谈判，两国人民一定会驱使他们的政府同我们一起参加谈判，他们一定会用棍棒驱使他们的政府参加谈判。"[①]

同一天，12月3日，他向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说："引起严重冲突的还有一点：即军队不应调往西线这个条件。霍夫曼将军宣称这个条件不能接受。和平问题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我们连夜指示我们的代表：不作让步。啊，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尔后德国作了让步，并保证除已经在途中的部队以外，不再调动军队。……我们有自己的代表跟德军人员一起，监视这些条件是否得到遵守。"他展开标明革命前两个月里德军运动情况的地图，接着说："假若克伦斯基还在当权并把战争拖延下去，德国总参谋部就有调换部队的充分能力……现在，多亏我们，协约国已处于更有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85－189页。

利的地位。"[①] 德军司令无疑是把这一条当做虚设,无意遵守;但事变表明托洛茨基的话并非放空炮。[②]

到目前为止由停战引起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心支持单独进行和平谈判,而非单独媾和。像列宁那样早已倾向于单独媾和的人也还没有准备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苏维埃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时间,在前线突然出现的平静中大声宣告它的和平目的;测定欧洲革命风潮的强度;并且试探协约国及敌国政府的态度。

布尔什维克对于欧洲社会剧变即将到来是毫不怀疑的。但他们首先要知道,通向和平的道路是否要经过革命,或者相反,通向革命的道路是否不经过和平。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将由各革命政府结束。在第二种情况下,俄国政府眼下不得不跟资产阶级统治者达成协议。只有时间才能表明事件如何发展以及俄国革命的冲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不能决定它们的方向。到目前为止,试探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德、奥工人阶级无疑是不安定的;但不能说这是预示敌人将立即崩溃还是预示更遥远的将来的危机。同盟国各国的和平谈判代表已出人意外地表示准备让步。他们的态度可能反映出同盟国各国的绝望形势;但也可能隐藏着圈套。另一方面,协约国的敌意似乎暂时缓和。尽管协约国仍然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但在 12 月初答应交换某些外交特权,这些特权通常都是给予已被它们承认的政府的。它们准许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信使在俄国与西欧之间来往;彼此承认外交护照;契切林终于获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3 卷第 2 册,第 199 页。

② 韦勒-本涅特先生在从协约国观点写的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历史事件的优秀著作中这样总结其结果:"但胜利者的和约必须强制服从,100 万人的军队滞留在东线不能调动是德国扩张的代价,而在西线激烈进行的列强之战,用 50 万人的军队可能就足以在它的前几个阶段扭转局面。"《被遗忘了的和平》第 327 页。

释，回到俄国；而且托洛茨基已与某些西方使节进行了外交互访。难道协约国也正在对和平改变主意吗？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满怀希望地评论这些事件，认为这是“表示全面停战与全面和平可能性的征兆”。[①]

他竟然从外交把戏的细节中得出如此牵强附会的最后结论。这个事实应该用他对战略前景预测中的一个基本错误来解释。在战争初期，当时各国政府及其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及早结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托洛茨基已正确地预测到壕堑战将长时间对峙。[②]他总是相信双方阵营由于势均力敌都不能打破对峙的局面。三年多的事变惊人地证实了这一预测，因此甚至在前提条件正要消失的现在，他对这个预测仍然坚持不放。美国参战了。但这并没有使托洛茨基改变看法；革命后，他如同以前一样重申敌对双方都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从这个僵化不变的假设中得出结论说，交战国双方最终会认识到继续打下去是无益的，他们会承认僵局而同意开始和平谈判。这种断定在表面上看来是合逻辑的，正是这一推理使他匆匆作出关于“全面停战和全面和平”可能即将到来的结论。

但同时布尔什维克担心，协约国可能与德、奥单独媾和，联合打击俄国革命。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在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流露出这种担心。已被揭露出来的战争内情表明，这种担心并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奥已经多次或联合或单独地向西方敌国进行秘密的和平试探。[③] 英、法统治阶级日益害怕革命，因而不可能预先排除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因害怕革命而促成调解的可能性。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210－112页。

② 参见本书第八章。

③ D.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2卷第70章；《屈尔曼回忆录》第475－487页。

这虽然还只是一个潜在威胁,但这足以促使列宁得出结论:只有在东线单独媾和才能先发制人,防止西线的单独媾和。

概括起来说,布尔什维克已陷入下述重重困境之中:他们必须决定他们等待和平能否等到革命扩展之后,或者他们是否要力图通过缔结和约来扩展革命。如果通向欧洲革命的道路要经过媾和,那么是共同的还是单独的媾和? 如果证明单独媾和的条件过于苛刻,令其感到屈辱而难以接受,他们能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吗? 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就原则说,他们能接受协约国的援助吗? 而协约国会愿意答应给他们援助吗? 如果不愿给援助,他们是否应不惜任何代价力争单独媾和? 或许还有什么摆脱这些困境的其他办法?

12月8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实际开始的前一天,托洛茨基在政府、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彼得格勒市政会与工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发言。这是一篇最值得注意的演说,不仅因为它修辞优美和激昂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且还因为这篇演说回荡着他自己的思想探索:

> 确实,这场战争展示了人类忍受前所未闻的苦难的的力量与复原能力,但也表明当代人仍然保存了多么多的残暴。……人是大自然的主宰,但却屈辱地蹲到壕堑里去,在那里从狭小的洞孔里像从牢房里一样向外窥探;他在那里埋伏着,窥视他的同类——他未来的牺牲品。……人类堕落到何等地步……当一个人想到,经历过这么多文明阶段——基督教、专制主义及议会民主——的人们,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却在统治阶级的鞭子下像悲惨的奴隶一样互相残杀,他就会为人,为他的血肉,为他的灵魂感到羞耻。如果战争落得的后果只是使

人们回到牛马槽里去拾取有产阶级餐桌上丢下来的可怜的面包屑，那么人类就会自行证明：几千年来一直经受的苦难以及自己思想上的惊人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但这样的结果绝不会出现，也绝不能出现。

在过去的欧洲宪兵国家里爆发了起义，俄国人民宣告要求用劳动者国际团结的语言而不是枪炮的语言向服兵役的兄弟说话。……这一事实在……所有国家人民群众的心中是抹不掉的。他们迟早一定会听到我们的呼声，他们一定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即令……人民的敌人将征服我们，我们将夭折，……但人们对我们的怀念仍然会一代代传下去，并且会唤醒后代去进行新的斗争。的确，如果欧洲各国人民跟我们一起起来反抗，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之谈判的不是霍夫曼将军及切尔宁(Czernin)伯爵，而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及罗莎·卢森堡，我们的处境就会好得多。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这不能怪我们。我们的德国弟兄不能责备我们跟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德国皇帝在背后谈判，我们跟他谈判是跟敌人的谈判一样——我们同暴君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决不弱化。

休战使敌对暂停一段时间。枪炮声已经沉寂，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倾听苏维埃政府将用什么声音同霍亨索伦王朝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们谈判。我们同他们的谈判是同自由的敌人的谈判，……而且我们不会向帝国主义出卖丝毫自由。对此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只有那时，我们斗争的真正意义才会深入到德、奥人民的良知中去。

在这样呼吁之后紧接着的是一段难以理解的话,这段话是他在广大听众面前大声说出的他的想法,在讲话中他控制不住地表现出其犹豫不决的心态,他突然说:"如果德国工人阶级的呼声……并不能发挥强有力的决定性影响……就不可能有和平。"接着他又说出第二种想法:"但如果事件证明我们错了,如果这样的沉寂气氛还要在欧洲长期地笼罩下去,如果这种沉寂将使德国皇帝有进攻我们的时机,并提出有损我国革命尊严的条件,那时,我们不知道——由于战争和国内的灾变所引起的经济崩溃与普遍的混乱——我们是否能继续进行战争。"他似乎是悟到他的这一绝望呼声会使他的听众吃惊,便突然改口高声说:"是的,我们能继续战争。"这句话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因受到听众响应的鼓励,他补充说:"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我们的革命荣誉,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在原报告的记录上,这段话之后记有"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由两个执政党领导集团组成的听众以此表示对单独媾和的强烈反对。

托洛茨基继续说:"厌倦了的人和衰老的人会靠边站……而我们会建立一支由士兵与赤卫队组成的富有革命积极性的强大军队。……我们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不是为了跪倒在德皇面前。"如果德国人要提出不公正、不民主的媾和条件,那么"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条件提交立宪会议,我们应该对立宪会议说:你们下决心吧。如果立宪会议接受那样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将靠边站,我们还应该说:去找另外一个愿意签署这样条件的党吧。我们布尔什维克号召,而且我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一样会号召全体人民进行反对各国军国主义的圣战。"他简直想不到,有朝一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高呼着进行这场"圣战"起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也想不到他本人那时竟会镇压他们。他最后说:"如果由于经济混乱使我们不能进行战争……斗争也不会结束,它只会延期,像

1905年时一样。当时沙皇政府把我们镇压下去，但我们活下来改日继续斗争。这就是我们参加和平谈判时不悲观、思想不消沉的原因……。"[①] 他的演说使听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像起义前彼得格勒的群众跟他重复革命誓言时的情况一样。

12月9日，谈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同盟国各国的代表让公众知道他们"同意立即签订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面和约"。[②] 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团长越飞要求将谈判再停10天，使西方各国再有一次交换意见的时间，在休会期间只举行和谈委员会的会议，而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出奇地顺利。实际谈判在12月27日托洛茨基到达后才开始。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采取若干示威性步骤：加紧反对德国帝主义的宣传；托洛茨基在刚回到俄国的卡尔·拉狄克的协助下主编《火炬报》，该报往德国战壕里散发。12月13日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供国外革命宣传之用，并公布了这一事实。19日俄国军队开始复员。俄国政府还解除了德、奥战俘的强制性劳动，准许他们离开战俘营并像自由公民那样组织起来从事劳动。政府宣布1907年英俄条约无效，根据该条约，波斯由两国瓜分；12月23日，政府命令俄国部队撤离波斯北部。最后，托洛茨基指令越飞要求把和平谈判地点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移到斯德哥尔摩或中立国的任何地方。

12月24日或25日，即起义后整整两个月，托洛茨基出发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途中，特别是在前线地区，托洛茨基受到当地苏维埃和工会代表的欢迎。他们强烈要求他加速谈判，带回和约。使托洛茨基震惊的是，他发现前线俄方战壕里几乎空无一人，驻守的士兵都已走光。引导他越过前线的德国联络官注意到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211－217页。

②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9页。

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说,托洛茨基"越来越抑郁"。[1] 他确实已敏锐而痛苦地意识到他不得不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与敌人对抗。他越发下决心要使用他的"批判的武器"。跟他同行的卡尔·拉狄克的行李包里装满革命小册子和传单,他们的列车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一停下来,当着聚集在月台上迎接他们的外交家和官员们的面,拉狄克就公然开始在德国士兵中散发小册子。拉狄克是波籍犹太人,名义上是奥匈帝国臣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以机智、激进的小册子作家而闻名。他作为俄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到布列斯特只能使德、奥外交官震惊。这是有意表明革命是维护一个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支持民族国家的事业,并表明单纯的"民族敌人"的概念是与此不相容的。托洛茨基要拉狄克陪同他来,像他对萨多尔说的那样,是因为他确信拉狄克学识渊博、政治上忠诚,而且他还确信这个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干劲十足的人的行动对越飞、加米涅夫及其他比较软弱的俄国代表能起强身剂的作用。[2]

会谈地点荒凉而又可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在战争初期已被撤退的俄军夷为平地了。只有陈旧的军事要塞没有损坏;东线德军总指挥部设在这个要塞里。和平谈判代表团都住在围墙内简单粗陋的营房里。军官食堂充当会议厅。这里一派普鲁士兵营的景象,四周则是波兰—乌克兰旷野。营房封闭在铁丝网之中,四周都是警卫的哨兵,在军事机关的例行奔忙中,俄国代表可能有一种战俘营里的战俘的感受。德国人坚持谈判要在这里举行,部分原因是为他们自己的方便,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要羞辱苏维埃政府的使节。但是他们表面上还是装出温和的样子。在托洛茨基到

① 奥托卡·切尔宁伯爵:《世界大战》第232页。

②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176页。

达以前，双方代表团吃饭喝茶都在一起，并互相作其他种种礼节性应酬；他们由挂名总司令，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尔德（Leopold）皇太子接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互相作礼节应酬的人，一方是那些有爵位的德、奥贵族；另一方是职业鼓动家，他们不久以前还是囚犯，其中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女恐怖主义者比岑柯（Биценко），她刺杀过沙皇的海陆军大臣，被判处服劳役。德、奥人殷勤的社交姿态甚至使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代表也不无窘困之感。越飞、加米涅夫、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卡拉罕都是饱经风霜、训练有素的革命家，但在谈判桌上却是外交新手，自然显得有些尴尬。在谈判第一阶段越飞担任苏方首席代表时，会议完全被德国外交大臣屈尔曼所支配。

托洛茨基到达后，对这一状况不满。他在列宁的坚持下担负起这一使命，旨在使和谈会议面貌彻底改观。开头，托洛茨基冷淡地拒绝会见利奥波尔德皇太子的邀请，而且停止了所有的聚会。霍夫曼将军指出："托洛茨基到了这里，会议厅以外的轻松社交活动停止了。托洛茨基要求代表团在自己的住处进餐，而且一般不允许私人往来。"[①] "这次风向似乎与上次明显不同，"奥国外交大臣切尔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②] 对方的外交官只要用轻快的恭维话或亲近的姿态去接近托洛茨基，就会使他板起面孔甚至发怒。[③] 外表必须和实质相符：他来是与敌人而不是与朋友谈判。

12月2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取代越飞作为俄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屈尔曼在会议开幕时声明说，同盟国业已同意的原则——不割地、不赔款的媾和——是只为全面媾和而

①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2卷第206－207页。

② 切尔宁：《世界大战》第232页。

③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45页。

定的。由于西方国家拒不参加谈判,因而议程上只有单独媾和这一项,德国及同盟国就不再受该原则的束缚。他拒绝苏俄在中立国进行谈判的要求;并指责苏俄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宣传,他说,这使人怀疑苏俄希望和平的诚意;但他还是以和解的语气结束他的话。霍夫曼将军的面前放着一叠苏维埃政府对德国士兵的宣言,他代表德军最高司令部再次提出抗议。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外交官的发言用的是同样腔调。托洛茨基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听他们发言,他在估量对手;尔后,他对指责不予答复,要求休会一天。

对手中有三个突出人物。屈尔曼是巴伐利亚天主教徒,因循守旧,是日耳曼帝国最精明的外交家之一,本人不无可爱之处,为人还算坦率果敢。他比德皇的其他臣仆更早料到德国在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战争中的失败;他急切地要在东线取得有利于德国而又不是太明显地强加于俄国的和约。也许在德国统治集团中只有他认识到,按单方旨意写下的和约等于德国的失败;而德国总是预先一再告诫其他国家说他们只能从德国的胜利中有所指望,以此加强他们的抵抗意志。最高司令部强烈地反对屈尔曼的政策。在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看来,他简直就是卖国贼;他们力尽所能地贬低他的声誉,所以,他在加入与托洛茨基的公开决斗之时不得不在幕后反对军方来保卫自己。军方和他都要求德皇做最高仲裁人。德皇时而支持他的外交家,时而支持他的将军们,但心里却同后者站在一起,准许他们去制服他的政府文官。屈尔曼不但敢于公然反抗鲁登道夫,有一次甚至对德皇中断谈判的生硬命令也置若罔闻。不过他与军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方式而不是实质;他也要为德国把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从俄国手中夺走,在这一点上他跟军方是一致的。但他急于得到俄国表面上的同意;正如后来所揭示的,他的地位如此虚弱使他不能如愿以

偿。他还希望把德国要并吞掉那些国家说成是解放它们。将军们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要这样微妙的外交手腕。

霍夫曼将军在会议桌上显然是最高司令部的耳目，而且大权在握。他的职责就是尽快使谈判缔结条约，以便把腾出来的同盟国的东线军队调到西线去作最后的全力进攻。他对屈尔曼的方式常常表示不耐烦和恼火。但是他越是比上级老练就越是受到革命的冲击；他不能不承认屈尔曼的办法有其优点。他有时对屈尔曼让步，因而招致鲁登道夫雷鸣般的怒斥。[①]

切尔宁伯爵是奥地利外交大臣，是屈尔曼的卓越副手，甚至比他的德国同僚更敏锐，他已意识到灾难正笼罩在同盟国国家的头上，从托洛茨基业已公布的秘密条约中他知道协约国已经要肢解奥匈帝国了。随着维也纳的饥饿和各从属国中的骚乱，帝国已开始瓦解；现在全靠消耗德国的实力苟延残喘。所以，每当切尔宁觉得霍夫曼生硬的干涉减少了媾和机会时，他确实感到惊恐，起初他用单独媾和威胁他的德国同僚，但是，他的政府日益依赖德国援助这一境况迫使他放弃这种威胁。尽管他有点儿害怕这个“聪明而非常危险的对手（他这样形容托洛茨基）……我几乎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才华非凡、反驳机敏迅速的人”，但他仍然力图去充当态度温和的调解人。切尔宁在空闲时间阅读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回忆录，试图为这个危险对手找到历史的尺度；他想知道俄国的夏洛特·科尔黛（Charlott Corday）是否已在窥视托洛茨基。

看来沉溺于这样的调解并寻求历史类比的只有切尔宁一人。他的同僚起初把托洛茨基及俄国其他代表看做是小小冒险家、出身微贱的新贵，充其量是一些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命运的嘲弄把他

① 托洛茨基误把霍夫曼当做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权威发言人，这导致他后来低估德国重新对俄作战的准备。

们推上舞台,在世界戏剧中表演非常短暂的荒唐插曲;而他们这两个显赫王朝的臣仆才是这出戏剧中的主角。他们确信,只要用小恩小惠就能收买俄国代表,但首先得让他们安分,不得越轨。他们在第一次会谈时就试图这样对付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也采用同样策略。他们让乌克兰人反对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否认彼得格勒有权做全俄的代言人。

12月28日,托洛茨基在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时,他介入其间的正是这样的利害关系、人物性格与勃勃野心的相互作用的局面。他对乌克兰的阴谋置之不理。[1] 他宣称:苏维埃政府不反对乌克兰参加谈判,他们已经宣告过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他们就是要尊重这种自决权。他也并不怀疑代表拉达的乌克兰代表们的证书是克伦斯基政权的地方性复制品,或毋宁说是拙劣的模仿。屈尔曼又一次试图挑起俄国人与乌克兰人公开争吵,以便从中渔利。但托洛茨基又一次避开这个圈套,把话题转到前一天对方的指责和抗议,他拒绝为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而作任何道歉。他说:他来这里是为讨论和平的条件,而不是为限制本国政府表示意见的自由;苏维埃政府并没有反对德国人在俄国公民中散布反革命宣传,革命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理想的感召力很有信心,因此欢迎公开辩论;这一点不能给德国人提供怀疑俄国希望和平的根据;特别是当德国代表团声称不再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原则束缚时,应该怀疑的倒是德国的诚意。"我方认为必须声明,我们宣布的民主和平的原则,在我们看来,10天后并未化为乌有……对我们来说,这些原则是各国人民合作共存的唯一可靠的基础。"

他又重新提出另一个抗议,即反对在布列斯特要塞这种人为

① 切尔宁:《世界大战》第234－235页。

造成的孤立气氛中举行会议。德国首相曾对德意志帝国国会说过,会议在中立国举行容易中协约国的圈套。托洛茨基评论说:"保护俄国政府免遭敌国阴谋诡计的职责绝对属于俄国政府。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份最后通牒:或者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或者根本别谈。"这个最后通牒是德国感到自己强大并深信俄国虚弱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也无意试图否认,我们国家被最近才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搞得虚弱不堪。但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由目前技术设备的条件决定,而且还受这个国家内在的潜力决定。"他并不打算根据德国目前的粮食储备情况,即它的人民正在挨饿来衡量德国的经济实力。他指出同盟国各国企图以所谓军事地图作为媾和基础而不是以"各国人民之间的协议作为基础。这种倾向对德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同样都是有害的,因为军事地图不断变化,而人民是恒久的"。然而,"我们留在这里,留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是为了不放过实现和平的一线希望……是为了在这里——东线的总司令部清楚准确地知道……现在是否可能在不侵犯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情况下实现和平,俄国革命已保证这些民族享有充分的自决权。"但会议能否继续,只能取决于一个条件,即谈判的举行应完全公开。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屈尔曼要求的秘密会谈,而后者以为托洛茨基挑战性的声明只不过是为了保全面子。[①]

两天后,代表们讨论德国的和约草案。开头,一件小事好像使同盟国各国的严肃稳重的外交家们进入萧伯纳式的喜剧气氛之中。和约的序言内容都是体面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缔约各方都希望和平友好地生活下去。草案的作者们想不到这会引起反对。他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 52 – 60 页。

们都错了。托洛茨基说:“我冒昧提议:把第二个词(缔约各方间的友好)删去。这种彻头彻尾因袭的冠冕堂皇的装饰风格(如其所示)看来跟文件的不加渲染的务实感并不吻合。”[①] 这些职业外交家感到既有趣又震惊,却看不出他的目的所在,他们心生疑惑:托洛茨基是在认真地说话吗?他怎么能把这一崇高的声明轻率地说成是因袭的装饰风格?托洛茨基痛快淋漓地继续说:“但是这样的声明是一份份外交文件辗转相抄而成的,从不能展示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特点”;他只希望今后能用更严肃的因素来体现这样的关系。一时间,这些外交家们感到,仿佛人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些“更严肃的因素”是什么?托洛茨基会提出什么方案?托洛茨基说,他可以给他们提出方案,但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喜剧性的争论持续了一会儿后,草案上有关友好的词语便被删去了。

接下来是以自决原则和以如何对待位于俄、德两国间各国的命运问题为中心的戏剧性辩论。主要在托洛茨基与屈尔曼之间进行的这场辩论占用了多次会议的时间,形式上是对自决的两种不同解释的冲突。看来双方都用平静的语调对法律社会学和历史主题进行学术式的辩论;但是在这些主题的后面隐隐呈现出战争、革命、占领和割地的现实。屈尔曼以为托洛茨基不过是想给俄国的投降乔装打扮一番,看来他急于给托洛茨基,更急于给他自己提供遮人耳目的方案,把德国并吞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说成是这些国家的自决。使屈尔曼茫然不解的是,托洛茨基对保全面子的一切企图都不屑一顾,他坚持兼并领土的事实。屈尔曼用系统、无情而微妙的逻辑说明他的理由,唯一的缺点是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守派政治家面临不能控制的革命现象时的机巧。托洛茨基作为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66页。

这种革命现象的化身站在会议面前，他甚至有更无情、更微妙的逻辑和敏捷而击中要害的智慧，使人无从逃避。他本人显然为自己的讽刺挖苦与幽默而得意，它们却使霍夫曼将军怒吼咆哮、暴跳如雷，而其余代表则因强忍不笑而颤抖。托洛茨基曾要求这位将军记住，他们的意见分歧是由于观点的深刻差异而形成的：他，俄国代表团团长，德国一个法院因他的反战宣传而判他坐牢。将军突然发现自己是与囚犯为伍的角色，感到好像胸前的所有勋章都被扯掉了，他退出会场，当屈尔曼问霍夫曼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生气地厉声回答道："够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和约草案几乎每一段里都有崇高的原则声明，也有对其否定的意见。开头的一节中有撤离被占领土的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屈尔曼声称德国要占领在全面和平前从俄国手中夺走的领土，甚至在全面和平以后还要无限期占领。屈尔曼还争辩说，波兰和被德国占领的其他国家已取得自决权，因为德国人已在各地建立了当地政府。托洛茨基反驳说，一个国家在被外国军队占领时，绝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作为先决条件，外国军队应该撤离有争议的地区"。他说这话时彬彬有礼，也没有直呼其名，他说得显然很清楚，德国人建立的正是傀儡政府。

当辩论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显然抽象化时，托洛茨基就把辩论的话题从俄国转到德国。使用外交法律套语，屈尔曼是行家，他厚颜无耻地借此挑起进一步的争论。他问："按照俄国代表团团长的意见，什么时候一个国家才作为单一实体开始存在？"如果在外国占领下这个国家就不存在，那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才会有诞生的时刻？托洛茨基很高兴能有再次陈述理由的机会，他开始用排除法回答这个难题：无疑，一个国家只要被占领，只要有一个其统治权依赖外国军队的存在的行政机构，这个国家就不是独立的。最后的标准是人民的意愿，即在全民公决中能自由地、民主地表示的

意愿。俄军已经撤离的芬兰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乌克兰,"自决的进程还在进行中"。但屈尔曼指出,这样建立起来的政府就是中断了法律的连续性;而按保守派的思想方法,法律连续性就是从始至终的连续。托洛茨基提醒这位德国大臣:任何占领国都会中断法律的连续性,而且这样做是毫无理由的;但革命中断法律的连续性是有正当理由的。屈尔曼巧妙地反驳说,如果革命要求权利这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那么只能依靠暴力和既成事实。这话似乎驳倒了托洛茨基的论据,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没有理由反对德国并吞领土的既成事实。托洛茨基答复的要点在于如何划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即是一国内部出现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暴力还是外部来的把其意志强加给它的暴力。

争论就是这样发展成为的世界观的冲突,发展成对立的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争论。关于这场辩论的每一阶段,全世界都有报导,也有歪曲的报导。前途危若累卵的被占领国屏息倾听报导。加米涅夫促使托洛茨基在某一点上要加以说明:当他如此强烈地否认德国有权使那些被占领国家处于屈从地位时,他没有为俄国要求这种权利,而以往的俄国外交家都是这样干的。托洛茨基声称:"我们承担有义务,决不直接或间接地强迫那些国家接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决不凭任何惯例或军事协定侵犯它们的独立。……我倒想知道,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代表是否能够发表同样效果的声明……?"

这样又使辩论回到最关键的问题上。屈尔曼回答说,德国占领的各国政府有权签订它们愿意签订的协定;它们甚至有权割让领土给占领国。这话在屈尔曼方面是一段自我暴露的表演,这是托洛茨基巧妙地诱他入彀的。托洛茨基抓住这一论点说:"德国代表团团长说,那些人民(傀儡政府)有权签订条约与协定,有权割让领土;这一断言对自决原则是完全彻底的否定。"同盟国各国一直

未邀请被占领国的代表来布列斯特;单这一点就暴露出他们把那些国家当成没有自己意志的附属国。"如果我们用惯用的语言来称呼这里所描述的情况,那就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完全不同的措辞:……并吞……。"①

托洛茨基在辩论中无疑已战胜对手。然而论证在某些方面还不能令人信服。正是因为论证过于微妙,对德方舆论的影响不如托洛茨基所相信的那样大。至少不能强有力地吸引他一心要使其革命化的德国工人与士兵;因而构成他工作成绩的美中不足之处。只有当霍夫曼将军渴望使自己披上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掠夺的外衣去进行干预时,这场辩论才一下子变得更为通俗,而且从布尔什维克观点看来,才会富有政治成果。这位将军摆脱了屈尔曼的约束,突然发作起来,说:"俄国代表团这样说话,仿佛它是侵略我国的胜利者的代表。我倒愿意提醒该代表团的代表们,事实恰恰相反:在俄国国土上获胜的是德军。我还应当进一步说,俄国代表团要求我们应当按照我们本国政府并不承认的形式和标准来承认自决权。……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必需拒绝对其占领地区事务的干涉。"霍夫曼拒绝参加关于撤军问题的任何讨论。

这是托洛茨基特别得意的时刻。他挖苦地质问霍夫曼是代表最高统帅部还是代表德国政府;屈尔曼和切尔宁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接受这一提示。如果按照将军的主张,最重要的事实是谁的军队驻在什么地方的问题,那么,占领奥地利和土耳其领土的俄国人应当用跟德国人谈判不同的语气去跟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会谈;但是俄国人不打算这样做。托洛茨基欢迎霍夫曼对布尔什维克的内政发表他的蛮横议论,因为他本人早已请他在这方面不必拘束。"当这位将军说我国政府以暴力为基础时,他说得非常正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 84－85 页;《屈尔曼回忆录》第 524－532 页。

确。我们知道到迄今为止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不需要暴力。……然而我必须坚决反对彻头彻尾的谎言,说我们把所有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都宣布为非法。如果我得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享有如同我们的政敌和反革命报刊在我国享有的那种自由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在这一阶段作这样的对比事实上仍有利于苏维埃政府。)"在我们的活动中,使其他国家政府害怕并反感的是,我们逮捕的不是举行罢工的工人,而是那些搞联合停业使大量工人失业的资本家。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不是枪毙那些要求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试图枪杀农民的地主和军官。"[1] 他指出屈尔曼和霍夫曼的论据之间的矛盾。前者声称德国占领的国家已有独立程度不同的政府,而后者则以那些国家没有自己政府这一事实证明德国无限期占领是正当的。然而,将军与大臣从不同的论据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等于表明,在他们决定现存的各民族的命运时,法律宗旨完全处于从属地位"。[2]

这样的揭露具有毁灭性的效果。霍夫曼在日记中记道:"我的发言所起的影响比我预期的小。"[3] 屈尔曼大发脾气,懊悔让自己被人诱入了公开外交。[4] 后来,他力图消除霍夫曼干预所留下的苦味,并且以后者的"军人的率直"来开脱。托洛茨基指出并证实了敌人营垒里军人与文官的分歧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我们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属于外交学派,算做革命战士更恰当些。我们更喜欢——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在各方面都是明确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02页。

② 在一段离题的话中,在屈尔曼引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来支持他自己的论点时,托洛茨基转向他说,大臣阁下如果从乔治三世的裁判权而不是从乔治·华盛顿的裁判权中汲取灵感,就更忠于本性。

③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209页。

④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00－104页。

清楚的声明。”[①]

1月5日，托洛茨基要求休会，以便把德方的要求通知他的政府。会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赢得了不少时间；此时党和政府必须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中又认真地巡视了俄方的战壕，战壕里照样是空无一人，仿佛在大声呼喊和平。但此刻他比以前更懂得，和平的代价将是俄国和革命的完全屈服和耻辱。他在布列斯特读到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有些报纸把媾和会议看做是演戏，说其结局早已安排好了。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是德皇的奸细，甚至那些并不怀疑列宁和托洛茨基正直品质的人也认为他们的政策是一种“心理疑团”。支配托洛茨基在谈判桌上行动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为党除去这一污名。[②] 此时看起来，他的努力好像并非全无成效。在各敌国中，要求和平的示威和罢工终于开始了。柏林和维也纳都大声抗议霍夫曼授意和约条件的企图。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苏维埃政府绝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必须争取时间，力图在他们自己与同盟国各国之间造成不战不和的状态。他带着这一结论来到斯莫尔尼宫，那里一直在焦急紧张地等待他的到来。

他归来时正值苏维埃政府与终于召开的立宪会议之间发生冲突之际。跟布尔什维克及其伙伴们所预期的相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却拥有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定解散立宪会议；而他们是在立宪会议拒不批准列宁的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政权归苏维埃的法令之后才如此决定的。起初证明解散立宪会议合法的根据是，认为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一项过时的法律举行的，这项法律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作了偏重少数富农的解释。布尔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33–134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一书撰写的序言。

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拥有多数票而在立宪会议的选票中仍占少数这一可能出现的矛盾状况在前一章中已经论述过了。解散的真正原因在于立宪会议统治与苏维埃统治是互不相容的。要么取消立宪会议,要么否定十月革命。托洛茨基全心全意赞成解散立宪会议,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反复捍卫这一行动,并为此承担全部道义责任。[①] 从1905—1906年以来,他一直主张以苏维埃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当他必须在专政与议会制之间进行抉择时,他毫不踌躇。不过,就事件本身说,他并没有出场。立宪会议于1月6日解散,是在他回彼得格勒之前。7日他到达时,他与列宁都曾一度担心过,因为拥护立宪会议的人似乎要组织一次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不过抗议不成气候,终于失败——只是在好久后,即在内战中才在伏尔加地区发起过一场"立宪运动"。[②]

1月8日,即立宪会议解散的第三天,中央委员会全神贯注于关于战争及和平的辩论;为探测情绪,中央委员会在外省来出席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面前进行辩论。托洛茨基作有关他此行任务的报告,并提出他的结论:不战不和。列宁力主接受德国的条件。布哈林发言要求用"革命战争"去反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表决结果是拥护革命战争的人取得令人瞩

① 参见《保卫恐怖主义》中论立宪会议的一章,第41-45页;另见《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17、69-70页。

②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几乎是幽默地描写了这一事件。列宁接到报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领导1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前往塔夫利达宫。托洛茨基夫人看见了示威者,估计人数有2万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紧张不安地命令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驱散示威游行。安东诺夫率领一团人赶到塔夫利达宫,但没有看到任何应驱散的人,"拥护立宪会议的人来了,乱哄哄地吵闹了一阵,像中国的幽灵一样不见了。示威的人数总共不过5000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回忆录》第1卷第18-19页。

目的胜利，他们被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列宁提议立即媾和，只得15票。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获得16票。投赞成布哈林号召战争的有32票。[1] 但因为有非代表，即局外人参加，表决对中央委员会没有约束力。

布尔什维克全党不久分裂为主和的与主战的两派。支持后者的是庞杂混乱的多数，一致反对媾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但主战派对自己的情况也并没有把握。反对媾和的呼声比力主恢复战争行动的呼声更强大。

1月11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主战派激烈攻击列宁。捷尔任斯基指责他胆怯地放弃全部革命纲领——正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中放弃革命一样。布哈林争辩说，接受德皇的指令就是在德、奥无产阶级的背后捅上一刀——一场反对战争的总罢工正在维也纳进行。乌里茨基认为列宁"从狭隘的俄国立场而不是从国际立场"处理问题，说这是他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柯秀尔(Косиор)代表彼得格勒组织拒不接受列宁的意见。最坚决主和的人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此时如同在十月一样，看不出有指望西方革命的理由；他认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是浪费时间；而且他还警告中央委员会：以后德国甚至会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斯大林比较谨慎地表示相同的意见，索柯里尼柯夫在辩论中说挽救俄国革命是压倒一切的主要考虑，他用古怪的警句预示党的观点在遥远的将来的变化。他说："历史清楚表明：世界的中心正在逐渐向东转移。18世纪的世界中心在法国，19世纪——在德国，现在的世界中心在俄国。"[2]

列宁对奥地利总罢工的结果如何是怀疑的，托洛茨基和主战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0页。

② 同上，第206页。

派则对此非常重视;他描绘了一幅说明俄国军队毫无战斗力的图景。他承认他赞成的是一种"耻辱"的和平,暗指出卖波兰。但他相信:如果他的政府拒绝那样的和平而试图进行战争,就会被彻底消灭,而另一个政府就要接受甚至更坏的条件。但他无论如何不承认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有关俄国革命神圣的利己主义这种更赤裸裸的论点。他并不忽视西方革命的可能性,但他相信和平会加速西方革命的发展。西方还只在孕育着革命,而俄国革命已经是"大声啼哭的健康婴儿",必须保护婴儿的生命。

眼下,托洛茨基的方案给对立的两派提供了一个交合点,尽管每一方内心所能接受的只是方案中适合自己一方目的的那部分。主战派之所以采纳它,是因为它使媾和成为不可能,而列宁和他那派人认为这一方案会使主战派陷入绝境。列宁愿意让托洛茨基再次为争取拖延时间试试身手,特别是因为托洛茨基正尽力证明革命战争的不现实性以此影响左派共产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授权托洛茨基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拖延签署和约,只有季诺维也夫一票反对。于是托洛茨基提出自己的决议案:"我们中断战争而不签署和约——我们复员军队。"9 人投票赞成 7 人反对,这样党正式授权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推行他的政策。①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报告。大会的情绪以压倒之势赞成战争,列宁对此也无可奈何。甚至托洛茨基在演说中也更加强调他反对媾和甚于他反对战争。一位英国目击者写道:"托洛茨基的发言是那天晚上重要的发言,(代表们)都凝神……倾听他的报告。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因为他的影响正处于巅峰。……这位正在向外部世界讲话的人体现了俄国革命的意志。……托洛茨基结束他的重要发言时,参加会议的无数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99 - 207 页。

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起立……庄严地高唱《国际歌》,激情的爆发是自发的,和笔者一样的目击者也都精神为之振奋……。"[①] 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托洛茨基的报告,但没有作出决议,以免束缚政府。

托洛茨基在动身回布列斯特前同列宁私下商定,对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决定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他答应在一定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政策,以便支持列宁的主张。只要德国人愿意让他避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抉择,托洛茨基的策略就是有意义的,列宁追问说:如果他们选择恢复战争行动,会怎么样?列宁确信,这是一定要发生的。托洛茨基对这一危险有些忽视,但如果证明列宁的担心是对的,他就同意签署和约。他和列宁认为,应该允许违反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那项浮泛于形式上的决定,因为那项决定模棱两可,不明确,对"不战不和"的表决没有给列宁考虑到的极其重要的意外情况作出规定。但他们私下商定的策略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也是模棱两可的。列宁以为托洛茨基答应过:只要他接到最后通牒或面临德国重新进攻的威胁时就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则认为只有德国实际发动新的进攻后他才答应接受和约的条件;而且即使在那时,他也只能接受同盟国各国迄今为止提出的那些条件,而不是他们后来提出的更为不利的条件。

1月中旬,托洛茨基回到布列斯特的谈判桌前。此时,德国和奥地利国内的罢工与要求和平的示威已被镇压或已停止了;因而他的对手在与他谈判时怀有新的自信。他打破常规,要求邀请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布列斯特来,但无结果;[②] 他要求准许

---

① M. 菲列普斯·普赖斯:《俄国革命回忆录》第224-225页。

② 德国政府刚刚拒绝社会民主党领袖前往斯德哥尔摩,因为他们想在那里与俄国革命领袖接触。

他本人去维也纳同曾在奥地利国会反对霍夫曼将军在布列斯特所作所为的维克多·阿德勒接触,也无结果;不过,准许他去华沙作短暂访问;他因捍卫波兰的独立而在那里受到热烈的欢呼。

在这部分讨论中,乌克兰和波兰的问题特别引人注目。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幕后准备同乌克兰拉达单独媾和。同时,布尔什维克全力在乌克兰促进苏维埃革命:拉达的命令在基辅仍然有效,但哈尔科夫已在苏维埃政府的统治下了;而且哈尔科夫的一个代表陪同托洛茨基一起回到布列斯特。乌克兰各党派的政治态度出现了令人惊奇的180度的转变。那些在沙皇、克伦斯基统治下主张同俄国建立联盟或联邦的人这时却一心要分离出去,而那些曾经鼓励分离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这时却要求联邦制。分离主义者变成联邦主义者,反过来,联邦主义者变成分离主义者,这并非出于乌克兰人或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动机,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同俄国现行的政府体制脱离或联合。同盟国各国希望从这种政治立场的反向变化中得到好处。他们装扮成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保护者,是希望从乌克兰攫取他们急需的粮食与原料,还希望把关于自决的辩论引到对俄国不利的方向。虚弱无力、缺乏自信、濒于崩溃的拉达不顾曾向协约国宣誓过的忠诚而试图依靠同盟国。拉达代表团由几个十分年轻、肤浅的政客组成——用屈尔曼的话说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① ——他们刚从边远落后地区浮现出来,陶醉于在这场重大的外交把戏中指派给他们的角色。

即令在这一阶段,托洛茨基也并不反对让拉达参加会议。但他正式宣布,俄国不会承认它和同盟国各国的单独协定。他还警告屈尔曼和切尔宁,说他们过高估计了乌克兰分离主义的力量。于是拉达代表卢宾斯基(Лубинский)对托洛茨基及苏维埃政府发

① 《屈尔曼回忆录》第531页。

动狂暴的攻击，指责他们践踏乌克兰的权利、用暴力建立他们自己的哈尔科夫和基辅政府。切尔宁在日记中记道："托洛茨基如此惊慌失措，真是惨不忍睹，他脸色苍白，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前方。……额头渗出滴滴冷汗。显然是因为他的同胞当着敌人的面辱骂他而深深感到耻辱。"① 托洛茨基后来否认他曾这样狼狈，不过切尔宁的话看来是可信的。托洛茨基肯定已认识到他的对手在搅乱自决权问题这一点上成功了。他心里可能疑惑，拉达的发言人声称乌克兰苏维埃并不代表乌克兰人民是否不无道理。② 这并不是说托茨基本人对把苏维埃的统治强加给乌克兰有什么顾忌，如果革命不扩展到乌克兰，俄国的革命就不能巩固，因为乌克兰深深地楔入俄国南北两部分中间。然而在这一问题上，革命利益第一次同自决权的原则发生冲突；因而托洛茨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问心无愧地呼吁自决权原则。

他用波兰问题进行回击，他质问，为什么布列斯特至今还没有波兰代表。屈尔曼认为波兰代表团的出席问题要取决于俄国是否先行承认波兰的现政府。托洛茨基说："你们还一再问我们是否承认波兰的独立。……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明确的。我们承认爱尔兰的独立吗？，我国政府承认……只是在眼下爱尔兰仍在英国占领之下。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并不等于承认挨饿的人已经吃撑了。"③ 承认波兰有权独立并不等于承认它在德、奥的监护下已经独立。然后，拉狄克站出来控诉德奥两国对他祖国的统治；他讲到把几十万波兰劳工押解到德国，押解的情况骇人听

① 切尔宁：《世界大战》第246页。

② 这是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的，从托洛茨基在内战即将结束时写给列宁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推论出来。托洛茨基直率地说，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开始时是以俄国派去的人而不是以当地人为基础的。他当时要求彻底放弃这种行政方法。

③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62页。

闻;还讲到政治压迫、关押或拘留波兰所有政党的领袖,包括拘留拉狄克的老政敌毕苏斯基(Pilsudski),当时毕苏斯基曾是站在德、奥一方作战的波兰地区司令,是波兰未来的独裁者。

在唇枪舌战的交手期间,1月21日托洛茨基接到列宁关于拉达垮台的来电和全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宣言。[1] 他亲自同基辅联系,查问事实,尔后通知同盟国各国,他不再承认拉达有权出席会议。

这些天是他在布列斯特的最后日子。相互指责、相互控诉已达到使谈判毫无结果、不能长时间拖延下去的地步。他在会议间歇时间里撰写《从二月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小册子,用以恢复精神,这是他的一篇比较次要的作品,是15年后他流亡王子群岛期间写成的不朽名著《俄国革命史》的初稿。最后,他在一封致列宁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宣布结束(谈判)而不签订和约。他们不能对我们发动进攻。即使他们进攻我们,我们的形势也不会比现在恶化。……我们必须得到您的决定。我们还能拖延谈判一两天或三四天。以后他们一定会停止谈判。"[2] 事变不允许他等候彼得格勒的新决定;而在他离开彼得格勒之前表决的结果无论如何给他计划中的行动留下了足够的自由。切尔宁伯爵仍然表示要做调停人,甚至到托洛茨基住处拜访,他警告托洛茨基说德国新的进攻迫在眉睫,请求托洛茨基说明最后的条件。托洛茨基回答说,他准备屈从武力,但绝不会证明德国人的行为是道德高尚之举,如果他们想要并吞,就让他们去并吞外国吧!但他们不要指望俄国革命会饶恕或粉饰他们的暴行。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64页。

② 托洛茨基向韦勒·本奈特先生证实这封信的真实性。参见《被遗忘了的和平》第185-186页。

谈判中止前最后一天，同盟国各国制造既成事实：他们同拉达单独签订和约。托洛茨基抗议说："我们曾正式通知过对方拉达已被推翻的消息，但他们却跟一个并不存在的政府继续谈判。在通知之后，我们曾向奥匈帝国代表团建议——这是我们在秘密，但完全是正式的会谈中提议的——他们应派一个代表去乌克兰，该代表会亲自看到拉达的垮台……但我们已被告知，条约的签署不能推迟。"[①] 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说他们是在同一个领土没有超过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房间大的政府签订和约。屈尔曼自诩公正地声称，德国报告的"可靠性无可怀疑，但它和这个信息截然相反"。[②] 这并不妨碍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据摆在我面前的报告来看……不幸的是，认为托洛茨基的话不无根据是有理由的。"[③] 同乌克兰单独媾和，不过是同盟国各国加强控制乌克兰的一个借口；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与他们的乌克兰合伙者的信任状是不相干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认为不能继续谈判下去，因为继续谈判就等于默许这一花招和默许这一花招所带来的一切遗患，即推翻乌克兰苏维埃并导致乌克兰分离。

第二天，在分组委员会上发生了驰名遐迩的场面：霍夫曼将军展示一幅大地图，上面标明德国想要兼并的全部领土。因为托洛茨基说过，他"准备屈服于武力"，但不会帮助德国人维持他们的面子。将军显然相信，直率地声明德国索取领土的要求也许是实现媾和的捷径。同一天，1 月 28 日，即公历 2 月 10 日政治委员会重新召开会议时，托洛茨基起来作最后声明：

---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 178－181 页。

② 同上，第 182 页。

③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 2 卷第 213 页。

分组委员会的任务……是要说明对方提出的国境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最低限度地保证俄国人民的自决。我们听过我国代表们的报告，因而……决定的时刻到了，各国人民焦急地等待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结果。他们问，由统治阶级的自私和权力欲挑起的空前的人类自我毁灭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如果说，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曾是为自己而战的话，那么这话早已过时了。英国夺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及耶路撒冷时，它进行的不是自卫战。德国占领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夺取蒙松群岛时，也不是自卫战。这是一场瓜分世界的斗争，现在这点已很清楚，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我们再也不愿参加这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了，在这场战争中，占有阶级公然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要求。……

在期待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来临时……我们正使我国军队和人民退出战争，我们的农民士兵今年春天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耕种，这些土地是革命从地主那里夺来并分给他们的。我们的工人士兵要回到工厂，不是制造破坏性的武器，而要制造建设工具，跟耕地的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

当同盟国各国的代表们仔细听着托洛茨基这些富有激情的话语时，本来还准备用“吼吧！狮子”向他欢呼，他们甚至这时还希望这是他最后的吼声，吼声之后就会听到投降者的啜泣。看来，他们逐渐才明白了托洛茨基声明的含义，当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现在目睹的是一幕令人痛苦的历史上罕见的悲剧时，紧张得连气都透

不过来了。[①]

> (托洛茨基继续说)我们正退出战争。我们向各国人民和政府宣布这件事。我们命令我们的军队全部复员。……同时我们宣布,德国和奥匈帝国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在内的各国劳动群众都否认这些条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库尔兰和爱沙尼亚等国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对他们的渴望的粗暴践踏。这些条件对俄国人民是不断的威胁。全世界人民大众在政治觉悟或道德本能的指引下都一致拒绝这些条件。……我们拒不签署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刀剑写在现存各民族肌体上的条件。[②] 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人带来压迫、不幸和灾难的和约上签字。

一位研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历史学家写道:"当托洛茨基强有力的呼声的回响静止下来时,没有一个人说话。整个会场寂然无声,在这一戏剧性变化的无畏精神面前,人们惊呆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霍夫曼一声突然的喊叫打破了令人惊异的沉寂,他怒不可遏地喊道:"恬不知耻!"屈尔曼说必须召开全体会议,但托洛茨基予以拒绝,说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接着,布尔什维克就离开了会议室。在沮丧的缄默中,不知所措的同盟国各国代表们

---

① 第二天,德国首席法律专家克吕格尔告诉越飞说,他找过历史先例,只找到了一个,即在远古波斯-希腊战争中的先例。参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一书附录——越飞的回忆,第262页。

②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207-208页。

简直难以相信他们听到的话,于是也散了。"①

然而,在代表们散开前又发生了一些情况,而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其全部意义,它们却证实了列宁所最担心的事。屈尔曼声称:鉴于已发生的情况,定要恢复战争行动,因为俄国军队的复员并无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关系重大的只是拒绝签署和约。托洛茨基把屈尔曼的这些话看做是空洞的威胁;他回答说,他认为德奥两国人民不会让它们的政府去继续打这场显然找不到任何自卫借口的战争。当屈尔曼询问苏维埃政府是否至少要准备与同盟国缔结法律、贸易的关系以及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跟俄国保持接触时,这是他本人给托洛茨基提供了不理睬威胁的某些理由。按照托洛茨基自己的观点,他应该这样答复这一询问:这该由同盟国承担尊重"不战不和"状态的义务。但他没有答复,却轻蔑地拒绝讨论。

他在布列斯特又逗留了一天,听到霍夫曼和职业外交家们之间争吵的风声,霍夫曼坚持恢复战争行动,而文职外交家们则宁可接受不战不和状态。看来,文职外交家们已当场得胜。因此,托洛茨基带着对自己成功的坚信和自豪回到了彼得格勒。这时候,我们眼前这个人物展现了他的全部力量和弱点。"(他)单枪匹马,在没有任何后盾的情况下去挽救一个混乱中的国家,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而他在一年之前还是一个流亡纽约的并不显眼的记者,此时却战胜了半个欧洲的所有外交能手。"② 他给人类第一次上了一堂真正公开外交的重要课程。但同时却让乐观主义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他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竟至不肯听听敌人的警告。尽管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竟然这样固步自封,这样迷恋自己的理

① 韦勒·本奈特:《被遗忘了的和平》第227-228页。

② 同上,第166页。

想,这样陶醉于自己工作的惊人的感染力,以至轻率地忽略了它的不足之处。当托洛茨基还在回彼得格勒的途中时,霍夫曼将军得到鲁登道夫、兴登堡和德皇的支持,已经向德军发出进军的命令了。

2月17日,[①] 德国开始进攻,没有遇到抵抗。霍夫曼写道:"这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场最好笑的战争。战争几乎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列车上载上几名携带机枪的步兵和一门大炮,冲向下一车站,夺取了那个车站,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另一支分遣队乘火车继续前进。"[②] 当德国进攻的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时,党中央委员会经过8次投票表决也未能对摆脱处境的出路问题取得一致。中央委员会中主和派与主战派势均力敌。托洛茨基的一票可以打破僵局。的确,在这一天和第二天,即2月17日和18日,他,而且只有他能做出重大的决定,可是他不肯加入任何一派。

他的立场非常复杂。他的表现和讲话使许多人认为他就是主战派;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他实际上更接近的是主战派而不是列宁派。但是他也曾私下答应过列宁:一旦德国恢复军事行动,他会支持媾和。但他仍然不相信这一时刻已经临头,2月17日,他同主战派一起投票反对列宁要求立即重新进行和平谈判的提议。尔后他又同主和派一起投票反对革命战争。最后他提出自己的动议:建议政府在德国进攻的政治结果和军事结果变得确凿无疑后再开始谈判。他的动议因为主战派投票赞成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得以通过,而这一票就是托洛茨基自己的一票。于是列宁提出问题:如果证明德国进攻是事实,如果在德奥两国国内反对进攻的革命没有

---

① 1918年2月14日俄国开始采用公历,从此以后,本书所有日期都用公历。

②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187页。

发展,和约应否签订,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①]

次日一早,托洛茨基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研究最近的事件。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皇太子刚刚向全世界广播说,德国保卫所有国家,包括使它的西方国家敌人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染。据报告,几个师的德国军队已从西线开到俄国。德军飞机已在德文斯克上空活动,预料会进攻雷瓦尔。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将是一场全面的进攻,但是这些情况都尚未证实。利奥波德皇太子的广播讲话表明德国与协约国之间有勾结的可能性,但也不过是可能性而已。列宁急切地重提立即同德国接触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行动,我们不要丧失时间。不是战争,革命战争,就是和平,二者必居其一。"托洛茨基因为不知道"进攻是否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爆炸性事件",仍然认为求和为时过早。列宁的提议又一次以一票之差被多数否决。

2月18日这一天的早晚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托洛茨基召开中央委员会晚间会议时,他报告说,德国人已夺取德文斯克,而进攻乌克兰迫在眉睫这一说法正广为流传。他仍在犹豫,提议要试探同盟国的要求,但不要求和平谈判。列宁回答说:"人民对此绝不会理解,如果是革命,就应该宣战和停止复员,……我们在这里写公文,而德国人却在抢劫仓库和车厢,……如果我们把战争当儿戏,就会使革命断送在德国人手里。历史将告诉人们,是你们断送了革命。我们本来可以签订对革命毫无威胁的和约。"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发言语气跟列宁相同。斯大林说:"如果他们像飓风一样猛烈地开火5分钟,我们在前线的士兵就无一生还……我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提议,像他那样提出问题,在文学上倒是不错的。"然而主和的极端派季诺维也夫此刻却疑虑不安起来。列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26-229页。

宁的态度是：即使失去乌克兰也要争取和平，而季诺维也夫却不想走这么远。[①]

托洛茨基三次发言反对求和，三次提议只进行试探。但当列宁再一次提出他自己的动议时，使每个人都吃惊的是，托洛茨基没有投票赞成自己的提议而是赞成了列宁的提议，主和派以一票的多数获胜。新的多数一方要求托洛茨基和列宁起草致敌方各国政府的电文。当天深夜，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开会；主战派在会上再一次占了上风。但在政府里，布尔什维克在票数上压倒他们的盟友；第二天，2 月 19 日，政府正式求和。

忐忑不安、不知所措地过了 4 天后，德国的答复才到达彼得格勒，那 4 天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同盟国各国政府是否会同意重新谈判或按什么条件重新谈判。它们的军队仍在进攻，彼得格勒已暴露在德军面前，城里成立了一个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防御委员会。尽管他们正在求和，但苏维埃不得不准备战争。托洛茨基转而询问协约国大使和军事使团：如果苏维埃政府重新进入战争，西方政府是否会援助他们。他以前作过这样的试探，但没有结果。[②]可是这一次，英国和法国的反应似乎积极了一些。托洛茨基发出求和电文的三天后，向中央委员会（列宁没有出席）报告说，英法两

---

① 关于这次会议现有两份记录。根据一份记录，季诺维也夫为媾和争辩说：俾斯麦同俄国合作的传统在德国尚未废弃，并说媾和对德国的利害攸关，如同对俄国一样。看一看在这几次仓促的辩论中未来苏维埃外交政策中有多少中心思想在此时初步闪现，是很有意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42 页。

② 罗宾上校说，托洛茨基在 1 月间曾提议美国军官应到前线去堵塞俄国货物被偷运到德国的漏洞，并把原料库搬到内地。托洛茨基当时说，即使他们单独签订和约，苏维埃政府也并无意加强德国。哈德：《雷蒙德·罗宾自述》第 64－65 页。罗宾的评述是这样的："协约国各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与其容忍托洛茨基存在，不如让德国人在俄国边境抢光俄国的原料。"同上引书第 70－71 页。

国建议进行军事合作。使他感到屈辱的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立即拒绝并指责他的行动。两派都反对他:主和派反对他——因为他们担心接受协约国的援助会损害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而主战派反对他是出于同一个革命道德动机,他们既反对同德国签约,也反对跟"英、法帝国主义者"合作。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说如果党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有权接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援助,那么他就不能留任。[①] 最后他使中央委员会转而赞成他的意见,列宁坚决支持他。

当德国的答复终于到来时,它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复电只给苏维埃政府 48 小时考虑答复的时间,而且谈判只有 3 天。条件比在布列斯特提出的苛刻得多:俄国要实施全面复员;割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退出乌克兰和芬兰。2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时,离作出决定的最后期限只不到一天了。但其结果再次要取决于托洛茨基的一票。在重新求和这一点上他虽已向列宁让步,但并没有答应接受苛刻得多的新条件。他并不同意列宁所认为的苏维埃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相反,他此时比以前更明显地倾向于主战派。他说:"列宁的论据完全不能使人信服,只要我们同仇敌忾,我们能够肩负起组织防御的任务,我们能够对付这一任务。即使我们被迫放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也决不当孬种。我们会使全世界继续处于紧张局势中。如果我们今天屈服于德国这份最后通牒,可能明天又要面临另一份最后通牒。……我们可以取得和平,但我们将会失去无产阶级中先进分子的支持。总之我们将使无产阶级分崩离析。"[②]

然而,尽管他预感到和平面临着凶兆,尽管相信苏维埃有自卫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43－246 页。

② 同上,第 248 页。

能力，他却再一次用他的一票保证了主和派的优势。

如果不对双方的组合和他们的论据以及动机作更仔细的观察，就不能解释托洛茨基使人大惑不解的表现。列宁力求为苏维埃赢得一个“喘息时间”，使他们能整顿内部并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为赢得喘息时间，他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退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并清偿赔款，他并不把接受这一“耻辱”的和约看做是最后的定局。他也认为革命战争不可避免；他不止一次援引1807年拿破仑向普鲁士口授的蒂尔西特和约，普鲁士的进步政治家冯·施泰因(Von Stein)和格奈泽诺(Gneisenau)曾利用该条约使他们的国家和军队趋于现代化，准备复仇。列宁正在学习他们的榜样；他也希望在喘息时间内德国革命可能成熟并因而摒弃和废除德皇的占领。

主战派与此相反，他们争辩说，同盟国不会容许列宁利用这一喘息时间：他们会切断俄国与乌克兰、高加索之间的交通线，使它不能得到这两个地方供应的粮食、煤炭和石油；他们会使俄国一半的人民受他们控制；会发动并支持反革命运动，扼杀革命。苏维埃在喘息时间里也建立不起一支新军队，他们不得不在战斗的过程中创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军队。不错，苏维埃政府也许会被迫退出彼得格勒，甚至退出莫斯科；但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退却并集结力量。即使人民将表明他们不愿为革命而战，就像他们不愿为旧政权而战一样——主战派的领袖们不肯承认这是当然的事——那么德国每前进一步，随之而来的恐怖与掠夺也会使人民摆脱厌倦和麻木，迫使他们起而进行抵抗，最后引起普遍、广泛、真正的群众革命战争的热情。一支令人生畏的新军队会在这一热情的潮流中诞生，革命不以悲惨的屈服为耻，定会得到复兴；革命会到处激起工人阶级的热情，会最终驱散帝国主义梦魇。

两派都认为对方提出的政策是有害的,辩论充满紧张激动的情绪。看来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认为,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赞成和反对每一方提出的行动方针都可以说出很多道理,但根据原则和革命道德,这些方针则都不可取。

从那以后,说列宁的政策具有现实主义的一切优点,说主战派代表布尔什维主义中十足的堂吉诃德式的一面,就成了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托洛茨基本人在事件后对这些老生常谈大力加以确认。但这种看法对主战派的领袖们并不完全公正。确实,列宁的政治创见及果敢精神当时已发展到天才的巅峰,而事变——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以及年底之前废除布列斯特和约——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而主战派往往在混乱的情绪冲动下行事,又没有提出一贯的政策,这也是事实。但是主战派领袖们竭尽全力为他们的理由作了强有力的、而且是现实主义的论证;他们的不少论点也为事变所证实。列宁取得的"喘息时间"事实上也有不少幻想的成分。德皇政府在和约签署之后尽其全力要扼杀苏维埃政府,只是由于它陷入西线的大规模战争而力不从心罢了。如果西方国家不与德国单独媾和,即使苏维埃政府不接受强加的、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德国也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布哈林和拉狄克提出论据反对俄国的屈服时,指出当时的情况已严重束缚德国行动自由。在这方面,当战争内情透露出来时,证明他们的判断比列宁的判断更为正确。仅占领乌克兰及南俄一些地方就拴住了100万德、奥军队。如果俄国拒不签署和约,德国充其量只能夺取彼得格勒。他们几乎不可能冒进军莫斯科的风险。[①] 如果他们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么主要力量都在这两个首都的苏维埃

① 鲁登道夫说,德国的纵深进攻"根本谈不上",已策划好的只是"一次强有力的突袭"。《我的战争回忆录》第447页。

政府就会发现自己突然处于极端危险、也许就是致命的危机中。[1]但这不是列宁与主战派争论的焦点，因为列宁也抱着极大的信心反复说，失去一个或两个首都对革命不会是致命的打击。

主战派领袖们提出的另一个论据说：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战争过程中、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平静的喘息时间内的军营里建立一支新军队，这既是奇谈怪论，但又是现实问题。这就是红军究竟如何才能建立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布哈林和拉狄克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中已预见到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今后几年中所要采取并推行的军事政策。[2] 正是因为俄国极端厌战，她不可能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内建立一支新军队。只有剧烈的震动，只有不可避免的作战必要而且是立刻作战的必要才能激发苏维埃政权中潜在的能量，并使之发挥作用，正因如此，这个在沙皇、李沃夫亲王和克伦斯基统治下精疲力竭、不能作战的国家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才能在内战与帝国主义干涉战争中持续作战几乎达 3 年之久。

主战派的弱点与其说在于他们的论据不足，还不如说在于缺乏领袖。它的主要人物是布哈林、捷尔任斯基、拉狄克、越飞、乌里茨基、洛莫夫-奥波科夫、布勃诺夫、皮达可夫(Пятаков)、斯米尔诺夫和梁赞诺夫，他们都是党内的出色党员，其中一些人才智超群，而且是杰出的演说家和小册子作家，另外一些人是果敢的活动家。但在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具有革命战争所需要的不屈不挠的意志、道义权威、政治战略才能、策略灵活性和行政能力。只要主战派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一派别就不是代表一项政策，而只不过是代

① 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认为无论哪一个首都屈服都意味着革命的“衰败”和革命的“衰亡”；就这一点说，作为主和派成员，他在某种程度上比列宁更为坚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48 页。

②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 32－50、69－73 页及同书各处。

表一种精神状态、道义的激动、文人的绝望呼声,即便这绝望的呼声在开始时曾引起党内多数人的激动而产生共鸣。主战派没有领袖,因而看中托洛茨基,请求他领导。顺便说一句,主战派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都是同他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事妨碍他满足他们的期望。尽管他认为列宁的政策与主战派的政策同样有其正当的理由,但他并不隐瞒内心的反感。使人尤为震惊的是,他在那些最关键时刻却运用他的影响支持列宁。

他不承担领导主战派的责任是因为意识到,这会使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裂痕激化为无可挽回的分裂,也许还会造成流血的冲突。那时他跟列宁就会成为两个敌对派别的领导人而彼此对立,而且不是在一般分歧问题上而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的分裂。列宁已经警告过中央委员会说:如果他们再次在和平问题的投票表决中压倒他,他就辞去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职务,要求党员群众反对他们。[①] 那时托洛茨基会是列宁唯一可能的继任人,成为政府首脑。但作为政府首脑,他要承担责任,在无望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很危险的战争时他就不得不镇压反对战争的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对列宁采取镇压措施。两派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后果,都克制着不去公然威胁对方。但在争论的话语中,这种威胁是不言而喻的。托洛茨基在关键时刻投票赞成列宁,正是为了防止党的队伍中发生内战的倾向。[②]

---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47－248 页。

② 20 年后,在肃反审判期间,指控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危机期间企图发动政变、反对列宁并逮捕列宁。这一说法旨在使对布哈林阴谋反对斯大林的指控变得可信而已,无须当真。不过,主战派领袖们一定考虑过,如果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多数后将会干什么。那时他们将不得不成立一个没有列宁的政府。如果列宁坚持反对战争,他们将不得不逮捕列宁。1923 年季诺维也夫说过:布哈林、拉狄克和左派社会

如果托洛茨基不这样做，也许看到的可能是类似法国大革命中巴黎公社派、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发生的三角斗争。在1793年，公社派和阿纳卡西斯·克洛斯（Anacharsis Cloots）像布哈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样是主战派，主张反对欧洲所有反革命政府的战争，丹东主张对普鲁士作战而同英国签约。他希望福克斯（Fox）会在英国取代皮特（Pitt）当权。罗伯斯庇尔力促国民议会对英作战，而力主同普鲁士签约。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联合反对公社派。但是他们在镇压公社派以后自己又闹翻了，断头台解决了他们的争端。

托洛茨基常常通过法国这面三棱镜来看俄国革命，他一定已意识到这个类似点。他不会忘记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的那封著名的信，其中用战争的命运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全部“脉搏的跳动”。[①] 想必他会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可能使人联想到丹东，而列宁扮演的角色则类似罗伯斯庇尔。一时间，仿佛断头台的阴影已经插到他与列宁之间。但这不是说，如果冲突进一步激化，托洛茨基会像丹东一样干出明知无望的蠢事来，或列宁会像罗伯斯庇尔一样想用断头台解决党内争端。类比就到此为止。显然，主战派如果胜利就将不得不镇压反对战争的人——否则它就不能应付它的任务。和平解决党内这次危机只有在主和派的统治下才有可能，因为他们比较能宽容反对派。在托洛

革命党人认真讨论过这一点。拉狄克否认这种断言，说关于逮捕列宁的说法仅仅是开玩笑而已。罗宾上校是一个完全没有偏见的目击者，他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他早在1920年就叙述过拉狄克同列宁之间一次对话的场面。他说拉狄克讲过，如果彼得格勒有500个有胆量的人，他们会把列宁关起来，便有可能进行革命战争。列宁回答说，他会先把跟他对话的人关起来（哈德：《雷蒙德·罗宾自述》第94页）。如果当真有反对列宁的阴谋在进行，拉狄克也不至急于事先给列宁报信，尽管这段对话事实上是开玩笑，但局势的逻辑却使这段对话具有严肃的含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第457－458页。

茨基看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考虑。为了消除断头台的阴影,他对原则与个人雄心作出非凡的牺牲。

他在答复列宁提出辞职威胁时所说的话与其说是讲给列宁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主战派听的:"我们不能在党分裂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战争的,特别是当那些主张战争的人不想接受进行战争所需的物资(即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①] "我将不承担投票赞成战争的责任。"他后来补充说,"列宁的看法中有不少主观成分,我不能肯定他是对的,但我决不愿做妨碍党的团结的事。相反,我将尽我所能维护党的团结。但我不能继续留任,不能承担处理外交事务的个人职责。"[②]

主战派的领袖们并没有托洛茨基的那种担心。已经担任契卡首脑的捷尔任斯基认为,党是强有力的,可以承受分裂及列宁的辞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领袖洛莫夫-奥波科夫要求托洛茨基不要被列宁的最后通牒"所吓倒",说没有列宁他们也能执掌政权。[③] 然而在辩论过程中,托洛茨基论点的严肃和急迫使主战派中有些人,如捷尔任斯基和越飞受到影响,因而他们让步了。列宁得到赞成媾和的7票,仍居于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但因为托洛茨基和主战派的三个领袖弃权,反对列宁的就只有4票,和约条件才得以通过。主战派弃权的三个领袖越飞、捷尔任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发表郑重声明,说他们不希望"进行一场同时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俄国资产阶级和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战争";并且说分裂纯粹是一场灾难,相比之下宁愿接受最苛刻的和约。[④] 但毫不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8页。

② 同上,第251页。

③ 同上,第250页 。

④ 同上,第253。

调和的主战派分子布哈林、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勃诺夫(以及出席会议的皮达可夫和斯米尔诺夫)指责赞成和约的决定是少数人的意见;他们辞去党和政府中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列宁试图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这一步骤,但也无效。托洛茨基打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此时则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安抚,他若有所思地说,他若知道他们要辞职的话,他是不会这样投票的。[1]

主和派虽然获胜,但受到良心折磨。2月23日,当中央委员会一经决定接受德国的条件,随即一致赞同立即开始备战。在任命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新代表团时,又发生悲喜剧的场面:中央委员会每位成员都躲避这份苦涩的荣誉;没有一个成员愿在和约上签字,甚至包括最强烈的主和派成员在内。最后,索柯里尼柯夫就任新代表团团长,但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却威胁说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经过列宁的耐心劝说他才让步。[2] 这件事解决后,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嘲笑中,斯大林后来曾为此道歉——要求中央委员会接受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辞呈,外交事务实际上已由契切林管理。中央委员会请他留任到和约签署之后。他只同意到那时以前不公开他的辞职,并声称他不会再在任何政府机关露面。中央委员会由于列宁的敦促责成托洛茨基至少要出席不辩论外交事务的政府会议。[3]

托洛茨基最近这一时期的努力、成功和挫败毕竟使他神经过于紧张。看起来,仿佛他在布列斯特所做的工作纯属徒劳;确实,

---

① 在同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场面。列宁向已被打败的对手保证:他们有一切权利进行反对和约的鼓动,对此斯大林反对说,既然他们目无组织纪律,胆敢辞职,他们就是自绝于党。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强烈反对斯大林的话,斯大林不得不收回他的话。《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54-255页。

② 同上,第259-266页。

③ 同上,第268页。

不少人就是这样想、这样说的。由于托洛茨基一再断言德国人不敢进攻,因而说他使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这种指责不能说毫无理由。他本是被崇拜的对象,一夜之间却变成罪犯。M.菲利普斯·普赖斯写道:"2月27日晚上,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在塔夫利达宫开会,托洛茨基对他们讲话。……他已经几天没露面了,看来人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然而那天晚上,他来到塔夫利达宫……像连珠炮似地向同盟国和协约国帝国主义倾泻其雄辩的嘲弄,说俄国革命是帝国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他讲完后又不露面了。传闻说,屈辱感压倒了他,使他痛哭失声。"①

※ ※ ※ ※ ※

3月3日,索柯里尼柯夫非常清楚地表明,苏维埃政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上签字的。不到两周时间,德国人占领了基辅及乌克兰广大地区,奥国人进入敖德萨,土耳其人开进特列比崇得。占领军在乌克兰推翻苏维埃,重建拉达,只是在不久以后为了制服拉达才让哥萨克头目斯科罗帕茨基(Скоропадский)当他们傀儡政府的首脑。暂时得胜的敌人向列宁政府头上倾泻他们的要求和最后通牒,每次的要求和最后通牒都比前一次更使人感到屈辱。最使人感到屈辱的最后通牒是要求苏维埃政府同"独立的乌克兰"立即签订和约。在乌克兰,人民,特别是农民奋起拼死反抗占领军及其乌克兰傀儡政权。苏维埃政府如果同后者签订单独和约,就只能拒绝支持全乌克兰人的反抗活动。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要求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列宁因

---

① 参见M.菲利普斯·普赖斯:《俄国革命回忆录》第251页。另见И.施泰因贝格:《当我做人民委员时》第208-213页。

为抱定来日复仇的思想，决定喝干这杯屈辱的苦酒。而每当德国挑衅时，党内和苏维埃内就又有人起来反对和约。布列斯特和约迄今未获批准，而且能否得到批准仍然悬而未决。

3月6日，在塔夫利达宫举行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决定是否将和约提请即将召开的苏维埃大会批准。会议进程严格保密，会议记录直到1925年才公布。会议气氛沉重而沮丧。外省来的代表发现政府机关因预料德国要进攻而正准备撤离彼得格勒，而这是克伦斯基政府都不曾采取的行动。人民委员们全都已在准备行囊——只有托洛茨基留下来负责断后，组织防务。代表们报告说党的声望普遍降低。[①] 不久前，要求和平的呼声如此强大，才使二月政权垮台，并使布尔什维克得到政权。而此刻，当和平已经到来时，负责争取和平的党却第一个受到指责。

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争论的中心点，列宁在一篇最尖锐的演说中力促批准和约。他争论的主要点是反对主战派，但也严厉批评托洛茨基的"重大错误"：他一厢情愿地相信德国人不会进攻，"不战不和"就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②] 主战派跳起来为托洛茨基辩护。拉狄克说："就连德国沙文主义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德国无产阶级反对兴登堡，赞成托洛茨基。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政策没有失败；这并非幻想，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政策。"[③] 在德进攻之后才签订和约，对苏维埃政府来说要好得多，因为没有人能怀疑，他们是受外力的强迫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接下来拉狄克却表达了主战派对托洛茨基的失望："单为这

① 官方记载："地方组织软弱涣散，大会反映了我们全党、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俄罗斯的情况。"《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4－5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同上，第71页。

一点人们就可以谴责托洛茨基,因为他在布列斯特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后来他却加入另一方去了。……因此我们有权谴责他;而且我们也是这么做的。"[①]

托洛茨基又一次而且更清楚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布哈林、拉狄克及其朋友们认为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救,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违反党的正式决定,这就必然会使争端更加激化。……做我们后盾的国家虚弱无力,农民消极被动,无产阶级情绪沮丧,而我们自己队伍的分裂又进一步威胁着我们。……我的一票举足轻重。……我承担不起分裂的责任。我曾认为,应(在德军面前)撤退而不应为虚幻的喘息时间而签署和约。但我本人不能承担党的领导职责……。"[②]

就记录表明的情况看,这是托洛茨基唯一一次公开说他不敢取代列宁而做党的领袖。他又补充说:"如果欧洲革命再继续推迟下去,分裂的危险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③] 他承认他对德国意图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他提醒列宁,他们俩曾同意中止和约谈判。他说,他非常尊重列宁的政策,但并不赞成列宁派把情况摆到全国面前的做法。他们助长了冷漠无情和失败主义,使工人阶级丧失斗志,要在丧失斗志的工人阶级中建立他们全都同意建立的新军队是极其困难的。他并不敦促大会拒绝批准和约,但屈服应该有限度:不应该再对列宁让步去跟德国的乌克兰傀儡政府签订条约。[④] 他的这几句话暗指最不祥的意外事件。他说,如果党软弱无力,因而不得不辜负乌克兰工农的希望,那么党就有责任宣

①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72页。

② 同上,第83页。

③ 同上,第84页。

④ 梁赞诺夫在辩论中说:"纵然托洛茨基试图抓住列宁的衣角去制止他,但列宁心里清楚:屈从和退却是无止境的。"同上,第9页。

布："……我们来得过早了，我们退入地下，就让切尔诺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去和乌克兰……结账吧。但我认为即使我们被迫撤退，我们仍须像一个革命党那样行动，为保卫每个阵地都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① 这是他到那时为止最强烈的暗示，认为俄国的革命也许是一次不合时宜的跳跃；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他的话含有最不祥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写到"来得过早"的革命家的悲剧命运。② 最后，他提起捷尔任斯基、越飞、克列斯廷斯基以及他自己"自我克制的伟大壮举"和在"布尔什维克团结的祭坛上"的"自我牺牲"，他对列宁说，按列宁的政策，有不少良机，同样也有不少危险，并说主和派"牺牲生命的唯一目的也许只是为了生存"。③

列宁再一次用辞职作要挟，他说，如果大会限制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他就辞职。他辩解说，既然是士兵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弱而不能救援被围困中的同志，而且也明白试图去援救则自己也要被消灭，那么拒绝援救那些被围困的战友就不算是背叛行为。苏维埃政府和乌克兰关系的处境就是如此。这一次同意列宁意见的人占绝大的多数。

不过，托洛茨基对列宁肯定和约是"必要的"这一动议提出修正——他提议用"可以容许的"这一说法来代替"必要的"。他在大

①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85页。

②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时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任何人陷入这样的困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68－469页。

③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86页。

会的讲台上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要修正的原因,他在为促成列宁的政策所做的一切之后,却又犹豫起来。他和列宁在幕后完全一致,他们再一次向协约国进行试探:如果拒不批准和约,他们是否会得到协约国的援助。列宁为期待协约国的回答,甚至推迟了对批准和约问题进行表决的苏维埃大会。他差不多快要向威尔逊总统表态:如果总统答应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援助许诺,他就拒绝承认布列斯特和约。[1] 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用含义隐晦的话说,形势的变化如此迅速,可能两天后他自己也要反对批准和约。[2] 因此托洛茨基希望大会不要用太僵硬的措辞起草决议。不过,列宁心里并没有指望协约国会有什么令人鼓舞的答复;他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托洛茨基鼓动下,他同意试探,旨在对事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他希望大会毫无保留地批准和约。这一点大会做到了。

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重提到自己的"自我克制的伟大壮举"和"自我压抑"。这些话使人想到他年轻时一个朋友的话:"托洛茨基的全部行为受他的自我支配,而他的自我则受革命支配。"[3] 在这位 38 岁的伟大著名人物身上仍然保留着他是 18 岁小伙子时的这一特点。他在这一戏剧性事件期间的表现证明他使个人雄心与爱好服从党的利益。但此时,当列宁完全胜利时,托洛茨基的自我却急躁不安起来;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大会讲坛上,他的自我大声疾呼要求补偿。继和约问题的大辩论之后,却是一场关于托洛茨基功过的荒唐争吵。托洛茨基的朋友和追随者克列斯廷斯基、越飞、梁

---

① 哈德:《雷蒙德·罗宾自述》第 135 – 139 页;韦勒-本奈特:《被遗忘了的和平》第 290 – 301 页。

②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 140 页。

③ 参见本书第二章。

赞诺夫提出一项正式动议，为他在布列斯特的政策辩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这一时刻提这样一项动议都是荒唐的。大会刚刚决定和平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期望会在这时对“不战不和”作回顾式的赞美。为托洛茨基辩护的人来自主战派，他们所处的环境使得这次示威性的辩解看起来仿佛是被打败的少数派的一次最后的突围。大会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做过的工作本无断然否定之意，但大会宁可不提这件过去的事。然而既已明白提出要求要大会表态，大会只能予以拒绝。大会否认了这项动议；这一否决伤害了托洛茨基的自尊和雄心。他声称，他已成为同盟国各国帝国主义者最痛恨的人，成为因要继续战争而受指责的人；而此刻党却有意或无意地为敌人对他的指责提供证据。因此他辞去党委托给他的所有职务。

这时，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这项任命如果说不是党的核心委员会提出的，那么就是由它决定的；大会力求希望至少要使托洛茨基感到部分的满意。在十分混乱的吵闹声中提出几项议案，进行过多次表决，但其结果都不明朗。列宁在这种有损庄严的争吵中始终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派向托洛茨基保证说：全党热烈感谢他通过布列斯特谈判为唤醒德国工人阶级所做的卓越工作，并认为他这部分活动是“完全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应该意识到党已改变态度，再对‘不战不和’这个公式进行辩论已没有任何意义。大会首先通过季诺维也夫的议案。尔后投票赞成拉狄克与此相反的动议，接下去又通过另一个和拉狄克动议相反的提案。托洛茨基抱怨说：“党竟然当着敌人的面否定自己代表的政策，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他赌气地提出一项狠狠谴责自己政策的挖苦性议案。大会当然予以否决，他就退出了争论。到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和列宁得到的票数最多。他既放弃他的政策，党仍然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　※　※　※　※

自从苏维埃批准和约以来已过了纷繁多事的4个月。人民委员会已迁离彼得格勒,移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协约国的外交使团也离开彼得格勒;但因反对和约,他们到外省的一个小城沃洛格达去了。托洛茨基已就任军事人民委员,着手"武装革命"的工作。日本人进攻西伯利亚,占领了海参崴。德国人镇压了芬兰革命,迫使俄国海军撤离芬兰湾。他们还占领了整个乌克兰、克里木及黑海和亚速海沿岸的地区。英、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捷克军团发动反苏维埃叛乱。俄国反革命势力在外国干涉者怂恿下不顾一切原则、肆无忌惮地重新开始生死斗争。不少不久前还指控布尔什维克为德奸的人,首先是米留可夫及其追随者,都已依靠德国的援助对布尔什维克作战了。[①] 饥饿已降临莫斯科及俄国北方的几个城市,从产粮区来的粮食来源均被切断。列宁下令全部工业国有化,号召贫苦农民委员会征用富农的粮食,用以供应城市工人。几起真正的动乱和几起可怕的阴谋都已经被镇压下去。

至今还未有过什么和约能像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给俄国带来这么可怕的痛苦和屈辱。但列宁在经历这一切磨难和失望之中终于养育了革命这个"婴儿"。他不会拒绝承认布列斯特条约;尽管他对和约的规定漠视不顾的不只是某一方面。他不断号召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起来造反。和约中虽有解除俄国武装的条款,然而他却授权建立红军。但他决不许追随他的人武装反抗德国。他把指导乌克兰苏维埃和企图秘密袭击占领军的布尔什维克召回莫斯

---

① 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3卷第72-90页。

科。[1] 德国的战争机器已摧毁了乌克兰的所有反德游击队。俄国赤卫队隔着边界看着他们痛苦挣扎，想过去援救他们，但列宁坚决制止。

托洛茨基早已不再反对和约了。他接受党的最后决定及其后果。人民委员会的团结及党的纪律同样都使他有义务支持列宁的政策。他这样做完全出于忠诚和献身精神，尽管为了忠诚他想必已付出过不少内心矛盾与不少剧烈苦恼的代价。布尔什维克的主战派群龙无首，一片混乱，陷入沉默。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和约的叫喊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响。3月间，在批准和约后，他们立即退出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包括契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和苏维埃执行机构中。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恼怒，他们不能长期地保持这种既反对政府而又对它负责的态度。

1918年7月初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定把事态闹大，并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反对和约的叫嚣又一次升温。乌克兰代表登上讲台陈述乌克兰游击队正在拼死斗争，要求援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Камков)和斯皮里多诺娃(Спиридонова)斥责"布尔什维克的叛卖行径"，叫嚣要进行解放战争。

卡姆柯夫和斯皮里多诺娃两人都是老民粹派型的著名革命家。他们曾手执炸弹跟沙皇体制斗争，他们为自己的英勇所付的代价是多年的单独囚禁和苦役。他们的发言与其说具有领袖与政治家的权威，不如说具有英雄殉道者的权威。他们拒不掂量正反双方的意见。他们要求胜利的革命具有他们自己已经树立起来的英雄气概和殉难精神。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党组织是完全没有这样盲目冲动的激情的。然而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姆柯夫的呼吁仍然

---

①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回忆录》第1卷第294－295页。

和的政委已遭杀害;莫斯科派去的调查团遭到枪击,他的朋友拉柯夫斯基一度是同拉达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也受到炸弹的威吓。“同志们,你们懂得这样的事是不能开玩笑的。目前他们是负责指挥红军的人……。”

这时,卡姆柯夫打断托洛茨基的话,高喊道:“克伦斯基!”另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大声喊叫“你自认为是新拿破仑”,托洛茨基回答说:“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服从资产阶级,而我在这里是对你们,即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负责。如果你们通过对我不信任案作出并执行不同的决定,不管这一决定我会不会同意,我作为革命战士将服从你们的决定。”他就是这样清楚地表明他的行动是为了和政府团结一致,因为他是政府的一员,而不是由于根本不同意反对派的意见。但他也警告反对派说,在这一阶段破坏和约只能有利于协约国或者只能有利于德国的极端军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甚至对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也不满意。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攻击他,但他向他们讲话时还是采取温和的劝说态度,并未指责他们应对煽动进行战争负任何责任。[①] 当斯皮里多诺娃骂他是“波拿巴式的军国主义者”时,他略带歉意地说:“同志们,我本人绝不是军人作风的爱好者。我已习惯于用新闻记者的语言,我喜欢这种语言胜过其他任何文体。但各种活动都有其后果,文体也不例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我不能不制止流氓恶棍们枪杀我们的代表,现在我不是新闻记者了,我不能像斯皮里多诺娃那样在这里发言时用那种抒情调子表达自己的感情。”

---

① 到争论结束时,托洛茨基才谴责社会革命党人,但就是在那时,他也清楚表明,他的谴责是针对个人而非针对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其实,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都已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破坏和平的图谋中。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75页。

和的政委已遭杀害;莫斯科派去的调查团遭到枪击,他的朋友拉柯夫斯基一度是同拉达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也受到炸弹的威吓。"同志们,你们懂得这样的事是不能开玩笑的。目前他们是负责指挥红军的人……。"

这时,卡姆柯夫打断托洛茨基的话,高喊道:"克伦斯基!"另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大声喊叫"你自认为是新拿破仑",托洛茨基回答说:"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服从资产阶级,而我在这里是对你们,即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负责。如果你们通过对我不信任案作出并执行不同的决定,不管这一决定我会不会同意,我作为革命战士将服从你们的决定。"他就是这样清楚地表明他的行动是为了和政府团结一致,因为他是政府的一员,而不是由于根本不同意反对派的意见。但他也警告反对派说,在这一阶段破坏和约只能有利于协约国或者只能有利于德国的极端军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甚至对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也不满意。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攻击他,但他向他们讲话时还是采取温和的劝说态度,并未指责他们应对煽动进行战争负任何责任。[①] 当斯皮里多诺娃骂他是"波拿巴式的军国主义者"时,他略带歉意地说:"同志们,我本人绝不是军人作风的爱好者。我已习惯于用新闻记者的语言,我喜欢这种语言胜过其他任何文体。但各种活动都有其后果,文体也不例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我不能不制止流氓恶棍们枪杀我们的代表,现在我不是新闻记者了,我不能像斯皮里多诺娃那样在这里发言时用那种抒情调子表达自己的感情。"

---

① 到争论结束时,托洛茨基才谴责社会革命党人,但就是在那时,他也清楚表明,他的谴责是针对个人而非针对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其实,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都已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破坏和平的图谋中。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75页。

至此,斯皮里多诺娃也放弃了“抒情调子”。这个身材矮小、身体虚弱的女人登上讲台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在叛卖,而且大声威胁他们说:“我要像过去那样手握左轮枪与炸弹。”这是仅仅两天之后的一场暴乱的预告,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一威胁的不同反应及当时的情景,萨多尔留下生动的描写。

> 列宁站起来,他那张不可思议的罗马牧神似的脸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而略带讥笑,当凌辱、攻击和直接威胁向他倾泻而来时,他从未停止过发笑,也不会不笑。在这悲剧性的境遇中,当他知道他的工作、思想、生命都危若累卵时,这样开怀爽朗的大笑令某些人觉得不合时宜,却使我感到他具有非常惊人的力量。常常是……甚至更尖刻的当众凌辱也只能使这种笑声暂且停一下,这使他的对手感到受辱和恼怒之至……。
>
> 托洛茨基站在列宁身旁,他也力图要笑,但愤怒、激动、焦急却使他的笑意一下子变成了痛苦的怪相,他那生气勃勃、富有表情的脸庞便黯然失色了,……而且那副梅菲斯特式的可怕面具也消失不见了。他确实没有当家做主的统治意志、冷静的头脑和绝对的自制力。然而他……却是一位比较宽容的人。[1]

当然,就列宁来说,满怀自信地面对反对者是比较容易的,他始终坚信只有媾和才能拯救革命。托洛茨基异常的脸色则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

这些激动的争论因 7 月 6 日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暗杀事件而

---

①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 396 页。

中断。暗杀者是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Блюмкин）和安德列也夫（Андреев），都是契卡高级工作人员，他们执行的是斯皮里多诺娃的命令，希望挑起俄德战争。[①] 紧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暴乱。他们逮捕了捷尔任斯基以及契卡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是在后者没带警卫来到暴乱者的总部时得手的。暴乱者占领了邮电局，向全国宣布列宁的政府已被推翻。但是他们既无领导，又无行动计划，经过两天小规模战斗后，他们就投降了。

7月9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复会，托洛茨基作关于镇压暴乱的报告。他说这次袭击使政府感到意外，在此前它把保卫首都的仅有的几支可靠的部队派到东线去攻打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了。政府本身的安全主要依靠的就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赤卫队，但正是他们发动了暴乱。托洛茨基能用来对付暴乱部队的只是由瓦采季斯（Вацетис）指挥的拉脱维亚步兵团，瓦采季斯是前总参谋部的上校，其时已成为红军总司令；还有一支由革命化的奥匈战俘组成的部队，率领这支部队的库恩·贝拉（Bela Kun）是未来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但这场暴乱的性质如果不从政治观点而从军事观点去看，几乎是滑稽的。暴乱者是一帮大胆而没有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员，他们的进攻彼此不能配合协调。他们最后不是屈服于武力，而是屈服于布尔什维克的说服。托洛茨基当时正在把赤卫队和游击队训练成一支集中化的红军，他利用这场暴乱作为示范教学的实例，证明他的军事政策的正确性。即使在此时，讲到暴乱

---

① 布柳姆金后来为他的行动感到后悔，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中十分出名，重新参加契卡。20年代他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但接受托洛茨基的劝告，继续为格别乌工作。托洛茨基流亡王子群岛时，布柳姆金秘密到那里去见过他，把他致反对派的信件带回莫斯科，但在他设法把在信件交出前，他就被捕并被处决（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

者时,他也是半带怜惜地说,他和其他同志在政府里曾为他们辩解,称之为“胡作非为的孩子”;[①] 但他补充说:“不能再给这样的孩子有胡闹的余地。”暴乱的头头被逮捕了,但几个月后又赦免了他们。处死的只有几个滥用契卡内部信任的人。

随着托洛茨基大力反击由他自己激情地反对和约所引起固执的余波,有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重大争论就这样收场了。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276页及以后各页。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它必然带有政治的特点，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所以，指挥战争，就其所表现的主要特色来说，本身就是拿刀代笔的政治，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战争本身的规律进行思考。”克劳塞维茨这段话说明，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战略与政治的一致性往往模糊不清，远非显而易见。在内战中这却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是政治规律支配着战争的各个阶段，支配着交战双方9/10的行动，并在战场上作出最后的裁决。1918年3月中旬，托洛茨基受命担当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时，他并没有为拿刀而放下他的笔来——他是刀笔兼用的。

他承担的工作显然是要凭空变出一支军队来。旧政权的武装

部队已经被消灭。旧军队中几支亲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仍在顿河和北高加索与刚刚组建的白卫军作战。但从军事上看,他们太不中用,政府宁可将他们解散也不愿设法把他们改造成为新的军队:政府生怕旧军队残部的无政府恶习可能传染给新军队,过去的军事大国就是这样分崩离析的。残存下来还堪作战的只有瓦采季斯上校指挥的拉脱维亚步兵团;除此以外,还有工人赤卫队和几支游击队,他们在热情的鼓舞下有时也不乏自我约束力,但很少或没有受过训练且往往缺乏组织性。他们的人数微乎其微,1917 年 10 月,彼得格勒赤卫队不过 4000 人,莫斯科赤卫队也不过 3000 人;但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①] 从 10 月以来,他们的人数实力并没有明显增加。红军就是在这样微弱的基础上开始成长壮大起来的,两年半后,其兵力已达 500 万人了。

单凭人数远不能说明当时的困难。最大的障碍是士气和政治方面的。当托洛茨基开始建立红军时,看来他对信奉过的一切都要憎恨,而对憎恨过的一切则要信奉。布尔什维克斥责军国主义,鼓励士兵憎恶纪律,视军官为敌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仇视军队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视那支军队为敌对利益的工具。他们的鼓动如此成功、势不可挡,最终致使他们自食其果。因此他们被迫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思想框架,尔后才能建立视为保存自己的条件的军队。群众的情绪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大杂烩:和平主义者对战争深恶痛绝;深信革命可以依靠赤卫队及游击队而无需建立正规军;认为选举指挥官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不可剥夺的权利。现在托洛茨基首次站出来说,士兵委员会不可能率领军队作战。在说到军队需要集中化和规范的纪律时,他的话听起来无异是对革命戒律的亵渎。

---

① 《苏维埃政权五年》第 154 – 155 页。

此外，所有政府机器都已完全垮掉，因而试图创立一支新军队看来毫无希望，也不现实。他从3个委员——波德沃伊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德边科——手中接管了他们主持的效率不高的陆海军事务委员会。自从11月以来他名义上主持全俄军事委员会，但布列斯特危机使他不能多关心这个机关。这个委员会在1918年1月15日已拟订了有关创立义务兵军队的法令，这项法令也同这一期间大多数法令、条例一样，仅是政府尚不能执行的一项原则性声明。没有征兵、送新兵入军营、供应他们军装和粮食的机构，没有军士、军官训练新兵。到了4月，即托洛茨基就任新职后一个月，他才开始成立他的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也就是征兵站；但是法令与执行之间仍然隔着一道鸿沟。十月起义后的5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在少数几个城市里开始对几百名赤卫队成员进行指挥职务的培训。

在托洛茨基就任新职时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含有他军事政策的主要成分。[①] 他首先向党和苏维埃的成员呼吁说，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有完成任务的希望。他要他们牢牢记住，革命必须从第一个破坏阶段过渡到第二个建设阶段。照他的原话说："工作、纪律和秩序将会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这一过渡不得不首先在战场进行，因为革命能否生存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败。他并非像机会主义者那样贬低破坏性的第一阶段，他说，第一阶段的破坏促使"俄罗斯个性的伟大觉醒"。革命第一阶段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就在于此。但"觉醒了的个性"在反抗以前的压迫的同时却暴露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反社会的特点："昨天作为大众中的一员还无足轻重，仅仅是沙皇、贵族、官僚的奴隶，是……机器……的依附物，是驮重

① 参见托洛茨基3月19日对莫斯科苏维埃的发言，3月21日的声明及3月28日在莫斯科党的会议上的发言。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

的牲畜。……这时既经解放,就格外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开始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①] 使觉醒了的人能习惯于自觉的社会新纪律,这是党的职责。因此党本身必须克服自己对军事专家的偏见,党员中有不少的人仍然把任何军队都看做是反革命的工具。创立一支羽翼丰满的军队还不是近期的任务,倒不如先为此积聚成一个核心。政府颁布法令,原则上是进行普遍的义务军事训练;但立即征召受训的大概只有志愿人员。党还必须克服支持选举指挥官和士兵委员会的粗鲁偏见,因为指挥人员和士兵委员会的选举并不是革命民主的本质。民主原则只要求政府应由群众选举和监督,并不要求群众僭取政府的职能和剥夺政府任命工作人员的权力,红军应该利用前沙皇军官来为自己服务。在防御中,仅有英勇、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正如工业需要工程师,农业需要合格的农学家一样,军事专家是防御所不可缺少的。"[②]

当那些干革命的人很不愿意执行旧政权的将军和上校们的命令时,将军和上校们也一样不愿把他们的技能与经验交给布尔什维克去使用。只有少数几个例外。第一个自愿要求服务的有名望的军人是前北线司令邦奇-布鲁耶维奇(Бонч-Бруевич)将军,他是被他的兄弟,一位著名布尔什维克作家争取过来的。托洛茨基委托这位将军组织总参谋部,这项任务根本不是革命头几天被任命为总司令的克雷连柯少尉所能胜任的。但是效法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军官很少。那些用正规军的思想习惯对待任务、惯于在正规军的刻板而秩序井然的框框中工作的人对革命的气候很不适应。拉狄克描写过 1918 年 4 月托洛茨基和这些军官的第一次会议。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 1 卷第 39 页。

② 同上,第 29 页。

在会议过程中，这些军官连续几天提出并讨论他们的意见，托洛茨基则洗耳恭听。他们提出的各种激励旧军队的计划都没有考虑到最近发生的心理剧变。尔后托洛茨基提出他的征募义务兵的计划，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耸肩和一片令人窘困的沉默而已。这些军官把旧军队瓦解的原因归咎于缺乏纪律，他们深信义务兵绝不会遵守纪律。托洛茨基的计划给他们的印象只是一个革命的业余军事爱好者的幻想。①

但托洛茨基所计划的是用政治目标支配军事行动的方针。他必须首先征募热心革命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完全自律地在军队中服役，并且以后还能依靠他们使其他人也遵守纪律。但即使征募义务兵也非易事。群集到征兵站来的人中混杂了些冒险家和唯利是图之徒，因而必须仔细把他们剔除出去。到 1918 年夏末托洛茨基才开始试行征兵，他征召到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少数产业工人。当头一批征募人数达到 1 万名时，人们曾欢呼这是个功绩。随着征兵的扩大，应征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而工人不愿入伍的情况开始暴露出来了。但进行劝说和呼吁阶级团结多半还是有效的。只有当军队的无产阶级核心确立起来时，托洛茨基才开始征召农民，首先征召贫农，尔后再征召中农。这些人在内战中往往大批地开小差，他们的士气上下波动得很厉害。②

随着苏维埃控制地区频繁而突然的扩大和缩小，军队状况也周期性地时起时伏，这一过程在各省之中、在不同的时间内曾反复出现。因此，一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红军队伍都参差不齐。红军组建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常是重叠的。千锤百炼、纪律严明的

① 卡·拉狄克：《肖像和抨击性小册子》第 31 - 32 页。

② 富农跟城市资产阶级一样只能在辅助部队和劳动部队服役，因宗教原因拒服兵役的人被免除兵役。

师团同那些仅比武器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好不了多少的部队并肩作战。这一情况使在全面动乱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特有的紧张与不稳定更加严重了。尽管如此,尽管经常短缺军火、制服、皮靴,也尽管还有饥饿和流行病,红军仍能顶得住种种考验,其原因就在于这一事实:红军是建立在若干围绕同一个核心、逐渐扩大的集团之上的,每个集团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革命所表现的忠诚各不相同。在每个师团中的布尔什维克内部核心领导着无产阶级分子,并通过他们领导动摇不定的农民群众。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提交了他的计划。[①] 当他讲到雇用军官这件事时,孟什维克高声抗议。唐恩叫道:"拿破仑之流露面了!"马尔托夫斥责托洛茨基为新的科尔尼洛夫铺平道路。这些指责因出于一个几乎把革命断送给科尔尼洛夫的党之口,是不会使人相信的。[②] 更严重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

---

① 托洛茨基提交执委会的法令是以如下的话开始的:"必须使人类摆脱军国主义,摆脱各民族间野蛮的流血战争,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普遍裁军、持久和平、实现地球上各民族的兄弟般的合作。"(《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23－124页。)同时,执委会还批准托洛茨基起草的红军誓词:

"我是劳动人民子弟,苏维埃共和国公民,我接受工农军队战士的称号。

"我向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宣誓,我保证不辜负这一光荣称号,认真学会使用武器。……

"我保证严格不懈地遵守革命纪律……

"我保证力戒并制止其他同志可能损害并降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尊严的行为,保证全心全意为解放全体劳动人民这一伟大目标而斗争。

"我时刻准备响应工农政府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号召,……在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各民族兄弟般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中,我将不遗余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心怀叵测,违背这一庄严的保证,我甘愿遭受全体人民的唾弃,甘受革命法律的严厉制裁。"同上,第125页。

② 同上,第117页。

人的反对，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争论的问题。但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出现的反对是最持久而且最有影响的。驱使他们反对的动机很不一样。大多数反对过布列斯特和约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以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名义否定托洛茨基的政策。他们拒绝支持一支集中制的常备军，更不必说是一支由沙皇的将校指挥的军队了。这一派人在И.Н.斯米尔诺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率领下跳出来反对托洛茨基，正像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争论时反对列宁那样直率激烈；他们认为目前的反对活动是他们以前斗争的继续，因此拒不同意与旧政权的势力妥协，无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国内政策方面。

反对派的其他成分是由布尔什维克内部领导集团中的人组成的。这些人通常支持权力集中与纪律严明，把左派共产主义者看成是不负责任的制造麻烦之徒。他们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托洛茨基创建新军队的主意，但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请求前军官团军官应征。他们疑心军官们应征是为了从内部出卖红军，这点不是全无道理的；有些人则是因为现在要求他们把自己刚刚得到的军队中的权力地位与昔日的敌人分享而感到不满。疑心和不满交融成为在中央委员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就连那些同意雇用旧军官的布尔什维克内心也有强烈的保留思想；他们抑制的感情也常常发泄出来，拐弯抹角地反对托洛茨基的政策，但攻击的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细节和做法问题。

这两种反对倾向交错在一起，形成暧昧的联盟。他们谋求赤卫队游击队的政委与指挥员、普通工人、军士的支持，因这些人在革命高潮最初几个星期曾大显身手并被英雄主义的光环围绕着，他们对服从前沙皇的将军或其他任何军事权威极为不满。

在当前的争论中还包含有一个范围更广泛的问题，这就是有关新政府对待革命前的文明和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的态度问题，而文

明和知识分子是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思想、知识与高级技能的总体现。这个问题在军事领域里最为尖锐;而它对苏维埃生活的每个方面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布尔什维克和普通工人对专家极为厌恶,因为,当革命家在流放和监狱中度过一生中的大好岁月时,专家们却享有自由和特权。当他们听说革命要恢复沙皇"走狗"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社会地位及势力时,他们大为吃惊。然而这是革命开始要做的事,因为革命如果对知识分子进行报复,就不能不毁掉革命未来的基础。如果没有医生、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而这些知识分子绝不是太多),如果没有作家、艺术家,国家最后会沉沦到原始野蛮的境地,无论如何,到这样的境地是危险可怕的结局。因此有关"专家"问题的争论蕴涵着社会主义建设据以开始的文化水平的斗争问题。托洛茨基反复在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把它当成军事方面的权宜之计。他论证说,对革命占有的"文化遗产"一定要加以拯救、培育并发展;只要革命还不得不进行自卫时,就必须把军事技能和知识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他这方面的主张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占有很大篇幅,这些著作既属于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史,也属于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史。

反对托洛茨基政策的几个集团的结合之所以越发可怕,是因为列宁对雇用军官问题迟迟未作决断,尽管他自己非常强调坚持要体贴、策略地对待文职"专家"。依靠党的军事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军事部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政策。当该部的领导人,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的亲密朋友拉舍维奇狂妄地扬言说,党使用旧将军只是为要"像柠檬一样榨干他们后把他们扔到一边"时,冲突便公开化了。季诺维也夫说话的腔调也一样,好像就是要伤害军官们的自尊心、破坏托洛茨基征召他们的尝试。[①] 有一位姓诺维

① Ф.伊林-杰尼夫斯基:《当权的布尔什维克》第87－89页。

茨基(Новицкий)的将军曾主动声称愿意为布尔什维克服务,但后来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他拒绝合作,说他不希望"像一只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被扔到一边"。托洛茨基利用此事断然回击对军官们的攻击,他写道:"这些旧军官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认真工作,即令他们的观点都是保守的,但比起搞阴谋的假社会主义者更值得受到工人阶级的无限尊重……。"[①]

托洛茨基这样说并不只是急于要消除军官们的疑虑,他对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粗鲁无礼的语言感到由衷的愤慨。尽管在内战以后当雇用旧军官的必要性不那么迫切时,他仍然要求应对他们加以照顾。他认为,即令在新的军官团建立起来以后,仍应雇用他们,因为文明的、合理管理的社会不能浪费有技能、有知识、有长处的人才。他还出于自己对革命的伟大精神力量的信念而断定,就连受保守教育的人也一定会受革命的影响;他激烈地指责某些布尔什维克的胆怯无能以及他们那种狭隘的观念:一个人一旦当过沙皇军官就一定会对社会主义的号召力永远麻木不仁。

他自己力求使军官们牢记革命的精神伟力,虽然这伟力被革命的艰难所遮盖。因而他为军官们所作的某些辩解也是为革命辩护的最激动人心的话。下面这段摘自1918年他在军事科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是例子。这篇讲话主要讲学院的课程,但也有一些军事学院墙内几乎从未听到过的话:

不习惯于革命及革命心理的人们……当然以恐惧心

---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35页;伊林-杰尼夫斯基:《当权的布尔什维克》第89－90页。托洛茨基的话表面上是对非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说的,实际上则针对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说的。他明确否认党有"像榨柠檬一样把他们榨干"的想法。

> 情来看……革命事变表面出现的那种骚乱、任性、极端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在那样骚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就连最消极的表现,例如当士兵,昨天的奴隶突然发现自己是在火车头等车厢里,就撕下天鹅绒座套给自己做绑腿,就连这样的破坏性行为本身表现的也是人的个性的觉醒。受虐待、被践踏的俄国农民惯于被人扇耳光、受人辱骂。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坐在头等车厢里,看见天鹅绒座套;而他自己的靴子里却是发臭的破布;他撕下天鹅绒,说他也有权捞些好处。两三天后,一个月后,一年后——不,只一个月后,他已懂得他的行为的丑恶。而他觉醒了的个性……人的个性,将会永远活在他身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种个性适应社会,使它感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是一个号码、一个奴隶,也不仅仅是某个伊万诺夫或某个彼得洛夫,而是伊万诺夫这个人的个性。[1]

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智能极为自信,他也经常严厉批评应征入伍的将军们,批评他们依恋常规、目光短浅并有时表现出的无知。在坚持雇用旧军官的必要性的同时,他在为把以前的军士和普通工人培养成为新的军官团的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魄力和首创精神。他向军士们——今后"苏维埃共和国军官团的牢不可破的干部核心"——呼吁,告诉他们:在俄国革命中如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在背包里携带最高指挥官官杖的就是他们。[2] 到内战结束时,"沙皇"军官只占指挥人员中的1/3,其余的2/3都是从普通士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65页。

② 同上,第174-185页。

兵中提拔起来的;在这样提拔起来的人中,后来有不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升元帅。但在1918年,3/4以上的红军指挥官和行政人员是由旧政权的军官构成的;而在最高指挥层中所占的比例甚至更大。[①]

当然在军官中也有叛徒和准叛徒。有些军官等候时机投靠白卫军;还有些军官在调动部队时使之暴露,结果部队被消灭或打败;还有些军官给敌人总部传递重要的机密。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后不久曾在指控海军司令夏斯特尼阴谋破坏案的审判中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根据他的有力证词判处这个海军司令死刑。这一审判案的目的在于使初建军队的军人头脑里牢固地树立起任何一支军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某些行动必须视为背叛而必将严惩不贷;即旨在威胁那些同情白卫军的军官。在内战中,任何轻于死刑的惩罚都很难产生威慑效果;坐牢吓不倒那些想要背叛的军官,因为他无论如何希望对方胜利,认定对方一定会释放他、给他荣誉、奖赏他;或者他至少可以希望内战结束后得到赦免。托洛茨基的日程里充满了对白卫军代理人的严酷威胁。但是就连死刑威胁对前线军官也不是严重的威慑。托洛茨基命令将他们的家属注册,使那些想要背叛的军官懂得,如果他跑到敌人那边去,他的妻子和子女就会被留做人质。这是残酷的措施,而托洛茨基运用他那激动人心的雄辩使威胁产生最大的效果。他证明威胁是正当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革命就会失败,支持革命的阶级就会遭到白卫军的报复。在内战的恐慌、强烈的猜疑和激烈的情绪中,有不少人成为无辜的牺牲者;这使托洛茨基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其狂热的部下:恐怖的目的不是摧毁潜在的敌人,而是驱使他们为

---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79页。另见《历史问题》1952年第2期;Ю.Н.彼得洛夫:《军事人民委员》。

革命政府服务。

他在军官身边设置政委。这项制度和许多其他制度一样都能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先例,而且克伦斯基也曾任命过军队的政委。但在此以前,政委隶属于最高司令,其角色并不明确。托洛茨基把他们安插在每一级上,即从连长到总司令身边都设置政委。他还力图划清指挥官和政委的职责。前者负责军事训练和指挥作战;后者负责指挥官的行为的忠诚及部队的士气。[①] 军事命令未经双方签署一律无效。不论在理论上已把职责分得如何清楚,但军权却被分裂了。对立与猜忌是难以避免的。军官们不满政委的监督;政委则拒不听从一个上校或一个将军的安排,他们在政治上是他的下属而在军事上则是他上司。托洛茨基力图保持两个集团的平衡,但有时在政委眼里他是军官们的保护人,而在军官看来,他又是政委的主要唆使者,加之他做事独断专行,所以树敌过多。不过他在军官中获得不少忠实的拥护者,他们感激他为他们恢复名誉;在政委中也有人认为红军的实力和政治凝聚力应归功于他的计划。这种体制虽然不无摩擦,但总的来说是起作用的;而且也设想不出其他的取代办法。若对旧军官的领导不加监督,红军在政治上就会瓦解。在布尔什维克的外行指挥下,红军就会在战场上注定被消灭。对这一体制的作用作过虽然勉强却是最充分赞扬的人,恰是这一制度的手下败将邓尼金,他说:"苏维埃政府应以其巧妙手段自豪,它用巧妙手段制服俄国将军和军官们的意志和头脑,使他们成为虽不情愿但却唯命是从的工具……。"[②]

建立集中制的红军和确立统一指挥的任务尚有待完成。托洛

① 参见托洛茨基1918年6月在莫斯科第一次政委大会上的发言,载《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30页及以后各页。

② 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3卷第146页。

茨基继续解散赤卫队和游击队。乌合的游击队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游击作风”会传染正规部队。[①] 最后，托洛茨基要求彻底解散游击队，并威胁要严厉惩罚那些愿意收编游击队的指挥官和政委。他坚持把全军组织成编制统一的师团。这就引起同游击队的冲突，尤其引起同由马赫诺率领的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数不清的冲突。但就连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师团也只是口头拥护集中领导和统一编制。集中制又必需服从“沙皇”的将军，许多布尔什维克对实施集中制就越发憎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断公然表示反对。一个不大公开但却更加有力量的反对派核心是伏罗希洛夫(Ворошилов)指挥的第十军，该军驻扎在察里津，该市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　※　※　※　※

到1918年年中时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仍然还没有一支军队，如果当时外国干涉已发展到后来的规模，或者如果白卫军已准备就绪，苏维埃的形势就危急了，但事变的进程不知怎么却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双方阵营用以集结布置武装力量所作出努力的节奏和速度大致相同。白卫军与红军一样也是刚刚开始建立。德国的推进仅限于南方的边缘地区，而协约国的军队只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等遥远的边境地区登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中部相对安全地巩固了他们的政权。这种情况是他们到那时为止

① 为争取与马赫诺和解，曾作过几次尝试，但都没有结果。托洛茨基在一次这样的尝试中公开说，指控马赫诺和白卫军勾结不是事实，但他根据军事和政治理由断然谴责马赫诺游击队的行径。最后，布琼尼的骑兵击溃并消灭了马赫诺的部队。参见《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210－212、216－217页；另见P.阿斯契诺夫：《马赫诺运动史》。

在军事上进展相对缓慢的部分原因。要加速这一过程就需要有紧迫而致命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突然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那里来了,该军团是在战争初期因急欲对奥匈作战而由战俘组成的。

根据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政府被迫解除了这个军团的武装。但解除武装是很勉强的,而且是马马虎虎执行的,因此这个军团仍然拥有大部分武器。英法两国开头提议把这个军团从俄国的一个港口撤出,苏维埃政府同意这一提议。但后来因协约国无法供给船只才决定让这个军团留在俄国,这样既可以用它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也可以用它来反对德国人,或者同时对付两者。托洛茨基保证这个军团享有充分安全;他甚至给军团的成员在俄国定居、工作的权利,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当这个军团无目的地穿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时,谣言四起,说布尔什维克要把他们引渡给德国人,这个谣言使该军团发起叛乱。他们拿起武器,在俄国亚洲的军事真空地带很快占领了广大地区,推翻苏维埃,并跟高尔察克(Колчак)的白卫军联合起来。[①]

在捷克人占领了伏尔加河上的萨马拉时,托洛茨基发出了第一道征召工人服义务兵役的命令。他匆匆把这支应征队伍从莫斯科派去攻打捷克人。其中大多数人几乎还没有受过最基本的训练,在开赴前线的途中才刚刚武装起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捷克人挺进时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乱。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可供布尔什维克调动的只有瓦采季斯指挥的拉脱维亚团以及库恩·贝拉领导的革命化战俘组成的部队,拉脱维亚军队在莫斯科镇压了暴乱后也被派去打捷克人。穆拉维约夫上校的背叛(对此尚有

---

① R.H.布鲁斯·洛克哈特写道:"……我可以肯定地保证托洛茨基的好意,倘若不是法国人愚蠢,我深信捷克人不会出事而且能安全撤出。"《马赫诺运动史》第272、285页。

争议)使伏尔加流域的形势更加恶化。穆拉维约夫上校曾挫败克伦斯基重新夺取彼得格勒的企图,在南方作战时大显身手,被任命为东线司令。穆拉维约夫是同情或自称是同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而布尔什维克则指控他同捷克人及高尔察克有勾结。有一种说法是,当他的假面具被戳穿后他自杀了,而按照另一种说法,他则是被处决了。与此同时,捷克人占领了乌法、辛比尔斯克及叶卡捷琳堡。

布尔什维克把沙皇及其全家拘留在叶卡捷琳堡,他们打算像审判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一样让革命法庭审判沙皇;托洛茨基为自己选择了向沙皇提起诉讼的首席检察官这一角色。但捷克人和高尔察克的挺进使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十分意外,他们声称已没有时间去安排沙皇及其全家的安全撤离。他们担心,沙皇可能被白卫军救走并将把所有反革命军队纠集起来,由于没有公认的权威,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反革命军队都是四分五裂的。因为记住了大概是马拉的名言:"可悲的是革命没有足够的勇气砍去旧制度的象征",布尔什维克在匆匆撤退之前把沙皇及其全家处死了。布尔什维克官方的说法称,就地处决是当地布尔什维克决定的,事后才由莫斯科批准。但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是有理由的。看来是当地布尔什维克先要求政治局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则仍建议把沙皇押送到后方,以便把沙皇送上被告席;但政治局拒绝冒险,命令执行死刑。这样,世人便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与沙皇面对面进行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审判场面。

捷克人和白卫军仍在继续前进。8月6日,红军仓惶撤离喀山,这是伏尔加河上游东岸的最后一个重要城镇。如果这时捷克人渡河成功,他们就能穿过开阔的平原而像潮水般地涌向莫斯科,而且一路畅通无阻。

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宣布共和国在危险之中。托洛茨基发出第

一道征召军官及军士义务服役的命令,并对军中玩忽职守或追求特权的共产党员采取严厉措施。[①] 喀山沦陷后两天,他乘专列亲赴前线,在此后的两年半中,列车就是他的住所和移动总指挥部。他在出发前当天颁布的命令中写道:

> 在奔赴抗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前线之际,我向所有……忠诚、英勇捍卫工人阶级的自由与独立的战士致敬……。
>
> 光荣属于英勇的战士!
>
> 同时我告诫如下:决不宽恕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特务、资产阶级雇佣军。我在军事人民委员的专列里起草这道命令时,革命军事法庭正在列车上开庭……[它]在这条铁路沿线地区范围内拥有无限权力。已宣布这个地区进入戒严状态。我已责成卡缅希科夫(Каменщиков)同志防御莫斯科—喀山战线,他已命令在穆罗姆、阿尔扎马斯斯维亚日斯克设立集中营……。兹告诫在所有军事作战区域内的苏维埃负责官员:我们对他们提出加倍要求。苏维埃共和国对玩忽职守、犯罪的政府人员的惩处将像对敌人一样严厉。……共和国在危险中,凡直接间接加剧危险处境的人都将严惩不贷。[②]

托洛茨基抵达斯维亚日斯克,这是位于伏尔加河西岸,喀山对面的一个小城镇,是红军渡河退却后最前沿的阵地。他看到前线实际上处于崩溃状态:大批士兵开小差,指挥官和政委疲惫沮丧。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74－185页。

② 同上,第233页。

托洛茨基的列车停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他从列车上下来，走进惊慌失措的士兵群中，他那滔滔不绝、热情雄辩的话语灌输到他们耳中，他把他们召集起来，有时还要亲自把他们领回前线去。在一次特别危急的时刻，连他自己的警卫队都加入了战斗，几乎只把他一个人留在车上。当地的政委们建议他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到停泊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汽艇上去；但他担心这样做可能影响军心，因此拒绝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把一支小鱼雷艇队带到伏尔加河上，他和水兵们登上一艘破旧的鱼雷艇，对喀山进行冒险夜袭。小舰队大部分被摧毁，但却把沿岸敌人的炮兵阵地打哑了，托洛茨基安然回到他的基地。

参加这场战斗的部队微不足道。[①] 正如在每一场内战的开头时一样，在这里，这场大革命的命运也取决于规模微小的战斗。在这类战斗中，领袖始终都是身先士卒：他的信仰、他的镇定沉着、他的英勇可以创造奇迹。他还要以个人表率来确立他的军事权威，很难指望一般军队的领导人会这样做。另一方面，当地指挥官在这样的战斗中始终在他的眼中；他们在现场取得的荣誉帮助他们得到梦想不到的提升和名望。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的友谊就是从斯维亚日斯克开始的，不久，他提升瓦采季斯为红军总司令。他在那里还注意到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Тухачевский）。也是在那里，他与喀琅施塔得水兵司令拉斯科尔尼科夫，政委 И.Н. 斯米尔诺夫及阿尔卡季·罗森哥尔兹（Аркадий. Росенгольц）的友谊联系越发密切起来。他在斯维亚日斯克时对 B. 梅日劳克（Межлаук）的组织才干很重视，而且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在提拔他。后来，梅日劳克变成他的敌人，当上了斯大林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在内战期间，

① 即使胜利后他们的队伍已大大增加时，红军人数也只有 25000 人，在托洛茨基到达前线之时，红军的人数肯定要少得多。

这些人——第五军的老战士跟托洛茨基的关系始终十分密切;他们形成一个与斯大林亲信的察里津集团针锋相对的集团。

托洛茨基对那些以英勇和才干著称的人大事赞扬,而对那些失职的人毫不宽容。他把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政委名叫潘捷列耶夫(Пантелеев)——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们在战斗最危急的关头擅自带着部下逃离前线。团长和政委二人都被枪决了。托洛茨基评论该事件时说:"红军士兵不是懦夫,不是损人利己者。他们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战斗。如果他们后退或作战不力,罪责在指挥员和政委。我预先警告过:任何部队擅自后退,首先要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部队指挥员……。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一律处决。我将亲自监督本命令的实施,特此告示全军。"[①]

在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未发表的通信中可看出,他对战争的细节多么关注。在一封信里,他坚持要求增援;在另一封信中,他要求派服从命令且"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到伏尔加河去——"这里不需要浅薄的宣传员"。还有一封信,他要求供应手枪和组织一支优秀的军乐队。他急于引发士兵的想象力与自豪感,因此要求派群众喜爱的讽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到前线去,并要求政府设立勇敢勋章。布尔什维克既已废除一切勋章,因此对这最后一项建议感到迟疑,这从托洛茨基等得越来越不耐烦、三次反复要求可以推想得到。这些书信还透露了可以说明托洛茨基无情的难以理解的例子。8月17日列宁写信告诉他说,由法国、美国领事支持的红十字会要求准许通过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下诺夫哥罗德把食物运到白军占领的萨马拉。列宁认为没有理由反对。但托洛茨基拒不准许红十字会越过战线。他回答列宁说"只有傻子和骗子"才会谈论与白军和解的可能性。他补充说,他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235页。

不想让红十字会成为喀山的“资产阶级总部”被炮击(焚烧成焦土)的见证人。不过托洛茨基在炮击前曾向喀山的劳动人民公开发出警告:“我们的炮兵……尽力避免损坏穷人的居所和生活区,但在残酷的战斗中可能发生意外事故,我预先通知你们迫在眉睫的危险。……把你们的孩子从城里迁出……在苏维埃地区找寻避难所——我们给予所有劳苦人民兄弟般的款待。”[①]

9月10日,红军进攻并占领了喀山。两天后,图哈切夫斯基率部队占领了辛比尔斯克,他在一封简短的电报中向托洛茨基汇报:“命令已经执行。辛比尔斯克业已收复。”10月初,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已重新在苏维埃统治之下了。

这一胜利令人振奋,特别是因为这一胜利恰好和严重的政治危机同时发生。一个叫范·卡普兰(Ф.Капла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对列宁行刺。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暗杀了乌里茨基。布尔什维克以宣布红色恐怖和命令枪毙人质来回击。在这些事件期间,托洛茨基应召回莫斯科。他看到列宁的伤势正在复原,他在使列宁和苏维埃执委会对战局前途放心之后便重返前线。大约与此同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试图重新召开已被解散的立宪会议,并在捷克人和高尔察克的庇护下在萨马拉成立一个敌对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中有相当的影响;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恢复立宪会议,也是给布尔什维克带来麻烦的一种危险。红军夺回伏尔加河流域才消除了这种危险。切断了农民对立宪运动的追随,就使这个运动变得无足轻重。社会革命党人后来发现自己在受高尔察克的任意摆布,不久,高尔察克宣布自己为独裁者(“最高执政者”),解散了这个残余议会,处决了它的几个头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44页;列宁关于红十字会的信发表在《列宁选集》第18卷第186页;托洛茨基的复信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之中。

头,迫使其他人到苏维埃地区寻求避难所。拥护立宪会议分子就这样在苏维埃与白卫军这两片磨盘之间被碾得粉碎。[①]

最后,伏尔加河上的胜利强有力地促进了红军的成长。严重的危险使苏维埃摆脱了自满和懒散;胜利使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军事人民委员部进行的初步组织工作已开始见效:指挥参谋部已建立起来,征兵站已发挥作用,军队的基本构架业已成型。

9月底,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把最高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问题。[②] 这个机构下设14个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军长和两三个政委组成。托洛茨基本人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他视察前线时,由他的副手埃·马·斯克良斯基(Склянский)处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托洛茨基本人对其副手的才能、干劲和勤奋大加赞扬,称他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斯大林时期写的内战史中几乎从未提到过斯克良斯基,尽管他从未卷入过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死于1925年。但已发表的列宁书信中,尤其是未发表的记录中对斯克良斯基处理军务的决定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经历是当时的非凡经历之一。他是基辅医学院年轻的毕业生,革命前应征入伍当军医,不久在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军事组织中成为杰出人才。托洛茨基到1917年秋天才结识他;斯克良斯基的创造性、热情奔放以及他对细节十分关注的特点给托洛茨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任命他为副主席。[③]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刚就任总司令的瓦采季斯,与瓦采季斯

① 维·切尔诺夫:《我在苏维埃俄国的苦难》。

② 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应跟以列宁为主席、托洛茨基为副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混同,后者是协调军事政策和国家政策的。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272-281页。

一起在伏尔加河地区工作的政委伊·尼·斯米尔诺夫和A. 罗森哥尔兹,在喀山指挥红色小舰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有穆拉洛夫和尤列涅夫。这样,喀山之役的胜利者此时都身居军事要职。

托洛茨基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整顿南方战线,并使之接受集中领导。这时白卫军的主要据点在南方。南方布尔什维克最强大的部队是伏罗希洛夫的第十军。但伏罗希洛夫拒不按照托洛茨基的统一方案彻底整顿他的部队。矛盾酝酿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在察里津的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度过了大半个夏季,一直支持伏罗希洛夫。稍后,9月里,斯大林担任了整个南方战线的总政委;前线同莫斯科的总部经常发生摩擦。托洛茨基决定结束这种局面。10月初,他任命旧军队的一位将军瑟京(Сытин)为南方战线司令,并且要求伏罗希洛夫服从命令。他还任命南方战线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成员施略普尼柯夫取代斯大林为总政委。在公布这些任命时,托洛茨基威胁说:"指挥员和政委中胆敢违反纪律者,不管过去功劳大小,立即交到南方战线革命军事法庭审判。"[1] 同时,托洛茨基提议任命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想以此平息他的不满或缚住他的手脚;因为斯大林早已反复向列宁抗议,反对托洛茨基对南方战线的处理。

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对立双方表面上和解了。但是,伏罗希洛夫自恃有斯大林的保护,继续蔑视上级的权威,无视新任司令的命令。以后不久,斯大林回到察里津。然而因为矛盾越来愈激化,列宁用外交手腕把斯大林召回莫斯科,于是托洛茨基出发视察前线。关于托洛茨基亲赴察里津的事,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他人曾多次描述过。他威胁要把伏罗希洛夫送交军事法庭,在他当时颁布的命令中,严厉批评伏罗希洛夫的司令部把自己的野心置于整个战线

---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347-348页。

的利害关系之上。[①] 伏罗希洛夫面对这一威胁同意服从他;因而托洛茨基除了派他信任的奥库洛夫(Окулов)任第十军司令去控制伏罗希洛夫以外,[②] 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军事形势,进一步公开了那场矛盾,并不惜给第十军抹黑。托洛茨基这样羞辱察里津集团,他们是绝不会原谅的。[③]

那个秋季的剩余时间和初冬托洛茨基都是在南线度过的。而此时他在莫斯科的对手,特别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力图进行反对他的活动,并且不无成功地影响了列宁。托洛茨基后来说过,他在前线时,后来的格别乌首脑明仁斯基(Менжинский)警告过他这个"阴谋"。明仁斯基说,斯大林力图让列宁相信托洛茨基把敌视列宁的人网罗在他的周围。托洛茨基向列宁坦率提出这个问题;他后来说,当时列宁感到为难,但不否认阴谋这一事实,然而列宁向托洛茨基保证自己完全相信他的忠诚。尽管如此,列宁拒绝介入这场纠纷并力求平息它。不久,他建议召回留在察里津负责监视伏罗希洛夫的奥库洛夫。托洛茨基拒绝召回他,而且这次要求免去伏罗希洛夫的司令职务,将其调往乌克兰,并给第十军任命新政委。列宁让步了,伏罗希洛夫不得不走。

察里津集团企图报复,私下说:托洛茨基是沙皇将军们的朋友,在军队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种控告在布哈林主编的《真理报》专

---

① 参见托洛茨基当时颁布的命令,日期为1918年11月5日,地点是察里津。《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250-251页。

② 1918年12月14日托洛茨基致列宁的电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的报告(这篇报告主要反驳对军队集中制的批评)中故意夸大红军的实力,他说:伦敦《泰晤士报》估计红军编制为50万人,是大大低估了。其实编制只有35万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332-341页;《苏维埃政权五年》第156页。

栏上出现。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发表伏罗希洛夫的一个下属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1] 这件事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为达到修改军事政策而进行的新尝试恰好同时发生。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雇用旧军官失败后,遂改变主张,要求政委应垄断指挥权,并建议军官只能作为顾问在政委领导下工作。这场暗中进行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甚至变得更加恶毒:竟有人传说托洛茨基把共产党员和政委交给行刑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成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在军中身居重要的政治职务,他们向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提出这样的指控(不要忘记拉舍维奇因为"把军官像柠檬一样榨干"的话曾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政委潘捷列耶夫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斯维亚日斯克执行,还有两个政委,即扎卢茨基(Залуцкий)和巴卡耶夫(Бакаев)险些被处决,这些案件引起中央委员会的注意。

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机密信中答复了这些指控。[2] 对枪决潘捷列耶夫一事他不予道歉,因为潘捷列耶夫是由于擅离职守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不过他补充说,就他所知这类事件仅此一起。他曾命令政委保存军官家属的户口登记册,以便使军官们知道,他们胆敢背叛,其亲属将成为牺牲品;对这一威胁手段最近有一种误解。有一次几个军官跑到白卫军那边去了,而结果证明政委们根本没有保存他们家属的户口登记册。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共产党员犯了如此玩忽职守的罪,理应枪毙。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显然以为托洛茨基的威胁是针对他们的。托洛茨基解释说这样的理解是十分荒唐的。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都知道他评价他们是红军中最优秀的政委。他的威胁"是泛泛而谈",并不

---

[1]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非常时刻》,署名是卡门斯基。

[2] 这封信没署日期,但根据内在证据显然是1918年12月底前写的,这封信没有发表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针对某个个人。

根据内在证据看来,托洛茨基的解释是真实的。他的对手除了潘捷列耶夫案之外举不出任何具体例证来支持他们的指控。然而,托洛茨基的命令确实充满令人胆战心惊的威胁;尽管他的命令可能只是要警告他的部下,却玷污了他的声誉;内战后好久,斯大林的追随者仍用与之相关的指控来反对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要求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军事政策明确表态,并抗议《真理报》不经事先调查就发表了那一指控。他亲自在《真理报》上对那些散布不信任、敌视军官的"自高自大、一知半解的党内假行家"进行抨击,他答复说:"广大读者几乎知道每一起背叛案件……即令是在党内比较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对那些为工农俄国的事业忠诚而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的专业军官也几乎一无所知。"[①] 当然,应该使读者知道背叛的事例,但还应该使他们知道,有多少次整团整团的兵力被消灭,就是因为指挥那些团的都是读不懂命令、看不懂地图的业余军官造成的。他坚决拒绝军官只应充当政委们的顾问这个新建议,说这种思想"旨在满足报复的渴望",而在军事上毫无价值。他认为,实行红色恐怖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或贬低知识分子,充其量只不过是吓吓他们,目的是让他们为工人国家服务。

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这个问题,这封信发表在1919年2月号的《军事杂志》上。信中透露出争论的激烈。他这样轻蔑地写到"苏维埃新官僚":他们"在他们的任务面前发抖";他们妒忌、仇恨每一个比他们有教养或比他们有技术的人;这类新官僚不愿学习,从来不愿在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总是寻找替罪羊,总是乐于大叫背叛;他们保守,懒散,对所有提醒他应该学习的人表示不满;这种官僚已成为新国家具有破坏性的绊脚石。"这是对共产

① 《真理报》1918年12月31日;《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54－161页。

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威胁。这些人即使不搞阴谋犯罪，也是反革命的真正帮凶。"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使几千个工人得到政府的职务而成为统治者，那么革命就会成为荒唐的事。"只有当每一个劳苦的男女都感觉到他或她的生活都已变得更富裕、更自由、更美好而且更有尊严时，才会充分证明我们的革命是正确的。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横在我们与这个基本的、唯一的目标之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①

概括地说来，这就是托洛茨基后来反对斯大林斗争的主题；而且它早在十月起义的一年之后就首次出现了。

※　※　※　※　※

1918 年 11 月，奥匈帝国和德国帝国在失败和革命的影响下灭亡。布列斯特和约宣告无效。同盟国部队撤出俄国和乌克兰，留下一个军事真空地带。托洛茨基急于把红军开进真空地带。但是大部分军队却已被乌拉尔的高尔察克和在南俄、顿河流域的邓尼金与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钳制住。西线和西南战线的形势同革命后不久其他战线的形势很相似，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只能依靠赤卫队和游击队。但就连这些部队的弹药也极端匮乏；他们的枪炮因得不到润滑油而生锈，马匹因没有饲料而饿死；铁路的军运一小时只走 15 公里。布尔什维克严酷的农村政策——征用粮食——对军队的情绪产生了不良的影响。②

---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 1 卷第 170－172 页。

② 这段叙述根据列宁与托洛茨基在 11 月、12 月和 1 月间的往来信函。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有关乌克兰的主要情况托洛茨基都向莫斯科报警，并力主放宽党对农民的政策。托洛茨基档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并不十分急于占领乌克兰。他对肃清顿河和北高加索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更为重视。托洛茨基倾向于首先占领乌克兰。他预料协约国远征军要在黑海沿岸登陆;他想使乌克兰在苏维埃的控制下,藉此使协约国军队尽可能远离莫斯科。同时,高尔察克的白卫军再一次进攻乌法和彼尔姆,并且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列宁担心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可能在伏尔加河会合,所以告诫托洛茨基不要被他的乌克兰计划吸引住而牺牲其他战线。然而,不久后高尔察克的进军被遏止,列宁最担心的危险并未发生。另一方面,法国人却正如托洛茨基所担心的那样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登陆了。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终于证明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打败彼得留拉(Петлюра)、占领哈尔科夫并使革命推进到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但同时邓尼金正在北高加索草原聚集军队。

随着冬季到来,战斗也暂时停息;眼下看来这种暂停可能最终成为正式休战。法国的干涉正在瓦解。法国在敖德萨的驻军受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而叛乱;不久以后,全部法国远征军退出俄国,使白卫军大失所望。但克雷蒙梭(Clemenceau)和福煦(Foch)并未放弃干涉政策。威尔逊总统反对他们干涉,建议俄国交战各方与政府休战,并在王子群岛会谈。苏维埃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1919年1月24日,列宁电告托洛茨基:"很抱歉,但是你必须去见威尔逊。"[①] 他力主托洛茨基再占领几个城市,藉以加强在王子群岛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这表明列宁认真考虑过停战。托洛茨基同意加速军事行动,但不肯接受外交任务,也许因为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痛苦回味迄今记忆犹新;他建议派契切林和拉柯夫斯基去。但这件事没有结果,白卫军的头目们在法国人的怂恿下拒不与布尔

---

① 托洛茨基档案。

什维克会谈。因而威尔逊总统的调解企图失败了。

新的战斗季节到来了，但就是到此时，即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一年之后，他的军事政策尚未得到党的同意——他推行他的军事政策似乎是由他个人负责似的。他的对手们狂热地准备在3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向他的政策挑战。列宁至少同托洛茨基一样，坚决主张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但在雇用军官问题上还没有下定决心。叛变发生得太频繁了；反对派则尽力加以利用。大会召开前不久列宁向托洛茨基建议，把军官全部解雇，任命曾在沙皇军队中当过军士的拉舍维奇为总司令。当托洛茨基告诉列宁说在红军服役的军官有3万多人时，列宁大感意外，直到这时列宁才认识到问题的重大意义，因而承认：与雇用的军官人数相比，叛变的事例只是少数；他终于也认为解雇军官是不可能的事；他在公开演讲中赞赏托洛茨基的首创精神，说托洛茨基在用被摧毁的旧制度大厦上留下的砖瓦"建设共产主义"。①

列宁的支持使托洛茨基感到放心，他满怀信心地期待辩论的到来。反对派召集军队中的追随者，尽可能多地使他们出席大会并能够当选。然而，在大会召开前，高尔察克重新发动全面进攻。东线再次吃紧。在这样的时刻，军事部门的首脑为给自己的政策

---

① 《列宁全集》(1920－1926年第1版第16卷第73页)第36卷第49页。争论开始一年后，列宁仍不知道应征人伍的军官人数，这一事实表明列宁因专心注意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只是一般间接地过问军事方针。托洛茨基向他透露的情况给他留下新的印象，他力图争取高尔基回到布尔什维主义，他同高尔基在辩论时这样说"请告诉我还有哪个人能在一年之内建立起一支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赢得军事专家的尊重；我们有这样的人，就有了一切，我们将创造出奇迹。"高尔基：《列宁和俄国农民》第95－96页。高尔基是在列宁逝世后撰写此书的，当时反托运动已在全力进行。在把托洛茨基放逐后出版的新版本中，高尔基把这些赞扬托洛茨基的话降调，只是肯定第一版所说的是事实。参见高尔基：《与列宁相处的日子》第56－57页；在后来出版的列宁著作中，列宁赞扬托洛茨基的话都被删掉了。

辩护而把时间浪费在长时间的辩论上,而且一大批政委竟然离开战线去参加大会,这显然十分荒谬。所以中央委员会决定,托洛茨基应立即出发赶赴东线,军人代表应返回前线。反对派抗议说,这是托洛茨基在利用紧急形势迫使反对派的追随者沉默,逃避对他的政策的批评和监督。于是中央委员会又撤销决定,准许反对派的军事代表留在莫斯科。但托洛茨基本人及其军中的拥护者立即奔赴前线。他留下解释他的政策要点的"提纲",由索柯里尼柯夫代表他提交大会。

关于军事问题的主要辩论在大会军事小组的秘密会议上进行。我们没有得到有关的记录,但辩论的要点及其结果从政治局的文件和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之间的来往书信中可以看清。[①] 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伏罗希洛夫对托洛茨基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又重提关于枪决政委的指控。列宁为托洛茨基作了强有力的抗辩后,离开会场去做其他事情。于是辩论由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主持进行。经列宁干涉后,反对派的失败已成定局。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两人小心翼翼地给人们造成他们的观点与列宁的观点一致的印象;但他们对托洛茨基政策的支持却是言不由衷,他们向反对派作了几点足以使托洛茨基的胜利黯然失色的小让步。反对派得到大约 1/3 的票数;按照季诺维也夫后来向政治局的汇报所说的,也许这些让步有助于减弱反对派的力量。大会公开表决时,以全票批准了托洛茨基的活动,并通过了他的"提纲"。但军事小组秘密通过的一项命令限制了这项批准,命令要求托洛茨基多注意军队中共产党员的意见以及要跟主要政委每月定期举行会议,等等。这样,尽管一般公众知道党已经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政策,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他的对手却感到满意,因为他们

① 托洛茨基档案,另见《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 337 - 338 页。

对托洛茨基的所有指控并没有被明确地驳回。而且有些指控，如托洛茨基是穿军装的党员的敌人，的确是缠住他不放。①

托洛茨基先是从斯大林签署的电报里得知，大会已全票批准了他的政策，这份电报是3月22日或23日他在前线收到的。不久后，他收到季诺维也夫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的信函，通知他向反对派让步的事，并极力劝他要把此事看做是一个"告诫"。托洛茨基拒不接受这一"告诫"。他用书面答复说，他不能每个月都把政委从前线召回来同他们开会。总之，这一"告诫"是受"可耻、粗暴、卑鄙的偏见"所支配，渗透着伏罗希洛夫的所有非难。他责备自己对待伏罗希洛夫太宽厚，因为"军中的每一个不满都是武装起来的不满"。他写道：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文职机构内，在党从辩论转到行动的时刻起，容许用于争论的时间跨度都是很小的。军队中争论的时间跨度必然更小，他必须要求严格的纪律。然后他非常激动地列举他跟指挥员及政委的几次冲突，他不得不因他们破坏纪律而逮捕并惩处他们，但是他希望他们会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而在将来不至对他怀恨。最后，他要求正式调查关于枪决政委的指控。② 他的意思是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并不完全知道前线骇人听闻的情况。反对派的态度是由他们的厌倦与神经紧张造成的；他担心党的领导也会屈服于这种情绪。

事情暂告结束。在大会上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重新进行挑战，他们的不满仍在酝酿，但是，在内战造成的危机中需要纪律、集中制及军事专家的领导，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得到普遍同意。

---

① 在后来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提到的是大会的公开投票，而斯大林派的资料说的是大会秘密地作出有利于它否决托洛茨基意见的决定。两种说法都符合事实，只是两种说法都只是说了事实的不同部分。

② 调查团成立了，但除了众所周知的潘捷列耶夫案件外再提不出任何支持指控的证据。看来调查团的裁决曾公布过，但我一直未能找到。

然而,党内领导集团中由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率领的反对派像过去一样强有力——只是把涉及的范围从一直争论的问题转到战略战术方面来了。

※ ※ ※ ※ ※

内战的战略是由红军在周长8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作战这一事实决定的。就连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及训练有素的军队也不能同时控制所有这些战线。构成这一战争的是一系列的推进与反推进,即外缘的白军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向内地纵深挺进和红军相应的反挺进,甚至是更纵深的反挺进。打败捷克军团以后,三个重大战役构成了1919年内战的顶峰:春季,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基地向伏尔加河流域和莫斯科进攻;夏季,邓尼金从南方推进,目标也是莫斯科;秋季,尤登尼奇企图夺取彼得格勒。如果所有这些攻势都同时围攻苏维埃政权的中心,反革命就可能取得胜利。但白卫军在"外线"作战,而且他们彼此相隔数千公里。每支白卫军都以不同的速度各自为战,每支白军的司令都渴望为自己赢得胜利的桂冠。与此相反,在"内线"作战对红军有利。红军把兵力从一条战线转移到另一条战线,保证局部优势。红军的作战毕竟是有计划的,资源由一个中心控制,但在确定战略重点时自然会引起摩擦与争论,特别是当每一项决策几乎都关系到政策和战略的取舍抉择时。

3月和4月间,高尔察克的军队又一次在广阔的战线上向伏尔加河流域推进,重新威胁去年夏季险些沦陷的莫斯科。东线的红军耗损殆尽:最好的部队都已被派往南方去打邓尼金。托洛茨基在东线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使后退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准备反攻。比起与捷克人作战时,这次他展望前景时信心更足。他已

有50多万人的大军;而且由于50%的工会会员已应征,到这一战役结束之前,军队编制已增到150万人。[①] 将近4月底时,东线司令C.加米涅夫——他以前是沙皇总参谋部的上校——对高尔察克南线的侧翼实施一项大胆的侧翼包围的策略,袭击敌人拉得过长的战线。不久,白军就开始溃不成军地败退到乌拉尔。

这时,在总司令瓦采季斯与东线司令加米涅夫之间发生了争论。后者极想乘胜挺进西伯利亚,追击高尔察克。他深信,只需用他的一部分部队就能彻底击溃高尔察克,其余的部队可调去增强南线,然而瓦采季斯否定了加米涅夫的计划。他认为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有强大的后备,而且认为纵深追击危险太大,他命令加米涅夫在乌拉尔停止追击。托洛茨基支持总司令,他也生怕东线部队可能进入高尔察克为他们设下的陷阱。[②] 托洛茨基那时更急于肃清俄国欧洲部分的白卫军,而不想先把苏维埃政权扩展到西伯利亚。这时又出现了新的任务: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刚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力主红军同苏维埃匈牙利建立联系,尽管东加利西亚的波兰军队挡住了通往匈牙利的道路。[③] 出于这些理由,托洛茨基急于减轻东线所承担的任务。因为加米涅夫不愿放弃追击高尔察克的计划,托洛茨基撤了他的司令职务。当时东线的拉舍维奇、斯米尔加和古谢夫(Гусев)声称他们和被撤了职的司令一致,并要求恢复他的职务,让他放手干。政委们的话先是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而后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他们推翻了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的决定。加米涅夫加强追击,越过乌拉尔,不久就摧毁了高尔察克,终于证明在西伯利亚并没有其战略后备军队。这一回合,托

---

① 《苏维埃政权五年》第156-157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87页。

③ 1919年4月21日、22日瓦采季斯与列宁的来往书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洛茨基的对手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到了南线,他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夏季时间。正当高尔察克开始败退时,邓尼金已推进到乌克兰,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乌克兰只在新近才受苏维埃的控制,而且徒有其表,没有正规军。赤卫队和游击队在乡间游荡,抢劫,散布无政府主义。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部队占领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在俄国已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乌克兰前线找到了他们的避难所,那里处于早期的革命骚动阶段,对他们却是相宜的地盘。是托洛茨基亲自任命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波德沃伊斯基和布勃诺夫负责乌克兰的军务的,但布勃诺夫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倾向于放松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约束。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提出采取坚决措施,并向莫斯科建议:把三个政委调离乌克兰,代之以确信能执行纪律的人。他甚至抱怨他的朋友拉柯夫斯基"太软弱",因为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是以拉柯夫斯基为首的;他要求任命C. 加米涅夫或者伏罗希洛夫为乌克兰前线司令,明确指定要他们担当起制服游击队的任务。[①]

起先莫斯科没有答复。然而,托洛茨基留在乌克兰的时间愈久,他愈感到普遍的混乱使自己不知所措。他开始考虑到,当国内经济政治状况还没有恢复正常时,就不可能克服军事上的混乱。他向莫斯科报告,他无法使军队接受集中领导、服从纪律,因为他无法为军队供应粮食、军装以及武器。"鼓动和镇压都不能使赤脚、衣不蔽体、饥饿、满身虱子的军队"成为骁勇善战的军队。[②] 他

① 托洛茨基相信,伏罗希洛夫这时已经悔悟,成了拥护他的政策的人(参见5月7日从哈尔科夫发给中央委员会的电报。托洛茨基档案)。而此时痛斥伏罗希洛夫"盗窃"军库等行为的人却是列宁(参见6月2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② 1919年7月1日的信。

向俄国要求供应军需，但落空了。此外，乌克兰农民十分仇视苏维埃；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对失败几乎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他本人提出的撤换司令也不能改善这些情况。与此同时，列宁开始更加不耐烦地力劝托洛茨基实行他所提议的更换乌克兰司令。

7月初，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这是他在内战期间的命运的最低点。他承认对东线形势判断错误，当时他反对追击高尔察克。此刻他必须答复对他处理乌克兰战线的责难。此外，他提升并支持的总司令成了严厉抨击的牺牲品。斯大林坚持要求免除瓦采季斯的职务，甚至指控他叛变。他提议任命战胜高尔察克却新近被托洛茨基降级的加米涅夫为总司令。顺便一提，斯大林本人刚刚成功地指挥了抗击尤登尼奇、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因而他挟着这一新胜利的光辉而自鸣得意。7月3日，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将瓦采季斯在顾全其面子的情况下予以免职，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托洛茨基抵制这一人事变动，而且十分气愤；他本人后来写道：加米涅夫“在东线的胜利赢得了列宁，使我的反对失败”。[①] 这样的失败已很痛苦，但是祸不单行。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彻底整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留任主席，但他的朋友（斯米尔诺夫、罗森哥尔兹和拉斯科尔尼科夫）都被免职，他们的职位由斯米尔加和古谢夫接替，这两个政委曾保护过新任总司令，反对托洛茨基，而对他们提名是斯大林所赞成的。

双重的谴责严重地伤害了托洛茨基，他当场辞去政治局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政治局不许这场冲突公开化。不管托洛茨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会议中受过什么奚落，对全国来说他仍然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胜利的旗手。他在新的非常时刻辞职会使党和军队震惊。无论如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13页。

何,列宁真正关心的是,他的政府不能失去托洛茨基。政治局根据列宁的提议拒绝了托洛茨基辞职,并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庄严保证政治局对托洛茨基的深深敬意与完全信任,力劝他继续负起南线的"极其困难、危险而且重要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时,列宁显然因此事感到不安,他交给托洛茨基可以签发任何命令的空白信任状,作为他信任托洛茨基的表示。[1] 在这些条件下,托洛茨基答应继续留任。

紧接着,在抗击邓尼金的战役问题上又发生了另一场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的对手们又打败了他。当时,邓尼金已经占领了察里津、顿涅茨煤田和哈尔科夫。反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流域扩展到乌克兰西部草原。顿河的哥萨克占据着伏尔加河和顿河间的东部防区,而白军本部则在中部及西部防区推进。要解决的问题是,红军应对哪一部分防区进行反击。新任总司令提议对东部防区、沿顿河流域向察里津以及邓尼金在北高加索的根据地进行反击。根据严格的军事理由,这是一个正确可靠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从侧翼包围邓尼金的军队,并要切断他们与主要根据地的联系。计划还打算把邓尼金的军队与高尔察克的军队分开,这样,高尔察克即使要重新取得主动而再一次挺进,他也不能和邓尼金会师。这场进攻要由从乌拉尔撤下来的军队进行;把这些军队投人攻打邓尼金的东线侧翼的战斗比把他们调到更远的西线容易得多。

托洛茨基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据是:由于白卫军本部与顿河哥萨克之间不和,邓尼金的力量已削弱了。白卫军主要由俄国

---

[1] 这一信任状盖有人员委员会主席列宁的章,其内容如下:"鉴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对革命事业胜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托洛茨基档案。

军官组成，它迫不及待地要推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沉溺在本位主义中的哥萨克一心只想拒布尔什维克于哥萨克村镇之外，不愿把自己的头探到顿河流域以外去。他们对邓尼金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并不热心。托洛茨基认为，如果红军把主力部队投入顿河流域，就会激怒哥萨克，迫使他们起而作困兽斗，因而会无意中帮助弥合敌人阵营的裂痕。即使在初战胜利以后，红军也不得不在交通工具缺乏的情况下穿越怀有敌意的居民住地前进。同时，邓尼金定会对力量薄弱的中部防区发起袭击，因为从那里到莫斯科路程最短。托洛茨基提议，红军主力应调到中部防线，以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为主攻方向。红军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可以切断邓尼金的军队，把哥萨克和白卫军隔开，使前者中立。进攻的部队会享有在高度工业化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那里的人民拥护苏维埃；还有密集的公路网及铁路网供他们使用。因此，应视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来决定进攻的方向。加米涅夫的计划虽然从抽象的战略角度看是正确的，但没有考虑到内战中政治与战略密切的相互影响。

军事人民委员和总司令之间的争论提交政治局时，总司令的论据获胜。政治局批准对东部防区进行主攻。

托洛茨基本人接二连三地受挫竟还有一点儿奇怪的余波。托洛茨基多少有些闷闷不乐地回到南方战线。他刚到达设在科兹洛夫的战地司令部就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上面有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列宁和斯克良斯基的签名，信上通知他，前总司令（即瓦采季斯）已被控犯有叛国罪，并已被关押起来。信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指控的罪状——只说是根据另一个被捕军官的证词。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这是斯大林的创作。他指控瓦采季斯是叛徒，而且这无疑是针对托洛茨基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托洛茨基对这一打击如何反应。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坚决为关押起来的人辩护并亲

自担保其人的正直、忠诚,因为在类似情况下,即便职务相对较低的军官受牵连时他也总是这么做的。[①] 幸而几天后瓦采季斯就获释了,并且被恢复了名誉。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对这一指控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瓦采季斯对他身边的反革命军官警惕性不高;另一种说法是,瓦采季斯希望将来能像拿破仑那样大展宏图。[②] 但警惕性不高或怀有个人野心都不等于是叛国,也不等于证明把他关押起来是正当的;瓦采季斯被释放后仍继续担任军队高级职务,直到斯大林时代的后期。所以说,1919 年逮捕瓦采季斯是有意给已经遭受挫折的托洛茨基添加耻辱。

正如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通信中所证明的,这几个星期是他们之间关系非常紧张的几个星期。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在战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部分是由于与下述相关的事实:托洛茨基抗击邓尼金、保卫乌克兰的任务是西绪福斯式的苦工。列宁也怀疑托洛茨基试图使新任总司令在南方战线军官的心目中丧失信誉。托洛茨基从南线报告说,前线司令叶戈里耶夫(Егорьев)对加米涅夫的进攻计划持严厉批评的看法;并说他对执行加米涅夫的命令没有信心。托洛茨基写道:不管问题的是非如何,这种事态是反常的;因而他提议任命一个和总司令意见相同的人担任前线司令。这一提议实际上证明托洛茨基的忠诚,但却引起克里姆林宫的猜疑。政治局更换了前线司令,却又选派跟托洛茨基不和的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到乌克兰去;而且还进一步意味深长地提醒托洛茨基要尽力加强新任总司令的权威。托洛茨基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暗示表

---

① 例如那年早些时候托洛茨基断然反对逮捕查京将军一事,他写道,查京帮助苏维埃所做的工作比那些关押他的人还多,蛮横地对待这样的人则会对军官的士气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他要求释放将军,并愿在法庭给他定罪前亲自为他作保。托洛茨基档案(1919 年 1 月的通信)。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 310 – 316 页。

示强烈抗议。他一再劝诫列宁和政治局，他们对他的信的答复是毫无道理的，而列宁答复时对他提出一大堆的告诫和责备：为什么他几乎没有汇报成绩呢？究竟要在乌克兰的什么地点发动进攻？

事实上，乌克兰的普遍混乱使托洛茨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军事行动的余地。红军已把主力投在战线的东部防区，而让构成中部及西部防区的乌克兰自行防卫。托洛茨基向莫斯科不断告急：乌克兰兵力不足，仍然是一盘散沙；他要求增援，要求军需供应。政治局几乎毫不怀疑，托洛茨基提出这些要求旨在用迂回的手法达到修改加米涅夫的作战计划以及对军队另作部署的目的。

从托洛茨基8月11日致政治局的那封愤然抨击的信中可以看出当地的形势。他写道，乌克兰的红军士兵正在挨饿，其中有一半既无靴子又无衬衣，有大衣的更少；枪支弹药也一样缺乏；除了士兵，每个人都已武装起来，富农们存有大量向逃兵买来的武器；红军士兵食不果腹，又没有武器；当他们跟吃得脑满肠肥的农村高利贷者们面对面时就失去了信心。他还写道，必须严厉申斥富农，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有两三千名装备精良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就能巩固前线；但是莫斯科却拒不派遣。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都怀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们认为让乌克兰经受短时间的白军统治可能不是一个坏主意——因为这样会消除人民的幻想，使他们回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向政治局保证，他坚决反对这种情绪。但是他认为乌克兰的师团必须有短暂的喘息，必须有机会“洗澡和穿起军装，准备进攻”。[①]

然而邓尼金不容许他们有短暂的喘息，两星期后他占领了基辅和几乎全部乌克兰；尔后他攻打红军薄弱的中部防区，向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推进，直逼莫斯科。

① 托洛茨基档案。

这时,托洛茨基要求修改作战计划,他力主最高司令部的后备部队从东线防区调往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他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而政治局及总参谋部一次又一次予以拒绝。与此同时,红军在顿河区域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邓尼金夺取了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奥列尔。10月初,直到对莫斯科的威胁迫在眉睫时总司令才改变主意,开始在中央防区集结后备部队。但此时邓尼金的部队已突破防区冲到土拉,这是通往莫斯科的最后一座重镇。同时,由英国武装并由英国海军支持的尤登尼奇从爱沙尼亚迅速向彼得格勒推进,并到达了彼得格勒郊区。

事件的发展证明托洛茨基完全正确,他的所有对手都转而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不是形势的极端严重,这可能会使他感到高兴。就连斯大林也迫切要求彻底放弃加米涅夫的作战计划,他还不惜凌辱加米涅夫,逐字重复托洛茨基的论点。①

在普遍沮丧的时刻里,托洛茨基的乐观与活力却是无限的。他确信最终被接受的军队的重新部署很快就会产生成果。战线事实上也进行了彻底整顿,组织起后备部队;由于交通路线大大缩短,充裕的军需品迅速到达部队。敌人战线延伸过长,而红军的力量则像准备反冲的压缩弹簧一样。托洛茨基颇有信心地估计着苏维埃政府还能调集的物资和精神资源。他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不同,他始终注视着内战中的悲惨景象。半裸的士兵在冰天雪地中瑟瑟发抖,大批伤兵因缺医少药而生命垂危,这种画面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还充分估计到军队精神状态的不稳定。但在士气低

① 现代苏联历史学家就是据此把托洛茨基进攻计划的原创权归到斯大林的名下的,但斯大林给列宁的那封力主把进攻力量集中到中部防区的信,日期是1919年10月15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246页),而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是却在9月写的。《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56－559页;伏罗希洛夫:《斯大林与红军》第21－22页。

落的时刻，他相信军队有突然爆发积极性的活力，相信军队有牺牲的准备，相信军队指挥员和士兵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所有这一切最终能战胜那些使革命似乎周期性地走向衰退的混乱局面。

这时，他不但作为军队的主要当家人和组织者达到了巅峰，而且作为军队的鼓舞者和思想的先知也达到了巅峰。他大胆挖掘革命的潜在精神资源。他那感召力可以从他的一次演讲中测定出来，那是在白卫军逼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时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上作的演讲。他对青少年们讲到在"留给红军大为缩小的地区内"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他们应协助动员；他们应帮助保持战斗部队间的联络；他们应潜人敌方战线侦察敌人的军事部署等等，但是在他们执行危险的任务之前，他们应该知道自身在世界事务中所占的位置。他用明晰简单的语言纵论国际形势，其中没有丝毫屈尊降贵的痕迹。他说，他们应看到自己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的角色，即：在人类那缓慢得让人生厌、同时又令人鼓舞地从"黑暗的动物王国"进步到梦想不到的文明之顶峰这一远景过程中，社会主义正在引导他们登上这座文明的顶峰，他们应在这样的远景中看到自己的作用。他使他的听众们想到远古的原始人：他们"步履维艰地徬徨在沉睡的森林中，他们受迷信支配，给自己创造众多小神、小沙皇和小君王"；尔后"用唯一的上帝取代诸神，用唯一的沙皇取代众多小沙皇和小君王"；但人类并不到此就停步，他们抛弃了沙皇和神，试图成为自己生活的自由的主人。他说，……我们都是这个历史上空前的尝试的参与者，"如果我们不能到达……新社会，人类几十万年来的发展和斗争将沦为笑柄。在新社会里所有人的关系都将以……合作为基础，人和人都将是弟兄，而不是敌人。"他然后讲到"历史洪炉"，说俄国民族性格将在这座洪炉里重铸，从而摆脱懒散消沉。"这座洪炉是残酷的……火舌将我们吞没、烧焦，但也……铸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钢铁性格。"托洛茨基高

声说道:“一个能在内心感触到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电流的人,他就是幸福的人。”[①]

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在极其阴郁的气氛中召开。奥廖尔的战斗胜负仍然未定;而莫斯科的命运将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果。保卫彼得格勒看来已没有希望。列宁觉得形势无望,因此建议放弃彼得格勒而把所有能集中的力量集中到莫斯科周围。他甚至估计:莫斯科可能陷落,布尔什维克将撤退到乌拉尔。

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表示决不能把彼得格勒这个革命的摇篮拱手让给白卫军。他认为彼得格勒的屈服对国内其余地方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提议亲自前往彼得格勒、担起保卫该城的责任。他提交给政治局一系列旨在进行总动员的紧急法令:让他们解散莫斯科此时已毫无用处的众多的政府机关部门,号召每个人都武装起来。他将从前线的尽头处白海沿岸及波兰边境地区紧急调兵增援彼得格勒。

这一次,他毕生的对手也支持了他。斯大林也要求保卫两首都。[②] 他们态度中的一致如同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大家都一心要救这条船时可以使敌人联合起来的那种一致。当托洛茨基自愿前往彼得格勒时,斯大林代替他去南方战线。政治局通过了托洛茨基提交的法令,选出一个实施法令的四人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政治局还授权托洛茨基出发前往彼得格勒,但对他提出的保卫城市的计划仍然保留判断权。

10月16日在驰往彼得格勒的列车上,托洛茨基口授他对形

①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一代人》第157-167页。

② 这是根据托洛茨基自己的叙述。根据记录,斯大林显然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10月15日他从南方战线给列宁寄了一封信。他大概是在动身前表达了他的意见。

势的思考。他嘲弄邱吉尔最近宣称的14国反苏十字军。他写道，这不过是“14个地理概念”——如果能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派遣14个师的英法援军来，他们会更高兴一些。资产阶级西方对苏维埃即将覆灭而发出的喜悦的喧嚣尚为时过早。即使红军未能成功地把尤登尼奇挡在彼得格勒城外，也会在城墙之内粉碎他。他为彼得格勒城内战斗草拟了一份类似计划的东西，这份计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使用的战术却是出奇地相似。

> 白卫军突破这座大城市之后，却会迷失在这座石砌的迷宫里，对他们来说，这里每一栋房子都是不可思议的，是威胁，或者是致命的危险。他们能料得到打击从哪里来吗？从窗口来？从阁楼上来？从地窖中来？从拐角后面来？打击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可用铁丝网把几条街道包围起来，而让其他街道敞开着，构成陷阱。所需的只是几千个坚决不投降的人。……这样的巷战进行两三天，就会使入侵者变成一群吓得胆战心惊的怕死鬼，他们会成群地或个别地向手无寸铁的过路男女举手投降。……但巷战会造成意外伤亡，并造成文物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战地司令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不许敌人接近彼得格勒的原因之一。①

此刻在彼得格勒，坏消息已在等待他：尤登尼奇已夺取了通向城市入口的“红村”。由于军队调往南方战线，使得城防空虚，又由于参谋部高级军官中的背叛而使城防瓦解。“北区”的主要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心情沮丧；他的犹豫不决感染到他的下属。列宁从莫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7卷第2册第266－267页。

斯科发来的通知说,政治局同意托洛茨基的计划,授权他在必要时可在城内进行战斗。列宁仍然慎重地坚持让托洛茨基准备撤退:转移官方文件,安排炸毁发电厂,凿沉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托洛茨基用一份满怀信心的报告作答;他仿佛要证明他有对形势将出现惊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转折的把握,他问是否准许他追击尤登尼奇进入爱沙尼亚——尤登尼奇的老巢。[①]

他再一次向他曾在1905年和1917的领导过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他坦率地说明可能临头的灾难,号召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并抒发了他个人的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 在这些阴暗、寒冷、饥饿、焦虑、恶劣的秋日里,彼得格勒再一次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恢复了的自信心、热情和英雄主义。这座城市遭受过这么多的苦难,点燃过这么旺盛的内心火焰,冒过这么多的危险。这座城市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却遭受过这么多的蹂躏,但这个壮丽的红色彼得格勒仍然像以往一样——是一支革命的火炬……。[②]

关于托洛茨基干预的效果,我们有不少目击者的记录。下面

---

① 这个问题引起列宁、托洛茨基与契切林之间长时间的交换意见,外交人民委员害怕国际纠纷,坚决反对追击进入爱沙尼亚。托洛茨基那时仅满足于威胁一下,说如果爱沙尼亚政府不能解除退入该国境内白卫军的武装,红军就要越过边境。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家的态度使政治局和托洛茨基有些担心。托洛茨基公开威胁芬兰政府说,如果芬兰人胆敢对彼得格勒采取行动,他会派出巴什基尔骑兵师进攻赫尔辛基。协约国政府秘密怂恿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加入尤登尼奇的进攻;但波罗的海国家受托洛茨基威胁的影响,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287页。

一段话摘自拉舍维奇的记述。据我们所知，拉舍维奇当时对托洛茨基并不友好，而且他本人在那些反对托洛茨基的事件中起过突出作用。他写道：

> 像新的援军到达一样……托洛茨基一到现场立刻出现了新气象：严格的纪律恢复了，军事机关和行政机关又能胜任工作了。凡办事效率低的人都被降职，高、中级指挥人员均已撤换。托洛茨基的命令清晰明确，对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要求每个人都发挥最大作用并能准确而迅速执行战斗命令，这一切立刻表明这里有了强有力的指挥员。……内心的振作已经开始。参谋部的工作进入正常运转之中。一直不行的联络工作现在也变得令人满意了。后勤供应部门开始发挥职能，没有任何故障。前线开小差的事显著减少。所有部队的战地法庭都在开庭办公。……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前进。所有后退的路都被堵死了。托洛茨基明察秋毫，深入到每一个细节，把他沸腾不息的干劲和惊人的毅力应用到每一项工作上。[①]

尤登尼奇继续推进了几天。城外出现英国坦克，引起了恐慌。托洛茨基骑在马上，把因害怕而后退的士兵集合起来，率领他们回到战场。临时拼凑建成的工厂拼命努力，在尤登尼奇大炮的射程范围内进行生产，开始制造出像坦克样的车辆；恐慌因而结束。正如尤登尼奇所说的那样，正规部队和匆匆建立起来的赤卫队，甚至妇女队都“蛮勇”地进行反击。托洛茨基到达后一个星期，防御部

① 《为彼得格勒而战》第52－53页。

队转入进攻。十月革命两周年时,也是他40岁生日,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向苏维埃执委会报告胜利。

内战最后一幕开始了。南方战线上的白卫军早已后退而且溃不成军。[①] 红军向哈尔科夫、基辅和波尔塔瓦推进。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已彻底失败。形势变得这样快,在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上政治局成员还忧心忡忡,笼罩着失败的阴影,但只过了3个星期,红色莫斯科就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在苏维埃执委会庆祝十月革命两周年的纪念会上,人们称呼托洛茨基为胜利之父,授予他红旗勋章。[②]

此时他处于政治军事成就的高峰。他领导了革命,创立了一支伟大的军队,并率领这支军队取得了胜利,他赢得了对革命心怀

---

① 白军溃败的原因没有人比邓尼金本人说得更直率、更符合事实的了:"应使我们解放的广大地区……所有跟苏维埃政权敌对的分子都起来暴动。……问题只是广大群众是否已忘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灾难?……人民是否跟我们一起走?……生活给予的答复先是肯定,尔后是否定。"参见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5卷第118页。"南方的军队免不了普遍的社会弊病,他们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玷污了他们的声誉。……在仇恨的气氛中,内心的仇恨愈来愈严重。集体迫害使犹太人蒙受痛苦,但也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扭曲了他们的心灵,破坏了军纪……。"同上,第146页。弗兰格尔就是这样对战争作道义方面的对比的:"志愿军因抢劫和暴行而丧失信誉,因此我们丧失了一切,我们甚至不能试图沿同样的道路,打着同样的旗帜再一次进军。"同上,第263页。写到他的部队腐败时,邓尼金继续说:"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这里举行的盛宴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愤怒和憎恶……。"他最后说:"英国的军火和库班面包仍从我们的军需供应基地送到。但道义基地已被摧毁。"同上,第314页。

② 授给彼得格勒和斯大林同样的勋章。斯大林连纪念会也没有出席,托洛茨基后来说,参加纪念会的人都对授予斯大林荣誉感到意外,还说没有人为此鼓掌。如果情况是这样,托洛茨基肯定是不满的,因为以后不久,他写道:"授给彼得格勒红旗勋章,彼得格勒确实当之无愧,奖状授给个人时,往往可能授错,可能是偶然的幸运,但把荣誉授予彼得格勒,没有错误也没有偏向。"《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310页。

良好祝愿的广大群众的敬爱和革命的敌人的钦佩与刻骨仇恨。他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内战的恐怖即将结束,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即将开始。他希望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他也能起到像在军事上已经起过的那样的杰出作用。1919 年 12 月,他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内战的困难和成就对比表;因为战争虽然还在进行,但内战的结局已定。[①] 他赞扬那些在过去两年中承担千钧重负的人的高尚品格。他称赞了政委——而他曾被怀疑为政委的敌人,他说:"我们的政委……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军官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并未享有社会等级特权,他们甘愿为工人阶级事业献身,并教育别人为这一事业而献身。"他更高度地称赞获胜部队的指挥员,在这些人中有昔日的沙皇的将军,有从普通士兵提拔起来的人,也有人曾是钢铁工人或理发师,他特别热情地讲到三个部队指挥员——工人伏龙芝,警卫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和革命记者索柯里尼柯夫的成就。尔后他提纲挈领地概述废除常备军而过渡到由社会主义理想产生的民主民兵(即饶勒斯曾梦想过的民兵)的前景。[②] 他甚至为在过去非常时刻应征入伍捍卫苏维埃、并出席这次大会的孟什维克说了几句友好的话。他说:"我们非常感谢其他党派,虽然它们属于反对派。……他们动员了一定人数的工人参军。他们在这里受到弟兄般的接待。"早几个月前,他曾威胁孟什维克说,如果他们破坏防御就会被"碾得粉碎"。但此时他亲自向马尔托夫致意,因为马尔托夫祝贺布尔什维克的军事与外交的胜利。他表示"由衷的喜悦……绝非别有用意,没有一点儿嘲讽的痕迹",因为"马尔托夫说到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际斗争——他用了'我们'这个词,他这样说,增强了我们事业的政治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17 卷第 2 册第 325 - 355 页。

②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后的《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力量和道义力量。"

托洛茨基像其他布尔什维克一样盼望,国内政策将会宽松,让各党派,至少是社会党反对派恢复公开活动。1920 年 1 月,削减契卡的权力、废除死刑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初步措施。但是这些乐观的希望并没有成为事实。

战争的恐怖尚未随着往事一起消逝。①

① 本章和下一章的资料除已注明的以外,都引自布勃诺夫、加米涅夫和埃德曼的《内战》第 1－3 卷;卡库林:《革命血战实录》第 1－2 卷;《伏龙芝全集》第 1－3 卷。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这几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始终焦急地注视着欧洲革命的兆头。欧洲每一阶段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对内战进程都有着直接影响。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使苏维埃国家重新得到由于布列斯特和约而丧失的领土。但不久以后，胜利的协约国宣布封锁俄国，继之而来的是“14 国十字军”的干涉。单单协约国军事干涉的威胁就对俄国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革命以来，旧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十分沮丧，把他们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深渊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没有组织，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他们

彼此分裂,而且不能制订出任何行动计划。[①] 军事干涉的诺言给他们壮了胆。只是在协约国许诺之后,在英、法、美的联络官到达白卫军将军们的司令部及第一批运载着外国枪炮、军火的船只抵达俄国海岸之后,白卫军的队伍才开始扩充,内战的火焰才真正燃烧起来。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国外激烈的革命骚动才能使军事干涉瘫痪。他们不得不把斗争扩展到敌人阵营中去;而使他们越发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地预言:欧洲统治阶级不会跟俄国革命和解,而革命为了自卫,不得不攻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在欧洲工人阶级的打击下已然摇摇欲坠了。该预言的一半已经实现:协约国的统治阶级已经对布尔什维主义宣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另一半预言似乎马上也会实现。

自1918年11月以来,德国和大多数中欧国家已处于剧变的阵痛中。在柏林、维也纳和华沙,工人苏维埃和社会民主党政府一起并存。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己最近的经验这面三棱镜注视着形势,他们认为这正是二月革命产生的俄国"双重政权"的翻版,他们谈论"德国的二月";他们希望双重政权迅速解体,希望工人苏维埃占有优势,即"德国的十月"。

认为历史会这样迅速、准确地一国接一国地重演,这是一种头脑极其简单的想法。不过,所有典型的人民革命的机制都有很多共同点:每次革命都从旧政府既定体制的部分垮台开始,都经过双重政权的过渡阶段;每次革命中保守的、温和的以及调和的党派互相争吵,不断地消耗自己,使自己精疲力竭、信誉扫地。布尔什维克所指望的恰好是在其他国家也能重演这些主要系列阶段。他们

① 白卫军第一批头目之一卡列金将军在1918年初自杀前说:"我们的情况没有希望,人民不但不支持我们,而且肯定仇恨我们。我们没有实力,抵抗也没用。"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2卷第220页。

的预料错误不只在于革命事变的日程，而在于他们说欧洲资本主义已到山穷水尽的那个根本假设。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持久力、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以及它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都严重估计不足。欧洲革命骚动的强烈程度仅仅使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决定追随布尔什维克，而多数都是尽力向政府和有产阶级争取改良。但就是在他们表示同情俄国革命的时候，也无意踏上革命道路和在本国进行内战，无意在这一过程中牺牲他们的生活水平、个人安全和他们已经取得的或他们希望取得的改良成果。

布尔什维克在其英雄时期的历史悲剧在于，不但拒不接受事实，而且甚至拒不充分考虑这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把欧洲工人的相对保守性看做是政治的外表假象。他们以为，这层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的是突破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这样描绘世界，不仅仅是由政治判断的错误造成的，它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主义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这种心理上的无能是所有革命领袖的通病，但在托洛茨基身上最严重。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头脑，他的心灵都浸透着对革命孤立的本能的恐惧。那时尚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对“一国社会主义”有哪怕是一种模糊的预感。而对托洛茨基来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孤立早已是一个可怕的梦魇，因为这就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而且直到那时为止还是唯一一次的尝试就不得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在没有加强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没有古老复杂文化传统的丰富影响、物质与文化如此惊人贫乏和如此原始简陋的环境里进行，这就势必会损害或歪曲为社会主义所作努力的本身。这种对孤立的恐惧迟早必定会同现实相冲突，而冲突将迫使布尔什维主义与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图像作紧张的斗争。

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当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第一次打乱托

洛茨基内在信心时,他在内战的艰巨努力中却找到一条逃脱窘境的出路。眼下,他对孤立的恐惧却逆向发展,表现为对革命迅猛扩展的信心的急剧膨胀。1919年1月当柏林街头布满街垒时,他写道:"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的共产主义幽灵……——而是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和希望才是彻头彻尾的虚幻。他把威尔逊总统在欧洲露面看成是鬼魂一样的东西。"这个伪君子是依靠'教友会'教徒斋戒日的食物长大的,他以道德的至高无上代表、美元救世主的身份在流血的欧洲漫游,惩罚这些国家,宽恕那些国家,决定它们的命运"。[1] 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或迟一个月罢了"。[2]

1919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列宁在古老的帝国法院召开外国各左派社会主义团体的会议,约有40名代表参加。这些代表能够到达这里,就某种意义来说是第一次突破封锁。其中大多数不得不偷越国境:有几个预期要来的代表被他们的政府阻止不能出国,还有几个在途中被捕。布尔什维克跟西方完全断绝关系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急于想听听代表们关于国外情况的报告。报告混杂而互相矛盾;但总的来说,它们似乎都证明对早日爆发革命的期望是有根据的。

会议的目的不很清楚。或者是要宣告成立第三国际,或者是为此作初步准备。布尔什维克打算在当时就地成立新的国际,但他们等待听取外国代表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代表的意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6-14页。

② 同上。

见,他们认为,除了俄国共产党之外,其他派代表出席会议的组织力量都太薄弱,还不能使自己组成一个羽翼丰满的国际。然而这时,一位奥地利代表经过冒险的旅程后在会议辩论之中到达会场,他陈述说欧洲革命正在沸腾,这话使人为之震惊。他满怀激情地要求大会立刻树起新国际的旗帜。会议响应这一要求:会议自称为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这个伟大的组织就这样在混乱和希望这对父母的孕育下,在突然事件的推动下诞生了。

共产国际的诞生恰与欧洲革命的退潮同时并行。柏林的一月起义已被镇压;勉强领导起义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已遭杀害。这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以后几年中出现的革命浪潮没有任何一次能在动力与效果方面跟 1918 年的革命浪潮相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均未能认识到这一转折的走向。他们认为,柏林一月起义的失败是暂时的倒退,很像他们自己在 1917 年 7 月的挫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社会斗争的加剧。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欢迎外国代表,他告诉他们:"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取得了胜利。"[①] 列宁对这种幻想的喜爱不亚于托洛茨基,不过,托洛茨基由于沉溺于作激动人心的预言的癖好,使他的错误甚至显得更为惊人。

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欧洲情况有更清楚的洞察力,他们是否会在那一阶段创立国际则令人置疑。无论如何,他们会像 1914 年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继续鼓吹新国际的思想。但提出一种思想和认为这一思想已成为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事。在齐美尔瓦尔德和

①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483－484 页。

昆塔尔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新国际并不是代表革命的少数与“社会护国主义”的旧国际对抗的实体,而是领导工人中的多数、取代旧国际的组织。托洛茨基曾明确论证: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处于少数,他们可能不得不回到旧国际里发挥左翼作用。[1] 企图给形形色色的政治小派别贴上国际这个响亮的标签,这与他和列宁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这却正是他们在1919年3月所做的。大多数自命为共产国际缔造之父的代表们所代表的是栖息在欧洲工人运动偏僻角落里的马克思主义或和平主义的小派别。这在真正革命的形势下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在那样的形势中,激进“派别”通常会迅速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的外国伙伴的软弱。即便他们认识到这点,他们仍可以寄希望于:这些伙伴随着国际革命的进展也会获得力量,正如布尔什维克过去获得力量一样,他们自己在1917年初的实力也不比一个“小派别”大多少。当第二国际已经声望扫地、看来定将死亡且万劫不复时,这种希望就越有其道理。然而,工人普遍反对旧国际并非出于什么积极的革命态度,而只是出于厌恶战争与社会护国主义。当然,布尔什维克把动机混淆了。尽管如此,他们的期待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事实上,新国际在一年内已掌握了欧洲的工人运动,这不容轻视。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只露了一下面。那时高尔察克的春季攻势刚刚开始,托洛茨基中断了对战场的视察,下了火车就径直来到大会的会议厅;他全身戎装,带来了内战的气息。凡知道他是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代言人的代表都激动而好奇地看着这位曾激烈地反对军国主义、现在却已变成红军领袖的人物。[2] 他匆

① 参见本书第八章。

② 阿瑟·伦塞姆:《在俄国的六个星期》第143页。

匆对大会说明了他的军事政策要点，尔后宣读他已草拟好的向全世界介绍新国际的宣言。宣言的开头对资本主义最近经历的变化作了简短透辟的评述。他说，战争已带来了自由放任的曙光。此时国家倾向于支配经济生活。而支配经济生活的应该是哪一种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是无产阶级国家？这是问题所在。改良主义者或社会护国主义者回避问题，宣扬和解。“如果这些说教在工人阶级中得到认可，那么资本主义新的、更集中得多的畸形发展可能在几代人的尸骨上复兴，而新的世界大战前景则不可避免。人类还算有幸，因为这是不可能的。”① 如果社会主义在欧洲取胜，还会解放殖民地国家，并用自己的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援助它们，以此来加速它们向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奴隶们！欧洲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日，将是你们敲响你们自己解放自己的钟声之时。”宣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方针的经典论述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政党的作用以及它们敢于向资产阶级民主的挑战上。但如果说这些只是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原则的不同的话，那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民族联合的思想则完全是新的，是具有第三国际的特点的。然而，宣言主要对象是欧洲：

>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指责共产党人破坏自由和政治民主。这一指责不符合事实。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只不过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适用，于是，它为新的更高的工人民主创造条件及形式……资产阶级世界对内战及红色恐怖的哀号是历史上所知的最惊人的伪善。……如果把人类送到毁灭边缘的剥削阶级不反对劳苦人民前进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38－49页。

> 每一步,如果他们们不组织阴谋和暗杀,不从境外纠集武装援助,那就根本不会发生内战。……共产党从未人为地挑起内战,而是力图尽可能地缩短这种战争的时间。……使战争受害的人数尽可能减少,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胜利。

共产国际引以自豪的绝不是成立阴谋家组织或放弃欧洲社会主义遗产,而是"继承从巴贝夫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几代人中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英勇努力与牺牲精神"。[①]

这篇宣言发表后不到一个月,革命就在中欧取得重要的立足点: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都宣告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的希望直线上升:革命肯定会从慕尼黑和布达佩斯立刻扩展到柏林和维也纳。消息传来时,托洛茨基正在乌拉尔地区的丘陵地带发动攻势;他用向亚洲的进军欢迎来自西方的拯救革命的许诺。他在事变产生的新鲜印象下写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思》一文中说:"从前教会常说:光明来自东方。……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但是"我们经历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强大、最有组织、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但他对事变的异常过程却有预感。匈牙利是奥匈帝国中最落后的国家,巴伐利亚是德国最落后的省份,这两个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二者一向都被视为反动堡垒。为什么革命却在那里而不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心获得立足点?

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虽然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弱,但统治阶级的力量更弱。"历史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革命时代是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38-49页。

从障碍最少的大门闯入的。"启发性的比喻比托洛茨基本来想要启发的更多。他没有怀疑过革命定要向堡垒中心挺进："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中心将向西移到柏林、巴黎、伦敦，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俄国无产阶级高兴地在克里姆林宫内欢迎世界工人阶级的使者。它将怀着更大的喜悦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在西欧的某个首都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国际大会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因而也是在全世界的全面胜利。……在这样的时代里生活和战斗是多么幸福！"[①]

仅仅三个月后，宏伟的前景和希望都化为泡影。巴伐利亚苏维埃向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对手霍夫曼将军的军队投降了。白色恐怖笼罩着苏维埃匈牙利的废墟。柏林和维也纳的工人冷漠地看着对两个公社的镇压。看来，根据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德奥两国，更确切地说整个欧洲正处于一种保守的新均势中，这些事变恰和内战最困难的关头是在同一时间：英、法的干涉达到最高峰，邓尼金占领乌克兰并向莫斯科挺进。

这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的时刻。不但反对苏维埃的军事干涉已集结了力量，而且只是偶尔遇到西方工人阶级小规模或无效的反击，革命不但在中欧失去立足点，甚至在俄国，革命也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中，即失去比较富有、文明的西部和中部的省份，不得不退到东部荒凉地区，因为只有在那里进行战争才对红军有利。尽管命运之神不赞许布尔什维克向西发展，但它却用东方的新机会怂恿他们，不但乌拉尔的荒凉山脉对苏维埃表示殷勤并提供安全屏障，而且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以外的亚洲也奋起反抗资产阶级西方。这时在印度发生了阿姆利泽惨案，使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差不多变成全国性的反英起义。这一系列相互联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14-30页。

系的事变激发了托洛茨基的政治想象力,而且驱使它向难以理解的方向发展。

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从前线给中央委员会寄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力主根本"改变"国际事务的方向。他认为革命已被迫回到东方——因此它必须面向东方。他还假定欧洲革命只会推迟一年至五年,他不相信邓尼金能巩固对乌克兰的控制。他写道,眼下红军在欧洲的作用还有限,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而通向亚洲的大门却对红军敞开着!红军在那里只须跟日本军队作战,相对于西伯利亚广袤的空间来说,日军兵力太少,而且会由于美国对日本扩张的戒备而受牵制。[①] 苏维埃政权在亚洲举足轻重,这使布尔什维克不但可以在那里等待欧洲的新发展,还可在东部进行紧张积极的活动。

托洛茨基对最近成立的国际却不抱有什么幻想,他清醒地提出:指导亚洲革命的机构不久可能成为比共产国际执行局更重要得多的机构。红军找到通往印度的路比通往苏维埃匈牙利的路可能近得多,方便得多。一个"严肃的军人"曾向他提出一个计划:成立一支远征骑兵军团开赴印度。托洛茨基一再说,革命传输到巴黎和伦敦的路可能要通过喀布尔、加尔各答和孟买。他极其迫切地提出下列建议:应在乌拉尔建立工业基地,使苏维埃政府不再依赖战略上易受攻击的顿涅茨盆地;应在乌拉尔或土耳其斯坦开办革命学院,训练在亚洲指挥斗争的政治军事人员;应动员技术人员、计划工作者、懂各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及其他专家从事这项工作,特别要动员乌克兰共产党员,他们已经失去了乌克兰,现在应

① 托洛茨基说,美国对日本在西伯利亚占优势很害怕,以至"华盛顿的可怜虫"(虽然他们仍在利用高尔察克作他们的代理人)可能还要下决心支持苏维埃反对日本。不久以后,列宁同样重视日美间的对立。《列宁全集》第40卷第95-118页。

帮助革命在西伯利亚立足。[1]

这些建议和为防止军事崩溃所能够或必须立即做的事并无直接关系。与这份备忘录一起，托洛茨基还提交了另外两份文件，其中详细建议如何对南方战线进行彻底整顿。据我们推测，当时政治局马上密切关注的是这后两个文件中的建议，而不是他所提的“以亚洲为方向的建议”。[2] 这一连串的思想在托洛茨基自己头脑中里也并非根深蒂固，只是他自己的头脑对一连串特殊情况的冲动式反应的产物；而他的反应跟他欧洲式的主要思想方向是相反的。然而它作为对今后的探索却富有启发。产生这些建议的特殊情况——俄国与西方断交以及欧洲革命中断，在军事干涉和内战结束以后还会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持续下去；对这些情况的反应大致会循着托洛茨基所提议的路线进行。苏维埃政权重心得向东转移，转移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外。不过，成为这一大转移的主要代表和执行者的是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大转移不能不使革命的心理因素和政治思潮“东方化”，而托洛茨基却不可能和东方同化。现在已经证明的是，革命通往北京和上海（即便不是通往加尔各答和孟买）比通往巴黎和伦敦的路近，并且肯定比通往柏林甚至布达佩斯的路方便。如果说他单凭瞬间的闪念便能揭示未来的远景并远远超过大多数同代人的理解，这不失为对托洛茨基丰富思想的颂辞。

1919年岁末以前，布尔什维克又满怀希望地面向西方了。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南方数省又重新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等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当然，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以及一年后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

待白军的是致命的打击。西欧工人的反对终于牵制了英、法的军事干涉。只有跟波兰的关系还悬而未决,波兰受法国的煽动充当了反苏维埃十字军的矛头。已统治波兰但尚未成为独裁者的毕苏斯基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怀有征服乌克兰的野心,波兰的地主豪绅在乌克兰拥有广大领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在波兰人庇护下的波—乌联邦。但只要布尔什维克军队还在跟白卫军作战,他就暂不开火,因为他知道邓尼金或尤登尼奇的胜利意味着波兰独立的末日。由于法国人正在武装和装备他的军队,因此他对法国人严格保密,不让他们知道他同布尔什维克订立了非正式的停火协定。眼下看来,停火会导致停战并签订和约。1919 年 11 月,政治局仔细考虑了波兰人提出的和约条件,认为条件可以接受,就委托托洛茨基和契切林拟订细节。[①]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和平的来临如此有信心,他们按平时的编制把那些不参加战斗的部队改编为劳动军。1920 年 1 月 16 日,协约国解除了对俄国的封锁;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立即发布命令实施已提到的改革——废除死刑和削减契卡的权力。但几天后,即 1 月 22 日,托洛茨基告知政治局:他担心毕苏斯基在准备打仗。[②]他在列宁的鼓励下继续加强波兰战线的红军。[③]

3 月初,波兰人开始进攻。托洛茨基中断了对乌拉尔劳动军的视察,匆匆赶回莫斯科。和平改革停止或被取消了。国家又一次处于尚武精神之中。

按照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应该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重大关头是主张对波兰采取强有力的武力政策的。在几个月中契切林

① 参见政治局 1919 年 11 月 14 日会议记录摘要,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中。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致季诺维也夫、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电报。

③ 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从 2 月下半月以来的信件。

频频向华沙提出秘密和平建议，力主用对波兰极有利的条件来解决边境争端，但都徒劳。毕苏斯基不顾这些友好表示，并使波兰舆论对这些有利条件一无所知。契切林甚至在波兰进攻开始以后还继续提出和解的建议。但他的政策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内部引起反对，特别是他的副手李维诺夫的反对。托洛茨基介入这一冲突，坚决站在李维诺夫一边。他极力要求政治局制止那些提议，因为毕苏斯基把那些提议只看做是苏维埃软弱的表示；由于提议是秘密提出的，所以无从推动波兰要求和平的舆论。托洛茨基要求恢复公开外交，使波兰人民能明白谁应对爆发战争负责。毕苏斯基结束了这场争论，因为不久以后他就找借口中断谈判并入侵乌克兰，占领了基辅。1920 年 5 月 1 日，托洛茨基号召红军给入侵者以严厉的打击，“这一打击将响彻华沙的每一条街道，传遍全世界”。

波兰的入侵使俄国深为激动。这时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号召进行民族战争而不是内战。诚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反对“波兰地主及资本家”的斗争，一场在民族战争掩盖下的内战。但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这场冲突释放了爱国本能和沙文主义情绪，使他们难以控制。在俄国保守派分子看来这是一场反对宿敌的战争，他们不能容忍它再度作为独立国家出现——尽管这场战争是在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但却是一场真正的俄国战争。对希腊东正教来说，这是一场反对固执地效忠罗马天主教的民族的战争，尽管率领基督教十字军的是不信神的共产党人。有些保守派分子心里同情白卫军，但此时白卫军已经垮台，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借口，好让他们也赶上苏维埃的浪头，又不至丢了爱国的希腊东正教的“面子”。波兰的入侵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借口。旧政权下的总司令布鲁西洛夫(Брусилов)将军领头搞归顺运动。他自愿为托洛茨基效力，并号召所有善良的俄国人追随他。这样，这场战争除了革命的泛音之外，还掺杂有民族主义的低音。毕苏斯基的部队

做了大量激起俄国人的反波情绪的事,他们占领乌克兰的行为十分蛮横;他们开始使波兰地主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领地上;他们用枪杀战俘和大屠杀来庆祝他们的胜利。

被卷入民族团结的浪潮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麻烦的新经历。托洛茨基努力坚持党的国际主义观点。他欢迎布鲁西洛夫与红军团结一致的表示,但他又公开否定布鲁西洛夫的沙文主义和反天主教的腔调。[①] 当谣言流传说布鲁西洛夫将率领红军攻打波兰人时,托洛茨基对此加以否定,而且强调说,波兰战线是由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指挥的,他们对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忠诚在内战中经受过考验。他在战争激烈时公开命令取缔总参谋部的期刊《军事杂志》,因为该刊上一篇论毕苏斯基的文章用了"伤害波兰人民民族尊严"的语言。他还进一步命令调查这件事,为的是"永远不再录用肇事者做任何能使他们影响红军思想的工作"。[②](战争期间,"文明"的政客和文人毫无顾忌地给敌对的民族性格打上像匈奴和野兽般的或低级人种之类的印记,上述事件不免使人回想起那种时代的某些珍贵的古董。)他到前线视察,抑制了有关波兰人枪杀战俘事件的报导在军中引起的愤怒情绪。在前线士兵集会上声明,即使是敌人也不应该加以诽谤。他断然禁止对波兰战俘进行报复,他在当天颁布的命令中写道:对凡杀害战俘和杀害已经解除武装、有病与受伤战俘的红军士兵,必将严惩不贷。战斗尽管无情,但红军对俘虏和已无反抗能力的敌人必须表示宽宏大量。[③]

毕苏斯基在乌克兰的胜利是短命的。波兰人几个星期的占领足以激起乌克兰农民反对入侵者。前线北部防区的图哈切夫斯基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407-408页。

②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2册第153页。

③ 同上,第17卷第2册第403-405页。

的军队和南部防区的叶戈罗夫军队得到从与邓尼金及高尔察克作战部队中“抽”出来的几个师的增援。红军虽然装备很差,此时的实力却达到顶峰——战役结束前,在红军军旗下作战者已达500万人了。6月12日,布尔什维克夺回基辅;毕苏斯基的军队一下子溃不成军地退到波兰边境。

此时,重大政治问题的介入使战争进程复杂化了。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英俄关系;另外有些问题关系到俄国对波兰的态度;两组问题在某几点上又互相关联。

英国工党对军事干涉的反对以及白卫军的失败削弱了以温斯顿·邱吉尔为首的力主干涉的一派。政府本身分裂,首相(劳合·乔治)打算退出军事干涉、同俄国恢复贸易。1920年5月底,以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伦敦。但与此同时,毕苏斯基的胜利暂时加强了主张干涉派的力量。政治局深信英国政府跟法国政府一样全心全意支持毕苏斯基。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试图打击英国在亚洲的阵地,特别是在波斯及阿富汗的阵地,正如前一年托洛茨基所提议的那样。但不久英国官方政策又摇摆起来:工党反对军事干涉非常激烈;红军追击波兰军队,无论如何已再一次暴露军事干涉毫无用处。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Curzon)勋爵提议他的政府在苏波间以及在苏维埃与邓尼金的残部间进行调解,邓尼金残部在弗兰格尔(Врангель)男爵率领下盘据在克里木。

在整个6月和7月里,政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力图掌握英国政策的动向。托洛茨基几度介入辩论,他发现自己跟多数人的意见相反。关于这场争论,在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列宁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机密信件中以及在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的列宁亲笔写的简短备注中都有生动的说明。在6月4日的备忘录里,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对英国采取和解态度。他认为,英国政策绝不是只遵循

决心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条路线,因而若使英国政策保持举棋不定则对苏维埃有利。如果苏维埃发动中东的反英暴动,更不用说苏维埃远征中东,都只会促使英国加强它极端敌视苏维埃的政策。去年8月,他自己极其重视亚洲的革命运动,但此时他根据最新的情报认为:这些运动在中东无论如何是缺乏内在力量的;[①] 布尔什维克应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秘密组织,而避免采取可能使自己卷入军事冒险的步骤;布尔什维克最好是利用中东革命来进行威胁,把它作为与英国外交交易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布尔什维克应利用一切机会促使英国希望在东方达成协议。

列宁在这份文件的边上带有几分讽刺地评论说,托洛茨基像克拉辛一样,对英国政策的看法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坚定不移;英国过去援助波兰人和弗兰格尔,今后还会继续援助他们。[②]

7月,在寇松勋爵提议调解之后,对这个问题又一次进行讨论。列宁把这个提议送给在前线的托洛茨基。同一天,即7月13日,托洛茨基用两封信回答,力求政治局和契切林接受英国在苏波间进行调解的提议,以便实现停战的目的,而停战会导致与协约国和波兰议和。[③] 他再一次向政治局建议:要更细心地注意英国的舆论与政策倾向之间的分歧。[④]

政治局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当然也拒绝了英国的提议。十分奇怪的是,政治局竟要求托洛茨基给寇松勋爵以断然的拒绝。出于内部团结一致的原则驱使,他照做了。竟没有任何人能在他

---

① 托洛茨基补充说,甚至在有众多产业无产阶级、而且与俄国联系悠久的苏维埃阿塞拜疆、高加索,苏维埃政权也不能在那里站住自己的脚跟。

② 日期也是6月4日的政治局决议表明,政治局认为毕苏斯基跟德国政府也有勾结。

③ 但托洛茨基反对调解苏维埃与弗兰格尔之间的战争,因为这是俄国的内政。

④ 此外托洛茨基要求,关于英国舆论的情况应请教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旅英俄侨费多尔·罗特施坦。

那篇才气横溢、充满挖苦讽刺的声明中稍稍猜出他思想中的保留。他在声明中解释说，根据军事干涉的记录，英国政府是冲突的一方，无权奢望作为不偏不倚的调解人而效劳。[1]

这一分歧毕竟还只涉及到外交策略，但却和另一场十分重大的争论有关。列宁拒绝了寇松的建议，要求"火速进攻波兰"。托洛茨基对此也表示反对。到这时候，红军已重新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全境，坚守在一条大致与寇松提议的俄波边界线一致的防线上，那时寇松勋爵还指望邓尼金能获胜呢。托洛茨基想让红军停在这条线上，并公开提出媾和建议。列宁同政治局的多数一心要乘胜追击波兰军队，追到华沙及华沙以外的地方。

政治和战略的相互作用又一次成为这场争论的主题。托洛茨基的建议有军事上的冒险性。毕苏斯基不可能接受"寇松线"作为边界线，他可能要利用停战的喘息时间准备卷土重来。托洛茨基乐意冒这一风险。他考虑的是他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中政治和道义上的有利条件以及列宁的政策可能导致的危险。他认为，提出直截了当的、公开的媾和建议会使人一目了然：苏维埃对波兰的独立并无阴谋，它并无觊觎波兰领土的野心；这样的提议会给波兰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如果毕苏斯基接受这一提议，那再好不过了；但如果他不接受，波兰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就会知道谁要负继续战争的罪责。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不预先提出媾和建议就命令红军向华沙挺进，就会破坏俄国革命与波兰人民的友好关系，就是在干对毕苏斯基有利的事。约一个半世纪以来，波兰的大部分领土一直在沙皇统治之下，自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并得到俄国革命对他们作出的庄严保证以来，时间还不到两年；尽管入侵波兰国土的俄国军队是在红旗下进军的，尽管入侵是毕苏斯基挑起的，但在他们看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426页及以后各页。

来入侵者却是一直奴役他们、他们的父辈及祖先的沙皇军队的直接继承者;波兰人因而会奋起拼命捍卫自己的国土。

列宁并没有托洛茨基那种顾虑和预感。当列宁竭尽全力防止战争时,毕苏斯基正大张旗鼓地蓄意扮演侵略者的角色。此时当战争的命运有利于红军的时候,列宁认为抓住胜利果实是红军的权利和职责——在胜利凯歌引导下的军队不会在追击几乎溃不成军的敌人时半途而止;而且也没有任何道德上、政治上或战略上的原则会禁止一支军队在追击途中侵入侵略者的领土。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列宁相信波兰工人和农民会像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一样欢迎入侵的军队。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对局势的实际情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封锁的结果,他们完全与波兰失去联系,好像这个国家远在千里之外。[①] 他们知道波兰曾建立苏维埃,共产党员在苏维埃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相信这些人还存在。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消息已过时一年多了。此时,像在中欧其他国家一样,波兰形势已彻底改变。毕苏斯基已经解散了苏维埃,严厉镇压了共产党。[②] 一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著名波兰社会主义者现在都住在莫斯科;政治局向他们征求意见,想不到他们有分歧: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Мархлевский)和(似乎是)捷尔任斯基,他们属于波兰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派,他们不相信波兰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复兴。这时他们警告政治局说:红军的入侵会因波兰的爱国情绪急剧高涨而被挫败。托洛茨基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警告所起的作

① 波罗的海各小国的感情都是一样的。托洛茨基在整整一年中都力促政治局同那里的所有小国签订和约。这件事得以实施(托洛茨基档案)。

② 甚至在1920年托洛茨基还在谈论波兰苏维埃的意义,设想波兰苏维埃依然存在。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01页。

用，列宁显然对拉品斯基（Lapinski）的报告印象更深，拉品斯基来自波兰社会主义偏于护国的一派，他过于夸大了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列宁受乐观主义的鼓舞，相信红军的挺进会成为在波兰爆发革命的信号，他的意见支配了政治局。就连本来清醒地不考虑进军华沙这一意见的斯大林也改变了立场；因而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了。

列宁下的赌注甚至更大。波兰是俄国与德国之间的桥梁；列宁希望通过这座桥梁跟德国建立联系。列宁设想德国也处于剧烈的革命骚动中。在幻想的烟雾后面确实也有火种。1920 年 3 月，一部分德军在柏林发动政变，想要推翻议会制、建立军事独裁。这场被称为卡普暴动的政变在两天内就因德国工人的总罢工而破产。这是德国工人显示力量的信号。罢工是工会而不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但后来不久，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取得强有力的进展，尽管还不能带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足以使列宁为之辩护的理由是：红军出现在德国边境可能刺激并强化革命进程。他想"用红军的刺刀对欧洲进行试探"。在攻势处于高潮时举行的一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在递给斯克良斯基的一张便笺上说，"务必在三五天内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华沙"。他一再问：已进入波美拉尼亚"走廊"的红军能否切断这条走廊，使波兰人不能接近但泽港？但泽是波兰接受西方军火的港口，也是与德国的联络点。[①]

托洛茨基尽管对灾难有预感，但仍服从多数的决定。他继续尽职，发布进军命令，执行例行公事——看来只是停止了视察前线。当攻势进展时，任命了一个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临时政府，以那些反对冒险的波兰布尔什维克为首。红军挺进越远，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给莫斯科的报告就越是令人担心。波兰

---

① 该便笺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的工人和农民并不认为入侵的军队是解放者,而认为他们是征服者。但此时红军凭自己的一股动力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延长了运输线,消耗了自己。北线、南线部队之间又发生危险的裂痕。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北线军队向华沙挺进,叶戈罗夫与布琼尼率领下的南线军队却转向西南,攻打利沃夫。根据托洛茨基的坚决要求而任命的南线部队总政委是斯大林。[①] 斯大林渴望胜过图哈切夫斯基,想抢在图哈切夫斯基进入华沙之前攻下利沃夫为自己夺得头功。毕苏斯基此时很可能会冲入中间的这个缺口袭击图哈切夫斯基的侧翼及后卫。这个缺口一度曾使列宁感到担忧;[②] 而且参谋部开始催促南线军队的指挥官堵住缺口时为时稍晚。然而红军还是滚滚向前,莫斯科全城欢欣鼓舞。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即从7月中旬到8月7日,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过去的一年中,欧洲工人运动已转向共产国际:几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老党、大党的领袖们都毕恭毕敬地来扣共产国际的大门。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成员的条件,即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拟订的著名的"二十一条",并讨论了共产党的任务、殖民地国家的命运等等问题。但把讨论对波兰的军事结局激动人心的期待作为主题,因为预计它会给欧洲革命新的有力的推动。列宁每天都站在大幅军事地图前给外国代表们作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挺进的乐观评论。

托洛茨基为了表示赞同讨论中的"二十一条",在大会开始时短暂地露过一面,到大会结束前才又回来——这时红军已兵临华沙城下——他代表共产国际起草宣言。代表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

①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1920年5月11日。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存有列宁给斯克良斯基未署日期的便笺,列宁在便笺中表示他的担忧。

迎他。他用最强有力的措词和比喻对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第一年的国际局势作了全面评述。他愤怒痛斥"巴比伦式"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并撕去了它的"民主面具"。他说："德国的议会民主制只不过是两个独裁制之间的空当儿。"① 代表们怀着憧憬屏息倾听他的发言；他那用语和比喻具有的魔力因战斗达到高潮而加强，这使他们认为他是这场战争的鼓动者。然而他抑制住自豪，在宣言中并不提及红军的胜利。代表们甚至未注意到他没有畅所欲言，也没有猜到隐藏在他充满自信的外表和使人共鸣的语言后面是多么强烈的担忧。在这次大会上即使是最慎重的人也因为激动而无法自制，唯独他不愿庆祝胜利，而人们却在欢呼他是这一胜利的缔造者。②

一个星期后，维斯图拉战斗开始。这场战斗只打了3天。同时代人认为这一战役没有改变历史进程——不过使它延迟了1/4世纪而已。但这场战斗以红军彻底失败告终。在战斗最激烈时，政治局要求托洛茨基去前线设法挽回局势。他拒绝了。他回答说，他不会自我欺骗，在这个时候凭他个人到现场进行任何积极的干预也不能避免败局。③

一时间，灾难甚至显得比实际上还要严重。弗兰格尔的白卫军看到红军已被波兰牵制，于是冲出克里木，侵入高加索。维斯图

政治局汇报军事局势;政治局显然承认在波兰的失败,决定首先着重对弗兰格尔作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共同负责对党员作新的动员。动员起来的人大多数都被派往克里木;大部分布琼尼骑兵也要调离波兰前线。斯大林还接到要他制订措施的指示。然而,弗兰格尔的部队尽管装备优良,但人数太少、士气沮丧,不能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很快退入克里木,企图在彼列科普地峡设有防御工事的隘口后面坚持下去。在伏龙芝和斯大林指挥的一场英勇猛烈的战斗之后,红军突破地峡,把弗兰格尔赶到了海上,这就是内战的尾声。[①]

10月12日,苏维埃和波兰签署临时和约,但一时间战争仍没有结束。在波兰,执政的党派分裂了,农民党——政府以这个党的领袖维托斯(Vitos)为首——迫切要求媾和,而毕苏斯基的军人集团则竭力破坏同俄国谈判。[②] 在莫斯科,意见也有分歧。政治局的多数赞成重新开战。有些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预料毕苏斯基无论如何不会遵守和约;其他人则出于渴望复仇。总参谋部讨论新的进攻。图哈切夫斯基深信下一次他会在华沙举行胜利阅兵式。托洛茨基说,列宁开头倾向于战争,但并不坚决。而托洛茨基无论如何都坚持媾和,坚持忠实履行同波兰签订的临时和约;他又一次觉得自己面临被多数票压倒并被迫顺从地执行他所憎恶的政策的危险,终于决定不再退让。他声称,分歧如此深刻,因而这一次他不会受任何多数决定或政治局团结一致的约束,如果以多数票压他,他就要呼吁全党去反对党的领导。他利用类似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中用过而且取得极大效果的威胁,而且他也

---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J. 达布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场激烈争论作过权威性的叙述,达布斯基是在里加举行的和约谈判的波兰代表团团长。

达到了目的。与那场争论对比,这次双方担任的角色颠倒了,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但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却相似,因为这一回列宁离弃了主战派,而转过去用他的影响支持托洛茨基。和平得救了。[1]

分歧继续深化。但值得怀疑的是,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是否意识到或能否意识到这些分歧的全部历史意义。只有到本世纪中叶发生的事变才尖锐而又明白地说明了那些分歧的全部历史意义。

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用刺刀输出革命,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准则,这一准则基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那场革命是在拿破仑征服外国中完成的,也是在其中毁灭的。这一准则也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来,该观点认为各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当然不指望从外部把社会主义强加给各国人民。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常说,红军可能干预邻国,但只作为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助手而不作为独立的决定力量,例如,列宁所希望的红军帮助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就起这种助手作用。红军或赤卫队小规模地进入芬兰和拉脱维亚援助真正的苏维埃革命,所起的也是这种作用,这两国的革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外国的,首先是德国的军事干涉。在这些事例中,红军并没有输出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对波兰的战争中走远了一步。尽管这样,列宁也没有成为完全靠征服输出革命的人。他看到波兰工人阶级可能起义,因而希望红军的挺进会起催化剂作用。但这跟援助一场实际的革命并不相同。无论列宁个人的信念和动机如何,波兰战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一次靠征服输出革命的重大尝试。确实,政治局是在战争狂热中多次受挑衅、不了解自己决定的全部含义的情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193-194页。

况下进行战争的。但这正是历史上发生重大的、命运攸关的转折的方式:那些开创重大转变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所开创的究竟是什么。革命政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抛弃神圣原则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如果红军占领了华沙,就会进而担当社会剧变的主要执行人,可以说,变成波兰工人阶级的取代者。不要忘记,托洛茨基在年轻时写的文章中指责过列宁的"取代主义",即指责列宁倾向于把党看做是工人阶级的临时代理人。[①] 这确实是在国际舞台上策划取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所不同的只是,充当外国无产阶级代理人的是军队而不是党。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列宁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始终热情地把尊重各国权利,尤其是把波兰的充分自决权几乎像教义一样灌输给他的学生及追随他的人。他跟在这一点上不那么教条的同志和朋友分了手。他写过大量文章,用深刻的论据反对罗莎·卢森堡、拉狄克和捷尔任斯基这些波兰人的观点,这些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在波兰仍然被分割的时候仍拒绝提倡波兰民族国家的概念。看来,列宁这时要抹煞自己的努力成果和宽恕侵害民族独立的行为,只不过是以革命的名义罢了。

列宁越来越认识到这不符合他的角色。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②] 他大声疾呼反对用刺刀输出革命。他跟托洛茨基携手合作,奋力争取和平。在他身上,伟大革命家战胜了革命冒险家。

然而,"错误"并非偶然发生,也不是微不足道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害怕在世界上孤立;党的所有领袖同样都对此感到害怕,但这对他们行动的影响各有不同。向华沙进军是孤注一掷,试图打破孤立;虽然失败了,但对党的观点却有深刻影响。

---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② 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第19-21页。

靠征服进行革命的思想已注入布尔什维克的头脑，继续发酵，溃烂化脓。某些布尔什维克根据经验进行反思，自然得出结论说，可悲的不是靠武力输出革命这一尝试本身，而只是尝试的失败；只要红军占领华沙，不管波兰工人愿意与否，都可以在那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只有那种符合人民意愿和希望的革命才是基础牢固的革命，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成见；主要问题是，下次再进行这类冒险时要有更精良的武装，要作更充分的准备。①

我们将在下一章论述助长这种思想倾向的布尔什维克的国内经验，在这里只要谈一谈那些赞成恢复对波兰作战的政治局成员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就够了。在当时，老布尔什维克只能私下试探性地提出这上述看法；他们不能用更正式的方式阐述它们或把它们提高到原则上来。正是这些看法的性质使他们不宜于公开陈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不容公然蔑视的。这一传统在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头脑中都根深蒂固，约束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活动，防止他们追求以新的思想方法得出他们的结论。甚至在30年后，斯大林也决不承认他赞成过靠征服进行革命，尽管他已经大规模地实施了！

然而这一有争议的的概念不久就找到了一个代言人。波兰战争后不久，图哈切夫斯基作为靠征服进行革命的拥护者站了出来。他没有忘却维斯图拉的失败，这是他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军旅生涯中唯一的挫折——然而又是那么重大的挫折。他到1918年才

① 党史学家H.波波夫写道："托洛茨基反对向华沙挺进，并不是出于他认为我们的武力不够……而是出于社会民主党的成见，认为从外部把革命输入到一个国家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红军援助1921年2月格鲁吉亚的起义，中央委员会在1920年7月的波兰问题和1921年2月的……格鲁吉亚问题上两次都断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考茨基主义的理由。"（《苏共党史纲要》第2卷第101页。）

接受布尔什维主义,那时他是一个青年军官,而此时他才26岁,是红军最杰出、最著名的将军。毫无疑问,他忠于苏维埃,但他只是革命战士而不是革命家。他不受党的传统束缚;他是从拿破仑身上而不是从马克思身上汲取鼓舞他的力量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要继续口头咒诅用刺刀输出革命。他在军事科学院用文章和演讲阐述他的观点时争辩说,红军"从外部"把革命施加给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稍后,他甚至提出成立国际红军总参谋部,以便指导所有国家的革命军事活动。他头脑冲动,见解独特,而且敢做敢为,甚至公开攻击党的戒律。但他以如此极端的形式提出他的理由,所以得不到很多人的支持。内战中的其他领袖倾向于接受他那已适当冲淡了的论点。[①] 无论如何,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与他们坚持的红军应采取明确的进攻性军事学说有着逻辑联系。[②]

托洛茨基与这种新的情绪作斗争。他在谈到波兰战争的后果时提出警告,反对用武力输出革命。这种警告像一条红线般地贯穿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和演说中。[③] 他对靠征服进行革命的合理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他渴望西方工人阶级革命以及他们有能力进行革命这种几乎不合理的信念的对应面。他毫不动摇地确信欧洲、美洲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处境的驱使而将追随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坚信,任何代替他们革命或用刺刀试探和促使他们革命的企图都是绝对有害的。他看到世界孕育着社会主义,相信怀孕期不会太长,但他担心揠苗助长会导致流产。他坚持认为,俄国革命

---

① M.图哈切夫斯基:《阶级战争》,特别是他的论文《从外部输入革命》第50－60页。

②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后面的《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③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114、124、142－143、206、225－277页及以后各页。

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团结应主要表现在帮助他们了解并解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经验、他们的任务,而不是试图代替他们去解决那些任务。在一次辩论中他愤怒地指出,有谁想靠红军作战取代国外的革命,那么就让这个人给自己在脖子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①]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新癖好如此强烈,不可能被彻底地压制下去,它不久又在红军入侵格鲁吉亚中表现出来。

格鲁吉亚在1921年2月前一直受孟什维克政府统治。在波兰战争期间,苏维埃跟孟什维克政府签订过一项条约。高加索几乎全部在苏维埃的控制下,孟什维克统治下的格鲁吉亚就成了眼中钉。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对让格鲁吉亚成为独立国家这一要求是前后矛盾的、带欺骗性的;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热烈提倡格鲁吉亚与俄国统一,只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他们现在提出分离主义,只是一个方便的藉口。只要有孟什维克统治的格鲁吉亚存在,布尔什维克就更难在高加索的其余地方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没有忘记,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俯首贴耳地甘愿让德英两国相继占领他们的国家,而且还严厉镇压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然而苏维埃政府还是庄严地承诺尊重格鲁吉亚的独立,并承认孟什维克政府。政治局希望格鲁吉亚最终会发现苏维埃高加索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总不能在与所有邻居对立的情况下统治他们的国家;当地革命力量推翻他们的一幕即将出现。因而政治局想耐心等待这一试验自然发展下去。

所以,在1921年2月中旬当托洛茨基在乌拉尔视察期间得知红军进军格鲁吉亚时,他大感意外。当时,他正要动身去莫斯科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动身前他和斯克良斯基联系,问是谁发的和

①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25页。

为什么要发进军令。原来,这次入侵对总司令也是晴天霹雳。托洛茨基猜疑这一冒险行动是背着总参谋部和政治局不负责任地发动的;他要把"这件事提到中央全会上去",并要法办那个擅自冒险的人。[①] 但是进军令是由高加索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并经政治局批准的。奥尔忠尼启则(Орджоникидзе)是该委员会的总政委,此人是斯大林的朋友,也是格鲁吉亚人。政治局是在托洛茨基不在时考虑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报告说,格鲁吉亚爆发布尔什维克起义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起义的后果是毫无疑义的;红军只会缩短斗争。政治局把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看做是格鲁吉亚事务的专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然而格鲁吉亚起义并没有得到所谓人民的支持;红军苦战了两个星期才进入格鲁吉亚首府梯弗里斯。格鲁吉亚人也像其他边境小国一样,始终没有忘记沙皇的压迫;此时再次用暴力兼并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不满和怨恨久久难平,它间接地反映在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莫斯科集中制的政策上。这一事件在列宁领导的最后一年中成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过在当时托洛茨基接受了既成事实,他认为,入侵行为不能下令取消,现在唯一可能的是努力缓和入侵引起的震动。列宁亲自处理这一工作。他告诫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的其他政委"对待格鲁吉亚人民要特别注意和谨慎",请他们"向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转达我的热烈敬意"。他要求把凡是违反他的这一指示的事例以及和格鲁吉亚人发生的最细微的磨擦都告诉他。他进一步力促奥尔忠尼启则努力同孟什维克,甚至同孟什维政府的首脑饶尔丹尼亚(Жордания)和解,因为后者并不完全敌视苏维埃政权。[②] 在这件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378-379页。

事上，托洛茨基本人当时已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然而，列宁的指令几乎没有产生效果。因为入侵者既已侵犯了格鲁吉亚的主权，就无意再在细节上去尊重它了。但这一情况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

托洛茨基继续全面否定并斥责靠征服进行革命的思想。但他并不认为有理由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公开地讨论那些具体的分歧，并且感到他没有道理再一次轻视政治局的集体负责制。因此当西方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麦克唐纳、亨德森及其他人叫嚣让红军退出格鲁吉亚时，他也照样加以驳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只用一段简短的文字谈到入侵问题。他重申援助外国已完全成熟的革命是红军的权利，但回避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发生的是否是这样的革命。他只集中全力尖锐地揭露社会民主党批评者们对俄国革命以及殖民地各民族的命运等问题的态度前后矛盾。[1] 不管怎样，他义愤填膺地捍卫的是苏维埃，反对他们的敌人和半心半意的朋友。因此在世人看来，他也要为入侵格鲁吉亚承担主要责任。

托洛茨基认为政治局在波兰和格鲁吉亚问题上所表现的错误仿佛是党在无意中犯下的大错误。他抵制过这两次错误，但他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内部的联系，看不到其中更深刻的意义。就某一点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整个党走上革命征服的路既不自觉，也非故意。入侵格鲁吉亚是踏上这条路的唯一成功的一步，而且是情有可原的。格鲁吉亚毕竟一直是俄国的一部分；它不能在苏维埃高加索内作为一个小小的“资产阶级孤岛”而残存下去。然而在波兰的冒险与在格鲁吉亚的冒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两者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一种新倾向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的革命周期将要结束。布尔什维主义在

① 托洛茨基：《红白之间》。

这一周期开始时登上真正革命的顶峰,到周期结束时则开始靠征服扩展革命。持续约1/4世纪的长期间隔把这一革命周期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的下一周期隔开。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一间隔期间没有扩展。当第二个革命周期开始时,它以第一个周期的终点为起点,即靠征服进行革命。一次战争的结束阶段和下次战争的开始阶段之间有连续性,这是军事史上司空见惯的事:在一次武装冲突结束时所发明的作战武器和所形成的作战思想支配着下一次冲突的最初阶段。在两个革命周期之间也可以看出有相似的连续性。在1945—1946年,甚至部分地在1939—1940年斯大林所开始干的事就是托洛茨基本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和列宁共同在1920—1921年所留下的事。托洛茨基死得太早,没能目睹后来被载入现代史的斯大林的革命征服这重要的一章。他对这一倾向的早期征兆的反对并不坚决。他赞成革命,反对征服;但当革命导致征服或征服促进革命时,他就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了,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境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并没有把他反对革命的征服推到公开决裂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却留下那句有启发性的、半警告半咒诅的话:"谁要想靠刺刀输出革命,就让这个人给他自己在脖子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不了解托洛茨基的军事著作，就不能对他的军事活动做出扼要的结论。尽管他是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但仍然是一个文人，即使在硝烟弥漫中也极力要表现和反映他的经验和他的思想。他那数卷军事论文、演讲和军令都以反差强烈的特点而著称：浪漫的激情和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有时几乎像哲学一样深奥。

拉狄克说过，托洛茨基任军事人民委员时只读过几本军事著作：饶勒斯的《新军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舒尔茨(Schulz)的巨著《战争史》以及弗兰茨·梅林论腓特烈大帝的著作。拉狄克无疑是为了更有力地强调托洛茨基的成就而贬低了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理论素养。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半岛战争期间和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头几年早已研究了当时流行的军事文献。他当然像列宁那样熟知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常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以克劳塞维茨的精神处理他自己的问题;但拉狄克认为托洛茨基受饶勒斯的《新军队》一书的影响更大。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新军队》一书是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社会党人的著作,而不是军事专家的著作。

饶勒斯试图把他自己政策的两个方面调和起来:一方面反对反动军官团的斗争,因为法国反动军官团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已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愿望,他要看到法兰西共和国武装起来,准备防御。他抱有改革军队的主张,设想配合政治和经济改革对军队进行的改革将把资产阶级的法国改造为"社会共和国"。他主张以民兵代替常备军,认为被限制在兵营的严格体制内受训练的常备军会人为地脱离平民社会甚至成为反对平民社会的潜在力量,因此,它始终是军官团政治力量的主要源泉。民兵组织建立在生产单位、工厂和乡村公社的基础上;民兵队员在当地接受军事训练并继续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和工作,只在业余时间里或间歇性地投入军事技术训练。这样,民兵将与平民社会有机地打成一片,因此有野心的将军或军人集团就不能利用民兵作为政治工具。[①]

托洛茨基借用了饶勒斯的观点,但把它们运用于不同的场合。饶勒斯相信,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可能使军队民主化和改成民兵制。但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改良主义的幻想。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常备军和平民社会在实质上或事实上的相互对立反映了军队最终保卫的有产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利害冲突。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最高利益以后,军

① 与饶勒斯观点完全对立的观点是利用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作为内战的决定武器,戴高乐将军在1939年前写的《论职业化军队》中阐述过一观点。

队才会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而跟人民一致。常备军的废除和国家将会逐渐消亡是一致的,因为据预料,无产阶级国家是要逐渐消亡的。

然而,托洛茨基建立的红军却是常备军。他论证说:民兵组织只有以高度工业化、组织化的文明社会为背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俄国的环境决定了红军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跟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非常相似。这两支军队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而不在于它们的严格的军事特征。

托洛茨基以暂时的必要来为此辩解,并坚持要求党和政府应把民兵制作为终极目标。他在向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为自己的意见作过辩解,而且索柯里尼柯夫在托洛茨基没有出席的这次大会上为此作过辩护。[①] 他期待有朝一日人们将在近似工人、农民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而不在军营中接受军事训练。在工业恢复之前不可能认真地开始这样的过渡;但托洛茨基坚持,即使在目前也必须使军营成为类似军校或普通学校,而不只是训练场所。虽然红军的指挥人员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但托洛茨基设想将来要恢复选举原则。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提纲",第九次代表大会再次予以批准。

这一纲领在内战接近结束时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当时托洛茨基正要初次尝试把它付诸实施。使职业旧军官惊异的是:曾经严格使军队集中化并且根除游击作风的托洛茨基竟会提倡一种在他们心目中看起来好像是令人猜疑为老赤卫队那样的军事组织。他们不可能认真接受这种观点,即在兵营以外能够建立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能习惯于集体行动的军队。斯韦钦(Свечин)将军就是批评托洛茨基的人中的一个,他是军事科学院教授,权威的战略著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85-195页。

作的作者。托洛茨基反对这位批评家,捍卫"幻想家饶勒斯"。他说:

> 如果斯韦钦教授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只是为了用红旗兵营取代(沙皇的)的三色旗兵营,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反对的理由认为民兵制下的指挥官不会享有固有的权威,那么这种反对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政治上的盲目无知。难道红军现任领导的权威是在兵营里树立起来的吗?……红军现领导的权威并非由于兵营中有治疗作用的催眠术产生的,而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感染力而建立起来的。斯韦钦教授完全忽略了革命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精神方面的巨变。……酗酒成性、梅毒流行、被天主教麻痹、在华伦施坦兵营服役的无知雇佣军和受新闻记者和律师领导攻破巴士底狱的巴黎手工学徒,1914—1918年萨克森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在世界史上第一个夺取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他眼中都是在兵营里可以精细加工出来的同样的炮灰。这岂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
>
> 共产主义制度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同步发展。凡是党迄今为止主要给予先进工人的东西,新社会一定会不断给予全体人民。……迄今为止,对党员来说,党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取代"兵营的:党给了党员必需的党内团结,使党员能自我牺牲并能进行集体斗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以大得无法比拟的规模做到这一点。……最广义的合作精神就是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但可在兵营里培养,而且可在安排完善的学校里,特别是教育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学校里培养,可以协助

> 对劳动原则的培养，还可用广泛有益的体育活动来培养。如果民兵以新社会的自然的生产职业组织，如农村公社、城市集体企业和产业社团为基础……由学校、体育社团及劳动环境使之内心思想统一，那么，民兵在"集体"精神方面就会比兵营里培养的军团丰富得多，他们就会有更高尚得多的精神品质。①

在党内，民兵这一概念也受到批评，而且要求修改党已通过的决议。1920年底，斯米尔加在全军政委大会上提出反对民兵制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他认为，根据民兵制，大多数团队差不多全由农民组成；而产业无产阶级部队就会为数很少，在红军其余部队中处于孤立。这样可能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危险。把无产阶级成分分布在全军对布尔什维克至关重要；但这与民兵组织的地区性生产原则却不相容。斯米尔加认为，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民兵制也是不适用的。俄国由于铁路少而又不完善，一旦战争爆发，无法及时动员民兵并把他们集结到战略要地去。在民兵制下，俄国不可能在入侵敌人到达伏尔加河流域之前进行战斗。民兵是防御性的。饶勒斯对民兵偏爱是因为他总是从防御战与进攻战的不现实的区别出发。民兵制要取胜，必需有非常高度的工业化和人数众多、技术先进而且受过相当教育的无产阶级和密集的交通网。因此，俄国不能没有常备军。②

托洛茨基承认这种批评中有不少是正确的，但他还是继续指出民兵制是军事政策的终极目标。1921年，他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乌拉尔建立了三个民兵师作为试验。但他本人也力主谨慎。

---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册第115－121页。

② 斯米尔加：《当前红军建设的首要问题》第8－12页。

那是在困难重重、群情不满的时期,他说:"如果乌拉尔的工人挨饿,这一试验就会失败。"人们不能抽象地说哪种体制比较好,不应企图像解答数学难题那样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当时普遍的环境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政治任务加以解决。[1] 然而在后来几年中,约 3/4 的红军都改编成地区部队,只有 1/4 仍属常备军编制。这一试验走得太远,俄国已无力承受。30 年代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下,红军全军作了大整顿,全部恢复为常备军。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实行这一反改革的理由都是斯米尔加在 1920 年已经说过的话。反改革同当时普遍的独裁倾向也是相符合的。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军事思想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他自称在这一方面并无创见。但是他却给问题的讨论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方法,而这样的视野和方法,如果说还不足以构成新的军事哲学的话,也有力地防止了红军落入片面学说的圈套。他一方面不得不跟旧将军们作斗争,而另一方面还必须同年轻的革命军官作斗争。他对前者是作为革新家说话,攻击他们的保守的思想习惯;而在后者看来,他几乎是一个拥护正统军事观念的人。

他是主管莫斯科军事科学院的灵魂,该院的教授和讲师都是旧将军。他力求科学院的课程现代化、摆脱学究气,使之密切联系战争的新经验。例如,他曾规劝军事科学院的那些军事作家抛弃毫无生气的伪历史风格,敦促他们努力赶超法国的同行。他说,法国的军事作家懂得如何把历史研究同对当代战争的兴趣及其社会问题的背景结合起来。院士们相当轻视内战,认为它不符合大规模战争的兵法。托洛茨基激动地反驳说:

---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 3 卷第 1 册第 12 页。

> 据说在你们中间有人认为军事科学对目前的内战或小规模战争……无论如何不起作用。我现在奉告各位军事专家先生们,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说法。……具有高度机动性和灵活性战线的内战为真正的创造精神和军事艺术提供了无数的机会。这里的任务同其他任何战争的任务完全一样:用最少的兵力消耗取得最大的战果。……正是上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给战略艺术留有余地。从比利时海岸到瑞士的宏大战线确定以后,战争就变成机械的了。战略艺术降到最低程度,一切都取决于互相消耗的结果。相反,我们的战争充满着可让最伟大的天才大显身手的灵活性和机动性……。①

当旧将军们拒绝研究内战的教训时,年轻的将军们则往往什么也不愿学。他们的雄心是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他们认为,这种新学说能满足革命阶级的需要并适合革命阶级的心理,它必然不屑于防御和阵地战而赞成机动性和进攻,只有在所有战场上退却的腐朽阶级才赞成防守。"无产阶级的战争风格"对行伍出身的指挥官有感染力。阐明这一学说的最天才的指挥员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可算在拥护者之列。在图哈切夫斯基看来,进攻论符合逻辑地补充了"从外部输入革命";他支持的这两种主张仍还停留在拿破仑的传统范围之内。不过,他的观点比他的同僚们更现代化些,他认为未来的攻势战争将由在空军配合下的坦克、装甲车集团军进行(他还是伞兵部队的创始人,他要把空降部队投到被卷入内战中那些远离前线的地区)。

---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第156页。

托洛茨基对这派军事思想的驳斥可能是他的军事著作中最有启发性的部分。他对"无产阶级战略"不予考虑,正如在其他方面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一样。他写道:"战争以多门科学为根据。但战争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用艺术,是技巧……是残酷流血的艺术。……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创立新的军事学说如同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创立新的建筑理论或新的兽医教科书一样。"[①] 他常用辛辣的讽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当成点金术,要求尊重经验和文化传统的一定连续性。他看出"无产阶级"革新掩盖着头脑浅薄和妄自尊大。他不断引导他的军事理论的读者注意到红军的野蛮、贫乏、粗野和不文明,只是由于苦干和服从命令听指挥,上述弱点才得到缓和,而俄国人终于落入抽象理论的王国也正是由于太想摆脱贫乏、粗野和不文明。

拥护"无产阶级进攻论"的人是根据他们自己在以迅速机动为主的内战经验而建立理论的。托洛茨基答复说:红军向白卫军学会了据说是叛乱阶级独有的优点——机动性,正如白卫军向红军借用宣传方法一样。在军事问题方面,红军和白军一直在彼此同化:"在彼此长期交战中,敌对双方相互学习。"[②] 托洛茨基亲自发出著名的命令:"无产阶级,上马!"这是成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信号,是在邓尼金的攻势达到高潮、马蒙托夫率领的白卫军骑兵纵深而迅速地袭击布尔什维克战线后方而构成有瓦解布尔什维克腹地的危险时才发出的。[③]

---

① 引自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军事代表的演说,载《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44页。

② 同上,第61-62页。

③ 托洛茨基开始时反对布琼尼的骑兵部队计划,部分是因为典型的骑兵都是反动的哥萨克,部分是因为托洛茨基从西方的技术角度思考问题的特点,他认为骑兵的时代已经过去。1919年9月,当他最终改变想法时写道:"这支最保守的、生气基本消

但内战特有的高度机动性却反映出(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在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作战的原始条件。他指出美国内战和俄国内战的相似处。在这两场内战中,敌对双方都是在人口稀少的大陆作战,交通线和运输工具都极端匮乏;骑兵的活动范围都特别大。这两场内战中,美国南方军队和俄国白军都是传统的骑兵;而美国北方各州和苏维埃军队都不得不夺取主动权和建立自己的骑兵部队。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度的机动性就是所有内战的普遍"方式",在斯凯尔特河、塞纳河或泰晤士河流域地区进行的内战总比在大平原或大草原上固定得多。①

俄国的内战是以准拿破仑的作战方式进行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低。但托洛茨基论证说,像图哈切夫斯基企图的那样要红军采用拿破仑式的进攻论,却是愚蠢的、反历史的。托洛茨基把革命的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革命的俄国的地位作了鲜明的对比。法国在19世纪初是欧洲大陆上最文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使拿破仑能实施进攻战略。俄国在欧洲是技术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拿破仑的战略与俄国社会和军事的潜力无论怎样说都很不相称。他指出:法国总参谋部,特别是福煦曾想发展拿破仑的战略,却总是枉费心机——法国在1914—191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使它不可能而且也绝不容许它运用这一战略。托洛茨基还取笑

失的部队仿佛又突然恢复了生机,成了最保守、最腐朽阶级手中的最重要的攻防手段,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中把这一武器夺过来,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武器。"《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册第287-288页。布琼尼对托洛茨基最初轻视地不考虑建立骑兵部队的主张表示不满是有理由的。

① 为了以实例解释他的理由,托洛茨基曾探讨过假设的"无产阶级的英国"在遇到侵犯的危险时不得不解决的防御问题。他对这一防御图景作过富有想象力的概括描写:设防的海岸、滩头防御、战壕、地堡、铁丝网及在通往海岛腹地道路上的道路封锁及其他等等,这幅图景与1940-1941年间的英国惊人地相似。《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68页。

说,更仔细地考察这一崭新的"无产阶级学说",它不过是对 1914 年以前法国教科书的抄袭。

试图给一般战争的本质,特别是无产阶级战争的"本质"下定义,按照托洛茨基的话说都是贩卖形而上学的教条。[①] 他本人的见解是,在军事理论方面需要某种折衷主义。他赞许地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人们在实用艺术方面不应把理论的鲜花和绿叶抬得太高——宁可使之接近经验的土壤",在讲到英帝国主义者的经验主义方法时,他怀着有保留的重视,认为"他们思考的是几个世纪和几个大陆"的经验,而他对克劳塞维茨的德国追随者则毫无敬意。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理论没有而且也不能给战争提供"终极真理"。各种思想流派只不过反映民族国家存在的当时条件。英国的均势说、海军霸权论和俾斯麦德国的审慎军事思想都是与侵略性外交携手并行的,加上已被自己的冲力冲昏头脑而把审慎抛到九霄云外的德国近代帝国主义的绝对进攻论和 1914 年前法国波拿巴主义者的进攻论(人们还可能要加上 1940 年前以马奇诺基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这一进攻论的反动),所有这些思想流派都只是把某时期和某方面的军事经验孤立起来并加以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任何军事教条主义都截然相反。"只有叛徒才拒绝任何进攻,只有蠢才会把所有的战略都归结为进攻。"[②]

散见于这些文章和演讲中的都是在争论过程中提出的值得注

① "如果我们核查一下军事科学'永恒真理'的清单,我们所得到的只不过几条逻辑法则和欧几里德假设:侧翼防守、确保交通线和退路的安全、对敌方最薄弱的防御点进攻,如此等等。这样的原则就连对那些远离战争艺术的问题也完全适用。从袋子的破洞口偷食燕麦(即"敌方"最薄弱的防御点)的驴子警惕地把屁股对着危险来源的方向,它肯定也是依照军事科学的永恒原则行动的。"《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 3 卷第 2 册中的论文《军事学说及伪军事理论》。

② 同上,第 222 页。

意的意见和预见，这里引证的只能是其中的少数几点。这样，几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0年，托洛茨基在论述它的战略时就已说过，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会与第一次大战中的战略大不相同。在西欧，壕堑战会变得不大重要或会彻底消失；而在俄国则相反，会比内战中有更多的阵地战。[①] 他在与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争论时论证说，如果一个在技术上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西面进攻俄国，红军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不应是进攻而应是防御，因为俄国在动员方面会比较缓慢，而防御战会使她有完成动员的时间。因此，在军中一再灌输那种认为进攻军队的士气永远占优势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我方既有空间又有数量，可以镇定而有信心地标定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由于我们的顽强防守而得到保证的总动员使我们能集结足够的进攻部队转入反攻。"[②] 红军也许不得不后撤，但后撤到什么程度只应取决于动员的需要。

> （然而）如果我军首先进攻，而进攻又得不到动员的充分支持而被迫后撤，我军就失去进展速度，而且会无可挽回地输掉战争。反之，如果我军的计划已预想到准备撤退，如果高级指挥人员都清楚这个计划，如果他们对不久的将来都抱有信心并把这种信心传达下去，如果这种信心并没有因有人认定应始终不变的是首先进攻这样的偏见而丧失掉——那么，我军就有一切机会重新取得速度，赢得战争。[③]

---

①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68页。

② 同上，第256页。

③ 同上，第256页。

托洛茨基当然不欣赏图哈切夫斯基的国际总参谋部。他坚持认为,只有在国外发生真正的革命和出现新的红军时,建立这样的参谋部的时机才会到来。但他自己仍然坚持必须有内战法规,认为在内战方面各国革命和起义的经验总是可以利用和加以评价的;他草拟了这类法规的纲要。

由于内战带来的后果,托洛茨基更加关注军队教育问题、战争技术的复杂情况及其与政治的更密切的联系。他写道:"要教育我们的红军指挥员,他们对各种现代武器配合作战以及相互作用的综合评估能力的提高应和取得正确的社会—政治方向相结合……。"[1] 他在军事科学院里力主指挥员学习外语,使他们借以从民族国家的小天地里摆脱出来、扩大视野和"分享世界性的人类经验"。

①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xi页。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托洛茨基就像古典悲剧中的主人翁一样，是在权力的巅峰上被绊倒的。他违反自己的原则，而且是在置最庄严地承担的道义责任于不顾的情况下违反的。形势、捍卫革命以及他的自豪感使他陷人这样的困境。就他的处境来说，他的悲剧命运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同样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还要沿着以前已经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而此时他那荣誉的顶峰和不幸的低谷之间只有一步之隔了——即使他在否定原则时，他仍然受原则的支配，然而在那样行动时他毁掉了他的立足点。

内战结束时，他开始倡导新的行动路线。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克服那些参加过或支持过革命的社会阶级的反抗才能贯彻这

些行动路线。布尔什维克斥责过资产阶级民主是掩盖社会阶级不平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遮羞布。他们自己则保证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保证工人阶级与贫农的言论、结社自由。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中,没有一个像托洛茨基那样热烈而一再地作出这类保证;而此时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坦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同时他仍一如既往地反对靠刺刀输出革命的观点,他的自相矛盾就越发惊人了。这种观点是符合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的。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那么,试图"从外部"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强加给这个国家就是荒谬的,甚至是罪恶的。但这一论点更有理由适用于俄国工人阶级,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本国的主人。然而托洛茨基当时制订的政策却同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政治自决权是互不相容的,而对这种精神和权利他已孜孜不倦地宣传了20年,而且今后在他与斯大林进行公开斗争的17年中还要继续宣传。

他开始提出新政策时曾得到列宁的赞同。但他继续做下去时,却发现列宁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一致起来反对他,而且援引的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这时他自己的思想却具有那种"取代主义"的明显标志,而他本人过去曾否定"取代主义",认为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缺陷,当然也是俄国革命政治的宿疾。因为,按照他的意见,党由于正确理解"时代的任务"和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要用她的理解、她的使命去代替她在革命中领导的广大社会力量的愿望和斗争。这样,托洛茨基此时变得与他自己过去给列宁画的那幅讽刺画一样了。[1]

造成这样不寻常的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武装的、而且是胜利的革命先知与他自己预言的要旨相矛盾呢?在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俄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作一简要的概述，因为当时的戏剧性情节的转变是基于这些层面发生的。

※　※　※　※　※

从1919年底起，托洛茨基只用少部分精力关注军事。内战的结局已经明朗；1920年下半年，他因为在波兰战争问题上跟政治局有意见分歧而对所执行的军事政策已不大过问，甚至更早些时候，他就已专注于经济恢复的问题了。他进入这一新领域怀有极大的自信心；他在军事人民委员任内的成就使他具有这样的自信心，而且他还打算把在军事方面制订和检验过的方法和决定应用到新领域之中。1919年12月16日他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关于从战争转向和平的整套经济过渡的建议（“提纲”）。他建议的办法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军事化。他专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写了这个文件，希望先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开始讨论。布哈林出于误会，马上把这个文件刊登在《真理报》上。这一轻率举动引起一场极为激烈的公开辩论，它一直持续到1921年春天。[①]

几年的世界大战、革命、内战以及军事干涉的结果是俄国经济完全崩溃和社会结构解体。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向已崩溃的经济索取内战所需的物资。到1919年，红军已经耗尽全部积存的军火和其他军需品。苏维埃管理下的工业能补充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在正常情况下，南俄为俄国中部及北部的工业提供燃料、钢铁和原料。但南俄先是被德国、继而被邓尼金占领，苏维埃对它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每次的时间都不长。最后，在1919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永远地回到那里，他们看到，顿涅茨流域的煤矿被水淹没，其他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10－14、36页。

工业也都遭到破坏。全国其余地方的工业中心由于缺乏燃料与原料也都陷于瘫痪。甚至到1920年,煤产量不到战前产量的1/10;钢铁产量不到战前的1/20;消费品的产量约为正常产量的1/4;交通运输受到的破坏使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全国的铁路路轨和桥梁都被炸毁,自从1914年以来,铁路公路的车辆从来没有更新,保持正常修理的只有少数,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濒于停顿。(顺便提一下,这是导致红军在波兰失败的原因之一。苏维埃征召了500万人,但其中实际参加波兰战争最后阶段的不到30万人。随着军队的迅速推进,前后方距离日益延长,铁路运送增援部队和军需品的能力则越来越低。)农业也已崩溃,农民已经6年没有更新农业设备了,后退或前进的军队践踏他们的农田,征用他们的马匹。然而,由于技术上的原始性,农业比工业容易恢复。农民用木犁耕作,这种木犁他们自己能够制造、能够修理。

布尔什维克力图对匮乏的物资实行最严格的控制;他们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种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把全部工业国有化,禁止私人贸易。他们派出工人征粮队到乡间为军队和城市居民征粮。政府不能征税,也没有征税机关。为了支付政府开支,印刷机日夜印制纸币,纸币这样不值钱,因而不得不以实物支付工资。用不足的粮食配给作为基本工资,也用工人自己制造的部分产品,如一双鞋、几件衣服作为工资付给工人,工人往往再用这些东西去换粮食。

在党看来,这套非常措施与权宜之计好像是其纲领的出乎预料迅速的实现。如果没有内战,工业社会化的实施将会更缓慢,更谨慎;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征用粮食,禁止私人贸易,用实物付工资,货币已失去意义,政府渴望要控制全国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废除了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设想的充分发展的共产

主义经济应该是一种自然经济，在那种经济中，社会化的计划生产分配应取代为市场而生产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分配。因此，布尔什维克倾向于认为，在1919—1920年的战时经济体现的是羽翼丰满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党宣传并严格实行的平均主义使布尔什维克更肯定这一倾向，而这种平均主义使军事共产主义具有浪漫的、史诗般的形象。

事实上，军事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憧憬的未来社会的可悲的效颦。那种社会应该以高度发达和高度组织的生产力、极为丰富的物质和服务为背景。资本主义充其量只能间歇性地组织并发展社会财富，而且不能合理管理、分配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共产主义要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永远废除社会的不平等。而军事共产主义则相反，是社会解体、生产力的破坏与崩溃、产品与服务奇缺的产物。军事共产主义确实试图要废除不平等，但它是出于不得已，这必然要靠降低生活水平、使贫困普遍化为代价。[①]

这种制度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征用粮食和禁止私人经商只能暂时帮助政府克服最可怕的紧急情况。但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些政策加剧而且加速了经济的萎缩和崩溃。农民开始只耕种能维持一家活命所必需的部分土地。他们不愿多生产粮食，因为征粮队正在搜寻余粮。当农村拒绝为城市生产粮食时，就连城市文明的基础都分崩离析了。俄国的城市人口减少了。许多工人都到农村去逃避饥荒；留下来的人在工厂的工作台上也是饥饿无力，生产不出多少东西，而且常常把他们的产品偷出去换粮食。旧的正常市场确实已经废除，但它的私生子——黑市在全国趁火打劫，报复性地败坏、腐蚀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再维持一年

① 在爱·霍·卡尔著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中，读者可以看到关于军事共产主义的富有启发性的详细叙述。

左右;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政府垮台和社会瓦解。

这就是1919年底托洛茨基所关注的形势。为应付这种形势,必须采取两条行动路线中的一条。政府可以停止向农民征用余粮,改为推行用实物或货币缴纳农业税。农民在纳税后就可以获准随意处理他的谷物:消费和出售粮食或以粮食换取别的东西。这样会使他为城市多种粮食。只有恢复农村对城市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才能指望国有工业恢复生产,这确实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但这种改革也意味着恢复私人贸易;恢复私人贸易就只能炸毁军事共产主义的整座大厦,而布尔什维克曾为建立这座大厦感到十分自豪。

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圈子里寻求解决办法。如果政府要继续征用余粮和强制禁止私人贸易,就不能不对农民增加压力,首先使他们多产粮食,尔后征用余粮。也可以对种粮食的农民发给特别奖励——衣服、鞋袜、农具。然而这要在挨饿的工人先把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工厂修复好并使机器开动并开始生产出农民急需的货物之后才能做到。所以政府不得不极力要求增加工业生产。但政府没有能力给工人提供物质鼓励,不得不像对农民一样对工人采用更加强制的办法。军事共产主义继续不顾现实,直到把自己逼入绝境,唯有依靠日益增加的暴力来维持其存在,这就是其乌托邦性质的毋庸置疑的症状。

起初托洛茨基并没有超越公认的政策框架。他关注于采取措施使涣散了的工人阶级能重新集合起来并使之回到工业生产中。工人中有的逃往农村;有的为粮食而放弃技术工作去干非技术的工作;有的脱离本阶级,完全卷入黑市,把工业忘到脑后。怎样才能使他们都回到正常的环境里重新组成国家的生产机构呢?托洛茨基总结说:因为改善生活的诺言不能吸引工人,就必须像征召士兵一样把工人征召到工厂去。托洛茨基根据经验得出劳动军事化

的概念。革命曾大声宣布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并且声明过“不劳动者不得食”。托洛茨基认为现在正是加强公民职责的时刻。革命中曾有数十万人战死沙场。无疑，革命有道义上的权利把人送进工厂、矿山，因为那里必须发动一场新的为生存而战的战斗。

1919年12月17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过早发表的那些“提纲”中别出心裁地把这一计划跟他设想的军事改革——即从常备军过渡到民兵制联系起来。他建议应利用军事动员机构去动员工人。他有在军队中实行最民主的改革的愿望，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这一愿望是怎么与采用强制劳动的极端方式的企图结合起来的。这支生产部队还要渗透着平民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精神，它的编制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另一方面，工人应服从军事纪律；军事机关要给工业单位提供人力。军事人民委员部要承担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职能。①

列宁全心全意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策。他坚持军事共产主义，并认为，要想让军事共产主义能完全发挥作用，唯一的条件是使托洛茨基所建议的措施推行成功。列宁也不反对由军事人民委员部负责供应工业劳动力这一设想。列宁曾不得不从零开始筹建其政府中的非军事部门；而经过几年内战后，这些部门大部分仍然处于雏形阶段。军事人民委员部已经吸收了最优秀的人员，在政府物资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它由头脑最清楚的行政人员领导，其机构令人生畏，但效率很高，是列宁的政府中最可靠的部门，真正的核心。看来，让军事人民委员部转而从事民用工作，是便于行政管理的。

这些建议刚一公布就激起了抗议的狂潮。在党员、行政人员以及工会会员的会议上，托洛茨基的声音被称其为“新阿拉克切耶夫”(Аракчеев)这一咒骂声所压倒，人们说他效法臭名昭著的将

① 1919年12月27日宣布，政府已成立劳动义务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主持。

军,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的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曾建立军屯,用棍棒统治农垦士兵。从那时以来,阿拉克切耶夫这个姓一直是军事官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荒唐幻想的代名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也掀起了抗议的喊叫,它是由托洛茨基的老搭档梁赞诺夫、拉林(Ларин)以及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李可夫、诺根、哥尔茨曼等人掀起来的。对内战的厌倦以及对这位胜利的缔造者的无法忍受,所有这些情绪都跟这抗议的喧嚣混在一起。正如在从战争的极度紧张与牺牲中恢复原状时所发生的那样,人民都愿意给胜利的缔造者戴上桂冠。但他们更渴望的是摆脱战时严厉的纪律;他们寻求性格不那么暴躁、才华不大出众而愿意实行比较温和的行动路线的人来领导。据说经受战争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宣称,他们已受够军队的强制了;军事人民委员部使国家处于恐怖之下,吸吮国家的血的时间够久了;并说他们不愿支持托洛茨基的新抱负。

1920 年 1 月 12 日,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工会领袖面前并力促他们接受军事化时,问题到了严重关头。托洛茨基为自己的活动辩护,他说,如果说他的军事人民委员部"掠夺过"自己的国家、强求过严厉的纪律,这样做都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此时竟以此反对他,竟煽动工人阶级反对军队,这是可耻的,是"反对革命精神的犯罪行为"。他的对手们以国内的经济情况自鸣得意。报纸掩盖了真实情况。"我们的经济情况比我们过去的军事形势坏一百倍,我们必须公开坦率说出来,使全国都听见,……正如我们过去下令'无产阶级,上马!'一样,现在我也要高喊:'无产阶级,回到工厂的工作台去!无产阶级,回去生产!'"[①] 全国劳动力继续减少而且蜕化变质。如不采用强制办法就不可救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15 卷第 27－52 页。

药，就不能重建和恢复元气。列宁发言的情绪也相同，然而会议几乎一致反对他和托洛茨基联袂提交的决议。60多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只有两名投赞成票。以前托洛茨基或列宁从未遭到过这样惊人的挫败。

托洛茨基指责批评他的人自鸣得意，不是没有理由的。批评他的人提不出，也不能提出任何切实可供选择的建议。他们也都坚持军事共产主义，只是不承认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的结论。所以他揭露他们的前后矛盾并不困难。然而就是在他们缺乏一贯性的本身中却有某种现实主义的、值得考虑的地方。托洛茨基的对手不相信凭军事命令就能使经济的车轮转动，他们深信一个工人国家充当自己工人阶级的抓丁队是错误的。[1]

与此同时，第一支劳动军成立了，它不是由普通工人军事化而是把正规军变成劳动力所组成的。这一倡议是由驻在乌拉尔的第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这支军队在战胜高尔察克之后，闲着没事干，浪费了时间与精力。它未能遣送士兵回家主要是因为没有运输工具。该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曾建议利用军队伐木、种田和做其他工作。列宁和托洛茨基欢迎这一建议，这个建议使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政策付诸实施而不至遭到反对：工会并不反对用闲置的军团进行生产。[2]

托洛茨基希望利用这一试验作为征集并管理普通工人的起点。军队在遣散士兵之前应先进行士兵生产技能的调查，在每个士兵的服役册上注明他的行业，尔后指示他从复员站直接前往需要他的工作岗位，没有比这样的事更简单了。托洛茨基计划把士兵的服役册同工人的劳动册结合起来，这个计划也方便了以生产

① 1920年1月的《真理报》和《经济生活报》的版面都载满了这场争论。

② 托洛茨基档案。

单位为基础来建立民兵。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主意。它的缺点是:遣散的士兵急于同家人团聚或寻求较好的生活,因而很可能放弃指定他去的那个工作岗位。托洛茨基绘出可以吸引工人的公社食堂的蓝图,但这一计划在当时饥荒、混乱的情况下不能付诸实施。他发挥其惊人的创造力,但是他的丰富想象力却是在真空中狂热地活动,他的思想和现实是脱节的。

继乌拉尔军队之后,高加索及乌克兰的军队也在矿山、森林及农田里劳动。托洛茨基主持整个组织工作,邦奇-布鲁耶维奇将军是他的参谋长;皮达可夫是他驻乌拉尔的代表;斯大林是乌克兰劳动军的总政治委员。这个组织保持军事纪律,每支劳动军都定期报告生产"战线"的成绩。(托洛茨基是第一个系统地把军事术语、符号和比喻用于民用经济问题,因而给俄国语言引进一种清新活泼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僵化为官僚的习惯用语,并扩展到其他语言中。)对劳动军经济效益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但无论如何,它不会低于当时普通工人的经济效益。布尔什维克赞扬劳动军,特别在托洛茨基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平息了工会的非议并要求劳动军跟他们友好合作之后。

他把自己在道义上的激情和戏剧性的热忱带到他的工作中去,但这也使他夸大了所干工作的意义,赋予充其量也不过是黯淡的权宜之计以迷人的假象。例如,他给劳动军发的一道命令是这样写的:

> 在工作中,要发挥不倦的干劲,就像你们在进军或在战斗中一样,……司令员和政委在工作中像在战斗中一样,对他们的部队负责。……政治部门必须在士兵中培养工人精神,在工人身上保持战士的作风。……劳动时开小差跟战场上开小差一样,都是卑鄙可耻的,两者都要

> 从严惩处！……只要有可能，都要和着社会主义赞歌的歌声开始并完成你们工作。你们的工作不是奴隶劳动，而是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服务。①

2月8日他在参谋们陪同下出发前往乌拉尔对劳动军进行了第一次视察。在他的专列上出版的报纸《路途报》上，他对全体人员这样致辞：

> 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已被摧毁，一去不复返了。新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才刚刚开始成形。我们必须成为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自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我们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找到出路，找到拯救、温暖和满足。我们必须从基础开始。……我们的列车正驶向北乌拉尔，我们将在那里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奉献给劳动组织，乌拉尔的工人、乌拉尔的农民和红军士兵……将携手参加这个组织。给挨饿的人以面包！给受冻的人以燃料！这就是我们小组这次提出的口号。②

午夜时分，他刚写完这些话，就被猛烈的冲击震动了。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使他的列车出轨。在离小车站几乎是目力所及的距离内，列车在雪堆里躺了整整一夜和翌日的全天。没有一个人来查询出了什么事。站长已停止给过往列车打信号，甚至连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列车经过也无人理睬。尽管有受军法审判的危险，但没有人操心清扫轨道上的雪堆。意外事件出人意料地向托洛茨

① 《真理报》1920年1月16日。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24－325页。

基暴露出,越来越大的真空带围绕着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人民陷入了深不可测的冷漠之中。托洛茨基愤慨之极,当场进行调查,命令军事法庭开庭。但他不能不考虑,单凭镇压不能医治人民的麻木不仁与冷酷无情之症。他在乌拉尔乡间逗留期间预感到情况愈来愈暗淡。他深刻意识到国家的元气和活力根源——农村——已经枯竭了。

这时他开始探索军事共产主义之外的补救办法。他带着应给农民恢复经济自由的措施这一结论回到莫斯科。他用清晰的措辞概括地论述了唯一能使国家摆脱绝境的改革方案:必须停止征用谷物,必须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出售余粮,还要使农民有利可图。政府和党没有认识到灾难的严重程度,因为看到最近强制征集的粮食比以前征集的还要多;但他认为这是因为白卫军撤退后实行征粮的地区比以前大得多。"然而总的说来,存粮有枯竭之虞。对此,靠改善征粮机构是无济于事的。"那条路会导致进一步的破坏和瓦解,进一步使劳动力减少,最终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衰退。[①]

托洛茨基的论据并没有说服中央委员会。列宁不准备停止征集粮食,托洛茨基所建议的改革在他看来是轻举妄动。他认为政府已经表明它太急于准备向和平时期过渡了:托洛茨基本人刚刚警告过中央委员会说波兰即将发动进攻。看来,与其在军粮供应办法上胡来,还不如坚持既定的政策比较安全,因为征粮毕竟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列宁和中央委员会还忘不了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43-544页。然而还不清楚托洛茨基是否意识到,如果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必然要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他本人主张的政策。他在以后几年中辩论说,他只是在军事共产主义背景下主张劳动军事化。然而当党的十大推行新经济政策时,他却坚持说他的劳动政策仍然有效,并说劳动政策同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参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1页和《我的生平》第2卷第38章。

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幻想。他们仍然希望在战争中作过巨大贡献的军事共产主义这一体制在和平时期甚至会更有用，认为托洛茨基的建议会引发使经济回到自由市场的危险潮流。而这正是孟什维克所要求的。托洛茨基难道和他们一致？他是否已变成了自由贸易者？有人这样质问他。[①] 他被告知，党已向有组织、有控制的经济前进，决不会被拖曳回去。

中央委员会拒绝他的建议。一年多以后，即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悲惨结局已昭示后，列宁才采用这一建议，作为新经济政策付诸实施。当时，而且至今仍然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是列宁的天才的重大措施，看做是他果敢而不教条的政治家才能的一个空前的功绩。根据事实来看，这一功绩至少是被夸大了；而且当托洛茨基后来指责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延迟了一两年之后才开始在经济政策上作出极重要的改变时，这一指责并不完全是空口无凭的。[②] 这一事件也表明，斯大林派硬说列宁是农民的朋友而托洛茨基是农民的敌人，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列宁获得农民的良好祝愿者的声誉，主要是靠新经济政策。

我们知道，越飞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1927 年越飞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说，托洛茨基的主要弱点在于不坚持自己的明智，特别是当唯有他一个人是明智的时候。[③] 人们可能要补充说，在这一次，托洛茨基因他的明智而遭非难，他又回头陷人那为众人认可的愚蠢之中，并且还顽固坚持，就连蠢人也认为这样太蠢了。在中央委员会拒绝他的建议之后，他就再不谈这个问题了。一个月后，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191 页。

② 参见 1921 年 8 月 7 日和 1922 年 8 月 22 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

③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即1920年3月底举行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也没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连暗示也没有。相反,他却作为政府主要的经济政策制订者出席大会,阐述下一阶段军事共产主义的总计划。难道他也相信他提出的修改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吗?难道他认为他主张的改革因孟什维克也大喊大叫地表示赞成就是失策吗?难道他担心整个党还处于没有接受能力的精神状态吗?很可能,所有这些动机都是促使他这样干的原因。

国家经济继续衰退下去,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党拒绝缓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严厉性,就不得不强化这些政策。托洛茨基同意承担这一任务的责任与耻辱。政治局迫切要求他负责已遭破坏的运输系统,并将完全支持他可能采取的措施,不管这措施多么严厉。托洛茨基推说不能胜任,但同意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暂时接管运输部门。[①] 随着信心的增加,他又回到劳动军事化问题上来。他在大会上说,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军事化对国家资源一体化并使之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计划经济还很遥远;但党和国家不应指望单凭小心谨慎的措施、得力的步骤就能实现计划经济。过去,俄国总是迅猛地飞跃前进;它将继续这样跃进下去。当然,在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强制劳动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强制劳动会达到极高的强度"。他力促大会批准纪律措施,说"措施的严厉程度必须同我们经济形势的悲惨性质相适应","应把开小差的工人"组成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②] 他主张给工作效率高的工人发鼓励工资及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他还讲到,有必要采取"泰罗制"的进步精华,即美国的科学管理和劳动组织概念,资本主义一直滥

① 参见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通信(1920年2月1日和3月9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126页。

用它，工人有理由痛恨它；但社会主义却能够并应当合理地利用它。这些意见当时使人吃惊。大会上有少数人指责这些思想，他们愤怒地反对托洛茨基政策中的惩戒性倾向。构成这个少数的是"自由派"、"极左派"、"民主集中派"，它们由奥新斯基(Осинский)、萨普龙诺夫(Сапронов)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领导。将来有一天他跟这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但此时他却是他们的主要对头，而且他支配着大会。[①]

不久以后，他又一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他的政策。他要求工会训练工人，要求它教导他们把生产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需求之上。工会中央委员会已经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支持托洛茨基的"生产主义者"立场；另一个由托姆斯基领导，认为工会不能不维护工人提出"消费主义者"要求的权利。托洛茨基争辩说，工人首先应生产出能满足他们要求的物资，他们不应忘记他们是在为工人国家劳动而不是在为旧的有产阶级劳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工会工作者从经验中懂得，这样的主张不能影响挨饿的工人。但党既然批准托洛茨基的政策，他们就不能公开反对他。孟什维克在大会上成为不满分子的代言人。他们攻击劳动军，否认政府有权征召工人并剥夺他们保卫自己利益的自由。他们争辩说强制劳动是没有工作效率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宣称："你不能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建立计划经济。"[②] 阿布拉莫维奇创造的这一警句几年以后在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时曾一再重复。孟什维克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在革命中的经历固然可悲，甚至可恶，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论点合乎逻辑和事实。他们论证说，只要不许农民自由出售粮食就不能阻止工业劳动力的浪费，这时，托洛

① 《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第81－84、123－136页。

②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97页。

茨基本人在心里对这一点是无从反驳的。[①]

他对批评的回答只不过是一篇才气横溢的诡辩之词。这一回答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企图为强迫劳动作逻辑上的辩护——现实中的监工们和手拿鞭子的人绝不会费脑筋去制造这种辩护。托洛茨基论据的要点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人为了生存都必须劳动",因此劳动总是强制性的;共产党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无需说假话,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为全社会的利益而组织劳动的。他含蓄地否认劳动固有的强制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有什么意义。人类做过奴隶、农奴、自由工匠、独立农民和挣工资的自由劳动者。社会关系使劳动固有的强制性或者加强或者减弱。人类为减轻劳动的强制程度而与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过斗争。俄国革命曾许诺要通过合理的经济组织手段从根本上减轻劳动的强制性。诺言不能兑现,这不是革命的过错,而是因为固有的贫困、几次战争和封锁的破坏。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特意否定这一许诺。看来这就是他要做的,当时托洛茨基对工会说,强制劳动、严密组织劳动和使劳动军事化都不只是紧急措施,并说工人国家按常规有权强制任何公民在国家选定的地方完成任何工作。

(他说)我们现在朝着这样一种类型的劳动前进,这是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调控的劳动,它对全国来说是必须履行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我所说的这一根本意义上,劳动军事化对组织我们的劳动力是必需的基本方法。……说强制

① 孟什维克达林在大会上列举了这个预示着新经济政策的政策改变的例子。《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8页。

> 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难道这是真的吗？……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①]

他因希望为自己倡议的措施作辩护而难以自制，这个杰出的叛逆者，不断革命的阐明者，他的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为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作辩护的辩护士。

波兰战争一度减弱了这场论战的锋芒。外来的危险又一次使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以前曾激起过极大反感的政策。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托洛茨基身边围着一群技术人员，他决心努力使铁路运转起来。当时现有的机车几乎完全损坏了。工程人员预测出俄国铁路全部瘫痪的确切时间就在几个月之后，托洛茨基置铁路工人和修理厂人员于军法管制之下，系统而迅速地组织所有机车的修复工作。他走进修理厂对工人说，国家因为他们的懈怠而付出血的代价，运输瘫痪助长了波兰人的攻势。他声称："工人的情况在各方面都令人痛心……比以前更为恶化，我要是说明天情况一定会好起来，就是欺骗你们。不，我们面临着几个月的严峻斗争，直到我们能把国家从可怕的苦难和彻底的衰竭中解救出来，直到我们能再不在药剂师的天平上称我们的面包配额为止。"[②] 当铁路工会起来反对他的行动时，他免去了工会领袖们的职务，任命其他愿意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他在其他运输工会中反复采取这一步骤。9月初他建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控制整个

---

①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87－96页。

② 参见1920年6月21日托洛茨基在穆罗姆斯克工厂的讲话，载《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68页。

运输领域。政治局履行诺言完全支持他。看来,在那个时候要在工会里履行选举权和投票程序就像在一个感染瘟疫的城市里进行选举一样荒谬。他创造了出乎预料的成绩:铁路运输提前恢复——经济机体已恢复血液循环——人们欢呼他的功绩。[1]

但波兰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不满和争论又重新爆发了,而且其势头比以前更大。他自己就是激起这场爆炸的肇事者。他因成功而兴奋,威胁着要"改组"各种工会,像他"改组"运输工会一样。也就是说,他威胁要免去工会的当选的领袖而代之以任命的领袖,这些任命的领袖会把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工人局部利益之上。他的做法严重地超越了限度。这时列宁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做法,并劝说中央委员会也拒绝。中央委员会公开号召党奋力抵制"军事化与官僚式的劳动方式",并严厉批评堕落了的集权制,说这种集权制粗暴压制经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中央委员会还号召党要重建工会中的无产阶级民主,其他一切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要服从这一任务;[2] 并且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监督这些决定的实施。季诺维也夫主持这个委员会,托洛茨基虽也在这个委员会中,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反对他的。[3] 中央委员会禁止托洛茨基公开谈论工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以此作为最后致命的一击。

托洛茨基并不想改悔,只是含怒不语。12 月初,他在中央运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15 卷第 345 – 347 页关于有名的 1042 号有关铁路的命令。同年稍晚些时候,任命托洛茨基为特别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采取紧急行动恢复顿涅茨流域及乌拉尔的工业。

② 参见《俄共中央委员会通知》1920 年第 26 号和《季诺维也夫全集》第 6 卷第 600 页及以后各页。

③ 特别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和托洛茨基组成。后来,增选施略普尼科夫、卢托维诺夫、洛佐夫斯基和安德列耶夫。其中只有安德列耶夫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也只有他在 30 年之后仍是斯大林最后一届政治局的成员。

输委员会的闭幕会议上对工会主义者进行还击。照他所说，这些人善于指挥过去的罢工，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却知之甚少。他为自己实施压制和蔑视工会选举要求的做法进行辩护，并严厉批评那些人大声叫喊的“新官僚正在恢复沙皇政府的办法”之说。他回答说：“官僚……不是沙皇统治的一个发现，而是代表着人类发展中的整个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并没有结束。按等级制度组成的、能胜任的文职人员有其功绩；俄国吃的苦头不是由于有工作效率的官僚过多，而是由于缺乏有能力的官僚。他反复说明这个论点，争辩说，为了工作效率，必须给官僚以若干有限特权。他就这样使自己成了管理集团的代言人，这一点后来使斯大林能似乎有理由用“官僚的族长”来奚落托洛茨基。[①] 托洛茨基说，他深信他能争取群众支持他的政策；但经济与社会的崩溃没有留给他们应用民主程序的时间，因为俄国群众文化和政治水平的低下使民主进程慢得令人难以忍受。“你们称之为通过任命人员来指挥、来管理的东西，它跟群众的启蒙教育、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以及我们行政机关的力量恰好成反比。”[②]

中央委员会再一次断然地拒绝了他的论点。托洛茨基烦躁地提醒列宁及其他委员，他们过去何等频繁地私下催促他这个“解决困难问题的能手”要无情地行动起来、无需考虑民主，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又假装捍卫民主原则而反对他，这是他们言行不一的表现。[③]

折磨整个政府体制的更深层的灾难在于，由革命引起的人民的希望落空了，而这场激烈的争论只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1917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422页。

③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15页。

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多数,更不用说农民,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一种孤立感开始萦绕在领导集团的心头。工人阶级确实没有抱怨过革命,而是继续参加革命,他们满怀强烈的敌意对待任何反革命的公然骚动。十月革命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此时不能不在批评政府之前先要明确表示承认"十月的成就"作为开场白。然而对布尔什维克现行政策的抵制却是激烈和普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三年中一直黯然失色,几乎连头都不敢抬;这时又得到一些群众的支持。人们听到无政府主义煽动家猛烈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时甚至还表示同情。如果当时布尔什维克容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被赶下台的。[①]

布尔什维克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让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认为他们是为自己抓住政权不放,那就错了。革命理想主义至今仍使整个党生气勃勃,地下斗争和内战都为这一点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党紧握政权是因为它把共和国的命运跟它自身的命运等同起来,而且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捍卫革命的力量。布尔什维克的这一信条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革命的幸运,但也是革命的不幸。如果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狂热地献身于革命的党,革命简直不可能生存下去。然而假如还有一个党在行动中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和冲天干劲的话,那么,这个党由于选举的结果可能取代列宁的政府而不会使新生的共和国受到震动,但这样的党却并不存在。如果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卷土重来,就会破坏十月革

① 不少布尔什维克领袖明确或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0、176、230及同书各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0页上的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在托洛茨基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一封私人信件(1926年4月14日)中把工人阶级的"威胁性的不满"说成是1920-1921年那场争论的背景。托洛茨基档案。

命，至少它们会怂恿白卫军再一次碰碰运气，进行武装叛乱。布尔什维克纯粹出于自卫以及更广泛的动机，不可能愿意出现这样的前景。他们一旦退却，就会在刚刚结束了一场内战之后又使国家再投入一场新的内战；他们不可能认为这就是民主的需要。

在苏维埃的自由选举中无论如何产生不了明显的多数。1917年曾支持过克伦斯基的人尚未真正从声望扫地中恢复元气。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宣传"第三次革命"，好像在工人阶级中很有市场；但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有效地集中在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上，而且他们也绝不想夺取权力。他们的批评虽然激烈，却没有积极的政治纲领，没有重要的全国性的组织，甚至连地方性的组织也没有，更没有统治一个大国的真正愿望。他们的队伍里有真诚的革命家，有狂热之徒，也有十足的歹徒，鱼龙混杂。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旦垮台，继之而来的只能是一片混乱，然后就是公开的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决不允许饥饿而情绪失常的国家去投票表决，否则会使他们的党丧失政权并使国家陷人流血的混乱中。

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在胜利之后会碰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往往心照不宣地设想，在革命中支持过他们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肯定会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他们，直到他们实现全部社会主义纲领。尽管这种设想是天真的，但它起源于下述观念，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杰出思想，无产阶级一旦接受了这一思想，就永远不会再放弃它。这一观念是构成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论据的基础。那些派别在其创作出来的大量政治文献中对如果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失去工人的信任时该怎么办的问题，几乎都未考虑到。不顾工人阶级的意志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否有可能或者是否允许，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简单地以为工人阶级的意志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同样的理由，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或苏维埃）民主不

过是同一件事的互相补充,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专政是为了镇压有产阶级的反抗,而专政的力量及其历史的合法性来自工人阶级自由民主地表达意见。现在,在苏维埃制度的两个方面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如果允许工人阶级自由地发表意见、投票表决,他们就会破坏专政;反之,如果专政公然取消无产阶级民主,那么,就是照它自己看来也是自行剥夺了专政的历史合法性。按严格意义来说,这也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因此今后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称号根据的是这样的要求,即专政实行的政策是工人阶级根据本身的利益应当实行而且最终一定会得到认可的政策;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被认可,所以,专政充其量只是代表阶级的思想,而不是代表阶级本身。

此刻革命已到了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十字路口,这时它才发现不容易,或不可能使人民在十字路口坚持他们的革命信仰,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当人民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个问题涉及一场是否忠诚的冲突,冲突的某些方面比迄今所知的冲突都更深刻。因为这场冲突播下了以后数十年所有的激烈争论和血腥清洗的种子。

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个十字路口受尽精神的痛苦,在历史上很难找到比这更激烈、更紧张的类似的运动了。后来列宁回想起在1920—1921年冬季那场把党的实力消耗殆尽的激烈争论,把它称为一场"狂热病"和"致命之症"。辩论的题目是工会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尽管重要,毕竟还是从属问题。在有关国家性质本身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全党都专注于次要问题的争论,因为党没有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主要问题,而且无人敢按照自己的想法坦率地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但在参加辩论的首要人物继续辩论下去的过程中,他们却再三接触到这个根本的大问题,并且被迫表明他们的态度。

在这里不必深入探究工会问题的某些复杂的、技术上的分歧，尽管革命的戏剧性事件本身会在这场貌似枯燥、但其意义是符合时代精神的经济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出来。[①] 概括地说来，只要举出三种具体化的立场就够了。以托洛茨基为领导(后来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共同领导)的一派主张剥夺工会的自主权，把工会并入国家机关。这是托洛茨基从他与工会的冲突中得出的最后结论。在新的制度下，工会领袖作为国家公仆，代表国家对工人说话，而不是代表工人对国家说话。他们要提高生产率、维护劳动纪律；他们要为产业管理部门训练工人；他们还要参与管理国家经济。

另一个极端是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领导的工人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和党对工会的指导。他们指责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劳动军事化的首创者、不平等的提倡者。他们按照准工团主义者的方式要求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全国生产者代表大会要对全部经济承担监督职责。当托洛茨基论证说工会维护工人而反对工人国家这种概念不合逻辑时，什利亚普尼科和柯伦泰已经给苏维埃国家打上新特权官僚堡垒的印记了。

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介于这两个极端派之间，代表着布尔什维克主体意见说话，并试图保持平衡。他们也坚持认为，约束工人和培养工人对国家、对国有化经济的责任心是工会应尽的义务。他们强调党有权监督工会；但他们也希望保持工会作为自主的群众团体的地位，使它能对政府和产业管理部门施加压力。

在这些立场中含有对国家、社会的不同概念。工人反对派和所谓的民主集中派是反对专政、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民主"的卫士。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反对政府

① 在多伊彻的《苏维埃工会(工会在苏维埃劳动政策中的地位)》中可看到对这次争论的详细叙述，参见该书第42－59页。

企图“强迫工人信仰”的方法,要求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使党获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他们所用的语言是全党在1917年早已说过的语言。他们是这次革命中的真正“平等派”,是品德高尚的乌托邦梦想家。党如果不准备高尚而又不可原谅地自取灭亡,是不能听他们的话的。党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托付给由于内战、饥饿与黑市而变得力量削弱、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在工人反对派的经济要求中显然有堂吉诃德精神。工人反对派大声疾呼,要求立即满足工人的需要,要求给全体工人同等的工资和报酬,要求无偿供给工人衣食住,要求免费医疗、免费提供交通工具和免费教育。[①] 他们想要看到的决非别的,而是充分实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然而这一纲领在理论上是为物质非常丰富的经济设计的。他们甚至不想说明当时的政府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力促党再一次把工业,或者说是工业的残余置于工厂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而那些工厂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已经表明只会挥霍浪费国家的财富。笼罩在这样空想氛围中的人几乎是唯一拥护完全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人,这是不幸的兆头。

托洛茨基跟他们不同,他敦促党暂时停止鼓吹和实施无产阶级民主,代之以全力以赴地建设生产者民主。说得更明白些,党将拒绝工人们的政治权利,而用给工人在经济建议中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以及管理的职责来作为补偿。在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这场争论达到高潮时,托洛茨基争辩说:

> 工人反对派提出危险的口号,他们使民主原则成了偶像崇拜。他们把工人选举代表的权利置于党之上,仿佛党没有权利维护它的专政,即令这一专政只是暂时同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63页;A.M.柯伦泰:《俄国的工人反对派》。

> 工人民主的一时情绪相抵触。……在我们中间必需确立党有革命历史继承权的认识。不管群众的自发情绪有何种暂时的波动，甚至在工人阶级中有何种暂时的动摇，党始终有责任维护它的专政。对我们来说，这一认识是一元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专政并不是在每一特定时刻都以工人民主的刻板原则为依据，尽管工人民主无疑是使群众能愈来愈深入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①]

很久以前托洛茨基曾论证说，苏维埃政府体制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因为在苏维埃体制下，选举人除了别的权利外，还享有在任何时候而不仅是在规定的选举期间再选代表的权利，这样能使苏维埃准确、及时地反映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并说这是任何议会制都做不到的。他这些对无产阶级民主的信心的一般声明此时听起来好像不过是些保留条款而已，其中最必要的是"党的历史继承权"以及党的这一认识是"一元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面对国内人民的敌意或冷漠情绪，他委婉而又有说服力地称颂和宣扬领导集团的集体团结。

列宁拒不言明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背离。他同样认识到政府和党是与人民有矛盾的；但他担心托洛茨基的政策会使这种矛盾持续化。党不得不制服工会和解除工会中难以管束的领袖的职务，不得不打破或消除群众的反抗，并制止在苏维埃内自由地形成舆论。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革命。但他希望这些实际做法会使他的政府有喘息的时间——他的全部政策成了单纯为赢得喘息时间而作的斗争，党在喘息时间内可以修改自己的政策，加速国家的复兴，减轻劳动人民的困苦，争取他们重新支持布尔什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2、215页。

维主义,那时专政就能逐渐恢复为无产阶级民主。如果这就是目标,像托洛茨基所赞同的那样,那么党就必须立刻重申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不能没有限度地一味提议放弃它。列宁说,尽管现政权曾经常求助于强制,但强制必须是不得已的手段,而说服则是首先求助的办法。[①] 所以,工会不应变成国家的附属机关。工会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在有必要反对政府时,工会应该代表工人说话,工会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而不应当成为训练机构。行政管理人员——托洛茨基正是从行政管理人员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对工会的要求可能会感到烦恼和不便;他们也许在反对工会的某些具体要求方面是对的;但总的来说,使他们感到不便和受到真正的社会压力和社会影响,这是正常的。如果对工人说不应反对工人国家,这没有用。国家是抽象的概念。列宁指出,实际上,他领导的政府必须考虑工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农民的利益;由于混乱,由于"官僚"的严重"歪曲"以及行使权力的专横,政府的工作搞得很糟。所以,工人阶级尽管自我克制,但也应该自卫和坚持对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按照列宁的看法,国家必须为多种利害关系和多种势力或影响提供发挥的机会。托洛茨基的国家概念则含有一元化的意思。

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列宁的决议案,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已离开无产阶级民主;但它还没有准备接受它的替代物——一元化的国家。

※　※　※　※　※

在会议期间,在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爆发了在所有俄国暴动中最意外的暴动。用列宁的话说,这场暴动像闪电一样照亮了现实。

---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08页及以后各页。

暴动者是红色海军的水兵，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自从2月底以来，他们一直极不安定。彼得格勒附近发生过罢工，而且预料会有一场总罢工；喀琅施塔得由于听信彼得格勒工人与军队发生冲突的谣传而骚动起来。军舰上的水兵被与1917年时的热情相近的政治狂热所支配。他们在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给工人自由、对农民实施新政策和苏维埃实行自由选举。随之，要求"第三次革命"的呼声开始在会上占优势，这是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民主的革命。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加里宁果断地到达海军基地；他斥责水兵"不忠诚、不负责任"，要求他们服从。派到彼得格勒的一个水兵代表团在那里被捕。

喀琅施塔得顿时到处响起了"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喊声。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政委被撤职，并被关押起来。一个无政府主义委员会僭取了指挥权，在水兵的狂热中升起造反的大旗。一位参加过这场暴动的无政府主义史学家写道："英勇、慷慨激昂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理想是解放俄国……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和全世界人民皆兄弟。他们视'第三次革命"为向最后解放的逐渐过渡；把建立自由选举独立的苏维埃看做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苏维埃当然不受任何政治党派的支配——它自由地表达人民的意志及利益。"①

布尔什维克斥责喀琅施塔得水兵是受白卫军将军领导的反革命叛乱者。这一斥责看来并无根据。布尔什维克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地与白卫军策动及怂恿的叛乱进行斗争，不能不使自己相信白卫军也插手了喀琅施塔得的这场叛乱。在事发之前，一家流亡白俄的报纸确实隐晦地暗示过喀琅施塔得正在酝酿一场动乱；这使怀疑显得可信。政治局在开始时想要进行谈判，最后决定镇压

① 亚历山大·伯克曼：《喀琅施塔得暴动》第10－11页。

叛乱。政治局不能容忍海军的挑战，担心即使叛乱没有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也会加剧普遍的混乱。就是在白卫军失败之后，仍有不少叛军和匪帮在北部海岸到里海一带到处游荡、袭击劫掠城镇、杀害政府机关人员。伏尔加河流域的饥饿农民队伍高喊着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口号横行于萨拉托夫省。同年晚些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用 27 个步兵师去征服他们。[1] 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如果宽大地处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肯定会被视为软弱的表示，终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3 月 5 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命令叛乱者无条件投降。他说："只有投降的人才能指望得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宽恕。我在发出这一警告的同时正在颁布命令，用武力镇压叛乱的一切准备业已就绪……这是最后的警告。"[2] 托洛茨基对水兵们说这样的话，该是又一个历史的讽刺落到他的头上。因为这曾是他的喀琅施塔得，是被他称为"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在 1917 年的骚动的日子里，他曾多少次在这个海军基地上发表政治演说！水兵们曾多少次把他抬在肩上狂呼他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领袖！他们多么忠诚地追随他到塔夫利达宫，到十字监狱他的牢房，到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城下，对他言听计从，几乎到盲从他的命令的地步！他们共同分担过多少忧患，一起冒过多少风险！的确，老战士中活下来的已寥寥无几，而仍留在喀琅施塔得的则为数更少。这

① 参见 C. 加米涅夫、沙波什尼科夫和斯米多维奇与萨拉托夫地区司令的通信和 1921 年 7 月 16 日图哈切夫斯基给列宁的报告，存于托洛茨基档案。这里还有一封 1921 年 3 月 25 日近北极地区的共产党员给列宁的有特色的电报："北方托波尔斯克地区的共产党员的鲜血将要流尽，我们向战无不胜的俄国共产党、向我们亲爱的同志和我们的领袖列宁致以临别的赤诚敬意。我们对最后胜利坚信不疑，我们对党和共和国尽了我们的职责，在这里殉职。"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 17 卷第 2 册第 518 页。

时“阿芙乐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及其他著名战舰上的水兵都是从乌克兰农民中招来的新兵。他们缺乏——托洛茨基这样对自己说——老一辈无私的革命精神。但即便这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革命的处境,进行过革命的普通男女已不再是以前的他们了,或者已不再在原来的地方了。其中最优秀的已经牺牲,其他的专心致力于行政管理;更有些人意志消沉了,变得心灰意懒、怨天尤人。而喀琅施塔得叛乱者提出的要求不过是托洛茨基答应过他们的兄长的许诺,但他和党一直未能兑现。正如布列斯特和谈以后一样,他自己说过的话竟以讽刺而带有敌意的回声又一次从别人的嘴里传回到他的耳中,他不得不再一次压制它。

叛乱者不理睬他的警告,希望争取时间。当时正是3月中旬,芬兰湾仍然冰封未解。但几天后可能开始解冻;而那时,由全部波罗的海红色海军守卫着并确保能得到芬兰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军需供应的、大炮林立的的喀琅施塔得将成为攻不进去的要塞,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战胜的。与此同时,甚至加入叛乱的共产党员也宣称他们已脱离“刽子手托洛茨基的党”。因此托洛茨基(或者是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在浮冰阻挡进路以前必须夺取要塞。紧急调遣精选的师团和突击部队增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当叛乱的消息传到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引起十分强烈的震惊和愤怒,大多数体格健壮的代表们都直接跑出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主动担当将越过芬兰湾攻击要塞的突击队的先锋。就连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头头们也投入了战斗,尽管他们在大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同叛乱者的要求大同小异,但他们也认为,水兵即使要求正当也无权手扣板机、发号施令。

布尔什维克部队往军服上披上白布,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跨越芬兰湾向前挺进。他们遇上从喀琅施塔得阵地上射来的暴风雨般猛烈的火力。冰层在他们脚下破碎;披着白色伪装的进攻

队伍一批接一批地进入冰冷的英烈祠,向死亡的进军仍在继续。新到的几个纵队从三个方向进攻,他们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动、匍匐前进,直到他们也消失在炮火、冰块和海水中。当密密麻麻、成排成排的进攻队伍前仆后继地被淹死时,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看来,仿佛走上邪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同时被淹死了,仿佛他们自己的纯真的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这些叛乱者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责骂布尔什维克的暴虐,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让革命吸吮人类仁慈的乳汁,他们就是这样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战斗的残酷在整个内战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进攻部队的怨恨与愤慨也因而增加。3月17日,布尔什维克在暴风雪中通宵挺进之后,终于成功地登上城墙,当他们冲入要塞时,就像复仇女神一样满腔怒火地砍杀防御要塞的水兵。

4月3日,托洛茨基检阅胜利的部队。他说:“我们曾尽可能久地等待我们盲目的水兵同志,以便让他们亲眼看到叛乱走向何方。但我们面临的威胁是冰将融化,因而我们不得不开始……进攻。”[①] 他称被击败了的叛乱者为“同志”,无意中表明他所庆祝的胜利在道义上说来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几个月后,访问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认为,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内战中常见事件之一,但使他们惊异和困惑的是,他们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讲到叛乱者时,没有像过去对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那样的愤怒与仇恨,他们的话里充满了“同情和保留”以及像谜一样的悲惨暗示,对外人暴露了党在良心上内疚。[②]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23页。

② 安得烈·莫里札特:《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家里》第78－84页;V.塞尔日:《革命回忆录》第4章,根据在俄国的外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叙述喀琅施塔得事件,这两位作者尽管都同情叛乱者,但都同意党陈述的理由。

※　※　※　※　※

3月15日，当时这场暴动还未被打败，列宁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新经济政策。大会几乎未经辩论就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心情沉重、默默地跟军事共产主义的梦想分了手。像列宁说的，退却是为了能更好地前进。有关工会及根本问题的争论也马上平息下来。芬兰湾上的炮击以及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罢工毫无疑义地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据随后几年推行的比较温和的混合经济政策来看，无论如何是没有劳动军事化的余地的。

但尽管如此，那场争论并非仅仅是一时的大吵大闹。争论对未来的意义比参加辩论双方所能料想的更大。斯大林在1920—1921年时支持过列宁的“自由”政策，但10年后，除了名称之外，他把托洛茨基的意见全部端了过来。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当时都不承认这一事实：斯大林——他不能承认他为了接受托洛茨基的立场而放弃列宁的立场；托洛茨基——他看到自己的意见已被他的敌人以残暴的方式付诸实施，因而畏缩、不敢承认。对托洛茨基1920—1921年纲领中的每个要点，斯大林在30年代的工业革命中几乎都利用了。斯大林推行征召劳役政策，指挥劳动；他坚持让工会采纳“生产者”政策以取代对工人消费利益的维护；他剥夺工会最后一点点自主权，变工会为政府工具，他使自己成为管理集团的保护人。他给管理集团的特权是托洛茨基做梦都想不到的。他命令在工厂、矿山进行“社会主义竞赛”；他这样干时都是任意使用托洛茨基的话，而且连字眼儿都是从托洛茨基那里拿过来的。托洛茨基提倡过“苏维埃泰罗制”，斯大林则把自己残酷无情的“苏维埃泰罗制”翻版付诸实施。最后，他把托洛茨基为强制劳动辩护的论据用于实施大规模的强制劳动，而托洛茨

基只是从理性和历史的角度模棱两可地证明强制劳动是合理的。

在前一章中我们探索过不自觉的历史延续性的线索,即开始于列宁关于靠征服进行革命的迟疑而羞怯的文章到斯大林这个征服者制造革命这一线索。另一条微妙的类似线索把托洛茨基那几年的国内政策与后来他的对手所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托洛茨基和列宁各自在不同领域都曾不自觉地充当了斯大林的鼓舞者和敦促者。两个人都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和他们自己的幻想所驱使而形成了某些看法,而环境和他们自己的顾虑又不容许他们坚持这些看法——这些看法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跟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不协调,跟他们自己生活的主旋律也不协调。[①]

只是在革命和国家受到彻底解体的威胁时托洛茨基才提出由国家对工人阶级实行全面管理的思想。他的警觉、不安定、不断探索的头脑在相互矛盾的方向中大胆寻求出路。各个方向都走向极端,而布尔什维克却踏步不前。他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党还在固执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接着,他的思想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探索到底并得出另一个结论:医治军事共产主义的弊病只有靠铸成铁的劳动纪律。到这时候布尔什维克的主导意见才刚慢慢地趋向新经济政策,迫使他放弃自己的结论。使托洛茨基失败的正是他那清晰、前后一贯、敏捷迅速的逻辑——即不能忍受混乱与贻误工作这种真正行政管理者的逻辑。他心里牢记的是他的目标,他轻率而仓促地投人争论,急躁地提出他的论点并从中引出概括的结论,而且不顾舆论的动向,直到他由于好高骛远而失败、最终引起愤怒和不满。如果在他身上自信的行政管理者战胜了敏感的政

① 1929年初,即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后几个星期,党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竞赛",全文引用的是1920年党已通过的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决议案。当然没提作者的姓名。

治思想家，就会使他看不到自己计划的复杂性。在托洛茨基试验性思想中的仅仅一个方面，到了斯大林的思想中却要成为全部。[①]

托洛茨基在其失误中仍保持其理性的真挚——真挚到于事无补的地步。他不想隐瞒他的政策，总是直言不讳，不管如何令人不快。因为惯于用论据的力量支配人民并诉诸理性，所以在最不合理的的事情上他仍然诉诸理性。他公开鼓吹高压统治的政府；而对这样的政府绝不能公开鼓吹，只能在暗中实施。他希望说服人民，但他们不需要一个依靠说服的政府。他告诉他们工人国家有权使用强制劳动；而当他们不愿争先恐后地到劳动营报到时，他感到由衷的失望。[②] 他的表现这样荒唐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并没有残酷而缓慢折磨人类肉体的无情强制的机器，只有那不朽而又短暂的“无产阶级斯巴达”的主要原则，而这些原则的严肃性却是社会主义开拓和冒险的组成部分。他的行为表现出的荒唐性本身就含有解毒剂。他的坦率使人们能充分注意到威胁他们的危险。他指明了他准备要达到的界限，并把他的政策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他亲自做了他有权做的一切，激起了导致他失败的反抗。他要在政治上保持活力，需要的是正大光明。反之，斯大林要使其思想付诸实施，需要的则是蝙蝠般的性格。

布尔什维克仍然捍卫无产阶级民主，反对托洛茨基；但在实际

① 列宁在遗嘱里说托洛茨基“过于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大概指的 [illegible]

行动上却继续背离无产阶级民主。

只是到了1921年时,列宁政府才开始禁止苏维埃内的一切反对派组织。整个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折磨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会儿宣布他们为非法,一会儿又准许他们公开活动,接着再镇压他们。严厉的路线和温和的路线都是由于环境和那些党派的摇摆不定所决定的。在那些党派中,有些集团倾向布尔什维克,另一些倾向白卫军。不过,这几个党派应该受到镇压这一思想在内战结束前原则上并未深深扎根。反对派集团即使在被压制期间也没有明确要求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他们仍然进行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常用暴力或计谋把他们排除出苏维埃或者减少他们的代表人数。列宁政府正是通过苏维埃这个机构组织进行内战的,尽管在这个机构里,它并不准备支持敌对分子或中立分子。但政府仍然盼望结束敌对状态,到那时候苏维埃就能尊重苏维埃宪制的法规,重新承认合法的反对派。布尔什维克认为此时他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所有的反对派都曾为喀琅施塔得的叛乱欢呼过;因此布尔什维克明白他们能期望于反对派的是什么。他们在国家中越孤立,就越害怕他们的反对派。他们没有彻底镇压反对派是为了争取内战的胜利;内战既已胜利,就要对反对派进行一劳永逸的镇压了。

说也矛盾,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放宽了经济政策这一事实才使他们确立自己的政治垄断。新经济政策使个体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这些人在其利益开始发挥作用时,就会设法创造表达政见的手段或试图利用反布尔什维克的现存组织,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这句由布哈林创造的名言表达了党内普遍的看法。有些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垄断感到不安,但更加害怕另谋抉

择。托洛茨基后来写道,他和列宁曾商定,只要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更趋稳定,就取消对反对派的禁令。这可能是事实,然而当时布尔什维克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派不可避免地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一信念在斯大林时代的斗争中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总是害怕城市的新生资产阶级(它在新经济政策下很快兴旺起来)、知识分子和农民联合起来结成有压倒实力的联盟而共同反对他们;因而他们为防止这种联盟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在内战胜利后,革命为摆脱虚弱而开始陷入集权主义。

与此同时,镇压布尔什维克队伍内部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工人反对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民主集中派表达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就是这些失望和不满导致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分裂的趋势已定;对立斗争的集团都想像党内之党那样行动。既要建立一党统治,又允许党分裂为几个派别,这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事。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像老社会民主党一样分裂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运动,那么试问其中会不会有一派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呢?

在1921年党的代表大会的情绪中确有某种貌似没有道理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情绪也曾是1903年代表大会的特点。分裂同样给前途投下阴影——只是真正的分歧比1903年的更不成熟、更加模糊而已。这时托洛茨基也像当年一样,在争论中并没有站到他最后所属的那一方。这时他也像当年一样,急于要阻止分裂。因

见。他胸怀博大地邀请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特别是在争论专版和争论专栏上陈述见解。他要求大会把各个反对派的领导人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坚决主张反对派仍应是分散的,主张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应组成紧密的联盟。他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一条(保密)授权中央委员会开除违反这条规定的人,不管违纪者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托洛茨基支持这一条,至少他没有反对这一条;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这一惩罚性的条款本是针对托洛茨基最不可调和的对手施略普尼柯夫的,是用来反对他的。托洛茨基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人们竟会用这一条来反对他自己。

这一协议规定,只要反对派保持分散状态,就允许它们存在。而这样的协议只有在党员对次要或临时性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才是有效的。然而,当分歧严重并持续下去时,思想相同的党员就会联合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像工人反对派那样的人,他们指控领导集团是靠"资产阶级和官僚敌视群众的态度"而生存的,他们必然要同心协力地反对他们认为是党内凶恶可怕的组织势力。因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开始时虽可推迟分裂,但最终只能加速分裂。

仅仅在两年之后托洛茨基就接受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那些表达能力稍差的头头们所提出的不少批评和要求了,并发出强有力的共鸣,他也要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然而此刻他却帮助党打败了他们。

※　　※　　※　　※　　※

自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作为流亡者描写俄国过去令人难忘的往事以来,不过才过了几年。他那时指出:历史如何把俄国人民投入"严峻的环境",使他们受到有钱有势的欧洲的压力,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侵略,任凭"海中怪兽"似的集权国家摆布他们的命运。

他接着写道，这“怪兽”为了喂饱自己，使全国挨饿，它既要阻止又要加速社会各阶级的发展，而且使文明衰退。[1] 革命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人民征服“海中怪兽”的胜利。看来这是彻底的胜利，因为旧国家已化为灰烬。

然而革命也必须从这同一个“严峻的环境”里汲取营养和活力，它也从中汲取了环境的全部严峻性。新共和国富有胸怀世界的思想和抱负，但穷于“一千多年积累的贫困”。新共和国非常痛恨贫困，但贫困却深入到共和国的血肉和呼吸中。

托洛茨基曾把西欧封建主义的“塔尖拱顶和哥特式的花饰”跟只能使小木屋的缝隙中长满苔藓的俄国封建主义的粗陋原始的建筑作过对比。他曾把欧洲第三等级丰富而复杂的发展同俄国警察监护下的手工业行会，把西方的自由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人格”同“每个警察都可拳打脚踢的大鼻子”摆在一起，使之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和布尔什维克正是从被革命和战争震碎了的小木屋里开始率先倡导社会主义的。出乎预料的是，“先进文明的”西方却背弃了革命；几十年来，布尔什维主义为了改变祖国的环境不得不扎根于这个环境中。当时打出的社会主义这块牌子只能是展示历史遗产的标志。这个崛起的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拱顶和花饰，而是粗陋的、原始的、没有修饰的，这个社会主义被占优势的敌对势力所包围，不久就把自己交给新的怪兽国家——它好像是旧怪兽国家的死灰复燃。这个新国家像旧国家一样，既要保护国家，又要使国家挨饿；既要阻止国家的发展，又要加速国家的发展，而且要抹去人的个性，革命无产阶级的个性。痛恨怪兽国家的托洛茨基竟然成为复兴怪兽国家的第一个先驱，这又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

① 参见本书第七章。

当托洛茨基还在他事业的起点时就曾写道:“有能力对全社会实施专政的工人阶级决不能容忍有一个支配自身的独裁者。”[①]到了1921年,俄国工人阶级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实施专政,甚至不能对那些借它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实施监督。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内战中消耗殆尽,几乎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而存在了。托洛茨基当时宣布了党的“历史继承权”,声称党有权对无产阶级及社会的其他阶层建立托管制度。这是昔日的“雅各宾”思想:正直而开明的少数人有理由以自己“取代”未成熟的人民并把理性和幸福带给人民,这是托洛茨基曾发誓要放弃的曾使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和布尔什维克连续几代迷恋的思想。托洛茨基本人曾论证说这一“使人着迷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俄国所有社会阶级的衰退或麻木。他深信,随着现代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出现,这种衰退一定会被克服。革命证明他是正确的。然而,俄国社会各阶级经历了1917—1921年间能量的突然爆发和艰巨无比的斗争之后看来已深深陷入麻木状态。近几年来如此拥挤的政治舞台变得冷落了,只有一个集团留在舞台上兴高采烈地代表人民讲话,甚至这个集团本身的圈子也愈来愈狭窄了。

当托洛茨基力主布尔什维克党以自己“取代”工人阶级时,他在繁忙的工作和频繁的争论中并没有考虑历史进程的下一阶段,尽管他早已以令人震惊的锐利目光预言过这一阶段。他说过:“首先是党组织以自己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

那个独裁者已经在一旁等待了。

---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参考书目

（本索引中所录书目仅仅是作者摘引或者直接提到的原始资料）

Akimov, V. L. (Акимов, В. Л.),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Развития РСДРП***. Geneva, 1905.

Antonov – Ovseenko, V. A. (Антонов – Овсеенко, В. А.), ***Записки 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т. 1. Москва, 1924.

Arschinoff, P., ***Geschichte der Machno – Bewegung, 1918 – 1921***. Berlin, no date.

Avdeev, N. (Авдеев, Н.), и другие,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и***), т. 1 – 5. Москва, 1923 – 1926.

Axelrod, P. B. (Аксельрод, П. Б.), ***Письма П. Б. Аксельрода и Ю. О. Мартова***. Berlin, 1924.

Badaev, A. E. (Бадаев, А. Е.), ***Большевик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Москва, 1930.

Balabanoff, A., ***My Life as a Rebel***. London, 1938.

Beatty, Bessie, ***The Red Heart of Russia***. New York, 1918.

Beer, M., ***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37.

Berkman, A., ***Der Aufstand von Kronstadt***, Reprint, ***Der Monat***. Berlin, no date.

The Bolshevik Myth. London, 1925.

Большев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Охран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Докуме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Большевизма с 1903 по 1916г. Бывшег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Охран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Сост. М. А. Цявловский. Москва, 1918.

Борьба За Петроград, 15 Октября – 6 Ноября 1919,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Г. Зиновьева. Петроград, 1920.

Brupbacher, F., 60 ***Jahre Ketzer***. Zürich, 1935.

Bryant, Louise,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 London, 1919.

Bubnov, A. (Бубнов, А.), and others, и другие,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1918 – 1921***, т.1 – 3. Москва, 1928.

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London, 1923.

Cherevanin, N. (Череванин, Н.),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й Вопрос***,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Мартова. Geneva, 1904.

Chernov, V.,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36.

(Tchernov) ***Mes Tribulations en Russie Soviétique***. Paris, 1921.

Czernin, Count Ottokar, ***In the World War***. London, 1919.

Dan, F. (Дан, 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зма***. New York, 1946.

Dabski, Jan, ***Pokój Ryski***. Warsaw, 1931. (The second edition of J. Dabski's memoirs published in Polish at a later date, contains muc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ackground to the Russo – Polish peace treaty of 1921. It was not available during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Denikin, A. I. (Деникин, А. И.), Генерал,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Смуты*** , ***т. 1 – 5. Paris – Berlin, 1921 – 1926.***

Доклад Русских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в Второму Итернационалу . Geneva,

Dubnov, S. M.,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 Philadelphia, 1918.

Eastman, M., ***Leon Trotsky: The Portrait of a Youth*** . New York, 1925.

Egorov. A. (Егоров, А.), ***Львов-Варшава*** . Москва, 1929.

Engels, F.,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 London, 1927.

Frunze, M. V. (Фрунзе, М.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1 – 3,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Бубнова. Москва, 1929.

Garvi, L. A. (Гарви, Л. 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 . New York, 1946.

Gorky, M., ***Lénine et le Paysan Russe*** . Paris, 1924.

Days with Lenin . London, 1931.

Hard, William, ***Raymond Robins' Own Story*** . New York, 1920.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Moscow, 1943.

Hoffmann, Max, ***Die Aufzeichnungen des Generalmajors Max Hoffmann*** . Berlin, 1929.

Ilin – Zhenevskii, A. F. (Ильин-Женевский, А. Ф.), ***Большевики у Власти*** .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Jaurès, J., ***L'Armée Nouvelle*** . Paris, 1911.

Kakurin, N. (Какурин, Н.) ***Как Сражалась Революция*** , т. 1 – 2. Москва, 1925.

Kerensky, Alxander (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здалека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 Paris, 1922.

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London, 1934.

Knox, Sir Alfred, Major General, ***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 – 1917***. London, 1921.

Kollontai, A.M.,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Russia***. London, 1923.

Krupskaya, N.K., ***Memories of Lenin***. London, 1942.

Kühlmann, Richard von, ***Erinnerungen***. Heidelberg, 1948.

Latsis (Sudbars), ***Чрезвычайные Коммисии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Москва, 1921.

Lenin, V. I. (Ленин, В.И.), ***Сочинения***, т. 1 – 35. Москва, 1941 – 1950. All quotations from Lenin's Works are from this, the fourth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This is the first edition of Lenin's Works published between 1920 – 1926, of which occasional use has been made for quotation of passages omitted from later editions.

Letters of Lenin. London, 1937.

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 4 – 20. Москва, 1925 – 1932.

Lenin's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other party leaders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some of it hitherto unpublished, has been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Harvard.

Lloyd George, D., ***War Memoirs***. London, 1938.

Lockhart Bruce, R.H.,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London, 1932.

Ludendorff, E.,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1914 – 1918***. Berlin, 1919.

Lunacharsky, A.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Силуэты***. Москва, 1923.

Lyadov, M.N. (Лядов, М.Н.), ***Как Начала Складываться Р.К.П***. Москва, 1925.

Из Жизни Партии. Москва 1926.

Material zur Erläuterung der Parteikrise in der S.D. Arbeiterpartei Rußlands. Geneva 1904.

Martov, L. (Мартов, Л.), Маслов, П., Потресов, 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Века***, т. 1 – 2. Петербург, 1909 – 1910.

Martov, L. (Мартов, Л.), ***Письма Аксельрода и Мартова***. Berlin, 1924.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 – Демократии. Москва, 1923.

Спаситель или Упразднитель. Paris, 1911.

Marx, K. and Engels, F.,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London, 1941.

Переписка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с Русски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ятелями. Москва, 1947.

Medem, Vladimir, ***Von Mein Leben***, ***vols. i – ii*** (***Yiddish***). New York, 1923.

Miliukov, P. N. (Милюков, П. Н.),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 Sofia, 1921.

Как Прошли Выборы во Вторую Гос. Думу. Петербург, 1907.

Mill, John, ***Pioneers and Builders***, vols. i – ii (Yiddish). New York, 1946.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Брест-Литовске, Сост. А. А. Йоффе,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Троцкого. Москва, 1920.

Morizet, A., ***Chez Lénine et Trotski***. Paris, 1922.

Noulens, Joseph, ***Mon Ambassade en Russie Soviétique***, vols. i – ii. Paris, 1932.

Olgin, M. J., 'Biographical Notes' in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rotsky's ***Our Revolution***. New York, 1918.

Paléologue, Maurice,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vols. i – iii. Paris, 1922.

Parvus (Helphand, A.L.), ***Росс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Петербург, 1906.

Pavlovich (Павлович), ***Письмо к товарищам о Втором Съезде РСДРП***. Geneva, 1904.

Plekhanov, G. V. (Плеханов, Г. В.), ***Год на Родине***, т. 1 - 2. Paris, 1921.

Переписка Плеханова и Аксельрода. Москва, 1925.

Pokrovsky, M.N. (Покровский М.Н.),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осква, 1929.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 2. Москва, 1927.

Popov, 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 P. S. U. (b)***, vols. i - ii.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16th Russian edition). London, no date.

Potresov, A. N (Потресов, A. H.), ***Посмертный Сборни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Paris, 1937.

Price Philips, M., ***My 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21.

Пятъ Лет Власти Советов. Москва, 1922.

Radek, K. (Радек, K.), ***Портреты и Памфлеты***. Москва, 1927.

Пять Лет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сква, 1924.

Ransome, Arthur,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London, 1919.

Раскол на Втором Съезде РСДРП и Второ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1933.

Raskolnikov, F.F.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Ф.Ф.), ***Кронштадт и Питер в 1917г***. Москва, 1925.

Reed, John,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London, 1934.

Rosmer, A., ***Le Mouvement Ouvrier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36.

Sadoul, Jacques, ***Notes sur la Révolution Bolchevique***. Paris, 1919.

Serge, V., ***Mémoires d' un Révolutionnaire***. Paris, 1951.

Sibiryak (Сибиряк), ***Студен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Geneva, 1899.

Slepkov, A. (Слепков, А.), ***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 Мятеж***. Москва, 1928.

Smilga, I. (Смилга, И.), ***Очеред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Москва, 1921.

Stalin, J.V. (Сталин, И.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1 – 13. Москва, 1946 – 1951.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Lenin, Trostsky,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Politbureau, some of it unpublished, is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Steinberg, I., ***Als ich Volkskommissar war***. München, 1929.

Sukhanov, N. (Суханов,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 7. Москва, 1922.

Sverchkov, D. (Сверчков, Д.), ***На Заре Революц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Trotsky, L.D. (Троцкий, Л.Д.)

The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he earliest document in this collection is dated Brest Litovsk 31 January 1918; the last bears the date 17 August 1940, three days before 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The Archives consist of four parts:

Section A: contains about 800 letters and messages exchanged between Trotsky, Lenin, and other Soviet leaders (1918 – 1922), and various other unpublished documents;

Section B: contains, in twenty-five dossiers, Trotsky's manuscripts and correpondence up to 1929;

Section C: contains, also in twenty-five dossiers, letters and memoranda from Zinoviev, Yoffe, Lunacharsky, Radek, Rakovsky,

Preobrazhensky, Sosnovsky, and many others. Most of this correspondence belongs to the period of Trotsky's exile at Alma Ata. This section also includes many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work of the Trotskyist opposition within the Soviet Union;

Section D: contains Trotsky's correspondence with groups and member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various countries. This section is sealed and is not to be made available for research before 1980.

The references to ***The Archives***, which occur in this volume are mainly to Section A. Only in a few instances are documents belonging to Sections B and C referred to. Extensive use of Sections B and C is made by the author in ***The Prophet Unarmed***, the next volume in this series.

Сочинения. (This was planned to be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Trotsky'sWorks, but its publication was discontinued in 1927, at the time of Trotsky's expulsion from the party. The following volumes, published in 1925 – 1927, were available to the author:

Т. Ⅱ (часть 1 – ая и чясть 2 – ая) ***Наша 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Т. Ⅲ: (часть 1 – ая) ***От Февраля до Октября***; (часть 2 – ая) ***От Октября до Бреста***;

Т. IV: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Т. VI: ***Балканы и Балканская война***;

Т. VIII: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луэты***;

Т. IX: ***Европа в Войне***;

Т. XII: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XIII: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Т. XV: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Т. XVII: (часть 2 – 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и Капи-***

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Мир;

Т.XX : ***Культура Старого Мира***;

Т.XXI : ***Культур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времени***.

Троцкий Л.Д., ***Как Вооружалась Революция***, т.1-3. Москва, 1923 – 1925. (The collection of Trotsky's military writings, orders of the day and speeches.)

Второй Съезд РСДРП (***Отчет Сибир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Geneva, 1903 (In the signature over this and the next work Trotsky used the initial N., not L.)

Наш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Задачи. Geneva, 1904.

История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 1906. Петроград, 1917.

Our Revolution. New York, 1918.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сква, 1919.

Террор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Петербург, 1920.

Between Red and White. London, 1922.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905. Berlin, 1923.

Пять Лет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сква, 1924.

Lénine. Paris, 1924.

Поколение Октября. Москва, 1924.

Моя Жизнь. т. 1 – 2, Berlin, 1930.

Перманент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Berlin, 1930.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s. i – iii. London, 1932 – 1933.

Vie de Lénine, Jeunesse. Paris, 1936.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New York, 1937.

Stalin. New York, 1946.

(Apart from the sources listed above, the author has quoted extensively from Trotsky's speeches printed in many published records

of party and Soviet congresses an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 Trotsky's early writings the author has drawn ***inter alia*** on the files of ***Iskra***, ***Nachalo***, the 'Viennes' ***Pravda***, ***Golos***, ***Nashe Slovo***, & c., sources rarely, if ever, used by previous writers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hese papers are in the Hoover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Tukhachevsky, M.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 ***Война Классов***. Москва, 1921.

Vandervelde, E., ***Souvenirs d'un Militant Socialiste***. Paris, 1939.

Voitinsky, V. (Войтинский, В.), ***Годы Побед и Поражении***. Berlin, 1923.

Voroshilov, K. (Ворошилов, К.), ***Сталин и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Москва, 1929.

Wheeler - Bennett, John W., ***Brest Litovsk. The Forgotten Peace***. London, 1938.

Witte, S. Yu. (Витте, С. 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 1 - 3.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 1924.

Zelikson - Bobrovskaya, Ts. (Зеликсон-Бобровская, Ц.), ***Перв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1905***, т. 1 - 2. Москва, 1925.

Zetkin, Klara, ***Reminiscences of Lenin***. London, 1929.

Zinoviev, G. (Зиновьев, Г.), ***Сочинения***, т. 1 - 16. Москва, 1924-1929.

Ziv, G. A. (Зив, Г. А.), ***Троцки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о Личны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New York, 1921.

The following editions of protocols and verbatim reports have been quotud: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 (***Август 1917 - Февраль 1918***). Москва, 1929

2 – ой Съезд РСДРП. Москва, 1932.

5 – ый Съезд РСДРП. Москва.

6 – ой Съезд РСДРП. Москва, 1934.

7 – о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 1923.

8 – о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 1933.

9 – 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 1934.

10 – 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

1 – 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1921. Москва, 1930.

3 – и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Петербург, 1918.

5 – 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Москва, 1918.

3 – и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Профсоюзов. Москва, 1920.

2 – о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Петроград, 1921.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orward – Vorwärts* (*New York*),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ue Zeit*, *Przeglad Socjal – Demakratyczny*, *The Times*,**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Голос* (*Paris*), *Искра* ('*old*' and '*new*'), *Известия*, *Извест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КП (б)*, *Красная Летопись*, *Луч*, *Начало*, *Наше Слово* (*Paris*), *Наша Заря*, *Новая Жизнь*, *Печать и Ревалюция*, *Правда* (*Viennese*), *Правда*,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Рабочее Дело* (*Geneva*, *1899*), *Русская Газета*, *Рабочий Путь*, *Речь Социал – Демокра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